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十三卷说明	VII - X X IX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3—177
序言	7—11
第一册 资本	13—177
第一篇 资本一般	15—177
第一章 商品	15—53
A 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	41
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54—177
1 价值尺度	54
B 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	66
2 流通手段	77
(a)商品的形态变化	77
(b)货币的流通	88
(c)铸币。价值符号	97
3 货币	112
(a)货币贮藏	115
(b)支付手段	127
(c)世界货币	139
4 贵金属	143
C 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	148

卡·马克思。* 意大利的统一问题	178—184
卡·马克思。欧洲战争前景	185—18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欧洲的金融恐慌	189—194
卡·马克思。路易·拿破仑的处境	195—199
弗·恩格斯。法国军队	200—206
弗·恩格斯。德国的兵力	207—212
弗·恩格斯。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	213—220
卡·马克思。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221—228
弗·恩格斯。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	229—234
卡·马克思。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	235—239
卡·马克思。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240—245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	247—299
一	249—252
二	253—281
三	282—292
四	293—299
卡·马克思。和平还是战争？	300—301
卡·马克思。土伊勒里宫的叹息	302—304
卡·马克思。法国的战争前景	305—310
卡·马克思。普鲁士的战争前景	311—315
卡·马克思。历史上的类似现象	316—319
弗·恩格斯。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320—324
卡·马克思。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	325—333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编者注

一	325—329
二	330—333
弗·恩格斯。* 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334—337
卡·马克思。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338—34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战争逼近的征兆。—— 德国的扩军备战	343—346
弗·恩格斯。战争的前景	347—351
卡·马克思。金融恐慌	353—355
卡·马克思。甜言蜜语	356—358
卡·马克思。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	359—364
弗·恩格斯。战争 365—370	
卡·马克思。维也纳要闻	371—377
弗·恩格斯。战况没有进展	378—382
弗·恩格斯。会战终于发生了	383—388
弗·恩格斯。蒙特贝洛会战	389—391
卡·马克思。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	392—396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	397—400
弗·恩格斯。战略	401—405
卡·马克思。马志尼宣言	406—412
弗·恩格斯。军事行动的经过	413—417
弗·恩格斯。军事事件	418—421
弗·恩格斯。奥军的失败	422—426
弗·恩格斯。马振塔会战	427—434
卡·马克思。斯普界河与明乔河	435—438
弗·恩格斯。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	439—443

弗·恩格斯。战争的消息	444—447
弗·恩格斯。索尔费里诺会战	448—451
弗·恩格斯。历史的公断	452—456
弗·恩格斯。索尔费里诺会战	457—461
卡·马克思。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	462—465
卡·马克思。意大利赢得了什么？	466—468
卡·马克思。媾和	469—471
卡·马克思。维拉弗兰卡条约	472—476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回顾	477—490
一	477—481
二	482—486
三	487—490
卡·马克思。被证实了的真理	491—495
卡·马克思。入侵！	496—499
卡·马克思。法国在裁军	500—502
卡·马克思。QUID PRO QLO	503—523
一	503—507
二	508—523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524—535
一	524—528
二	529—535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贸易	536—540
卡·马克思。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	541—545
卡·马克思。政治评论	546—548
卡·马克思。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	549—554

卡·马克思。工厂工业和贸易	555—559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	560—567
卡·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	568—585
一	568—571
二	572—576
三	577—581
四	582—585
卡·马克思。英国的贿选活动	586—591
卡·马克思。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592—595
卡·马克思。德国的动荡局势	596—600
卡·马克思。对华贸易	601—605
卡·马克思。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	606—608
弗·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	609—615
弗·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	616—621
弗·恩格斯。萨瓦与尼斯	622—626
弗·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	627—632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	633—680
一	635—643
一	644—659
二	660—669
四	670—680

附 录

“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	683
报刊选评	684—695

注释	699—76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63—779
人名索引	780—816
期刊索引	817—818
地名索引	819—833
货币、重量、容量名称表	834
译后记.....	835

插 图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5
1859—1860年摩洛哥战争	611

第十三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收集了 1859 年 1 月至 1860 年 2 月所写的著作。

1859 年是标志着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的一年，也是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加强的一年。欧洲各国出现了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持续很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即将结束。新的革命前景展现在工人阶级的面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1857—1859 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推动了政治的全面活跃。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它的后果到 1859 年仍有充分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活动，是为了准备国际无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业已成熟的条件下去迎接新的阶级搏斗。马克思继续努力钻研政治经济学问题，恩格斯则继续钻研军事科学、历史和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紧张地从事政论著作。他们系统地 in 报刊上发表有关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文章，而且还继续从事自 1857 年就开始的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工作。

为了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特别注意发展经济学说。早在四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

起就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根本原理。在此以后,马克思便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确定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后,就着手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年中马克思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极其重大的问题,他根据大量文献和资料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实况,研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技术史、农业化学、数学等),他利用这些科学领域的资料来更详尽地阐明许多经济学问题。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马克思就于1857年开始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我们搜集到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这部著作第一部分的草稿。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对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多年来的研究进行了某些总结,表述了马克思后来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发展的许多重要原理。1857—1858年手稿表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大体上已经制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原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有一部分是马克思打算在写作他计划写的那部经济学巨著时加以修改、补充和利用的原始材料。马克思准备把这部著作分册出版。第一分册于1859年1月脱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形式出版。

本卷的头一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弗·伊·列宁所指出的,这是马克思的那些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的著作之一。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清晰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的高度科学的见解,分析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和劳动的本性,制定了价值学说,研究了货币的起源、实质和职能问题。这部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批判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关于商品、价值、货币以及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马克思在他这部著作中为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奠定了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开头有一篇著名的序言,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天才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说,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原理,作了周密说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7页)。

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同时他着重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样就指出了科学地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页)来研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马克思在序言中表述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以及关于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革命、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为另一种比较进步的社

会经济形态革命地代替的主要原因这一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见本卷第 8—9 页)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死亡,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摆脱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

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他在该书中阐明的经济学问题,特别是用来分析商品、劳动、价值、货币。他揭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个矛盾的发展及其扩展到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上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商品和价值是永恒的自然范畴,马克思和他们相反,他证明了商品和价值在历史上的暂时性质。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研究指出,产品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生产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它在从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马克思把商品看作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其中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马克思在其对商品的分析中最先确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矛盾。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的过程中还弄清楚了,商品中包含的矛盾

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的矛盾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创造价值的劳动,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他确定并证明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个发现是使政治经济学中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得以阐明的“出发点”。

马克思根据对商品和劳动的分析发展了他的价值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在内,在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价值的交换中看到了物的交换,而马克思则在这种交换中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限于问题的数量方面,只限于规定价值量,而是首先详尽地阐明价值的本质,对它作出质的评定,指出价值是物化了的抽象劳动;他从理论上验证了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马克思依据他的价值学说确定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必然采取价值的形式。

马克思从自己的价值学说出发,对货币问题也作了详尽的研究。在经济科学中他最先阐明了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起源,指出了价值和货币的有机联系,认为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他揭示了货币的本质,研究了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作用,科学地确定并阐明了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金属货币和纸币流通的规律。同时,马克思也揭露出: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关于货币和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企图通过消灭货币的方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改善资本主义”的计划是一种空想。

马克思所创立的严整的科学的价值学说,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马克思以他的价值学说为基础,后来在

“资本论”中详细地、全面地制定了剩余价值学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即马克思计划写的那部著作的第一分册出版以后,马克思曾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在这一册中他打算阐述资本问题。但是,马克思在进一步研究经济的过程中对自己最初的写作计划作了很大的改变,决定暂时不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而对许多他认为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的问题继续作了研究。马克思的新的想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体现,该书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续篇。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中扼要地叙述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基本内容是必要的。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研究上的更加连贯和完整,而且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只作了初步阐述的他的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的学说的个别原理,要在“资本论”中加以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关于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学说,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原理等)。同时,正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指出的,他认为某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已详细探讨过的原理,在“资本论”中可以只作比较简略的阐述。所以,在“资本论”出版以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没有失去其独立的科学意义,而且有理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据一个卓越的地位。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对商品分析史、价值学说史和流通手段学说史等方面所作的探讨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文献中一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的最优秀的专题学术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作品,在本卷中占相当大

的篇幅,这就是他们在当时进步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那时他们继续为该报撰稿)和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恩格斯的以单行本出版的两本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和“萨瓦、尼斯与莱茵”。革命政论的写作在这个时期仍旧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主要活动形式之一。这些作品的内容充分反映了欧洲政治局势尖锐化以及新的革命事件成熟的过程。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注意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意大利反对专制奥地利和国内反动派(它们妨碍国内政治上分裂状态的消除和阻挠国家的民族统一)的压迫的不断加强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国内外日益加强的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各国革命民主力量的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切看作是预示欧洲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同时他们也密切注视孕育着国际关系的新危机和新战争的国际冲突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各种事件时,首先注意到资产阶级性的改造尚未完成,在许多国家中无产阶级都必须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必须解决在1848—1849年未能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首先是像德国的统一和意大利的统一那样的任务,以便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

马克思在“意大利的统一问题”这篇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要通过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办法来达到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统一的方针。马克思指出了意大利发生的各次人民骚动,他特别注意意大利民族运动中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即反对统治集团的政策“民族派”;当时意大利的统治集团为了王朝的反人民的利益,为了在皮蒙特的霸权下统一意大利,曾力图利用国内的局势。马克思看到,这些统治集团请求外国的“援助”、它们同追求自

私自利目的的路易·波拿巴结成同盟是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马克思希望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将会唤醒其他各国的人民起来革命,希望“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见本卷第184页)。

在“欧洲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和平还是战争?”、“法国的战争前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反动势力,首先是法国波拿巴统治集团想用发动新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爆发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就警告要防止这种战争,因为它一开始就可能“在各方面起反革命的作用”(见1859年2月4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同时,他们推测欧洲反动派是不能使战争“局部化”的,“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结束”(见本卷第18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促进各国人民的广泛开展的革命运动,使这场战争变为全欧洲性的革命战争。

虽然备战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在战争开始前好几个月就预言,以法国和皮蒙特为一方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向“论坛报”的读者揭露了促使路易·波拿巴及其仆从们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的真正原因,揭示了欧洲各国政府旨在加剧冲突的外交阴谋,指出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备战活动。在“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等一系列文章中,恩格斯从战略观点分析了未来的战场的特点和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大体上预言了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的国际危机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加强实际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和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参加了许多群众大会。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特别尖锐地感觉到发表政论性言论和影响社会舆论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机会受到了限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靠在“论坛报”上撰稿显然已经不够了。马克思在1859年3月28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时代改变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占领阵地,哪怕是为了不让其他政党去占领它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找各种办法去直接向欧洲大陆的读者群众说话。1859年3月马克思同意给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撰稿,但是由于奥意法战争的爆发,该报编辑部不敢让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因此谈判在当时没有获得成功。

1859年4月,恩格斯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有关意大利危机和日益临近的新战争的各个问题所持的立场。

“波河与莱茵河”一书是对复杂的国际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典范。恩格斯写这本小册子是供广大公众,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读者阅读的,因此他把军事历史观点和战略观点提到了首位。但是,全书都贯穿着从无产阶级立场,即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捍卫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它证明了统治阶级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所执行的反动政策与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是不相容的。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揭露了波拿巴法国根据反动的“自然疆界论”妄想侵占莱茵河左岸

的野心,恩格斯指出,“自然疆界论”经常被用来为侵略政策辩护。德国资产阶级亲奥地利集团的代表当时宣扬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霸权下的“中欧大国”并使中欧各民族都屈从于德国人的统治的沙文主义思想,恩格斯给了他们以坚决的回击。同时恩格斯也揭穿了建立一个以容克地主的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计划的反革命性质。恩格斯热烈地主张把伦巴第和威尼斯从奥地利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令人信服地证明,让意大利独立对德国来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有利的。“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们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见本卷第 281 页)

由于有必要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机关报,以它作为党宣传革命思想的公开讲坛,以它作为团结和组织在反动时期彼此失去了联系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干部的核心,于是马克思就在 1859 年 5 月初召集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老战友——李卜克内西、普芬德、罗赫纳等人开了一次会,就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机关报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此后不久,马克思就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答应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为该报提供他在“论坛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向该报提建议,给予物质上的支持。马克思希望在决定关头把“人民报”变成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的机关报。1859 年 6 月 11 日“人民报”第 6 号正式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不久,马克思便担任该报的编辑,实际上也是该报的行政负责人。

虽然“人民报”在 1859 年 8 月 20 日出版了第 16 号以后就由

于缺乏经费而停刊了,但是它在马克思的主持下完成了作为宣传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战斗喉舌的光荣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宣传了许多极其重要的革命理论原理。该报转载了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8月“人民报”有两号连续刊登了收集在本卷中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恩格斯在这篇评论中阐明了马克思以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现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实质,指出这些发现不仅对于科学,而且对于实践,对于革命运动都具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落后性作了鲜明的阐述,他用无产阶级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去对抗那些庸俗经济理论。恩格斯在评论的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点。

“人民报”捍卫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声援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特别是详细地阐述了1859年7月爆发的著名的伦敦建筑工人大罢工的进程。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政治评论”一文中论证了对罢工的革命观点,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和重要的形式之一。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妄想用武力强迫工人放弃有组织的斗争的企图只会导致“劳资之间本来就有很深的鸿沟”的加深,只会导致作为社会变革的可靠保证的阶级仇恨的加深(见本卷第54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可以比在“论坛报”上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革命观点,因为“论坛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妨碍他们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人民报”结合欧洲各国对外和对内政策的重大事件公开阐述无产阶级的策略原理,坚决地揭露反动派,

并同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斗争。

例如,收入本卷附录中以“报刊述评”为题的材料表明,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等人在他们的伦敦机关报“海尔曼”上所发表的浸透着庸俗气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言论,在“人民报”上遭到了多么辛辣的嘲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在“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的主要任务是,针对1859年4月底在意大利爆发的战争论证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对这场战争的估计,阐明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战争的进程和后果,这一切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当时所写的许多文章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早在意大利危机初期,即军事行动开始以前他们就已发表的观点,认为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是波拿巴集团的反人民政策的继续。他们着重指出,这场战争是路易-拿破仑及其集团所主使的,他们力图用比较轻易地战胜“外敌”的办法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蛊惑人心地利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民族原则”的口号来投机取巧,以获得声望,并在这个口号的掩盖下牺牲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利益以整化法国的版图并且巩固它在欧洲的政治霸权。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撕下了路易-拿破仑的“意大利解放者”的假面具,彻底揭穿了他对意大利民族运动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强调指出,波拿巴法国和奥地利一样,都是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最凶恶的敌人。拿破仑第三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对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隐蔽的干涉。马克思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一文中直接把这场战争比作1849年第二共和时期法国干涉者为了恢复罗马教

皇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马克思指出,对路易-拿破仑来说,“这次战争只是法国对罗马的第二次远征,诚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规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结果而论却和那次‘共和主义’壮举毫无二致”(见本卷第541页)。其实,拿破仑第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保持意大利的分裂状态和意大利各国的反革命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充满了对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的热烈同情。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强调指出,尽管波拿巴主义者在搞阴谋,尽管皮蒙特君主主义者在搞王朝的反革命图谋,但是在意大利有能够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统一的力量。马克思赞同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那篇揭穿了路易-拿破仑的蛊惑人心的花招的宣言,并且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这篇宣言的译文(见本卷第406—41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杰出的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所率领的志愿部队反对奥军的行动看作是人民反抗外国统治的榜样,看作是真正的解放战争的典范。恩格斯指出,加里波第“不怕采取拿破仑第三告诫部下避免采取的那种迅速行动和猛攻”(见本卷第413页)。恩格斯在“战略”一文中对加里波第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革命的统帅。

在“战争”、“会战终于发生了!”、“军事行动的经过”、“军事事件”、“马振塔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意大利战争。回顾”等文章中,恩格斯从军事观点分析了各次战争事件。这几篇文章和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其他军事历史性的简评,是对军事科学的重大贡献。恩格斯作为精通军事问题的专家,在这些文章中对1859年的军事行动作了全面的分析,经常对军事学术史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且作出了深刻的军事理论概括。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意大利战争”一文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分

析了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作战方法由于掩护国界的营垒和要塞的构筑技术及其体系的发展、由于运输业随着铁路和轮船航线的开辟有了很大改进而发生的变化。从这个例子中，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作战方法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在军事评论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要塞战、要塞和野战军相互配合的问题以及山地战的特点等等。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批评了交战双方军队的统帅部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恩格斯在评价奥地利军队及其领导人时，揭示了武装力量的编制、战略和战术对某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从属性。恩格斯指出了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经济上的落后性和国内保存的半封建制度所决定的奥地利军事制度的保守主义。恩格斯给了奥地利士兵的勇敢精神以应有的评价，同时严厉地抨击了奥军指挥部的重大错误和失策，指出了由于宫廷权奸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本人干预战争进程而造成的悲惨后果。例如，谈到权奸的走卒，奥军总司令居莱时，恩格斯写道，他的军队“显示了人民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而他本人则表现了君主制度的老朽和昏聩”（见本卷第433页）。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对法军指挥部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恩格斯指出，法军指挥部没有远大的战略计划和主动精神，不会利用由于敌人的失策而造成的军事上的良机。恩格斯指出，波拿巴法国的作战方法是和拿破仑第三的两面三刀的反动政治战略，和他想“把战争局限于一个地区”，以免造成严重的军事纠纷并带来革命的后果的企图相适应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特别是在“人民报”上对第二帝国头目们的对意政策的揭露，具有对整个波拿巴制度进

行广泛的揭发运动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自己的读者要深刻地憎恨建立在警察恐怖、大肆进行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各个阶级之间投机取巧的基础上的大资产阶级的波拿巴专政。他们认为波拿巴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危险的反革命势力,是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扼杀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要回击民主主义者当中尤其是德国流亡者当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正是这个时候马克思开始密切注视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的亲波拿巴的言论,开始收集那些揭露福格特是拿破仑第三的雇佣走狗的材料。马克思根据这些材料于1860年写成了抨击性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

马克思在“入侵!”、“法国在裁军”、“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等文章中指出,第二帝国的头目们所执行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一切新冲突和战争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也痛斥了在策划意大利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进行期间在外交上支持法国的其他欧洲反动势力。马克思特别揭露了路易·拿破仑同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帕麦斯顿相勾结的反革命性质,这种勾结使拿破仑第三能够放手去进行意大利冒险。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1859年3月波拿巴法国同沙皇俄国签订的协定也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意大利问题同德国的统一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和马克思为“人民报”和“论坛报”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强调指出,无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或者波拿巴在欧洲的霸权都是德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

志国家而斗争的道路上的障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既能使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也能使德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归根到底会导致欧洲反人民的制度的崩溃,会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包括中欧各国被压迫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的斗争的发展。在德国,这种形势会使主张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来统一国家的人获得优势,这条道路就是废除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君主政体并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从这种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德意志联邦的各邦都参加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战争,并且谴责了那些主张“中立”的分子。

收集在本卷中的马克思的许多文章是为了反对普鲁士统治集团以及同它们一鼻孔出气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战争的态度而写的。在“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以及那组没有写完的文章《Quid pro quo》中,马克思痛斥普鲁士宣布的“调停大国”的中立政策是直接为波拿巴主义充当帮凶。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统治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之所以采取可鄙的、胆怯的投机取巧手法,对路易-拿破仑和俄国沙皇阿谀逢迎,其真实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出现德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企图削弱它在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中的对手奥地利。马克思指出,普鲁士采取投机取巧的手法,避免参加战争,是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见本卷第510页)。普鲁士容克地主想在自己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意图是普鲁士政策的基础。

马克思在内容极其深刻的“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些所谓哥达党中的人物,他们早在1850年普鲁士倡议召开爱尔福特议会时就企图实现使德国

普鲁士化的思想——是这个反革命计划的热烈拥护者。马克思强调指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完全证实它已经抛弃了任何革命的和民主主义的传统,它已经向反动派屈膝投降。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的结果,最反动的势力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它们以歪曲的形式来实现这一革命的业已成熟的任务,特别是国家的民族统一的任务。马克思指出,“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见本卷第46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论战中也捍卫了统一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反,拉萨尔在他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为普鲁士的中立辩护,实质上是赞同亲普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在普鲁士领导下从上面来统一德国的方针。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的拉萨尔的立场,反映出他不相信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力量。拉萨尔在当时所写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企图从历史上论证他否定农民和平民大众的革命作用的观点,并替他号召同贵族君主集团结成同盟的主张辩护(参看马克思1859年4月19日和同年5月18日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

与拉萨尔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通过革命的道路来摆脱意大利危机,他们强调指出,这条道路就是要加强意大利和德国的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发动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波拿巴主义和支持它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他们提出为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为了解放被压迫民族而进行反对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的革命解放战争的思想,以此来同波拿巴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相对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旨在依靠奋起斗

争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用彻底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某些民族中,由于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而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像在 1848 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马克思的这种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使运动发展起来的想法,就是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与民族自由派联盟的策略根本不同的地方。”(“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126—127 页)

在马克思的“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等文章中以及在恩格斯的“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对奥意法战争进行了总结。这些文章着重指出,维拉弗兰卡和约(它的条款稍后在苏黎世基本上被批准了)完全暴露了路易-拿破仑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王朝的掠夺的目的,这些目的和解放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拿破仑第三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心想侵占萨瓦和尼斯,后来便吞并了这两个省份,他力图让意大利反动势力的主要鼓舞者罗马教皇成为当时策划中的意大利联邦的首领,他企图恢复已被人民推翻了的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各公爵的统治。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波拿巴反动集团和奥地利反动集团之间签订了一项牺牲意大利利益的协定,过了若干时候,只是由于拿破仑第三的“恩典”,皮蒙特统治集团才被允许参加了这项协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一的积极结果,是拿破仑第三的自我揭露,是他冒充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捍卫者这个角色

的彻底破产。这个和约签订得很仓卒,这也说明了第二帝国内部的不稳定,说明了这个制度已无力经受孕育着革命爆发的长期战争考验。尽管意大利革命者在1859年没有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小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发展为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但是这一年的事变促进了下一年即1860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

在“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恩格斯依据对军事历史和语言学的分析,驳斥了第二帝国的领土野心。恩格斯从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这一情况出发,在这里重新考察了早在意大利战争以前就已在国际舞台上以及上述两国国内形成的力量配置情况。他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采取的方针就是在战后也是正确的,这一方针就在于把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反对以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为首的反动君主主义势力的斗争看作是使意大利和德国重新恢复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的唯一道路。同时,恩格斯也估计到了1861年改革前夕在俄国形成的革命局势,他把这种局势看作是加速欧洲革命高潮到来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他把奋起反抗沙皇制度的俄国农奴当作欧洲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来欢迎。

对英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评述以及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揭露在本卷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不列颠的贸易”、“工厂工业和贸易”等文章中,马克思根据对英国官方统计资料的分析,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许多极其重要的规律性的作用——生产积聚的加强和生产发展的周期性。

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当时进出口贸易的资料,指出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英国对世界市场发挥它的债主作用比发挥工厂

主和商人作用的速度还要快”(见本卷第 557 页)。

马克思列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趋势。他引用了许多事实和数字,证明英国工人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条件在日益恶化,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技术设备,生产中的不幸事故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赤贫现象和犯罪率也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分析了这一切事实,得出了下述结论:“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见本卷第 551 页)

马克思批评了当时英国的工厂立法,这种立法使工厂主可以任意破坏它。他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方面的奴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的真面目,他们诚心用自己的理论去替统治阶级的任何犯罪行为辩护。

马克思引用的许多材料,特别是英国工厂视察员的那些揭露出英国工厂主营私舞弊、描绘出英国工人受残酷剥削的情景的报告书,他后来都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马克思在“政治评论”、“英国的贿选活动”等许多文章中,揭穿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贿赂。”(见本卷第 586 页)在“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迪斯累里于 1859 年 2 月提出的对英国现行选举制度作一些微小修改的建议,他强调指出,这个法案的基本目的是要保存当时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政权的垄断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马克思写道:“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新的选举优惠条件,虽然使资产阶级中又有几部分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蓄意不让工人阶级参加选举,

使工人阶级仍旧处于目前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的地位。”(见本卷第 237 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为反对欧洲各资本主义强国的,首先是英国的奴役和剥削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丑恶制度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马克思在“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一文中揭露了英国对印度的掠夺政策,指出了英国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所造成的极有害的后果。他特别指出,英国棉织品和棉纱的大量输入破坏了印度的地方工业。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后果时指出,由此造成的巨大开支,以及必须在印度经常供养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首先给英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新的对华战争”这组文章中,在“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英法殖民主义者的政策,他们在 1859 年力图对中国再发动一场像 1838—1842 年和 1856—1858 年的鸦片战争那样的掠夺战争。马克思揭穿了英国人的行动的挑衅性质,强调指出,不是中国当局,而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破坏了现有的各项条约,尤其是 1858 年天津条约的条款,从而捍卫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略(不管这种侵略的借口是什么)的权利。

马克思在揭穿英国统治集团的殖民政策的同时,还揭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它们故意激发“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捏造事实来为侵略中国的行为辩护。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政策的近视性,他们不了解经济的规律性,指责中国政府在国内对英国贸易制造人为的障碍,从而要求通过掠夺性的军事冒险来消除这些障碍。

马克思指出,贸易规模比较狭小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在于只允许进行有限的对外交换的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结合。马克思表示坚信,无论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冒险行动,他们永远也不能征服中国。

恩格斯有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的标题是“对摩尔人的战争”,另一篇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论述了1859年11月至1860年3月西班牙在摩洛哥挑起的殖民战争。恩格斯指出原洛哥人对西班牙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尽管西班牙正规军在军队的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在战争进程中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西班牙政府被迫于1860年3月签订了和约。

本卷附录中刊载了前面提到过的由马克思同比斯康普为“人民报”合写的题为“报刊述评”的材料,以及该报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正式撰稿人的编辑部声明。这个文件说明了马克思为把“人民报”变成无产阶级的机关报而斗争的历史。

* * *

编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13篇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而且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这就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德国的兵力”、“和平还是战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维也纳要闻”、“意大利战争”、“马志尼宣言”、“索尔费里诺会战”、“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法国在裁军”、“政治评论”、“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编入附录的文件也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收入本卷的全部文章发表时都没有署名,其中有几篇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曾多次提到的,“纽约

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任意处理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给它们增补文句,甚至加添整段的文字,竭力把这些文章改成像是在纽约写的。本版中凡是编辑部对文章原文作了修改或补充的地方一律加注说明。这个时期所写的某些文章保存有两种文本,一种是德文的,载于“人民报”,另一种是英文的,载于“论坛报”,这也相应地加注说明。

在研究本卷各篇文章所引用的具体历史资料时,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当时事件的很大一部分文章中,能够利用的资料主要是“泰晤士报”、“总汇通报”、“维也纳日报”、“总汇报”、“军事总汇报”和“经济学家”杂志等资产阶级报刊上的报道。他们从这里取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和以后核实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上印错了的人名、地名、数字和日期等,已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凡是在报纸上发表时有标题的文章一律用原标题。当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时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9年1月—1860年2月

政治经济学批判

卡·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¹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8 月—1859 年 1 月
1859 年在柏林出版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Sur Kritik

—

Politischen Oekonomie

—

Karl Marx.

Erstes Heft.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Dunder,
(des Buch-Verlagsanstalt.)

1850.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卷的扉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一版的扉页

序 言

序 言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 商品，(2) 货币或简单流通，(3) 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²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³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

动因⁴。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⁵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⁶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

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⁷（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

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⁸)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⁹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社,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¹⁰。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¹¹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¹²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¹³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¹⁴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¹⁵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

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一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à convien che qui sia morta》 .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月于伦敦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但丁“神曲”)——编者注

第 一 册

第一册
资 本

第一篇
资本一般

第一篇 资本一般

第一章 商品

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但是,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

商品首先是,按英国经济学家的说法,“生活上必需的、有用的或快意的某种东西”,是人类需要的对象,最广义的生活资料。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这种存在,和它的自然的、可以捉摸的存在是一致的。例如小麦是一种不同于棉花、玻璃、纸等使用价值的特殊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对于使用有价值,只在消费的过程中实现。同一种使用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但是,它可能有多少用途全在于它作为具有一定属性的物的存在。其次,使用价值不

Aristot. d. Rep. L. 1, C. 9 (edit. I. Bekkeri, Oxonii, 183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卷第9章第13页(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因为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其他货物也是如此。”

仅在质上是一定的,而且在量上也有一定的。不同的使用价值,按照它们的自然特征,具有不同的尺度,例如小麦论舍费耳、纸论刀、麻布论码,等等。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例如,这个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一颗钻石。从钻石本身看不出它是商品。当它作为使用价值时,不论是用在装饰方面还是机械方面,在娼妓胸前还是在玻璃匠手中,它是钻石,不是商品。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它们成为同一交换量。因此,1卷“普罗佩尔提乌斯歌集”和8盎斯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虽然烟草和哀歌的使用价值大不相同。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

这就是德国编辑 con amore [喜欢] 谈他们称为“货物”的这种使用价值的缘故。例如,见 L. Stein 《System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Bd I, den Abschnitt von den 《Gütern》 [罗·施泰因“政治学体系”第1卷,“货物篇”]。关于“货物”的知识应该到“商品学指南”中去找。

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因此，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

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资料。但是，这些生活资料本身却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物化劳动。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这个统一物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的特性，是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

假定 1 盎斯金、1 吨铁、1 夸特小麦、20 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价值。作为这样的等价物，它们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消失了，它们代表同一劳动的相等的分量。等量地物化在它们之中的劳动，本身应该是同样的、无差别的、简单的劳动，对这种劳动来说，不论它出现在金、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样。但是，挖金、采铁、种麦、织绸，是质上互不相同的劳动种类。事实上，那种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差别的东西，在过程中就表现为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的差别。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其次，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

如果 1 盎斯金、1 吨铁、1 夸特小麦、20 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

价值或等价物，那末 1 盎斯金、 $\frac{1}{2}$ 吨铁、3 蒲式耳小麦和 5 码绸缎就是根本不等量的交换价值，这种量的差别是这些物品作为交换价值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作为不等量的交换价值，它们代表较多或较少的、大量或小量的简单的、同样的、抽象一般的劳动，即构成交换价值实体的劳动。试问，怎样衡量这些量呢？或者，不如说，既然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量的差别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的差别，那末这种劳动本身的量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呢？正如运动的量的存在是时间一样，劳动的量的存在是劳动时间。假定劳动的质已定，劳动本身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就是劳动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作为劳动时间，劳动用时、日、周等自然计时尺度作自己的尺度。劳动时间是劳动的活的存在，与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无关；它是作为量的存在的劳动的活的存在，同时带有这种存在的内在尺度。物化在各种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使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因而成为商品的实体，同时又衡量商品的一定价值量。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当量是等价物，换句话说，一切使用价值，在它们包含的已支出的物化劳动时间相等的比例上，都是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要理解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必须把握住下列几个主要观点：劳动化为简单的、可以说是无质的劳动；生产交换价值因而生产商品的劳动借以成为社会劳动的特殊方式；最后，以使用价值为结果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之间的区别。

要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

这种简化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这样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相反地，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换句话说，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可以叫作一般人类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个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是人的肌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消耗。这是每个平常人都能学会的而且是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完成的简单劳动。这种平均劳动的性质本身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在一定的社会中却是一定的。任何统计都能证明，简单劳动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甲用6小时生产铁，乙也用6小时生产铁，或者，甲用12小时生产铁，乙用12小时生产铁，这显然只是同一劳动时间的不同用法。可是，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这种劳动可以化为复合的简单劳动，高次方的简单劳动，例如1个复杂劳动日等于3个简单劳动日。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但是这种简化在进行是很清楚的，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产品在一定比例上是简单平均劳动的产品的等价物，因而等于一定量的这种简单劳动。

其次，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还包含一个前提：物化在一定商品如1吨铁中的劳动，不问是甲还是乙的劳动，总是同样

英国经济学家称它作《Unskilled labour》[“不熟练劳动”]。

多，或者说，不同的个人在生产同一个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使用价值时耗费等量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它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是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在当时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另一个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是劳动的社会规定，或者说，是社会劳动的规定，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不是通常的意义，而是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首先，劳动的无差别的简单性是不同个人的劳动的相同性，是他们的劳动彼此作为相同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当然，这是通过事实上把一切劳动化为同种劳动。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只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就有相同性这种社会性，而且也只有作为相同的劳动同所有其他个人的劳动发生关系，才表现为交换价值。

其次，在交换价值中，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而个别劳动的这种一般性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个人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个人与其他个人没有差别，既然大家完成的是相同的劳动，所以这样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所有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因此，任何个人为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其他每一个人为生产同一商品也会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它是个人的劳动时间，是他的劳动时间，但只是作为大家共同的劳动时间，因此，这样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哪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作为一般劳动时间，它在一个一般产品、一般等价物、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中表现出来；这个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同它直接表现为某一个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一定的使用价值形式无关，可以任意换成

它作为任何别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任何别的使用价值形式。它只有作为这样的一般的量，才是社会的量。个人的劳动，要成为交换价值，就必须成为一个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必须使个人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或者说，使一般劳动时间表现为个人的劳动时间。仿佛是不同的个人把他们的劳动时间结合在一起，并把他们共同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不同量表现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上。这样，个人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社会为生产一定使用价值、满足一定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但是，这里成为问题的仅仅是劳动借以获得社会性的那种特殊形式。例如，纺工的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物化在 100 磅麻纱中。假定织工的产品 100 码麻布也代表同量的劳动时间。既然这两种产品代表同量的一般劳动时间，因而是每种包含同量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的等价物，它们也就互为等价物。在这里，只是由于纺工的劳动时间和织工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从而他们的产品表现为一般等价物，织工的劳动才成为纺工的劳动和纺工的劳动才成为织工的劳动，一个人的劳动才成为别一个人的劳动，也就是对他们两者来说，他们的劳动才成为社会存在。相反，在农村宗法式生产下，纺工和织工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家庭中女纺男织，供本家庭的需要，在家庭的范围内，纱和布是社会产品，纺和织是社会劳动。但是，它们的社会性不在于纱作为一般等价物去交换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布，不在于两者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并无差别而同样有效的表现而相互交换。倒是家庭联系同它的自然发生的分工在劳动产品上打上了自己特有的社会烙印。或者，我们就中世纪的徭役和实物租来看。在这里，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最后，我们看一下一切文明民族的

历史初期自然发生的共同劳动。这里,劳动的社会性显然不是通过个人劳动采取一般性这种抽象形式,或者个人产品采取一个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成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使个人劳动不能成为私人劳动,使个人产品不能成为私人产品,相反,它使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

最后,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同别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时,不同个人的劳动才作为相同的一般的劳动相互发生关系。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末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1磅铁和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两个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作为物

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财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Galiani 《Della Moneta》, p. 221 In vol. III von Custodis Sammlung der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 Parte moderna*) Milano, 1803[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

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正如简单的化学物质按一定比例化合而形成化学当量一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在商品上这种神秘化还是很简单的。大家多少总感觉到,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人们与他们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在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中,这种简单的外貌就消失了。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東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劳动相互发生的关系,不过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物化表现,那末,说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是财富(就它由交换价值构成来说)的唯一源泉,就是同义反复。说自然物质本身由于不包含劳动也就不包含交换价值,说交换价值本身不包含自然物质,也

“物质在其自然状态中总是没有价值的。”Mac Culloch 《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 économie politique etc 》, traduit par Pr érost Genève, 1825, p 57 [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普雷沃译, 1825年日内瓦版第57页]。可见, 连一个麦克库洛赫都比德国“思想家们”的拜物教高明得多, 后者把“物质”和半打杂物凑在一起说成是价值的原素。例如, 参看罗·施泰因“政治学体系”第1卷第170页。

是这种同义反复。但是,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¹⁶贝克莱主教问:

“四大原素和包括在其中的人类劳动难道不是财富的真正泉源吗?”

美国人托马斯·库伯通俗地解释说:

“从一块面包中抽掉耗费在它上面的劳动,抽掉面包师、磨坊工、农夫等等的劳动,还剩下什么呢?不过是一把对人没有任何用处的野草籽而已。”

所有这些见解所说的,都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而是作为物质财富源泉之一的具体劳动,总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既然这里的前提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那末,这里的前提也就是耗费在商品上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效用并合乎一定的目的,而从商品的观点出发,这也就充分无遗地包含了对于当作有用劳动的劳动的一切考虑。面包作为使用价值,使我们关心的是它作为食品的属性,而决不是农夫、磨坊工、面包师等人的劳动。即使这种劳动由于某种发明减少了^{19/20},这个面包的用处仍然和从前一样。即使它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子。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实现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相同性上,而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劳动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上。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它按照形式和材料分为无限

Berkeley.《The Querist》London,1750[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Whether the four elements and man's labour therein be not the true source of wealth》

Th. Cooper《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1831(Columbia,1826),p.99[托·库伯“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1831年伦敦版(1826年哥伦比亚版)第99页]。

多的不同的劳动方式。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以裁缝的劳动为例，就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的物质规定性来说，它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劳动，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在古代家庭工业中，妇女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的劳动，立法者摩西同税吏亚当·斯密同样熟悉。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把交换价值化为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几个更切近的规定。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是当作原因发生作用的。例如，小麦是作为食品发生作用的。一部机器在一定比例上代替劳动。商品借以成为使用价值、成为消费对象的这种作用，可以称作商品的服务，即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提供的服务。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总是

弗·李斯特永远不能理解（对他那讲求实际的利己主义的头脑来说，理解永远是不可及的）两种劳动的区别：一种是协助造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劳动，一种是造出财富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劳动；因而他把英国现代的经济学家看成只是埃及的摩西的剽窃者。

仅仅从结果的观点上被考察。这里的问题不是它提供的服务,而是在生产它的过程中给它本身提供了的服务。举例来说,一部机器的交换价值不是决定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量,而是决定于为它本身已经支出的、因而也是生产同样一部新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不变,那末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不变。但是,生产的难易是不断变动的。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了,那末,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同样多的使用价值。如果劳动生产力降低了,那末,要生产同样多的使用价值就需要较多的时间。因此,一个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的量,因而它的交换价值,是一个变动的量,它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反比地增加或减少。劳动生产力在加工工业中是按照预定的程度被应用的,而在农业和采掘工业中受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的制约。同一劳动在开采不同金属时提供的采掘量有大有小,这要看这些金属在地壳中蕴藏多少而定。同一劳动在丰收年可以物化为两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或许只物化为一蒲式耳小麦。在这里,因为自然条件的贫瘠还是富饶决定着受自然条件限制的特殊实在劳动的生产力,于是似乎是自然条件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

不同的使用价值以不等的体积包含同一劳动时间或同一交换价值。一个商品如能以比其他使用价值更小的使用价值体积包含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它的特殊交换价值就越大。我们看到,某些使用价值在前后悬隔的不同文化时代里彼此间总是构成一个特殊变

“服务”(《service》)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萨伊和弗·巴夏那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他们的理性智慧,正如马尔萨斯已经正确地指出过的,到处都抽掉了经济关系的特定的形式规定性。

换价值的系列,这些特殊交换价值彼此间虽然不是保持着丝毫不变的数字比例,但是保持着高低级次的一般关系,如金、银、铜、铁或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以均等的或大体均等的程度影响着生产这种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自己的使用价值上是表现不出来的。但是,作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同别的种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形成各种比例。这样,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在别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等价物实际上就是在别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某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譬如我说1码麻布值2磅咖啡,麻布的交换价值就在咖啡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而且是在这种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上表现出来。有了这个比例,我就能够把任何数量麻布的价值用咖啡表现出来。显然,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交换价值,在只有一种别的特殊商品如咖啡成为它的等价物的这样一个比例中,还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1码麻布所代表的一般劳动时间的量,同时实现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种不同的量上。每一种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包含等量劳动时间的比例上,都是这1码麻布的等价物。因此,这一个别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它的等价物的无限多个等式中,才充分表现出来。它只有在这些等式的总和中,或者说,只有在一种商品同每种别的商品交换的各种不同比例的总体中,才充分表现为一般等价物。例如,下面的等式系列:

$$1 \text{ 码麻布} = \frac{1}{2} \text{ 磅茶叶}$$

$$1 \text{ 码麻布} = 2 \text{ 磅咖啡}$$

1 码麻布 = 8 磅面包

1 码麻布 = 6 码棉布

可以表现为：

1 码麻布 = $\frac{1}{8}$ 磅茶叶 + $\frac{1}{2}$ 磅咖啡 + 2 磅面包 + $\frac{1}{2}$ 码棉布。

因此,如果我们有了足以把 1 码麻布的价值充分表现出来的全部等式的总和,我们就能够用一个系列的形式把它的交换价值表现出来了。实际上,这个系列是无限的,因为商品的范围从来没有确定的界限,它是不断地扩展的。但是,既然某一种商品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衡量自己的交换价值,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反过来用这种被它们衡量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自己。如果 1 码麻布的交换价值在 $\frac{1}{2}$ 磅茶叶、或 2 磅咖啡、或 6 码棉布、或 8 磅面包等等上表现出来,那末咖啡、茶叶、棉布、面包等等在它们分别等于第三者麻布的比例上是彼此相等的,这样,麻布就成为它们的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每一种商品,作为物化的一般劳动时间即作为一定量的一般劳动时间,依次用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一定量来表现自己的交换价值,而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反过来用这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自己。但是,每一种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既是这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起着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在每一种其他商品用来直接表现自己交换价值的许多种商品的总体中,又只是这许多种商品中的一种。

“被衡量物在某种形式上是衡量物的尺度,同被衡量物有这样一种关系,也是尺度的一个特点。”Montanari. 《Della Moneta》, p. 48 in Custodis Sammlung, vol. III. Parte antica [蒙塔纳里“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第 3 卷第 48 页。]

一种商品的价值量同在它以外的其他商品种类的多少无关。但是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等式系列的长短,取决于其他商品种类的多少。例如,表现咖啡价值的等式系列,表明咖啡的交换能力的范围,表明它起交换价值作用的界限。一个商品把无限多种的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等价这种表现,是同它的交换价值是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相符合的。

我们看到,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随着直接包含在这个商品本身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变动的。一个商品的实现了的、即表现在其他商品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价值,必然也取决于生产一切其他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以什么比例变动。举例来说,如果生产一舍费耳小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而生产一切其他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增加一倍,那末,一舍费耳小麦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它的等价物上就减少一半。结果,实际上好像生产一舍费耳小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一半,而生产一切其他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没有变动一样。各种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按什么比例能在同量劳动时间中生产出来。为了说明这种比例可能有什么样的变动,我们假定有甲和乙两种商品。第一,假定生产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这时,用乙来表现的甲的交换价值,随着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成正比地增减。第二,假定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用乙来表现的甲的交换价值,随着生产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成反比地增减。第三,假定生产甲和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按同一比例增减。这时,用乙表现的甲的等价表现保持不变。假定由于某种情况,一切劳动的生产力都按同一程度降低,以致生产一切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都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会增加,而它们的交换价值的实际表现却仍然不变;但是,社会的实际

财富减少了,因为社会要用更多的劳动时间才能生产出同样多的使用价值。第四,假定生产甲和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不同的程度增加或减少,或者生产甲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增加,生产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或者相反。所有这些情形,都可以简化为: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有所增减。

每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用每种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可以用这个使用价值的整数,也可以用它的分数。作为交换价值,每种商品同物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一样,都是可以分割的。商品与商品的等价关系同它们作为使用价值时在物理上有无可分割性无关,正如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相加,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合成一件新商品时发生的实际的形式变换无关一样。

到此为止,商品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方面来考察的,每次考察一面。可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商品相互间的实际关系是它们的交换过程。这是彼此独立的个人所参加的社会过程,但是他们只是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参加这个过程;他们互为对方的存在,是他们的商品的存在,因此,他们实际上只是作为交换过程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出现。

商品是使用价值,如小麦、麻布、钻石、机器等等,但是,作为商品,它同时又不是使用价值。如果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直接是满足他自己需要的手段,那它就不是商品。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倒是非使用价值,就是说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或者说只是交换手段;作为交换价值的积极承担者,使用价值变成交换手段。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才是使

用价值。因此,它还得变成使用价值,首先变成别人的使用价值。由于商品对它自己的所有者不是使用价值,所以它对别种商品的所有者是使用价值。不然,他的劳动就是无用的劳动,从而劳动的结果就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必须变成它的所有者本人的使用价值,因为他的生活资料是在它之外,在别人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为了变成使用价值,商品就得面对一种特殊的需要,成为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之变成使用价值,是在它们全面地变换位置、从把它们当作交换手段的人的手中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对象的人的手中的时候。只有通过商品的这种全面的转移,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才变成有用劳动。商品在它们彼此作为使用价值而发生的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新的经济上的形式规定性。相反,那种使它们具有商品特征的形式规定性却消失了。例如,面包从面包师手中转到消费者手中,并不改变它作为面包的存在。相反,只有消费者才把它当作使用价值、当作这种一定的食品,而在面包师手中,它本来是一种经济关系的承担者,一个既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因此,商品在它变成使用价值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唯一的形式变换,就是抛弃了它的形式存在——对它自己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而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商品要变成使用价值,就要全面转移,进入交换过程,但是它为交换的存在就是它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因此,它要实现为使用价值,就必须实现为交换价值。

个别商品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来原来表现为独立的物,作为交换价值却一开始就是在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的关系中被考察的。

亚里士多德是在这个规定性上理解交换价值的(见本章第一段脚注引文)。

但是，这种关系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想像的关系。它只是在交换过程中才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商品固然是交换价值，因为在商品上面支出过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因而它是物化劳动时间。但是就它的直接形式来说，它只是具有特殊内容的物化的个人的劳动时间，而不是一般劳动时间。因此，它不直接就是交换价值，而是先要变成交换价值。首先，只有当它代表着具有一定用途的、一个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时候，它才能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这是一个物质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才被认为是一般社会劳动时间。因此，如果说商品只有在实现为交换价值时才能变成使用价值，那末另一方面，商品只有在它的转移中证实为使用价值时才能实现为交换价值。一种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只能转移给把它看作使用价值即特殊需要的对象的人。另一方面，它只有同另一种商品对换才被转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站在这另一种商品的所有者的一方，那末同样，这个所有者也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商品同那种以这一商品为对象的特殊需要接触时才能把它转移，即把它实现。因此，当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而全面转移时，它们按照它们的物质差别，作为以自己的特殊属性来满足特殊需要的特殊物而相互发生关系。但是，作为这种单纯的使用价值，它们彼此是漠不相干的存在，更恰当些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才能被交换。但是，它们所以可以交换，只因为它们是等价物，而它们所以是等价物，只因为它们是等量的物化劳动时间，于是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从而它们同特殊需要的关系，都无需考虑了。一个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倒是在于它作为等价物去任意替换一定量的任何别的商品，而不问自己对别的商品所有

者是不是使用价值。但是，对于别的商品所有者来说，它只有对他使用价值的时候才成为商品，而对它自己的所有者来说，它只有对别的商品所有者是商品的时候才成为交换价值。因此，同一关系既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相同而只在量上不同的量和量之间的关系，是它们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而相等的关系，同时又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不同的物、作为满足特殊需要的各种特殊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作为各种实际使用价值而相异的关系。但是这种相等和相异是相互排斥的。所以，这里不仅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出现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因为一个条件的实现同另一个与它对立的条件的实现直接结合而出现一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

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既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又是这些矛盾的解决，可是这些矛盾在交换过程中不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上面我们只看到，商品本身怎样彼此作为使用价值发生关系，就是说，商品怎样作为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内部出现。交换价值则相反，正像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样，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抽象中，或者不妨说只存在于个别商品所有者的抽象中，对于个别商品所有者来说，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放在仓库里，作为交换价值放在心上。但是在交换过程内部，商品本身不仅要彼此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且要彼此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并且它们的这种存在应该表现为它们自己的相互关系。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商品要表现为交换价值，表现为物化劳动，就要先作为使用价值来转移，交给别人，而它们要作为使用价值来转移，反过来又以它们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假定这个困难已经解决了。假定商品已经摆脱了它的特殊使用价值，通过使用价值的转移已经实现了那个物质

条件,即成为社会有用劳动而不是个人为自己进行的特殊劳动。这样,它在交换过程中对其他商品就应该变成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因而不再是具有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有限作用,而是取得一种直接用一切使用价值作自己的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能力。但是,每一个商品都是这样一个商品:它应当像这样通过自己特殊使用价值的转移而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但是另一方面,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对立着的只是特殊商品,只是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私人劳动。一般劳动时间本身是一个抽象,这个抽象本身对于商品来说是不存在的。

我们研究一下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得到实际表现的等式的总和,例如:

1 码麻布= 2 磅咖啡

1 码麻布= $\frac{1}{2}$ 磅茶叶

1 码麻布= 8 磅面包或其他等等

这些等式只表示在 1 码麻布、2 磅咖啡、 $\frac{1}{2}$ 磅茶叶等等中物化着等量的一般社会劳动时间。但是,事实上,只有当这些特殊使用价值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的长短的比例实际上彼此交换的时候,表现在这些使用价值上的个人劳动,才变成一般劳动,并且以这个一般劳动的形式变成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时间可以说只是潜伏在这些商品中,只是在它们的交换过程中才显露出来。在这里,出发点不是作为共同劳动的个人劳动,相反地是私人的特殊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扬弃了自己原有性质后才证明为一般社会劳动。因此,一般社会劳动不是现成的前提,而是变成的结果。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困难,一方面,商品必须作为物化一般劳动时间进入交换过程,另一方面,个人劳动时间作为一

般劳动时间的物化，本身又只是交换过程的产物。

每个商品要通过它的使用价值的转移，即它的原来存在的转移，取得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相应的存在。因此，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必须使它的存在两重化。另一方面，它的作为交换价值的第二存在本身也只能是另一种商品，因为在交换过程中对立着的只是商品。怎样把一种特殊商品直接表现为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呢？换句话说，也就是怎样使物化在一种特殊商品中的个人劳动时间直接具有一般性这种性质呢？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实际表现，即每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实际表现，是一个无限多的等式的总和，如：

1 码麻布 = 2 磅咖啡

1 码麻布 = $\frac{1}{2}$ 磅茶叶

1 码麻布 = 8 磅面包

1 码麻布 = 6 码棉布

1 码麻布 = 其他等等

当商品只是被想像为一定量物化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上述表现是理论上的东西。只要把上面的等式系列倒置过来，一个特殊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就从单纯的抽象变为交换过程本身的社会结果。例如：

2 磅咖啡 = 1 码麻布

$\frac{1}{2}$ 磅茶叶 = 1 码麻布

8 磅面包 = 1 码麻布

6 码棉布 = 1 码麻布

既然咖啡、茶叶、面包、棉布，总之一切商品都把它们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在麻布上表示出来，麻布的交换价值就反过来在作为它自己的等价物的一切其他商品上展示出来，物化在麻布本身中

的劳动时间就直接变成在一切其他商品的不同量上均等地表现出来的一般劳动时间。这里,麻布由于一切其他商品对它的全面行动,变成了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每种商品都曾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这里则相反,由于一切商品都用一种特殊商品来衡量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分离出来的商品就变成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交换价值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另一方面,每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表现的无限系列或无限多的等式,紧缩成单独一个只有两个项的等式。 $2 \text{ 磅咖啡} = 1 \text{ 码麻布}$ 现在是咖啡的交换价值的充分的表现,因为1码麻布在这种表现中直接表现为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等价物。因而,现在在交换过程内部,各种商品以麻布的形式彼此作为交换价值存在或出现。原先,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只当作不同量的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彼此发生关系,现在,这一点表现为: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只代表不同量的同种物品即麻布。因而,一般劳动时间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物,一种站在一切其他商品之旁和之外的商品。但同时,一个商品对另一个商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那个等式,如 $2 \text{ 磅咖啡} = 1 \text{ 码麻布}$,是一个尚待实现的等式。商品只有通过它作为使用价值的转移(这要看它能否在交换过程中证明自己是满足某种需要的对象),才真正从它作为咖啡的存在转化为它作为麻布的存在,从而取得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对一切其他商品真正变成交换价值。反之,由于一切商品通过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转移而转化为麻布,麻布就变成一切其他商品的转化存在,并且麻布只有作为一切其他商品向它转化的结果,才直接变成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也就是个人劳动全面转移、扬弃的产物。如果说,商品为了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而把它们的存在这样地二重化了,那末,作为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的商品也

把它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这个分离出来的商品除了它作为特殊商品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以外,还获得了一种一般使用价值。它的这种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性,就是说,是从它在交换过程中由于其他商品对它的全面行动所起的特殊作用产生的。作为一种满足特殊需要的对象,每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不同人的手中有不同的价值,例如,在转让者的手中是一种价值,而在获得者手中是另一种价值。作为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的商品,现在是满足从交换过程本身产生出来的一般需要的对象,它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使用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成为一般交换手段。于是,在这个商品上解决了商品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它既要作特殊使用价值,同时又要作一般等价物,因而作每个人的使用价值、一般使用价值。所以,如果一切其他商品现在首先把自己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这个分离出来的商品的观念上的、尚待实现的等式,那末,就这种分离出来的商品来说,虽然它的使用价值是实际存在的,但在过程本身中却表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它还需要通过转化为真正的使用价值才得到实现。原先,商品表现为商品一般,表现为物化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在交换过程中,一切商品都同作为商品一般的那个分离出来的商品发生关系,都同作为一般劳动时间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存在的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因此,它们作为特殊商品同一个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商品所有者相互把他们的劳动作为一般社会劳动来对待的关系,就表现为他们把他们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对待的关系,而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作为交换价值相互对待的关系,就表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在詹诺韦西的著作中有这种说法。”——编者注

现为它们把一种特殊商品作为它们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表现的全面关系,这反过来又表现为这种特殊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关系,因而表现为一个物品的一定的仿佛是天生的社会性质。这样地代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的特殊商品,或者说,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它是商品在交换过程本身中形成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结晶。因此,如果说商品在交换过程内部只有解脱了一切形式规定性,以直接的物质形态彼此发生关系,才变成互为使用价值,那末,它们为了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就必须采取新的形式规定性,必须发展成货币。货币不是符号,正如一个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存在不是符号一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像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在货币上,它不过比在商品上表现得更加夺目而已。

一切商品的货币存在应该结晶在其中的那种特殊商品所必需具备的物理属性(就其直接由交换价值的本质产生来说)是:可以任意分割,各部分是同质的,这种商品件件全无差别。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这种商品必须是同质的东西,只能表现量的差别。另一个必需具备的属性是它的使用价值的耐久性,因为它要经常处在交换过程中。贵金属最富于这些属性。货币既然不是思考或协商的产物,而是在交换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所以曾经有过各种极不相同的、不大适合的商品交替地执行过货币的职能。在交换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把交换价值的规定和使用价值的规定两极式地分配在商品中间,于是一种商品比如说充当交换手段,而

另一种商品则作为使用价值被转移 ;由于这种必然性 ,到处都有一种甚至几种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最初偶然地起着货币的作用。它们即使不是满足当前需要的物品 ,但是它们是财富的最重要的物质组成部分 ,这就使它们比其余的使用价值具有更大的一般性。

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 ,与其说表示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 ,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 ,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 ,就它的整个结构来说 ,是为了使用价值 ,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 ,因此 ,在这里 ,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量时 ,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 ,变成商品。另一方面 ,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 ,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 ,因此 ,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 ,而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实际上 ,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 ,而是在它的尽头 ,在它的边界上 ,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 ,由此浸入公社内部 ,对它起着瓦解作用。因而 ,在不同公社间的物物交换中变成商品的那些特殊使用价值 ,如奴隶、牲畜、金属 ,通常成为公社本身内部的最早的货币。我们说过 ,一种商品的等价物的系列愈长 ,或者它的交换范围愈大 ,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愈在较高的程度上作为交换价值表现出来。因此 ,物物交换的逐步扩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当作原始公社的私人家庭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家庭的原初形式本身是氏族 ,私人家庭只是从氏族在历史上的解体中才发展起来的。“因为在最初公社(而这是家庭)中 ,这(即交换)显然毫无必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 1837年牛津版第1卷第9章第14页)

大,交换次数的增加,进入物物交换的商品种类的增多,发展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促进了货币的形成,从而对物物交换起着瓦解的作用。经济学家惯于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去寻求货币的起源,却忘记了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出来的。举例来说: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应当可以任意分割,作为使用价值却不能任意分割。或者,甲的商品对于乙是使用价值,而乙的商品对于甲却不是使用价值。或者,商品所有者对于他们拿来互相交换的商品有需要,但这些商品是不能分割的商品,在价值比例上也不相等。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在借口考察简单的物物交换时,看到了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体的商品存在所包含的矛盾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始终坚持物物交换是商品交换过程的最适当形式,只是在技术上有某些不方便,而货币是为了消除这些不方便被巧妙地设计出来的手段。从这个非常肤浅的观点出发,有位机智的英国经济学家说得对:货币只是一种物质工具,如同船舶或者蒸汽机一样,它不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因而不是经济范畴。因此,把货币放在政治经济学中来研究是弄错了,政治经济学同工艺学事实上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在商品世界中,发达的分工是作为前提存在的,或者更正确

“货币实际上只是买卖活动的工具。但是请问您是怎样理解买和卖的呢?研究货币,同研究船舶、蒸汽机或任何用来便利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其他工具一样,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Th Hodgskin《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etc》London, 1827, p. 178—179[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178—179页])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地说,这种分工直接表现在使用价值的多种多样上,这些使用价值作为特殊商品彼此对立并包含着同样多种多样的劳动方式。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质方面、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来考察的社会劳动的总体形式。但是,从商品的角度以及从交换过程内部来看,分工本身只在它的结果、在商品本身的特殊性上存在。

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商品彼此间在过程中的关系结晶为一般等价物的种种规定,因而,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种种过程连续进行的这个过程的整体,就是流通。

A 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

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劳动,并非不清楚劳动的创造力受自

对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暂且不谈这一比较将异常清楚地说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将是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立的起源的叙述。这种对立最后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又重新表现出来。

然条件的限制。关于实在劳动，他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这种关于物质财富的源泉的看法，不

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阐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庞大。见《An Essay concerning the multiplication of mankind etc》, 3 edition, 1686, p. 35—36 [“论人类的繁殖”1686年第3版第35—36页]。他在这一著作中说明分工对生产的好处时，不仅像后来亚当·斯密以制针业为例那样举出制表业为例，而且用大工厂企业的观点来看一个城市和整个国家。1711年11月26日的“旁观者”杂志¹⁷曾引用这位“可敬佩的威廉·配第爵士的解释”。因此，麦克库洛赫以为“旁观者”杂志误把配第当作另一个年轻40岁的作家，那是猜错了。（见MacCulloch.《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lassified catalogue》. London, 1845, p. 102 [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分类目录”1845年伦敦版第102页]）配第觉得自己是一门新科学的奠基者。他说，他的方法“不是传统的”。他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 terms of number, weight or measure [数字、重量和尺度] 来说话，只利用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 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s in nature [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把那些以 mutable minds, opinions, appetites and passions of particular [个人的变化无常的意图、见解、爱好和热情] 为依据的原因留给别人去研究。（《Political Arithmetic etc》. London. 1699. Preface [“政治算术”1699年伦敦版。序言]）他的天才的胆略例如表现在这样的建议中，即把爱尔兰的居民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动产迁移到大不列颠的其余地区。这样，劳动时间可以节省，劳动生产力可以提高，而“国王及其臣民将更加富强”（“政治算术”第4章）。又如，当荷兰作为一个贸易国家还占着优势地位，而法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称霸于世的贸易强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中就证明英国负有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他说：“英王的臣民有适宜而充裕的资本来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贸易。”（同上，第10章）“阻止英国强大的种种障碍是暂时的、可以排除的。”（第247页及以下各页）他的全部著作洋溢着别致的幽默。例如，他指出，荷兰（当时它在英国经济学家的眼中正如今日英国在大陆经济学家的眼中一样，是一个模范国）征服世界市场是合乎自然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荷兰人有天使般的机智和理解力”（同上，第175—176页）。他维护信仰自由，把它看作贸易的条件，“因为只要允许穷人这样想：他们的财产虽然少些，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看作穷人特有财产的神的

像在他的同代人霍布斯那里一样多少是无结果的,而是把他引导到政治算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但是,他把交换价值看成货币,正如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表现的那样,而把货币本身看成存在着的商品,看成金银。他受着货币主义观念的束缚,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叫做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他实际上是说,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转移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物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然而,他的例子显然证明,认识了劳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并不排斥不了解那种使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会形式。

布阿吉尔贝尔就他这方面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

事物有着更多的机智和理解力,那末穷人就会勤勉,就会把劳动和辛勤看成是对于神的义务”。因此,贸易“不是同任何一种宗教结合着,而首先是和居民中的异教徒结合着”。(“政治算术”,第183—186页)他主张为骗子公开征收一种特殊的捐税,因为对于公众说来,为骗子纳税比让骗子课税好些(同上,第199页)。相反,他反对那种使财富从实业者手中转入“专门吃喝玩乐和搞玄学”的人们手中的租税。配第的著作几乎是书肆珍品,只散见于陈旧拙劣的版本,这一点尤其值得奇怪的是,威廉·配第不仅是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而且还是别号兰斯唐侯爵的英国辉格党的奈斯托尔——亨利·配第的先祖。但是,兰斯唐家族要出版配第全集,不附上一篇作者的传记几乎是不行的,而贵族的辉格党门第的大多数的 *origines* [家世],正是 *the less said of them the better* [少说为妙]。这个敢于思想而又十分轻浮的外科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的盾的保护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男爵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诸于世的。同时,配第在他生前出版的大部分著作中,力图证明查理二世时期正是英国的繁荣时期,而这一看法在《*glorious revolution*》[“光荣革命”]的世袭冒充者看来是一种异端。

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la juste valeur),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但同时他又和配第相反,狂热地反对货币,认为由于货币的干预,商品交换的自然平衡或和谐被破坏了,他认为货币是一个要求把一切自然财富作祭品的荒诞的摩洛赫。如果说,这个反对货币的论战一方面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有关,因为布阿吉贝尔攻击路易十四的宫廷、包税人和贵族的具有盲目破坏作用的求金欲,而配第则把求金欲当作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加以颂扬,那末,这里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则对立,这种对立是真正英国的经济学和真正法国的经济学之间的经常对立的重复。布阿吉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他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来生产以及商品的交换过程,看成是个人劳动借以达到它的目的

布阿吉贝尔在反对当时的“理财秘术”时说:“财政学不过是对农业和商业的利益的深刻认识。”《Le détail de la France》.1697 Ausgabe von Eugène Daire der《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 V III siècle》Paris,1843,vol I ,p 241 [“法国详情”1697年版,载于欧仁·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241页]。

不是拉丁语系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学派和米兰学派重演了英法政治经济学上的对立,而早期的西班牙人,要末只是重商主义者或像乌斯塔里斯那样的变相重商主义者,要末像霍韦利亚诺斯那样(见他的Obras . Barcelona,1839—40[“文集”1839—1840年巴塞罗纳版])与亚·斯密同持“中庸之道”。

“真正的财富……不仅是生活必需品的充分享受,而且是剩余物品和一切足以引起快感的东西的充分享受。”Boisguillebert《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 la richesse etc》,1 c .,p 40[布阿吉贝尔“论财富的本性”,载于欧仁·德尔“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03页]。但是配第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而布阿吉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

的合乎自然的社会形式。因此,一遇到资产阶级财富的特殊性质,例如在货币上,他就认为有强挤进来的外来因素的干涉,并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布阿吉尔贝尔的例子向我们证明,劳动时间还是可以看成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的,尽管把物化在商品交换价值中并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同个人直接的自然活动混为一谈。

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我们是在新世界的一个人那里发现的,在新世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它的承担者一起输入进来,并且在这块由于土质肥沃而补救了历史传统贫乏的土地上迅速生长起来。这个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1719年所写而在1721年付印的一本青年时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他说必须撇开贵金属而寻找另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

“银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一样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比如我们假定,有一个人种玉蜀黍,另一个人采矿炼银。到年底或者在任何其他一段时期以后,生产的全部玉蜀黍和全部银互为自然价格,再假定前者是20蒲式耳,后者是20盎斯,则1盎斯银的价值等于生产1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劳动。但是,如果发现了更近便易采和更富的矿,现在一个人生产40盎斯银同从前生产20盎斯一样容易,而生产20蒲式耳玉蜀黍所需要的劳动还和从前一样,那末,这时2盎斯银的价值不会多于生产1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那个劳动,而 *caeteris paribus*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前1蒲式耳值1盎斯,现在1蒲式耳就值2盎斯了。因此,一国的财富要用它的居民所能购买

蒲鲁东式的法兰西社会主义患着同样的民族遗传病。

Franklin, B. The works of etc., ed. by J. Sparks, vol. II. Boston, 1836: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斯巴斯克斯编“富兰克林文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

的劳动量来估计。”

于是,劳动时间在富兰克林那里就以经济学家的片面性立即表现为价值尺度。实在产品转化为交换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问题只在于替它们的价值最发现一种尺度。

他说:“既然贸易整个说来不过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东西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

只要把这里的“劳动”一词换成实在劳动,我俩立刻就会发现,一种形式的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劳动被混为一谈了。既然贸易,比如说,就是鞋匠劳动、矿工劳动、纺工劳动、画匠劳动等等的交换,那末难道鞋的价值用画匠的劳动来估价就是最正确的吗?富兰克林的意思正好相反,他是说,鞋、矿产品、纱、画等等的价值,决定于那种不具有特殊的质、因而只在量上可以衡量的抽象劳动。但是,因为他不是把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当作抽象一般的、由个人劳动的全面转移而产生的社会劳动来阐明,他就必然看不到货币就是这种被转移了的劳动的直接存在形式。因此,在他看来,货币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货币倒是为了技术上的方便而从外面搬进交换中来的一种工具。富兰克林关于交

杰·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文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5页:《Thus riches of a country are to be valued b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its inhabitants are able to purchase》。

《Trade in general being onthing else but the exchange of labour for labour, the value of all things is, as I have said before, most justly measured by labour》, 同上,第267页。

L c 《Remarks and facts relative to the American paper money》,1764[“富兰克林文集”：“关于美国纸币的评论和事实”1764年版]。

见《Papers on American Politics》[“美国政治问题论文集”]。“关于美国纸币的评论和事实”1764年版(“富兰克林文集”)。

换价值的分析,对科学的总的发展并无直接影响,因为他只是出于一定的实际需要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个别问题。

究竟哪一种特殊的实在劳动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源泉呢?在十八世纪,实在的有用劳动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对立,就是以这样的问题形式激动着欧洲。这就已经假定,并不是每一种实现为使用价值或提供产品的劳动,因而就已经直接创造财富。但是,对于重农学派来说,也像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一样,争论的焦点倒不是哪一种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哪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他们还没有把问题在初级形式上解决,就先在复杂化了的形式上进行探讨,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在到达它们的真正出发点之前,总要经过许多弯路。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关于重农学派这里不再多谈,并且把一整批在正确分析商品方面表露了或多或少中肯想法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也略去不说,我们直接来看一看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在他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还处在从它们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因而表现得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

例如见 Galiani 《Della Moneta》, vol. III, in de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erausgegeben von Custodi) Parte moderna Milano, 1803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他说:“只有 fatica [辛劳]才使物品有价值。”(第74页)把劳动叫作辛劳,是南方人的特点。

斯图亚特的,《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一书,最初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前10年即1767年在伦敦用两卷四开本出版的。我引的是1770年的都柏林版。

交换价值这个范畴也是如此。他在一个地方说实在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what a workman can perform in a day[一个工人一天所能做的]),但同时又混乱地加上 Salair(工资)和原料。在另一个地方,同物质内容进行的搏斗表现得更加激烈。他把一个商品所含的自然物质,例如,银器中所含的银,叫作商品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而把商品所含的劳动时间叫作商品的使用价值(usable value)。

他说:“前者是某种本来就是实在的物……而使用价值则相反,它必须依照为生产它而耗费的劳动来估计。为改变物质形式而耗费的劳动,代表一个人的时间的一定部分……”

斯图亚特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

他说:“那种通过自身转移(alienation)而创造出一般等价物(universal equivalent)的劳动,我称之为产业。”

他不仅把作为产业的劳动同实在劳动区别开来,而且也同劳动的其他社会形式区别开来。他认为,这种劳动是资产阶级形式的,是同它的古代形式和中世纪形式相对立的。他特别注意资产阶级劳动和封建劳动之间的对立,他在苏格兰本地以及周游大陆时,曾对没落阶段的封建劳动进行过考察。斯图亚特当然很清楚,在资产阶级以前的时代,产品就采取过商品的形式,商品也采取过货币的形式,但是他详细地证明,只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时期,商品才成为财富的基本的原素形式,转移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因此,生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1卷第181—183页。

同上,第361—362页:《represents a portion of a man's time》。

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在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轮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这里他完全没有看到自然因素,可是在纯粹社会财富即交换价值的领域内,自然因素却追跟着他。诚然,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换句话说,从简单商品的观点看来他以为是真实的东西,一到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等等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代替了这种商品时,他就看不清了。例如,他说:在市民阶级的 *paradise lost*[失乐园]中,人们还没有以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佃户、高利贷者等身分互相对立,而是以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身分互相对立,在那里,商品价值是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他经常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价值这一规定混为一谈,在谈到细节时总是摇摆不定,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之转化为生产

因此他说,以替土地所有者创造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的宗法式农业是一种“滥用”诚然,这不是在斯巴达,或者在罗马,或者甚至在雅典,而是在十八世纪的工业国家。这种《*abusive agriculture*》[“滥用的农业”不是《*trade*》[“经营活动”],而“只是谋生的手段”。正如资产阶级农业清除了农村的过剩人口一样,资产阶级工场手工业清除了工厂的过剩人手。

例如,亚当·斯密说:“对从事劳动的人来说,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必然有同等的价值。在他的健康、体力和活动处于正常的情况下,在他的技巧处于平均水平的条件下,他所付出的休息、自由和幸福的分量总是一样

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转化为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认为私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固然是对的,但是认为分工以私人交换为前提就错了。譬如在秘鲁人中曾有过非常发达的分工,但是并没有私人交换,产品并没有作为商品交换。

大卫·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反,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在这方面他至少推测到这个规律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前提。他说,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这样的商品,

“这些商品可以由工业任意增加,它们的生产受无限制竞争的支配”。

实际上,这不过是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同时,李嘉图还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¹⁸是他所知道的

多。所以,不论他取得多少商品作为他的劳动的报酬,他所付的代价总是一样。诚然,用这个代价买来的商品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但这只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值有了变动,而不是因为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有了变动。可见,只有劳动从来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因此,它是商品的实在的价格……”

Ricardo Davi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ition London, 1821, p. 3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页]。

唯一的社会形式。李嘉图虽然受着这种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但是他对深处与表面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作了非常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析,以致布鲁姆勋爵说:

“李嘉图先生似乎是从别的行星上掉下来的。”

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不仅强调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而且指出:“我们经济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结于必要劳动时间,归结于

“全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像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如果撇开这种争论的多半是幼稚的形式,它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第一:劳动本身有交换价值,而不同的劳动有不同的交换价

Sismondi 《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2, p. 162 Bruxelles, 1838[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162页]:“商业把一切东西都归结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同上,第163—166页及以下各页。

最幼稚的恐怕是让·巴·萨伊给康斯坦西奥翻译的李嘉图著作的法文本所加的注释,最迂腐而又傲慢的是新近出版的麦克劳德先生的《Theory of Exchanges》¹⁹, London, 1858[“汇率论”1858年伦敦版]。

值。把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作为尺度的那个交换价值本身还需要有尺度。这种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已知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试以此为基础论证工资。雇佣劳动学说将答复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Ergo[因此],这种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资本时解决。

第三:商品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低于或高于它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在这种奇怪的结论中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这个问题将在竞争学说中解决。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留给蒲鲁东先生去做的,就是不仅把旧社会的基本原则宣布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且宣称自己是李嘉图概括英国古典经济学全部成果的那个公式的发明者。事实证明,当蒲鲁东先生在海峡彼岸“发现”这个公式的时候,在英国,甚至对李嘉图公式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早已被人遗忘了。(参看我的《Mieère de la Philosophie etc》. Paris, 1847“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关于 la valeur constituée [构成价值]一节)

第四 :最后一个辩驳 ,假如不是像通常那样用古怪例子的形式提出来 ,似乎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如果交换价值不过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那末 ,不包含劳动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 ? 换句话说 ,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 ? 这个问题将在地租学说中解决。

第二章

货币或简单流通

在英国议会就 1844 年和 1845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银行条例²⁰进行的一次辩论中,格莱斯顿曾经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他是对不列颠人谈不列颠人。相反,在货币钻研上早就有“天使般的机智”(虽然配第对此表示怀疑)的荷兰人,在货币钻研上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们的机智。

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只在于清楚地理解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一切资产阶级关系都镀上了金或银,表现为货币关系,因而货币形式似乎具有一种无限复杂的、对它本身说来是外来的内容。

在以下的研究中要把握住,我们所谈的只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为简化起见,到处把金作为货币商品。

1 价值尺度

流通的第一个过程,可以说,是实际流通的理论上的准备过程。作为使用价值存在的商品,首先替自己创造一种形式,它们以

这种形式彼此在观念上作为交换价值,作为一定量物化一般劳动时间而出现。这个过程的一个必要行动,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商品使一种特殊商品,比如金,当作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即当作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我们回顾一下商品把金转化为货币时所采取的形式:

1 吨铁= 2 盎斯金

1 夸特小麦= 1 盎斯金

1 摩哈咖啡= $\frac{1}{4}$ 盎斯金

1 钾碱= $\frac{1}{2}$ 盎斯金

1 吨巴西木材= $1\frac{1}{2}$ 盎斯金

Y 量商品= X 盎斯金

在这个等式系列中,铁、小麦、咖啡、钾碱等等彼此表现为同样的劳动即物化在金中的劳动的化身,在这种劳动中,这些商品的不同使用价值所表现的各种实在劳动的一切特点完全消失了。作为价值,它们是相同的,是同一劳动的化身或劳动的同一化身,是金。作为同一劳动的同样的化身,它们只有一种差别即量的差别,或者说表现为不同的价值量,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中包含着不等的劳动时间。它们是这样单个单个的商品,但是因为同一般劳动时间本身,即同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金发生了关系,它们同时又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彼此发生关系。正是这个使商品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中的关系,把包含在金中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一定量的这种一般劳动时间在不同量的铁、小麦、咖啡等等上,总之,在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或者说,直接在商品等价物的无限系列上展示出来。当商品全面地通过金来表现它们的交换价值的时候,金就直接用一切商品来表现它自己的交换

价值。当商品彼此间互相赋予交换价值的形式的时候,它们就赋予金以一般等价物的或货币的形式。

因为一切商品都按照一定量金和一定量商品含有等量劳动时间的比例用金来衡量自己的交换价值,金就成了价值尺度,而金首先只是由于作为价值尺度这一规定——作为价值尺度它直接用一切现有的商品等价物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才变成一般等价物或货币。另一方面,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现在都用金来表现。在这个表现中,要区别质的因素和量的因素。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作为同一的同样的劳动时间的化身存在着;而商品的价值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各商品在与金相等的比例上彼此相等。这一方面表现出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质,另一方面在它们的金等价物上表现出这个劳动时间的量。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地用一种特殊商品,或者说,用商品同一种特殊商品相等的唯一等式,作为一般等价同时也作为这个等价的程度表现出来,就是价格。价格是商品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内部出现时的转化形式。

可见,商品通过它们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金价格这个过程,同时把金表现为价值尺度,从而表现为货币。如果它们全面地用银或小麦或铜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因而表现为银价格、小麦价格或铜价格,银、小麦或铜就会变成价值尺度,并且因此变成一般等价物。商品要在流通中表现为价格,它们在进入流通之前就应该是交换价值。金所以变成价值尺度,只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计自己的交换价值。但是这种过程中的关系——金作为尺度的性质正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的全面性的前提是:每一单个商品都按照金和自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用金来衡量自己,因此,商品和金之间的真正尺度是劳动本身,或者说,商品和金是通过直接的物

物交换彼此作为交换价值而相等的。至于这种相等实际上如何发生,在简单流通领域内不能加以研究。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生产金银的国家,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直接体现在一定量金银中,而在既不产金也不产银的国家,是通过迂回的办法达到同样的结果的,这就是用本国的商品,即本国平均劳动的一定部分去同那些有金银矿藏的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交换物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金要充当价值尺度,就必须是一个潜在可变的价值,因为它只有作为劳动时间的化身才能变成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而同一劳动时间又随着实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动而实现在同一些使用价值的不同量上。一切商品的价值用金来估计,正如每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用一种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一样,其前提不过是金在一定时刻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前面讲过的交换价值规律也适用于金的价值变动。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保持不变,那末它们的金价格只有在金的交换价值跌落的时候才能普遍上涨。如果金的交换价值保持不变,那末金价格只有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上涨的时候才能普遍上涨。商品价格普遍跌落的场合则相反。如果一盎司金的价值由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发生变动而跌落或上涨,那末它的涨落对一切其他商品都是同等程度的,因此,它在一切其他商品面前依旧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同一些交换价值现在是用比从前大或比从前小的金量来估计,但是它们是按照自身的价值量来估计的,因而它们彼此之间仍然保持着同样的价值比例。2 4 8变为1 2 4或4 8 16时,其比例仍然不变。金的价值变动了,交换价值就以改变了的金量估计自己,这个改变了的金量并不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正如银的价值虽然只等于金的价值的 $\frac{1}{15}$,但这并不妨碍银把金排斥于这个职能之外。由于

劳动时间是金和商品之间的尺度,而且金只有在一切商品都用它来衡量自己的时候才成为价值尺度,因此,以为商品的可通约性是由货币造成的想法,纯粹是流通过程的假象。相反,正是作为物化劳动时间的商品的可通约性使金成为货币。

商品进入交换过程时所采取的实在形态,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形态。它们必须通过自身的转移才变成真正的一般等价物。它们的价格规定,是它们仅仅在观念上向一般等价物的转化,是一个尚待实现的同金相等的等式。但是,由于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只是观念上转化为金,或者说转化为只是想像的金,它们的货币存在还没有真正同它们的现实存在脱离,所以金还只是转化为观念的货币,还只是价值尺度,而一定的金量实际上还只是作为一定量劳动时间的名称起作用。商品彼此表现它们交换价值的一定方式决定着金借以结晶为货币的形式规定性。

现在,商品是作为两重存在而互相对立着,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观念上作为交换价值。现在,它们彼此把自己所包含的劳动的

不错,亚里士多德理解到,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价格的前提:“显然……还没有货币的时候,就已经有交换了,因为用5张床换一间屋,或者换5张床所值的货币,是没有区别的。”另一方面,由于商品在价格上才取得互为交换价值的形式,所以他以为商品通过货币才成为可通约的。“一切物都必须有一个价格,这样才会始终有交换,因而才会有社会。事实上,货币就像尺度一样,使物品可以通约,从而使它们相等。因为没有交换就没有社会,而没有相等就不能有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相等。”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这些用货币来衡量的不同物品是一些完全不可通约的量。他寻找的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统一物,但是他作为一个古希腊人不能找到这个统一物。为摆脱这个难关,他假定本来不可通约的物在实际需要时会借助货币变成可通约的物:“固然,在本质上,这样不同的物是不能通约的,但是由于实际需要,这种情况却发生了。”(Arist《Ethic Nicom》,L 5, C 8, edit Bekkeri Oxonii, 1837[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贝克里编 1837年牛津版第5卷第9章])

两重形式表现出来了,因为特殊的实在劳动作为它们的使用价值而实际存在着,而一般的抽象劳动时间则在它们的价格上取得想像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上,它们是同一价值实体的同样的、只有量的差别的化身。

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差别,一方面,似乎只是名义上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劳动是商品的实在价格,货币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假定1盎斯金是30个工作日的产品,那末现在1夸特小麦就不用30个工作日估价,而用1盎斯金估价。另一方面,这个差别决不是单纯名义上的差别,因为实际流通过程中威胁着商品的一切风暴正是集中在这个差别上。30个工作日已经包含在1夸特小麦中,因此,没有必要现在才把1夸特小麦表现为劳动时间。但是,金是一种和小麦不同的商品,1夸特小麦能否像它的价格所预先标明的那样事实上变成1盎斯金,只有在流通中才能证明。这就要看它能否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能否证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是社会为生产1夸特小麦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商品本身是交换价值,它有一个价格。在交换价值和价格的这个差别中表现出:包含在商品中的特殊的个人劳动,必须通过转移的过程才表现为它的对立物,表现为无个性的、抽象一般的、并且只有在这种形式上才是社会的劳动,就是说表现为货币。它能否得到这种表现,看来是偶然的事情。因此,虽然在价格上,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是在观念上得到一个同自身不同的存在,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两重存在只是作为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存在,另一方面,虽然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金还只是作为想像的价值尺度同实在商品相对立,但是,就在交换价值作为价格的存在或金作为价值尺度的存在中,已经隐藏着商品向镏铤的真金转移的必要性和商品转移成的可能性,总之,隐藏

着由于产品是商品而产生的全部矛盾,或者说,隐藏着由于私人特殊劳动必须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物即抽象一般劳动才取得社会效力而产生的全部矛盾。因此,那些只要商品不要货币、只要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而不要这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空想主义者是作得彻底的,他们不等货币以可感觉的形式出现,就在它作为价值尺度的朦胧的、想像的形式上把它“消灭”。在看不见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假定金变成价值尺度而交换价值变成价格的过程已经存在,一切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还只是想像的大小不同的金量。它们作为同一物即金的不同量而互比较量、互相比较和互相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使它们同作为计量单位的一定金量发生关系,这个计量单位分为若干等分,每一等分又分为若干等分,因而发展成为标准。但是金量本身是用重量来衡量的。因而这个标准在金属的一般衡制中是现成的,所以在一切金属流通中,金属的一般衡制便首先起了价格标准的作用。当商品不再作为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交换价值,而作为用金来衡量的同名量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候,金就从价值尺度转化为价格标准。商品价格彼此作为不同金量而进行比较,这样就结晶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切合于想像的金量并把这个金量表现为等分的标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规定性,两者的混淆曾经

在英国,作为货币衡量单位的1盎斯金不是分成等分,这种怪事可以解释如下:“我国的铸币制度本来只适用银,因此1盎斯银分成的银币总是一个整数;但是,后来在只适用银的铸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1盎斯金铸成的金币就不是一个整数了。”M adaren.《History of the currency》,p.16, London, 1858 [麦克拉伦“通货史”1858年伦敦版第16页]。

引起最荒谬的理论。金作为物化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金作为一定的金属重量是价格标准。当金作为交换价值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发生关系的时候，它是价值尺度，而在价格标准中，金的一定量成为金的其他量的单位。金所以是价值尺度，因为它的价值是可变的，金所以是价格标准，因为它被确定为不变的重量单位。在这里，正如在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和确定性有决定的意义。把一定金量确定为计量单位并在这个单位之下确定若干等分的必要性，曾经引起一种想法，似乎一定金量（它的价值本来是可变的）同商品的交换价值被确定在固定的价值比例上了，不过这种想法没有看到，在金发展成价格标准之前，商品交换价值就已经转化为价格、转化为金量了。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彼此间总是表示同样的价值比例。哪怕金的价值跌落 $1000/100$ ，12 盎斯金的价值仍然是 1 盎斯金的 12 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1 盎斯金决不会因为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也不会因而改变它的等分的重量，所以，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

“货币在价值上可以不断变动，但是它仍然可以很好地充当价值尺度，好像它根本没有变动一样。譬如说，假定它的价值跌落了……在价值跌落之前，1 基尼买 3 蒲式耳小麦或 6 日的劳动；后来只买 2 蒲式耳小麦或 4 日的劳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已知小麦和劳动两者同货币的比例，就可以推出两者的相互比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求出 1 蒲式耳小麦值 2 个劳动日。这就是价值衡量的全部意义，而这在价值跌落以后可以和价值跌落以前一样容易地办到。一件物品适于充当价值尺度的长处，同它自己的价值的可变性毫无关系。”(Bailey,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London, 1837, p. 9—10 [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 年伦敦版第 9—10 页])

历史过程(我们在后面将根据金属流通的本质来加以说明)造成这样的后果:执行价格标准职能的贵金属的重量不断变动和减轻,但是它的重量名称却保持不变。例如,英镑还合不到它原有重量的 $\frac{1}{3}$;苏格兰镑在合并²¹以前只合原有重量的 $\frac{1}{36}$;法国的利弗尔只合原有重量的 $\frac{1}{74}$;西班牙的马拉维第还不到原有重量的 $\frac{1}{1000}$,葡萄牙的瑞斯同原有重量的比例还要小得多。于是,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就和金属的一般重量名称在历史过程中脱离了。计量单位、它的等分以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充当货

“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上的名称的铸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铸币;然而它们在一个时期全都是真实的。后一句话说得那么广泛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是真的,人们才用它们来计算。”(Galiani.《Della Moneta》, 1. c., P. 153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3卷第153页])

浪漫派的亚·弥勒说:“在我们看来,每一个独立的君主都有权替金属货币命名,授予它们社会的名义价值、等级、地位和称号。”(S. 288. Zweiter Teil. A. H. M. üller.《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Berlin, 1809 [亚·亨·弥勒“政治学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8页])就称号来说,我们的宫廷顾问先生说得对;他只是忘记了实质。比如,下面一段话表明他的“看法”多么混乱:“每个人都看到,正确规定造币局价格是何等重要,特别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如此,在那里政府宽宏大量地免费造币。看来,弥勒先生以为英国政府人员从自己的私囊中开支造币费用,并且不课造币税等等,因此,如果政府把金的造币局价格定得大大高于市场价格,如果不是像现在那样对每盎斯金付3镑17先令 $10\frac{1}{2}$ 辨士,而是把1盎斯金的造币局价格规定为3镑19先令,所有的货币就会流向造币局,而从那里得来的银会到市场上去换便宜的金,然后再送到造币局,而币制就陷于混乱。”(同上,第280、281页)为维持英国造币局的秩序,弥勒自己却陷于“秩序混乱”。先令和辨士只是1盎斯金的一定部分用银记号和铜记号来表示的名称,而弥勒以为1盎斯金是用金、银和铜

币材料的一定金属是社会已经提供了的。在不同的国家,法定价格标准自然不同。在英国,例如,作为金属重量的盎斯分为 penny - weights〔本尼威特〕、grains〔克冷〕、carats troy〔克拉〕,但是,作为货币单位的 1 盎斯金分为 $\frac{7}{8}$ 索维林,1 索维林分为 20 先令,1 先令又分为 12 辨士,这样,100 磅 22 开金(1200 盎斯)等于 4672 索维林 10 先令。可是在消失了国界的世界市场上,货币尺度的这种民族性又消失了,它让位给金属的一般的衡制。

因此,商品价格或商品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来表现了。英国人不说 1 夸特小麦等于 1 盎斯金,而说等于 3 镑 17 先令 $10\frac{1}{2}$ 辨士。这样,一切价格就用同样的名称表现出来。商品赋予自己交换价值的那个特殊形式,转化为货币名称,它们用这种名称彼此说明自己值多少。而货币这方面也就成为计算货币。

每当从交换价值的观点来表示任何一种财富时,就会在脑中、在纸上或在谈话中发生商品向计算货币的转化。为了这种转化,

来估价的,因而认为英国人有三重 standard of value〔本位〕是他们的幸运。诚然,银作为货币尺度同金并存的情况到 1816 年才由乔治三世第五十六年第六十八号法令正式加以废止。可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早在 1734 年就由乔治二世第十四年第四十二号法令在法律上加以废止了,而在实践中废止得还要早些。有两种情况特别使亚·弥勒能对政治经济学有所谓高超的理解。一方面他对于经济事实完全无知,另一方面他对哲学只是抱爱好而空想的态度。“有人问阿那卡西斯,希腊人为什么要用货币,他回答说,为了计算。”(Athen. Deipnosophistai, L. IV, 49, v. 2, ed. Schweighäuser, 1802〔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十五卷集)施魏格霍伊泽尔编 1802 年版第 4 卷,49,第 2 分册第 120 页])

亚当·斯密著作的早期法文译者之一加尔涅有过一种古怪想法,想在计算货币和实在货币的使用之间定出一个比例。这个比例是 10:1。(Garnier G.

必须有金的物质,但只是想像中的。用若干盎斯金来估计 1 000 包棉花的价值,再用 1 盎斯金的计算名称如镑、先令、辨士来表现这些盎斯,不需要真金的一个原子。例如,在 1845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条例之前,在苏格兰连 1 盎斯金都没有流通,虽然 1 盎斯金,作为英国计算标准表现为 3 镑 17 先令 $10^{1/2}$ 辨士,是法定的价格尺度。又如,西伯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事实上虽然纯粹是物物交换,但是以银为价格尺度。因此,对于作为计算货币的货币说来,它的单位或单位以下的等分是否真正铸造出来,是毫无关系的。在征服者威廉时期的英国,1 镑曾是 1 磅纯银,先令是 $1/20$ 磅纯银,但镑和先令只是作为计算货币而存在,辨士即 $1/240$ 磅纯银倒是当时大量存在的银铸币。相反,在今天的英国,虽然先令和辨士是 1 盎斯金的一定部分的法定计算名称,却并无先令和辨士存在。货币作为计算货币可以完全只在观念上存在,而实际存在的货币却按照完全不同的标准铸造。例如,在北美洲的许多英国殖民地中,流通的货币直到十八世纪末叶还是由西班牙币和葡萄牙币组成的,但是计算货币却到处和英国一样。

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和商品价格表现为同样的计算名称,例如,1 盎斯金和 1 吨铁同样都可表现为 3 镑 17 先令 $10^{1/2}$ 辨士,因此,金的这种计算名称被叫作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

《Histoire de la monnaie depuis les temps de la plus haute antiquité éecl》, t. I, p. 78[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的货币史”第 1 卷第 78 页]

1723 年马里兰条例规定烟草是法定的货币,但是烟草的价值要折合为英国金币,即每磅烟草折合 1 辨士。这件事使人想起 *leges barbarorum*²², 这种法律相反地规定一定货币额等于若干头公牛、母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计算货币的真正材料既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公牛和母牛。

的想法，以为金用它自身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其他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金作为价格规定的因素并因而作为计算货币发生作用时，它不仅没有固定的价格，而且根本没有任何价格。如果金要有价格，就是说要在一种特殊商品上使自己表现为一般等价物，那末，这另一种商品就要和金一样，在流通过程中起一种排他的作用。但是，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物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金和银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们当作同一物质看待，总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假定同一劳动时间固定不变地物化在金银的同一比例中，这实际上就是假定金银是同一物质，而银这种价值较低的金属是金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的。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英国币制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是法定的金银价值比例同金银价值的实际变动不断发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估价高了。估价过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和输出。于是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再由法律加以调整，但新的名义价值很快又像旧的那样同实际的价值比例发生冲突。现代，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银，同银相比，金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被金逐出于流通之外。1855、1856和1857年，输入法国的金比从法国输出的金多了4 158万镑，而从

例如，我们在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Familiar words》[“家常话”]中读到：“金的价值应当用金自身来衡量；任何物质怎么能够在别的物体中有它自己的价值尺度呢？金的价值应当用它自身的重量来确定，可是这个重量要取一个假名，于是1盎斯金就应当值若干镑和几分之几镑。这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准。”

法国输出的银比输入法国的银多了 34 704 000 镑。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其中的一种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来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

B 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

商品在价格的形式上只是在观念上转化为金，金从而只是在观念上转化为货币，由于这种情况，便产生了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因为在规定价格时，只是想像的金银起作用，金银只是当作计算货币起作用，有人就以为镑、先令、辨士、塔勒、法郎等名称，不是指金银的重量部分或某种物化劳动，而是指观念的价值原子。于是，比如说，如果一盎斯银的价值提高了，那它就包含更多的这样的原子，因此它就应当算成和铸成更多的先令。这种学说在英国最近一次商业危机中又流行起来，甚至在议会中，在

“作为商业尺度的货币应当像其他任何尺度一样尽可能永久保持稳定。如果你们的货币是由价值比例不断变动的两种金属构成，就做不到这一点。”(John Locke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etc》.1691 ;p. 65 in seinen *Works*), 7 ed., London, 1768, vol. II [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1691年版;“洛克全集”1768年伦敦第7版第2卷第65页])

1858年银行委员会报告所附的两个专门报告中也提出过。这种学说最早产生于十七世纪末叶。在威廉三世即位时,1盎斯银的英国造币局价格是5先令2辨士,或 $\frac{1}{62}$ 盎斯银称作1辨士,12个这样的辨士称作1先令。按照这个标准,例如6盎斯重的银就铸成31个称作先令的银币。但是,1盎斯银的市场价格升到它的造币局价格之上,从5先令2辨士升到6先令3辨士,或者说,购买1盎斯生银必须付给6先令3辨士。既然造币局价格不过是1盎斯银的等分的计算名称,1盎斯银的市场价格怎么能升到它的造币局价格之上呢?这个谜一下子就解开了。在当时流通的560万镑银币中有400万镑已被磨损和刮削。有一次检验证明,57200镑银币应该重220000盎斯,实重却只有141000盎斯。造币局仍然按照同样的标准铸造,但是实际流通的轻先令所代表的1盎斯的等分却比它名称所代表的要小。因此,到市场上购买1盎斯生银,就得支付较多的这种变轻了的先令。这样就发生了混乱,于是决定普遍重铸,这时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财政部秘书长〕朗兹断言,1盎斯银的价值已经提高,因此今后它应该铸成6先令3辨士,而不应该同从前一样铸成5先令2辨士。其实,他也就是说,因为1盎斯的价值已经提高,所以它的等分的价值降低了。但是,他的错误理论只是一个正当的实际目的的掩饰。国债是用轻先令借的,难道要用重先令来还吗?在名义上得5盎斯而实际上得4盎斯的地方,他不说还4盎斯,却反而说名义上要还5盎斯,但是把它的金属含量减成4盎斯,把从前称作 $\frac{4}{5}$ 先令的称作1先令。因此,朗兹实际上是维护金属含量,虽然在理论上是坚持计算名称。他的反对者只是坚持计算名称,因此把减轻了25—50%的先令同足量的先令说成一样,但他们反而硬说他们只是坚持金属含

量。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他也接受了朗兹的挑战。约翰·洛克获得了胜利，货币借来的时候是 10—14 先令合 1 基尼，而偿还的时候则是 20 先令合 1 基尼。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挖苦地总结这笔生意说：

“政府在赋税上大占便宜，债权人在资本和利息上大占便宜，唯一受骗的人民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 Standard〔标准〕他们自己的价值的标准并未降低。”

洛克还说：“把以前称作半克朗的称作 1 克朗吧。价值仍然是由金属含量决定的。如果你们能把一个铸币的银量减少 $\frac{1}{20}$ 而不减少它的价值，那末你们同样能把它的银量减少 $\frac{19}{20}$ 。按照这种理论，把一个法寻称作克朗，这个法寻就能够同含有 60 倍银的克朗一样，购买同样多的香料、丝绸或其他商品。你们能够做到的一切，不过是拿较大的银量的印记和名称加在较小的银量上。但是用来偿还债务和购买商品的是银，不是名称。如果你们提高货币价值不过是对于银块的一个等分随便给一个名称，例如把 $\frac{1}{8}$ 盎斯银称作 1 个辨士，那末，你们实际上可以把货币价值爱提得多高就多高。”²³洛克同时还答复朗兹说，市场价格升到造币局价格之上，原因不是“银价值的增高，而是银铸币的减轻”。77 个已被刮削的先令丝毫不比 62 个足量的先令重。最后，他正确地提出，如果撇开流通的铸币的银量减少不谈，在英国，生银的市场价格也会多少高于造币局价格，因为生银的输出是容许的，而银币的输出是禁止的。（见“略论降低利息”第 54—116 页）洛克非常谨慎地避免涉及迫切的国债问题，同样他非常小心地避开下面这个细致的经济问题：汇率，同生银对银币的比例一样，证明流通的货币的贬值远不是与它实际的银量减少成比例的。我们在流通手段一节中将回过头来对这个问题作总的研究。尼古拉·巴尔本在《A discourse concerning coining the new money lighter, in answer to Mr Locke's considerations etc》, London, 1696〔“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 年伦敦版〕中企图把洛克引入危险地带，但没有成功。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 年都柏林版第 2 卷第 156 页。

斯图亚特以为,随着商业进一步的发展,人民会更机敏一些。他错了。大约在120年后,同样的quid pro quo(误会)又发生了。

贝克莱主教是英国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他给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加上了讲求实际的“财政部秘书长”所忽略的理论气质,这是合乎常理的。他问:

“难道不能把利弗尔、镑、克朗之类的名称看成只是比例名称 即抽象价值本身的比例 吗?难道金、银或纸币不只是用来计算、记载和监督 价值比例的记号或符号吗?难道支配别人的实业活动 社会劳动 的权力不就是财富吗?难道货币实际上不只是转移和记载这种权力的符号或记号,而用什么材料做这种符号是十分重要的吗?”

这里一方面混淆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另一方面混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银和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因为贵金属在流通过程中可以用记号代替,贝克莱就得出结论说,这些记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对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发挥得如此充分,以致他的追随者(无意识的追随者,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既找不到一个新的说法,甚至也找不到一个新的例子。

他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分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money coin)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计算货币对物品的价值所起的作用,就像度、分、秒等等对角度的作用,标尺对地图的作用等等一样。在这一切发明中,总是采用一个名称作为单位。

“提问者”。顺便提一下,《Queries on money》[“关于货币问题”]一篇写得很有才智。其中贝克莱正确地指出,北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恰恰“最清楚地证明,金银对于一国的财富,并不是像各阶层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必要”。

价格在这里按照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著作家的用法,是指实在的等价物。

所有这些措施的用途不过是在于指示比例,货币单位的用途也是一样。因此,货币单位不能同任何一部分价值有固定不变的比例,也就是说,它不能固定在任何一定量的金、银或任何其他商品上。单位一经确定,用乘法就可以求出最大的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对商品发生影响的环境的总的结合以及人们的癖性,所以应当把商品价值看作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变动着的。凡是用共同的、一定的、不变的标准妨碍和扰乱确切规定比例变动的做法,必定对贸易发生有害的影响。货币只是具有等分的观念标准。如果有人问:一个部分的价值的计量单位应当是什么,我就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度、分、秒的标准大小是什么?它们没有标准大小;但是,只要一个部分已经确定,依据标准的本质,其余的必定全都依比例确定下来。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货币和非洲海岸的安哥拉货币就是这种观念货币的例子。”

斯图亚特所说的只是货币在流通中充当价格标准和计算货币的现象。如果几种商品在价格表上分别标价为 15 先令、20 先令、36 先令,那末,在比较它们的价值量时,实际上我所关心的既不是先令的含银量,也不是先令的名称。15、20、36 这些数的比例已经说明一切,1 这个数成为唯一的计量单位。比例的纯抽象的表现始终只是抽象的数的比例本身。因此,为彻底起见,斯图亚特不仅要撇开金银,而且还要撇开它们的法定的教名。他由于不了解价值尺度向价格标准的转化,自然就以为用作计量单位的一定量金,不是对其他的金量作尺度,而是对价值本身作尺度。因为各种商品通过自己的交换价值转化成价格而表现为同名的量,他就否定了使各种商品成为同名的那个尺度的质;又因为在各种不同金量的比较中用作计量单位的金量的大小是约定俗成的,他就连对这个大小总得有个规定都加以否定。他可以不说圆周的 $\frac{1}{360}$ 是 1 度,而说 $\frac{1}{180}$ 是 1 度;这时,直角就不是用 90 度计算,而是用 45 度计算,

锐角和钝角的计算以此类推。虽然如此,量角器仍然首先是有一定质的数学形式——圆,同时又是有一定量的圆的部分。至于斯图亚特的经济例证,一个反驳了他自己,另一个什么也没有证明。阿姆斯特丹银行货币实际上只是西班牙多布隆币的计算名称,当辛勤流转的铸币因为同外界剧烈磨擦而消瘦下来的时候,多布隆币却因懒洋洋地躺在银行地窖里而保持着自己的全部脂肪。至于那些非洲的观念论者,在有批判眼光的旅行家作出关于他们的详细报道之前,我们只能让他们听天由命了。法国的阿西涅可以说是近似斯图亚特所了解的观念货币:“国民财产。阿西涅 100 法郎”。诚然,这里阿西涅所应代表的使用价值,即被没收的土地,是确切指明了的,可是计量单位的量的规定被忘记了,因而“法郎”便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词。一个阿西涅法郎代表多少土地,要看土地公开拍卖的结果而定。但是实际上,阿西涅法郎是作为银币的价值符号来流通的,因而它的贬值也是用这个银标准来衡量的。

在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时期,货币理论几乎比战报还要多。由于银行券贬值和金的市场价格高于造币局价格,银行的某些辩护人重新提出观念的货币尺度学说。卡斯尔里子爵给这种混乱见解找到了典型的混乱说法,他把货币计量单位说成是《a sense of value in reference to currency as compared with commodities》[“通货同商品比较所产生的价值感”]。巴黎和约签订以后几年,情

在最近一次商业危机中,英国某些方面的人士盛赞非洲的观念货币,而这一次观念货币的住址从海岸移到贝尔贝莱内地去了。有人认为,贝尔贝莱人没有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是由于他们用《Bars》[金属条块]这种观念的计量单位。把商业和工业的存在说成是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岂不是更简单吗?

况又容许恢复兑现,这时,威廉三世时代朗兹曾提出的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又被提出来了。庞大的国债,二十多年积下的大量私人债务和定额债券等,都是用贬值的银行券订立的。这些债务是否应该用每 4 672 镑 10 先令不仅名义上而且实际上也代表 100 磅 22 开金的银行券来偿还呢?北明翰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以 Lowndes redivivus(朗兹转世)的姿态出现。他主张债权人在契约中名义上借出多少先令,就该在名义上收回多少先令;不过,如果按照从前的铸币含金量把大约 $1/78$ 盎斯金称作 1 先令,那末现在应该比如把 $1/90$ 盎斯金称作 1 先令。阿特伍德的门徒以《little Shillingmen》[小先令人]的北明翰派而著称。从 1819 年开始的关于观念的货币尺度的争论,到 1845 年仍然在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特伍德之间进行着,阿特伍德在货币作为尺度的职能方面所有的智慧,可以全部总结在下面所引的一段话中:

“在与北明翰商会论战中罗伯特·皮尔爵士问道:你们的一镑银行券代表什么?什么叫作一镑?.....反过来说,对现行的价值计量单位应如何理解?3 镑 17 先令 $1/2$ 辨士是表示 1 盎斯的金,还是它的价值?如果是 1 盎斯金本身,那为什么不用它的名字称呼它,为什么不称盎斯、本尼威特、克冷而要称镑、先令、辨士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制度去了.....

或许它们指的是价值?如果 1 盎斯金= 3 镑 17 先令 $10^{1/2}$ 辨士,为什么它有时又值 5 镑 4 先令,有时又值 3 镑 17 先令 9 辨士呢?.....‘镑’(£)这个用语是指价值,但不是指固定于一个不变的量上的价值。镑是一个观念的单位.....劳动是形成生产费用的实体,它把金的相对价值赋予金,就像把铁的相对价值赋予铁一样。因而,不论用什么特别的计算名称来表示一人的 一日劳动或一周劳动,这种名称总是表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

《The currency question, the Gemini letters》London, P. 266—272 passim[“通货问题,两人书简”1844 年伦敦版散见第 266—272 页]。

在最后几句话中,观念的货币尺度的模糊概念消散了,而这种概念的固有的思想内容显露出来了。金的计算名称,如镑、先令等等,应该是一定量劳动时间的名称。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那末,这些名称实际上就应该代表价值比例本身。换句话说,劳动时间被认为是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关于北明翰派,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但是还要顺便指出,观念的货币尺度学说在银行券可兑现或不可兑现的争论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如果纸币的名称是从金或银得来的,那末,银行券可以兑现、即可以兑换为金或银,总是一条经济规律,不论法律如何规定。例如,普鲁士的纸塔勒,法律上虽然规定不兑现,但是,当它在日常流通中低于银塔勒,因而实际上不能兑现时,就立刻贬值。因此,英国那些坚决维护不兑现纸币的人,就把观念的货币尺度作为藏身之所。如果货币的计算名称,如镑、先令等等,是一个商品在同其他商品交换时或多或少地吸进或吐出的一定数目的价值原子的名称,那末,比如一张英国的五镑券,就不依赖于它同金的比例,正像不依赖于它同铁和棉花的比例一样。既然它的名称不再使它同一定量的金或其他任何商品在理论上相等,所以它的可兑现的要求,即它同一定量的某种特殊物实际上相等的要求,就被它的概念本身排除了。

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由约翰·格雷第

John Gray 《The social system A 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Edinburgh, 1831[约翰·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年爱丁堡版],并参看他的《Lectures on the nature and use of money》Edinburgh, 1848[“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在二月革命以后,格雷送给法国临时政府一份备忘录,其中教训说,法国所需要的不是一个《organisation of labour》[“劳动组织”],而是一个《organisation of exchange》[“交换组织”],这个组织的方案在他想出的货币制度中已经完

一次加以系统地发挥。他主张国家中央银行通过支行来确定生产各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者以自己的商品换回一张正式的价值凭证，即换回一张表明他的商品包含多少劳动时间的收据；而这种代表1个工作周、1个工作日或1个工作小时等等的银行券，同时又是领取存放在银行仓库中的其他一切商品中的一个等价物的证据。这就是他的基本原则，他把这个原则的细节研究得非常周到，并且使这个原则处处适合英国各种现行机构。在这种制度下，格雷说：

“为取得货币而卖，在任何时候都和现在用货币来买一样地容易；生产将同需求相等而成为需求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贵金属将失去它们对其他商品的“特权”，

“将在市场上与黄油、鸡蛋、棉布、花布并列，取得它们应有的地位，它们的价值不会比金刚石的价值更使我们关心”。

“我们应该保持我们想像出来的价值尺度——金，从而束缚一国的生产力呢，还是应该改用自然的价值尺度——劳动，从而解放一国的生产力呢？”

全设计好了。老实的格雷想不到在他的“社会制度”出现了16年之后，这个发明的专利权会被善于发明的蒲鲁东拿去了。

格雷“社会制度”第63页：“货币应该仅仅是一张收据，证明这张收据的持有者曾经对现存的国民财富贡献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曾经从贡献这一价值的人那里取得了对于这一价值的支配权。”

“产品在事先经过估价后可以存入银行，一有需要又可以把它提取出来，但是大家要同意一个条件：凡是把任何种类的财产存入这种国家银行的人，都可以从银行取出同等价值的任何物品，而不是只准提取他所存入的物品。”同上，第67—68页。

同上，第16页。

格雷“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议”第182页。

同上，第169页。

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内在尺度,为什么除了劳动时间之外还有另一种外在尺度呢?为什么交换价值发展成为价格呢?为什么一切商品都用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来估计自己的价值,因而使这一商品变成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变成货币呢?这是格雷应该解决的问题。他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去空想商品能够直接当作社会劳动产品而相互发生关系。但是,它们是什么,就只能当作什么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直接是彼此孤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必须在私人交换过程中通过转移来证明是一般社会劳动;或者说,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只有通过个人劳动的全面转移才成为社会劳动。但是,既然格雷把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直接当作社会劳动时间,那他就是把这种劳动时间当作共同的劳动时间,或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实际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和银,就不会当作一般劳动的化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交换价值就不会变成价格,而使用价值也就不会变成交换价值,产品也就不会变成商品,因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也就会消灭。然而,这决不是格雷的本意。在格雷看来,产品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格雷指靠国家银行来实现这个虔诚的愿望。一方面,社会通过银行使个人不依赖私人交换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又让个人在私人交换的基础上继续生产。因此,这里的内在逻辑迫使格雷一个又一个地废弃资产阶级生产的条件,虽然他只是想将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货币“改良”一下。这样他就把资本变成国家资本,把地产变成国家财产,如果仔细

“每个国家的实业应该靠国家资本来经营。”(约翰·格雷“社会制度”第171页)

“土地应该成为国家财产。”(同上,第298页)

地看一下他所说的银行,就会发现它不仅一手收进商品和另一手发出对提供的劳动的凭证,而且还调节着生产本身。格雷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中小心翼翼地想表明他的劳动货币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在这里他陷入了更加尖锐的矛盾中。

每种商品直接就是货币。这是格雷从他的不充分的、因而是错误的商品分析中得出的理论。“劳动货币”、“国家银行”和“商品堆栈”的“有机”结构不过是一种幻影,使人误认为这种教条是支配世界的规律。关于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这种教条,当然不会因为有一个银行相信它并按照它经营就会变成现实。相反,在这种情形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格雷的著作中所隐藏的、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就是劳动货币是一种经济学上的空话,它用来表示下面这种虔诚的愿望:废除货币,同货币一起废除交换价值,同交换价值一起废除商品,同商品一起废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一点被英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有些在格雷前,有些在格雷后,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了。但是,把贬低货币和颂扬商品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来认真宣传,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根本不了解商品和货币的必然联系,这要等蒲鲁东先生和他的学派来完成了。

例如见W. Thompson《An inquiry into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tc》London, 1824[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Bray.《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Leeds, 1839[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1839年里子版]。

Alfred Darimon.《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 Paris, 1856[阿尔弗勒德·达里蒙“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可以看作是这种滑稽的货币理论的纲要。

2 流通手段

在商品通过确定价格的过程取得它适于流通的形式、金取得它的货币性质后,流通将表现并解决商品交换过程所包含的矛盾。商品的实际交换,即社会物质变换,表现为一种形式变换,在这种形式变换中,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展开了,同时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也结晶为货币的一定形式。说明这种形式变换,也就是说明流通。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成为发达的交换价值,是以商品世界,因而是以实际发达的分工为前提的,同样,流通是以全面的交换行为和这种行为的经常更新为前提的。第二个前提是商品要当作具有一定价格的商品进入交换过程,或者说,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彼此要当作二重的存在出现,即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观念上——价格上——作为交换价值。

在伦敦最热闹的大街上,商店鳞次栉比,橱窗中陈列的世界各地的财富琳琅满目,有印度披肩、美国手枪、中国磁器、巴黎胸衣、俄国毛皮、热带香料;但这一切娱世物品,额上都贴着决定命运的白标签,上面写着阿拉伯数码和简写字 $£, sh., d.$ [镑、先令、辨士]。这就是商品出现在流通中的景象。

(a)商品的形态变化

仔细考察起来,流通过程表现出两种不同形式的循环。如果用 W 代表商品,用 G 代表货币,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形式表示为:

$$W—G—W$$
$$G—W—G$$

本篇只论述第一种形式,即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

$W-G-W$ 的循环,分解为 $W-G$ 的运动即商品换货币或卖,和 $G-W$ 的逆运动即货币换商品或买,以及这两个运动的统一 $W-G-W$,即为了用货币换商品而把商品换成货币或为买而卖。但是,过程结束时得出的结果是 $W-W$,即商品换商品,实际的物质变换。

$W-G-W$,从第一个商品那端出发,表现为它向金的转化和它从金向商品的逆转化,或者说,表现为这样一个运动:商品最初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存在,而后摆脱了这种存在,取得了同它的自然存在脱离一切关系的作为交换价值或一般等价物的存在,然后又摆脱了这种存在,最后仍然作为满足个别需要的实际的使用价值。商品以最后这个形态离开流通而进入消费。因此 $W-G-W$ 这个流通的全程,首先是每个商品成为它的所有者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时所要通过的形态变化的整个系列。第一形态变化在流通的前半段 $W-G$ 上完成,第二形态变化在流通的后半段 $G-W$ 上完成,而整个流通形成商品的 curriculum(生命旅程)。但是, $W-G-W$ 这个流通,要成为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全程,它只有同时是其他商品的一定的、单方面的形态变化的总和,因为第一种商品的每一次形态变化就是它向另一种商品的转化,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商品向第一种商品的转化,因而,是在流通的同一阶段上完成的双方面的转化。对于 $W-G-W$ 这个流通所分成的两个交换过程,我们首先应该分别加以考察。

$W-G$ 或卖 W 即商品在进入流通过程时,不仅是作为特殊的使用价值,如 1 吨铁,而且是作为具有一定价格的使用价值,如值 3 镑 17 先令 $10^{1/2}$ 辨士或 1 盎斯金。这个价格,一方面是铁包含

的劳动时间量即铁的价值量的指数,同时又表示出铁的虔诚愿望——想变成金,也就是想赋予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以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形式。如果这个变体没有实现,这吨铁就不仅不再是商品,而且不再是产品,因为它所以是商品,只是由于它对它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或者说,它的所有者的劳动只有作为对别人有用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它只有作为抽象一般劳动才对它的所有者有用。因此,铁的任务,或者说,铁的所有者的任务,是在商品世界中找到铁吸引金的地方。但是,如果像我们在这里分析简单流通时所假定的那样,卖确实完成了,那末这种困难即商品的 salto mortale〔惊险的跳跃〕就渡过了。这吨铁通过它的转移,即通过从把它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的人的手里而实现为使用价值,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价格,从不过是想像的金变成了实在的金。现在,1 盎斯实在的金代替了 1 盎斯金的名称或 3 镑 17 先令 $10^{1/2}$ 辨士,而这吨铁也让出了位置。由于卖即 W—G,不仅原来通过价格在观念上转化成金的商品实际上转化成金,而且由于这同一过程,原来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上的金而实际上只是作为商品本身的货币名称出现的金,也就转化成实在的货币。过去,由于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衡量它们的价值,金在观念上变成了一般等价物,现在,金作为一切商品向它全面转移——卖 W—G 就是这种全面转移的过程——的产物,变成了绝对可以

“货币有两种,一种是观念的货币,一种是实在的货币,因而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用来对物品进行估价,一种是用来购买物品。就估价来说,观念的货币同实在的货币一样适用,而且也许更适用些……货币的另一种用法是用来购买它所估价的物品……价格和契约是用观念的货币来估算,而用实在的货币来实现的。”(加利阿尼“货币论”第 112 页及以下各页)

转移的商品,变成了实在的货币。但是,金在卖的过程中变成实在的货币,只是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中已经是观念上的金的缘故。

不论是卖 $W-G$ 或是买 $G-W$,其中总是有两种商品对立着,这两种商品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但是,在商品方面,它的交换价值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价格存在,而在金方面,虽然它本身也是实际的使用价值,但是它的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存在,因而只是作为同任何实际的个人需要无关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存在。这样一来,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就分配在 $W-G$ 的两极,商品在金的面前是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必须通过金才能实现它的观念上的交换价值即价格,而金在商品面前是交换价值,这个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商品才能把它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变为物质。只有通过商品的这种二重化——分为商品和金,通过这二重对立的关系——每方观念上是对方实际上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对方观念上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商品表现为两极对立物,商品的交换过程所包含的矛盾才得到解决。

到这里为止,我们是把 $W-G$ 当作卖,当作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来考察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另一极,同一过程就相反地表现为 $G-W$,表现为买,表现为货币向商品的转化。卖必然同时是它的对立面——买,从一方面来看这个过程,是卖;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过程,是买。或者说,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区别只是在于:在 $W-G$ 上,主动方面是商品或卖者,在 $G-W$ 上,主动方面是货币或买者。因此,我们把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当作第一流通阶段 $W-G$ 完成的结果来说明,同时也就是假定有另一个商品早已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已经处在第二流通阶段 $G-$

W 上。这样,我们就陷入互为前提的恶性循环。流通本身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把W—G 中的G 看作已经是另一种商品的形态变化,那末,我们就是把交换行为从流通过程中分离出来。但是,在流通过程之外,W—G 的形式就消失了,只剩下两个不同的W——如铁和金——互相对立,它们的交换不是流通过程,而是直接的物物交换。在金的产地,金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商品。在这里,金的相对价值也和铁或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一样,是用它们彼此交换时的量来表现的。但是,在流通过程中,这个行为已经是前提,金本身的价值在商品价格中是既定的。因此,以为金和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发生直接的物物交换关系,因而以为它们的相对价值是通过它们作为简单商品交换来确定,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从表面上看来,金在流通过程中似乎只是作为商品和种种商品交换,但这种假象的产生只是由于一定量的商品在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量的金,就是说,已经同作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发生关系,从而可以直接同金交换。就商品的价格通过金实现来说,商品同金交换是同商品,同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交换,但是,就通过金实现商品的价格来说,商品同金交换就不是同商品交换,而是同货币,同劳动时间的一般化身交换了。而在两种关系上,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交换的金量,都不是由交换来决定的,相反地,交换是由商品的价格即用金估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的。

在流通过程中,金不论在谁的手里都是卖W—G 的结果。但是,因为W—G 卖同时就是G—W 买,这就表示,当过程的起点商

自然,这并不妨碍商品的市场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考察不属于简单流通的领域,而是属于完全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我们在后面要加以考察,在那里要研究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

品W正在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时,另一个处于对极G的商品,正在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因而正在通过流通的后半段,这时前一个商品还在它的旅程的前半段上。

作为流通的第一过程卖的结果而出现的,是第二过程的起点即货币。代替第一形态上的商品的,是商品的金等价物。这个结果首先可以造成一个休止点,因为商品在这第二形态上有它自身的持久的存在。商品在它的所有者手里原来不是使用价值,现在却具有永远可以交换因而永远可以使用的形式,而它究竟在什么时候、在商品世界表面的什么地点再进入流通,那要看情况而定。它的金蛹成了它生命中的独立的一段,它可以在这里停留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在物物交换时,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交换是直接同另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交换结合在一起的,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般性质,却表现为买和卖的行为的分裂和任意脱离。

G—W,买,是W—G的逆运动,同时又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终结的形态变化。商品作为金或者在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上,能够直接表现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些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都把金当作自己的来生来追求,同时又表示出金应该奏出什么样的音符,才能使它们的肉体即使用价值跳到货币那边,使它们的灵魂即交换价值跳进金本身。商品转移的共同产物,是绝对可以转移的商品。金转化为商品,没有任何质的限制,只有量的限制,即金自身的量或价值量的限制。“现金可买一切。”商品在W—G运动中通过它当作使用价值的转移,实现了它自己的价格和别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而商品在G—W运动中通过它当作交换价值的转移,实现了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和别的商品的价格。商品通过自己的价格的实现,同时使金转化为实在的货币,而商品通过自己

的逆转化,使金转化为商品自身的只是瞬息间的货币存在。商品流通既然以发达的分工为前提,因而是以与个人产品的单面性成反比的个人需要的多面性为前提,所以买 $G—W$ 时而表现为与一种商品等价物相等,时而分裂为一系列的商品等价物,这个系列现在决定于买者的需要范围和他的货币额的大小。正如卖同时就是买,买同时也就是卖 $G—W$ 同时也就是 $W—G$,可是在这里主动属于金或买者。

我们回头来看 $W—G—W$ 这个流通的全程,可以看出,一个商品在这里通过了它的形态变化的整个系列。可是,当一个商品开始流通的前半段,完成第一形态变化的时候,第二种商品进入流通的后半段,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离开流通;反过来说,第一种商品进入流通的后半段,完成它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离开流通,是在第三种商品进入流通,通过它的旅程的前半段,完成第一形态变化的时候。因此,流通的全程 $W—G—W$,作为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全程,同时总是第二种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的结束和第三种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的开始,因而它是一个无始无终的系列。为了明白起见,我们把商品加以区别,给两极的 W 加上不同的记号,如 $W—G—W''$ 。实际上,第一环节 $W—G$ 是以另一个环节 $W—G$ 的结果 G 为前提,就是说,它本身不过是 $W—G—W'$ 的后一环节;而第二环节 $G—W''$ 的结果是 $W''—G$,所以这一环节本身是 $W''—G—W'''$ 的第一环节,以此类推。其次可以看出,后一环节 $G—W$ 中的 G 虽然不过是一次卖的结果,但这个环节却可以表现为 $(G—W) + (G—W'') + (G—W''') + \dots$,因而可以分裂为许多次买,也就是许多次卖,即许多次新的商品形态变化全程的第一环节。因此,如果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不仅表现为一个无始无终的形

态变化锁链的一个环节,而且表现为许多个这样的锁链的一个环节,那末,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由于每一个单个商品都要通过 $W-G-W$ 这个流通,就表现为在无数不同地点不断结束又不断重新开始的这种运动的无限错综的一团锁链。但是每一次单独的卖或买同时又作为互不相关的孤立行为而存在,它的补充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和它脱离,因此无需作为它的继续而直接同它衔接起来。由于每一特殊流通过程 $W-G$ 或 $G-W$,作为一种商品向使用价值的转化和另一种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作为流通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从两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休止点,而另一方面,由于一切商品都以它们共同的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即金的形式开始它们的第二形态变化而站到流通的后半段的起点上,所以在实际流通过程中,任意一个 $G-W$ 接在任意一个 $W-G$ 之后,一个商品的生命史的第二章接在另一个商品的生命史的第一章之后。例如,甲卖了铁,得2镑,因而完成了 $W-G$ 或商品铁的第一形态变化,可是他把买推迟到较远的时候。同时,乙在14天前卖了两夸特小麦,得6镑,现在用这6镑向“摩瑟父子公司”买衣裤,因而完成了 $G-W$ 或商品小麦的第二形态变化。 $G-W$ 和 $W-G$ 这两个行为在这里只是表现为一个锁链的两个环节,因为在 G 即金上,一种商品看起来和另一种商品是一样的,从金的身上再也看不出它是经过形态变化的铁,还是经过形态变化的小麦。这样一来,在实际流通过程中 $W-G-W$ 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全程的形形色色的环节的无限偶然的并行和连接。因而,实际的流通过程不是表现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全程,不是表现为商品通过对立阶段的运动,而只是表现为许多偶然并行发生或彼此连接的买卖的集合。这样,这个过程的形式规定性就消失了,并且由于每一次单

独的流通行为卖同时是它的对立面买,而买同时是它的对立面卖,这种形式规定性就更加消失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流通过程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运动,因此必然也会在自己的总运动中反映这个运动。关于流通过程如何反映这个运动,我们将在下一篇加以研究。这里只要指出,在 $W-G-W$ 中,两极的 W 同 G 不是处在同样的形态关系中。第一个 W 是作为特殊商品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而货币则是作为一般商品同作为个加商品的第二个 W 发生关系。因此 $W-G-W$ 可以抽象地从逻辑上归结为 $B-A-E$ (特殊——一般——个别)的推理式,其中特殊是第一极,一般是联结中项,个别是终极。

商品所有者只是以商品监护人的身分进入流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以买者和卖者的对立形式出现,一个是人格化的糖块,另一个是人格化的金。糖块一变成金,卖者也就变成买者。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这些身分是个性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

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Leçons sur l'industrie et les finances》. Paris, 1832 [“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1832年巴黎版]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靈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Crédit Mobilier》²⁴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

的必然表现。此外,资产阶级生产的对抗性质,在买者和卖者的对立上表现得还很肤浅很表面,这种对立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中也存在,因为它只要求人们彼此当作商品所有者来发生关系。

现在我们来考察W—G—W的结果,它归根到底是物质变换W—W。商品换商品,使用价值换使用价值,而商品的货币化或商品作为货币,只是用来作这种物质变换的媒介。因而,货币表现为只是商品的交换手段,但不是一般的交换手段,而是以流通过程为特征的交换手段,即流通手段。

由于商品的流通过程总是归结为W—W,因而好像仅仅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物物交换,或者,由于W—G—W不仅分裂为两个孤立的过程,而且同时也表现出两者在运动中的统一,于是就得出结论说,买和卖之间只有统一,没有分裂,——这种思想方法是要由逻辑学而不是由经济学来批判的。买和卖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破坏了社会物质变换的地方的、原始的、传统虔诚的、幼稚荒谬的界限,它同时又是社会物质变换中相互联系的要素彼此分裂和对立的一般形式,一句话,是商业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劳动所包含的一切对立的抽

消费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所以它们要彼此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由于必须进行交换,就必须决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因而价值和交换的观念是密切联系的,两者在实际形式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性……产品价值之所以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性。只是在有买卖的地方,就是说,在每一个人被迫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斗争的地方,人们才为价格和价值操心。”(贝列拉“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第2、3页及以下各页)

“货币只是手段和动力,而对生活有用的商品才是目标和目的。”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1697年版,载于欧仁·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210页。

象的一般的形式。因此,可以有货币流通,而不发生危机,但是没有货币流通,却不会发生危机。然而这只是说,在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劳动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货币的地方,这种劳动自然更不会引起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那些现象。因此,那种想用废除贵金属的“特权”、用所谓“合理的货币制度”来消除资产阶级生产的“弊害”的批判的深刻程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下面这段曾经被吹嘘为特别透彻的言论,足以作为经济学辩护论的标本。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说:

“一切商品从来不会缺少买者。任何人拿出一种商品来卖,总是希望把它换回另一种商品,因此,单单由于他是卖者这个事实,他就是买者了。因此,由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总起来看,一切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必然保持平衡。因此,如果一种商品的卖者多于买者,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必然多于卖者。”

穆勒建立平衡的办法是把流通过程变成直接的物物交换,又把从流通过程中搬来的人物买者和卖者偷偷地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去。用他的混乱的话来说,在一切商品都卖不出去的时候,像

1807年11月,在英国出版了威廉·斯宾斯的一本著作,书名叫《Britain independent of commerce》[“不依靠商业的不列颠”],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由威廉·科贝特在他的《Political register》[“政治纪事”]中用《Perish commerce》[“打倒商业”]这个更激烈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为了与此相抗衡,詹姆斯·穆勒在1808年发表了他的《Defence of commerce》²⁵,其中已经有我们在正文中从他的《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原理”]引用的那个论据了。让·巴·萨伊在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就商业危机进行论战时把这一套妙论攫为己有,由于不可能说出这位可笑的《prince de la science》[“科学王子”]用什么新的思想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所以他的大陆上的崇拜者把他吹嘘成找到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论这种宝藏的人,其实倒不如说,他的功绩在于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来曲解他的同时代人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和李嘉图。

伦敦和汉堡在 1857—1858 年商业危机的某些时候那样,其实是有一种商品即货币的买者多于卖者,而所有其他的货币即各种商品的卖者多于买者。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不过是说每次买就是卖,每次卖就是买,这对于那些不能卖出,因而也不能买进的商品监护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安慰。

由于卖和买的分裂,除了真正的贸易外,有可能在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之间的最后交换之前造成许多虚假的交易。这样一来,许多寄生者就有可能钻进生产过程并利用这种分裂来牟利。但这仍然只是说,有了作为资产阶级劳动的一般形式的货币,这种劳动的矛盾也就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b)货币的流通

实际的流通首先表现为许多偶然地并行发生的买和卖。不论

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商品的不同的形式规定:“有货币在手,要得到所要的东西,我们只须作一次交换;有其他剩余产品在手,我们就得作两次交换,其中第一次(换取货币)比第二次困难得多。”G. Opydke.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51, p. 287—288 [乔·奥普戴克“政治经济学专论”1851年纽约版第287—288页]。

“货币的较高的可售性,正是商品的较低的可售性的影响或自然结果。”(Th. Corbet.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modes of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etc》. London, 1841, p. 117 [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式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117页])“货币有一种属性,即总是可以同它所衡量的物品相交换。”(Bosanquet. 《Metallic, paper and credit currency etc》. London, 1842, p. 100 [博赞克特“硬币、纸币、信用货币”1842年伦敦版第100页])

“货币总是能购买其他商品,而其他商品并不总是能购买货币。”(Th. Tooke.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2 ed. London, 1844, p. 10 [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10页])

在买或卖中,商品和货币总是在同样的关系上彼此对立:卖者在商品一方,买者在货币一方。因此,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总是表现为购买手段,于是它在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对立阶段上的不同的规定,就变得无从分辨了。

在同一行为中,商品转到买者的手里,货币转到卖者的手里。商品和货币以相反的方向运动,商品走向一方而货币走向另一方,这种位置变换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表面上的无数地点同时进行的。但是,商品在流通中所走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它的最后一步。不论商品移动位置是由于金受了它的吸引($W-G$),还是它受了金的吸引($G-W$),只要它这样一移动,一交换位置,它就脱离流通而进入消费。流通是商品的不断运动,但总是新的商品的不断运动,每个商品只运动一次。每个商品在开始它的流通的后半段时,已不是原来的商品,而是另一种商品金。因此,经过形态变化的商品的运动,是金的运动。同一块货币或同一金块在 $W-G$ 的行为中曾经一度同一种商品变换位置,现在反过来又成了 $G-W$ 的起点,再次同另一种商品变换位置。过去它是从买者乙的手里转到卖者甲的手里,现在它是从变成买者的甲的手里转到丙的手里。因此,一个商品的形态运动,它向货币的转化和它从货币的逆转化,或者说,商品形态变化全程的运动,表现为同一块货币同两种不同商品两次变换位置的外部运动。不论买和卖如何分散地偶然地并行发生,在实际流通中,买者对面总是站着卖者,而移动到被卖商品的位置上去的货币,在它转到买者手里以前,一定已经一度同另

同一商品可以多次买了又卖。这时它不是作为简单商品流通,而是在这样一种规定中流通,这种规定从简单流通的观点、从商品和货币简单对立的观点来看,还不存在。

一商品变换过位置。另一方面,货币迟早会再从已经变成买者的卖者手里转到新的卖者手里,货币通过它的反复不断的位置变换,表现出各商品形态变化的连结。因此,同一些货币总是朝着和商品运动相反的方向从流通中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有的移动次数多些,有的移动次数少些,从而画出或长或短的流通曲线。同一块货币的这些不同的运动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相反地,大量的分散的买和卖,则表现为同时发生的、空间上并行的、单次的商品和货币的位置变换。

商品流通 $W—G—W$ 的简单形式是:货币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再从已经变成买者的卖者手里转到新的卖者手里。商品的形态变化即以此结束,货币的运动,就它是这个形态变化的表现而论,也随之结束。但是,由于新的使用价值必须不断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因而必须不断地重新投入流通,所以 $W—G—W$ 就由同一些商品所有者不断重复和更新。他们作为买者付出的货币,一到他们重新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时,又回到他们手里。因此,商品流通的不断更新就反映成:货币不仅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表面上不断地转手,而且同时画出许多不同的小循环,从无数不同地点出发,又回到这些地点,以便重新再作同样的运动。

商品的形式变换表现为货币的单纯的位置变换,只是货币一方才具有流通运动的连续性,这是因为商品总是按照同货币相反的方向只走一步,而货币总是代替商品去走第二步,在商品报了“一”的地方,货币报“二”。因此,看来好像整个运动都是从货币出发的,虽然卖时是商品吸引货币离开原位,从而使货币流通,就像买时是货币使商品流通一样。其次,因为货币总是在作为购买手段这样一种关系上与商品对立着,而作为购买手段,只有通

过实现商品价格才能使商品运动，所以，流通的整个运动总是表现为货币去同商品变换位置，不论是在同时并行发生的特殊流通过程中实现商品的价格，或者是连续地实现商品的价格，即由同一块货币依次地实现不同商品的价格。例如，我们就 $W-G-W-G-W'$ 来考察，如果不考虑在实际流通过程中变得无从辨认的质的要素，那末它不过是表示同一个单调的动作。G 在实现了 W 的价格之后，依次地实现 $W'-W''$ 等等的价格，而 $W-W'-W''$ 等商品，总是补上货币所让出的位置。因而，表面看来，是货币通过实现商品价格使商品流通。货币在执行实现价格的职能时本身不断流通，时而只变换一次位置，时而通过一条流通曲线，时而画出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的小圆圈。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有它自身的流通。因此，过程中的商品的形态运动表现为货币自身的、替本身不运动的商品的交换作媒介的运动。于是，商品流通过程的运动就表现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表现为货币流通。

商品所有者把自己的私人劳动产品表现为社会劳动产品，是通过把一种物即金转化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存在，因而转化为货币，而现在，他们自身借以完成其劳动的物质变换的全面运动，就作为一种物所特有的运动即金的流通而同他们对立。社会运动本身，对商品所有者来说，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只是形式上的媒介过程，使每一个人能够用他投入流通的使用价值从流通中取回价值量相等的另一些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离开流通时才开始发生作用，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使用价值则是货币的流通本身。商品在流通中的运动不过是瞬息间的要素，而在流通中不息奔走却成为货币的职能。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

这种特殊的职能,使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具有新的形式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现在我们要详细阐述的。

首先我们看到,货币的流通是一个无限分散的运动,因为它反映着流通过程无限地分散为买和卖,反映着商品形态变化中相互补充的阶段的任意脱离。在货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的小循环中,固然表现出回归运动,真正的循环运动。可是,有多少商品,便有多少出发点,单单由于出发点无限多这一点,这种循环就根本无法控制、衡量和计算了。从离开出发点到再回到出发点所经过的时间同样是无法确定的。这种循环在某一场合是否完成也是毫无关系的。一个人可以用一手付出一笔货币而没有用另一手把这笔货币收回,这个经济事实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了。货币从无限不同的点出发,回到无限不同的点,可是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合是偶然的,因为在 $W-G-W$ 运动中,买者反过来变为卖者,并不是必要的条件。货币流通更少可能表现为这样一个运动:从一个中心辐射到圆周上各点,再由圆周上各点回到这一中心。所谓货币的循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过是我们一切点上看到货币的出现和消失,看到它的不息的位置变换。在货币流通的较高的媒介形式中,例如在银行券的流通中,我们会看到货币发行的条件包含着它回笼的条件。相反地,在简单的货币流通中,同一买者再变为卖者是偶然的。真正的循环运动在简单的货币流通中经常出现,不过是更深刻的生产过程的反映。例如,工厂主在星期五从他的银行家那里取得货币,星期六付给他的工人,工人把其中大部分立刻付给店主等,后者在星期一又把它交回银行家。

我们已经知道,在空间上并行发生的各式各样的许多买和卖中,货币在同一时间内实现着一定量的价格,并且同商品只变换一

次位置。可是,另一方面,既然商品形态变化全程的运动和这些形态变化的连结表现为货币的运动,同一块货币就实现着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格,因而进行了若干次流通。因此,我们拿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日内)的流通过程来看,实现价格所需要的金量,因而也就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量,便决定于两个要素:一方面是这种价格的总额,另一方面是同一块金币的平均流通次数。这个流通次数或货币流通速度,又决定于或只是表现出商品通过其形态变化的不同阶段的平均速度,这些形态变化锁链般发生的平均速度,经过形态变化的商品在流通中由新商品代替的平均速度。因此,如果说,在确定价格时,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观念上转化为具有同一价值量的金量,在两个孤立的流通行为 $G-W$ 和 $W-G$ 中,同一价值量双重地存在,一方面在商品上,另一方面在金上,那末,金作为流通手段的存在不是决定于它同个别静止商品的孤立的关系,而是决定于它在过程中的商品世界里的动的存在;决定于它用自己的位置变换来表现商品形态变化的职能,也就是决定于它用自己的位置变换速度来表现商品形态变化速度的职能。因此,它在流通过程中的实际的存在,即流通中的实际的金量,就决定于它在整个过程本身中的职能存在。

货币流通的前提是商品流通,就是说,货币使具有价格的商品即已经在观念上等于一定金量的商品流通。在确定商品本身的价格的时候,用作计量单位的金量的价值量,或者说金的价值,是假设为既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流通所需要的金量就首先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的总额。而这个总额本身又决定于:(1) 价格水平,即用金来计算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相对的高低,(2) 按一定价格流通的商品的数量,也就是按既定价格进行的买卖的数

量。假定一夸特小麦值 60 先令,那末同它只值 30 先令相比,要使它流通或实现它的价格,就要有多一倍的金。假定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是 60 先令,那末要使 500 夸特流通,就比使 250 夸特流通,要有多一倍的金。最后,要使每夸特值 100 先令的 10 夸特小麦流通,同使每夸特值 50 先令的 40 夸特小麦流通相比,只要有一半的金就行了。由此可见,如果流通的商品数量的减少在比例上大于价格总额的增加,那末即使价格上涨,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量仍会减少;反之,如果流通的商品数量减少,而其价格总额以更大的比例增加,那末流通手段量也会增加。例如,英国人曾以出色而细致的研究证明,在英国谷物涨价的初期,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了,这是因为减少了的谷物量的价格总额高于以前较大的谷物量的价格总额,同时其他商品量的流通在若干时间没有受到影响,还保持着原来的价格。在谷物涨价的后期,流通中的货币量却相反地减少了,这或者是因为除了谷物以外,其他商品按原有价格出卖而数量减少了,或者是因为这些商品出卖的数量同样多而价格降低了。

可是,我们知道,流通的货币量不仅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流通的速度,或者说,决定于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这种实现业务的速度。同一个索维林在同一天内完成了 10 次买,每次买的商品的价格是一个索维林,它一共转手 10

货币量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足以维持同商品相应的价格”。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第 209 页。“如果 4 亿镑商品的流通需要 4 000 万镑金,而这¹/₁₀的比例是适当的水平,那末,当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由于自然原因增加到 4 5000 万镑时,为了维持原有水平,金的数量就必须增加到 4 500 万镑。”W. Blake.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produced by the expenditure of government etc.》London, 1823, p. 80 [威·布莱克“论政府支出的影响”1823 年伦敦版第 80 页]。

次,它所完成的业务正好是一天内每一个只流通一次的10个索维林所完成的业务。因此,金的流通速度可以代替金的数量,或者说,金在流通过程中的存在不仅决定于它在商品旁边作为等价物的存在,而且也决定于它在商品形态变化运动中的存在。可是,货币流通的速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货币的数量,因为无限分散的买和卖,在每个一定的时刻是在空间上并行发生的。

如果流通的商品价格总额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在比例上小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那末,流通手段量会减少。相反,如果流通速度的降低,在比例上大于流通的商品量的价格总额的减少,那末,流通手段量会增加。流通手段量随着价格普遍降低而增加,或流通手段量随着价格普遍上涨而减少,是商品价格史上充分证实了的现象之一。但是,引起价格水平提高同时引起货币流通速度更加提高的原因,以及引起相反的运动的原因,不是属于简单流通的研究范围。可以举一个例子说说,当信用活跃的时期,货币流通的速度比商品价格增加得快,而在信用紧缩的时期,商品价格比流通速度降低得慢。简单货币流通是表面的和形式的,这种性质正是表现在:决定流通手段量的一切要素,如流通的商品量、价格、价格的涨落、同时进行的买和卖的次数、货币流通速度,都依赖于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的过程,而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人口数、城乡关系、运输工具的发展,依赖于分工的粗细、信用等等,——简言之,依赖于一切处于简单货币流通之外而只反映在简单货币流通中的情况。

因此,如果流通速度已定,流通手段量就只是决定于商品的价

“影响货币量多少的,是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不是金属的量。”(加利阿尼“货币论”第99页)

格。因此,价格的高或低,不是因为有多或少的货币在流通,相反,有多或少的货币在流通,倒是因为价格高或低。这是最重要的经济规律之一,根据商品价格史对这个规律作详细的证明,也许是李嘉图以后的英国经济学的唯一贡献。经验表明,在某一个国家内,金属流通的水平或流通的金银量虽然有过暂时的、有时甚至是极其猛烈的退潮和涨潮,但是总的说来,在较长时期内是不变的,同平均水平的偏离只是微弱的波动,这只是因为决定流通过货币量的种种因素具有对立的性质。这些因素的同时变动,使它们的作用互相抵销,使一切照旧。

已知货币流通速度,已知商品价格总额,流通手段量就已决定,这一规律也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已知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金量就决定于金本身的价值。因此,如果金的价值,即生产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增加或减少,那末,商品价格将以反比例上涨或下跌,而同价格的这种普遍的上涨或下跌相适应,在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要使同一商品量流通,就需要一个较大或较小的金量。同样,在原来的价值尺度被价值较高或较低的金排挤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变动。例如,荷兰由于体贴国债持有人,由于担心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新金矿的发现后果,

例如,在1858年,英国的金属流通量异乎寻常地降到它的平均水平以下,这可以从伦敦“经济学家”杂志²⁶中引来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到:“按照现象的本质,即简单流通的分散性,不可能获得关于在市场上和非银行阶级手中流通的现金数量的十分精确的材料。但是,大商业国家的造币局的活跃与否,或许是现金数量变动的最确切的指标之一。需要多就铸得多,需要少就铸得少……英国造币局1855年共铸造9245 000镑,1856年共铸造6 476 000镑,1857年共铸造5 293 858镑。在1858年造币局几乎是无事可做。”“经济学家”杂志1858年7月10日。同时,银行库存大约有1 800万镑。

用银币代替了金币,于是使同一商品量流通所需的银量就得等于过去的金量的十四五倍。

既然流通的金量以变动的商品价格总额和变动的流通速度为转移,金属的流通手段量就必须有紧缩和扩张的能力,简言之,金必须适应流通过程的需要,时而作为流通手段进入这个过程,时而再退出这个过程。流通过程本身如何实现这些条件,我们到后面再谈。

(c)铸币。价值符号

金在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上取得了一种特有的 Façon〔形状〕,它变成铸币。为了使它的流通不因技术困难而受到阻碍,它是按照计算货币的标准来铸造的。铸币是这样的金块,它以一定的花纹和形状表示它含有镑、先令等货币计算名称所指的金的重量。正如造币局价格由国家规定一样,铸造的技术事务也由国家担任。作为铸币的货币,同作为计算货币的货币一样,有地方性和政治性,讲不同的国家语言,穿不同的民族服装。因此,作为铸币的货币的流通领域是不同于商品世界的普遍流通的、限于国界内部的商品流通。

可是,金块和金铸币的差别,并不比金的铸币名称和它的重量名称的差别更大。在后者表现为名称差别的,现在只表现为形状差别。金铸币可以投进熔炉,再 sans phrase〔直截了当地〕变成金,反过来,金块只要送到造币局去,就能取得铸币形式。从一种形状转到另一种形状,又从另一种形状回到原来的形状,看来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事务。

把金衡 100 磅或 1 200 盎斯的 22 开金拿到英国造币局去,可

以换得 $4\ 672\frac{1}{2}$ 镑或金索维林,把这些金索维林放在天平的一端,把 100 磅金条放在另一端,它们的重量相等,这证明索维林不过是在英国造币局价格中用这个名称来表示的具有特定的形状和印记的金的一定重量。这 $4\ 672\frac{1}{2}$ 金索维林从许多不同地点投入流通,被流通吸收后一天完成一定的流通次数,有的完成的次数多些,有的完成的次数少些。如果每一盎斯一天平均流通 10 次,那末 1 200 盎斯金将实现 12 000 盎斯或 46 725 索维林的商品价格总额。不论你把 1 盎斯金怎样颠来倒去,它决不会重 10 盎斯。可是在这里,在流通过程中,1 盎斯事实上重 10 盎斯。铸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存在,等于它所含的金量乘它的流通次数。因此,铸币除了它作为具有一定重量的单个金块的实际存在外,还取得了一种从它的职能产生的观念存在。可是,索维林不论流通 1 次或 10 次,在每一次单独的买或卖中,总只是当作 1 个索维林发生作用。好比在 1 个作战日,1 个将军及时出现在 10 个不同的地点而代替了 10 个将军,可是在每个地点上还只是这同一个将军。在货币流通中由于速度代替数量而引起的流通手段的观念化,只涉及铸币在流通过程中的职能存在,而不包括单个铸币的存在。

然而,货币流通是外部的运动,索维林虽然 non olet(没有臭味),却在复杂的社会中周旋。铸币由于同各种各样的手、荷包、衣袋、裤、腰包、匣子、箱子、柜子等摩擦而磨损了,这里掉一个金原子,那里掉一个金原子。它在尘世奔波中磨来磨去,日益失去自己的含量。它因使用而损耗。让我们来看一个其本来面目看来只是略受损害的索维林吧。

“面包师今天刚从银行领到一个崭新的索维林,明天便把它付给磨坊主,他支付的索维林,已经不是那个本来的(veritable)索维林,它已经比领取它

的时候轻了一些。”

“显然,单单由于日常的不可避免的摩擦的作用,铸币也就必然一个一个地不断贬值。要在任何时间内,哪怕是在一天内,把轻量铸币完全排斥于流通之外,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杰科布估计过,1809年欧洲有38000万镑,到1829年,即过了20年,有1900万镑因磨损而完全消失了。因此,如果商品在跨进流通的第一步上就脱离流通,那末铸币在流通中走过几步之后所代表的金属含量却比它实有的还大。在流通速度不变时,铸币流通得越久,或者在同一时间内它流通得越活跃,它作为铸币的存在就越是同它的金银的存在脱节。余下的是 *magni nominis umbra* [一个伟大名字的影子]。铸币的肉体只是一个影子。它原来因流通过程而加重,现在却因流通过程而减轻,但是在每一次单独的买或卖中仍旧当作原来的金量。索维林成了虚幻的索维林,成了虚幻的金,但是仍然执行着法定金币的职能。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为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纯粹虚幻的存在。由流通过程本身所引起的金属货

Dodd.《Curiosities of industry etc》London,1854 [多德“工业奇迹”1854年伦敦版第16页]。

《The currency question reviewed etc. by a banker》Edinburgh,1845,p.69 etc [“一个银行家评通货问题”1845年爱丁堡版第69页等等]。“如果一个稍受磨损的埃巨的价值比一个全新的埃巨的价值少些,那末流通就会不断遇到障碍,而且没有一次支付不会引起争论。”(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的货币史”第1卷第24页)

W. Jacob.《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London,1831,Vol. II, ch. XXVI, p. 322 [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26章第322页]。

引自古罗马作家卡努斯的历史叙事诗“发萨罗战役”。——译者注

币的第二次观念化,或者说它们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的分离,一方面被政府、另一方面被私人冒险家利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铸币伪造活动。从中世纪初至十八世纪末的整个货币铸造史,就是这两方面的、互相对抗的伪造铸币的历史。库斯托第所编的多卷本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文集大部分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可是,金在它的职能范围内的虚幻存在,同金的实际存在发生冲突。在流通中,一个金铸币丧失的金属含量较多,而另一个丧失的较少,于是一个索维林的价值实际上比另一个更大。但是,因为它们在作为铸币的职能存在上是等值的,实际重 $\frac{1}{4}$ 盎斯的索维林并不比表面重 $\frac{1}{4}$ 盎斯的索维林有更大的价值,所以分量十足的索维林一部分就会在不老实的所有者手中受到外科手术,流通本身曾经在它们分量轻的兄弟身上自然地做过的事就会人为地加在它们身上。它们被刮削,它们的多余的金脂进入熔炉。如果 $4\ 672\frac{1}{2}$ 金索维林放在天平上,平均重量不是1 200盎斯,而只是800盎斯,那末它们在金市上就只能买到800盎斯的金,换句话说,金的市场价格就升到它的造币局价格以上。每个货币,尽管分量十足,但它在铸币形式上的价值会比它在铸块形式上的价值少。分量十足的索维林会反过来变成它的铸块形式,因为在这种形式上,较多的金比较少的金有较多的价值。一旦相当多的索维林减少了金属含量,以致金的市场价格经常高于它的造币局价格,那末铸币的计算名称虽然不变,但是它今后只会表示一个较小的金量。换句话说,货币的标准会改变,金今后会按照这个新标准来铸造。金作为流通手段而发生的观念化,会反过来改变金曾借以成为价格标准的法定比例。这样的革命过了一定的时间会重新发生,所以金无论在它作为价格标准的职能上或作为流通手段都会发生不断的变

动,而一种形式的变动会引起另一种形式的变动,反过来也是一样。这就说明了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现象:在所有现代民族的历史上,金属含量本身虽不断减轻,但仍采用同一个货币名称。作为铸币的金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之间的矛盾同样也变成作为铸币的金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之间的矛盾,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就不仅在国界以内而且在世界市场上流通。作为价值尺度,金总是分量十足的,因为它只是当作观念的金来用的。金在孤立的W—G行为中充当等价物时,从它运动的存在立即回到它静止的存在,但是在它充当铸币时,它的自然实体就不断同它的职能发生冲突。要完全避免金索维林变成虚幻的金,是不可能的,但是立法想在它的实体减轻到一定程度时把它收回,不准它再当铸币通用。例如,按照英国的法律,1个索维林失去的重量超过0.747克冷,它就不再是合法的索维林。英格兰银行从1844年到1848年间称过4800万个金索维林,用的是柯顿氏金秤这种机器,它不仅辨别得出两个索维林之间 $\frac{1}{100}$ 克冷的差别,而且像一个有理智的生物那样,把分量不足的索维林立刻推上一块滑板,使它滑进另一架机器,这架机器就以东方式的残酷无情把它锯碎。

在这种情况下,不把金铸币的流通限制在它磨损得较慢的一定流通范围内,它就根本无法流通。如果一个金铸币在流通中当作 $\frac{1}{4}$ 盎斯,而只重 $\frac{1}{5}$ 盎斯,那末它的 $\frac{1}{20}$ 盎斯金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符号或象征。这样,由于流通过程本身,所有的金铸币或多或少地变成了自己的实体的单纯符号或象征。但是任何一种东西不能是它自身的象征。画的葡萄不是真葡萄的象征,而是假葡萄。分量轻的索维林更不能是分量十足的索维林的象征,正如瘦马不能是肥马的象征一样。由于金变成了它自己的象征,又不能当作自己

的象征来用,所以它在自己磨损得最快的流通范围内,即在买和卖以最小规模不断重新进行的范围内,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存在脱离的象征性的存在即银存在或铜存在。在全部金货币中总有一部分(虽然不是同一些金块)在这个范围内当作铸币来流通。这一部分金就被银记号或铜记号所代替了。因此,如果说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因而作为货币在一国之内发生作用的只有一种特殊商品,那末,当作铸币来用的除金外可以有几种商品。这些辅助的流通手段,如银记号或铜记号,在流通中代表金铸币的一定部分。因此,它们自己的含银量或含铜量不是由银对金或铜对金之间的价值比例决定的,而是由法律任意确定的。它们的发行量只应该限于它们所代表的金铸币的细小部分为兑换较大金铸币或实现相应的小额商品价格所需要的经常流通的量。在零售商品流通中,银记号和铜记号又分别属于特定的范围。就事物的本质来说,它们的流通速度同它们在每一次单独的买和卖中所实现的价格成反比,或者说,同它们所代表的金铸币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我们可以想一想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日常的小额交易量是如此庞大,而流通的辅币总量却占着相对不大的比例,这就表示它们的流通的迅速和频繁的程度。例如,我们从不久以前发表的一篇议会报告中看到,1857年英国造币局铸造的金是4 859 000镑,铸造的银名义价值是373 000镑,而金属价值是363 000镑。截至1857年12月31日为止的10年间,铸造的金总共是55 239 000镑,铸造的银总共有2 434 000镑。1857年铸造的铜币的名义价值总共只有6 720镑,其中3136镑是辨士,2464镑是半辨士,1 120镑是法寻,而铜的价值有3 492镑。最近10年间铸造的铜币总额的名义价值是141 477镑,金属价值是73 503镑。金铸币由于按法律规定损失金属含量到一定程

度就失去铸币资格,不能永远执行铸币的职能,同样,银记号和铜记号则由于按法律实现的价格限额是一定的,不能从自己的流通领域走进金铸币的流通领域而固定为货币。例如,在英国用铜支付以6辨士为限,用银支付以40先令为限。如果银记号和铜记号的发行量大于它的流通领域所需要的量,商品价格不会因此提高,但是这些记号会在零售商那里累积起来,最后不得被他们当作金属卖掉。例如,在1798年,英国的小贩手里积累的由私人发行的铜币额达到20、30、50镑,他们无法再把它们投入流通,最后不得不把它们当作商品投入铜市场。

在国内流通的一定领域内代表金铸币的银记号和铜记号,有一个法定的含银量和含铜量,但被流通吸收后,就同金铸币一样受到磨损,并且随着它们的流通的迅速和频繁程度而观念化,更快地变成单纯的影子。如果再规定银记号和铜记号损失多少金属就失去铸币资格的界限,那末它们在自己的流通领域的一定范围内,又要被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如铁和铅来代替,而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表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在一切流通发达的国家中,由于货币流通本身的必要性,不得不使银记号和铜记号不论损失多少金属仍具有铸币资格。这就表明,从事情的本质来说,它们成为金铸币的象征,不是因为它们是银制的或铜制的象征,不是因为它们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没有价值。

因而,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纸,可以作为金货币的象征发生作用。用银铜等金属记号作的辅币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在大

David Buchanan 《Observations on the subjects treated of in Doctor Smith's Inquiry 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etc》Edinburgh, 1814, p. 31 [大卫·布坎南“论斯密博士的‘国富论’的内容”1814年爱丁堡版第31页]。

多数国家,价值较低的金属过去是作为货币流通的,例如银在英国,铜在古罗马共和国、瑞典和苏格兰等地,直到流通过程把它们降为辅币和贵金属代替它们为止。此外,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货币象征,最初本身又是金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那部分必须经常当作零钱而流通的金被金属记号代替一样,那部分经常当作铸币被国内流通领域吸收的因而必须不断流通的金,也可以被无价值的记号所代替。流通中铸币量的最低水平,在每个国家是根据经验规定的。可见,金属铸币的名义含量和金属含量之间最初并不显著的差别可以发展到绝对的分裂。货币的铸币名称离开了货币的实体,而存在于实体之外,存在于没有价值的纸片上。正如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商品的交换过程结晶为金货币一样,金货币在流通中升华为它自身的象征,最初采取磨损的金铸币的形式,而后采取金属辅币的形式,最后采取无价值的记号、纸片、单纯的价值符号的形式。

可是,金铸币所以最初产生金属代用品,后来又产生纸代用品,只是因为它尽管损失金属,但仍然执行铸币的职能。它不是由于磨损才流通,而是由于不断流通才磨损成一个象征。只有在流通过程中金货币本身变成了它自己价值的单纯的符号,单纯的价值符号才能够代替它。

只要 $W-G-W$ 这个运动是直接互相转化的两个因素即 $W-G$ 和 $G-W$ 的过程中的统一,或者只要商品是在经历着它的形态变化的全程,商品把自己的交换价值发展成价格和货币,是为了立即再放弃这个形态而再变成商品,或者不如说再变成使用价值。因此,商品达到的是它的交换价值的仅仅在表面上的独立化。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只要金仅仅作为铸币发生作用或经常处在流

通中,金实际上只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连结,是商品的仅仅瞬息间的货币存在;金实现一种商品的价格,只是为了去实现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无论在哪里,它都不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静止的存在,或本身静止的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和金在它的流通中所表现的现实性,仅仅是闪电一样的现实性。金虽然是实在的金,但只执行虚幻的金的职能,因而在这个职能上可以由它自己的符号来代替。

执行铸币职能的价值符号,如纸片,是用金的铸币名称表示的金量的符号,因此是金的符号。一定量的金本身并不表示一种价值比例,代替它的符号也是如此。只就一定量的金作为物化劳动时间具有一定的价值量而言,金的符号代表价值。可是,它代表的价值量,每一次都决定于它代表的金量的价值。价值符号在商品面前代表商品价格的现实性,它是 *signum pretii* (价格的符号),而只因为商品的价值已经表示在商品的价格上,它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在 $W-G-W$ 过程中,只要这个过程表现为只是两个形态变化的过程中的统一或直接的相互转化,——这个过程在价值符号发生作用的流通领域内就是这样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上得到的只是观念的存在,在货币上得到的只是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存在。这样,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想像的或用物代表的东西,它除了在商品本身中物化着一定量劳动时间以外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因此,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金不是像彼得·施莱米尔那样出卖自己的影子²⁷,而是用自己的

影子购买。因此,价值符号起的作用,只是在过程内部对另一个商品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对每个商品所有者代表金。某种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一块皮、一片纸等等,最初按照习惯变成货币材料的符号,可是,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的效力的时候,它才肯定为货币材料的符号。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的唯一形式。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象征性的纸币实际上同金属辅币毫无区别,只是流通范围较广。价格标准或造币局价格的纯技术性的发展以及后来把金块铸成金币的成型工作,已经引起国家的干预,并因此使国内流通和普遍商品流通显然分离,而铸币发展成价值符号,就使这种分离最终完成。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只有在国内流通的领域内才能独立存在。

我们的叙述已经证明,金的铸币存在,作为与金的实体本身脱离的价值符号,是从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而不是从协议或国家干预中产生的。俄国提供了价值符号自然产生的鲜明实例。当兽皮和皮货在俄国用作货币的时候,这些不经久不方便的物质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之间发生了矛盾,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用打上印记的小块熟皮代替这种物质的习惯,小块熟皮变成了可以兑换兽皮和皮货的凭证。后来它们称作戈比,变成银卢布等分的单纯符号,在某些地方一直用到1700年彼得大帝命令把它们换成国家发行的小铜币为止。古代的著作家虽然只能看到金属流通的现象,

Henry Storch. «Cours d' économie politique etc .avec des notes par J. B. Say». Paris, 1823, t. IV, p. 79 [亨利希·施托尔希“政治经

但已经把金铸币理解为象征或价值符号。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 就是这样。在信用完全没有发展的国家 ,如中国 ,早就有了强

济学教程。附让·巴·萨伊注释”1823年巴黎版第4卷第79页]。施托尔希在彼得堡用法文发表了他的著作。让·巴·萨伊立即在巴黎翻印,并补充了一些所谓“注释”,实际上这些注释不过是陈词滥调。施托尔希对于这位“科学王子”所加的附录丝毫不表示欢迎。(见他的《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 Paris, 1824 [“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

Plato .De Rep ., L . II :《νόμισμα ἐστὶν ὁμοίον τῷ ἀλλοτρίῳ 》, Opera omnia , etc ., ed . G . Stallbaumius , London , 1850 , p . 304 [柏拉图“理想国”第2篇“铸币是交换的象征”。格·施塔耳鲍姆出版的“文集及其他”1850年伦敦版第304页]。柏拉图只在当作价值尺度和当作价值符号的两种规定上发展了货币的概念;但是除了那种用于国内流通的价值符号以外,他还要求有另外一种用于希腊同外国的交易的价值符号。(参看柏拉图“论法律”第5卷)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编第8章:“货币根据协议成为交换相互需要的唯一的交换手段。它所以称为 νόμισμα ,因为它不是天然地,而是通过法律(νόμος)存在的,我们有权改换它,废除它。”亚里士多德对于货币的认识,比柏拉图全面和深刻得多。他在下面一段话中很好地阐明了,由于不同公社之间的物物交换,如何产生了一种必然性,使一种特殊商品,即一种本身贵重的实体具有货币的性质。“在不足物品的输入和剩余物品的输出这种互相帮助在较远的距离之间进行时,就必然采用货币……于是大家同意在相互交换中只收付本身贵重而又便于使用的物品……如铁、银之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篇第9章。迈克尔·舍伐利埃引用了这段话,他或者是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或者是没有读通,所以才会引用这段话来证明,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流通手段必然由一种本身贵重的实体构成。相反地,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确,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货币似乎只是习惯的或法定的存在,这从它的名称 νόμισμα)上已经表示出来,而且从下面这一点上也表示出来,即实际上货币作为铸币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的职能本身得来的,而不是从它本身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得来的。“货币似乎是一种虚空的东西,不是天然的,而是法定的,因此,它处于流通之外就毫无价值,对任何需要都没有用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页])

制通用的纸币。早期的纸币拥护者也曾明白地指出,金属铸币是在流通过程本身中转化为价值符号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贝克莱主教就是这样。

可以把多少令纸切成纸票当作货币来流通呢?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价值的记号,只有在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代表金的限度内,才成为价值符号,它们又只有在金本身原来就会作为铸币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度内,才代表金,这个量,在商品交换价值和商品形态变化速度既定的时候,是由金本身的价值决定的。名义为5镑的纸票只能以等于名义为1镑的纸票的 $\frac{1}{5}$ 的数量来流通,而一切用先令票来支付,流通的先令票就等于镑票的20倍。如果用各种不同名义的纸票,例如五镑票、一镑票、十先令票等来代表金

Mandeville, Sir John. 《Voyages and Travels》 London, ed. 1705, p. 105 [约翰·孟德维尔爵士“航海与旅行”1705年伦敦版第105页]:“这个皇帝(中国皇帝)可以无限制地尽情挥霍。因为除了烙印的皮或纸以外,他不支出也不制造任何其他货币。当这些货币流通太久,开始破烂时,人们把它们交给御库,以旧币换新币。这些货币通行全国和各省……他们既不用金也不用银来制造货币”,孟德维尔认为,“因此他可以不断地无限制地支出”。

* 5/9 [Benjamin Franklin 《Remarks and facts relative to the American paper money》. 1764, p. 348] c [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美国纸币的评论和事实”1764年版,“富兰克林文集”第348页]:“目前,连英国的银币,就它价值的一部分来说,都不得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这一部分就是它的实际重量和它的名义价值之间的差额。现在流通的先令和6辨士银币,大部分由于磨损而减轻5%、10%或20%,有些6辨士银币甚至减轻50%。在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之间的这个差额上,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连一张纸的价值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值3辨士的银币所以能当作6辨士流通,仅仅因为这是法定的支付手段,谁都知道不难把它按同样的价值交付出去。”

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第3页:“当铸币的金属已经消蚀而它的名称仍被保持的时候,商业流通难道就不能继续了吗?”

铸币,那末这各种不同的价值符号的量,不仅决定于总流通所必需的金量,而且决定于每种纸票的流通范围所必需的金量。如果1400万镑(这是英国银行立法承认的数额,但不是指铸币,而是指信用货币)是某国流通的最低水平,那末可以有1400万张每张一镑的价值符号流通。如果由于生产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金的价值有了增减,那末当同一商品总量的交换价值不变时,流通的镑票就会与金的价值变动成反比地增减。如果作为价值尺度的金被银代替,银同金的价值比例为1:15,而每一张纸票以后代表的银量同它以前代表的金量相等,那末以后流通的镑票将不是1400万张,而是21000万张。因此,纸票的量决定于它们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货币的量,而因为它们只有代表金货币才成为价值符号,所以它们的价值只是决定于它们的量。可见,流通的金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相反,流通的纸票的价值则完全决定于它自身的量。

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我们这里讲的只是这种纸币)这种干预,似乎废除了经济规律。过去国家规定造币局价格只是给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而制造铸币只是把自己的印记加在金上,现在国家似乎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纸成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如一镑、五镑、二十镑。纸票一进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抛出来,因为不仅国境界碑阻止它们流出,而且它们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一切价值,不论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它们离开自己的职能存在,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

支配。

如果 1 400 万镑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的数额,而国家把 21 000 万张名义为一镑的纸票投入流通,那末这 21 000 万张纸票就变为 1 400 万镑金的代表。这就好比国家用镑票来代表其价值只等于金的 $\frac{1}{15}$ 的另一种金属,或者用镑票来代表其重量只等于从前 $\frac{1}{15}$ 的金。除了价格标准的名称改变外,什么也没有改变,而这种名称自然是约定俗成的,无论它直接地由于铸币含金量改变而产生,或间接地由于按照新的、较低的价格标准所需要的量增发纸票而产生。既然现在“镑”的名称是指只相当于以前 $\frac{1}{15}$ 的金量,一切商品价格就会增加到以前的 15 倍,于是 21 000 万张镑票事实上就会同以前的 1 400 万张一样,全部是必需的。随着价格符号的总数的增加,每一符号所代表的金量就按同一比例减少。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

在英法两国政府货币伪造的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价格不是按照银铸币成色减低的比例而上涨。这只是因为铸币增加的比例同铸币成色减低的比例不相当,也就是因为金属成色较低的铸币的发行量还不足以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后用这种成色较低的金属当作价值尺度来计算,并且用同这种较低的计量单位相适应的铸币来实现。这一点解决了洛克和朗兹的争论中没有解决的困难。价值符号——不论是纸或降低了成色的金银——按什么比例代表按造币局价格计算的金银重量,不是决定于这些符号本身的物质,而是决定于它们在流通中的数量。这个比例所以难于理解,是因为货币在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手段这两种职能上受到不仅是相反的、而且似乎是同这两种职能的对立相矛盾的规律所支配。在货币

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上,货币只是用作计算货币,而金只是用作观念的金,对于这种职能来说,一切看货币的自然物质而定。交换价值用银计算或表现为银价格,自然完全不同于用金计算或表现为金价格。相反,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上,货币不仅是想像的,而且必须作为实在的东西同其他商品并列,对于这种职能来说,货币材料变得毫无关系,而一切决定于它的数量。对于计量单位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它究竟是1磅金、1磅银、还是1磅铜;而使铸币成为每个这种计量单位的适当体现者的,只是铸币的数量,不论它自己的材料究竟是什么。但是,就只是想像的货币而论,一切决定于它的物质实体,就感觉上存在的铸币而论,一切决定于观念上的数的比例,这一点是同人类的常识相矛盾的。

由此可见,商品价格随着纸票数量的增减而涨跌(这种现象发生在纸票成为唯一流通手段的地方),不过是由流通过程强制实现一个受到外力机械地破坏的规律,即流通中金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流通中价值符号量决定于它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铸币量。因此,另一方面,不论多少纸币都可以被流通过程所吸收,仿佛被消化掉,因为,价值符号不论带着什么金招牌进入流通,在流通中总是被压缩为能够代替它来流通的那个金量的符号。

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流通的金量随着商品价格涨跌而增减,而商品价格却似乎是随着流通中纸票数量的变动而涨跌。商品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金铸币,因而流通的货币量交替地紧缩和扩张是必然规律,而纸票却似乎不论增加多少都可

以进入流通。国家发行的铸币哪怕只少于名义含量 1% 克冷, 就是减低金银铸币的成色, 因而破坏它们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 而国家发行只具有铸币名称而不包含任何金属的无价值的纸票, 却是执行了完全正确的措施。金铸币显然只有在商品价值本身用金计算或表现为价格的时候才代表商品价值, 而价值符号却似乎直接代表商品价值。由此可知, 那些片面地根据强制通用的纸币流通来研究货币流通现象的观察家为什么必定对货币流通的一切内在规律发生误解。实际上, 这些规律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不仅颠倒了, 并且消失了, 因为, 当纸币发行数量适当时, 纸币完成的并不是它作为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 而它特有的运动不是从商品形态变化直接产生的, 而是由于它同金的比例遭到破坏产生的。

3 货 币

不同于铸币的货币 $W-G-W$ 这种形式的流通过程的结果, 成为 $G-W-G$ (即货币换商品是为了再把商品换成货币) 这种形式的流通过程的起点。在 $W-G-W$ 形式中, 商品是运动的起点和终点, 在 $G-W-G$ 形式中, 货币是运动的起点和终点。在前一形式中, 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 在后一形式中, 商品充当货币变成货币的媒介。货币在前一形式中表现为单纯的流通手段, 在后一形式中表现为流通的最终目的; 商品在前一形式中表现为最终目的, 在后一形式中表现为单纯的手段。因为货币本身已经是 $W-G-W$ 这种流通的结果, 所以在 $G-W-G$ 的形式中, 流通的结果同时表现为流通的起点。在 $W-G-W$ 中, 物质变换是过程的实际内容, 从这第一过程产生的商品的形式存在本身却是第二

过程 $G—W—G$ 的实际内容。

在 $W—G—W$ 形式中,两极是具有同一价值量的商品,但同时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它们的交换 $W—W$ 是真正的物质变换。在 $G—W—G$ 形式中则相反,两极是金,同时是具有同一价值量的金。金换商品是为了再把商品换成金,或者我们就 $G—G$ 这个结果来看,以金换金,似乎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把 $G—W—G$ 译成“为卖而买”这个公式,这不过是说金通过一个中介运动来换金,那我们立即就会认识到,这是资产阶级生产的主导形式。可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是为卖而买,而是为贵卖而贱买。货币换商品,是为了用这同一商品再去换数量更多的货币,因此两极 G 和 G ,虽然质上并无差异,但是量上是不同的。这种量的差别以非等价物的交换为前提,而这里的商品和货币只是商品本身的对立形式,因而只是同一价值量的不同的存在方式。所以, $G—W—G$ 的循环,在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后面掩藏着进一步发展了的生产关系,在简单流通范围内,它不过是一种更高级的运动的反映。因此,我们必须从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 $W—G—W$ 中引出不同于流通手段的货币。

金,即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不要社会的进一步协助,就变成货币。在英国,银既不是价值尺度,又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流通手段,它不成为货币,正如在荷兰,金一失去价值尺度的王位,就不再是货币一样。因此,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可是,作为这样的统一,金又有了一个独立的、同它在两个职能上的存在不同的存在。作为价值尺度,金只是观念上的货币和观念上的金;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金只是象征性的货币和象征性的金;但在它的简单的金属实体形式上,金是货币,或者说,货币是

实在的金。

现在我们对于作为货币的、在静止状态中的商品金从它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上来略加考察。一切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代表一定数额的金，因而它们只是想像的金或想像的货币，只是金的代表，正如反过来货币在价值符号上只是商品价格的代表一样。既然一切商品都只是想像的货币，货币就成了唯一实在的商品。商品只是代表着交换价值、一般社会劳动、抽象财富的独立存在，而金与商品相反，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从使用价值方面看，每种商品通过它们同一种特殊需要的关系，仅仅表现出物质财富的一个要素，财富的个别方面。但是货币能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直接转化成任何需要的对象。它所特有的使用价值，在成为它的等价物的种种使用价值的无限系列上实现。在它的坚固的金属实体中，它隐秘地包含着在商品世界中展开的一切物质财富。因此，如果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代表着一般等价物或抽象财富——金，那末金在它的使用价值上代表着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金因此是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它是《*précis de toutes les choses*》〔“万物的结晶”〕（布阿吉尔贝尔），是社会财富的集成。就形式上说，它是一般劳动的直接化身，就内容上说，它又是一切实在劳动的总汇。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在作为流通的媒介的形式上，金受到种种虐待，被刮削，甚至被贬低为纯粹象征性的纸片。但是，作为货币，金又恢复了它那金光灿烂的尊严。它从

“不仅贵金属是物的符号……而且，反过来，物……也是金银的符号。”A Genovesi. 《Lezioni di Economia civile》（1765），p. 281 [安·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1765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8卷第281页。配第说：“金银是《universal wealth》[“一般财富”，“政治算术”第242页。

奴仆变成了主人。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

(a)货币贮藏

金最初作为货币同流通手段分开,是由于商品中断了自己的形态变化过程,并在它的金蛹形式上停顿下来。每逢卖不转为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因此,金作为货币独立起来,首先是流通过程或商品的形态变化分裂为两个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关的行为的明显表现。铸币的行程一经中断,铸币本身就变成货币。铸币在用商品换得它的那个卖者手中是货币,不是铸币;一离开他的手,它又变成了铸币。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生产的单方面的商品的卖者,又是

E. Misselden. 《Free trade or the means to make trade flourish etc》 London, 1622 [爱·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繁荣之道”1622年伦敦版]。“贸易的自然对象是商品, which merchants from the end of the trade have stiled comodities [即商人在业务上称为货物的东西], 贸易的人为对象是货币, 它被称为 sinewes of warre and of state [战争和国家的神经]。货币无论从性质上说或从时间上说都是在商品之后出现的, yet for as much as it is now in use has become the chiefe [虽然如此, 现在它在实践中却居于首要地位]。”(第7页)他把商品和货币比作“老雅各的两个儿子, 雅各把右手放在小儿子身上, 把左手放在大儿子身上”(同上)。Boisguil- lebert. 《Disser- sert.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etc》, 1. c. (p. 395, 399) [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的本性”, 载于欧仁·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395、399页)]中说:“于是, 在这里, 贸易的奴隶变成了贸易的主人…… 人民的苦难的产生, 就是由于人们使过去的奴隶成了主人, 或者不如说, 成了暴君。”布阿吉尔贝尔说:“人们把这些金属(金、银)变成了偶像, 人们忘记了把它们召到贸易中来的企图和目的是为了使它们在交换和相互交付中充当抵押品, 而几乎让它们解脱了这种任务, 把它奉为神明。为了它们, 人们牺牲了并且仍然牺牲着许多财富、重要的需要、甚至人的生命, 而且比在愚昧的古代为其假神牺牲的还多。”(同上, 第395页)

他为了社会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其他商品的买者。他以卖者身分出现是以他的商品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为转移,而他以买者身分出现是由他的生活需要的不断更新决定的。他要能够不卖而买,他必须曾经卖而不买。事实上 $W-G-W$ 的流通,只是由于同时是卖和买不断分裂的过程,才是卖和买在过程中的统一。货币要作为铸币而不断地流动,铸币就必须不断地凝结为货币。铸币的不断流通,以铸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断停顿下来成为铸币准备金为条件,这种准备金在流通内部到处发生,同时成为流通的条件,这种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复经常更替着,它的存在不断消失,它的消失不断存在。关于铸币变货币、货币变铸币的这种不息的转化,亚当·斯密这样说过:“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除了他所出卖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须经常准备一定数额用于购买的一般商品。我们知道,在 $W-G-W$ 的流通中,第二个环节 $G-W$ 分裂为许多次买,它们在时间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成的,因此 G 的一部分作为铸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而停留。货币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的铸币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总是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因此,流通手段变成货币的这个第一种转化,仅仅是货币流通本身的一个技术因素。”

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

布阿吉尔贝尔从这个 *perpetuum mobile*(永动机)的初次变为不动,即从它的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存在的否定中,立即察觉到货币对商品闹独立。他说:“货币应该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只有它是可动的,它才能是这样,一旦它不动了,就一切都完了’”(见“法国详情”第213页)。他没有看到货币的这种静止是它的运动的条件。实际上他是要说,商品的价值形式不过是它们的物质变换的瞬间间的形式,决不应该作为目的本身固定下来。”

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的占有。在研究从商品到货币的过渡时,我们已经知道,在尚未发达的生产阶段上,正是产品的这种剩余或过剩形成商品交换的固有范围。剩余产品变成可以交换的产品即商品。这种剩余的最适当的存在形式是金和银,这是财富被当作抽象的社会财富保存时采取的第一种形式。商品不是只能在金银的形式上被保存,就是说,不是只能在货币材料中被保存,然而金银却是在被保存形式上的财富。每种使用价值本身都是由于被消费,即被消灭而起使用价值的作用。但是,作为货币的金的使用价值,是去充当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作为无定形的原料去充当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作为无定形的金属,交换价值取得了一种永久的形式。这样作为货币而静止下来的金银就是贮藏货币。在纯粹以金属流通的民族如古代民族中,货币的贮藏是从个人到国家普遍进行的一个过程,国家保护着自己的国库。在更古的时代,在亚洲和埃及,国王和僧侣保护下的这种贮藏货币,毋宁说是他们的实力的见证。在希腊和罗马,建立国库成了一种政策,国库被看成是剩余品的永保安全而随时可用的形式。这种贮藏货币被侵略者从一国迅速移往他国,以及它的一部分突然涌入流通,是古代经济的特点。

作为物化劳动时间,金保证了它自己的价值量,而且由于它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流通过程就保证了金能经常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正是由于商品所有者能够把商品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保存,或者说,能够把交换价值本身当作商品保存,那种为了在金这个转化形式上收回商品而进行的商品交换就成了流通本身的动机。商品的形态变化 $W-G$,就是为了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为了

商品从特殊自然财富转化为一般社会财富。形式变换代替物质变换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价值从单纯的形式变成了运动的内容。商品只有当它保持在流通领域的时候,才能作为财富、作为商品保持下来,只有当它硬化为金银的时候,才能保持这种流动状态。它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晶而保持流动状态的。同时,金银本身只在不是流通手段时才固定为货币。作为非流通手段,它们变成了货币。因此,把商品在金的形式上从流通中抽出,是使它经常保持在流通中的唯一办法。

商品所有者只能把他作为商品投入流通的东西从流通中作为货币收回。因此,从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经常地卖、不断地把商品投入流通,是货币贮藏的第一个条件。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断地在流通过程本身中消失,因为它经常实现为使用价值而化为短暂的享受。因此,货币必须从吞没一切的流通洪流中被拯救出来,或者说,商品必须被固定在它的第一形态变化上,这样,货币就被阻止去履行它的购买手段的职能。现在变成货币贮藏者的商品所有者必须尽量多卖,尽量少买,正如老卡托所教导的: *patrem familias vendacem, non emacem esse*²⁸。如果勤劳是货币贮藏的积极条件,节俭便是货币贮藏的消极条件。从流通中取出商品等价物,以特殊商品或使用价值形式取出的越少,以货币或交换价值形式取出的就越多。因此,要占有一般形式的财富,就要放弃物质的现实的财富。因此,推动货币贮藏的活力是吝啬,对吝啬说来,所需要的不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要取得一般形式的剩余物,就必须把特殊的需要当作奢侈和浪费。例

“商品的储存越多,贮藏货币(in treasure)的储存越少。”爱·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第 23 页。

如,1593年西班牙议会给菲力浦二世的呈文中说:

“伐利亚多利德的议会在1586年曾请求陛下不再准许蜡烛、玻璃器皿、珠宝、刀子等类物品向王国进口;这些对人类生活无用的东西从外国运来是为了换取黄金,西班牙人似乎成了印第安人。”

货币贮藏者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既不蛀又不锈、完全是天上的又完全是人间的永恒的财宝。米塞尔登在前面所引的著作中说:

“我们缺乏黄金的总的根本的原因,是我国消费外国商品太多,事实上,这些商品对于我们不是 *commodities* (有益之物),而是 *discommodities* (无益之物),因为它们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代替这些玩意 (*toys*) 进口的财宝。我们消费了过多的西班牙的、法兰西的、莱茵区的和近东的葡萄酒,西班牙的葡萄干,近东的无核小葡萄干,埃诺的细麻布(一种上等麻布)和细棉布,意大利的丝绸,西印度的糖和烟草,东印度的香料,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物品,可是这些东西都得用真金去买。”

在金银的形式上,财富是长久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交换价值存在于不朽的金属中,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金银被阻止作为流通手段去变成只是商品的瞬息间的货币形式。于是,暂时的内容为长久的形式牺牲了。

“如果通过税收把一个人用在吃喝上的货币拿来,交给另一个人去改良土地、捕鱼、开矿、办工厂、甚至做衣服,对于社会总有好处,因为即使衣服也不像吃喝那样不长久。如果把货币用来购买家具,好处就更大,用来盖房子等等,好处还要大,而好处最大的,是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并且不论何时何地都被当作财富;而其他一切东西只是 *pro hic et nunc* (一时一地的) 财富”。

把货币从流通洪流中拯救出来而不让它参与社会的物质变

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第11—13页及以下各页。
配第“政治算术”第196页。

换,还明显地表现为窖藏,这样一来,社会的财富变成了地下的长久的库藏,与商品所有者发生一种完全秘密的私的关系。在德里的奥朗则布的宫殿里住过一段时间的贝尔尼埃博士,曾谈到商人们,特别是几乎掌握了全部贸易和货币的不信回教的异教徒,怎样把他们的货币秘密地、深深地埋在地里,他们

“深信生前埋下的金银,对他们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有用。”

可是,只要货币贮藏者的禁欲主义与勤劳相结合,在宗教上他就实际上成了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

“不可否认,买卖是必需的,没有它是不行的;人们尽可以按照基督教的道理来购买,特别是购买必需品及和体面有关的东西,因为就是长老们也曾买卖过牲畜、羊毛、谷物、牛油、牛奶等物品。这是上帝从大地拿来分配给人类的赐物。但是对外贸易从加尔各答、印度等地运回的商品,是贵重的丝绸、金器和香料,只供奢侈而别无用处,耗费了国家和人民的金钱;如果有统一的政权和君主,就不应该允许这种对外贸易存在。但是关于这一点我现在不想多写,因为我认为,当最后我们已经不再有钱的时候,这种贸易自然就会终止,奢侈和大吃大喝也是如此,因为不到贫困逼着我们的时候,文章和说教都是徒然的。”

François Bernier.《Voyage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tome I,conf p 312—314[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帝国游记”第1卷第312—314页]1830年巴黎版。

Dr .Martin Luther .《Bücher vom Kaufhandel und Wucher》.1524[马丁·路德博士“论商业与高利贷”1524年版]。路德在同一个地方说:“上帝把我们德国人置于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的金银流到外国,让全世界变富而自己沦为乞丐。如果德国不买英国的布,英国的金就没有这么多;如果我们不买葡萄牙的香料,葡萄牙国王的金也会少些。要是你计算一下,通过法兰克福一个集市有多少金钱毫无必要和毫无理由地从德国运出,你就会奇怪,怎么在德国境内还会留下一个铜板。法兰克福是金银的豁口,通过这个豁口从德国流出的,是在我们这里刚刚涌现、产生、铸造或打成的东西,如果堵塞这个

在社会的物质变换发生动荡的时期,甚至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货币也会作为贮藏货币而窖藏起来。社会联系(对于商品所有者来说,这个社会联系在于商品,而商品的最适当的存在是货币)在其坚固的形式上从社会的运动中被救了出来。社会的 *nervus rerum* 和它所依附的肉体一起被埋葬了。

如果贮藏货币不是经常渴望流通,它就仅仅是无用的金属,它的货币灵魂就会离它而去,它将变成流通的灰烬,流通的 *caput mortuum*。货币,或独立化了的交换价值,按它的质来说,是抽象财富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定的货币额都是量上有限的价值量。交换价值的量的界限同它的质的普遍性发生矛盾,货币贮藏者感到这个界限是障碍,而这个障碍事实上同时就变成了质的障碍,换句话说,使贮藏货币仅仅成为物质财富的有限的代表。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直接表现在一个等式中,它自己成为等式的一边,商品的无限系列则成为等式的另一边。货币在实

豁口,现在就会听不到这样的怨言:到处都只有债务而没有货币,乡村和城市都受着高利贷的盘剥。但是,该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德国人应该始终是德国人!我们决不罢休,我们应该干。”

米塞尔登在“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中希望把金钱至少保留在基督教国家的范围内。他说:“由于同土耳其、波斯和东印度等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货币减少了。这种贸易大部分是用现金进行的,但是这和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完全不同。因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虽然也用现金,但这些现金仍保留在基督教国家内。基督教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中实际上也有货币的顺流和逆流,涨潮和退潮,因为这个国家欠缺,那个国家有余,有时这个地方的货币多,那个地方的货币少;货币在基督教国家范围内来回周转,但始终没有超出它的范围。可是用来同上述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的货币,就总是不断支出而永不返回。”

直译是:物的神经;转意是:万物的动力。——编者注

直译是:骷髅;这里的意思是:残渣。——编者注

现自己的时候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这样的无限系列,也就是说,货币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它是交换价值这个概念,决定于交换价值的量。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自动器的运动,只能是突破它的量的界限的运动。但是当贮藏货币的一个量的界限被超越时,就又有另一个新的障碍,必须再加以克服。表现为障碍的,不是贮藏货币的某一个界限,而是它的任何一个界限。因此,货币贮藏在它本身并无任何内在的界限,并无任何限度,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它每次的结果中就有再次开始的动机。贮藏货币只有保存才能增加,它也只有增加才能保存。

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是 *auri sacra fames*〔万恶的求金欲〕。致富的欲望与追求特殊的自然财富或使用价值(如衣服、首饰、畜群等等)的欲望不同,只有在一般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因而可以当作单独的商品保存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实际上成为基础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及其增加成了目的。吝啬死守着贮藏货币,不让货币变成流通手段,但是求金欲保持着贮藏货币的货币灵魂,保持着它对于流通的经常的渴望。

这样,贮藏货币借以形成的活动,一方面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卖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另一方面是简单的收藏、积累。事实上,只有在简单流通范围内,而且正是在货币贮藏的形式上,才有真正的财富

引自罗马诗人咏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译者注

“货币是吝啬之源……这里逐渐燃起一种狂热,这已经不是吝啬而是求金欲了。”Plin《Hist nat》,L. X X X III, c. III [sect. 14] 普林尼“博物志”第33卷第3章第14节。

积累,至于其他的所谓积累形式,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只是由于滥用名词,只是由于联想起简单的货币积累,才被当作积累。其他一切商品,或者当作使用价值来积累,这时,它们的积累方法决定于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例如,粮食的积累需要有特殊的设备。积累羊群使我变成牧人,积累奴隶和土地使主奴关系成为必要,等等。特殊财富的储备要有不同于积累本身这种简单行为的特殊过程,并且发展着个性的特殊方面。或者是,把商品形式的财富当作交换价值来积累,这时,积累就表现为一种贸易业务或特殊经济业务。经营这种业务的人变成粮商、畜贩等等。金银所以是货币,不是由于积累金银者个人的任何活动,而是由于没有这种个人的协助而进行着的流通过程的结晶。他别的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把金银放在一边,一两又一两地堆积起来就行了,这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活动,这种活动如果应用在其他一切商品上,就会使商品丧失价值。

贺雷西的下面这几句诗表明他完全不懂货币贮藏的哲学(Satir L. II, Satir 3. [讽刺诗第二卷第三首]):

“买来弦琴置一旁,不爱音乐不弹唱,
不作鞋匠买刀剪,不去航海买帆桨;
世间若有这等人,谁不说他是疯狂。
今有人焉攫黄金,黄金到手即埋藏,
平生不敢动铢两,试问此人狂不狂?”

西尼耳先生却比较了解,他说“货币似乎是唯一的普遍要求的東西,这是因为货币是抽象的财富,人们有了货币,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不管是哪一种”。《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Ec pol》, traduit par le comte Jean Arrivabene, Paris, 1836, p. 221[“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伯爵译 1836年巴黎版第221页];施托尔希也说:“因为货币代表着一切其他财富,人们只要把货币积累起来,就可以取得世界上一切种类的财富。”(“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卷第135页)

我们的货币贮藏者表现为交换价值的殉道者，坐在金塔顶上的神圣的禁欲主义者。他关心的只是社会形式的财富，因而他把这种财富埋藏起来不让社会见到。他追求的是具有永远适于流通的形式的商品，因而他把这种商品从流通中抽出。他热衷于交换价值，因而他不进行交换。财富的流动形式和财富的化石，长命之浆和哲人之石，像在炼金术中一样，彼此疯狂地纠缠着。为了想像中的无限享受，他放弃了一切享受。因为他希望满足一切社会需要，他就几乎不去满足必需的自然需要。他把财富保存在它的金属实体中，他也就把财富化成幻影。但实际上，为货币而积累货币是为生产而生产的野蛮形式，也就是社会劳动生产力超越惯常需要的界限的发展。商品生产愈不发达，交换价值的最初独立化为货币即货币贮藏就愈为重要；因此，在古代各民族，在直到目前为止的亚洲，在交换价值尚未掌握所有生产关系的现代农业民族中，货币贮藏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现在就要考察货币贮藏藏在金属流通本身中的特殊的经济职能，但我们先指出货币贮藏的另一种形式。

金银制的商品不管具有什么样的美学属性，既然它们用的材料是货币材料，那就可以转化成货币，就像金币或金条可以转化成这些商品一样。因为金银是抽象财富的材料，所以炫耀财富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用作具体的使用价值，如果商品所有者在一定的生产阶段上把货币藏起来，那末只要安全，他总是力图在别的商品所有者面前以 *rico hombre* [大财主] 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家镀上黄金。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货币贮藏不像在资产阶

就在商品所有者已经变得文明而发展为资本家的时候，他的 *inner man* [本

级经济中那样表现为总生产机构的附属职能,这种形式的财富却总是被当作最后的目的,在那里,金银制的商品实质上不过是贮藏货币的美学形式。在中世纪的英国,由于加在金银制的商品上的那一点粗糙劳动使它们的价值增加得很少,因此在法律上金银制的商品只是被看作贮藏货币的一种形式。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投入流通,因此它们的成色定得完全同铸币本身的成色一样。用作奢侈品的金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个很简单的事实,在古代人看来,是十分明白的,可是现代经济学家却提出了错误的论点,说金银制的商品的使用不是按照财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只是按照贵金属价值跌落的比例而增加。因此,他们关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的消费情况的资料,在其他方面虽然确实,但是总有一个缺陷,因为用作原料的金的消费量的增加不是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有相应的金价值的降低来证明。从1810年到1830年间,由于美洲殖民地同西班牙的战争²⁹以及革命所引起的矿山劳动的停顿,贵金属的平均年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1829年在欧洲流通的铸币比1809年减少了几近 $\frac{1}{6}$ 。可见,虽然产量减少了,生产费用——如果有变动的话——增加了,但是,英国在战时,大陆从巴黎和会时起,用作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量却大大地增加了。它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在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

性]也丝毫没有改变,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证明:有一个国际银行的伦敦代理人,把一张十万镑的银行券装在镜框里当作恰当的家徽。妙在这张银行券嘲笑而高傲地俯视着流通。

见后面色诺芬的话。

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第2卷第25章和第26章。

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大: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¹/₄。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现,或者说,不过是社会的物质变换所借以实现的形式变换的表现。因此,流通中的金的总量,一方面随着流通中的商品的时时变动的价格总额或同时发生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规模,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形式变换每次的速度,必须不断地扩张或收缩,这一点只有在一国的货币总量与流通中的货币量之比不断发生变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个条件是靠货币贮藏来实现的。如果价格跌落或流通速度提高,贮藏货币的蓄水池就吸收从流通中游离出来的那部分货币;如果价格上涨或流通速度降低,贮藏的货币便开放,有一部分就回到流通中去。流通中的货币凝结为贮藏货币和贮藏货币注入流通,是一种不断交替的摆动;在摆动中哪一个方向占优势,完全是由商品流通的摆动决定的。这样,贮藏货币就表现为流通中的货币的引水渠和排水沟,因而,当作铸币而流通着的,总只是由流通本身的直接需要所规定的货币量。如果总流通量突然扩大,卖和买的流畅的统一占着主导地位,因而待实现的价格总额比货币流通速度增长得更快,贮藏货币就显著地缩减;一旦总的运动异常停滞,或者卖和买的分离加强,流通手段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凝结为货币,贮藏货

“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具和饰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第2卷第357页)

币的蓄水池就大大超过平均水平。在纯粹用金属流通的或者处于不发达的生产阶段的国家,贮藏货币无限零散,遍布全国各地,但在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它就集中到银行的金库中了。不能把贮藏货币同铸币准备金混为一谈,铸币准备金本身是经常处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贮藏货币与流通手段的能动的关系却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减少或增加为前提。前面已经说过,金银制的商品同样既是贵金属的排水沟,又是贵金属的潜在来源。但在平时,对于金属流通的经济来说,只有它们的第一种职能是重要的。

(b)支付手段

到现在为止货币不同于流通手段的两种形式,是暂歇的铸币的形式和贮藏货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在铸币暂时转化成货币中反映出 $W-G-W$ 的第二环节即买 $G-W$,在一定流通范围内必

在下面的一段话中,色诺芬把货币在其作为货币和贮藏货币的特殊形式规定性上作了论述:

“在我所知道的一切部门中,只有这一部门的新企业家不引起旧企业家的妒忌……银矿越丰富,它的采银量越大,它吸引到这种劳动上的人也越多。实际上,当家庭中有足够的家具时,人们便很少再去添置;可是,谁的银也不会多到不想再要的地步,如果真有人觉得太多,他会把多余部分埋藏起来,他所感到的喜悦,不会比使用这些钱时少。当国家繁荣时,国民特别需要银:男人除了优良的武器以外还想买骏马、豪华的房屋和设备,女人需要各种服装和金饰;如果国家遭受歉收或战争,那末由于田地荒芜,为了取得粮食,或者为了招募补充兵员,都需要货币……”Xen《Devectig》,c. IV [色诺芬“赋税论”第4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1篇第9章中,用“经济”和“货殖”两个名词,在对立中论述了 $W-G-W$ 和 $G-W-G$ 这两种流通的运动。希腊的悲剧作家们,特别是欧里庇得斯,把这两种形式作为 $\gamma\acute{\alpha}\lambda\lambda\omicron\varsigma$ [公正]和 $\pi\omicron\lambda\upsilon\tau\eta$ [食欲]对立起来。

然分裂为一系列先后相继的买。而货币贮藏只是基于W—G行为的孤立,即不向G—W继续发展,或者说,它只是商品第一形态变化的独立发展,是作为一切商品转移后的存在而发展起来的货币,同商品在其不断转移形式上的存在即流通手段正相反。铸币准备金和贮藏货币之成为货币,只因为它们是非流通手段,而它们之所以成为非流通手段,只因为它们不流通。我们现在要在这样一个规定上研究货币,在这个规定上,货币流通着,或者说,货币进入流通,但是,它并不履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货币总是购买手段,现在,它却作为非购买手段起作用。

货币一旦由于货币贮藏而发展成为抽象社会财富的存在和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它就在它这一个当作货币的规定性上,在流通过程内部取得特殊的职能。如果货币当作单纯的流通手段,因而当作购买手段流通,这就表示商品和货币同时对立着,因而同一个价值量具有二重形式:在一极上是在卖者手中当作商品,在另一极上是在买者手中当作货币。两个等价物在对立两极的这种同时存在,以及它们同时变换位置或相互转移,又是表示卖者和买者只是作为现有等价物的所有者相互发生关系。可是,产生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的商品形态变化过程,使商品所有者也发生形态变化,或者说,改变着他们出现时彼此所具有的社会身分。商品监护人在商品形态变化过程中,每逢商品发生一次变化或货币采取一种新形式,就改变一次自己的外皮。例如,商品所有者最初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对立着,后来一个成为卖者,另一个成为买者,然后每一个都交替地作买者和卖者,后来又成为货币贮藏者,最后成为富人。可见,商品所有者走出流通过程的时候,同他走进流通过程的时候不一样了。实际上,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各种形式规定性,不过

是商品本身的结晶了的形式变换,而这种形式变换又不过是商品所有者借以完成其物质变换的那种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交往关系,而商品所有者作为这种改变了的关系的承担者,就获得了新的经济身分。正如在国内流通过程中,货币把自己观念化,单纯一张纸片就作为金的代表来履行货币的职能一样,这同一个过程又使那些作为货币或商品的单纯代表而进入流通过程的、即代表着未来货币或未来商品的买者或卖者,具有现实的买者或卖者的效力。

金发展为货币时的一切形式规定性,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那些规定的展开,那些规定在简单货币流通中,在货币作为铸币的表现中,或在作为过程中的统一的 $W-G-W$ 运动中,还没有分化为独立的形式,或者像商品形态变化的中断那样还只是表现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在 $W-G$ 过程中,作为实际的使用价值和观念上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同作为实际的交换价值和只是观念上的使用价值的货币发生关系。当卖者把商品当作使用价值转移时,他就实现了商品自己的交换价值和货币的使用价值。相反,当买者把货币当作交换价值转移时,他就实现了货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的价格。与此相应,发生了商品与货币的位置变换。现在,这个两极对立的活的过程,在它实现的时候又重新分裂开来。卖者实际转移商品,但最初只在观念上实现商品的价格。他已经把它照它的价格卖出,但是它的价格只是后来在约定的时间才实现。买者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者来买,而卖者则作为现在商品的所有者来卖。就卖者方面说,商品当作使用价值实际上被转移了,却没有当作价格实际上被实现,就买者方面说,货币实际上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实现了,却没有当作交换价值实际上被转移。从前,是价

值符号象征地代表货币,而这里,是买者本身象征地代表货币。但是,正如从前价值符号的一般象征要求国家的保证和规定其强制流通一样,现在买者的人身象征则在商品所有者之间引起一种法律上有强制性的私人契约。

相反,在G—W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转移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移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驻俄国的外商购买俄国农产品时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因此并没有取得新的形式规定性。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就不再多说;不过关于G—W和W—G这两个过程在这里所借以表现的那种转化形式,我们必须指出:买和卖之间的区别,在流通中直接出现时只是想像的区别,现在却变成了现实的区别,因为,在一种形式上,只有商品存在着,在另一种形式上,只有货币存在着,在两种形式上,都只有过程开始的那一极存在着。此外,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是,在这两种形式中,等价物之一只存在于买卖双方的共同意志中,这种共同意志约束着双方,并且取得一定的法律形式。

卖者和买者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如果先前作为货币贮藏者的商品所有者曾经扮演了可笑的角色,那末现在他却变成了可怕的人物,因为现在他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看成一定货币额的存在,他不是把自己而是把他的邻人变成为交换价值的殉道者。他从信徒变成了债主,他从宗教走进了法律。

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预付货币可以是预付资本;可是这个观点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

《I stay here on my bond 》

〔“我照契约行事！”〕

因此,在W—G的这个改变了的形式中,即在商品存在着而货币只是被代表着的形式中,货币首先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商品的交换价值用货币来计算,把货币当作它的尺度;但是价格,作为在契约上规定的交换价值,不仅存在于卖者的头脑中,而且同时也是买者所负的义务的尺度。其次,货币在这里起着购买手段的作用,虽然它不过是把自已的未来存在的影子投射在自已面前。这也就是,它使商品离开自己的位置,把商品从卖者手中转入买者手中。一旦契约到期,货币就进入流通,因为它变换位置,从过去的买者手里转入过去的卖者手里。但是它进入流通,不是作为流通手段或购买手段。它作为这种手段起作用,是早在它存在之前,它的出现,是在它已经不再作为这种手段起作用之后。它进入流通,倒是作为商品的唯一适当的等价物,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作为交换过程的最后一言,总之,是作为货币,而且是作为起一般支付手段这个特定职能的货币。在这个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上,货币表现为绝对商品,但是不像贮藏货币那样在流通之外,而是在流通之内。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差别,会在商业危机时期令人非常不快地显露出来。

产品在流通过程中转化为货币最初只是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个人的必需,因为他的产品对他并不是使用价值,只有通过转移之后才对他是使用价值。但是,为了在契约到期时支付,他就必须先

引自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编者注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法:“路德曾着重指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差别。”——编者注

把商品出卖。所以,这种出卖,与他的个人需要完全无关,已经由于流通过程的运动变为他的一种社会必需。作为某种商品的过去的买者,他被迫成为另一种商品的卖者,不是为了取得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而是为了取得作为支付手段、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形式的货币。作为终结行为的由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或者说,作为目的本身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在货币贮藏上曾经仿佛是商品所有者的随心所欲的行为,现在却成了一种经济职能。为支付而卖的动机和内容,是从流通过程本身的形式中产生的内容。

在卖的这一形式中,商品变换自己的位置,流通着,可是它推迟自己的第一形态变化,即推迟自己向货币的转化。从买者方面说则相反,在第一形态变化完成之前,即商品向货币转化之前,就完成第二形态变化,即货币向商品逆转化。因此,在这里,第一形态变化在时间上晚于第二形态变化。因此,货币,即商品在其第一形态变化中的形态,获得了新的形式规定性。货币,或者说交换价值的独立发展,已不再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形式,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卖的两极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这种期卖,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自然产生的,这一点无需详细证明。首先,流通的发展使得同一商品所有者彼此反复地作为卖者和买者交替出现。这种反复出现,并不只是偶然的,而是,例如说,约定在未来的某一期限交出商品和付清款项。在这种情况下卖是在观念上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这里是在法律上完成的,并无具体的商品和货币出现。这里,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支付手段的两种货币形式还结合在一起,因为一方面货币和商品同时变换位置,另一方面货币并非购买商品,而是实现过去卖出的商品的价格。其次,许多使用价值的性质,使得使用价值不是在商品实际移交的时候被转移,而是在商品使用了一定

期限之后才真正被转移。例如,把房屋的使用权出卖一个月时,虽然房屋在月初已经移交,但是它的使用价值要到月底才转移完毕。这里,由于使用价值的实际移交同它的真正转移在时间上是彼此分开的,所以它的价格的实现也就迟于它的位置变换。最后,各种商品在生产上有时间长短和先后的不同,使得这个人作为卖者出现时,别一个人还不能作为买者出现;当买卖在同一些商品所有者之间更加频繁地反复进行的情况下,卖的两个要素就适应着他们的商品的生产条件而彼此分离开来。在商品所有者之间就发生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是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但是可以在信用制度存在之前就十分发达。然而很明显,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因而随着一般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将靠缩小其作为购买手段的职能,尤其是缩小其作为货币贮藏因素的职能而扩展起来。例如,在英国,当作铸币的货币几乎完全被排挤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零售贸易和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而当作支付手段的货币则在大规模交易的领域内居于支配地位。

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这最初

麦克劳德先生虽然以教条式地定义而自鸣得意,可是他这样不理解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竟认为货币起源于最发达的货币形式,即支付手段的形式。他说:“因为人们需要相互的服务并不总是同时的,而且价值量也不相等,于是第一人就要对第二人支付一些差额或一定量的服务,——这就是债务”。这个债务的债主需要第三人的服务,但第三人并不直接需要他的服务,于是他“把第一人欠他的债转给第三人。债券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这就是流通……当一个人得到用金属货币表示的债券时,他不仅能够支配原来债务人的服务,而且能够支配整个生产社会的服务”。MacLeo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etc.》London, 1855, v. 1, ch. 1[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伦敦版第1卷第1章]。

仅限于商品流通领域之内。可是,随着它的这一职能的发展,其他一切支付形式都渐渐地变为货币支付。货币发展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的程度,表示交换价值在深度和广度上掌握生产的程度。

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货币量首先决定于支付总额,即已转移的商品的价格总额,而不是像在简单货币流通中那样决定于待转移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可是,这样决定的总额,受着两种情况的校正:第一,是同一块货币重复这同一职能的速度,或者就许多笔支付形成一个过程中的支付锁链的速度。如甲付给乙,而后乙又付给丙等等。而同一块货币重复其支付手段职能的速度,又一方面决定于商品所有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同一个商品所有者对于一个人是债权人,对于另一个人又是债务人等等,另一方面决定于不同的各个支付期间间隔的长短。这个支付锁链,即推迟了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的锁链,在质上不同于那个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流通时表现出来的形态变化的锁链。后者不但在时间上是先后衔接的,而且是在这种先后衔接的过程中才初次形成的。商

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3页上说:“货币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或者说,是用来订立大部分将来要履行的财产合同的东西。”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221页上说:“因为一切东西的价值在一定时期内都会发生变动,所以人们就选了价值最少变动而且最能长久保持一定平均购买力的东西作为支付手段。于是,货币变成了价值的表现或代表。”而事实正好相反。正因为金银之类已经变成货币,即变成独立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它们才变成一般支付手段。在对于货币价值量的稳定性发生西尼耳先生所提到的那种顾虑的时期,即在货币为形势所迫而确定为一般支付手段的时期,恰好也是货币价值量的波动被发现的时期。这样的时期,在英国是伊丽莎白时代,那时柏里勋爵和托马斯·斯密斯爵士鉴于贵金属的显著贬值,通过了一个议会法案,责成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它们所收的地租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用小麦和麦芽保存起来。

品变成货币,而后再变成商品,这样使另一种商品能够变成货币,如此等等,换句话说,卖者变成买者,由此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就变成卖者。这种联系是在商品交换过程本身中偶然产生的。但是,甲支付给乙的货币被乙支付给丙,被丙支付给丁等等,并且在时间上一个紧接着一个,——这种表面联系不过是表现一种已经现成地存在的社会联系。同一货币流过不同的手,并不是因为它们作为支付手段出现,可是它们作为支付手段流通,却是因为不同的手已经彼此相握。因此,同货币作为铸币或购买手段流通的速度比较起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速度表明个人已更深得多地卷入了流通过程。

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买和卖的价格总额,对于铸币流通速度代替铸币数量,是一个界限。这个障碍对于起支付手段作用的货币就消失了。如果应当同时履行的许多笔支付都集中在同一地点,——这种情形最初自然只是发生在商品流通的大集中点,——那末这些支付就可以作为负数和正数相互抵销,因为甲要支付给乙,而同时丙要支付给甲等等。因此,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要量,不是决定于应当同时实现的支付的价格总额,而是决定于支付的集中程度和它们作为负数和正数互相抵销以后的余额的大小。在信用事业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时候,例如在古罗马,就已经产生为这种抵销而设的专门机关。但是这里不是要考察这种机关,也不是要考察在一定社会圈子里到处规定着的一般支付期。这里只需指出,关于这种支付期对流通中货币量的周期性波动的特殊影响,直到最近才作了科学的研究。

只要许多笔支付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销,就根本没有现实的货币参与。这里,货币仅仅在其价值尺度的形式中起作用,即一

方面在商品价格中,另一方面在彼此间的债额中起作用。因此,交换价值在这里除了它的观念上的存在之外,并没有获得任何独立的存在,哪怕是作为价值符号的存在,或者说,货币只变为观念上的计算货币。因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只要许多笔支付互相抵销,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作为尺度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只要支付必须实际进行,货币就不是作为瞬息间的流通手段进入流通,而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静止的存在、作为绝对商品,简言之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因此,在支付锁链和一种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已经发达的地方,如果有什么震动强制地打断了支付之流,破坏了它们的抵销机制,货币就会突然从它的价值尺度的虚无缥缈的姿态一变而为坚硬的货币或支付手段。于是,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生产情况下,当商品所有者早已变成了资本家,已经熟悉自己的亚当·斯密,并且高傲地嘲笑那种以为只有金银是货币或以为货币根本不同于其他商品而是绝对商品的迷信的时候,货币却又突然不是作为流通的中介出现,而是完全像货币贮藏者所理解的货币一样作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形式、作为唯一的财富出现。货币作为财富的这样的唯一存在,不是像货币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只是表现在一切财富在观念上贬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而是表现在一切财富在实际上贬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这就是世界市场危机中称作货币危机的特殊时机。人们在这种时机当作唯一财富渴求的 *Summum bonum*〔至善〕就是货币,就是现金,而其他一切商品,正因为它们是使用价值,就在现金旁边表现为无用之物,表现为废物和玩具,或者就像我们的马丁·路德博士所说的,是供奢侈和大吃大喝的东西。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

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

支付又必需有一笔准备金,一笔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积累。这种准备金的形成,不像货币贮藏那样是流通本身之外的活动,也不像铸币准备金那样仅仅是铸币的技术性的滞留,而是必须把货币逐渐积聚起来,以便到未来的约定支付期届满时握有现款。因此,如果在抽象形式上被当作致富之道的货币贮藏随着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而减少,那末,这种为交换过程所直接需要的货币贮藏却在增加,或者不如说,一般在商品流通领域之内形成的贮藏货币的一部分被吸收为支付手段准备金。资产阶级生产越发展,这种准备金越是限于必需的最低限度。洛克在论利率降低的著作中,关于当时这种准备金的规模,提供了有趣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英国,正是在银行业开始发展的时代,支付手段准备金曾经从一般流通的货币中吸收了多么大的一部分。

研究简单货币流通时所得出的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规律,因支付手段的流通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下,——不论货币是作为流通手段或作为支付手段,——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 [加上]同一时期中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流通中的货币量决

那位想不让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去猛烈反对资产者本人的布阿吉贝尔,对于只是观念上的和只是瞬息间的货币形式有所偏爱。以前他对流通手段如此,现在对支付手段也是如此。他又没有看到的是,货币从它的观念的形式直接变为它的外在现实,他没有看到坚硬的货币已经隐伏在仅仅是想像的价值尺度中了。他说,货币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这一点表现在批发贸易上,在那里,《les marchandises sont appr éci ées》[“商品被估价”]之后,交换是在没有货币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国详情”第 210 页。

洛克“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结果”第 17、18 页。

定于商品价格这个一般规律,并不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因为支付总额本身是由契约上规定的价格决定的。但是,很明显,即使假定流通的速度和支付上的节约不变,一定时期例如一日内,流通的商品量的价格总额和同一日内流通的货币量也决不相符,因为,有一定量正在流通的商品,它们的价格只是在将来才实现为货币,又有一定量的货币正在流通,同它相当的商品早已退出流通。后面这一一定量的货币本身又决定于各个不同时期签订而在同一日到期的各笔支付的价值总额的大小。

我们已经知道,金银价值的变动并不妨碍金银执行价值尺度或计算货币的职能。可是,这种变动对于当作贮藏货币的货币却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随着金银价值的涨落,金银贮藏货币的价值量也会提高或降低。这种变动,对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就更加重要。支付只是发生在商品卖出之后,换句话说,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后是作为与这个尺度相适应的支付手段。在先后两个时期之间,如果贵金属的价值有变动,或者说,如果生产贵金属所需的劳动时间有变动,那末,同量金银的价值,当它作为支付手段出现时,就会比它作为价值尺度时或签订契约时高些或低些。这里,像金银这样的特殊商品,它们作为货币或作为独立化了的交换价值的职能,就同它们作为随生产费用的变动而变动价值量的特殊商品的性质发生了冲突。贵金属价值的跌落在欧洲引起的社会大革命,正像在古罗马共和国初期平民用来计算债务的铜的价值的上涨引起了相反的革命一样,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再去研究贵金属的价值变动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影响,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贵金属价值的跌落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相反,它的价值的上涨则有利于债权

人而不利於债务人。

(c)世界货币

金变成不同于铸币的货币,最初是由于它作为贮藏货币而是出流通,后来是由于它作为非流通手段而进入流通,而最后则是由于它突破国内流通的界限以便在商品世界中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样,金就成了世界货币。

如果贵金属的一般衡制曾经充当最初的价值尺度,那末在世界市场上,货币的计算名称又变成相应的重量名称。如果无定形的原金属(aes rude)曾是流通手段的最初的形式,而铸币形式本身原来不过是金属条块所含重量的官方记号,那末作为世界铸币的贵金属,就又抛弃了它的形状和官方印记,回到无差别的条块形状,换句话说,如果民族铸币如俄国的伊彼利阿耳、墨西哥的塔勒和英国的索维林在国外流通,那末它们的名称就变得毫无关系,只有它们的内容才有意义。最后,作为国际货币,贵金属重新起着它们原来的作为交换手段的作用,这种作用,如同商品交换本身一样,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而是在不同公社的接触点上发生的。因此,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又采取它的原始的最初的形式。货币离开国内流通,就重新抛弃了那些由这种特殊领域内的交换过程的发展所引起的特殊形式,即它的作为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的地方形式。

我们已经知道,在一国的国内流通中,只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但是,由于执行这种职能的在一国是金,在另一国是银,在世界市场上就有两种价值尺度,货币在其他一切职能上也就有两种存在。商品价值从金价格改成银价格以及相反的情况,每次都决定

于两种金属的相对价值,这种相对价值是不断变动的,因而相对价值的确定表现为一个经常的过程。每个国家国内流通领域的商品所有者不得不在对外流通中时而用金时而用银,这就要把在国内作为货币的金属,拿去同他所需要的在国外作为货币的金属交换。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把金银这两种金属当作世界货币。

在国际间的商品流通中,金和银不是表现为流通手段,而是表现为一般交换手段。但是,这种一般交换手段,只是以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这两种发展了的形式起作用,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市场上是相反的。在国内流通中,只要货币是铸币,是 $W-G-W$ 这个过程中的统一的中介,或者说,是交换价值在商品不断的位置变换中的瞬息间的形式,它就只起购买手段的作用。在世界市场上则相反。这里,当物质变换只是单方面的,因而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时候,金和银才起购买手段的作用。例如,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事实上或条约上³⁰都是物物交换,银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1857—1858年的战争³¹迫使中国人只卖不买。于是银就突然成了购买手段。俄国人为了遵守条约上的字句,把法国的五法郎银币改铸成粗陋的银器,用来当作交换手段。在欧美同亚洲之间,银一直充当购买手段,而在亚洲,它就沉淀为贮藏货币。其次,一旦两国之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例如,歉收使其中一国不得不大量购买的时候,贵金属也就起国际购买手段的作用。最后,贵金属是生产金银的国家手中的国际购买手段,在那些国家里,它们是直接的产品和商品,而不是商品的转化形式。不同各国流通领域之间的商品交换越发展,世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以平衡国际差额的职能也就越发展。

同国内流通一样,国际流通也需要有一个经常变动的金银量。

因此,每一个民族都有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贮藏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准备金,这笔准备金随着商品交换的波动而时枯时满。世界货币除了往返于各国流通领域之间的特殊运动以外,还有一种一般的运动,其起点是金银的产地,金银的源流由这里四面八方地流向世界市场。这里,金银作为商品进入世界流通,并且作为等价物,依它们所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同商品等价物相交换,这发生在它们进入国内流通领域以前。因此,它们在国内流通领域出现时,已经具有一定的价值量了。因此,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每一增减,在世界市场上以同样的程度影响着它们的相对价值;这种相对价值,与不同各国流通领域吸收多少金银完全无关。商品世界中每一特殊领域所吸收的那部分金属源流,一部分直接进入国内货币流通,以补偿磨损了的铸币,一部分被栏蓄在铸币的、支付手段的和世界货币的各种准备金蓄水池中,一部分变成奢侈品,至于其余的部分,干脆成了贮藏货币。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发达阶段上,贮藏货币被限制在不同流通过程为本身自由地发挥作用所需要的那个最低限度以内。在这里,成为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的,只是闲置的财富——只要它不是支付差额的瞬息间的形式,不是物质变换被中断的结果,不是商品在其第一形态变化上的凝结。

如果作为货币的金和银按其概念是一般商品,那末它们在世界货币上就取得了普遍商品这种相应的存在形式。一切产品在什

“为了实际上留在流通之中,为了满足贸易上可能的需要,便有一定的数额离开并退出流通领域本身,积累起来的货币就是加到这个数额上。”詹·黎·卡尔利在Verri,《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t. X V, p. 162[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上加的注,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162页]。

么规模上向它们转移,它们也就在什么规模上变成一切商品的转化形式,因而变成可以全面转移的商品。实在劳动的物质变换在全世界扩展到什么程度,它们就在什么程度上变成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成为它们的交换领域的特殊等价物的系列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们就在什么程度上变成一般等价物。因为商品在世界流通中普遍地展开了它们自己的交换价值,所以这个交换价值的转化形式金银,就表现为世界货币。因此,如果说商品所有者各国由于其全面的工业和普遍的贸易而使金变成最适当的货币,那末对这些国家来说,工业和贸易只是从世界市场吸取金银形式的货币的手段。因而,金银作为世界货币,既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产物,又是进一步扩展流通范围的手段。正如炼金术士想炼出黄金时,在他们背后产生了化学一样,商品所有者追求那具有迷人姿态的商品时,在他们背后涌现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源泉。金银帮助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因为金银在自己的货币概念中已经预示着世界市场的存在。它们的这种魔力决不限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而且必然会从商品世界的承担者对自己社会劳动的曲解中产生出来,十九世纪中叶新的产金地的发现对于世界贸易所发生的非常影响证明了这一点。

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Gemeinwesen]是货币。但是,随着同国家铸币对立的世界货币的发展,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义就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如果同一块金,先以美国 eagles〔鹰

币)的形式在英国登陆,变成索维林,三天后在巴黎当作拿破仑币来流通,几星期后又在威尼斯变成杜卡特币,但是它总是保持着同一个价值,那末,商品所有者就会清楚地看到,民族性《is but the guinea's stamp》(“不过是基尼上的印记而已”)。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个崇高的观念,就是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市场的观念。

4 贵金属

资产阶级生产过程最初所掌握的金属流通是一种现成地移交下来的机构,这个机构虽然逐步经过改造,但是始终保持着它的基本结构。为什么是金银而不是别的商品充当货币材料,这个问题不属于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因此,我们只概括地谈谈最重要的几点。

因为一般劳动时间本身只容许有量的差别,所以要充当它的特殊化身的那种物体必须能够表现纯粹的量的差别,因而首先要有同一性,同质性。这就是一个商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第一个条件。如果我用牛、兽皮、谷物等等来计算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末实际上我就必须用观念上的平均牛、平均兽皮等等来计量这些商品的价值,因为牛和牛、谷物和谷物、兽皮和兽皮之间,在质上是不同的。金银则不然,它们是一种单纯的物体,本身总是相同的,因而等

蒙塔纳里“货币论”(1683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3卷第40页:“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如此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

量的金银代表同样大小的价值。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还需有另一个条件,一个直接从它应当表现纯粹量的差别的职能产生出来的条件,这就是它要能够任意分为若干部分,并且能够重新合而为一,以便计算货币在外表上可以感觉出来。金银特别富于这种性质。

用作流通手段,金银比其他商品优越;它们的比重大,一个小的体积代表着较大的重量,它们在经济上的比重与此相适应,一个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多的劳动时间,就是说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这就保证了运送的方便,便于从一手转到另一手,从一国转到另一国,保证了它们既能迅速出现又能迅速消逝,总之,保证了物质的灵便性,这是要充当流通过程的 *perpetuum mobile* (永动机) 的商品的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

贵金属比值高,耐久,比较不易损坏,在空气中不氧化,特别是金,除王水外不溶解于其他酸类,这一切自然属性,使贵金属成为货币贮藏的天然材料。因此,那位似乎特别喜欢巧克力的殉道者彼得,关于曾充当墨西哥的一种货币的袋装可可说过:

“哦,有福的货币,既供给人类以甜美滋养的饮料,又不会使它的无辜的所有者染上可怕的贪婪病,因为它既不能埋藏,也难于长期保存。”(“新大陆”³²)

一般金属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只是同它们当作生产工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撇开金银很稀少不谈,仅就它们比铁甚至比铜(指古人所用的硬铜)软而论,这已经使它们不适于这种用途,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们丧失了一般金属的使用价值所依以

“金属有这样的属性和特点,就是只有在金属中,一切关系才归结为一种关系,即它们的量,因为它们不论在内部构成上或外部形状和构造上,天然没有不同的质。”(加利阿尼“货币论”第 126—127 页)

存在的那种属性。它们不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作为生活资料,作为消费对象,它们同样不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把多少金银投入社会流通过程,也不致对直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发生不利的影晌。它们本身的使用价值并不与它们的经济职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³³)。

最后,金银可以从铸币形式变为条块形式,从条块形式变为奢侈品形式,并且也可以变回来,因此,金银比其他商品优越之处是不受一成不变的、一定的使用形式的束缚,这就使它们成为货币的天然材料,因为货币是必须经常从一种形式规定性变为另一种形式规定性的。

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的物的形式上作为物神结晶起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应的化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一方面,银质或金质的货币结晶不仅是流通过程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是流通过程留下的唯一产物。另一方面,金和银是现成的自然产物;它们既直接是前者又是后者,没有任何形状的差别可以区分。社会过程的一般产物,或者说作为产物的社会过程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产物,是一种藏在地壳里

并在那里发掘出来的金属。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要求作为货币的金银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量,金银是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不过,正像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的,金银同其他商品的平均情况比较起来,还是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量。撇开贵金属价值的涨落所引起的一般影响不谈,金银之间的价值比例的变动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两者在世界市场上同时充当货币材料。这种价值变动的纯经济的原因,——征服或其他政治事变在古代世界曾对金属价值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现在只能起局部的暂时的影响,——必须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劳动时间本身又决定于金银自然蕴藏的相对稀少程度,也决定于获得纯金属状态的金银时困难的大小。金实际上是人所发现的第一种金属。一方面,自然界本身赋予金以纯粹结晶的形式,使它孤立存在,不与其他物质化合,或者如炼金术士所说的,处于处女状态;另一方面,自然界本身在河流的大淘金场中担任了技术操作。因此,对人说来,不论淘取河里的金或挖掘冲积层中的金,都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而银的开采却以矿山劳动和一般比较高度的技术发展为前提。因此,虽然银不那么绝对稀少,但是它最初的价值却相对地大于金的价值。斯特拉本曾断言,在一个阿拉伯部落里用10磅金换1磅铁,用2磅金换1磅银。这一断言绝不是不可置信的。可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从而简单劳动的产品贵于复杂劳动的产品,随着地壳到处被开发,原来的那些在

在760年,许多穷人移居到布拉格以南去淘沙金,3个人1天可以淘1马克的金。结果,放弃农业而去采金的人这样多,以致第二年国内闹饥荒(见M. G. Körner: 《A bhandlung von dem Altertum des böhmischen Bergwerks》 Schneeberg, 1758[格·克尔纳“波希米亚矿业往昔情况的研究”1758年施奈堡版[第37—38页]]。

地表面的金矿来源日益枯竭,银的价值就低于金的价值了。最后,在技术和交通工具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新的金银产地的发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古代亚洲,金银价值的比例是 6 : 1 或 8 : 1,在十九世纪初期,后一比例还存在于中国和日本;色诺芬时代的 10 : 1 可以看作古代中期的平均比例。迦太基以及后来罗马开采西班牙银矿在古代所发生的影响,同美洲矿藏的发现在现代欧洲所发生的影响相似。在罗马帝国时代,大致的平均数是 15 : 1 或 16 : 1,虽然我们知道在罗马银的价值常常跌得更低。在以后的时代里,即从中世纪直到最近时期,这种以金的价值相对跌落开始而以银的价值跌落结束的运动不断地反复发生。同色诺芬时代一样,中世纪的平均比例是 10 : 1,由于美洲矿藏的发现,又变成 16 : 1 或 15 : 1。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哥伦比亚金矿的发现大概又会使金的价值跌落。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等地金矿的发现还没有影响金银的价值比例。米歇尔·舍伐利埃所持的相反见解,同他这位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值同样的价钱。诚然,伦敦市场上银的牌价表明,1850年至1858年间用金表示的银的平均价格比1830年至1850年期间几乎提高3%。可是这种提高只能用亚洲对于银的需要来说明。1852年到1858年间,个别年份和月份银的价格发生变动,完全是由于这种需要造成的,决不是由于新发现的金矿的金的供给造成的。下面是伦敦市场上用金表示的银的价格的一览表:

1 盎斯银的价格

年份	3月 (辨士)	7月 (辨士)	11月 (辨士)
1852	60 ¹ / ₈	60 ¹ / ₄	61 ⁷ / ₈
1853	61 ³ / ₈	61 ¹ / ₂	61 ⁷ / ₈
1854	61 ⁷ / ₈	61 ³ / ₄	61 ¹ / ₂
1855	60 ⁷ / ₈	61 ¹ / ₂	60 ⁷ / ₈
1856	60	61 ¹ / ₄	62 ¹ / ₈
1857	61 ³ / ₄	61 ⁵ / ₈	61 ¹ / ₂
1858	61 ⁵ / ₈	—	—

C 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

在十六、十七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同样,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即货币主义(重商主义不过是它的变种)的创始人宣布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他们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从简单商品流通观点来看,也就是积聚既不蛀又不锈的永恒的财宝。用价格3镑的1吨铁同3镑的金是同样大的价值量这种说法是不能驳倒货币主义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大小,而在于它的最适当的形式。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当作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划分出来,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国民生产大部分还处在封建形式中,还是当作直接的生存源泉为生产者本身服务。产品大部分并不转化为商品,因而也不转化为货币,它们根本不参加总的社会物质变换,因而不表现为一般抽象劳动的化身,实际上不形成资产阶级财富。把货币当作流通的目的,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因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同资产阶级生产的萌芽阶段相适应,那些不被承认的预言家坚持交换价值的坚实的、可以捉摸的和闪闪发光的形式,坚持它同一切特殊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的形式。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是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黄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能要什么有什么。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一封信)——编者注

商品流通的领域。所以他们从这个基本领域的观点来判断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混淆了货币和资本。现代经济学家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这多半是因为这种主义粗野而坦率地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支配。李嘉图曾在什么地方(尽管他是用来达到错误的目的)说过:即使在闹饥荒的时候,输入谷物也不是由于国民挨饿,而是由于谷商要赚钱。因此,政治经济学在批判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时,攻击这种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和完全虚构的理论,不承认它是自己的基本原理的野蛮形式,那是错误的。此外,这种主义不仅在历史上保留着它的权利,而且在现代经济的一定领域中也完全享有它应得的权利。在财富采取商品这个原素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一切阶段上,交换价值采取货币这个原素形式,而在生产过程的一切阶段,财富总是不断有一刹那再回到商品这个一般原素形式。甚至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经济中,金银作为货币的这一特殊职能(不同于其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也没有取消,而只是受到限制。因此,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还保留着它们的权利。金银作为社会劳动的直接化身、因而作为抽象财富的存在而与其他普通商品对立这种旧教式的事实,自然有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教式的 *point d'honneur*〔体面〕,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唯恐染上货币主义的偏见,长期对货币流通现象失去判断能力,下面的叙述就表明这一点。

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货币只是在它作为流通中的结晶体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识;与此相汉,古典经济学把货币首先在它的流动形式上,作为在商品形式变换本身内部产生而又消失的交换价值形式来理解,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此,正如对商品流通单

是从 $W-G-W$ 这一形式来理解,而对这个形式又单单从卖和买的过程中的统一这个形式规定性上来理解一样,对于货币就是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定,而不是从它作为货币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定。如果流通手段本身在它作为铸币的职能上被孤立起来,它就会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转化为价值符号。可是,由于摆在古典经济学面前的,首先是作为流通的支配形式的金属流通,所以它就把金属货币理解为铸币,而把金属铸币理解为单纯的价值符号。于是,按照价值符号的流通规律,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是相反地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这一原理就被提出来了。我们看到,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已经多多少少提到过这种见解,洛克有时加以肯定有时加以否定,而“旁观者”杂志(1711年10月19日的那一期)孟德斯鸠和休谟则明确地把它发挥了。因为休谟是十八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的评论从他开始。

在一定前提下,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的增减,或流通中的价值符号量的增减,对商品价格似乎起着同样的影响。如果商品交换价值借以表现为价格的金银的价值降低或提高,那末,由于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动,商品的价格就提高或降低,而由于价格提高或降低,就有较多或较少的金银作为铸币来流通。但表面现象是,在商品交换价值不变时价格随流通手段量的增减而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流通中价值符号量降到必要水平之下或升到必要水平之上,那末,这个价值符号量就通过商品价格的降低或提高被强制地化为那个必要水平。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是同一原因产生同一结果,休谟就紧紧地抓住了这种表面现象。

要对流通手段量和商品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科学研

究,必须假定货币材料的价值是一定的。相反,休谟所考察的仅仅是贵金属本身的价值发生革命的时代,也就是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时代。自从美洲矿山发现以来随着金属货币量的增加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的提高成为他的学说的历史背景,正如反对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论战构成他的学说的实际动因一样。当然,贵金属的进口在贵金属生产费用不变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增加的。而另一方面,贵金属价值即生产贵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最初只在贵金属进口的增加上表现出来。因此,后来休谟的门徒说,贵金属价值的减少表现为流通手段量的增加,而流通手段量的增加表现为商品价格的提高。然而实际上只有这样的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提高了,这些商品同金银交换时,是把金银当作商品,而不是当作流通手段。这些商品用价值降低了的金银来估计,而一切其他商品则继续以金银的原来生产费用为标准用金银来估计自己的交换价值,对比起来,前者的价格是提高了。这种在同一个国家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双重计算当然只能是暂时的;用金或银表示的各种价格必然会按照交换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彼此拉平,于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最终都会按照货币材料的新价值来估计。这个过程的发展,正如在市场价格波动中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方式和方法一样,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生产还不很发达的时期,这种拉平的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经历了很长的时期,而且无论如何赶不上流通中现金的增加。最近关于十六世纪商品价格变动的批判性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休谟的门徒喜欢引

休谟也承认这一过程是缓慢地进行的,虽然这并不符合他的原理。见 David Hume 《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London, 1777, vol. 1, p. 300 [大卫·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00页]。

用古罗马由于征服马其顿、埃及和小亚细亚而引起价格上涨的事实,这完全是文不对题。古代世界所特有的用暴力把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宝突然从一国运到另一国的现象,某一国家的贵金属生产费用由于单纯的劫掠而暂时降低的现象,并不涉及货币流通的内在规律,正如在罗马免费分配埃及和西西里谷物并不涉及支配谷物价格的一般规律一样。为了仔细研究货币流通,一方面需要可靠的商品价格史,另一方面需要关于流通媒介物的膨胀和紧缩、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等等官方的经常的统计,这样的资料只有在银行业充分发展时才能产生,而休谟同十八世纪的所有其他著作家一样,都缺少这些资料。休谟的流通理论可以归结为下列几条原理:(1)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实在的货币或象征性的货币)。(2)一国中流通着的货币代表国内现有的所有商品。按照代表即货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每个代表所代表的被代表物就有多有少。(3)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降低,或货币的价值就提高。如果货币增加,那末,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货币的价值就降低。

休谟说:“货币过多所造成的物价昂贵,对现存的一切商业都不利,因为它能使较贫的国家在一切国外市场上用低廉的价格与较富的国家竞争……如果我们单就一个国家来看,那末,用来计算或用来代表商品的铸币不论多少,都不会产生任何好的或坏的影响,这就像某个商人不用数码少的阿拉伯记数法而用数码多的罗马记数法记账,并不改变他的账款一样。是的,较大量的货币就像罗马数码一样,反而不方便,无论在保管上或搬运上都更费事。”

参看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1卷第394—400页。

大卫·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第300页。

同上,第303页。

休谟如果真想证明一点什么的话,他应该指明,用一定的记数法时,所用数码的个数不是决定于数值的大小,而是相反地,数值的大小决定于所用数码的个数。的确不错,用价值跌落了的金银来估计或“计算”商品价值是没有好处的,所以,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各个国家都觉得用银计算比用铜计算方便,用金计算又比用银计算方便。随着国家日益富裕,国家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另一方面,休谟忘记了,在用金银计算价值的时候,既不需要“现存的”金,也不需要“现存的”银。在他看来,计算货币和流通手段是一回事,两者都是铸币(coin)。由于价值尺度或执行计算货币职能的贵金属的价值变动使商品的价格提高或降低,从而在流通速度不变时也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或减少,休谟就得出结论说,商品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决定于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在十六、十七世纪,不仅金银的数量增加了,而且它们的生产费用同时减少,这一点是休谟可以从欧洲矿山的停止开采上看到的。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商品价格随着从美洲输入的金银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该国内部存在的金银的数量。这就是休谟的第一个“必然的结论”。在十六、十七世纪,价格的提高与贵金属的增加并不一致;商品价格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显出有一点变动,至于商品交换价值普遍按照金银的降低了的价值来估计,即这一革命掌握所有商品价格,那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因此,休谟完全违背了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把片面观察到的事实不加批判地变成一般原理,得出结论说,商品价格或货币价值不是决定于一国中存在的货币

的绝对数量,而是决定于实际进入流通的金银数量,但是一国中存在的全部金银最后必然作为铸币被流通所吸收。显然,如果金银有自己的价值,那末撇开其他一切流通规律不谈,作为一定商品价值总额的等价物来流通的只能是一定数量的金银。因此,如果一国中偶然存在的任何数量的金银,不顾商品价值总额如何,都必然作为流通手段参加商品交换,那末金银就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因此实际上也就不是真正的商品。这是休谟的第三个“必然的结论”。他使商品不带价格、金银不带价值进入流通过程。因此他从来不谈商品的价值和金的价值,而只谈它们的数量关系。洛克已经说过,金银只有一种想像的或习惯的价值;这是对于货币主义的唯有金银才有真正价值的论断的第一个粗野的对立形式。金银的货币存在完全从它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职能产生,这一点被解释成:金银靠一种社会职能才有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自己的价值量。这样一来,金银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作为商品的代表获得一个虚拟的价值量。它们经过流通过程不是转化为货币,而是转化为价值。它们的这种价值是由它们自己的数量和商品数量之间的比例决定的,因为这两个数量是必定相抵的。因此,一方面休谟让金银以非商品的资格进入商品世界,但是另一方面,一

“显然,与其说价格决定于一国内商品和货币的绝对数量,不如说决定于进入或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和流通着的货币。如果铸币锁在箱子里,那末对于价格来说就好像消灭了一样;如果商品堆在仓库和谷仓里,结果也会相同。既然货币和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相遇,它们也就不会彼此发生作用。结果,总的价格水平同一国中金属货币的新的数量确立了一个正确的比例。”(大卫·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第303、307、308页)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见罗和富兰克林关于金银应该从充当货币的职能中得到追加价值的论点;并见福尔邦奈的著作。”——编者注

且金银在铸币的形式规定性上出现,他又反过来把它们变成一种通过简单物物交换同其他商品交换的单纯商品。现在假定商品世界只由一种单一的商品组成,例如由100万夸特的谷物组成,那末不难想像,如果现存的金有200万盎斯,每夸特谷物就换2盎斯金,如果现存的金有2000万盎斯,每夸特谷物就换20盎斯金,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同现存的货币数量成反比地提高或降低。但是商品世界是由无数不同的使用价值组成的,它们的相对价值无论如何不是由它们的相对数量来决定的。然而,休谟关于一堆商品和一堆金之间的这种交换究竟是怎样想的呢?他满足于空洞模糊的想像,说每一个商品作为商品总量的一个分数同金量中的一个相当分数交换。于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引起的、表现在货币流通中并结晶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的、过程中的商品运动就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幻想的、一国中现存贵金属重量和同时存在的商品数量之间的机械相等。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对铸币和货币的研究是从详细批判休谟和孟德斯鸠开始的。实际上,他是第一个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还是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这个问题的人。虽然,由于他关于价值尺度的奇怪观点、关于一般交换价值的摇摆不定的解释和重商主义的残余,他的阐述模糊不清,但他还是发现了货币的各种基本的形式规定性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因为他不是机械地把商品放在一边和把货币放在另一边,而是事实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在孟德斯鸠那里也见到过这种虚构,连词句都一样。”——编者注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1卷第394页及以下各页。

求是地从商品交换本身的各种因素中来说明货币的各种职能。

“货币在国内流通中的用途可以归结为两个要点：用来支付债务和用来购买所需要的东西；两者合在一起构成对现金的需要(ready money demands)……商业和工业的状况，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开支，这一切加在一起，调节并决定所需现金的数量，即转移的数量。为了实现这各种各样的支付，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货币。这个比例虽然在转移的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又可以依照情况不同而增减……无论如何，一国的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货币。”

“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需求和竞争(demand and competition)的复杂作用决定的，需求和竞争同一国中存在的金银数量完全无关。那末，不需要用作铸币的金银又怎样呢？它们当作贮藏货币积累起来，或当作奢侈品的原料被加工。如果金和银的数量低于流通所需要的水平，人们会用象征性的货币或其他辅助手段来代替金银。如果一个有利的汇率使国内货币过剩，同时又切断了把它运出国外的需要，那末货币常常就会在保险箱里堆积起来，就像躺在矿山里一样无用。”

斯图亚特所发现的第二条规律是以信用为基础的流通回到自己的出发点。最后，他阐明各国利率差异对贵金属在国际输入输出上所起的影响。后面两点同我们所谈的简单流通这个题目相去甚远，在这里只是为了求完全起见才提到它们。象征性的货币或信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2卷第377—379页及以下各页。

同上，第379—380页及以下各页。

“多余的铸币会锁起来，或者制成银器……至于纸币，只要它达到第一个目的，即满足了借钱人的需要，就会回到债务人手里而被实现……因此，不论一国的金属货币增减到什么程度，商品仍然会依照需求和竞争的原则涨跌，而需求和竞争总是决定于那些握有财产或某种可以给付的等价物的人的意图，而决不是决定于他们所拥有的铸币数量……假定它即一国的金属货币量很少，但只要有一种实在财产，只要握有这种财产的人争着要消费，那末，价格将会通过物物交换、象征性的货币、抵销以及其他千百种方法而保持住高

用货币——斯图亚特还没有把货币的这两种形式区分开——能够在国内流通中代替充当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贵金属,但是不能在世界市场上代替它们。因此,纸币是社会的货币(money of the society),而金银是世界的货币(money of the world)。

法的历史学派³⁴所说的“历史”发展的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忘记自己的历史。因此,虽然商品价格对流通手段量的关系这个争论问题,在这半个世纪中一直惊动着议会,在英国为它出版了成千种大大小小的书刊,但是斯图亚特依然是“死狗”,有过于莱辛时代的莫泽斯·门德尔森眼中的斯宾诺莎。连最新的《currency》[“通货”]史家麦克拉伦都把亚当·斯密看作斯图亚特学说的创立

水平……如果这个国家同其他国家有来往,那末,许多商品在本国的价格和在外国的价格之间必然有一个比例,金属货币的突然增减,假定它本来会起提高或降低价格的作用,那末国外竞争就会限制它的作用。”(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1卷第400—401页)“每个国家的流通,必须同生产投入市场的商品的居民的生产活动相适应……因此,如果一国的硬币太少,与提供销售的产业活动的价格不成比例,人们就会想出象征性的货币之类的办法为此创造一个等价物。但是,如果金属货币在比例上超过了产业活动的规模,它就不会使价格提高,也不会进入流通:它将当作贮藏货币堆积起来……一国的货币数量不论比世界上其他部分大多少,留在流通中的只能是同富者的消费和贫者的劳动和产业活动大致成比例的数量”,而这个比例不是决定于“国内实际存在的货币量”。(同上,第403—408页及以下各页)“一切国家都会努力使本国流通所不必要的现金投到货币利息比本国高的国家去。”(同上,第2卷第5页)“欧洲最富的国家就流通中的金属货币而言,可以是最穷的国家。”(同上,第6页)(见阿瑟·杨格对斯图亚特的论战)。[圆括弧中最后一句话是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的注。——编者注]

同上,第2卷第370页。路易·勃朗把只是指国内民族货币的《money of the society》[“社会货币”]变成什么都不是的社会主义货币,于是也就合乎逻辑地使约翰·罗变成社会主义者(见他的“法国革命史”第1卷)。

者,正如把李嘉图看作休谟学说的创立者一样。李嘉图曾使休谟的学说更加完善,而亚当·斯密却只是把斯图亚特的研究成果当作死的事实记录下来。亚当·斯密把他的苏格兰格言“得到了一点,就不难得到许多,但是困难就在于得到这一点”,也用到精神财富上,因而小心翼翼地隐瞒了他实际上借以得到许多的那一点的来源。当明确的表述迫使他同前辈清算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避开了问题的锋芒。在货币理论上就是这样。他偷偷地采用了斯图亚特的理论,说一国中存在的金银一部分转化为铸币,一部分积累起来,在没有银行的国家变成商人准备金,在有信用流通的国家则变成银行准备金,一部分当作贮藏货币用来平衡国际支付,一部分被加工成奢侈品。他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错误地把货币当作单纯的商品。亚当·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乏味的让·巴·萨伊——法国人称他为 prince de la science [科学王子],正如约翰·克利斯托夫·哥特谢德把他的雪恩奈希奉为荷马和彼得罗·阿雷蒂诺把自己称作《terror principum》[“王公的恐怖”]和《lux mundi》[“世界之光”]一样,——郑重其事地把亚当·斯密这个并非完全出于无知而犯的错误奉为信条。亚当·

麦克拉伦“通货史”1858年伦敦版第43页及以下各页。爱国主义使一位死得过早的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尤利乌斯)误认为老毕希是与李嘉图学派对立的权威。可敬的毕希把斯图亚特的精美英语译成汉堡方言,并且尽量用自己的修正损害原文。

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了一个注:“这句话不确切。有些地方亚当·斯密正确地说出了这个规律。”——编者注

因此,在“国富论”中找不到《currency》和《money》,即流通手段和货币之间的区别。亚当·斯密非常熟悉他的休谟和斯图亚特,而老实的麦克拉伦却被他表面的公正所蒙蔽,说:“价格决定于通货数量的理论直到目前还没有引

斯密关于信用货币的观点是独创的而且深刻的,但是,反对重商主义幻想的激烈论战,使他不能客观地理解金属流通的现象。正如在十八世纪古生物学理论中总有一股来自对圣经上洪水传说的批判或拥护的暗流,在十八世纪的一切货币理论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反对货币主义——这个幽灵曾经守护过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摇篮并且还一直把自己的阴影投到立法上——的暗中斗争。

十九世纪对于货币本质的研究,不是直接由金属流通的现象引起的,倒是由银行券流通的现象引起的。回头去研究前者只是为了发现后者的规律。1797年以来英格兰银行停止了银行券兑现,随后许多商品价格上涨,金的造币局价格跌到市场价格以下,银行券特别是从1809年以后贬值,——这一切是议会中党派斗争和议会外理论论战的直接实际原因,两者都很激烈。这次争论的历史背景是:十八世纪的纸币的历史,罗氏银行的破产³⁵,十八世纪初期至中期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地方银行券随价值符号量的增加而产生的贬值;后来独立战争中美国中央政府用法律强制流通的纸币(Continental bills),最后是规模更大的法国阿西涅币的试验。当时英国大部分著作家都把完全遵循另一种规律的银行券流通,同价值符号或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的流通混为一谈;他们借口这种强制流通的现象要用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说明,实际上反而是从前一种现象中抽出后一种现象的规律。我们跳过1800年到1809年间的许多著作家而直接来研究李嘉图,不仅因为他对前辈作了总结,更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而且因为他给予货币理论的形式,直到目前还支配着英国的银行立法。李嘉图同他的前辈一样,

起注意,斯密博士也同洛克先生 洛克的观点是动摇不定的 一样,把金属货币只看成一种商品。”(麦克拉伦“通货史”第44页)

把银行券流通或信用货币流通同单纯的价值符号流通混为一谈。他所依据的事实主要是纸币的贬值和与此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的上涨。美国矿山对休谟的意义,与针线街³⁶纸币印刷厂对李嘉图的意义是相同的,李嘉图本人也曾某处明确地把这两个因素同等看待。他的专门研究货币问题的初期著作正好属于英格兰银行同其反对者进行最激烈争论的时期,站在前者一边的是内阁大臣和主战派,而聚集在后者周围的是议会反对派即辉格党和主和派。这些著作直接是采用了李嘉图观点的1810年金条委员会的著名报告的前身。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虽然认为货币只是一种单纯的价值符号,却被称为《Bullionists》(金条党人),这种怪事不仅是从这个委员会的名称来的,而且是从李嘉图学说本身的内容来的。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重复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但是他从来没有像研究交换价值、利润、地租等等那样研究过货币的本质。

李嘉图像决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首先用物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量来决定金银的价值。金银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用来衡量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因而,一国中流通手段的

David Ricardo 《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notes》, 4 edition London, 1811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第4版](第1版在1809年出版)。此外《Reply to Mr. Bosanquet's prac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report of the bullion committee》London, 1811 [“答博赞克特先生关于金条委员会报告的具体意见”1811年伦敦版]。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第77页：“贵金属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最终决定于取得它们并把它们送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

同上,第77、180、181页。

数量,一方面决定于货币单位价值,另一方面决定于商品交换价值总额。这个数量因支付手段的节约而变更。因此,既然具有一定价值的货币所能够流通的量是有一定的,而它的价值在流通中又只表现在它的量上,那末它的单纯的价值符号如果按照由它的价值所决定的比例来发行,就可以在流通中代替它;并且,

“如果流通中的货币完全由跟它所应代表的金币同值的纸币组成,那它就处于最完善的状态”。

因此,到此为止,李嘉图认为在货币价值已定的前提下,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并且把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看成一定金量的符号,而不像休谟那样看成商品的没有价值的代表。

当李嘉图突然离开了他说明问题的正路而采取了相反的见解时,他立即转向贵金属的国际流通,于是由于引进了无关的观点便使问题混乱不清了。我们现在且跟随他的内在思路,首先撇开一切人为的偶然情况,假定金银矿就处在把贵金属当作货币来流通的国家。那末从李嘉图以上的阐述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如果金的价值已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就决定于商品价格。因而在一定的时候,一国中流通的金量只是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现在假设这个交换价值的总额缩小了,这或者是由于交换价值不变而生产的商品减少了,或者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同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第 421 页:“一国内可以使用的货币量决定于货币的价值。如果单单用金来流通,就只需要单单用银来流通时的十五分之一。”并见 Ricardo:《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cy》London, 1816, p. 8 [李嘉图“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1816 年伦敦版第 8 页],其中说:“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决定于一国流通所需要的量,后者又决定于货币单位的价值、支付量以及履行支付时的节约。”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432、433 页。

一个商品量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变小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假定这个交换价值的总额增大了，这或者是由于在生产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增加了，或者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使同量的或较少量的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流通中金属的已定数量会怎么样呢？如果金之所以成为货币只因为它当作流通手段而流通，如果它同国家所发行的强制流通的纸币一样（李嘉图正是这样想的）非留在流通中不可，那末在前一种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量对金属的交换价值来说是过多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低于它的正常水平。因此，金虽然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却变成一种交换价值比自己低的金属的符号，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变成一种交换价值比自己高的金属的符号。它作为价值符号，在前一种情况下低于自己的实际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高于自己的实际价值（这又是从强制流通的纸币得出的一个抽象）。在前一种情况下，好像商品是用一种价值比金低的金属来估计，在后一种情况下，好像商品是用一种价值比金高的金属来估计。因此，商品价格在一种情况下会提高，在另一种情况下会降低。在这两种情况下，商品价格的运动，即它们的涨跌，都是流通中的金量在与它本身价值相适应的那个水平（也就是由它本身的价值和要流通的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正常数量）上下相对膨胀或相对紧缩的结果。

如果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额不变，但流通中的金量由于矿山没有生产相当的金来补偿流通中磨损了的金铸币而低于正常水平，或者由于矿山中新的供给超过了流通的需要而高于正常水平，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假定金的生产费用或它的价值不变。

现在归纳一下：在商品交换价值已定的情况下，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由货币本身的金属价值决定，流通中的货币就处于正常水平。如果商品交换价值总额减少，或者矿山提供的金增多，流通中货币就超过这个水平，金就跌到它本身的金属价值之下，商品的价格就提高。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总额增加，或者矿山所提供的金不足以补偿被磨损了的金量，流通中货币就紧缩到它的正常水平之下，金就升到它本身的金属价值之上，商品的价格就降低。在这两种情况下，流通中的金是一个价值符号，代表着一个大于或小于它实际包含的价值的价值。它能变成一个它自己的升值或贬值了的符号。一旦商品全都按照货币的这个新价值来估计，一切的商品价格相应地提高或降低，则流通中的金量又将与流通的需要相适应（这是李嘉图特别满意地强调的结论），但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相矛盾，因而与它作为商品对其他商品发生的关系相矛盾。依照李嘉图的交换价值理论，金涨到自己的交换价值以上，即涨到它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以上，就会引起金的生产增加，直到它的供给的增加再把它降到它的正常价值量为止。反过来说，金降到自己的价值以下，就会引起它的生产减少，直到它再提高到它的正常价值量为止。由于这种相反的运动，金的金属价值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价值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流通中的金量的正常水平得到恢复，商品价格水平又同价值尺度相适应。流通中金的价值的这种波动，会对条块形状金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依照假定，所有不用作奢侈品的金，都处在流通中。既然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己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那末显而易见，流通中的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实在价值符合于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

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the aggregate currency consisting of metal and of convertible notes)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而定。从这个观点看来,不可兑纸币胜过可兑纸币的地方只是它可以双重贬值。它跌到它所应该代表的金属的价值之下,可以是因为发行量太大,也可以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金属跌到了金属自己的价值之下。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金的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值,这是李嘉图的主要发现之一;奥维尔斯顿男爵之流利用了这一发现,把它用作 1844 年和 1845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

应该证明的是,商品价格或金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金量。要证明这一点必须先证明:用作货币的贵金属的任何数量,不论与其内在价值成何比例,必定成为流通手段,成为铸币,因而成为流通中商品的价值符号,而不管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如何。换句话说,这个证明就在于抹煞货币除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外的一切其他职能。李嘉图完全受价值符号因它的数量而贬值的现象所支配,当他被逼得很紧的时候就武断了事,例如同博赞克特争论时就是这样。

如果李嘉图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抽象地建立这个理论,而不引进一些具体情况和与本题无关的偶然情节,那末它的空虚是很明显的。然而他给整个阐述涂上了一层国际的色彩。但是不难证明,表面上的规模宏大一点也不改变他的基本思想的渺小。

大卫·李嘉图“答博赞克特先生的具体意见”第 49 页:“商品价格按货币增减的比例而涨跌,我以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因此,他的第一条原理是:当流通中金属货币量决定于流通中商品的用货币的金属价值估计的价值总额时,这个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是正常的。这个原理从国际看就是:在正常的流通情况下,每个国家具有与它的财富和实业相适应的货币量。货币依照它的实际价值或符合它生产费用的价值流通,这就是说,货币在一切国家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货币就不会从一个国家输出或输入到另一个国家。于是,各国的 currencies(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之间就保持平衡。一国的 currency 的正常水平表现为 currencies 的国际平衡,这实际上不过就是说,国别丝毫不改变一般的经济规律。在我们又像前面那样遇到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正常水平是怎样打破的?也就是说,currencies 的国际平衡是怎样打破的?或者说,货币怎么会不再在一切国家中具有同等价值的?最后或者说,它是怎么会不再在每一个国家中保持着它本身的价值的?前面,正常水平的打破是由于流通中的金量在商品价值总额不变时有了增减,或者是由于商品交换价值增减时流通中的货币量不变,现在,国际的、由金属本身价值决定的水平的打破,是由于一国内存在的金量因国内发现新金矿而有了增加,或者是由于个别国家流通中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总额有了增减。前面,贵金属生产的增减是根据 currency 的紧缩或膨胀以及商品价格相应地降低或提高的需要,现在,发生作用的是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输出和输入。如果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4页:“货币将在一切国家具有同等的价值。”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修正了这种说法,但这个修正在这里并不重要。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3—4页。

同上,第4页。

某国的价格上涨,金的价值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跌到它的金属价值之下,那末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的金是贬值了,因而商品价格是提高了。这样,金就会输出,商品就会输入。如果情况相反,结果也就相反。前面,金的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涨跌会继续到金属和商品之间的正常价值比例恢复为止,现在,金的输入或输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涨跌会继续到国际 currencies 的平衡恢复为止。在前一种情况下,仅仅因为金高于或低于自己的价值,金的生产才有增减,现在,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金才在国际间流动。在前一种情况下,金的生产上的每一变动都会影响流通中的金属量,从而影响价格,现在,金的国际间的输入和输出会发生这种影响。一旦金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或流通手段的正常量恢复,那末除了为补偿被磨损了的铸币和满足奢侈品制造业的消费以外,在前一种情况下金就不会继续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金就不会继续输出或输入。由此可见,

“除了由于流通手段量过剩以外,决不会有把金当作商品的等价物来输出的企图或不利的贸易差额”。

好像金的输入和输出始终只是由于流通手段量膨胀到它的正常水平之上或紧缩到这个水平之下而发生的金属的升值或贬值。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在前一情况下金的生产的增减,在后一情况下金的输入和输出,只是因为金量高于或低于它的

《An unfavourable balance of trade never arises but from a redundant currency》(Ricardo, 1 c ., p .11, 12) [“除了由于流通手段过剩以外,决不会有不利的贸易差额”(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 11、12 页)]。

“硬币的输出是由它的价值低引起的,这不是不利的贸易差额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同上,第 14 页)

正常水平,只是因为金涨到高于或跌到低于它的金属价值,因而商品价格太高或太低,那末,每一个这样的运动都起着校正手段的作用,因为它通过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或紧缩使价格再回到它的正常水平,在前一种情况下指金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水平,在后一种情况下指 currencies 的国际水平。换句话说,货币在不同各国流通,只是因为它在每一个国家作为铸币流通。货币只是铸币,所以一国中存在的金量必然进入流通,因而它可以当作它自身的价值符号升到它的价值之上或跌到它的价值之下。于是我们绕了复杂的国际圈子,又幸运地回到成为出发点的那个简单的教条。

李嘉图怎样硬用他的抽象理论解释实际现象,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他断言,在 1800—1820 年间英国常常遇到的荒年里,金的输出并不是因为需要谷物,也不是因为金是货币,因而始终是在世界市场上有效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而是因为同其他商品比较起来金贬值了,从而遇到荒年的国家的 currency 与其他国家的 currencies 相比贬值了。正因为歉收减少了流通中的商品数量,流通中货币的既定数量就超过它的正常水平,因而一切商品的价格上涨。同这种怪论相反,统计材料证明,从 1793 年到最近,每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第 17 页。

同上,第 74、75 页:“由于歉收,英国将处于失去一部分商品因而对流通媒介物的需要量也减少的国家的状态。过去同支付相适应的流通手段现在过多了,而且按照生产减少的比例相对地便宜了。因此,这个金额的输出会使流通手段的价值重新同别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相一致。”他在下面一段话中可笑地把货币和商品、货币和铸币混淆起来:“如果我们设想,英国在遭受歉收以后有必要输入很多谷物,而另一个国家的谷物有多余,但它不需要任何商品,那末毫无疑问,这个国家不会输出自己的谷物来换取商品,但是它也不会输出谷物来换取货币,因为货币不是任何国家绝对需要而只是相对需要的一种商品。”(同上,第 75 页)普希金在他的一首叙事诗中,说他的作品的主人公的父亲怎样也

逢英国遇到荒年的时候,流通手段的现有数量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因此就有并且必须有比从前更多的货币流通。

同样,李嘉图在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³⁷和英国实施封锁令³⁸的时候硬说,英国人向大陆输出金而不输出商品是因为与大陆各国的货币相比英国的货币贬值了,英国的商品价格因而相对地较高,所以不输出商品而输出金是更有利的投机买卖。照他的说法,英国是商品贵而货币贱的市场,而大陆上则是商品贱而货币贵。

有一位英国著作家说:“实际上在过去6年战争期间,我们的工业品和殖民地产品的价格由于大陆封锁的影响低得要命。例如,糖和咖啡在大陆上用金计算的价格比在英国用银行券计算的价格要高三四倍。这是法国化学家发现甜菜糖并用菊苣代替咖啡的时候,同时也是英国农场主试用糖浆和果汁来养育肥牛的时候,是英国占领黑尔郭兰岛,想把它当作堆栈以便于向北欧走私的时候,是英国轻工业品设法绕道土耳其转输德国的时候……几乎全世界的商品都堆在我们的货栈里,死搁在那里,只有少量商品得到一张法国进出口贸易许可证才得救,为了得到这张许可证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付给拿破仑一笔四五万镑的款子。如果商人花这样多的钱去换取一种把商品从昂贵市场运往低廉市场去的自由,那简直是可笑的事情。或者按每磅银行券6辨士买进咖啡,把它送到可以按每磅值金三四先令直接卖出的地方,或者用银行券按每盎斯5镑买进金又把它送到每盎斯值3镑17先令 $10^{1/2}$ 辨士的地方。这两种办法,一个商人显然会选择哪一种呢?因此,把输出金不输出咖啡说成有利的买卖,是荒谬的……当时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不能像在英国那样可以用1盎斯金买到这么多想买的商品。波拿巴经常仔细观察英国价

不懂得商品就是货币。但是,俄罗斯人早就懂得货币就是商品,不但1838—1842年把谷物输入英国这件事,而且他们的全部贸易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参看 Thomas Tooke 《History of prices》[托马斯·图克“价格史”]和 James Wilson, 《Capital, currency and banking》[詹姆斯·威尔逊“资本、通货与银行业”]。(后一著作是1844、1845和1847年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篇论文的翻印。)

目表。只要看见英国金贵而咖啡便宜,他就为他的大陆体系见效感到满意。”

在 1810 年,正是李嘉图最初提出他的货币理论和金条委员会在议会报告中采用了这一理论的时候,英国所有商品的价格与 1808—1809 年相比发生了惨跌,然而金的价值却相应地提高了。农产品则是例外,因为从国外输入遇到障碍,而国内的存量又因歉收大大减少。李嘉图完全不理解贵金属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职能,他 1819 年在上院委员会的发言中竟说:

“只要现金支付一恢复,货币流通一恢复到它的金属水平,金的输出就会完全停止。”

他恰好在 1825 年危机爆发以前去世,那次危机证明他的预言是错误的。李嘉图从事著作活动的时期,是不适宜于观察贵金属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的时期。在大陆体系实施之前,贸易差额几乎总是对英国有利,而在大陆体系实施期间,同欧洲大陆的交易太少了,不足以影响英国的汇率。货币的输送主要是政治性的,而李嘉图对于补助金在英国金的输出中所起的作用看来是一无所知的。

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同时代人中创立学派来崇奉他的政治经济原理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企图根据简单金属流通来说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不想涉及与问题无关的、被李嘉图用来掩饰自己贫乏无力的观点的复杂国际关系,也根本不打算去抨击英格兰银行

James Deacon Hume 《Letters on the corn laws》 London, 1834, p. 29—31 [詹姆斯·迪肯·休谟“关于谷物条例的书信集”1834 年伦敦版第 29—31 页]。

托马斯·图克“价格史”1848 年伦敦版第 110 页。

参看前引威·布莱克“论政府支出的影响”。

的措施。他的主要论点如下：

“货币的价值等于人们用它交换别种物品的比例,或人们在交换一定量的其他物品时所给的货币量。这个比例决定于一国中存在的货币总量。假定一方是一国的全部商品,另一方是一国的全部货币,那末显然,当两方交换时,货币的价值,即货币所交换的商品量,完全决定于货币本身的数量。实际情况完全如此。一国中商品总量并不是一下子同货币总量交换,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而且往往以很少部分在一年中的各个不同时期进行交换。同一块货币今天用在这一次交换,明天又可能用在另一次交换。一部分货币用于交换行为的次数很多,另一部分用的次数很少,第三部分则被贮藏起来,一次也不用于交换。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平均数,就是每块金币在实现同样多次数的交换行为时被用于交换行为的次数。我们随意假定这个平均次数,譬如说是10。如果国内存在的每块货币用于10次购买,那末这就好比货币总块数增加到10倍而每块只用于一次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价值等于货币价值的10倍,等等。反过来说,如果每块货币不是一年用于10次购买,而是货币总量增大为10倍,每块货币只用于一次交换,那末显然,只要这个总量一增加,就会引起其中每块单个的金币的价值按比例地减小。既然假定货币能交换的商品总量不变,那末,货币总量的价值在货币数量增加之后也没有比从前大。假定货币数量增加 $\frac{1}{10}$,那末货币总量的每一部分的价值,譬如1盎斯的价值就必然减少 $\frac{1}{10}$ 。因此,在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的条件下,不论货币总量减少或增加到什么程度,这个总量和总量中每一部分会成反比地减少或增加。显然,这个原理是绝对真理。只要货币价值有了增减而人们能用货币交换的商品数量和流通速度保持不变,这个变动的的原因必然是货币的成比例的增减,而不会是什么别的。如果商品量减少而货币量不变,情形就同货币总量增加一样;反之亦然。流通速度的每一变动也产生类似的变动。流通次数的每一增加产生同货币总量增加一样的结果,流通次数的减少

James Mill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正文中的这段引文译自1823年巴黎出版的伊·特·帕里索的法译本。根据俄文版和英文版这里有“的价值”三字。——译者注

直接引起相反的结果…… 如果年产品中某一部分根本不用于交换,如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这一部分就不计在内。它既然不同货币交换,它对货币来说就等于根本不存在…… 只要货币的增加和减少可以自由发生,一国中存在的货币总量就由贵金属的价值来调整…… 但金银是商品,它们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它们的生产费用,即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

穆勒的全部智慧不外是一套强词夺理的假定。他想证明商品价格或货币价值决定于“一国中现存的货币总量”。如果假定流通中商品的数量和交换价值不变,流通速度不变,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贵金属的价值也不变,同时假定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同一国现存货币量成比例增加或减少,那末这事实上“很明显”,是把应当证明的东西已经假定好了。并且穆勒犯了同休谟一样的错误,认为处在流通中使用价值,而不是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商品,因此,即使我们承认了他的一切“假定”,他的原理还是错误的。流通速度可以不变,贵金属的价值也可以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数量也可以不变,但是随着商品交换价值的变动,商品流通需要的货币量有时就大一些,有时就小一些。穆勒看到了一国中现存的货币一部分在流通,另一部分停留不动这个事实。但是,他却借助于一种十分可笑的平均计算假定一国中存在的全部货币实际上都在流通,虽然实际上看来不是这样。假定某一个国家有 1000 万银塔勒一年流通两次,那末,如果每个塔勒只用于一次购买,就可以有 2000 万在流通。如果一国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银的总额有 1 亿塔勒,那末就可以假定,如果每一块货币 5 年只用于一次购买,这 1 亿就全部可以流通。还可以假定全世界的货币都在汉普斯泰特³⁹一地流通,不过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128—136 页及以下各页。

其中每一部分不是一年流通三次而是 300 万年流通一次。对确定商品价格总额和流通手段量之间的比例来说,一个假定同另一个假定是同等重要的。穆勒认为,对他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把商品直接同流通中现存货币量联系起来,而是同一国每个时期存在的货币的储备总量联系起来。他承认,一国的商品总量“并不是一下子”同货币总量相交换,而是分成不同部分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同货币的不同部分交换。为了排除这个不合适的情况,他就假定这种情况不存在。同时,这种商品和货币直接对立和直接交换的全部观念,是从简单的买和卖的运动中或货币当作购买手段的职能中抽出来的。在货币当作支付手段的运动中,商品和货币同时出现的现象已经消失了。

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 1825 年和 1836 年的大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像休谟那时候的十六、十七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像李嘉图那时候的十八世纪中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方法。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

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货币同一切商品对比起来它的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

以说成货币的相对价值的跌落。两种说法都是叙述现象而不是解释现象。如果我这样提出课题：试说明交替发生的价格的周期性普遍上涨和价格的普遍跌落，或者这样提出课题：试说明货币同商品对比起来它的相对价值的周期性的跌落和上涨，说法虽然不同，但课题并没有改变，正如这一课题从德文译成英文也并不改变一样。因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因为它赋予同义反复以因果关系的外貌。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上涨。反过来问，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上涨？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跌落。可以同样正确地说，价格的周期性的涨跌就是由于价格的周期性的涨跌。课题的提法本身就假定货币的内在价值，即它的由贵金属生产费用所决定的价值不变。如果这个同义反复有超出于同义反复的地方，那是由于它不理解最基本的概念。如果用乙衡量的甲的交换价值跌落，那末我们知道，这可能是由于甲的价值跌落，同样也可能是由于乙的价值上涨。反过来说，如果用乙衡量的甲的交换价值上涨，情形也就相反。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切就好办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性地上涨和跌落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如果有人证实，价格在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时上涨，在流通中的货币增加时跌落，那末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断言，由于流通中的商品量有了某种虽然在统计上完全无从证明的减少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有了虽然

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已经知道，在李嘉图看来，价格的这种普遍波动就是在纯粹的金属流通中也必然发生，但由于涨跌的交替发生而抵销，例如，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商品价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国外输出，商品输出引起货币输入，货币输入再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则相反，那时会输入商品和输出货币。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急剧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金属流通以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作为补救手段，而贵金属是立即当作铸币进入流通的，因此，它们的流进或流出使商品价格跌落或上涨。对商品价格的这种作用，现在必须人为地由银行仿照金属流通规律来进行了。如果金从国外输入，那末这就证明流通中货币不足，货币价值太高，商品价格太低，因而银行券必须同新输入的金成比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须同金的流出国外成比例地从流通中收回。换句话说，必须依照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或依照汇率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不过是铸币，因此所有输入的金都增加着流通中的货币，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的金都减少着铸币，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上的假定在这里变成了实际的试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维尔斯顿男爵（银行家琼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伯思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currency principle》〔“通货原则”〕派著名的著作家，不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 1844 年和 1845 年的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条例把它变成现行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试验之后，

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到研究信用学说时才能加以说明。但是，人们看到：李嘉图把货币在其流动形式上当作流通手段孤立起来的理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贵金属的增减对资产阶级经济起着连货币主义的迷信都从未梦想过的绝对影响。这样一来，称纸币为最完善的货币形式的李嘉图就成了金条党的先知。

在休谟的理论或货币主义的抽象对立物这样发展到了它的最后的结论以后，斯图亚特对于货币的具体观念终于由托马斯·图克恢复了它的权利。图克不是从某种理论中，而是从认真分析1793年到1856年的商品价格史中得出他的原理的。图克在1823年出版的他的“价格史”第一版中还完全受着李嘉图学说的影响，徒劳无益地力图使事实来迁就这一理论。他的“论通货”这本在1825年危机之后出版的小册子，甚至可以看成后来奥维尔斯顿所实际运用的那些观点的第一次系统叙述。可是，对商品价格史的继

在1857年的普遍商业危机爆发之前几个月，下院的一个委员会开会研究1844年和1845年的银行法的效果。这些银行法的理论之父奥维尔斯顿男爵在委员会上的发言中夸口说：“由于严格而及时地奉行了1844年条例的原则，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和十分顺利，货币制度稳固可靠，国家的繁荣毋庸置疑，公众对1844年条例的信任与日俱增。如果委员会还需要什么实际例证来说明条例所依据的原则的健全以及它所已经保证的效益，正确而完善的答复就是：请您看看四周吧；看看国内的贸易现状，看看民众的满意心情，看看社会上各阶级的财富和繁荣；在观察了这一切以后，委员会就能够决定，对于一个取得了这些成果的条例，是否应该干涉它的继续存在。”这是奥维尔斯顿在1857年7月14日的夸口，同年11月12日，内阁却不得不由自己负责宣布停止执行这个奇妙的1844年条例。

图克完全不知道斯图亚特的著作，这从他所著的《History of prices from 1839—1847》, London, 1848[“1839—1847年价格史”1848年伦敦版]中可以看出，书中对货币学说史作了综合的叙述。

续研究使他不得不看到：这个理论所假定的那种价格和流通手段量之间的直接联系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当贵金属的价值不变时，流通手段的膨胀和紧缩始终是价格波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货币流通只是居于第二位的运动；货币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还取得与流通手段这一形式规定性完全不同的其他的形式规定性。图克的精心研究不是属于简单金属流通的领域，而是属于另一个领域，因此这里还不能详细讨论，属于同一流派的威尔逊和富拉顿的研究也一样。所有这些著作家都不是片面地而是从货币的不同要素上来理解货币，可是仅仅注重材料，而无视在这些要素之间或它们同经济范畴的总体系之间的任何生动的联系。因此，他们错误地把不同于流通手段的货币同资本，甚至同商品混淆在一起，虽然另一方面他们有时也不得不承认它同后两者的区别。例如，如果把金

图克的重要著作，除了他的合作者纽马奇用六卷出版的“价格史”以外，是《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e connection of currency with prices etc.》2 edition, London, 1844[“通货原理研究、通货与价格的关系”1844年伦敦第2版]。威尔逊的著作我们已经引过。最后要提到的是 John Fullarton .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 2 edition London, 1845[约翰·富拉顿“论通货的管理”1845年伦敦第2版]。

“应该把当作商品的货币也就是资本和当作流通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图克“通货原理研究”第10页)“人们可以指望，当金银到手的时候，它们能够几乎正确地实现所需要的款项……金银和其他各种商品相比有一种无限的好处……因为到处用它们作货币……契约上规定用来偿还内债外债的通常总不是茶叶、咖啡、糖或靛青，而是铸币；因此，汇款时不论是用指定的铸币，或者用能够在收款地的造币局或市场上立即变成那种铸币的金银条块，对于汇款人总是提供了达到汇款目的的最稳当、最直接和最确实的手段，能避免因无人需要或价格变动而产生的落空的危险。”(富拉顿“论通货的管理”第132、133页)“其他任何物品，金银除外，都可能在数量上或品种上超出它们被送去的那个国家的正常需要。”(图克“通货原理研究”)

运出国外,那末实际上是把资本运出国外,但是如果输出铁、棉花、谷物,简言之,输出任何商品,结果也是一样。两者都是资本,因此它们不是作为资本彼此区别,而是作为货币和商品彼此区别。所以,金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作用并不是从它作为资本的这个形式规定性产生,而是从它作为货币的这个特殊职能产生。同样,当金或代替金的银行券作为支付手段在国内贸易中发挥作用时,它们同时也是资本。但是它们不能由商品形式的资本来代替,这一点譬如说已经由危机十分清楚地证明了。因此,金成为支付手段,是由于它作为货币不同于商品,而不是由于它作为资本的存在。就在资本直接作为资本输出的时候,例如,把一定的价值总额按一定利息贷给国外的时候,还要看市场的情况才能决定这笔资本是用商品的形式还是用金的形式输出,如果用金的形式输出,那末这是由于贵金属作为货币具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形式规定性。一般说来,这些著作家观察货币,不是首先从抽象的形式上,看货币怎样在简单商品流通内部发展和怎样从那正在经历发展过程的商品本身的关系中成长起来。因此,他们经常动摇于同商品对立的货币所具有的抽象的形式规定性和隐藏着像资本、revenue(收入)等等更具体的关系的货币的规定性之间。

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们将在论述资本的第三章即这第一篇的最后部分中加以研究。

卡·马克思

* 意大利的统一问题

像牧童谎报狼来了⁴⁰一样,意大利人一味重复说,“意大利的激昂情绪已经达到顶点,它已经处在革命的边缘”,而欧洲的帝王们又一味空谈“解决意大利问题”,所以如果狼真的来了而没有人发觉,如果真正的革命和全面的欧洲战争突然爆发而使我们感到意外,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1859年的欧洲战云密布,即使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敌对态度和公开的备战不会引起什么后果,意大利人对压迫者的刻骨仇恨随同日益加深的痛苦也并不是不可能爆发为全面的革命的。我们仅仅说“并不是不可能”,是因为长久不能实现的希望使人痛苦,而长久不能证实的预言使人怀疑。然而,如果相信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报纸的报道,那末那不勒斯的舆论便是本国实际情况的 *fac simile*(真实反映),而革命熔岩的奔腾也就不会比老维苏威火山的又一次爆发更加令人吃惊。记者们从教皇国详细地报道了教权主义政府日益严重的滥用职权的情况,并且还谈到,罗马居民深深相信:改革或者改良是不可能实现的,唯一的办法是彻底推翻这个政府,假如不是驻有瑞士、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⁴¹,这个办法也许早就采用了,而且尽管有这些重大的障碍,这种行动还是随时可能采取的。

威尼斯和伦巴第的报道则更加明确,这些报道使我们强烈地

感觉到 1847 年底和 1848 年初在这两个省出现的那些征候⁴²。大家一致抵制奥地利的烟草和工业品,叫民众不到娱乐场所去的呼吁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意大利人有意处处表现出对大公以及所有的奥地利官吏的仇恨,以致忠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贵族阿尔丰梭·帕尔恰公爵不敢当着民众的面向路过的大公妃脱帽致敬;为了惩罚这一行为,大公命令公爵立即离开米兰,这就使得公爵那一阶级的人也同意了普遍的要求:fuori i Tedeschi! (德意志人滚出去!)如果民众情绪的这种无言的表露,再加上民众同兵士之间每天都发生的纠纷——这种纠纷总是由民众挑起的——以及帕维亚大学生的风潮和继之而来的大学的封闭,那末在我们面前就将重新揭开 1848 年来兰五日⁴³的序幕。

虽然我们也相信,意大利不可能永远处于目前这种状况,因为凡事都有个终结,虽然我们知道,整个半岛都在进行积极的组织活动,不过我们暂时还是不能说,这些活动是人民意志的完全自发的表现呢,还是由路易·拿破仑及其同盟者卡富尔伯爵的代理人鼓动起来的。从表面迹象看来,得到法国,可能还得到俄国支持的皮蒙特,企图在今年春季进攻奥地利。从法皇在巴黎接见奥地利大使的情况看来,法皇对许布纳尔先生所代表的政府似乎没有什么友好的愿望⁴⁴;从那样强大的兵力集中在阿尔及利亚这点看来,自然会认为,对奥地利的敌对行动将从进攻奥属意大利各省开始;皮蒙特的战争准备及其官方和半官方报纸每天所登载的近似向奥地利宣战的言论,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国王一有借口就会渡过提契诺河。此外,根据私人的可靠消息,蒙特维多和罗马的英雄加里波

第⁴⁵被召往都灵一说是确实的。卡富尔同他谈了话,把不久即将发生的战争的前景告诉了他,并且说最好能召集和组织志愿军。作为主要当事方面之一的奥地利清楚地表示,它相信这些传说。除了集中在它所属的意大利各省的12万人以外,它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扩充兵力,不久以前它派出了3万人的援军。威尼斯、的里雅斯特等地的防御工事正在扩大和加固;在奥属其他各省已经要求地主和一切有马的人交出马匹,因为骑兵和工兵需要乘骑。奥地利一方面抓紧一切机会准备“以明智的奥地利方式”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又采取措施准备应付可能遭到的失败。对于普鲁士这个在利害关系上正好与奥地利针锋相对的德国的皮蒙特,奥地利至多只能指望它保持中立。奥地利派了泽巴赫男爵到圣彼得堡争取俄国在奥地利遭受侵犯时给予支援,看来他的使命是完全失败了。沙皇在许多方面的意图,以及在并不是最次要的地中海(在那里,他的船只也有了停泊场⁴⁶)问题上的意图,同他在巴黎的旧时的敌人、今日的忠实盟友的计划太相吻合了,因此他不想保护“感恩图报的”奥地利⁴⁷。大家清楚地知道,英国人民对意大利人仇恨 *giogo tedesco* [德意志人的桎梏] 是同情的,因此,不论英国所有的大臣是怎样希望援助奥地利,但是任何一届英国内阁是否敢于这样做,这是使人不能不深表怀疑的。此外,奥地利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坚信,以“滑铁卢的雪耻者”自居的野心家 绝不会放弃他贬低“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⁴⁸的强烈愿望,他虽然不会冒险深入敌巢实行进攻,但却会毫不犹豫地东方向它挑衅,同俄国一起进攻土耳其帝国(尽管这违背他保证土耳其帝国不受侵犯的誓言),这样一来,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他就可以迫使英军的一半兵力在东方战场上作战，而利用瑟堡来牵制英军的另一半兵力，使他们不得不防守本国的海岸而不能调动。因此，奥地利非常惶惑地感到，一旦战争真正爆发，它就只有依靠自己。但是应当指出，为了尽可能减少万一失败时所受的损失，奥地利采取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可以说明它的厚颜无耻的创造才能。在整个威尼斯—伦巴第地区的营房、宫殿、军火库和其他官用建筑物，虽然在营造和维修上曾使意大利人担负了极其繁重的捐税，然而都算是帝国的财产。现在，政府强迫各市政府以特别昂贵的价格把这些建筑物全部收买下来，借口是将来政府不再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财产，而愿意租赁。可是即使奥地利将来还能保持统治权，市政府在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文钱的租金，这至多只能成为一个疑问；而如果奥地利从它在意大利的全部领地或部分领地上被赶了出去，那末它就可以庆幸自己由于想出了这条妙计而把它原来要损失掉的很大一部分财产变成了便于随身携带的现金。此外，有人肯定地说，奥地利正在千方百计地力图说服罗马教皇、那不勒斯国王以及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地那的公爵们像它那样坚决地对人民群众或帝王企图改变意大利现状的一切行为反抗到底。但是谁都没有奥地利那样清楚地知道，它的这些可怜的工具为抗拒人民起义浪潮或外国干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虽然每一个真正的意大利人都渴望着对奥作战，但是我们一点不用怀疑，相当大一部分意大利人认为，法国和皮蒙特所发动的战争，从前景看来，结局至少是可疑的。尽管谁也不会真正相信，罗马的刽子手在某种慈悲感的影响下会变成伦巴第的救主，然而有一小撮人赞成路易·拿破仑把缪拉特扶上那不勒斯王位的计划，并且声称，他们相信路易·拿破仑的意图是把教

皇逐出意大利或将其权力限制在罗马城和罗马近郊平原之内，并且帮助皮蒙特把整个北意大利并入它的版图。其次，还有一派为数不多却是正直的人，他们认为，意大利的王冠引诱着维克多-艾曼努尔，就像它曾引诱过他的父亲一样；他们相信，他焦急地等待着，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拔出剑来夺取意大利的王冠，他将利用法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帮助来达到他的唯一目的——取得这个垂涎已久的宝物。此外，还有人数多得多的一派，他们在受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各省特别是在伦巴第以及在伦巴第侨民中到处都有拥护者，他们并不特别相信皮蒙特国王或皮蒙特君主制度，但还是说：“不管他的目的怎样，皮蒙特毕竟拥有 10 万人的陆军，还有海军、军火库和资金，让他向奥地利挑战吧，我们一定跟他上战场；他如果对事业保持忠诚，那就会得到奖赏；如果辜负了希望，那末在民族中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已经开始的斗争，直到胜利为止。”

与此相反，意大利民族派声称：他们认为，在法国和皮蒙特的庇护下宣布为争取意大利的独立而战是民族的不幸。在他们看来，问题不是像人们所经常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在于摆脱了外国统治的意大利是以共和制政体还是以君主制政体的形式统一起来，而是在于这个办法并不能为意大利人争得意大利，最多也只能以同样残酷的另一个外国压迫代替这一个外国压迫。民族派认为，十二月二日的英雄⁴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军队日益增长的急躁情绪或法国人民带有威胁性的态度的压力之下，是不会进行战争的；一旦被迫切进行战争，他将选择意大利作为战场以便完成他伯父的计划

查理·阿尔伯特。——编者注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把地中海变为“法国的内湖”——,只要把缪拉特扶上不勒斯王位,他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将迫使奥地利接受他的条件,力图完成已经在克里木开始的对1815年条约的报复,因为当时奥地利是迫使法国接受使波拿巴家族受到极大耻辱的条件的一方。民族派认为,皮蒙特只是法国手中的一个工具,并且深信,拿破仑第三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不会再冒险帮助意大利去争取他不许法国获得的那种自由,而会同奥地利媾和,并扼杀意大利人继续进行战争的一切尝试。如果奥地利大体上能守住自己的阵地,那末皮蒙特就不得不满足于将帕尔马和摩地那两个公国并入它现在的版图;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这次战争中失败,那末就会在阿迪杰河媾和,把整个威尼斯省和伦巴第的一部分留在可恨的奥地利人的手中。关于在阿迪杰河媾和一事,民族派断言,皮蒙特和法国已经互相达成默契。虽然民族派相信,一旦发生反对奥地利的民族战争,意大利民族必定胜利,但是他们仍然断言,如果这次战争以拿破仑为鼓舞者,以撒丁国王为独裁者,那末意大利人就不能采取任何步骤来反对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领袖,他们决不能防止外交骗局、投降、签订条约,结果必定是使自己重新戴上枷锁;民族派指出了皮蒙特在1848年对待威尼斯和米兰以及1849年在诺瓦拉的所作所为⁵⁰,并且劝告同胞们从自己不幸地信任了君主的这一事件中吸取沉痛的教训。民族派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把整个半岛组织起来,唤醒民众团结起来作最后的努力,在民众还没有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发起伟大的民族起义的时候暂不进行斗争,因为民族起义在推翻了教皇、炮弹国王之流以后,就有可能利用有关各省的陆

军、海军和军用物资来消灭外来的敌人。他们认为,皮蒙特军队和人民是热心争取意大利自由的战士,因而觉得,只要皮蒙特国王愿意,就完全能够促进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如果他站在反动派一边,那末他们知道,军队和人民是会站在民族事业一边的。如果国王不辜负他的拥护者对他的期望,意大利人很快就会以最鲜明的态度来表示他们的谢意。不管怎样,民族本身是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民族派估计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因此他们并不害怕法国的干涉,因为拿破仑第三自己国内的麻烦事将层出不穷,即使想实现他好大喜功的野心,也无力干涉别国的事务。那末 *chi tocca tocca* (谁先开始呢)?——意大利人这样问道。我们不敢预言是谁最先出现在战场上:是革命者呢,还是正规军。然而,看来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如果这种战争确实不可避免,那我们就由衷地、诚心诚意地希望它能真正而公正地解决意大利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它们就会常常破坏欧洲的和平,从而妨碍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 月 5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1 月 2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41 号

卡·马克思 欧洲战争前景⁵¹

1859年1月11日于巴黎

奥皇对于以“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⁵²的名义从巴黎给他寄来的不平常的新年贺词的回答,以及德行高尚的艾曼努尔在撒丁议会开幕时的讲话,丝毫没有使笼罩着欧洲的害怕会爆发战争的不安气氛消散下去。在一切金融市场的中心,晴雨表都指向“暴风雨”。那不勒斯国王突然变得宽大为怀了,并对俄国抱敌对情绪:他开始整批整批地释放政治犯,驱逐波埃利奥及其拥护者,拒绝为俄国提供亚得利亚海的煤炭基地;在米兰、洛迪、克雷莫纳、布里西亚、贝尔加莫、帕尔马和摩地那,同德国人的争吵和反对政府雪茄烟的消费者的运动正在继续,而在帕维亚,奉政府的命令,大学暂时停课;被召到都灵去的加里波第受命改组志愿军,都灵正在新编一个约有15 000人的猎兵军,而卡萨勒正加紧修筑工事。一个约有3万人的奥地利军团,即一个满额的 corps d'armée〔军〕(第三军)当时大概已经开进了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而拉德茨基学派的将军居莱伯爵,一个具有海瑞的本能的人,已经到达米兰,要从温和的、好心肠的、但懦弱无能的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手中把权柄夺取过来。在法国,军事演习已成为经常现象,皇帝本人对于在文森试验新式火炮一事也表现得十分热心。最后,普鲁士

政府为了扩充常备军并把后备军变为基干部队的附庸,向议院要了一笔款项以后,也实行起它那新自由主义制度⁵³来了。在欧洲的地平线上乌云密布的情况下,伦敦交易所的行市下跌不多,这可能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伦敦交易所通常总是比巴黎和大陆其他各地的金融观象台更准确地表明欧洲社会脉搏跳动的状况。

首先,伦敦交易所中有眼力的观察家们并不反对把拿破仑的新年怪想单纯看做是他们至圣的盟友方面所施展的一种交易所的投机手法。的确,法国的有价证券刚开始下跌,群众便拼命冲进巴力神庙,以能够脱手的随便什么价格赶紧把国家债券以及 *Crédit Mobilier*⁵⁴ 的债券和铁路股票抛售出去。后来,当把赌注押在行市上涨上的一部分投机商垮台以后,由于流传说“通报”⁵⁵将要刊登政府的一篇短评,以冲淡“陛下”对奥地利大使的谈话所产生的印象,1月6日巴黎交易所便立即稍微活跃起来了。这篇短评在1月7日星期五那天果然出现了。于是国家有价证券回升,不少以土伊勒里宫的自己人知名的精明人在那个星期五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些老爷就这样用最赚钱的方法捞回了他们送年礼所花去的钱。在伦敦也曾经策划了类似的阴谋,但是没有得逞,看来并不是由于不列颠的财政能手们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是由于他们暗中控制着某些负责爱丽舍宫的 *menus plaisirs* 的财政管理人。可是,不列颠的有价证券之所以会比较稳定,主要却是由于另外一种对路易-拿破仑不很光彩的、而对欧洲局势则很典型的情况所引起的。没有一个接受忏悔的牧师对悔罪美女心中的隐痛的了解,能够像礼拜堂街、伦巴特街和针钱街⁵⁶的金融生意人对欧洲各国执政

直译是：“小乐趣”；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编者注

者的困难的了解那样清楚。他们知道：俄国需要大约 1 000 万英镑的贷款，法国虽然可以指望预算的收入能够超过支出（人们谈起这种情况时总是用的将来时），但迫切需要钱用；奥地利为了偿付一部分债务，正竭力设法至少弄到 600—800 万英镑；小撒丁正渴望得到贷款，不仅是为了进行新的意大利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偿付它因克里木战争而背上的旧债；在军队出动，血洒沙场，大炮轰鸣以前，帝王们和武士们首先必须从英国的钱包中得到总数达 3 000 万英镑的贷款。但是，要把这些金融业务全部办妥，起码还要拖上两个月；这样一来，不管从军事观点看来怎么样，如果仗非打不可，那也得推延到春天。

可是，如果匆忙作出结论，认为由于好战的恶犬们要依赖爱好和平的资本家们的裁夺来行事，这种依赖性一定会妨碍它们挣脱锁链，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利率勉强达到 $2\frac{1}{2}\%$ 的情况下，在有 4 000 万以上的黄金在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金库中长期搁置不用的情况下，在对商业投机活动普遍失信的情况下，如果恶魔要发放新战争贷款的话，它是能够在几次假意推托和两三次虚伪劝说之后，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售出自己的债券的。

那些可能推迟欧洲战争的情况，也正是促使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况。俄国在亚洲获得一连串外交上的辉煌成就⁵⁷以后，正力图在欧洲重执牛耳。事实上，正如小撒丁的国王的御前演说事先在巴黎受过审查一样，波拿巴（小拿破仑）⁵⁸的新年 *boutade*（厥辞）也只不过是圣彼得堡提出的口号的回音而已。法国和撒丁唯圣彼得堡之命是从，奥地利正处于威胁之中，英国被孤立了起来，普鲁士则动摇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战争，俄国的势力便会占统治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是如此。俄国可能袖手旁观，让法奥在斗争中

互相削弱,最后它就会“减轻”奥地利这个大国的困难,而奥地利现在挡着它的南进去路并阻碍它进行泛斯拉夫主义宣传。俄国政府迟早总要过问的;它的内部困难可能通过国外的战争得到解决,并且依靠战争中的胜利,皇帝的权力就可能粉碎国内的贵族反对派。但是,另一方面,因克里木战争引起的财政负担也将大大增加,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请求贵族的帮助,这样一来贵族便会获得一种攻守两利的新武器,而农民面对着尚未履行的诺言⁵⁹,被一再的延期、连接不断的征兵和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所激怒,可能会被逼得发动起义。至于奥地利,那它是害怕战争的;但是,当然也可能把战争强加于它。波拿巴也很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现在已经到了拿出自己主要的王牌的时候了。Aut Caesar, aut nihil! (或是完全成功,或是彻底失败!) 第二帝国的虚伪的光荣正在迅速消失,而为了重新证明这种闻所未闻的诈骗是真实的,就需要流血。要不是波拿巴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这样一个得益匪浅的角色,要不是现在出现英国被迫保持中立,俄国暗中支持他,皮蒙特承认自己是他的藩臣这些极其有利的情况,波拿巴能够指望获得成功吗? 另一方面,法国的教权派正激烈地反对读神的十字军远征;资产阶级正向他提醒他说过的话:《L'Empire c'est la paix》⁶⁰;英国和普鲁士暂时被迫保持中立这一情况将使得这两个国家在战争进程中能够左右局势的发展,而在伦巴第平原上的任何失败都将为这个假帝国敲起丧钟。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1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47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这被认为是尤利乌斯·凯撒说的话。——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洲的金融恐慌⁶¹

1859年1月13日于巴黎

欧洲交易所中的恐慌情绪还没有安定下来,根据十分审慎的估计,国家有价证券的价值大约下降了3亿元。法国、撒丁和奥地利的国家证券下降5%,这几个国家的铁路股票下跌了15—35%,而伦巴第一威尼斯铁路股票几乎下跌了50%。除了伦敦交易所以外,所有的欧洲交易所现在都深信将会爆发战争。我没有根据来改变不久前我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我深信,路易-拿破仑实际上并不打算打仗,他的想法出不了在外交上战胜奥地利这个圈子,这种外交胜利能使他本人和他的娄罗们即巴黎交易所的冒险家们大发横财。波拿巴派的报刊以及卖身求荣的谣言收集家“比利时独立报”⁶²的大叫大嚷,对战争准备的吹嘘,都十分清楚地证明,问题不在于进行战争,而在于用战争来进行恫吓。现在连伦敦“泰晤士报”⁶³的记者也承认,债务缠身的朝廷奴仆们又可以利用行市的下跌来大肆投机,以前所未见的规模洗劫全法国的“可敬的”投机商和少量有价证券的持有者了。据说,到1月5日为止,仅仅德·莫尔尼伯爵一人在这场交易中就至少赚了200万法郎,而从资产阶

见本卷第186—187页。——编者注

级的荷包落到波拿巴派冒险家们的荷包中去的金钱的总数,一定要比这个数目多许多倍。

促使路易·拿破仑去努力取得意大利的好感并占领对奥地利具有威胁性的阵地的,有三个因素。首先是从巴黎和约⁶⁴签订以来一直把路易·拿破仑当作自己的工具使用的俄国。第二个因素人们不太知道,因为拿破仑和他的宫廷挖空心思地加以掩盖,不让公众看见它,然而这个因素的存在已被证实了。从奥尔西尼行刺以来,在他被处死前后,法国皇帝不断地收到秘密团体意大利烧炭党最高温特的许多信件,因为他在1831年曾经是这个团体的成员⁶⁵。他们提醒他,他加入这个团体时是怎样宣誓的,他怎样违背了这些誓言,以及根据该团体的章程如何惩处这类叛徒。奥尔西尼被捕入狱后,烧炭党人曾警告法皇,如果处死奥尔西尼,对他的行刺活动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成功为止。奥尔西尼被处死以后,路易·拿破仑就收到了温特给他做出的正式死刑判决书。这位迷信很深的走运的冒险家对秘密法庭的这种判决极为震惊。他那虽然不是钢铁般的,但是已经变得迟钝和像鞣革般坚韧的神经(他在赌桌前熬夜的20年中锻炼出来的)经不起这达摩克利斯剑的经常威胁。对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的神秘干预,他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根据不久前皮阿诺里的枪击和奥尔西尼的炸弹,已经有所认识,这种神秘干预恰好能使这样一种人丧魂落魄:他在直接利益的日常政策中看不出历史上的因果联系,而只是看到人类理智无法揣测的、常常把荒谬绝伦的东西奉为最高权力的某种宿命力量在神秘莫测地行动。对于威胁着他的危险的经常恐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作为最近一年来他的统治特点的一连串的明显的重大失策。

事实上,为了逃避这种厄运(因为他相信意大利恐怖分子的万

能,并不亚于相信埃普塞姆赛马场⁶⁶上茨冈女人的占卜),他必须使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大发慈悲。因此,便公布了捏造的奥尔西尼的信件,企图混淆视听,使人们由此得出结论,以为实现意大利人的希望是路易-拿破仑所担负的一种神圣的义务⁶⁷。但是,要使烧炭党人满意并不那么容易:他们仍然不断地提醒被告,说他仍然被判处了死刑,只有立功赎罪才能撤销这种判决。最后,近来他在法国国内的处境大大地尖锐化了。最重要的问题——到哪里去弄钱?——越来越严重地摆在他的面前。已经没有丝毫希望得到贷款,因为近来国债飞速增加,所以根本谈不上这个问题。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和Crédit Foncier⁶⁸,借口兴修灌溉工程、排除沼地积水、植树造林、修筑堤坝去搜刮千百万的金钱,——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做过,不能再做了。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要用的钱越来越多;他本人的挥霍浪费,首先是贪婪的军阀们、官吏们、冒险家们(他不得不每天出钱收买这些人,使他们忠实于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使金钱问题成了他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纯粹从金钱着眼,以发行强制公债、掠夺和向被征服的省份要求军事赔款为前景的战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将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但是,问题不仅在财政方面,而且还在于他在法国的地位总的说来是不巩固的。问题在于意识到,他虽然依靠军队的恩典当上了皇帝,可是他不管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舆论的斗争中都不能越过一定的界限。同时,既然他是依靠军队的恩典当上皇帝的,他就应当执行军队的意旨。由于这一切,他本人以及全世界都早已看得很清楚,一旦出现极端的危险,他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战争,而且是收复莱茵河左岸地区的战争。这场战争并不一定要在莱茵河进行。相反地,上述领土可能在意大利争夺,确切些说,上述领

土的争夺可能在意大利开始 ,就像对这些省份的初次争夺由于波拿巴将军在伦巴第战场上的几次胜仗而完成一样。

这场战争必然是路易·拿破仑的最后一张牌。他会把全部赌注都押在这张牌上 ,他这个老赌棍非常清楚 ,跟他对峙的是多么可怕的力量。他明白 ,不管他以多么神秘的姿态保持沉默 ,全世界还是知道 ,而且从他一上台就知道 ,他的最后一张牌是什么。拿破仑明白 ,他戴着这种斯芬克斯 的假面具在这方面并不能愚弄任何人。他明白 ,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不会容忍法国这样扩张自己的领土 ,而俄国友谊的可靠性 ,几乎像他自己誓言的可靠性一样。他大为发展了路易十五的箴言《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并且知道这将是什么样的洪水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 ,每一小时都是肯定的、不可估价的一笔赢钱 ,用这笔赢钱他可以把赌局拖下去 ,赢得时间和愚弄他周围的那些赌棍。

同时他却根本不是局势的主宰者 :必要性会迫使他比他所希望的时间更早地打出主要的王牌。至少在最近三个月中 ,武装法国的工作会大规模地进行。在大量的老兵归休以后 ,1858 年总共征召了 10 万名新兵 ,而和平时期通常每年只征召 6 万名。一切军火库和兵工厂的紧张工作早在三个月以前就已使最高指挥部的全体成员确信 ,正准备进行一场严重的战争。现在我们得悉 ,各个国营铸造厂接受了制造 75 个炮兵连的用炮或者说 450 门路易·拿破仑的新式火炮(轻型十二磅炮)的订货 ,枪弹已进一步改进(根据米涅的正式继承人奈斯勒的建议改进) ,猎兵营的人数已由 400 人增加到 700 人 ,基干团各营的人数已由 900 或 1 000 人增加到 1 300

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 ,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 ,谁猜不出 ,它就杀掉谁 ;转意是 :不可解的怪物 ,谜样的人。——译者注

人,增加的办法是从后备部队(它是由新兵补充的)调来 6 万左右的人:土伦正储存军用物资,并计划建立两个兵营,地点还不知在哪里。可是,这两个兵营的配置是不难猜到的:一个将在里昂附近,或者偏南,靠近土伦,另一个靠近麦茨,作为对付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⁶⁹的监视军。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在军队中极度地煽起好战情绪,他们满有把握地估计战争必然爆发,甚至军官们都已不再定做便服了,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只能穿军装。

在法国情况是这样,而在皮蒙特,国王早在圣诞节前就已向自己的将军们宣称,要他们做好准备,因为可能在春天来临以前他们就要闻到火药味。他不久前在议会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竟充满了这样多称赞意大利爱国主义的华丽辞藻,并且竭力暗示奥地利的统治是非正义的,以致不禁使人要得出结论:他或者是下定决心打仗,或者就是甘愿让全世界称他为大傻瓜。在伦巴第、罗马和各个大公国都发生了骚动,只有 1848 年大爆发以前的骚动才能与此相比;显然,居民对外国军队公开表示了反抗;他们力求做到:显示对现存政权的极度蔑视,完全相信几个月以后奥地利军队不得不离开意大利。为了回答这一切,奥地利十分沉着地加强它在伦巴第的驻军。这支军队是由 3 个军(第五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组成的,总共有 10 万人左右。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第三军正开来增援。据报道,有 6 个步兵团(30 个营)、4 个提罗耳猎兵营、2 个骑兵团、6 个炮兵连以及第三军的整个参谋部和工程辎重队正在途中,或者已到达伦巴第。这样一来,奥军人数就增加到 13 万或者 14 万。这支军队占据着阿迪杰河和明乔河之间的阵地,至少能够

见本卷第 185 页。——编者注

对付一倍以上的敌人优势兵力的袭击。

可见 ,到处都堆满了易燃物。路易- 拿破仑能不能应付这一切事件呢 ?不能。许多事情是他力所不及的。如果在伦巴第、罗马或哪一个大公国里爆发了战争 ,如果加里波第将军打进紧邻的领土并发动人民举行起义 ,皮蒙特和路易- 拿破仑有办法坚持下去吗 ?既然实质上已经答应让法国军队征服意大利 ,让那里的人把它作为解放者来欢迎 ,而同时奥地利军队又正在践踏意大利起义的发源地 ,那怎么能够要求法国军队稍息 ,枪放下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意大利事件的进程已经不受路易- 拿破仑的意志支配了 ;法国国内事件的进程也随时可能摆脱他的控制。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9年1月13日

载于1859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4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路易·拿破仑的处境

1859年1月26日于巴黎

你们当然已经知道路易·波拿巴的新意大利政策和他对意大利恐怖主义者的栗栗畏惧之间的秘密联系。几天以前,你们或许已在“法国中部报”(可惜这家地方报纸从未越过大西洋)上读到下面这段故事:

“我们提到了上星期一在土伊勒里宫举行的一次舞会。许多巴黎来信向我们报道了一件在这次盛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事情。宾客满堂。不知是因为一位太太晕厥,还是由于别的缘故,出现了一场混乱,三四千来宾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幸,于是惊惶不安。有几个人急忙向御座奔去,皇上为了让人放心,便到各个大厅走了一遍。”

不过,参加上面提到的在 Salle du Trône〔宝殿〕举行的舞会的人大约有两三百人,他们是这一事件的目睹者;而这一事件并不像“法国中部报”所描写的那样。其实,来宾们不知为什么突然在各个大厅里乱窜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涌向 Salle du Trône,这时,路易·波拿巴和欧仁妮便急忙离开御座,穿过大厅,拚命地往出口跑去,并且皇后一边跑,一边勉强提着自己的裙子,面色那样苍白,以致后来她的挚友们说:“她面无人色。”

从奥尔西尼行刺以来,这个篡位者及其伙伴们提心吊胆的不

安状况，酷似柏拉图“理想国”中很有名的一段话：

“暴君甚至不能达到他的基本目的——成为统治者。凡是暴君都是奴隶。他的内心永远充满惊惶，为恐惧和良知的谴责所鞭挞。他日益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即成为受人嫉妒、憎恨和怀疑的人，众叛亲离和不公正的人，一切圣物的敌人和一切邪恶的庇护者与鼓励者。因此暴君是一个最不幸的人。”

波拿巴对奥地利所采取的敌对立场，虽然无疑是为了给不满的军队以采取性质和它现在所执行的警察职务不同的积极行动的某种希望，但是其主要目的终究是为了消除意大利匕首的危害性，并使意大利爱国者确信，皇帝是恪守自己过去的烧炭党人的誓言的。拿破仑亲王，或者如巴黎人所称呼的普隆-普隆将军，同撒丁公主克洛蒂尔达联姻，在全世界看来必然要导致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因此，正如居住在土伊勒里宫的人们想要描述的那样，这应当是波拿巴家族第一次还意大利人的债。然而，你们是了解这位萨托里的英雄⁷⁰的！他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而闻名，但是，他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前进有经常的后退伴随着，而且每当他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就要碰到会使他束手无策的极大的困难。

在发生布伦事件、斯特拉斯堡事件⁷¹和1851年12月1日夜晚的事件⁴⁹这样一些时刻，总有一些厚颜无耻、自以为是和狂热的亡命之徒站在他的背后，不让他再延宕执行他早已想好的计划，而迫使他走向卢比康河。在安然越过卢比康河后，他又照旧搞他惯于搞的狡诈勾当、罪恶诡计、秘谋，照旧犹豫不决和委靡颓丧。他由于虚伪成性，对自己的计划也采取两面手法。例如，这一次和撒

“越过卢比康河”是句成语，即破釜沉舟之意，源出公元前49年，古罗马凯撒不顾禁令，挥师越过卢比康河，引起内战，结果建立了罗马帝国。——译者注

丁结亲的事情,就是8个月以前在一场应由法国领导的意大利十字军远征的借口下策划出来的。在屡次企图置身皇室之列都未得逞之后,竟能在虚伪的借口下把欧洲一个最古老王朝的代表人物的女儿诱入波拿巴家族的罗网,这倒是一种不坏的政治手腕啊!

但是,路易-拿破仑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使他在召唤人们进行战争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响起之后实行 *reculade*(退却)并采取安抚的策略。在他统治的整个期间,资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明显的不满迹象,而资产阶级仅仅由于战争的传闻而引起的惊慌,在交易所、农业市场和工业中心汇成了巨大的震荡。金融巨头们提出了抗议。法兰西银行经理德·日尔明尼伯爵亲自告诉皇帝说,坚持执行危险的政治方针,必然会使全国的商业生活受到震荡。

马赛、波尔多以及其他大商业城市的行政官在报告商业界空前的混乱状况时,突出地暗示了这些“财产和秩序之友”的不忠顺的迹象。梯也尔先生认为这是打破自己的长期沉默,在布满政府密探的沙龙里公开而尖锐地批评土伊勒里宫的“疯狂政策”的良好时机。他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证明说,如果法国在战争初期除驻扎在阿尔及利亚和留守国内的士兵以外不能拥有40万士兵的话,它就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甚至政府的“立宪主义者报”⁷²,虽然用的是假装愤懑的腔调,但也不得不承认,法国的威风凛凛的气焰已经消失了,它像一个胆小鬼似的一想到严重的战争就怕得要命。另一方面,下级密探异口同声地报告,单是法国的专制者打算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这一角色的想法就已引起了居民的嘲笑。而且除了这些嘲笑之外,还起劲地唱着极不恭敬的讥讽与撒丁结亲的歌曲。有一首讽刺歌曲是这样开头的:

“这一次普隆-普隆应该成为玛丽亚·路易莎的丈夫。”⁷³

尽管向所有的行政官发出了旨在安定民心的训令,尽管官方严词驳斥了关于存在什么威胁 *status quo*〔现状〕的危险的谣言,而普遍的混乱远没有平息下去。首先,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有人曾迫使土伊勒里宫的这位半神人走得比他打算的还要远些。据传,克洛蒂尔达公主虽然年轻,但却性格坚强,她在接受普隆-普隆的求婚时说道:“我和您结婚,是为了保证我的父王得到法国的支持。如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信心,我是不会和您结婚的。”当她的父王还没有得到法国给予积极援助的“坚决保证”时,她拒绝订婚。因此,路易·波拿巴应该同维克多·艾曼努尔订立攻守同盟⁷⁴——这是普隆-普隆的代理人力图马上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向全欧洲宣布的事实。这个普隆-普隆及其仆从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在目前充当培尔西尼在布伦远征时以及莫尔尼、弗略里和圣阿尔诺在12月1日夜晚所充当的角色,即把路易·波拿巴抛向卢比康河。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普隆-普隆并没有英勇善战的名声。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物,连一个普通士兵所必须具备的勇敢精神都没有,他甚至连骑马都骑不稳。然而,他现在却是波拿巴王朝的真正的玛尔斯。做伦巴第的准国王,在他看来,是登上法国宝座的一个必经的步骤。他的伙伴们变得这样傲慢,以致在谈到皇帝的意旨时,他们的首领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竟敢当着差不多20个人的面宣称:“你们说的是哪一个皇帝?唯一的真正的皇帝是住在帕勒-乐雅尔宫⁷⁵里的那个。”当政府的报纸装模作样地宣扬和平的时候,普隆-普隆的喉舌“新闻报”⁷⁶却极其冷静地天天鼓吹备战。当路易·波拿巴故作姿态地劝说维克多·艾曼努尔抑制马志尼分子的时候,普隆-普隆却在唆使国王“鼓励他

们”。当波拿巴把像尼耶尔将军这样一些最保守的人派去做他的堂弟到都灵去时的随员时,普隆-普隆为了使自己的 entourage (周围)具有一种革命外观,同意只有在曾任 1848 年法兰西共和国部长的比克西奥先生的陪同下,才肯前往。可是人们却说:“如果路易-拿破仑不准备铤而走险的话,那就再没有什么比普隆-普隆的装腔作势及其伙伴们所发表的文章更危险的了。”这就是顾虑仍然没有消除的原因。另一方面,谁都明白,如果路易-拿破仑慑于法国资产阶级的叫嚣和欧洲各个王朝的反对,而在维克多-艾曼努尔声誉败坏和法国军队的好战狂达到最高峰之后实行退却,这就无异自杀。为了给军队一个 *quid pro quo* (代用品),据说他打算派军队进行一次不管什么样的海外远征——远征摩洛哥、马达加斯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未列入维也纳议定书⁷⁷的遥远的地方。但是,与这个戴皇冠的骗子手的愿望相反,任何一个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同奥地利的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 月 28 日
载于 1859 年 2 月 1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56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法国军队

巴黎“立宪主义者报”不久以前发表了一份材料,想要证明法国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向国外派出 50 万军队。⁷⁸根据昨天“美国信使报”⁷⁹上发表的、盖亚尔德先生从巴黎寄出的那封信来看,这份材料及其所依据的数字是皇帝本人直接交给我们的巴黎同行发表的,事先并没有通知他的任何一个大臣。这份材料的第一点说,如果把所有的归休兵都召回,并且不再让他们归休,那末到今年 4 月 1 日法军将有 568 000 人;如果把 1858 年的全部应当征集的人员都征集入伍,法军人数将再增加 64 000 人;并且一旦宣战,法国政府可以完全有把握地召集服役期满的老年兵作为志愿兵,同时召集年轻的志愿兵,总数至少为 5 万人。这样加在一起就有 682 000 人;按照我们的戴皇冠的统计家的统计,各类军队的人数如下:

步兵	390 978 人	辎重兵	10 120 人
骑兵	830 00 人	近卫军	29 942 人
炮兵	46 450 人	其 他	49 000 人
工兵	121 10 人		
		共 计.....	621 600 人

这个总数少了 6 万人,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皇帝笔下疏忽,忘

了把这6万人归类。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假定682 000人这一数字是正确的。一旦爆发战争,将有10万人作为担任国内警备勤务的后备部队。他们要25 000名宪兵来支援;而在阿尔及利亚,有5万人就足够了。从上述总数中减去这175 000人,还有507 000人。但不知皇帝陛下又把1万人弄到那里去了,他不从682 000人而从672 000人中减去这175 000人,结果野战部队的数量就减少到了497 000人。这样,根据我们这位权威人士的资料,到1859年6月1日,法国不必对军队的现行编制作任何变动,就可以有50万人用于国外作战。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法军实际的编成是怎样的。任何一支军队所采用的现行编制,在某种程度上都限制着扩充军队的能力;各兵种的营和连(步兵营、骑兵连、炮兵连)的人员、马匹和火炮,都不能超过一定数量,否则就会破坏体制,使各兵种失去自己的战术特点。例如,法军步兵营是由8个连编成的,每连通常有兵士118人,要把各连的人数增加一倍,就必须根本改变兵士的基本训练和营训练;同样地,法军炮兵连要把火炮数量由6门增加到8门或12门,就不能不引起类似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步兵连和炮兵连如不分为更小的单位,就会非常臃肿庞大。可见,任何军队的编制都给军队的人数规定了一个限度;如果超过了这一限度,就必须编成新的部队。但是,既然建立一定数量的新的部队就瞒不住社会舆论,既然“立宪主义者报”声称目前还没有必要建立新的部队,那末我们可以用法军在对俄战争80结束时的编制作作为今天法军所能容纳的人数的最大限度。

编制复杂的法军基干营,由6个基干连和2个精兵连组成,其人数未必能超过1 000人。这样,100个基干团,每团3个营,就有

30万人。我们之所以特意把第三营包括在内,是因为第三营虽然一直到对俄战争开始时还只作为后备营,但是以后就编成了基干营,而每团又建立了3个补充后备连,这些连目前无疑还存在。这300个后备连共计约36000人。chasseurs à pied〔猎步兵〕共20个营,它们主要应当以单个连为单位,而不是以整个营为单位进行战斗,每营兵力可能多些,约有1300人;20个营共有26000人,而且它们几乎没有后备部队,因为它们由其他各团得到大量人员的补充。近卫军由2个步兵师组成,一直到同俄国缔结和约时每团都只有2个营,这一数量和“立宪主义者报”的说法是一致的,按照他们的说法,近卫军的步兵将编成18个营,即18000人。上述各部队组成法军的全部步兵,担任非洲勤务的部队不包括在内。担任非洲勤务的部队计有:9个朱阿夫营,共9000人,此外约有500人编为后备连;3个惩戒营(捷菲尔兵),共3000人;9个阿尔及利亚(土著)猎兵营,满额时共有9000人⁸¹。这样,法军步兵各部分的总数如下:

基干部队(包括后备部队在内)——336000人,编为300个营和300个后备连。猎兵——26000人,编为20个营。近卫军——18000人,编为18个营。朱阿夫兵——9500人,编为9个营。捷菲尔兵——3000人,编为3个营。阿尔及利亚土著猎兵——9000人,编为9个营。

共计401500人,编为359个营和300个后备连。

其中有36500人属于后备连,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国国内和国外担任作战勤务的部队有365000人。

据估计,法国骑兵在1856年包括:12个重骑兵团,其中有72个骑兵连(14400人),12个骑兵后备连(1800人);20个基干团,

其中有 120 个骑兵连(24 600 人),20 个骑兵后备连(3 820 人);21 个轻骑兵团,其中有 126 个骑兵连(27 100 人),21 个骑兵后备连(4 230 人);4 个非洲团,其中有 16 个骑兵连(3 000 人),4 个骑兵后备连(450 人);3 个土著团为 12 个骑兵连(3 600 人)。

共计 346 个野战骑兵连(72 700 人)和 57 个骑兵后备连(10 300 人)。此外,还必须加上近卫军骑兵的 30 个野战骑兵连(6 000 人)。

总计 376 个野战骑兵连,共有 78 700 人;57 个骑兵后备连,共有 10 300 人。

然而不应当忘记,法国虽然从 1840 年起在改良马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所产的马仍然很不适于担任骑兵勤务。只是在最近几年作了很大努力,耗费了大批经费之后,法国才得以主要用自己的马匹来装备骑兵,但是情况仍然不很好。而且,这实际说来也只能满足军队平时的需要,即大概不超过 5 万匹马的需要;虽然法国可以用阿尔及利亚马来装备军队,但是仍然必须从国外购买大量马匹,其中有不少是其他国家的骑兵卖出的不适于服役的马匹。目前,法国骑兵的马匹是从德国购买的,而奥地利政府在不久前已禁止经过西南边境输出马匹。由于存在以上这些困难,就不用担心法国骑兵有一天会超过上述数字,而且,如果它不依靠掠夺手段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好马,那末除了装备有阿尔及利亚马匹的人数不多的骑兵部队以外,也不用担心法国骑兵有一天会出色地作战。

炮兵,包括近卫军炮兵在内,可能有 5 万人左右,编成 207 个野炮连,共有 1 242 门火炮。其中至少有 5 000 人编入各炮兵后备连。工兵的数量不会超过 9 000 或 10 000 人,但是我们根据“立宪

主义者报”的说法,将工兵算作 12 000 人。辎重兵、工役连、医务人员等一切非战斗人员,在战时大约有 11 000 人。可见,法军按其现行编制可以容纳的人数最多为:

	战斗部队	后备部队	共计
步兵	36 5000 人	36 500 人	401 500 人
骑兵	78 700 人	10 300 人	89 000 人
炮兵	45 000 人	5 000 人	50 000 人
工兵	12 000 人	—	12 000 人
非战斗人员.....	—	11 000 人	11 000 人
总 计	500 700 人	62 800 人	563 500 人

这一总数,和法军采用通常的补充措施所达到的数量是完全一致的。每年有 10 万青年应征入伍,但是以前在平时实际上编入各团的只有 6 万人,而且因为他们服役期限规定为 7 年,所以军队数量不可能超过 40 万或 42 万人。但是,在路易-菲利浦时代,实际的服役期限很少超过 4—5 年,因此,那时军队的实际数量不超过 30 万人,而其余的都是归休兵。但是,由于从那时起每个步兵团增加了一个营,每个骑兵团增加了一个连,此外还建立了近卫军⁸²,因此军队的编制扩大了许多,军队数量几乎可以增加到 60 万人,除了进行民族防御战争以外,法国在任何时候也未必能同时拥有比这更多的受过训练的兵士。

这样,如果我们把上述数字加上 49 000 名宪兵、市警备队以及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立宪主义者报”为了得出他们所需的总数而加进去的“其他兵力”,那末军队的总数和这家报纸所说的法军到 1859 年 4 月 1 日应有的人数大体是一致的。但是这里开始发生分歧。我们最后得出的总数包括有 300 个步兵后备连和 57 个骑兵

后备连,它们的编制只够容纳本身现有的 46 800 名步兵和骑兵,并对他们进行初步训练。我们假定,这些步兵和骑兵突然编入各团,补上那些服役期满的兵士的位置,而把新兵编入各个后备连,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后备连应当训练多少新兵呢?应当训练 1859 年征召的 10 万新兵以及至少 2 万名未受训练的志愿兵,一共 12 万人,也就是比后备部队所能容纳的数量多 7 万人。这时,无疑地在 4 月 1 日到 6 月 1 日这段期间内每个步兵团的 3 个后备连将扩大为 1 个满额的营,而在每个骑兵团里,骑兵后备连必须由 1 个增加到 2 个。因为如果说现在全军只是担任警备勤务,后备连只不过是新兵的转运站,尚未受过训练或者稍受训练的新兵要尽快地由后备连转到团内去接受训练,那末不应当忘记,在战时,当军队担任战斗勤务时,后备部队就必须充分地装备和训练兵士,使他们在编入各团时就能够担任勤务。由此可见,“立宪主义者报”断言,法军不需要建立新的部队,就可以扩充到 70 万人,这种说法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由 300 个后备连编成 100 个后备营和建立 57 个补充骑兵后备连,就必须在作战部队特别需要军官和军士的时候至少抽调出 2 000 名军官和 1 万名军士。

但是,我们假定法国将征集 70 万人(不过我们完全没有肯定地说法国在战争开始时不能征集这么多青年),那末其中能有多少人能够担任勤务呢?不超过 58 万人,根据“立宪主义者报”的看法,其中 5 万人应当用来驻守阿尔及利亚。宪兵和担任内务勤务的其他部队的数量,我们不应当算 25 000 人,而应当按照“立宪主义者报”最初的统计算 49 000 人。这样,还剩下 481 000 人。然而,我们的戴皇冠的笔友如果认为,保卫王朝可以只依靠 12 万名未受训练的新兵、49 000 名宪兵和其他的军事警察,那末大概是过于相信

自己王朝的稳固了。后备部队要组成除巴黎和里昂以外的其他重镇的守备部队,未必够用。巴黎和里昂这两个城市,路易-拿破仑是无论如何不会交给未受训练的新兵去防守的;虽然“立宪主义者报”认为,有4万人就足够用来扼守这些地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为了这一个目的而使用10万人,也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我们减去守卫法国各大城市以及受保皇派影响的南方地区所必需的10万人,那末法国可以用于国外作战的军队总数将减少到381 000人。其中至少要有181 000人作为监视军,驻守在同比利时、德国和瑞士接壤的边界上,而用来进攻意大利的兵力,就只有20万了。我们肯定地说,在明乔河与阿迪杰河强大阵地上的15万奥军,至少同30万法军和撒丁军队势均力敌,如果真正爆发战争,那末总有一天他们会证明这一点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1月31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2月24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68号

弗·恩格斯 德国的兵力

不久以前,路易-拿破仑把他能用来对付奥地利的兵力吹嘘了一番,于是德国的报纸也发表了一些材料来吹嘘德国在爆发战争时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总的说来很不确凿,也缺少根据,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原始资料和官方文件中搜集一些事实和数字,并且在这里提供给读者。

一旦发生对法战争,奥地利军队无疑比其他各邦用来对法作战的军队强大得多。奥地利的步兵包括 62 个基干团(每团包括 1 个掷弹兵营、4 个基干营和 1 个预备营),共有 310 个野战营和 62 个后备营;14 个边屯团(每团包括 2 个野战营和 1 个预备营),除 1 个独立营外,共有 28 个野战营和 14 个后备营,此外还包括 32 个猎兵营。奥军各营的人数是不一样的,因为每营包括 4—6 个连不等。满额时,奥军步兵人数为:

基干部队	370 000 人
边屯区 ⁸³ 各团	55 000 人
猎兵部队	32 000 人

共 计..... 457000 人(包括后备营在内)

基干团和边屯团装备的是滑膛短铳枪,这种短铳枪的击发机虽然结构特殊,但决不是最完善的,不过这种枪的性能很不错。边

屯团的每个连有 20 枝步枪。32 个猎兵营装备的都是步枪,但是这种枪的射程比法国米涅式步枪或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要近得多。奥地利步兵在各方面都是第一流的,虽然同英国步兵或普鲁士步兵(他们的每个兵士都装备着远射程的步枪)比起来,装备较差是一个不利的条件,但是奥军兵士并不比任何欧洲国家的兵士差。而且如果不算法军的 20 个猎兵营,如果将来法军不改变基干步兵的装备,那末奥军同法军或俄军比起来,也不存在装备差这一劣势。

奥地利骑兵包括 16 个重骑兵团和 24 个轻骑兵团,重骑兵团由 6 个连组成,轻骑兵团由 8 小连组成,此外,每团各有 1 个后备连。重骑兵连在其编成内有 194 人,轻骑兵连有 227 人。这样编成的奥军骑兵团比法军骑兵旅要强。总计奥军有 67 000 名配有骏马的骑兵,而且大部分轻骑兵是由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生来就是骑手的民族组成的。无疑,这 67 000 人比路易·拿破仑所要派出的 81 000 名法国骑兵强。现在,奥地利骑兵无疑是无与伦比的。

炮兵包括 12 个野炮团(每团 13 个八门制炮兵连)、1 个岸防炮团和 1 个包括 20 个连的火箭团,共计 1 248 门火炮、240 个火箭发射管,共有 5 万人。此外,工兵、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约 2 万人。

全部奥军,包括辎重兵和其他人员在内,在平时总共有 58—60 万人。其中通常约有 20 万人是归休兵(目前也是如此),只有 40 万人服现役。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征集入伍的不仅有这 20 万人,还有 12 万预备兵(就是服役 8 年回家后转入 2 年预备役的兵士),如果相信奥地利人的说法,那末所有这些应征人员在 14 天内就可以武装起来。而奥地利帝国的潜在力量决不只限于这些。边

屯区没有预备兵,但那里每一个男子在60岁以前都是兵,随时都可以应征入伍。1848年,这一地区提供的军队在意大利拯救了拉德茨基,同时也就是拯救了奥地利君主国。大家都还记得,这些健壮的斯拉窝尼亚人是怎样被编成了一营又一营而派到意大利去的;顺便提一句,从起义者手中夺回维也纳的那支军队中,就有这样的部队⁸⁴。这一地区在平常的情况下只有55 000人的军队,必要时则可提供20万名兵士。所以,奥地利军队(包括预备兵在内),只要加上边屯区的8万名兵士,就有整整80万人,而随着边屯区各营的陆续编成,还可增加10万人以上。由此可见,奥地利如果有必需的财力的话,它就有足够的兵力单独防守自己的意大利领地,对付法国和皮蒙特联军的袭击。

普鲁士是第二个强国。这个王国的步兵包括:36个基干团和近卫团(共有108个营);9个预备团(共有18个营);加上8个预备营和10个猎兵营,总共有144个营,战时约有15万人。加上第一类后备军116个营,约12万人,一共就有27万人。战时,8个预备营根据36个基干团和近卫团的数量,扩编为36个后备营,而9个预备团以及与其相应的用后备军编成的9个营担任警备勤务;这样,野战部队共有228个营,约23万人。

骑兵包括38个基干团,每团4个连,共152个连,以及第一类后备军的34个骑兵团,136个连,共约49 000人。

炮兵包括9个团(每团11个八门制炮兵连)和担任要塞勤务的4个连,共有792门野炮和2万人。

工兵、辎重兵以及其他部队,共为4万人。

由此可见,普鲁士军队的基干部队和第一类后备军,总共有38万人,其中至少有34万人可以随时出动。第二类后备军没有组

织,它实际上只用来担任要塞勤务。但是一旦发生战争,以步兵和炮兵而言,大约在4个月内可以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而骑兵还不见得能较好地执行野战勤务。但无论如何,可以大胆地估计,第二类后备军有10万或12万人可以代替同样数量的基干部队担任警备勤务。可见,普鲁士能够征集一支50万人的军队;此外,还有大量受过战斗训练的人员,按现行编制无法编入第一类后备军,但可以用来编成新的部队。

由于普鲁士军队规定的服役期限不长(3年),以及整个第一类后备军平均有4—5年不在军队内服役(除了几个很短的时期外),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普鲁士军队的人员质量将不如奥地利军队。但是,普鲁士人很爱好军事,因此只要经过几个星期的军事行动,他们就能成为很好的兵士。普鲁士所担心的,只是战争最初的一两个月。由于军队一大半是由民兵组成的,因此不适于进攻,但是能很出色地进行防御,因为除了瑞士⁸⁵以外,各国都没有像普鲁士这样一支拥有全民武装的军队。在装备方面,整个近卫军以及每个基干团中的1个营,都装备着射程达1000码的新式针发枪,除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外,这种针发枪在射程方面超过了目前军队装备的其他一切火枪。其余的基干部队装备的是普通火枪,但是用极简单的方法按照米涅的原理刻上膛线以后,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和真正的米涅式步枪相差不了多少。第一类后备军在征集入伍后,也装备针发枪。可见,在欧洲,除了英国步兵外,普鲁士步兵的装备是最优良的。

奥地利编成德意志联邦军队的第一、二、三军,普鲁士编成第四、五、六军。巴伐利亚则编成第七军,它有义务按一般编制员额提供36500名兵士,并提供17800名预备兵,共计54300人。但是,

巴伐利亚军队的实有人数要多得多,它一共有 54 个步兵营,54 000 人,56 个骑兵连,9 000 人,火炮 224 门,炮兵 5 600 人,此外还有工兵等等,总共有 72 000 多人,而且服完现役的、年龄在 27 到 40 岁的预备兵还没有计算在内;他们可以编成新的部队。

第八军按编制员额和预备兵员额应有:

维尔腾堡	21 000 人	实有	19 000 人
巴登	15 000 人	实有	15 000 人
黑森-达姆斯塔德...	9 300 人	实有	10 500 人
共 计.....	45 300 人	实有.....	44 500 人

第九军按编制员额和预备兵员额应为 36 000 人,但是实有 44 000 人。

第十军应有 42 000 人,我们假定实有人数与此大致相同。预备师(诸小邦军队的编制员额)约有 17 000 人。这样,得出的总数如下:

奥地利	800 000 人
普鲁士	400 000 人
巴伐利亚	70 000 人
第八军	45 000 人
第九军	44 000 人
第十军	42 000 人
预备师	17 000 人
总 计.....	1418 000 人

在这支庞大的兵力中,后五个组成部分,共 218 000 人,经常处于充分的战斗准备状态,而且这只是有关各邦召回全部归休兵后的平时正规部队。因此,这些邦能够很容易地再提供 10—15 万人,但是因为对这些人员没有进行任何组织,所以同普鲁士第二类

后备军一样,我们根本没有把他们计算在内。毫无疑问,奥地利在两个星期内可以武装起 70 万人。普鲁士征集预备兵(归休兵)所需的时间更少,征集以后,基干部队可以按满员的建制扩充到 225 000 人。所以,在两个星期内,德国可以派出 115 万人,过一个月可以再派出 27 万人。甚至在这以后,德国仍掌握有普鲁士的全部第二类后备军、巴伐利亚的全部预备兵员以及奥地利边屯区约 10 万名兵士。在这些力量全部动用以后,而且也只有在这以后,才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

由此可见,德国所拥有的兵力十分雄厚,只要有统一的坚强的指挥,即使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同时进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能否这样使用军队,当然还是个问题;不过,如果在共同作战中有一些猜忌、犹豫和因循,就会使军队行动困难,以致失败,而现在的德国各邦的政府就可以卷起铺盖,因为它们很快就得逃跑。1859 年的德国不同于巴塞和约时期以及耶拿、奥斯特利茨和瓦格拉姆时期的德国⁸⁶,正如今天的法国不同于 1793 年革命时的法国一样,因为 1848 年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结果,但是毕竟在德国全境各个角落的人民中间激起了民族感情,甚至在过去被指责为亲法分子的那些人中间也激起了民族感情。路易-拿破仑可能还想扮演意大利解放者的角色,但是他在莱茵地区是不敢这样做的;即使他在战争中取得了局部的胜利,那也只能引起德国的革命,这将使他遭到彻底的失败,而革命的影响会使他摇摇欲坠的帝位受到威胁。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2 月 10 日
载于 1859 年 3 月 12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58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

1796年,波拿巴将军下了滨海阿尔卑斯山,在德果、密雷栖摩、蒙特诺特和蒙多维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会战,就夺取了整个皮蒙特和伦巴第。⁸⁷他的军队在进到明乔河以前,一直顺利前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是到了明乔河,形势就根本改变了。曼都亚的城墙挡住了他,而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统帅为了征服这一障碍,竟用了9个月的时间。第一次意大利战争的整个后半期都是为了攻占曼都亚。里沃利、卡斯提奥涅、阿尔科列会战以及经过布兰塔河河谷的进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⁸⁸拿破仑一生有两次为要塞所阻:第一次是在曼都亚,第二次是在但泽⁸⁹。拿破仑很清楚地知道,曼都亚是意大利的锁钥。这个地方,他从占领时起,直到离开帝位时止,就一直没有放弃过;这一时期,他在意大利的统治从来没有遇到过重大的危险。

意大利的地理形势清楚地说明,哪一个强国能够控制北意大利,即罗马人的南阿尔卑斯高卢,它就能统治整个意大利。波河流域总是决定半岛命运的战场。从马利尼亚诺会战和帕维亚会战起,经过都灵、阿尔科列、里沃利、诺维和马连峨等会战,一直到库斯托查和诺瓦拉会战,所有争夺意大利统治权的决战,都正是在这里发生的⁹⁰。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论是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只要能把

对方逐出波河河谷,就能够使对方同狭长的半岛隔绝,并使这个半岛同它的同盟国隔绝。这个半岛是意大利人口最少、文化最低的部分,它如果被迫仅仅依靠本身的资源来维持,很快就不得不屈服。而在这个波河流域,最居中的一个阵地就是曼都亚。它距亚得利亚海和地中海同样远,约为 70 英里;因此,这个阵地如果由野战军来防守,便可以确实封锁半岛的一切入口。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这个阵地处于湖泊之间,并有三个桥头堡供军队进出,而且在四周的地形上有许多纵横交错的河流,能把围攻军队割裂成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曼都亚的这一形势在战术上有巨大的优势;无怪乎古谚说:曼都亚在谁手,意大利归谁有。

这几点就足以说明,纵然奥军仅仅握有曼都亚一地,想把他们赶出意大利,也不是很容易的。当代第一个统帅需要 9 个月来完成的事情,前瑞士炮兵上尉⁹¹在同样期间是做不到的。但是,伦巴第的情况从军事观点来看,从 1796 年以来,甚至从 1848 年以来,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848 年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 1796 年的战争正好相反。1796 年的战争证明了曼都亚在防御战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而 1848 年的战争则证明了曼都亚同培斯克拉、列尼亚哥和维罗那合在一起在进攻战中所具有的作用。从此以后,奥地利参谋部和奥地利军事工程师苦心孤诣、ensemble(同心协力地)从各方面研究并改进了这个出色的阵地——大概是全欧洲最好的阵地,这使他们得到了最大的荣誉。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明乔河是由加尔达湖流入波河的一条很小的河,在夏季有许多地方可以徒涉而过,但是整个说来,它是适于作为防御阵地的。这一线应由培斯克拉算起到博尔戈福特(虽然后者并不在明乔河边),长约 30 英里,因此居中配置的军队能以一

日行程到达这条线的任何一端。这条 30 英里的短线,右方(北方)为加尔达湖和提罗耳阿尔卑斯山脉所掩护,左方为波河所掩护,成为奥军用来抵抗从西方入侵的敌人的第一道有利的防线。但是这并非它唯一的长处。在加尔达湖和明乔河、波河东面 10—30 英里处,几乎与它们平行地流着一条阿迪杰河,形成第二道更为强大的防线,这是在一年四季都只有架了桥才能通过的障碍。我们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条双线使提罗耳和邻近的奥地利各省天然地紧密连成一个整体;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条双线成为这一整体中必要的补充部分。奥地利政策的原則声称明乔河线是德国的防御所必需的,必须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其根据也就在这里。

这个阵地按其天然条件来说已很坚固,再经过人工修筑就更坚固了。明乔河线被曼都亚要塞截为两段。这个要塞离河口非常近,所以要塞下游那一段河流可以完全不必考虑。这样,明乔河线又大约缩短了七八英里;该线的南端由形成两岸桥头堡的第一流要塞所加强。该线的另一端,即河湖相连的地方,有培斯克拉小要塞作掩护。当然,这个要塞不很坚固,并且在 1848 年曾被皮蒙特军队占领过。但是,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偶然的攻击,因此只要奥军进行野战,这一要塞就能守住;同时它保障奥军能到达明乔河西岸。

1815 年以前,阿迪杰河线一直被忽视。从 1797 年到 1809 年,它是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边境线;但是从 1815 年起,奥地利占领了该河两岸。在离曼都亚约 25 英里的地方,在阿迪杰河上有一个小要塞列尼亚哥;然而离培斯克拉最近的城市维罗那当初却没有设防。但是,奥地利人很快就发现,要使这个阵地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使维罗那成为要塞。而他们也就这样做了。不过,

由于奥地利人所特有的办事迟缓的旧习性,他们对完成这个任务极不重视,以致到1848年革命爆发时,虽然阿迪杰河左岸(即东岸)的、可以被用来对付奥地利的工事倒构筑得相当不错,但是朝着敌人的那一岸,相对说来却几乎是没有设防的。

拉德茨基和他的参谋长海斯和雪恩海斯,在被革命逐出米兰以后,就立即开始纠正这个缺点。他们在西面围绕维罗那的高地上构筑了工事,使敌人不能对要塞围墙进行射击。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奥地利的一件幸事。当时,明乔河线被迫放弃。培斯克拉受到了皮蒙特军队的围攻;皮蒙特军队几乎接近了维罗那多面堡的围墙。但是在这里,他们被挡住了。桑塔路其亚会战(1848年5月6日)向他们表明,继续对维罗那防御工事进行任何攻击,都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但是整个北意大利完全为革命军掌握了。拉德茨基除了他的四个要塞(其中,他以维罗那作为自己军队的营垒)以外,已经一无所有。当时,在他的正面前和两侧的地区以及几乎整个后方地区,都为敌人所控制。甚至和提罗耳的交通也受到威胁,有时还被截断。但是,由努根特将军指挥的一个师还是在起义的威尼斯省打开了一条道路,并在5月底与拉德茨基会合。那时,拉德茨基表明,他掌握了这个刚刚为自己筑成的出色的阵地,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由于在这个搜括一空的维罗那四郊再也无法养活自己的军队,由于兵力过于薄弱不能进行决战,拉德茨基便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巧妙的侧敌行军,把自己的军队经过列尼亚哥转移到曼都亚;然后,在敌人尚未弄清真相以前,拉德茨基又由曼都亚向前推进,到明乔河西岸攻击敌人;他把敌人的封锁线向后压缩,使皮蒙特的主力军不得不撤离维罗那。然而他无力防止培斯克拉的陷落。在取得了向

曼都亚的进军所预期的一切战果以后,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军队,经由列尼亚哥向维琴察出发,并从意大利军队手中夺回了该城;于是,他便控制了大陆上的整个威尼斯地区,恢复了自己的交通线,并得到了自己后方广大富饶地区的资源;此后,拉德茨基又重新退入他的要塞维罗那,但是,皮蒙特军队对于把奥军逐出维罗那这一点已经完全失望,以致无所事事地消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正在这时,奥军3个强大的旅开到了,于是局势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3天的时间内,拉德茨基肃清了阿迪杰河和明乔河之间的高地上的皮蒙特军队,同时在曼都亚附近迂回皮蒙特军队的右翼,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在退到提契诺河彼岸之前,一直没有作任何抵抗。

拉德茨基进行的这个战局说明,一个将军,即使他的兵力比敌人薄弱,只要依靠防御得很好的河网体系,就可以扭转局势。无论皮蒙特军队在什么地方或者想把战线转到哪一方面,他们总是无法攻击奥军,并且,他们在最后失败前的5个星期内的混乱行动显然说明,他们处于怎样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那末,拉德茨基阵地的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说,这些要塞的作用在于它们不仅掩护拉德茨基的军队不受攻击,而且还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拉德茨基却可以在要塞掩护下,集中兵力在任何一点上,来对抗当面的那一部分敌军。培斯克拉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敌军,拉德茨基在维罗那的时候,曼都亚则牵制了另外一部分敌军,而当拉德茨基刚刚前往曼都亚时,维罗那又迫使意大利军队留下一个军来监视它。不仅如此,皮蒙特军队还不得不以分散的部队在西岸地区行动,并且这些部队中没有一个可以迅速支援其他部队,而拉德茨基却能够凭借他的要塞和桥头堡任意把他的全部军队从河这岸转移

到河那岸。如果皮蒙特军队能够支援维琴察和威尼斯省,那末这些地方是决不会丢失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拉德茨基攻占了这两地,而皮蒙特军队却被维罗那和曼都亚的守军牵制住了。

在阿尔及利亚,当法军纵队需要通过敌人的地区时⁹²,他们编成四个步兵方队,使这些方队居于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四角,而骑兵和炮兵则在中间。如果阿拉伯人来进攻,步兵便以坚决的火力击退他们,一当进攻者陷入混乱,骑兵立即冲到他们中间,这时,火炮卸下前车,以便对他们进行射击。骑兵如果被击退,就可以在步兵方队后面得到可靠的掩护。对于同优势敌军作战的军队来说,要塞体系,特别是设在河网中的要塞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正如成密集队形的步兵对于这些非正规的紊乱部队作战时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维罗那、曼都亚、培斯克拉和列尼亚哥形成方队的四个角,只要其中的三个没有被敌人占领,那末就不可能迫使较弱的军队放弃它的阵地。但是怎样才能攻占这些要塞呢?如果奥军无力进行野战,培斯克拉的确随时都是容易被攻克的,而曼都亚,在1848年敌军甚至没有企图对它进行封锁,更不用说围攻了。封锁曼都亚需要三路军队:一路在明乔河西岸,一路在东岸,这两路军队用来围攻,第三路军队则用来对付维罗那的奥军,以掩护围攻。但是,奥军如果在河流和要塞之间进行巧妙的机动,就可以用全部兵力 *ad libitum* [任意]攻击这三路军队中任何一路。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进行围攻呢?仅仅一个曼都亚,波拿巴将军经过9个月的努力才用围困的方法夺取了它,那末在依托于维罗那、列尼亚哥和培斯克拉各要塞的军队的支援下(这支军队能够在明乔河或者阿迪杰河两岸集中兵力,进行机动,同时他们的退路也绝不会被截断,因为他们有两条交通线,一条经过提罗耳,另一条经过威尼斯省),曼都亚会比以前

强大多少呢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这个阵地是欧洲最强大的阵地之一 ,并且因为奥地利人不仅在那里构筑了足够的工事 ,而且也完全了解它的意义 ,所以我们认为 ,配置在这个阵地上的 15 万奥军 ,是用不着害怕数量比他们多一倍的敌军的。

然而我们假定他们被逐出这个阵地 ,假定他们丢失了曼都亚、培斯科拉和列尼亚哥 ,但只要他们握有维罗那 ,并且没有被完全逐出野战阵地 ,他们就可以使得任何一支法军向的里雅斯特和向维也纳的进军成为非常冒险的行动。奥军一方面守住维罗那作为前哨阵地 ,一方面可以退到提罗耳补充人员 ,再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一部分敌军将围攻维罗那 ,另一部分必须防守阿迪杰河谷 ;这样一来 ,敌人是否还有足够的兵力向维也纳进军呢 ? 即使有的话 ,提罗耳的军队也可以经过布兰塔河谷(波拿巴将军在 1796 年曾使奥军接受了一次极其惨痛的教训 ,因此他们了解到布兰塔河在战略上的意义)来袭击他们。但是如果奥军没有其他部队防卫直接通往德国的道路 ,这样的做法就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奥军把主力调到提罗耳阿尔卑斯山 ,敌人也仍然能绕过该地 ,并在奥军走出山地以前到达维也纳。但是我们假定维也纳已经设防(我们估计 ,这一工作正在进行) ,那末这种考虑就不存在了。奥地利军队会及时赶到 ,来为维也纳解围 ,并且只要扼守住阿尔卑斯山 ,就能保卫克伦地亚边境 ,从而威胁入侵军队的左翼 ,使他们担心在巴萨诺附近或者在科涅利安诺附近遭受袭击 ,担心在通过该地区后交通线立刻会被截断。

附带说一下 ,奥地利人借口明乔河线是德国南方的自然疆界 ,企图以此证明他们侵占意大利是有理由的 ,而德国南方疆界这样的间接防御正好驳斥了这种论调。如果情况真如这种论调所说的

那样,那末莱茵河就应当是法国的自然疆界。在一种场合有效的一切论据,在另一场合也可能完全适用。但是,幸而法国既不需要莱茵河,德国也不需要波河或者明乔河。谁要从翼侧迂回别人,他也会被别人迂回。威尼斯省可以从翼侧威胁提罗耳,而提罗耳则可以威胁整个意大利。直通米兰的博尔米奥山口,可以用来为进攻的里雅斯特和格腊迪斯卡的敌人准备第二个马连峨,这恰恰就和大圣伯纳德山口对于向瓦尔河一线进攻的梅拉斯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⁹³。归根到底,在战争中,谁能够更持久、更成功地进行野战,谁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胜利。让德国紧紧握有提罗耳吧,那样,它便完全可以让意大利在平原上为所欲为。只要德军能够进行野战,威尼斯省是否在政治上从属于德国,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军事观点看来,德国的阿尔卑斯山疆界控制着威尼斯省,这对于德国说来,应当是足够了。

当然,这纯粹是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当法国插手,情形便不同了,如果法国以全力来干涉,交战的每一方当然都会尽可能保卫自己的阵地。德国将会放弃明乔河线以及阿迪杰河线,但是只有把它们让给意大利而不是让给其他国家,它才能够放弃它们。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是研究了奥军方面采取防御战的前途。但是如果发生战争,那末他们的处境将迫使他们采取进攻战的计划。关于这个题目,我们在下一篇文章里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2 月中
载于 1859 年 3 月 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57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1859年2月25日于伦敦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工厂视察员们公布了关于他们各自的视察区到1858年10月31日为止定期的半年报告,我也照例把我对这些极端重要的工业通报⁹⁴的简评寄给你们。综合报告这一次压缩得只有几行字,它仅仅指出,除了苏格兰一地而外,工厂主违反关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工作时间,特别是他们吃饭时间的法律的事件,确实急剧地增加了。因此,视察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坚决要求颁布一个补充法令来取缔这些违法行为。

他们说:“工厂立法的缺点使视察员及其助理极难执行揭发和惩处违反工厂立法的人的任务,而且极难实现本立法有关限制工作时间、保证工人们在一天中有充分的可能来休息和吃东西等极其重要的事情的确切意图。因此有必要对各项法律做某些修改。如果议会预料到,有人会这样规避法律,它就一定会事先做出相应的决定,以防止这种情况。”

因为我认真地研究了产生现行工厂法的热烈的议会辩论,所以,我不赞同工厂视察员们的结论,并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制定工厂法的明显意图,就是使人有一切可能去违反和回避这些法律。促使这些法律产生的土地占有者和工厂主之间的强烈敌意,终究由于这两个统治阶级对那些他们称之为“黎民百姓”的人

的共同仇恨而缓和了。同时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向那些不顾万能的阶级利益,以道义上的英勇气概、顽强的毅力和出众的智力起来保护被压迫群众的不列颠工厂视察员表示敬意。在我们这个普遍崇拜玛门的时代,这样的人是不可多得的。

第一篇报告的作者是莱昂纳德·霍纳先生,他的视察区包括英格兰的工业中心,即整个郎卡郡、柴郡和得比郡的一部分、约克郡西区和北区以及英格兰北部的四个郡。因为工厂法现在还在受到工厂主方面的毫不调和的反对,而且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争取废除这些法律的议会运动,所以,霍纳先生一开始就维护一项使童工和女工摆脱无情的自由贸易法的无限控制的立法。官方的经济学家们宣称,工厂立法是与一切合理的“原则”相矛盾的,其后果对工业无疑将是十分有害的。霍纳先生回答第一种反对意见时说:

“因为在一切工厂中大笔固定资本都投到厂房和机器上去了,所以机器工作的时数越多,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不言而喻,如果完成这种工作对人没有害处,也就不会从立法上对这种事情进行任何干涉了。但是,已经发现,为了使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童工、男女未成年工和女工每天工作时间过长,而且常常加夜班,这种现象根本不能保持他们的健康,同道德、儿童教育、正常生活完全不能相容,使人根本不能合理地享受丝毫的生活乐趣,所以,道德原则最起码的要求促使立法机关取缔这种极其不良的现象。”

换言之,霍纳先生说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在经济学家和他从理论上代表的那些阶级看来,随便什么原则,不仅是违反人类良心一切准则的原则,而且像毒瘤一样吮吸整代人的生命液那样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原则。至于那些工厂法的反对者借口说什么这些工厂法阻碍着工业的发展,霍纳先生举出事实来反驳他们的空谈。在根据下院 1835 年 3 月 19 日的决议出版的一个报告中,这个视察区的工厂数和在厂里做工的

人数为：

	工厂数目	在厂里做工的人数
棉纺职业.....	775	132 898
毛纺职业和精梳毛纺职业.....	220	8 738
亚麻.....	60	3 546
丝绸.....	23	5 445
共 计.....	1 078	150 627

在 1857 年 2 月提交下院的一个报告中,数字是这样的：

	工厂数目	在厂里做工的人数
棉纺职业.....	1 535	271 423
毛纺职业和精梳毛纺职业.....	181	18 909
亚麻.....	49	6 738
丝绸.....	46	10 583
共 计.....	1 811	307 653

这两个统计表的资料表明,在 22 年中棉纺织厂几乎增加了一倍,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毛纺织业和精梳毛纺织业中工厂数目大大减少,而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证明资本在积聚,小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工厂排挤掉了。在亚麻生产中也可以看见同样的过程,只是规模比较小些。丝绸工厂数目增加了一倍,在厂里做工的人数也几乎增加了一倍。

霍纳先生指出：“但是,工业的进步并不是限于工厂数目的增加,因为对各种机器实行的重大改进大大地提高了机器的生产力。”

这里重要的关键是,这些改进(特别是有关在一定时间内大大增加机器速度的问题)的动因无疑地是由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所提供的。

霍纳先生说：“这些革新和工人有可能更认真工作的情况，产生了我有机会不止一次肯定过的一种结果，即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

就在霍纳先生的视察区，自从工业状况在不久以前得到了改善以来，愈来愈经常地发生蓄意和自觉违反限制工作时间的各项规定的事件和违反关于工人年龄和从 8—13 岁的童工（法律规定，他们的工作时间应该减半）上学的各项规定的事件。报告说：

“一些工厂主迷恋于增加利润，在他们的道德规范中违反议会决议并不是犯罪，他们的盘算是，就算他们的行为被揭露而被课以任何数量的罚款，那在他们由于不遵守法律规定而赚得的利润中也只占很小一部分。”

要了解这个在历次报告中一再提出的平常的控诉，首先必须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是工厂主或他们的亲属，其次，法律规定的罚款是很少的，最后，只是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未成年工和女工才被认为是在工作。可是，霍纳先生说：

“对于不诚实的工厂主来说，再也没有比提出反证更容易的了。为此，他只要在视察员刚一出现的时候关上他的蒸汽机就行了，那时全部工作都会停止；在每一次报告中，视察员都要证明，控诉中所提到的人是真正在工作时被发现的。刚开始非法的工作（这在一天不同时间里要发生六次，因为一天的工时总数是由许多小部分组成的）就派人出去望哨，只要视察员一来，就马上发出信号，关上机器，叫工人离开工厂。”

助理视察员只有采用正派人所厌恶的警探手法，才能抓到罪证。由于视察员及其助理在他们的视察区里很快就被别人熟识了，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发现最狡猾的违法者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只剩下一个唯一的办法——求助于他们邻区的同行，这些同行由于被误认为是前来办货的外地商人，才能逃过工厂主设在各个火车站上的密探的眼睛。

下述这份霍纳先生视察区在半年内工业生产中的伤亡通报一定会使那些研究军事科学的人感到兴趣,他们会相信,以人体的各个部分,例如手、手臂、骨骼、脚、头部和面部作为奉献给现代工业的经常贡品,超过了许多被认为是流血最多的战役中的伤亡。

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

伤害的种类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工		总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	4	—	3	1	2	—	9	1
截断右臂或右手.....	2	—	1	—	—	—	3	—
截断左臂或左手.....	2	—	1	1	1	—	4	1
截断右手的一部分.....	8	19	14	14	6	4	28	37
截断左手的一部分.....	14	14	8	12	5	3	27	29
四肢和身体骨折.....	18	4	10	4	3	3	31	11
手或脚骨折.....	26	27	23	19	8	9	57	55
头、面部受伤.....	11	16	12	13	7	1	30	30
裂伤、碰伤和上列伤亡以外的其他损伤.....	146	97	122	138	33	35	301	270
共 计.....	231	177	194	202	65	55	490	434

非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

伤害的种类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工		总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事件.....	3	1	—	—	—	—	3	1
头、面部受伤.....	2	—	1	—	—	—	3	—
裂伤、碰伤和上列伤亡以外的其他损伤.....	3	2	4	2	—	1	7	5
共 计.....	8	3	5	2	—	1	13	6

第二篇报告是约翰·金凯德爵士写的,其中包括了全苏格兰的资料;正如他指出的,在苏格兰,调整工厂中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劳动的各项法律,仍然得到严格的遵守。这种情况并不包括关于童工的学校教育的规定,因为苏格兰的工厂主显然有一种惯用的手段,能够使他们的年幼的工人从专门为发文凭而建立的学校中得到文凭,童工根本不到这些学校去上课,即使有人去上课,那里也根本不能对童工进行什么教育。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举出两件事来就够了。1858年,约翰·金凯德爵士在助理视察员坎伯尔先生陪同下,访问了两所学校,在格拉斯哥的几个印花工厂做工的童工通常是从这两所学校获得文凭的。报告中说:

“第一所学校属于布里季顿的斯密斯小巷的安·基林女士;我们去访问时,校舍里没有儿童;当我们请基林女士按字母说出她的姓来时,她就手足无措地先说了一个《C》,但马上更正说,她的姓的头一个字母是《K》。但是,我察看她在儿童文凭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并不是始终都写得一样的,而且她的笔迹证明,她根本没有能力教书,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记课堂日志。我访问的第二所学校属于考尔顿的朗德列西街的威廉·洛古,他发的文凭我也认为有责任说是无效的。校舍长约15英尺、宽10英尺,我们数了一下,这个校舍中共有75个儿童,他们在那里大声乱叫乱嚷。我请教师给我叫出几个儿童的名字来,根据他来回环视那群儿童的神情,我了解到,他不知道哪个儿童来上课了,哪个没有来。”

实际上,工厂法有关教学的条款虽然要求童工要有上学的证明,但是,并没有要求童工从那里得到什么知识。

在苏格兰,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是237起,其中男工58起,女工179起;其他不幸事故只有10起。需要做截除手术的不幸事故的数目在增加,轻伤事故也在增加;但是,不同的是受害者大都是1858年下半年就业的工人。死亡事故只有一起。根据苏格兰西部各区助理视察员的报告看来,1857年停业的一些棉纺织厂还没有

复工, 时兴的印花布生产全年的开工情况也萎靡不振。约翰·金凯德爵士从东部地区得到的最新报告说, 丹第和阿布罗思有些工厂由于不久前破了产和其他原因, 已经停工, 其他几个被认为是充分开工的工厂, 也有许多机器没有开动; 报告说,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生产过剩, 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运来的亚麻比往常少, 以及由此引起的原料价格的昂贵。平常在厂里做工的人数减少了, 可以看出, 亚麻厂主们实际上已经企图在萧条现象尚在继续的时候把工厂开工的时间缩减到每周 42 小时。另一方面, 在那些生产毛织品的地区, 特别是制造“芬格兰呢”的地区, 在这个日益扩大的生产部门, 在哈里季、加拉希耳兹、塞耳克尔克等地, 却出现十分兴旺的复苏景象, 而且一切工业部门都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 只有手纺织业是例外, 由于机器纺织机数量的增加, 手纺织业正逐渐衰落, 很快就会完全消失。

约翰·金凯德爵士提出了下面这个统计表来说明 1835 年到 1857 年这 20 年中, 苏格兰工厂工业各部门的变化情况:

年 份	工 厂	工 人 人 数		
		男 工	女 工	总 计
1835.....	各种棉纺织厂	10 529	22 051	32 580
1857.....	159	7 609	27 089	34 698
	152			
1835.....	毛 纺 织 厂	1 712	1 793	3 505
1857.....	90	4 942	4 338	9280
	196			
1835.....	亚 麻 厂	3 392	10 017	13 409
1857.....	170	8 331	23 391	31 722
	168			

关于其他两篇报告,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再作评述,尤其因为罗伯特·贝克先生的报告中包含有会使任何国家的工业家感兴趣的

材料。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2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3 月 1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58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 取胜的可能性

最热心拥护和平的朋友们,对保持欧洲和平开始失去了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他们现在不再谈论和解的可能性,而在谈论将要交战的双方取胜的可能性。因此,让我们继续从军事观点来研究一下波河河谷的特点,以及这一河谷能够给彼此对峙的法国-撒丁联军和奥地利军队提供哪些作战条件。

我们已经叙述了奥军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坚强阵地。现在谈谈另一方面。大体从西向东流的波河有一个大河湾,它从西北向东南流约 16 英里,然后又折向东流。这个河湾位于撒丁境内,距奥地利边境约 25 英里。由阿尔卑斯山向南流的塞齐亚河在这个河湾的北端流入波河,而从亚平宁山向北流的博尔米达河则在河湾的南端流入波河。无数小河在上述两河与主流汇合处附近流入这两条河,因此在地图上看来,这两条河以西的地区是一片宽广的河网地区,这些河流都是起源于呈半圆形从三面环抱皮蒙特的山脉,并且流向一个共同的中心,好像是从圆周引到圆心的许多半径。皮蒙特这一有利的防御阵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对于这一阵地,拿破仑

早就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不论拿破仑还是接替法国统治这一地区的撒丁政府都忽视了这一阵地,一直到1849年撒丁遭到惨败后才开始在这里构筑防御工事。但是甚至在那时,防御工事也是构筑得非常缓慢,而且在用钱方面极其吝啬,以致到目前这一工程还没有完成,并且那些本来应当有石砌内岸和外岸的防御工事,现在为了在今春能够完工,也筑成了简单的野战工事。

在塞齐亚河和波河汇合外以西约4英里,在波河上有一个卡萨勒城,它设有防御工事并且还在继续加固中,目的是使它成为阵地北翼(即左翼)防御的基础。在塔纳罗河和博尔米达河汇合处,也就是在博尔米达河和波河汇合处上游8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皮蒙特最强大的要塞亚历山大里亚,现在这一要塞已成为掩护整个阵地南翼(即右翼)的巨大营垒的中心。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为16英里,并且波河又有连接这两个城市的道路平行,距道路约5—6英里。配置在这个阵地上的军队,左翼既有塞齐亚河掩护,又有卡萨勒和波河掩护,而右翼则有亚历山大里亚以及在该城附近汇合的奥尔巴河、博尔米达河、贝尔博河和塔纳罗河掩护。阵地的正面有波河河湾作掩护。

如果撒丁在这个阵地上集中8—9万人的一支军队,那末它便有5万人可以进行积极行动,来袭击那些企图在南面诺维和阿库伊附近或者在北面韦尔切利附近迂回这个阵地的任何军队的翼侧。因此可以认为,都灵也受到这个阵地的很好的掩护,而且,这个首都都有一个城砦,要占领它,必须预先进行正规的围攻,但是,如果不预先把皮蒙特军队逐出营垒,那末迂回这个阵地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进行围攻。然而,卡萨勒—亚历山大里亚阵地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纵深,而且它的后方又完全没有掩护。奥军在明乔

河和阿迪杰河之间有一个四边形要塞区,四个角上各有一个要塞作掩护,而皮蒙特军队在波河和博尔米达河上的一条防线,只是两翼各有一个要塞作掩护,正面有很好的防御,但他们的后方却是完全暴露的。由南面迂回亚历山大里亚是冒险的,并且作用较小;但是却可以由北面迂回卡萨勒,即使在韦尔切利附近不能迂回,那末至少可以在塞斯托-卡兰德、诺瓦拉、比耶拉、桑提亚和克列申丁诺附近进行迂回。如果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在卡萨勒以西渡过波河,并攻击皮蒙特军队的后方,皮蒙特军队将不得不立即放弃坚固的筑垒阵地这一有利条件,而在平地上应战。这种情形将是马连峨会战的重演,不同之处只是在博尔米达河的另一岸而已。

这样,我们叙述了波河流域的两个作战基地——在前一篇文章中叙述了奥军的基地,在本文以上各段中则叙述了法国—皮蒙特联军的基地,——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如何利用这些基地的问题。展开地图,我们首先看到,属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整个东北部分,也就是由日内瓦到距离斯特尔维奥山口不到1英里的地方,将成为中立地区,一直到交战的一方认为有必要破坏这个中立的时候为止。由于目前瑞士人正在聚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来进行防御,所以在战争一开始时这种中立马上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在目前,我们把瑞士看作是真正中立的、双方不可侵入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法军进入皮蒙特的道路只有四条。里昂军团将经过萨瓦和蒙塞尼山口。较小的部队可以通过布里昂松和蒙热涅夫尔山口;这两支兵力都将通过阿尔卑斯山,在都灵会合。集中在普罗凡斯的军团,一部分可以由土伦通过尼斯和田达山口,一部分可以在土伦乘船用短得多的时间到达热那亚。这两部分军队的集中地点是亚历山大里亚。虽然在这里还有其他几条道路,但是这

些道路不是不便于大的部队通过,便是在通往上述集中地点的各条道路中只有比较次要的意义。

法国的意大利军团(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这样称呼它),已根据上述形势配置好了。军队的两个主要集中地点是里昂和土伦;小部队集中在这两地之间的罗尼河河谷,准备经由布里昂松出动。为了迅速地把一支强大的法军集中在波河河谷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地区,的确需要利用上述所有的道路,这时,最大的部队将通过里昂和蒙塞尼山口,较小的部队将通过布里昂松和蒙热涅夫尔,在普罗凡斯的军团则应当把尽可能多的兵力由海道运到热那亚,因为从瓦尔山口经过田达山口前进的军队,到亚历山大里亚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而取道海路,则可以在24小时内由土伦到达热那亚,由此再经过3天强行军或者4天正常行军,就可以到达亚历山大里亚。

如果我们假定(而实际上可能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法国步兵营进入皮蒙特,奥地利就会立即宣战,那末请问,奥地利的意大利军团可能采取哪一种行动呢?他们可能留在伦巴第按兵不动,静待20万法军和5万皮蒙特军队集中,然后放弃整个伦巴第,在敌人面前退到他们在明乔河上的作战基地。这种行动会使奥军意志沮丧,而使他们的敌人因为轻易取得意外的胜利而士气昂扬。或者奥军可能在伦巴第开阔的平原上等待法军和皮蒙特军队的进攻。在这种场合下,因为他们只有12万人来对抗数量上多一倍的敌军,所以会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击败,并且还会因为意大利人在全国各地举行起义而处于困境。固然,奥军可以勉强到达他们的要塞,但是这个强大的作战基地将只能用来进行没有成果的防御,因为野战军的进攻力量在这时已消耗殆尽。在增援部队由奥地利内

地赶来以前,这个要塞体系的最重要的作用——使比较薄弱的军队利用它作为基地,有掩护地向比较强大的军队进行有效的攻击——就完全不能发挥了;而在这一期间,培斯克拉可能陷落,列尼亚哥也可能陷落,经过威尼斯省的交通线也必定会被截断。上述两种作战方法都是不利的,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能采用。但是,奥军还有一着棋可以走。

奥军至少可以出动 12 万人。如果他们很好地选择战机,那末和他们对抗的仅仅会有 9 万皮蒙特军队,并且其中只有 5 万人可以参加作战。法军正沿着四条都是通往亚历山大里亚的道路前进。在这四条道路之间,也就是在蒙塞尼山口到亚历山大里亚的一线与热那亚到亚历山大里亚的一线之间,总共约有 140 度的角度;因此,法军各个集团在尚未集中之前是谈不上相互协同的。如果奥军能够很好地选择战机(我们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曾经看到他们善于做到这一点),从正面攻击皮蒙特军队的作战基地,或者由北面迂回它,那末我们就敢断言,即使皮蒙特军队发挥了应有的勇敢精神,他们也很少可能经受住奥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当皮蒙特军队在野战中被逐退而不得不只进行消极的要塞防御战时,奥军便能在法军各个集团从阿尔卑斯山或者亚平宁山走出时,以优势兵力逐个地攻击他们。纵然奥军被迫退却,只要瑞士保持中立,奥军的北翼就有掩护,退却也是有保障的,并且奥军在到达曼都亚以后仍然能在自己的作战基地进行积极的攻势防御。

奥军另一个可能的作战方法是:在托尔托纳郊区占领阵地,等待法军纵队由热那亚向亚历山大里亚进发,因为这时它必然要在奥军面前暴露自己的翼侧。但是,这个进攻方法是非常不高明的,因为法军也许会安然地停留在热那亚,一直等到其他的纵队集中

在亚历山大里亚为止,到那时,奥军不仅会完全失掉一切优势,而且与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通道也可能被切断。

我们假定,奥军被击败而不得不退到他们的作战基地;但是法军一进到米兰以东,也可能为奥军所迂回。经由斯特尔维奥山口来的道路从提罗耳沿阿达河河谷直通米兰;经由托纳列山口来的道路沿奥利奥河河谷、经由朱迪卡里耶来的道路则沿基泽河河谷通到伦巴第的中心,通到从西方攻击明乔河的任何一支军队的后方。奥军经过提罗耳,可以迂回整个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并且如果有必要的准备,奥军在任何一天都可以在伦巴第平原上给敌人造成新的马连峨。只要瑞士保持中立,敌人是无法施用同样的军事计谋来对付进攻皮蒙特的奥军的。

因此,在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下,奥地利最好的作战方法就是进攻。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敌军之间,是拿破仑善于巧妙使用的、现代战争中最出色的有效战法之一。而且正是在同奥军作战中,拿破仑最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战法;蒙特诺特、密雷栖摩、蒙多维和德果等会战⁸⁷便证明了这一点,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会战⁹⁵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奥军在索马康帕尼亚⁹⁶和库斯托查,尤其是在诺瓦拉,显然表明他们已从拿破仑那里学会了这个战法。因此,这样的战法在目前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最适合的;虽然采取这一战法必须极其慎重,并且必须准确掌握作战的时间,但是,如果奥军仅限于单纯防御他们的领土,那末终究会错过极好的胜利机会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2 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3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8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⁹⁷

1859年3月1日于伦敦

迪斯累里先生在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向下院透露了政府的议会改革法案的秘密。这个法案可以简略地叫做洛克·金先生法案,因为这个法案规定把各郡的选民选举资格限制由50英镑降低到10英镑。⁹⁸这种降低在某种程度上被抵销了,因为居住在有权选派代表参加议会的各城市中的有40先令收入的自由农⁹⁹在各郡中都被剥夺了投票权;而且这个法案也被斑驳杂陈的一大堆难以理解的选举特权装饰着;这些特权一方面总的说来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它们也只会加强现存的阶级垄断。关于让大多数人民参加选举、对一切选区权利平等、保证秘密投票这些重要问题,甚至没有提到。我对这个法案的评语是确切的,这可以从对法案基本原则的下列简要叙述中得到证明,这些基本原则就是:应该为各郡和各城市的租赁者制定一种统一的选举法;换句话说,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中规定各郡的租地者的财产资格限制为50英镑的契安多斯的条文应该取消¹⁰⁰。不动产租赁者的选举法适用于各种不动产,不管这种不动产是否包括建筑物。根据纽马奇先生估计,在各郡实行10英镑的财产资格限制,将使各郡选民人数增加103 000人,而迪斯累里先生认为,各郡选民将增加20万。另一方

面,40先令的自由农名义上照旧都有选举权,但是,居住在城市中的、由于自己占有自由土地在此以前一直在各郡享有投票权的40先令的自由农,现在却失去了这种权利,因为他们必须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投票。这样一来,大约有10万选票将从各郡转移到城市,同时,大约有4万名(甚至可能更多)不是经常居住在各郡的选民的权力完全被剥夺了。这就是新法案的实质。它用一只手夺去了另一只手给予各郡选举权的东西,它所特别关心的是,要彻底消除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城市通过购买40先令的自由农的土地而对各郡选举所起的影响。迪斯累里先生在议会提出法案时所做的长篇演说中,想竭力证明,最近15年来,40先令的自由土地已由各城市广泛地建立了工厂,以致:

“各郡不住在郡里的选民人数,目前已超过了根据关于租赁者选举权的条文进行投票的选民人数”,结果在选举那天,“一些大城市就会乘铁路之便把城市里的选民大批运往各郡,仅仅某一个城市俱乐部的成员人数就会在数量上压到经常居住在郡里的选民”。

为了维护各郡的利益,布莱特先生对这位绅士的演说作了有力的回答:

“您的目的是还要进一步限制各郡的选举权。看来,你最害怕不过的就是那些积极的选区,特别是各郡的那些积极的选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各郡选民人数都没有增加,而且有很多郡甚至还减少了。纽马奇先生指出,有11个郡,在1837—1852年这15年中,选民人数减少了2000人以上,但是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有投票权的总人数在这15年中却增加了36000人,其中17000人以上都是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西区增加的。在英国的其他地区,购买自由土地是如此困难,农场的规模扩充得这样大,结果总的说来,各郡的选民人数,几乎不是没有变化,就是必定减少了。”

现在我们放下各个郡来谈谈小城市吧,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新的难以理解的选举特权,这些特权部分地是从 1852 年和 1854 年约翰·罗素勋爵提出的两个未获通过的法案¹⁰¹中抄来的,部分地也应该归功于费尽心机想出矛盾百出的倒霉的印度法案的埃伦伯勒勋爵的天才¹⁰²。在这些特权中,首先有所谓教育优惠条件,正如迪斯累里先生讽刺地指出的,这些教育优惠条件虽然不以某一学科为转移,但是这意味着各有关阶级的教育“要求耗费相当多的金钱”,因此可以归入合乎财产资格限制的总的一类。根据这种优惠条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英国教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团体的教士、律师、私法律师和公证人、辩护士和法院代诉人、医生、领有执照的教师,总之,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或者法国人在基佐先生时代通常称之为“贤者”的人,都享有选举权。因为这些“贤者”有很大一部分已作为有 10 英镑收入的契约农¹⁰³而享有选举权了,所以这条规定虽然可能助长教权派的影响,但未必能使选民人数增加多少。其他重新实行的选举优惠条件给予了:(1)每周交房租 8 先令或每年交房租 20 英镑的房屋住户和租户,不论其房屋有没有家具;(2)持有国家证券或无期公债、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或银行股票等动产每年可以得到 20 英镑收入的人,或者由于在陆军、海军或民政机关长期服务现在已经不再供职而每年可以领到 20 英镑抚恤金或津贴的人;(3)在储蓄所有 60 英镑存款的存户。

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新的选举优惠条件,虽然使资产阶级中又有几部分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蓄意不让工人阶级参加选举,使工人阶级仍旧处于目前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迪斯累里先生不慎地这样称呼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的地位。所有反对政府的人,从约翰·布莱特先生到约翰·罗素勋爵,都强调

指出,新改革法案的这一点是最使人反对的,可以说这是在下院发言的反对派的一个新的特点。迪斯累里先生本人宣称:

“1831年提出选举改革法案的时候,大家都承认,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在立法机关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

约翰·罗素勋爵说:“爵士,您知道吗,从我反对把1832年的法律看做是极限的时候起,我持这一观点是根据一个我认为唯一足以破坏广泛而复杂的协议的事实,即有大量完全应该有选举权的人被排斥在选举之外,而且这些人都属于我们国家的劳动阶级。”

罗巴克先生说:“1832年的法案是要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如果没有劳动阶级参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选举改革法案。工人的表现使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英国资产阶级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为了我国的劳动阶级,现在我要向资产阶级呼吁。”

布莱特先生说:“如果我能够设想,英国的劳动阶级会甘心让别人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像迪斯累里的法案所做的那样,那我一定会极端鄙视他们,更正确些说,我不仅会鄙视他们而且会对他们失去任何信心。”

把劳动阶级排斥在选民之外,同时又剥夺居住在城市的自由农的选举权,这是向目前的议会改革法案及其起草人发起进攻的战斗号召。同时,由于沃尔波尔先生和汉利先生退出内阁而显露出来的,因为契安多斯的条文被取消而引起的政府阵营内部的分歧,绝不会有助于加强他们的防御手段。

至于法案的其他条款,它们的意义是比较小的。没有一个有权选派议员的城市,是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而且还新设了15个席位,其中约克郡西区将得到4个,南郎卡郡将得到2个,密多塞克斯将得到2个;同时,有7个议会中的新席位将分别给予7个不久以前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即哈特耳普耳、伯肯海德、合并了的西布罗姆威奇和温斯柏利、贝恩利、海利布里奇、克劳伊登和格累夫森德。为了给这些新添的议员腾出席位来,有15个人口不超过6000

人的小城市选派的议员人数,要从 2 名减为 1 名。这就是应该实现对一切选区“权利平等”的比例。

在拥有 200 名选民以上的每一个或几个教区都应当设立选民点,新设置的选民点的费用由各郡负担。为了同秘密投票的拥护者取得妥协,不愿在进行选举的地方投票的选民,可以用发给选民的选票进行选举;而且选民要用挂号信把选票寄回给选举委员,在挂号信上签名时须有两个证人在场,其中一个必须是房东;信应该由特别委托的人在投票那一天开启。最后,这个法案对各郡选民的登记制度作了某些改进。除了“泰晤士报”和政府的机关报¹⁰⁴以外,伦敦没有一家报纸对这一法案的成功寄予任何希望¹⁰⁵。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3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8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1859年3月4日于伦敦

今天我打算概述一下前面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两个工厂报告。第一个是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编写的,他的工厂区包括密多塞克斯(伦敦及其近郊),萨雷,艾塞克斯,柴郡、得比郡、郎卡郡的一部分,以及东区(约克郡)。半年来——到1858年10月31日为止——在这个厂区共发生331件因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其中有12件是死亡事故。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几乎只提到了一点,即关于印花工厂及其他工厂的童工的教育问题的规定。在招收童工或未成年工到印花工厂或其他工厂做长期工之前,雇主必须得到分教区医师的证明书。根据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第七年颁布的法律第十五章附则A¹⁰⁶的规定,凡申请检查身体的人

“如果不具有最起码的力气和一般8岁儿童的外貌,而青少年如果不具有至少13岁的外貌,或者因疾病和体力孱弱以致这些年轻人不能在法律允许的时间内每天在工厂工作”,

分教区医师应该拒绝发给证明书。

8—13岁的儿童按照法律被认为是不适宜全天工作的,他们

见本卷第228页。——编者注

应当用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去上学,而且医生有权只发给他们工作半日的证明书。从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中可看出,一方面,当家长们能为自己的孩子获得全工作日的工资时,他们总是尽量设法不让他们的孩子进学校和获得半份工资,另一方面,对于工厂主来说,孩子只作为能够完成这种或那种工作的一种体力而使他们感到兴趣,当家长们得到全工作日工资时,工厂主也得到了全日工作的工人。下面这则刊登在雷德格雷夫先生工厂区中巨大工厂中心的报纸上的广告,令人震惊地想起贩卖奴隶的手段;它表明工厂主是如何履行法律的规定。广告上径直这样说:

“兹征求 12—20 名男孩,其外貌起码要像 13 岁……工资每周 4 先令。”

依据法律规定,雇主实际上不必要求某种有可靠根据的关于儿童年龄的证明书;对他来说只要按照儿童的外貌来判断他的年龄就够了。半日工作制所依据的原则是,如果儿童在工厂工作的同时没有每天上学,就不应允许童工劳动。这种制度由于两种原因遭到了工厂主们的反对。他们不愿意对半日工作者(13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上学这点负责,并且认为使用一班童工代替两班轮流工作 6 小时的童工比较便宜和省事。因此,实行半日工作制的第一个结果是 13 岁以下在厂童工名义上几乎缩减了一半,从 1835 年的 56 455 人降低到 1838 年的 29 283 人。但是,这种缩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有名无实,因为签发证明书的分教区医师的效劳使联合王国幼年工人的相应年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随着签发证明书的医生受到工厂视察员及其助理的较严格的监视,随着根据出生登记表查明儿童实在年龄的可能性的增长,1838 年以后开始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动。13 岁以下的童工的人数又从 29 283 人(1838 年在

厂工作的童工曾下降到这个数目)上升到 1850 年的 36 122 人和 1856 年的 46 071 人,况且最近发表的官方报告书远没有反映出使用童工劳动的真正规模。一方面,很多签发证明书的医师仍然能巧妙地躲过视察员的警戒,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儿童辍学,并由于有关丝织厂的法律的改变¹⁰⁷在 11 岁就就已经不再受半日工作制的束缚了。

正如一个工厂视察员所说的:“这是可能供奉给工厂主的一种牺牲品,但这种牺牲品对丝织工业区的社会福利是有害的。”

虽然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现在在联合王国印花工厂及其他工厂工作的 8—13 岁童工的人数超过了 1835 年从事同样工作的童工的人数,然而无可怀疑的是,半日工作制在刺激发明代替童工劳动的办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雷德格雷夫先生这样声称:

“现在有一类工厂主——毛纺织厂的厂主——事实上很少使用 13 岁以下的即做半个工作日的童工的劳动。他们采用了各种类型的经过改良的和新的机器,这些机器完全消除了使用童工劳动的必要性。为了说明参加生产的童工人数缩减的情形,我可以举一个生产过程为例:由于把一种称为捻线机的装置和目前使用的机器连接起来了,6 个或 4 个——视每台机器的特点而定——做半个工作日的童工的劳动仅需一个未成年工就能完成了。”

现代工业(至少在那些现代工业早就发达的国家里)迫使童工寻找工钱的情况达到了什么程度,这在不久前普鲁士的例子中再次得到了明显的说明。1853 年普鲁士工厂法规定,从 1855 年 7 月 1 日起,任何一个未满 12 岁的儿童都不得进工厂工作,12—14 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6 小时,每天至少要有 3 小时去上学。这项法律遭到了工厂主们的强烈反对,以致政府不得不实行让

步,不再在普鲁士各地普遍施行,而只在两个紧相毗连并有大批从事纺纱、印制花布等工作的工厂居民的工业城市爱北斐特和巴门试行。爱北斐特和巴门贸易局 1856 年年度总结中就这一问题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如下的报告:

“工资的提高,同煤价和一切为这些工业部门所必需的材料,如皮革、油脂、金属等价格的上涨一样,对于生产非常不利。除此以外,严格实行 1853 年 5 月 1 日颁布的关于在工厂中使用童工劳动的法律也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使相当数量的童工离开生产,而且也使他们失去了受到能把他们培养成熟练工人的早期训练的机会。某些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这些幼年工人,机器停止开动了,因为使用成年工来管理这些机器不合算。我们建议修改一下上述法律,缩短达到一定知识水平的儿童必需上学的时间,这是一种对无数家庭和工厂主都有利的办法。”

最近的一份由爱尔兰视察员贝克先生写的工厂报告,着重对造成不幸事故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对一般生产状况作了评述。谈到前一个问题时,贝克先生确定:每 340 名工人中就有一件不幸事故,同到 4 月份为止的半年相比增长了 21%,而在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中(只有 10%的不幸事故与机器无关),有将近 40%的事故只消稍微破费一点钱本来是可以避免和预防的,但是

“由于不久前修改了法律,现在是很难增加费用了,因为单靠规劝是不起作用的”。

贝克先生断定说,生产状况改善了,但在他看来,

“在很多情况下重又达到了最高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工厂工业将逐渐变得愈来愈无利可图,直到它完全不再成其为工厂工业”。

他公正地把原料价格和工厂制成品价格之间的对比的变化列为同增加机器设备一起引起景气周期和不景气周期互相更替的主要原因之一。贝克先生举出精梳毛纺织业方面的变化作为例子:

“在精梳毛纺织业有利可图的年份,即 1849 年和 1850 年,梳整好的英国羊毛的价格每磅是 1 先令 1 辨士,而澳洲羊毛的价格则波动在每磅 1 先令 2 辨士和 1 先令 5 辨士之间。在 10 年——从 1841 年到 1850 年,包括上述两年在内——中,英国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未超过每磅 1 先令 2 辨士,而澳洲羊毛的价格却超过了每磅 1 先令 5 辨士。在倒霉的 1857 年初,澳洲羊毛的价格起初是 1 先令 11 辨士,以后在恐慌达到最高点的 12 月份,跌到 1 先令 6 辨士,然而后来在 1858 年间又逐渐回升到 1 先令 9 辨士;与此同时英国羊毛的价格起初是 1 先令 8 辨士,1857 年 4 月和 9 月上涨到 1 先令 9 辨士,1858 年 1 月又跌到 1 先令 2 辨士;从那以后它又上涨到 1 先令 5 辨士,这和上述 10 年的平均价格相较每磅增加了 3 辨士。这证明,不是忘记了 1857 年这种价格所引起的破产,就是生产出来的羊毛只是勉强够维持现有加工羊毛的锭子转动。”

总的说来,贝克先生显然持这样一种见解,即不论锭子和纺织机的数量还是它们所达到的转数,都在以和羊毛生产不相适应的比例增加着。在这方面英国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但是,警察局收集的爱尔兰农业统计资料和霍尔·麦克斯威尔先生收集的苏格兰的统计资料,对于一切实际目的已足够用了。这些资料表明,1857 年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某些谷物的耕种以及整个畜牧业都有很大的扩大,只有牧羊业例外。1858 年爱尔兰的羊的头数比 1855 年减少了 114557 头;虽然在 1858 年中羊的头数比 1857 年增加了 35533 头,但其总数仍比前 3 年的平均数少了 95177 头,而且主要是母畜。苏格兰的有关数字如下:

	作种畜的各种 年岁的羊(头)	供屠宰的各种 年岁的羊(头)	羊 羔
1856 年.....	2 714 301	1 146 427	1 955 832
1857 年.....	2 632 283	1 181 782	1 869 103
减少.....	82 018	增加 35 355	减少 86 729

这不仅说明,总共减少了 133 392 头羊,而且说明,屠宰的羊比以往多了。假定每头羊的剪毛量为 7 磅,从以上数字我们知道,1855 年爱尔兰能提供 1 681 0934 磅羊毛(不算羔羊毛),而 1858 年则只能提供 16 276 330 磅,1857 年苏格兰羊毛的产量(羔羊毛也不算在内)减少了 326 641 磅。因此,两地羊毛总共减少了 861 245 磅,或者,按照比较精确的计算,约相当于精梳毛纺织业每年需要加工的英国羊毛总产量的¹/₉₅。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3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9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波河与莱茵河

弗·恩格斯

—

波河与莱茵河¹⁰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2 月底—

3 月初

1859 年 4 月以单行本在柏林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

—

今年一开始，“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一公式就成了德国大部分报刊的口号。

这个口号由于波拿巴的备战活动和威胁而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德国，大家凭本能正确地感觉到，波河只是路易-拿破仑的借口，而莱茵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的主要目标。也许，只有为确定莱茵河上的疆界的战争，才能成为波拿巴主义的避雷针，帮他应付在国内威胁着它的两个因素：革命群众“爱国主义的威焰”和“资产阶级”不可遏止的不满情绪。这样做就会给前者提出一个具有民族意义的任务，而给后者一个夺取新市场的希望。因此，关于解放意大利的谈论在德国迷惑不了任何人。这就正如古谚语所说的：打麻袋，赶驴子。如果说意大利被迫当了麻袋，那末这次德国却根本不想当驴子。

因此，固守波河在目前只具有这样一种意义，那就是德国虽然处于最终目的在于夺取它的最好几个省份的这种袭击的威胁之下，但是绝对不想不经过战斗就把它即使不是最坚强的军事阵地，也是最坚强的军事阵地之一拱手让与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整个德国都非常关心波河的防御。在战争前夜，也和战争中一样，双方通常都力图占领每一个可以威胁敌人和挫伤敌人的有利

阵地,而不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

但是,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种提法,完全不同于德国许许多多军事家及政治家的意图,他们宣布波河即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在战略上是德国的必要补充部分,甚至说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观点从1848年和1849年意大利战争以来提得特别多,在理论上也不断得到更多的论证;拉多维茨将军在圣保罗教堂¹⁰⁹以及维利森将军在他所著的“1848年意大利战局”¹¹⁰一书中都论证了这一观点。在非奥地利的南德,巴伐利亚将军海尔布隆纳尔也以极大的热情评论过这一问题。在所有这些场合所提出的主要论据全都是政治性的,说什么意大利根本不能独立,意大利不是应当由德国统治,就是应当由法国统治;如果今天奥地利人被赶出意大利,明天在艾契河流域,在的里雅斯特的大门口,就会出现法国人,接着德国整个南部边境就会暴露于“宿敌”之前。因此,奥地利是代表整个德国而且是为了整个德国的利益而控制伦巴第的。

据我们所知,主张这一观点的军事权威是德国最有名的人物。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最坚决地反对他们。

对于以充当德国在意大利的利益的官方辩护士为己任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来说,这个观点成了它真正狂热地加以辩护的信念的象征。这家基督教德意志的报纸,虽然痛恨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却宁愿自身接受“割礼”也不让在意大利的“德国”诸省受到“割礼”。那些热心于政治的将军们所辩护的,归根到底无非是使德国获得最好的军事阵地,而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来说这却是某种政治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所谓“中欧大国”论,根据这个理论,奥地利、普鲁士及德国其他各邦应当在奥地

利的霸权下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对于匈牙利和沿多瑙河的斯拉夫—罗马尼亚各国应当用殖民、办学校和怀柔的方法使它们德意志化 ;从而使这个国家集合体的重心逐渐转向东南方 ,转向维也纳 ;此外 ,还应当重新夺取亚尔萨斯和洛林¹¹¹。这个“中欧大国”应当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¹¹²的复活 ,并且除了其他的目的以外 ,似乎还要兼并原奥属尼德兰¹¹³以及荷兰作为藩属。这样一来 ,德意志祖国也许几乎要比现在操德语的范围扩大一倍 ;如果所有这一切真正实现了 ,德国就要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和主宰。命运已经在设法使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罗曼语系各民族正在迅速地衰落着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已经完全灭亡了 ;法国人目前也正衰落中。另一方面 ,斯拉夫人完全无力建设真正的现代的国家 ,世界历史的进程注定他们要德意志化 ,而复兴的奥地利则一定要再度成为执行天意的主角。因此 ,保持精神力量而又能完成历史创举的 ,就只有日耳曼各民族了 ,但是其中英国人已经深深陷入了自己岛国的唯我主义和实利主义 ,以致欧洲大陆不得不以关税壁垒来隔绝他们的影响 ,隔绝他们的工商业 ,而自己另搞一套合理的大陆体系¹¹⁴。因此 ,纯粹的德意志的美德和年轻的“中欧大国”就绝对有把握在短期内争得陆上和海上的世界霸权 ,从而开辟历史的新纪元 ,那时德国在经过了长期休养生息之后将会重执牛耳 ,而其他各民族则将唯命是从。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
德国人的威力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根本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些爱国幻想的政治方面。我们只是一般地就这个题目概括地说几句,使得以后没有人再能利用这些堂皇的词句作为确定“德国”必须统治意大利的新的论据。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问题的军事方面,也就是,德国为了本身的防御需不需要永远统治意大利,特别是需不需要在军事上完全占领伦巴第和威尼斯省?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德国为了防守它的南部边境,需不需要占领艾契河、明乔河和波河下游及其桥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

在设法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我们这里所说的德国,是指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言,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和它的行动都是由一个中心来实行的;我们不是把德国看做某种臆想的政治机体,而是把它看做一个真正存在的政治机体。否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德国的政治需要或者军事需要。

二

在整整几个世纪中,北意大利较之比利时在更大程度上是法国人和德国人逐鹿的场所。占领比利时和波河谷地总是进攻者必要的条件,无论是德国进攻法国或法国进攻德国都是这样;只有占领这些地方才能充分可靠地掩护攻入法国或德国的军队的后方和翼侧。只有比利时和北意大利完全中立,这种常规才能发生例外;但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

自帕维亚会战¹¹⁵以来,在波河流域的战场上,间接决定着法国和德国的命运,直接决定着意大利的命运。自近代大规模的常备军出现以来,由于德国和法国力量的不断增长,由于意大利在政治上的解体,古意大利,也就是卢比康河以南的意大利已失去任何军事价值,只要占领旧南阿尔卑斯的高卢,随之就必然能统治整个狭长的亚平宁半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波河和艾契河流域以及热那亚沿岸、罗马尼亚沿岸和威尼斯沿岸,在这些地区,农业最繁荣,工业最发达,商业也最活跃。半岛(即那不勒斯和教皇国)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地区已经有几世纪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了。过去谁占领了波河谷地,切断了半岛同大陆的陆上交通,谁就能够一有机会就不费力地征服整个意大利。法国人在革命战争中曾两次做到这一点;奥地利人在最近这一世纪也曾两次获得这样的结果。因此,只有波河和艾契河流域才具有军事意义。

这个流域为连绵不断的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三面环抱,而第四面——自阿克维列亚到里米尼——则与亚得利亚海相连;大自然把这一块土地的轮廓勾划得非常鲜明,波河在这上面自西向东流过。这个地区的南部边界,即亚平宁山边界,目前我们对它没有任何兴趣,但北部边界,亦即阿尔卑斯山边界,却使我们很感兴趣。那里只有少数地方才有石铺大道通向终年积雪的山峰;甚至车行道、骡马道和人行小道心很有限,狭谷里漫长的隘路通向穿越高山的山口。

北意大利由伊宗察河口到施蒂尔夫山口的一段为德国边境所环抱,由施蒂尔夫山口到日内瓦与瑞士接壤,由日内瓦到瓦尔河口则与法国毗连。由东向西,即由亚得利亚海向施蒂尔夫山口逐渐推移,山道就一个比一个更深入波河流域的心脏,因而就能迂回在它东面的一切意大利或法国军队的阵地。伊宗察河疆界线也可以通过它西面最近的卡尔弗利特(卡波列托)山口从契维达列方向来迂回。通过庞塔菲尔山口可以迂回塔腊门托河附近的阵地,从克伦地亚和卡多烈的两条非石铺的山道也可以对这个阵地进行侧击。出勃伦纳山口可以经过佩特耳施坦山口——从布鲁内克到科丁纳·达姆佩佐和贝卢诺——迂回皮亚韦河线,经由苏甘纳谷地到巴萨诺可以迂回布兰塔河线,沿艾契河谷可以迂回艾契河线。基泽河上的阵地可以由朱迪卡里耶来迂回,奥利奥河上的阵地可以沿通过托纳列山口的非石铺道来迂回;最后,阿达河以东的整个区域可以由施蒂尔夫山口和瓦尔特林纳来迂回。

因此,可以说,在这样有利的战略形势之下,是否真正占有到波河为止的这一平原,对我们德国人说来是无所谓的。只要双方兵力相等,不论敌军配置在任何地方,配置在阿达河以东或者波河以

北他们所有的阵地都可能被迂回。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渡过波河或阿达河,他们到处都会使自己的翼侧受到打击;如果他们配置在波河以南,他们与米兰和皮蒙特的交通就要受到威胁;如果他们退到提契诺河以西,他们就有与整个半岛丧失联系的危险。最后,如果他们竟敢转而向维也纳进攻,他们就随时都可能被切断而不得不在背靠敌国领土而面向意大利的情况下应战。如果他们遭到失败,那就会是第二个马连峨,只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互换角色而已;即使德国人在这次会战中失败,他们也决不至于傻到错过向提罗耳退却的机会。

奥地利人修筑通过施蒂尔夫山口的道路一事证明,他们从马连峨失败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拿破仑修筑了通过辛普朗山口的道路,以便能有进入意大利腹地的安全的道路;奥地利人从施蒂尔夫山口向博尔米奥铺设了一条大道,因而补充了自己在伦巴第的积极防御体系。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山道地势太高,冬季无法通行;整个路线上难走的地方太多,因为它至少有 50 德里(从巴伐利亚的菲森到科摩湖滨的莱科)通过对行人不便的山区;在这个地区,它必须通过三个山口;最后,它很容易在科摩湖和山地的狭长隘路上被阻塞。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这个山口实际上正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所有能通行的山口中最高的一个:它高达 8 600 英尺,冬季积雪很深。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麦克唐纳 1799—1800 年通过什普留根山口和托纳列山口的冬季进军这件事,那末就不会把这样的障碍看得太了不起了。冬天,阿尔卑斯山所有的山道都有积雪,但仍然能够通行。全部炮兵

1 德里等于 7420 米。——编者注

的改编(自阿姆斯特朗发明了操作方便的后装的线膛炮以来,这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任务了)使较轻的火炮也可编入野战炮兵,从而大大提高它的运动性。较严重的障碍是在山区的行程很长,要接连不断地越过一个个的山口。施蒂尔夫山口位置不在阿尔卑斯山南北斜面的分水岭上,而在亚得利亚海区域的两条河流——阿达河和艾契河的分水岭上。要从音河谷地到艾契河谷地,必须先经由勃伦纳山口或芬斯特闵茨山口,通过阿尔卑斯山主脉。但是由于音河在提罗耳地区是在两条山脉之间大致上自西向东流的,所以由博登湖和巴伐利亚出发的军队也必须越过这两个山脉中的北面那个山脉。这样一来,仅仅在这一段道路上,我们大约就得通过两三个山口。但是无论怎样困难,这样的障碍也决不能成为阻挡军队从这一条道路进入意大利的决定因素。如果音河谷地已部分通车的铁路以及艾契河谷地正在设计修筑的铁路完全建成,这一段行程的困难很快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固然,拿破仑所选择的从洛桑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到伊符雷的道路仅经过约 30 德里的高山区,但是 1779 年拿破仑进军时所经过的,也就是 1809 年欧仁亲王和麦克唐纳为了与拿破仑会师于维也纳而经过的从乌迪讷到维也纳的道路,却有 60 多德里的山路,而且也要通过阿尔卑斯山的三个山口。从庞-迭-博富阿森经过小圣伯纳德山口到伊符雷的道路不经过瑞士而直接由法国深深进入意大利境内,因而最便于进行迂回,但是这条道路也有 40 德里通过高山,从洛桑经过辛普朗山口到塞斯托-卡兰德的道路也是一样。

至于说在山口上或科摩湖附近道路有被封锁的可能,那末自法军在阿尔卑斯山多次进军以来,人们已经不大相信这些筑垒封锁点的效果了。瞰制它们的高地和迂回的可能性几乎使它们失去

作用。法军曾以猛攻夺取了许多封锁点,而山道上的工事从来没有真正阻挡住他们过。在阿尔卑斯山面向意大利这边的斜坡上构筑的山道上的工事可以从切韦达列山口、蒙特科尔诺和加维阿来迂回,也可以从托纳列山口和阿普里卡来迂回。从瓦尔特林纳有几条骡马道通到贝尔加马斯加,科摩湖上狭长的隘路上的封锁点有一部分可以从这里,有一部分可以从德尔维奥或贝拉诺通过萨辛纳谷地来迂回。况且山地战术本来也要求几个纵队同时行进,其中一个突破敌人防线,通常目的就达到了。

最困难的山口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过,只是要派精锐的部队和果断的将领来完成这一任务;最不重要的、甚至车辆都不能通行的平行的山道也同样可以成为良好的作战线,特别是可以用来进行迂回运动;山地封锁点的用处已经不大,——所有这些事实,都已为1796—1801年在阿尔卑斯山的多次进军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当时,阿尔卑斯山还没有一个山口铺上了石道,然而,军队还是从各个方向通过了山岭。1799年,路瓦松在3月初就率领法军一个旅从人行小道通过了莱斯河和莱茵河的分水岭,同时,勒库尔布通过伯纳丁和维阿马拉山口,从这里再越过阿耳布拉和尤列尔(高7100英尺)两山口,在3月24日就用迂回的方法占领了马丁斯布鲁克隘路,同时又派德索尔取道闵斯德谷地通过皮佐克和伏尔姆斯山口(高7850英尺的人行小道)进至艾契河上游谷地,由此再进至雷申-舍迪克山口。5月初,勒库尔布又经由阿耳布拉山口退回。

同年9月,接着就是苏沃洛夫的远征,用这个老兵自己的形象的豪语来说,在这次远征中,“俄国的刺刀穿透了阿尔卑斯山”(Ruskij styk prognal cresa Alpowa)。他派大部炮兵通过什普留根山口,又把迂回的纵队沿布伦尼奥谷地派到卢克曼尼尔山口(高5

948 英尺的人行小道),由这里通过西克斯-马敦山口(约 6 500 英尺)进入莱斯河上游谷地,他自己则沿当时勉强可以通行的车行道(高 6 594 英尺)通过圣哥达山口。9 月 24—26 日,他以强攻夺取了鬼桥附近的封锁点,但是到阿尔多夫后,他前面是一个湖,周围又都是法军;于是他不得不沿舍亨塔尔而上,经过金齐库尔姆到穆塔塔尔。他把全部炮兵和辎重留在莱斯河谷,到了这里以后,他又碰到了优势的法军,而勒库尔布仍然尾随其后。于是苏沃洛夫又通过普拉格尔山口进入克伦河谷,想从这条路到达莱茵河平原。在涅费尔斯隘路上,他遇到了敌人的不可克服的抵抗,因此被迫沿小径通过高达 8 000 英尺的庞尼克斯山口到达莱茵河上游谷地并恢复与什普留根山口的联络。行军自 10 月 6 日开始,到 10 日,他的大本营就到了依朗兹。这次行军是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切阿尔卑斯山行军中最出色的一次。

我们不想多谈拿破仑越过大圣伯纳德山口的行军。这一战斗行动还比不上当时其他类似的战斗行动。季节很有利,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是拿破仑为了迂回巴尔德堡垒这一封锁点所采取的一种巧妙的方法。

反之,1800—1801 年冬麦克唐纳所进行的一次战斗行动是特别值得赞扬的。麦克唐纳奉命率领法军左翼 15 000 人的一支部队迂回明乔河和艾契河上的奥军右翼,他在严冬统率各兵种越过了什普留根山口(高 6510 英尺)。一路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时常为雪崩和暴风雪所阻,但他于 12 月 1—7 日率领军队通过了山口,溯阿达河而上由瓦尔特林纳向阿普里卡山口前进。奥军也同样不怕山地的冬天。他们扼守阿耳布拉山口、尤列尔山口和布劳利奥(伏尔姆斯山口),在布劳利奥甚至还袭击了法军,俘获了一队徒步的骠

骑兵。麦克唐纳由阿达河谷通过阿普里卡山口到达奥利奥河谷后，就由人行小道登上特别高的托纳列山口，于12月22日进攻奥军，后者以冰块阻塞了山道的隘路。因为他当日的攻击和第二次攻击（这是在12月31日，可见他已在山中停留了9天！）都同样被击退了，他就沿卡莫尼卡谷地而下抵达伊泽奥湖，命令骑兵和炮兵沿平原行进，自己亲率步兵越过通往特隆皮亚谷地、萨比亚谷地和朱迪卡里耶（他也到过这里）的三个山岭到了诺罗，这时已经是1月6日了。与此同时，巴拉盖·狄利埃山音河谷地经过雷申-舍迪克山口（芬斯特闵茨山口）进入艾契河上游谷地。既然这样的行军在60年前可以做到，那末在现在，当大部分山口都有了很好的石铺大道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从这一简短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封锁点中只有那些因时间仓卒或指挥人员无能而未能迂回的各点才能暂时守住。例如，巴拉盖·狄利埃一出现在艾契河上游谷地，托纳列山口就无法扼守了。其他几次战局也证明，封锁点可以用迂回的方法来夺取，也常常可以用强攻的方法来夺取。卢齐延什泰格曾两三次被攻下，1797年和1809年庞塔菲尔山口的马尔鲍尔格情况也一样。提罗耳的封锁点既没有在1797年阻止住茹贝尔，也没有在1805年阻止住奈元帅。拿破仑有句名言，任何小径只要山羊能走过，就可以用来迂回敌军。从那时起，战争就是以这种迂回各种封锁点的方法来进行的。

因此，不能想像，一支与德国人为敌的军队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在阿达河以东的平地上抗击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的德军，而守住伦巴第。这支敌军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配置在现有的或者应当重新修筑起来的要塞之间并在其间进行机动。这个可能，

我们下面再来分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法国要攻入意大利可以利用哪些山口。德国的疆界环抱着北意大利的一半,而法国的疆界则由北到南几乎成一条直线,因而使法国没有围攻之利。只有占领萨瓦和热那亚沿岸的一部分地方,法军才能通过小圣伯纳德山口和滨海阿尔卑斯山的山口进行迂回运动;但是这些迂回运动也只能影响到塞齐亚河和博尔米达河;因此,无论是伦巴第或者是各公国都不会遭到从法国方面迂回的危险,半岛本身则更是如此。只有在热那亚登陆才能造成迂回整个皮蒙特的形势,但这对于一支大军是有很多困难的。在更靠东的地方,例如在斯佩威亚登陆,那就不能以皮蒙特和法国为基地而只能以半岛为基地,因此,迂回敌人和被敌人迂回的机会是相等的。

上面我们一直是把瑞士当作一个处于中立地位的国家来谈的。如果它被卷入战争,法国就可以多一个山口,即辛普朗山口(大圣伯纳德山口和小圣伯纳德山口一样,都通到阿奥斯塔,除路途较短以外,没有任何更多的好处)。通过辛普朗山口的道路通至提契诺河,因此使皮蒙特暴露于法军之前。在同样的情况下,德军也会取得具有次要意义的什普留根山口,它在科摩湖附近与施蒂尔夫道路会合;此外,德军还可以利用伯纳丁,它的影响可以一直扩展到提契诺河。圣哥达山口,能为哪方所利用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它对双方都只有很少的侧击之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军和德军通过阿尔卑斯山的迂回运动,都能影响到现在伦巴第和皮蒙特的交界线即提契诺河。但是,如果德军到了提契诺河附近,即使他们仅仅到达皮阿琴察和克雷莫纳附近,他们就可以封锁法军连接意大利半岛的陆上道路。换句话说,如果说法国控制着皮蒙特,那末

德国就控制着意大利其余的整个地区。

德军还有一个战术上的优势,就是在整个德国边境上的所有最重要的山口上,除施蒂尔夫山口外,分水岭都位于德国境内。庞塔菲尔山口的费拉河起源于克伦地亚;佩特耳施坦山口的博伊泰河发源于提罗耳。在提罗耳省,上述这一优势具有决定的意义。有兰塔河上游谷地(苏甘纳谷地)、基泽河上游谷地(朱迪卡里耶)和艾契河的大部都在提罗耳境内。虽然在每一个别场合,不很好地研究当地地形就不能最后肯定,占领高山山口的分水岭是否真正具有战术优势,但是照一般惯例,谁占领山脊和向敌斜坡的一部分,谁无疑就有制高和迂回的可能性;不但如此,而且这样无疑也就可以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设法使次要山口上最险阻的地方能通过各个兵种,这一点在提罗耳对于保证交通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我国领土正像德意志联邦在提罗耳南部的领土一样深深楔入敌国;既然像现在一样,两个主要的山口——勃伦纳和芬斯特冈茨——都距离敌国边境很远;此外,既然最重要的各平行山道,例如通过朱迪卡里耶和苏甘纳谷地的山道,也完全位于德国境内,那末所有这一切就使得攻入北意大利的战术条件非常有利,因此一旦发生战争,只要合理地利用它们,胜利就是有把握的。

只要瑞士保持中立,德军对意大利作战时最近的道路总是提罗耳;如果瑞士放弃中立,那捷径就是提罗耳和格劳宾登(音河和莱茵河的河谷)。霍亨施陶芬王朝当日就是沿这一道路侵入意大利的。在军事上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行动的德国,从其他方向都不能在意大利进行迅速而坚决的打击。但是,从这一方向进攻的作战基地不是奥地利内地,而是从博登湖到萨尔茨堡的巴伐利亚和上士瓦本。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奥地利在多瑙河

中游建国以后,在维也纳成为帝国的中心以后,在德意志帝国崩溃以后,在意大利进行的已经不再是德国的战争而只是奥地利的战争以后,才放弃了由音斯布鲁克到维罗那和由琳道到米兰的那条旧的捷径,而开始利用由维也纳经克拉根富特和特雷维佐到维琴察的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和不好走的道路。这条路,德军从前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敌军威胁下退却时才利用,而无论如何不是用来进攻的。

当德意志帝国真正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存在的时候,当它因此以上士瓦本和巴伐利亚作为进攻意大利的基地的时候,它总是从政治上考虑,而绝不是纯从军事上考虑来力图统治北意大利。在争夺意大利的长期战争中,伦巴第有时羁于德国,有时独立,有时属于西班牙,有时属于奥地利;但是不要忘记,伦巴第是从威尼斯分离出来的,而威尼斯本来是独立的。虽然伦巴第拥有曼都亚,但是,明乔河线和明乔河与伊宗察河之间的地区却不在伦巴第的境内,也正是这个地区,目前有人要我们相信,不占领它,德国就不能高枕无忧。但是,德国(通过奥地利)是从1814年起才完全占领了明乔河线。如果说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机体,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也没有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那绝不是因为它没有占领明乔河线。

无论如何,从战略上整化各国版图并根据便于防御的河流线来确定它们的疆界的思想,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创立了运动性较大的军队并带领这些军队横扫全欧洲以后,更加受到重视了。在七年战争¹¹⁶时,军队作战的区域还仅限于一省,军队的运动在整整几个月里都围绕着个别的要塞、阵地或个别的作战基地进行,而现在在每一次战争中都必须注意到许多国家的地形;以前个别战术阵

地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只有很大的要塞群、很长的河流线或高而险峻的山脉才具有。从这个观点来看,当然像明乔河和艾契河这样的一些河流线现在的意义就要比以前大得多了。

那末,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河流线。

自辛普朗山口以东的阿尔卑斯山沿北意大利平原流入波河或直接流入亚得利亚海的一切河流,都与波河形成或者各自形成一小凹部向东的圆弧。因此,位于河东的军队要比位于河西的军队更便于防守这些河流。试看提契诺河、阿达河、奥利奥河、基泽河、明乔河、艾契河、布兰塔河、皮亚韦河和塔腊门托河,这些河流中的每一条都各自形成或者与它相连的波河的一部分形成一个圆弧,其圆心位于河流以东。因此,位于这些河流左岸,即东岸的军队可以占领河流东面的中心阵地,这样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赶到河道上受攻击的任何一点;他们扼守着若米尼称这“内线”¹¹⁷的河流线,可以沿半径或弦运动,而敌军却不得不沿较长的路线即圆周进行机动。如果位于右岸的军队必须进行防御,这种情况对他们也不利,因为地形便于敌人进行佯攻,原来使敌人在防御中易于进行机动的距圆周各点较短的距离,现在又使敌人在进攻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伦巴第—威尼斯各河流线无论是防御或是进攻,正好都对德军极其有利,而对意大利军队或者意法联军不利。如果再加上前面所说提罗耳的各个山口都便于迂回所有这些河流线这一情况,那末即使在意大利疆土上没有奥地利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德国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随时都能占领伦巴第。

此外,伦巴第的这些河流大部分都很小,不太适合于进行真正的防御。除了波河(关于波河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本身以外,无论对

于法国或者对于德国,在这一河流的整个流域里只有两处真正有价值的阵地;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些阵地的力量;它们已被加固,而且在最近将来的战争中当然会起决定的作用。在皮蒙特,原来一直向东流的波河在卡萨勒以东1德里处转弯,有整整3德里的一段流向南南东方向,而后又折向东流。在北面河弯处,塞齐亚河自北流入波河,在南面河弯处,博尔米达河自西南流入。在博尔米达河与波河的汇合处不远,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有塔纳罗河、奥尔巴河和贝尔博河流入博尔米达河,这些河流共同形成向一个中心点辐射的河网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枢纽又为亚历山大里亚营垒所掩护。军队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可以随意到这些小河的任何一岸作战:可以防卫直接位于前方的波河线;此外也可以在同样设有工事的卡萨勒渡过波河或者沿河在右岸行动。这一设有相当工事的阵地是掩护皮蒙特或者可以作为进攻伦巴第和各公国的基地的唯一阵地。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纵深,同时因为它既可以被迂回,又可以被正面突破,所以这种形势极为不利;有力而巧妙的进攻可以迅速把这个阵地压缩到尚未完工的亚历山大里亚营垒的边界上;至于说这一阵地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它的防御者无需在不利的条件下应战,这一点我们无法判断,因为我们既没有关于那里最新的筑垒的材料,也没有关于它们完成情况的材料。这一阵地可使皮蒙特抵御来自东方的进攻,它的这一意义早就为拿破仑所承认,所以亚历山大里亚又重新加固。在1814年,要塞没有发挥它的防御力量,现在它的防御力量究竟有多大,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

另一个阵地可以抵御来自西方的进攻,它之对于威尼斯省同亚历山大里亚之对皮蒙特有同等的,甚至是大得多的意义,这就是

明乔河和艾契河所形成的阵地。明乔河发源于加尔达湖,向南流 4 德里到曼都亚,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小河湾,周围都是湖泊似的沼泽,然后向东南流入波河。该河从曼都亚沼泽以南到波河入口处的这段流程过短,无法使整个军团渡过,因为敌人从曼都亚出击,就可以攻击他们的后方并且迫使他们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应战。因此,迂回运动必须在曼都亚以南更远的地方进行,并且必须在列维勒或费拉拉附近渡过波河。在北面,明乔河阵地有很长一段为加尔达湖所掩护,可防止敌人迂回,所以明乔河上真正需要防御的从培斯科拉到曼都亚这一线不超过 4 德里,同时在两翼都有要塞为依托,可以保证军队转至河的右岸。明乔河本身不是什么重大的障碍,同时由于地形关系,有时右岸高,有时左岸高。因为所有这一切,所以明乔河线在 1848 年以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蔑视,如果不是由于一个特殊情况的影响而使它大大得到加强,它未必会得到这样大的名声。这一特殊情况就是在它东面 4 德里的地方有北意大利第二条河流——艾契河流过,它成弧形,几乎与明乔河和波河下游平行,因而形成第二道更加强大的阵地,而傍河的两个要塞——维罗那和列尼亚哥又加强了它。这两条河流连同它们的四个要塞一起形成德国或奥地利军队对付从意大利或法国进攻的军队的非常坚固的防御阵地,欧洲任何其他阵地都不能和它相比;而且只要有一支在派出守备部队后还有能力进行野战的军队,就可以在这个阵地上从容地抗击甚至兵力超过自己一倍的敌人的进攻。1848 年,拉德茨基就曾证明这样的阵地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在米兰三月革命¹¹⁸以后,在几个意大利团脱离奥军而皮蒙特军队渡过提契诺河以后,拉德茨基率领他的残部约 45 000 人退向维罗那。分出 15 000 人作为要塞的守备部队后,他所能调动的只剩下 3

万人左右。他的敌人近6万人,包括皮蒙特、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军队,配置在明乔河和艾契河之间。在拉德茨基后方有杜兰多的军队45000人,由志愿军和罗马教皇及那不勒斯派出的军队¹¹⁹编成。当时拉德茨基只有一条交通线,即通过提罗耳的交通线,但就连这条通过山区的交通线也受到伦巴第志愿军的威胁,虽然威胁并不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拉德茨基还是支持下来了。监视培斯克拉和曼都亚就用去皮蒙特很多的军队,以致他们在5月6日只能用4个师的兵力(40000—45000人)攻击维罗那附近的阵地(桑塔路其亚会战);而拉德茨基则连维罗那的守备部队在内,可以有36000人投入战斗。因此,如果把奥军在战术意义上极强大的防御阵地估计在内,战场上就已经恢复均势,结果皮蒙特军队被击败了。5月15日那不勒斯的反革命事件使得同拉德茨基作战的那不勒斯军队调走了15000人¹²⁰,从而使威尼斯军队减少到3万人,但是其中仅有5000瑞士人组成的教皇军和大约同等数量的意大利人组成的教皇基干部队适于进行野战;其余都是志愿军。4月在伊宗察河编成的几乎有2万人的奥地利预备军团在努根特的率领下,很容易地冲过了这些部队的防线,在5月25日与拉德茨基在维罗那会师。于是,这位老元帅终于可以摆脱其消极防御的状况了。为了解救被皮蒙特军队围困的培斯克拉并扩大他所占领的地区,他率领全部军队向曼都亚进行了有名的侧敌行军(5月27日);5月29日,他在这里渡到明乔河右岸,以猛攻夺取了库尔塔唐附近的敌军阵地,30日在戈伊托附近进到意大利军队的后方和翼侧。但是,同日培斯克拉陷落了,天气也不利,加之拉德茨基也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决战。因此,6月4日他又经由曼都亚回师艾契河,派一个预备军去维罗那,自己则率领其余的部队经

列尼亚哥向维琴察进发,当时维琴察正由杜兰多和他的 17 000 人设防固守。10 日拉德茨基以 3 万人猛攻维琴察,11 日杜兰多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以后投降。第二军(即达斯普雷军)占领了帕多瓦、布兰塔河上游谷地和威尼斯全省,然后随第一军进至维罗那;与此同时,另一个预备军团在韦尔登指挥下由伊宗察河方面开来。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直到整个战局结束时,皮蒙特军队执迷不悟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里沃利高原,大概从拿破仑胜利时起他们就把这个高原视为占领意大利的锁钥,但是,在 1848 年,当奥地利人开辟了一条经由达尔萨谷地到提罗耳的可靠的交通线,即经伊宗察河到维也纳的直接交通线后,这个高原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同时皮蒙特军队还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对付曼都亚,因此他们在明乔河右岸上封锁了曼都亚,这个行动只能有一种意义:证明束手无策的状态支配着皮蒙特兵营,把军队分散在里沃利和博尔戈福特之间整整 8 德里的战线上,并且让明乔河把军队分为两半,不能互相支援。

正当皮蒙特军队企图在明乔河左岸也封锁曼都亚的时候,拉德茨基又从韦尔登的军队得到 12 000 人的增援,于是决定对力量已经削弱的皮蒙特军队的中央进行突破,然后将敌人前来增援的部队各个击破。7 月 22 日,他下令攻击里沃利,23 日皮蒙特军队即全部退出该地;7 月 23 日,他亲自率领 4 万人由维罗那出击,向索恩河和索马康帕尼亚附近仅仅由约 14 000 名皮蒙特军队防守的阵地进攻,攻占了该阵地,从而打乱了敌人整个防线。7 月 24 日,皮蒙特军队左翼完全被赶过明乔河,而这时已集中并转入对奥地利军进攻的他们的右翼,也于 25 日在库斯托查被粉碎;26 日,全部奥军渡过了明乔河,又一次在沃尔塔附近击败了皮蒙特军队。战

局到此结束；皮蒙特军几乎未作抵抗，即退过提契诺河。

上面对 1848 年战局的简述比任何理论根据都更好地证实了明乔河和艾契河这一阵地的力量。皮蒙特军队到达四边形要塞区以后，不得不分派很多的兵力来监视这些要塞，以致他们进攻的力量，正如桑塔路其亚会战所表明的那样，就因此而大为削弱；而拉德茨基刚获得第一批增援，就能在要塞之间完全自由地行动，有时以曼都亚为基地，有时以维罗那为基地，今天在明乔河右岸威胁敌人后方，过几天又攻占维琴察，一直把战局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固然，皮蒙特军队曾接连犯了错误。但是，阵地的作用也就在于能使敌人陷入困境，而且几乎是迫使他们去犯错误。对各个要塞的监视，尤其是对这些要塞的围攻，迫使他们分散、削弱自己现有部队的进攻力量，河流又使他们加大了军队分散的程度，使他们的几个军几乎不能相互支援。在敌人的野战军时刻都可能从维罗那的独立堡垒出动并向围攻者猛扑的条件下，要想围攻曼都亚，那该需要多么巨大的兵力啊！

1797 年只有曼都亚才阻住了波拿巴将军的常胜军。他一生只有两次对要塞感到敬畏，一次是在曼都亚，另外一次是十年之后在但泽。1797 年战争的整个后半期，即卡斯提奥涅、美多列、卡利阿诺、巴萨诺、阿尔科列、里沃利等会战¹²¹，都是围绕着曼都亚进行的，只是在这一要塞陷落后，胜利者才敢继续东进渡过伊宗察河。那时维罗那还没有构筑好工事；1848 年，在艾契河右岸的维罗那周围仅构筑好城墙，桑塔路其亚会战就是在不久以后奥地利构筑多面堡、后来又接着构筑独立堡垒的地方进行的；只是在有了这些工事以后，维罗那营垒才成为整个阵地的核心——内堡，而阵地也因此而具有极大的威力。

可见,我们并不是要竭力缩小明乔河线的作用。但是不应当忽视,只是在奥地利开始独自担当风险在意大利进行战争,而博岑—音斯布鲁克—慕尼黑这一交通线由于另外一条交通线,即特雷维佐—克拉根富特—维也纳交通线的出现而退居次要地位以后,这一条河流线的作用才显示出来。对于现在的奥地利来说,占领明乔河线确实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奥地利作为不受制于德国的、以欧洲大国身分行动的独立国家,必须或者把明乔河及波河下游控制在自己手里,或者放弃提罗耳的防御;不然,提罗耳就可能从两个方面受到迂回并且只有经过托勃拉赫山口才能与帝国的其余部分保持联系(由萨尔茨堡通过巴伐利亚到音斯布鲁克)。但是,老一辈的军事家中,有人认为提罗耳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防御能力,它既能瞰制多瑙河流域,又能瞰制波河流域。然而这个意见无疑是以幻想为基础的,从来没有为经验证实过,因为像1809年的战争¹²²那样的起义战争,不能作为给正规军作战下结论的根据。

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毕洛夫。他在他所著的霍根林登¹²³和马连峨战史中顺便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拿破仑在世时被派到圣海伦岛去的一位英国军事工程师埃梅特曾有过该书¹²⁴的法译本,这本书在1819年落到被囚的统帅手中。他在该书上了许多眉批,埃梅特于1831年将该书连同拿破仑的眉批一起再版。

看来,这本书开始一部分给拿破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毕洛夫提出的将全部步兵展开成散兵线的意见,他赞许地指出:《De l'ordre, toujours de l'ordre, les tirailleurs doivent toujours être soutenus par les lignes》[“队形,总是队形,散兵线始终应当由横队支援。”]以后又几次写道:《Bien c'est bien》[“好,这很好”],又是《bien》[“好”]。但是到了第20页,拿破仑看到可怜的毕洛夫煞

费苦心地想要用他的离心退却和向心进攻的理论来说明(说得极不成功而且又很笨拙)战争的各种变化无常的现象,看到他幼稚的解释使巧妙的几步棋失去意义的时候,就忍耐不住了。开始拿破仑一连几处指出:《Mauvais》,《cela est mauvais》,《mauvais principe》[“不好”],[“这不好”],[“不好的原则”],接着他指出:《cela n'est pas vrais》,《absurde》,《mauvais plan bien dangereux》,《restez unis si vous voulez vaincre》,《il ne faut jamais séparer son armée par un fleuve》,《tout cet échafaudage est absurde》[“这不对”][“胡说”][“不好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计划”],[“如果想要取得胜利,就得坚持集中”],[“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河流把自己的军队隔开”],[“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等等。及至以后当拿破仑发现毕洛夫总是夸奖坏的战例而指责好的战例,把最愚蠢的动机强加于一些将军并向他们提出一些最可笑的劝告,甚至还想废除刺刀而用长矛装备步兵第二列的时候,他不禁叹道:《bavardage inintelligible, quel absurde bavardage, quelle absurdité, quel misérable bavardage, quelle ignorance de la guerre》。[“莫名其妙的空谈,毫无意义的空谈,荒谬绝伦,可怜到极点的空谈,对战争简直无知已极。”]

毕洛夫指责克赖指挥的奥地利多瑙河军团,因为它退到乌尔姆,而不进入提罗耳。提罗耳——这是由许多山峰和峭壁形成的不可攻破的棱堡,如果有相当强大的军队将它占领,就能同时控制巴伐利亚和一部分伦巴第地区(这里拿破仑批道:《On n'attaque pas les montagnes, pas plus le Tirol que la Suisse, on les observe et on les tourne par les plaines》。[“对山地不能进攻,无论对提罗耳或者对瑞士都不能这样作,应当监视它们,沿平原迂回它们。”])。

接着毕洛夫又指责莫罗不应当让克赖军团把自己牵制在乌尔姆附近,而应当不理睬它,直接去占领驻军很少的提罗耳;毕洛夫认为,占领提罗耳对奥地利帝国是致命的打击(拿破仑批道:《A baurde, quand même le Tirol est éouvert, il ne fallait pas y entrer》. [“胡说八道,纵然提罗耳完全开放,也不应当进占。”])。

拿破仑读完全书以后,他对向心进攻和离心退却的体系和山地瞰制平原的理论下了如下的评语:《si vous voulez apprendre la manière de faire battre une armée supérieure par une armée inférieure, étudiez les maximes de cet écrivain; vous aurez des idées sur la science de la guerre, il vous prescrit le contre-pied de ce qu'il faut enseigner》. [“如果你想要知道使比较强大的军队被比较弱小的军队打败的方法,就请你研究这个作者所提出的原理;你将会得到一个关于军事科学的概念,他教你不要去做的,恰好就是你应当学习的东西。”]

拿破仑三次甚至四次重复为一警告:《il ne faut jamais attaquer le pays des montagnes》. [“绝不应当进攻山地。”]他对山地的这种恐惧无疑产生在较晚的时期,那时他的军队已经非常庞大,必须依靠平原来解决给养问题和造成战术展开的条件。西班牙¹²⁵和提罗耳大概也促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他并不是这样惧怕山地的。他的1796年远征前半期完全是在山地进行的,而在以后的几年中,马森纳和麦克唐纳充分证明:在山地战中,而且首先是在山地战中,也能以较小的兵力获得很大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现代的军队在平原和小丘陵相间的地形上能够最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主张率领大军进入高山(不是因为要通过这些高山,而是要在那里长期地占领阵地)的理

论,尤其是在左右两面有像巴伐利亚或伦巴第这样四通八达的平原可以解决战争的结局的条件下,是错误的。比如说,提罗耳对于一支 15 万人的军队能够供养多久呢?饥饿很快地就会把他们重新赶到平原上,而敌人在这段时间内却可以在平原上巩固自己的阵地,因此他们可能被迫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应战。最后,在狭窄的山谷中,这支军队又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展开全部兵力的阵地呢?

如果奥地利不再占有明乔河和艾契河,那末提罗耳对于它就会成为命中注定一旦遭受来自北方或南方的攻击就得被迫放弃的阵地。德国却可以通过提罗耳的各山口迂回直到阿达河的伦巴第地区,但是,在奥地利单独行动时则相反,从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却可以迂回直到布兰塔河的提罗耳地区。只有当奥地利北有巴伐利亚作掩护,南又由于占领了明乔河线而有了掩护时,它才能守住提罗耳。莱茵联邦¹²⁶建立以后使得奥地利甚至连提罗耳和威尼斯省两地合在一起都完全不能真正防守,所以,拿破仑根据普勒斯堡和约从奥地利割去这两省¹²⁷是完全贯彻了他的主张。

因此,对于奥地利说来,占领连同培斯克拉和曼都亚在内的明乔河线是绝对必要的。对于整个德国,虽然从军事观点来看占领这一线也还是有很大的好处,但是没有任何必要。好处在什么地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这一河流线使我们可以伦巴第平原预先占有一个强大的阵地,而不需要一开始先去夺取它,同时这一河流线使我们的防御地带变得十分完整并且大大加强了我们的攻势。

可是如果德国不占有明乔河线又怎么样呢?

假定整个意大利是独立的、统一的,并同法国结盟以进攻德国,那末从前面所讲的一切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作战线

和退却线就会不是维也纳—克拉根富特—特雷维佐方向,而是慕尼黑—恩斯布鲁克—博岑和慕尼黑—菲森—芬斯特闵茨山口—格留恩斯方向,这些路线通往伦巴第平原的出口都在苏甘纳谷地和瑞士边境之间。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所应指向的决定性地点是什么地方呢?显然,这将是北意大利的把半岛同皮蒙特和法国连结起来的那一部分地区,亦即波河中游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克雷莫纳的这一段。但是,德国人要进入这一地区,有加尔达湖和科摩湖之间那些山口就完全够了,并且这些道路还可以作退却之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经由施蒂尔夫山口退却。这时,位于明乔河和艾契河畔的那些要塞(根据我们前面的假设,它们是在意大利军队手中)就离决战战场很远。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派一支强大得足以采取进攻行动的部队去占领维罗那营垒,只是无谓地分散兵力。或者可以想象,意大利军队也许会以主力在他们所喜爱的里沃利高原上掩护艾契河谷以抵御德军吧?自从通往斯特尔维奥山口(通过施蒂尔夫山口)的道路筑成以后,艾契河谷的出口就不再起那样重要的作用了。但是,即使里沃利重新起占领意大利的锁钥的作用,而且那里的意大利军队能诱使德军向它进攻,那时维罗那又有什么用呢?它不能封锁艾契河谷的出口,否则,意大利军队向里沃利的进军就成为多余的了。要在失败时掩护退却,有培斯克拉就足够了,因为它能保证渡过明乔河,这样就可以继续安全地向曼都亚或克雷莫纳前进。如果意大利军队把全部兵力集中在四个要塞之间,不进行战斗而在这里等待法军到来,这在战局一开始就会把敌人的兵力分成两半,这就使我们能够处于两军之间,首先以联合的兵力向法军猛扑,粉碎他们,然后再把意大利军队从他们的要塞里赶出来,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长些。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每当它遭到来自

北面和东面的胜利进攻时，它本国的军队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抉择：以半岛或者以皮蒙特作为它的作战基地，这样一个国家显然应当在它的军队可能面临这种抉择的地区构筑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提契诺河和阿达河与波河的汇流处就可作为据点。维利森将军（在他所著的“1848年意大利战局”一书中）曾表示希望，这两个地点都由奥地利人设防。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筑垒所需的这块领土不属于奥地利（在克雷莫纳附近，波河右岸属于帕尔马，而在皮阿琴察，奥军也只有权留驻守备部队）；此外，这两个地点都太深入意大利，奥军在任何一次战争中都会受到起义者的包围。维利森一看到两条河流的汇合点，就不能不立即设计构筑大型营垒，但是他又忘记了，无论提契诺河还是阿达河都不适于做防线，因此，甚至根据他自己的意见来看，它们也不能掩护位于其后的地区。但是，对奥军说来是白白浪费兵力的地方，对意大利军队却是绝好的阵地。对他们说来，波河是主要防线；匹威格顿、克雷莫纳和皮阿琴察这个三角地带连同其左面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右面的曼都亚能成为这一防线的真正的屏障，使军队可以在它的掩护下静待远方盟军的到来，或者甚至可以在一定场合下在决定性的战场上，在塞齐亚河和艾契河之间的平原上实行进攻。

冯·拉多维茨将军曾就这个问题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发表过意见，他说，如果德国失去了明乔河线，它就将陷入目前只有在整个战局失败时才能遇到的那种处境。那时，战争立刻就会在德国本土上展开，战争将会在伊宗察河和意大利提罗耳开始，而包括巴伐利亚在内的整个南德意志将被迂回，所以甚至在德国，战争也将在伊扎尔河地区进行，而不是在莱茵河上游地区进行。

看来,冯·拉多维茨将军对于自己听众的军事知识有完全正确的判断。确实不错,如果德国放弃明乔河线,从领土和阵地方面说它受的重大损失,等于让法军和意大利军队打了一次大胜仗。但是,德国即使这样让步,也绝不会处于战败时所处的那种地位。难道说,集中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麓、经过提罗耳山口进攻伦巴第的一支强大的、新锐的德国军队的处境,会同一支因战败而士气沮丧的、在敌人追击下仓卒向勃伦纳山口退却的军队的处境完全一样吗?难道从一个能在许多方面瞰制法军和意大利军队的会合地区的阵地上发动胜利进攻的条件,能够同一支战败的军队把炮兵拖过阿尔卑斯山的条件相提并论吗?我们在未占领明乔河线的时候征服意大利的次数远比我们占领了它以后为多。在必要时我们还会重演这个把戏,这一点谁能怀疑呢?

至于断言没有明乔河线,战争马上会在巴伐利亚和克伦地亚开始,这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总括如下:没有明乔河线,南德边境的防御只能是攻势的。这是由于德国边境诸省多山,不能作为决战的场所,同时阿尔卑斯山各条山道的有利形势也决定了这点。战场位于这些山道前面的平原上。我们必须冲下山去,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这样作。不能想像还有比我们在这里所具有的条件更有利于进攻了,甚至在法意结成同盟这种对我们最不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整修经过阿尔卑斯山的山道,在提罗耳各道路交叉点构筑工事,还会使形势更为有利,道路交叉点的工事应当十分坚固,万一我们退却,即使不能完全阻住敌人,至少也要能迫使他们分派大量部队来保证自己的交通线。至于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情况,在阿尔卑斯地区的一切战争都向我们证明,不仅大部分主要的非石铺道,而且甚至许多骡马道,各兵种

通过都不太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向伦巴第的进攻确实可以组织得使它具有取胜的一切可能。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能会打败仗,那时才可能发生拉多维茨所说的那种情况。那时关于维也纳会失去掩护和敌人会通过提罗耳迂回巴伐利亚的问题又将是是个什么情况呢?

首先非常明显,在提罗耳的德国军队没有完全彻底被赶过勃伦纳山口之前,没有一营敌人敢于渡过伊宗察河。从巴伐利亚成为德国对意大利作战的基地以来,意法联军向维也纳的进攻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种进攻只会是不利地分散兵力。但是,即使在那时维也纳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心,敌军会派遣自己的主力来占领它,这也不过说明,它应当设防。如果维也纳设了防,那末拿破仑的1797年远征及其1805年和1809年的侵入意大利和德国都会使法军遭到极不利的结局。前进到这样远的一支进攻的军队,常常有使自己最后的兵力为设防的首都的抵抗所粉碎的危险。纵然敌人把德国军队赶过了勃伦纳山口,那他们需要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兵力才能分兵向奥地利内地作有效的行动啊!

但是,通过意大利迂回整个南德的可能性又怎样呢?事实上,如果说从伦巴第有可能迂回直到慕尼黑的南德,那末试问:德国能够迂回意大利多少地方呢?至少也能够迂回到米兰和帕维亚。因此,在这方面,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德国的领土比意大利广阔得多,所以配置在上莱茵地区的德国军队在遭到敌军通过意大利向慕尼黑方向的“迂回”时,完全不必立即撤退。上巴伐利亚的营垒或者慕尼黑的临时工事可以掩护被击败的提罗耳军团并迅速阻止敌人的追击,这时上莱茵军团只需要选择乌尔姆和英果尔施塔特或者美因河作为基地来作战,就是说在最坏の場合也只不过要变换

作战基地。对于意大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敌军通过提罗耳各山口从西面迂回意大利军队,那末只要把意大利军队赶出要塞,就可以征服整个意大利。在同时对意大利和法国作战时,德国经常会有好几支——至少有三支军队——作战,而胜败也要看所有三个战局的总的结果如何。但是,意大利只能提供一支军队展开的战场;任何分散兵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如果这一支军队被歼灭,意大利也就被征服了。对于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主要的问题都是保持与法国的交通线;由于这一交通线不是只到田达山口和热那亚为止,因此法军就得把自己的翼侧暴露给驻在提罗耳的德军;而且法军在意大利前进得愈远,暴露得也愈多。既然在意大利将反复进行德国战争,而且作战基地将由奥地利转到巴伐利亚,那末法军和意军经过提罗耳进入巴伐利亚的可能性当然应该预计到。但是,只要有按照要塞为军队服务而不是军队为要塞服务的现代原则构筑的相应的筑城工事,那末侵入德国比德国侵入意大利要容易粉碎得多。因此,我们不应当用所谓“迂回”整个南德这种说法吓唬人。敌人即使经过意大利和提罗耳迂回了德国的上莱茵军团,也必须在前进到波罗的海之后才能利用这一迂回的成果。拿破仑由耶拿向施特廷的进军¹²⁸恐怕不能在慕尼黑到但泽的方向上重复了。

我们决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放弃明乔河和艾契河线德国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阵地。但是,认为这个阵地对南德边境的安全必不可少,那我们是坚决地反对的。当然,如果从一个假定出发(看来持相反观点的人就是从这种假定出发的),认为随便哪一支德国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要被击败的,那就可以设想艾契河、明乔河和波河对于我们是绝对必要的。果真如此,这

些防线实际上对于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好处 ;无论要塞还是军队也都不能给我们帮什么忙 ;我们也最好是干脆从卡夫丁的轭形门下面走过吧¹²⁹ ! 我们不是这种设想德国武装力量的 ,因此我们认为 ,我们的南部边境给我们提供的向伦巴第领土进攻的那些有利条件 ,完全足以保证它本身的安全。

当然 ,这里还有一些政治上的理由在起作用 ,我们对此也不能不加以注意。自 1820 年开始在意大利掀起的民族运动¹³⁰ ,每经过一次失败就重新兴起而且更加壮大。所谓自然疆界和民族疆界恰恰相合而且同时又非常明显的国家并不很多。如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 ,而且又有 2 500 万人口 ,民族运动已经愈来愈加强起来 ,那末只要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最重要的而且人口约占四分之一的这一部分领土处于反民族的外国统治之下 ,这种运动就不会再平息下去。1820 年以来 ,奥地利只是依靠暴力 ,依靠对此起彼伏的起义进行镇压 ,依靠戒严的恐怖手段才统治住了意大利的。为了维持在意大利的统治 ,奥地利不得不采用比对待普通犯人还要坏的办法对待自己的政治敌人 ,即每一个有民族意识的意大利人。奥地利过去并且现在有些地方仍然采用的对付意大利政治犯的手段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闻所未闻的。为了使意大利的政治犯失节 ,奥地利人特别喜欢对他们进行杖笞 ,以此来向他们逼供和惩罚他们。不少人对意大利人的匕首或者对于政治性的暗杀流露出道义上的愤懑 ,但是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对奥地利杖笞的回答。奥地利为了维持自己在意大利的统治所不得不采用的方法 ,就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统治是不能长久的 ;德国在意大利的利益恰恰与拉多维茨、维利森和海尔布隆纳尔的说法相反 ,是和奥地利的利益不一致的 ,德国必然会问 :这些利益是不是大到超过了随这些利益而

产生的许多不利呢？

北意大利是一个附属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在战时对德国有利，在平时却只能有害。为了使意大利继续屈从所需要的兵力，从 1820 年开始，一直在增加，从 1848 年起甚至在最太平的时期也超过 7 万人，这些军队总是觉得身在敌国，必须时刻提防受人袭击。非常明显，奥地利虽然从皮蒙特获得了军事赔款，在伦巴第反复勒索军税，又发行强制公债和征收特别税，但是它在 1848—1849 年的战争和对意大利的占领所付出的代价仍然远远超过了它 1848 年以来从意大利所得到的利益。而在 1848—1854 年这个时期，奥地利有计划地把意大利当作临时占领的国家来对待，在离开以前尽量搜刮。只是从东方战争时期起，也就是在几年中，伦巴第在某种程度上才处于比较正常的条件下；但是在目前混乱的形势下，在意大利人的民族感情再次被极强烈地激发起来的时候，这样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弄清下列问题：占领伦巴第所得的利益比起因此在全意大利引起的对我们的仇恨和极强烈的敌视来究竟孰轻孰重？这种利益比起德国人由于奥地利（它以德国的名义，而且要我们相信，也是为了德国的利益）想在这个国家里保持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措施所负的共同责任来究竟孰轻孰重？这种利益比起经常干涉意大利整个其余部分的内政而带来的不利来究竟孰轻孰重？迄今的实践表明，而且奥地利人要我们相信，不这样干涉，伦巴第就保持不住；而进行这种干涉更加激发了整个意大利对我们德国人的仇恨。在我们上述的所有军事探讨中，我们总是把最坏的情况，即法意同盟作为前提。只要我们占据着伦巴第，在法国对德国的一切战争中意大利都无疑总是法国的盟邦。但是，只要我们放弃

伦巴第,这一点就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保有四个要塞而使我们必然受到极强烈的敌视,他法国人同2500万意大利人结成同盟,这难道对我们有利吗?

说意大利人政治上无能,说他们注定不是受德国人统治便是受法国人统治的这种自私的谰言以及关于能否建立统一的意大利的各种议论,竟出自德国人之口,实在使我们有些奇怪。我们——人口比意大利多一倍的伟大的德意志民族,摆脱“注定”不是受法国人统治便是受俄国人统治的命运,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关于德国是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难道今天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吗?难道此刻我们不正是处在将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问题的重大事变的前夜吗?难道对爱尔福特的拿破仑或者奥地利在华沙会议上对俄国的态度或者布隆采耳会战¹³¹我们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吗?

我们姑且假定意大利应该处于德国或者法国的势力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同情或憎恶的问题外,决定的关键仍旧还有向意大利扩展自己势力的两个国家的军事地理形势。就算法国和德国的军力是相等的,虽然德国显然可能会强大得多,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已经证明,即使是在对法军最有利的情况下,即瓦里斯和辛普朗对法军是开放的,法军的直接军事势力也只能达到皮蒙特,如果想把势力扩展到更远的地区,他们首先就要打胜仗,而我们的势力却遍及整个伦巴第以及皮蒙特与半岛相接的地区,要使我们失去这种势力,我们的敌人首先必须打败我们。不过有保证德国居于优势地位的这种地理形势,德国是不必害怕与法国争雄的。

不久以前,海尔布隆纳尔将军曾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了如下的意见:德国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给将遭雷殛的波拿巴王朝作避雷针。意大利人也同样有权说:意大利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给德

国人作缓冲国,以缓和法国对他们的打击,而为此所得到的报答是挨奥地利的杖笞。如果德国愿意保有这样一个缓冲国,那末它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意大利搞好关系,承认民族运动,让意大利人能决定自己的事务,因为意大利人是不会干涉德国事务的。拉多维茨硬说,如果奥地利今天退出北意大利,法国明天必然会统治那里,这种说法不仅在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三个月以前也是毫无根据的。今天正在形成的局势证明,拉多维茨的说法开始成为现实,不过是就同他所说的完全相反的意义来讲。如果说2500万意大利人都不能捍卫自己的独立,那末200万丹麦人、400万比利时人和300万荷兰人就更做不到这一点了。虽然如此,我们却没有听到,拥护德国在意大利的统治的人们抱怨法国和瑞典在上述国家的统治并要求以德国的统治来代替它。

至于统一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或者意大利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时它将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绝对不会是法国的,也绝对不会是德国的,因此对我们也不会比对法国人更有害些;或者意大利仍然保持分裂状态,那时这样的状态也可以使我们在每一次对法国的战争中在意大利获得同盟者。

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只要我们本身强大,不管我们是否占领伦巴第,我们总会在意大利保持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让意大利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多,意大利人对我们的仇恨自然就会消失,而我们对他们的自然的影响无论如何会大得多,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跃居真正的领导地位。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们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

三

你有权要求的,别人当然也有权要求。如果我们与其说是为了抵御意大利人不如说是为了抵御法国人而要求取得波河和明乔河,那末,如果法国人为了抵御我们同样也要求取得一些河流的话,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了。

法国的重心不在它的中部,即奥尔良附近的卢瓦尔河上,而是在北部,在塞纳河上,在巴黎,而且两次经验也证明,只要巴黎一陷落,整个法国也就要陷落了¹³²。因此,法国疆界形势的军事意义首先在于这些疆界所起的防护巴黎的屏障作用。

由巴黎到里昂、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洛特布尔的直线距离几乎相等,大约都是55德里。每当以巴黎为目标由意大利攻入法国时,如果攻入的军队不愿意使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就必须突入罗尼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里昂地区或者更向北推进。因此,在敌人向巴黎前进的时候,法国对自己在格勒诺布尔以南的阿尔卑斯疆界可以不予注意,因为巴黎在这一方面是完全有掩护的。

自洛特布尔起,法国疆界即离开莱茵河,与它成直角转向西北;自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法国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线。因此,我们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经过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洛特布尔划出的圆弧,到洛特布尔即中断;法国北部疆界简直成了这一圆弧的弦,弦那边的弓形地区不属于法国。由巴黎到北部疆界最短的交通线,即巴黎—蒙斯线,只有巴黎—里昂或巴黎—斯特拉斯堡半径的一

半。

从这些简单的几何关系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法国和德国之间在北方进行的一切战争中比利时总是成为战场。经过比利时,可以迂回从凡尔登和马尔纳河上游直到莱茵河的法国整个东部。也就是说,不等配置在莱茵地区的法国军队经过凡尔登或肖蒙赶回巴黎,从比利时攻入的军队就可能先到达巴黎城下。因此,从比利时攻入法国的军队在胜利进军的条件下总是可以在巴黎和法国莱茵军团或摩塞尔军团之间楔入;因为从比利时疆界到对迂回有决定意义的马尔纳河上各点(莫市、梯叶里堡、埃佩尔讷)的路线比直接到巴黎的路线还要短,这一点就更容易做到了。

但是不但如此,敌人沿着从麦士河到海边整个这一线在向巴黎方向前进时,在到达安讷河和瓦瑟河下游以前,都不会遇到任何天然障碍,而且这两条河流的分布也非常不利于从北方防守巴黎。无论是1814年或者是1815年,这些河流都没有给攻入的军队造成严重的困难。即使把它们也划入塞纳河及其支流所形成的防御体系区内(在1814年,这些河流曾部分地被这样利用),那末同时也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北部的真正防御只是在贡比泉和苏瓦松附近才开始,而且从北方掩护巴黎的第一道防御阵地距巴黎仅12德里。

很难想像有比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疆界更为薄弱的国境了。大家都知道,沃邦费了多少心血以人工的防御手段来弥补这一疆界的自然防御手段的不足;大家还知道,1814年和1815年攻入法国的敌军几乎毫不介意地通过了三层要塞带。谁都知道,1815年在受到仅仅一个普鲁士军的攻击并经过空前的短期围攻和炮击之后,要塞便一个接着一个投降了。阿温在受到10门野战榴弹炮半

日的射击之后于 1815 年 6 月 22 日投降。吉兹要塞一弹未发,就在 10 门野炮之前投降了。莫贝日在围攻开始后的第 14 天,即 7 月 13 日投降了;兰德列西在围攻开始和两小时炮击之后,即在围攻者总共发射了 126 发爆炸弹和 52 发实心弹之后 36 小时,即 7 月 21 日就打开了城门。马里昂堡仅仅 *pro forma*(为了装样子),让敌人对它开始围攻并发射了一发 24 磅的实心弹,然后于 7 月 28 日投降。菲利普维耳只支持住了两昼夜的围攻和几小时的炮击。罗克鲁阿在敌人开始堑壕作业和两小时炮击之后 26 小时便投降了。只有梅济埃尔在围攻开始后支持了 18 昼夜。在要塞司令中间投降之风极为盛行,这和普鲁士在耶拿会战后所表露的情绪相差无几;如果借口说 1815 年所有这些要塞都已坍塌倾颓,守军薄弱,装备不好,那未毕竟不能忘记,这些要塞除了少数例外,不可能不是经常无人过问的。沃邦的三层要塞带目前已失去任何意义,它对于法国是绝对有害的。麦士河以西的要塞没有一个能独自掩护任何一块领土,而且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四五个要塞在一起组成要塞群,使军队能在其中掩蔽而同时保持机动能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要塞都不在大河岸旁。利斯河、些耳德河和松布尔河,从军事观点来看,只有在比利时境内才有意义;因此,分散在开阔地上的这些要塞的威力不能扩展到火炮射程以外。除了在向比利时进攻时可以加以利用的疆界上的几个大筑垒基地和麦士河及摩塞尔河上几处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以外,法国北部疆界上其他一切要塞和堡垒都只能无谓地分散兵力。哪一个政府如能铲平这些要塞,就可以说是造福于法国了。但是法国传统的迷信对此又会说些什么呢?

因此,法国的北部疆界是极端不利于防御的;实际上这里是无

法防守的，沃邦的要塞带并没有加强它，在目前只是它的弱点的供认和标志而已。

正如“中欧大国”的理论家在意大利寻找河流一样，法国人也正在他们北部疆界的那一边寻找一条河流充当良好的防御阵地。那末这能是哪一条河流呢？

第一条可能引起注意的是些耳德河下游和迪尔河一直到松布尔河与麦士河的汇合处这一线。这一条线把比利时最好的一半划入了法国。它几乎把法国人和德国人交战的所有著名的比利时战场都包括在内，如奥登纳德、热马普、弗略留斯、利尼、滑铁卢¹³³。但是，即使有这一线也还不能作为防线，因为它在些耳德河和麦士河中间留有巨大的空隙，敌人仍可由此长驱直入。

第二条线可能是麦士河。可是，纵然法国占领了麦士河左岸，它的地位仍然不如德国在意大利只占领艾契河时所处的地位那样有利。艾契河一线可以使德国的疆界非常完整，而麦士河在这一点上还差得很远。如果麦士河由那慕尔直接流向安特卫普，那它就会成为一条相当好的疆界线。但麦士河却由那慕尔转向东北，只是到文洛以后才成大的弓形流入北海。

那慕尔以北麦士河和北海之间的整个地区在战时只能由自己的要塞来掩护；因此，敌人一渡过麦士河，就一定会与法国军队相遇于南布拉班特平原，而法军向德国莱茵河左岸进攻时却立即会碰到坚固的莱茵河防线，也就是直接碰到科伦营垒。麦士河在色当和柳提赫之间所形成的凹角也会使这一线受到削弱，虽然这一凹角为阿尔登高原所弥补。因此，麦士河一线在一个地方给予法国人的好处太多，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又太少，因而不能成为一条好的国防线。所以我们还得进一步找寻。

现在我们把圆规的一脚放在巴黎,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由巴塞尔到北海划一弧线。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莱茵河由巴塞尔非常准确地沿着这一圆弧流到它的河口。莱茵河上的各要点与巴黎的距离都相等,相差仅数德里。这也就是法国企图获得莱茵河疆界的真正的现实的理由。

如果莱茵河属于法国,那末在同德国作战时,巴黎就真正成为国家的中心了。由巴黎向受威胁的疆界(不论莱茵河还是汝拉山)所引的一切半径,长度都是相等的。凸出的圆弧到处朝向敌人,敌人不得不在这个圆弧的外面进行迂回机动,而法国军队却可以沿较短的弦运动而赶上敌人。几个军团的作战线和退却线等长,极其便于它们进行向心退却,而能在预定进行主要突击的地点集中其中两个军团来对抗还处在分散状态的敌人。

如果法国人占有了莱茵河疆界,法国的防御体系,就自然的条件而论,就将属于被维利森将军称为“理想的”、再好不过的那一类疆界了。成扇形流入塞纳河的云纳河、奥布河、马尔纳河、安讷河和瓦瑟河在塞纳河流域形成了坚强的内部防御体系(拿破仑在1814年曾利用这一体系在战略上给联军以非常严重的教训³⁴),只有在莱茵河作为疆界线的条件下,这一河流防御体系才能在各个方向受到同等的掩护,敌人将差不多同时自各方接近这一地区,并可被河流阻止,直到法国军队能以集中的兵力分别向敌军各个孤立的纵队进击时为止;但是,如果没有莱茵河一线,在决定性地区如贡比泉和苏瓦松一带的防御就只能在距巴黎仅12德里的地点开始。在欧洲任何地区的铁路,都不能像在莱茵河和塞纳河之间这块地区的铁路那样,可以迅速集中大批兵力来大力支援防御。铁路线以巴黎为圆心,沿半径分别通往布伦、布鲁治、根特、安特卫普、马斯

特里赫特、柳提赫和科伦,通往曼海姆并经过麦茨通往美因兹,通往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第戎和里昂。无论敌人最大的兵力在什么地方出现,到处都会遇到由巴黎沿铁路开来的全部后备军的迎击。塞纳河流域的内部防御能力特别是由于在这一地区内的所有作为半径的铁路都沿河谷(瓦瑟河、马尔纳河、塞纳河、奥布河、部分云纳河)通过而更为加强。但是不仅如此,三条同圆心的铁路弧线,每一条的长度至少都有圆周的四分之一,以彼此几乎相等的距离环绕着巴黎:第一条弧线是莱茵河左岸的铁路线,现在几乎由诺伊斯直通巴塞尔;第二条弧线由奥斯坦德和安特卫普经那慕尔、阿尔隆、提翁维耳、麦茨和南锡到厄比纳尔,也几乎全部连接起来;最后,第三条弧线由加来经利尔、杜埃、圣昆廷、里姆、马尔纳河岸夏龙和圣迪济埃到肖蒙。因此,在这一地区内,到处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大批军队集中在任何一个地点;在这里,由于自然和人工的条件,甚至没有任何要塞也可以借军队机动的能力进行非常坚强的防御,使侵入法国的敌人遇到与他们在1814年和1815年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抵抗。

以莱茵河作为疆界河流仅有一点不足之处。只要莱茵河的一岸完全属于德国而另一岸完全属于法国,那末两国人民谁也不能控制这一河流。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阻止较强的军队(无论它属于哪一个国家)渡过莱茵河;这种事情我们已见过几百次,而且战略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德国人以优势兵力进攻,法国人就只好在较近的接近地上进行防御:北方军团在文洛和那慕尔之间的麦士河上进行防御;摩塞尔军团在摩塞尔河上,大约在萨尔河流入摩塞尔河的汇合处附近进行防御;上莱茵军团在摩塞尔河上游和麦士河上游进行防御。为了完全控

制莱茵河，为了能够有力地阻挡敌人渡河，法军必须在莱茵河右岸占据桥头堡。因此，当时拿破仑直截了当地把威塞尔、卡斯特尔和克尔并入法兰西帝国¹³⁵，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侄子除了德国人在莱茵河左岸为他构筑的绝好的要塞以外，一定还会要求取得埃伦布莱施坦、多伊茨，而必要时还要取得盖尔曼尔斯海姆附近的桥头堡。这样，法国的军事地理体系，无论从进攻或者从防御的观点来说，才算是完备的，任何更多的加添只能是有害的。至于这一体系的自然条件是多么好，多么不言而喻，1813年联军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法国在这以前大约17年建立了这一体系，而且人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可敬的联军尽管处于优势而法国无力抵御，但是他们却惊惶地退却了，连想也不敢想动摇这一体系，就像不敢亵渎圣物一样；如果不是运动的德意志民族分子把联军吸引到自己方面的话，莱茵河也许在今天还是法国的河流。

但是，法国人只有当我们不仅把莱茵河而且把莱茵河右岸的桥头堡都让给他们时，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正如在拉多维茨、维利森和海尔布隆纳尔看来，我们德国人要保住艾契河和明乔河以及这两条河上的桥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才算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那时我们就会使得德国对法国完全无能为力，就像目前意大利对德国一样。那时，俄国就会像在1813年那样，成为德国的当然“解放者”（正如目前法国，或者更正确地说，法国政府成为意大利的“解放者”一样），而且为了补偿它的大公无私的行为，它一定会只要求一些“小块”领土——如加里西亚和普鲁士——以便使波兰的版图完整，因为经过这些省份不是也可以“迂回”波兰吗！

莱茵河对于法国，就像艾契河和明乔河对于我们一样，只是莱

茵河更加重要而已。如果说通过在意大利手中或者可能在法国手中的威尼斯省,可以迂回巴伐利亚和莱茵河上游并打开通向维也纳的道路,那末比利时和德国通过比利时则可迂回法国整个东部并且使得通向巴黎的道路更加畅通无阻。由伊宗察河到维也纳的距离到底还有 60 德里,在这一地区内还有某些防御的可能性;由松布尔河到巴黎一共才有 30 德里,而且只是在距巴黎 12 德里处,即苏瓦松或贡比臬附近,才可以找到多少能作为掩护的河流进行防御。如果像拉多维茨所说的,德国让出艾契河和明乔河,就会使自己事先处于像整个战局失败后所处的地位,那末法国在现有疆界的条件下所处的地位,就好像它有了莱茵河疆界却打了两次败仗一样,其中一次是为了争夺莱茵河和麦士河上的要塞而进行的,另外一次是在比利时平原的田野上进行的。甚至像北意大利要塞的强大阵地,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莱茵河下游和麦士河上找到类似的情况;难道说就不能把马斯特里赫特、科伦、幽里希、威塞尔和文洛稍事修筑,再加上两个中间据点,来构成同样强大的防御体系,使它完全能够掩护比利时和北布拉班特并使野战能力极弱的法国军队能够在河流间机动,以阻止有强大优势的敌军,最后借助铁路毫无阻碍地退到比利时平原或杜埃地区吗?

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德国人向法国进攻的时候比利时对德国人完全开放并与德国人结盟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因为我们应当用法国人的观点来论证,所以我们有权要求这个,就如同我们的敌人认为意大利——即便自由和统一的意大利也一样——是经常和德国人敌对的国家而有权要求明乔河一样。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首先考虑最坏的情况并准备应付它是非常自然的;法国人现在考虑他们北部疆界的防御能力和战略形势的

时候,就应当这样作。至于说比利时和瑞士一样,根据欧洲条约都是中立国,这种情况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注意。因为第一,历史实践一定会再次证明,这种中立在任何一次欧洲战争中都无非是一纸空文而已;第二,法国无论如何不能坚决指望这种中立,不能在军事上这样来对待与比利时接壤的全部疆界,就好像那里已出现一个能掩护法国免遭德国进攻的海湾似的。因此,不管今后是否真正积极地防守疆界或者只派出部队占领以防可能的袭击,这段疆界仍然是很薄弱的。

我们已经把波河和莱茵河作了充分的比较。除了莱茵河的问题涉及的范围比波河更大以外(这只能加强法国的要求),没有比这更加相似的情况了。可以相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兵士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实际上将比“中欧大国”鼓吹者在理论上所作的更为成功。当然,这些鼓吹者也是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但……只是为了法国人。

不过德国人也可能在什么时候一再吃败仗,以致失去自己在明乔河和波河上的“自然疆界”,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愿意再作个比拟。法国人占有自己的“自然疆界”共 17 年,从此以后几乎已经 45 年没有这样的疆界了。在这个期间,他们优秀的军事权威也同样在理论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沃邦要塞带对防止敌人侵入毫无作用,这一点已在现代军事学术的原则中找到了根据,可见在 1814 年和 1815 年,并不是偶然的会,也不是人们极喜欢说的《trahison》[“叛变”]使联军得以安然地在要塞之间通过。此后,就很明显了,为保障易受袭击的北部疆界,必须采取某种措施。但是,虽然如此,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恢复莱茵河疆界,这是非常清楚的。那末该怎么办呢?

法国人找到了使这个伟大的民族获得光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巴黎建筑成要塞，在近代史上他们最先试图把自己的首都变为规模宏大的营垒。旧派军事专家看到这种不智的举动，大摇其头。这不过是为了法国式的自夸而浪费金钱罢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纯粹是吹牛。谁听说过有方圆9德里、居民百万的要塞呢？除非将一半军队作为守备部队，否则怎样来防御这样的要塞呢？怎样供应这样多人的粮食呢？糊涂、法国式的自负、犯罪、修建巴比伦塔的重演！守旧的军事家这样指责这一新的举动，这些人正按沃邦式的六角形要塞研究围攻战，他们所知道的消极的防御方法中，没有比一个步兵排由隐蔽路向斜堤底部出击的规模更大的反击了！但是，法国人还是沉着地继续他们的工程，虽然巴黎还没有受到战争的考验，但是他们已心满意足，因为全欧洲非守旧的军事家都认为他们作得对，威灵顿已开始设计伦敦的筑城，在维也纳周围，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也已经开始构筑独立堡垒，柏林的设防问题至少也正在讨论中。他们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例子中亲身体会到，巨大的营垒，如果为进行大规模的积极防御的一支大军所防守，将具有多么巨大的威力。而且塞瓦斯托波尔周围仅有一道要塞围墙，根本没有独立堡垒；只有野战工事，没有任何石砌的内岸！

自从巴黎要塞筑成以后，法国就不再需要以莱茵河为疆界了。就像德国在意大利一样，法国将首先以进攻来防守自己的北部疆界。铁路网的分布说明，这个问题正应当这样来理解。如果进攻

根据圣经传说，有人企图在巴比伦修建一座高可接天的塔，在开工后，天神发怒，“弄混了建筑者的语言”，使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以致停工。建筑巴比伦塔一语的转意是：混乱、愚蠢、瞎忙。——译者注

被打退，法军可以坚守在瓦瑟河和安讷河之间；敌人继续前进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对于攻打巴黎来说，由比利时攻入的军队本身将过于薄弱。法国的北方军团可配置在安讷河后，保证与巴黎的交通线，静待其他军团的到来，在最坏の場合，也可在马尔纳河后，左翼以巴黎为依托，占领侧方阵地进行积极防御。敌人除了向梯叶里堡前进以攻击法国在摩塞尔河及莱茵河的军团的交通线以外，别无他法。但是这些行动远不像巴黎未设防时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在最坏の場合，法军其他军团向卢瓦尔河后的退路也不会被截断；集中在卢瓦尔河地区后，法军仍然会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可以威胁已被削弱并因围攻巴黎而兵力分散的敌军，或者可以突入巴黎。一句话，由于巴黎的设防，经过比利时的迂回已不再是危险的了；这一迂回的影响也不再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迂回而产生的不利因素以及抵抗这一迂回所需的手段，现在就容易计算了。

仿照法国人的例子，我们就会做得很好。如果我们不使自己为必须占领德国以外的领土（这些领土对于德国来说已日益不巩固）的呼声所蒙蔽，而事先准备应付我们必须放弃意大利的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会做得好得多。我们在这种场合所必需的要塞构筑得愈早愈好。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配置这些要塞，我们在前面已大略谈过，要更详细地谈就不是我们的事了。不要只耽于幻想和构筑堡垒封锁点，不应只依靠这些封锁点而轻视唯一能使退却的军队停驻的那种类型的工事，即营垒和河岸上的要塞群。

四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中欧大国”鼓吹者所提出的“自然疆界”论将导致什么结果。德国有权利要求波河，法国也有同样的权利要求莱茵河。如果说法国不应当为了一个好的军事阵地而把 900 万瓦伦人、尼德兰人和德国人并入法国，那末我们同样也没有任何权利为了一个军事阵地而去奴役 600 万意大利人。波河这一自然疆界归根到底不过仅仅是一个军事阵地，可是有人对我们说，只是为了这个缘故德国就必须保持它。

“自然疆界”论也可以用一个口号来彻底解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Danmark til Eideren！丹麦到埃德尔河！¹³⁶丹麦人不要求他们的明乔河和波河，即埃德尔河，以及他们的曼都亚，即弗利得利赫什达特，又要求什么呢？

“自然疆界”论使德国有权要求波河，同样也使俄国有权要求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并且在波罗的海方面整化领土，至少把普鲁士的维斯拉河右岸地区全部囊括进去。再过几年，俄国又可以同样有权利提出要求说：俄属波兰的自然疆界是奥得河。

“自然疆界”论如用于葡萄牙，这个国家也可以要求把领土扩大到比利牛斯山并把整个西班牙划入葡萄牙。

如果考虑到永恒正义的法则，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¹³⁷的自然疆界至少应当扩展到德意志联邦的疆界或者甚至更远些——到波河，也可能到维斯拉河。要知道罗伊斯-格莱

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和奥地利一样,同样都有实现自己权利的要求!

如果“自然疆界”论,也就是纯粹以军事观点为根据的疆界论是正确的,那末对于那些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德国外交家,我们应该怎样来称呼呢?他们使我们面临德国人打德国人的战争的威胁,使我们失去麦士河,使德国东部疆界门户洞开,让外国人确定德国的外部疆界和从内部分割它。老实说,哪个国家也不像德国这样,有那么多的理由来抱怨维也纳会议;但是,如果我们从自然疆界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当时那些德国的国家伟人的名誉将如何呢?何况拥护波河自然疆界论,靠 1815 年外交家的遗产过活并继承维也纳会议的传统也正是这些人。

你们愿不愿意听这种事情的一个实例呢?

1830 年比利时从荷兰分立出来的时候¹³⁸,也是现在把明乔河作为生死问题提出来的这些人在大喊大叫。他们为毗邻的尼德兰强国的分裂而大声疾呼,因为这个强国应当作为对付法国的屏障,而且应当负有义务以薄薄要塞带来与当时确实是极为庞大的工事的沃邦式要塞带相抗衡(甚至在有了 20 年的经验以后,偏见还是这样深)。各大国似乎很担心,有朝一日,棱堡、半眼镜堡和眼镜堡栉比皆是的阿拉斯、利尔、杜埃和瓦郎西恩会突然出现在比利时并安然屹立在那里!我们在本文中与之力争的这一狭隘思想的代表者们那时痛哭抱怨,说什么德国处于危急中,因为比利时只是唯法国之命是从的附庸,必然要成为德国的敌人;说什么用德国的(也就是从法国人手中夺来的)金钱建筑起来对付法国的宝贵的要塞现在可能被法国人用来反对我们。他们说,法国的疆界已经推进到麦士河和些耳德河以至更远的地方,再向前推进到莱茵河,还需

要很久吗！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号泣。但是实际情况怎样呢？从 1848 年以来，特别是从波拿巴复辟以来，比利时愈来愈坚决地脱离法国而接近德国。现在甚至可以把比利时看作是德意志联邦的一个外国成员国。比利时人采取这种反对法国的立场时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把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从上面强迫他们国家建立的所有要塞作为完全无法对付法国的废物全部铲平了，然后在安特卫普周围建成了一座营垒。这个营垒的规模相当大，足以容纳整个军团并在法国侵入时可以使它在那里等待英国或德国的援助。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 1830 年曾经想把主要操法语的信天主教的比利时与操荷兰语的信新教的荷兰硬缚在一起的那个英明政策，从 1848 年以来又想用暴力把意大利置于奥地利压迫之下并使我们德国人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行为负责。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由于害怕法国而产生的。这些先生的全部爱国主义看来就在于，一谈到法国就狂热地激动起来。好像五六十年以前老拿破仑所赐予他们的打击，至今痛犹在身。当然我们不属于把法国军事力量估计过低的这类人。比如说，我们清楚地知道，德国没有一支军队在轻步兵、小规模战争的经验和技术方面以及在炮兵学的某些方面能与法国军队相比。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人起初夸耀他们拥有 120 万名德国兵，似乎这些兵士已经作好战斗准备，如同科尔布博士为了亚尔萨斯和洛林与法国下一盘棋而摆好的棋子一样¹³⁹，可是后来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同样是这些人却又表现得非常畏缩，似乎这 120 万兵士不躲在不可摧毁的阵地内，就一定会被人数少一半的法军打得落花流水，这种情况确实使人再也无法忍耐。为了反对这一消极防御政策，我们认为提醒下列事实是适时的，就是即使德国总的说来注定

要利用反击来进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提醒下列事实也是适时的,就是我们已经很多次地证明,正是在进攻方面我们优于法国及其他国家。

“进攻毕竟是我们军队所特有的精神,这正是非常好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曾这样进过他的步兵。¹⁴⁰

至于他的骑兵如何善于进攻,有罗斯巴赫、措尔恩多夫和霍恩弗里德贝尔格等会战¹⁴¹可以作证。而1813年和1814年德国步兵如何善于进攻,最好的证明是1815年战争之初所颁发的布吕歇尔的名训示:

“因为经验教导我们,法国军队抵挡不住我们成营兵士的刺刀冲锋,所以要想打败敌人或攻占某一阵地,照例都应当采用刺刀冲锋。”

我们最成功的会战是进攻的会战;如果说德国兵士还有不及法国兵士的地方,那就是德国兵士还不善于为了防御的目的而坚守村庄和房屋;至于在进攻中,他们证明自己完全不亚于法军,并且多次地证明了这点。

不管产生这个政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政策起初在保卫可疑的或者夸大到荒谬程度的德国利益的借口下使我们受到一切较小邻国的憎恨,然后又对它们倾向于法国表示愤慨。波拿巴复辟整整五年才使比利时脱离了与法国的联盟,而比利时是被1815年开始的、1830年继续执行的神圣同盟¹⁴²的政策驱入这一联盟的;在意大利,我们为法国人造成了一种和明乔河意义相同的形势。但是,法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是狭隘的、自私的、剥削的,所以,只要我们稍有诚意,意大利人无疑地就会倒向我们,而不是倒向法国。大家都很清楚,拿破仑及其地方官员和将军们在1796年到1814年期间如何从意大利勒索金钱、粮食、艺术珍品和

兵员。1814年,奥军以“解放者”的身分来到意大利并且也被作为解放者接待了。(至于他们如何解放意大利,关于这点每一个意大利人对Tedeschi(德国人)所抱的仇恨态度可作为最好的说明。)法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与实践方面就是如此;至于这一政策的理论,我们只能说,它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法国永远不会容许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存在。一直到路易·拿破仑,这一原则始终没有动摇,而且为了避免一切的误会,拉·格隆尼埃尔还不得不再一次宣布它是永恒的真理¹⁴³。难道在法国实行这种狭隘而庸俗的政策,实行这种毫无顾忌地要求干涉意大利内政的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德国人还怕已经不再直接受德国统治的意大利会永远作为法国的温顺仆从来反对我们吗?这种担心是十分可笑的。这仍然是1830年对比利时问题所发出的那种惊叫。但是,尽管如此,比利时还是走到我们这边来了,不邀而来地走到我们这面来了;意大利一定也会同样地向我们靠拢。

但是,必须牢牢记住,占领伦巴第的问题是意大利与德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决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于像路易·拿破仑这样只为了自己的、在某些方面是反德国的利益才愿参与其间的第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握有一个省份,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放弃它,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扼守一个军事阵地,只是在不能再守时才放弃它。在这种场合,政治问题就立即让位于军事问题:有人袭击我们——我们自卫。

如果路易·拿破仑愿意扮演捍卫意大利独立的武士的角色,那他用不着与奥地利作战。《Charité bien ordonnée commence chez soi-même》[“好事先自为之。”]科西嘉“省”虽然是波拿巴主义的诞生地,却原是意大利的岛屿。让路易·拿破仑首先把科西

嘉岛让给他的姻伯维克多·艾曼努尔,那时也许我们还可以听听他的谈论。在他没有这样作以前,他最好还是不要谈他热烈地忠实于意大利的利益吧!

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境内不包括有一部分其他民族。法国 有佛来米族的、德意志族的、意大利族的地区。英国是唯一真正具有自然疆界的国家,可是它走出这个疆界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各国进行征服;在以真正的奥地利式的手段镇压了规模宏大的印度起义后,现在它又和自己的保护地之一——伊奥尼亚群岛进行斗争¹⁴⁴。德国有半斯拉夫族的地区,有居住着斯拉夫族、马扎尔族、瓦拉几亚族和意大利族的附属地。而彼得堡白帝又统治着多少种操其他语言的民族啊!

谁都不能肯定说,欧洲的地图已最后确定。但是一切改变,如果希望能长期保持,就应当从下列原则出发,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同时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的、但是没有能力再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那些残余的民族,仍然应当留在比较大的民族里面,或者溶化到他们中间,或者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地作为民族志学的纪念品¹⁴⁵。军事观点在这里只能具有次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欧洲的地图要重新绘制的话,我们德国人有权要求做得公平合理,不能再像以往所常发生的那样只让德国做出牺牲,而所有其他国家则在这样的重新分配中光占便宜,不牺牲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放弃给我们国境加添的许多东西,可以放弃使我们牵涉在最好不直接干预的事件中的许多东西。但是所有别的国家也应当这样;让他们给我们树立大公无私的榜样,不然就让他们闭上嘴。从整个这一研究所得的最后结论是,我们德国人如果以波

河、明乔河、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废物换得德国的统一，那就是作了一桩漂亮的生意，因为统一会使我们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复辙，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一当我们取得了这个统一，我们就可以不再防御了。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什么明乔河了，那时“我们特有的精神”又将重新是“进攻”了；要知道现在还有一些腐朽的地方非常需要这种“进攻”精神。

卡·马克思 和平还是战争?¹⁴⁶

我们在另一版上转载一篇不久前发表在“通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带预言性地否认它的主子和鼓舞者路易·拿破仑有任何想使欧洲卷入战争的意图¹⁴⁷。看来,这篇文章提高了交易所的证券牌价,并把旧大陆的担心消除了一半。但是,只要仔细地读一读,仍旧会从这篇文章中看出,它所唤起的那些希望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在这篇宣言中,除了仅仅肯定说皇帝对撒丁国王的义务只限于保证保护撒丁免受奥地利的侵略(这个保证维克多·艾曼努尔无疑是不需要了,至少在他的军队已派遣去支援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法、英军队之后)以外,我们看到的只是对舆论的新的嘲笑。这篇文章实际上建议全世界为了法国僭位者的利益而忘掉:不是报纸而正是他本人在新年那天通过奥地利大使对奥地利进行的毫无根据的和盛气凌人的威胁惊动和扰乱了欧洲;正是他的报刊,他那批专写抨击性小册子的作者,他的堂弟,他积蓄武器和购置军火的行动散布了对战争的惊慌情绪,这是他自己蓄意说出来的话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没有一行字,没有一句话包含有哪怕是一点暗示他打算放弃他的野心和在意大利以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

许布纳尔。——编者注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编者注

国¹⁴⁸的阴谋的迹象。他可能是决定向欧洲舆论让步(意大利除外,但法国并不除外);但也可能是他决定使用爱好和平和温和的语言,以便掩饰交易所的骇人听闻的投机,并用欺骗的手腕使那些他打算加以攻击的人产生一种不幸的安全感。在他的整个新宣言中,从头到尾丝毫也看不出,这种与其说是立场本身的改变不如说是语调的改变,是由于奥地利傲慢态度的缓和,外交气候的转晴所决定并从中得到解释的。一个正在准备进行歼灭性打击的人看来是不可能表现出这种爱好和平的情绪的;不要忘记,这个路易-拿破仑也就是那个在用叛变手段扼杀法兰西共和国的前夕还向一位共和主义者埋怨那些认为他是会干出类似卑鄙勾当的人的路易-拿破仑。因此,我们认为拿破仑的这个宣言是个“什么也没有总结的结论”。这只是一团白色的东西,它可能是普通的面粉,也可能是在面粉里面打过滚的一只公猫,但究竟是什么——这只有将来才能见分晓。

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中劝告人们对宣言持审慎态度的那一部分比公开赞同宣言的那一部分有更大的意义。路易-拿破仑永远再也不能成为交易所和资产阶级的半神人了。今后他只能靠剑来进行统治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3 月 2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9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土伊勒里宫的叹息

拿破仑皇帝的处境大概确实非常悲惨,因为他不仅写了一封凄怆的信,而且还把这封信寄给了弗·赫德爵士。后者在小政治家中远不是最乐观愉快的人。赫德爵士把这封信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了¹⁴⁹,这家报纸在不列颠的报纸中也远不是最乐观的报纸,因而使整小事件具有一种高卢人的快乐的国家中从未见过的特别庄严的气氛,甚至在这里,在多雾的英国,这听起来也像是送葬的钟声一样。皇帝在信的开头亲切地称这个肥皂泡从男爵¹⁵⁰为“我亲爱的弗兰西斯爵士”,在信的结尾同样写着:“我亲爱的弗兰西斯爵士”。看来弗兰西斯爵士在此以前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过一些维护皇帝的信。用不着怀疑,这些信是写得很出色的,就像通常报纸的记者自动写的通讯报道那样。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想不起曾读过或者至少是浏览过这些信。我们相信,这些信件在帝国议会中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讨论过。拿破仑陛下从作者那里收到了这些作品,由于伟人们通常总是要对送给他们的荡刀布或大块干酪表示感谢,因此拿破仑陛下也带着忧郁的神情感谢弗·赫德爵士所写的文章。皇帝很高兴地相信,在英国还有人未忘记他,他感动地回忆起在英国的那些日子,那时候这个国家的小店主曾经给与他任何一个流浪亲王¹⁵¹都不曾享受过的贷款。

他说：“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权力会带来多少麻烦，在我看来最不愉快的，正是那些你所最器重并愿意同他和睦相处的人不了解你，不正确地指责你。”

此外，他还公然宣称，自由就是欺骗。

他说：“我深感惋惜，自由像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样，有自己的极限！为什么它不传播真理而要尽力掩盖真理？为什么它不鼓励和发展高尚的情操而要播种不信任和仇恨呢？”

于是这位圣体被自由束缚住的皇帝非常感谢亲爱的弗兰西斯爵士，因为他毫不动摇地、真挚地、无私地和坚决地起来反对类似的谬误。

我们丝毫也不了解拿破仑第三陛下目前的悲哀的政治细节，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希望他今后的心情将经常欢乐而愉快。难道家庭的生活道路（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冒充的成员）曾是那样可喜可乐和光辉灿烂，以致当他窃据了法国的王位，当他以自己的生命、自由和他能借到的钱作赌注冒险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侵袭¹⁵²以后，他就可以追求奢侈逸乐的玫瑰花冠，追求支配人的权力，追求个人享受，追求约翰牛的祝福和追求对欧洲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有招摇撞骗的本领）了吗？难道他从未听说过“圣威廉”的意见：

“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枕席的！”

难道他不是认为在所有的人当中偏偏是他命中注定要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在土伊勒里宫中受偏头疼的折磨吗？为什么他要投入弗·赫德爵士的宽广的怀抱并因为他热心追求的皇冠把他的头压得太紧而啼哭呢？如果他认为需要给“泰晤士报”写信，为什么他

自己不去写,而要由一个没落的从男爵越俎代庖呢?要知道他曾一再粗暴地蔑视过礼节,难道他现在就不能那样做了吗?

可卑的欺骗伎俩(如果对于达官贵人们可以使用这种不恭敬的词句的话)是伯父擅长的手法,侄儿显然相当成功地仿效了他。王朝的缔造者喜欢痛哭流涕地、多愁善感地和漫无边际地侈谈自己的痛苦、烦恼、忧患和遭到的危险,特别是“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对他的恶劣态度。但是我们以为,他一次也未能做到使他写给英国人的信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拿破仑第一做到了使英国人尽情地嘲笑他,使法国人极其真诚地惋惜他,然而有时他也能使他的嘿嘿窃笑的邻居哭泣。但是,如果拿破仑第一所关心的只是给他的同时代的弗兰西斯·赫德爵士们写信,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那末,恐怕早在他被送往圣海伦岛上静穆的修道院以前,人们就把他从土伊勒里宫中的使他受折磨的职务中解放出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8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3 月 2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94 号

卡·马克思 法国的战争前景

1859年3月9日于巴黎

当战争将临的惊慌气氛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交易所的时候，我曾写道，波拿巴远远没有最终下定决心打仗，但是，不管他的真实意图如何，看来他将要失去对事件的控制力。然而现在，当欧洲的大部分报纸似乎倾向于相信和平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不是某种情况的巧合导致突然推翻僭位者和他的王朝的话，战争将会爆发。甚至是最肤浅的观察家都会承认，和平的前景仅局限于谈判的范围，而相反地，战争的前景却有物质因素作依据。无论法国或奥地利都在以空前的规模进行备战。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两个帝国的金库的绝望状况的话，用不着详细论证，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说，战争正在策划，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爆发。我敢说，奥地利正遭到厄运的追逼，厄运的线索大概一直延伸到圣彼得堡。每当它的财政眼看就要巩固的时候，厄运就不可避免地把它抛到后面去，抛向财政灾难的深渊，就像每当息息法斯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把这个命定受折磨的人费尽千辛万苦推上山去的倒霉的石头推下山来一样。例如，在经过多年不断的努

力之后,奥地利在 1845 年才接近于收支平衡的状况,但是突然爆发了克拉科夫革命¹⁵³,迫使它增加非常开支,以致造成了 1848 年的灾变¹⁵⁴。另一次,在 1858 年,它向全世界宣布维也纳银行恢复现金结算,但是突然从巴黎送来的新年贺词¹⁵⁵又猛然粉碎了奥地利实行节约的一切希望,使它遭到这样大的损失和消耗这样多的物资,甚至使最冷静的奥地利政府要员也不得不把战争看做是获得拯救的最后手段。

在所有能够吹嘘不仅具有地方意义的报纸中,“论坛报”大概要算是唯一的一家从来没有堕落到为了追求时髦(我还不说是赞美路易·波拿巴的性格,因为这样就太糟糕了)而说路易·波拿巴英明和毅力超群的报纸。“论坛报”分析了他在政治、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功绩,依我看来,这家报纸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所获得的在民众眼里是如此惊人的成功,是由于各种机会的巧合造成的,这些机会不是他创造的,而且在利用这些机会方面,他从来不比一个普通赌棍更为高明;一个普通赌棍就有本领作各种可能的妥协,敢于采取突然的手段和 *coups de main* (勇敢的打击,坚决的行动),然而始终只是做机会的恭顺的奴隶,并竭力把自己的罪恶心肠隐藏到铁的假面具后面去。这也正是欧洲列强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决定对 *grand saltimbanque* (伟大的丑角)(这是俄国外交家给他起的绰号)所持的观点。列强知道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险的地位,所以它们同意让他把自己装扮成拿破仑的继承者,但是心照不宣地约定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始终只应满足于表面上的煊赫声势,任何时候都不能越过那条把演员和他所扮演的角色分隔开来的界线。这个把戏一度耍得很成功。但是,外交家们按照他们的惯例,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时总是忽略一个重要因

素——人民。当奥尔西尼的炸弹爆炸的时候,萨托里的英雄⁷⁰摆出一副对英国发号施令的姿态,而不列颠政府也表示完全同意让他采取类似举动;但是人民的强烈要求对议院施加的压力是这样大,以致不仅帕麦斯顿被免职¹⁵⁶,而且实行反波拿巴的政策变成了要主宰唐宁街¹⁵⁷就不得不接受的条件。波拿巴让步了,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对外政策遭到了一连串的挫折、屈辱和失败。这只要指出他的迁移自由黑人的计划和对葡萄牙的冒险举动¹⁵⁸就够了。其实,如果说奥尔西尼的谋刺导致了法国专制制度的恢复,那末由于欺诈行为而从急性寒热病变成慢性病的商业危机使这个暴发户的宝座失去了它所依靠的唯一现实基础——物质繁荣。军队中出现了不满的迹象,证明资产阶级开始反抗的信号已经发出了;奥尔西尼的同胞进行人身报复的威胁使得这位僭位者夜不安寐。这时僭位者突然想为自己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他 *mutatis mutandis* (作相应的变化后),重复了拿破仑在吕内维尔和约¹⁵⁹后向英国大使发出的大声呵斥,并用意大利的名义向奥地利挑战。这个谨小慎微的人物,妥协的元帅,夜间突袭的英雄,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为大势所迫,铤而走险。

毫无疑问,他的虚情假意的朋友们推着他走了这一步。帕麦斯顿在贡比泉阿谀逢迎地向他保证说,英国自由党人同情他,但在议会开幕的时候却慷慨激昂地反对他。¹⁶⁰曾用秘密的照会和在网上公开发表文章来唆使他的俄国,显然已在同自己的奥地利邻邦进行外交 *pourparlers* [谈判]。但是大势已定,挑战已经发出,因此欧洲不得不重新考察一下这个终于活到意大利远征(他的伯父就是靠这个远征起家的)的走运的赌徒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12月的日子里⁴⁹,他在法国恢复了拿破仑主义,现在他显然决定用意大利

远征在全欧洲恢复拿破仑主义。他所关心的不是意大利战争,而是不经任何战争使奥地利受到屈辱。他企图依靠对革命的恐惧来夺取他的同名者用火炮赢得的胜利。非常明显,他并不打算打仗,而只是希望 succès d'estime〔仅仅依靠声望获得成功〕。否则,他会从外交谈判开始,以战争告终,而不是相反。在谈到战争之前,他会先准备战争,总之,他不会把车放在马的前头。

但是,他对同他发生争吵的强国的估计大错而特错了。英国、俄国和合众国可以作很多似是而非的让步而丝毫不丧失它们的实际势力;但是奥地利——特别是当问题牵涉到意大利的时候,如果不是帝国本身遭到危险的话,是不可能改变它的道路的。因此波拿巴从奥地利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准备战争,这使得波拿巴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行动。装模作样的争吵逐渐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冲突,这完全违反他的意志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外,一切都事与愿违。在法国他碰到了消极的然而却是顽强的抵抗,而同他休戚相关的朋友们竭力希望阻止他采取丧失理性的举动,使人毫不怀疑,他们是不相信他具有拿破仑的天才的。在英国,自由党背弃了他,并谴责他企图把自由看做是法国的出口项目。在德国,对他的一致蔑视向他表明,不管1848年因循守旧的法国农民的观念怎么样,在莱茵河彼岸却坚信他只是个假的拿破仑,德国统治者给予他的尊敬只不过是一般的客套,总之,他是“礼貌上尊称的”拿破仑,就像英国公爵的幼子们是“礼貌上尊称的勋爵”¹⁶¹一样。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在1859年1月使这个人 and 奥地利的关系复杂化的那些困难将会用可笑的和可耻的 recule〔退却〕来克服,或者萨托里的英雄本人认为他用他曾经遭到过的最大的和最明显的失败改善了他的绝望处境吗?他知道,法国的军官们即使照

顾面子也不会掩饰他们对他在“通报”上侈谈目前战争准备情况的可笑谎言的极端愤怒的；他知道，巴黎的小店主已经开始把1840年路易·菲力浦向欧洲同盟的让步¹⁶²和1859年路易·波拿巴的*grande retraite*〔大退却〕进行比较；他知道，资产阶级已经满怀着明显的、尽管是压抑着的憎恨，因为他们必须服从一个本来是懦夫的冒险家；他知道，在德国对他的普遍鄙视是毫不掩饰的，只要他朝着同一方向再走几步，就会使他成为全世界讥讽嘲笑的对象。维克多·雨果说过：《*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但是这位荷兰冒险家所需要的不单是加西莫多的名声，他要使人把他看做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加西莫多。他目前指望当真开始进行战争（而他知道，他应当开始它）的时机是这样的：奥地利在即将举行的外交谈判中不作任何微小的让步，这就会给他一个相当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诉诸武力；由于普鲁士在对奥地利2月22日照会的复照¹⁶³中表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的敌意可能会加深。英国的对外政策在得比内阁垮台之后将转入帕麦斯顿勋爵之手。俄国将对奥地利进行报复，但它自己却不一兵一卒，也不花一个卢布，它主要将在欧洲制造纠葛，以便利用自己在多瑙河两公国，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给土耳其政府所设下的罗网坐收渔人之利。最后，当外交的浓烟笼罩着巴黎会议的时候，在意大利将燃起熊熊烈火，欧洲人民将把他们拒绝给予自封的意大利保卫者的东西给与起义的意大利。这些就是路易·波拿巴希望能够再一次使他的幸福的大船驶向辽阔海洋的时机。至于他现在不得不忍受多大的恐怖的煎熬，这一点即使从下面这

雨果“小拿破仑”。——编者注

个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不久前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他突然剧烈地呕吐了。对意大利人复仇的恐惧也是执拗地推动他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意大利 *Vehme*¹⁶⁴ 的法官们正在暗中窥伺他，这一点三个星期以前他重新查明属实了。在土伊勒里宫的花园中抓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对他进行了搜查，发现他身上有一枝手枪和两三个带有起爆管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同从奥尔西尼身上搜出的相似。当然，把他逮捕起来并关进监狱里去了。他说出了自己的意大利姓名，讲话的时候也带有意大利口音。他说，他可以向警察提供许多情报，因为他和秘密团体有联系。但是在两三天内他一语不发，后来他请求给他的禁闭室再增添一个人，并声明说，如果继续对他实行单独监禁的话，他什么也不能讲，而且也不愿意讲。于是找了一个档案管理员或者图书馆管理员之类的狱吏给他做伴。这时，意大利人揭露了或者装出一副正在揭露很多秘密的样子。但是过了几天，负责审讯的人回来了，向他说道，根据调查，他所招认的一切都不符合事实，他应当说实话。意大利人答应在第二天这样做。这天晚上没有人打扰他。但是他在早上4点钟左右就起来了，用同室人的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据召来的医生的检验，创伤很重，大概立即死去。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11 日
左右

载于 1859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59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普鲁士的战争前景

1859年3月15日于柏林

战争在这里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行将发生的这场斗争中，普鲁士应当起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引起普遍争论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显然都没有确定的意见。有一件事应当使你们感到惊异，这就是，送到柏林的唯一的一批好战的请愿书，不是来自普鲁士，而是来自莱茵省省会科伦。但是用不着对这些请愿书给予多大的重视，因为这显然是天主教党干的事。无论在德国或在法国和比利时，天主教党都是亲奥地利的。在一个问题上可以说整个德国是完全一致的：谁也不表示支持路易-拿破仑，谁也不对这位“解放者”表示丝毫同情，相反地，憎恨和蔑视他的真正洪流日甚一日地在汹涌。天主教党认为他是反对教皇的叛乱者，自然也就诅咒那把亵渎神明的宝剑，这把宝剑眼看着就要指向一个以其与罗马教廷所签订的宗教条约使相当大一部分欧洲重新隶属于教皇宝座的大国¹⁶⁵。卦建政党虽然也装出一副憎恨法国僭位者的样子，实际上它所憎恨的是法兰西民族，它期望通过反对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圣战，把从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的国家输入的可怕的新东西消除净尽。一度把路易·波拿巴誉为伟大的“秩序、财产、宗教和家庭的救

主”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现在也不遗余力地揭露丧心病狂的和平破坏者。这个破坏者不甘心于镇压法国的充沛盈溢的力量以及在拉姆别萨和凯恩¹⁶⁶用有益的劳动来驯服那些不屈不挠的社会主义者，他硬要想出荒唐的主意来降低有价证券的牌价，破坏经济生活的平稳进程，重新唤起革命的热情。广大人民群众在多年被迫保持沉默之后，现在有可能对他们认为是造成1848—1849年革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的那个人任意表示自己的憎恨了，他们对此至少是感到非常满意的。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回忆引起了人们的愤怒，他们陷约地怀疑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反对德国的一个隐蔽步骤，这就足以使那些出于各种动机的抨击波拿巴的演说带有某种全民族感情的假象。“通报”上的弥天大谎，皇帝的御用文人所编造的无聊的小册子，以及被迫扮演狮子的狐狸所表现出来的动摇、惊惶失措以至恐惧的明显迹象，——这一切再也不能令人容忍了，它们把普遍的憎恨变成了普遍的蔑视。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整个德国的情绪都是反对波拿巴的，因而统一的德国会站在奥地利一边，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们关于奥地利政府和普鲁士政府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因为关于华沙会议，关于不流血的布隆采耳会战，关于奥地利在汉堡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武装游历或者甚至关于俄土战争¹⁶⁷的回忆未必能使这个矛盾缓和。你们知道，普鲁士政府最近几个声明保持着何等审慎的态度。这些声明说，作为一个欧洲大国，普鲁士在事实上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理由必须表明拥护哪一方。作为德国的一个大邦它保留研究奥地利在意大利的要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符合德国的利益这一问题的权利。普鲁士的态度还远不限于此。它声明说，奥地利同帕尔马、

摩地那、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单独签订的条约以及提上议事日程的关于废除这些条约的问题,应当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考虑,它们绝不是仅仅涉及德意志联邦的问题。普鲁士在多瑙河问题上公开反对奥地利。它从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中召回了自己的全权代表,因为他显然是奥地利利益的过分坚决的拥护者。¹⁶⁸最后,为了不致让人怀疑它有不爱国的举动,它仿效德意志各小邦的例子,禁止输出马匹;但是,为了把这项禁令的反法矛头移开,它就把这项禁令扩大到整个关税同盟¹⁶⁹,这样一来,这个矛头就既指向奥地利也指向法国。普鲁士仍然是曾经在巴塞尔签订了单独条约¹⁷⁰,而在1805年曾派豪格维茨给拿破仑军营送去两封信的那个大国,这两封信中有一封应当在奥斯特利茨会战遭到失败的时候转交给皇帝,另一封的内容是对这位外国侵略者的奴颜婢膝的祝贺。不管霍享索伦王朝一贯坚持的传统的宗族政策如何,普鲁士仍然害怕俄国。它知道这个国家在暗中同波拿巴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还促使波拿巴在新年那天发表那个不祥的声明。我们看到,像“新普鲁士报”¹⁷¹这样的机关报都在保护皮蒙特国王而反对弗兰茨-约瑟夫,因而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就可以断定,现在刮的是什么风。为了消除任何怀疑,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鼓吹俄法同盟以反对奥英同盟¹⁷²。

但是,问题的真正实质与其说在于政府的意图,不如说在于人民的同情。我应当向你们指出,除了天主教党、封建政党以及1813—1815年间的愚蠢的条顿空谈家的某些殖余分子而外,全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北部的居民都感到,德国正处在左右为难的境

地。德国人民要坚决站在意大利方面来反对奥地利,同时又不能不站在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波拿巴。当然,如果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的话来判断,我们就会一致相信,奥地利是每个德国人心中的偶像。我愿简单地叙述一下这家报纸所提出的理论。除了德意志民族而外,欧洲的所有民族都在分化。法国正在分崩离析;意大利应当因自己变成德国的兵营而感到特别幸福;各斯拉夫民族缺乏自己管理自己所必需的道德品质;英国因贸易而腐化了。因此,只有一个德国还是巩固的,而奥地利则是德国在欧洲的代表。它一方面使意大利,另一方面使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受到德国的 *Sittlichkeit* (这个字无法翻译)的崇高的影响。奥地利控制了加里西亚、匈牙利、达尔马威亚沿岸和莫拉维亚并企图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借以保卫祖国不受俄国的侵略,同时它也紧紧控制意大利以保卫德国这个人类文明的中心不受法国的道德堕落、轻浮和爱虚荣的有害影响。不过,我没有必要对你们说,在奥地利境外,这个理论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承认,只是一些巴伐利亚的 *Krautjunker* (落后的容克地主)除外,他们妄想充当德国文明的代表,其理由就和古代贝奥提亚人¹⁷³妄想充当古希腊智慧的代表时所持的理由差不多。但是,在这一伙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另一种比较平庸的观点。他们硬说,需要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奥地利在波河、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上的阵地是德国反抗法国侵略的自然军事疆界。1848年拉多维若将军在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中提出的这个理论占了上风,它使得议会站到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意大利,但是对于这个竟然把执行权授与奥地利大公¹⁷⁴的所谓的革命的议会早已作

近似的意思是:德行、伦常。——编者注

出了判决。德国人开始懂得 ,quid pro quo[混淆是非]的作法使他们坠入迷雾 ,开始懂得保卫奥地利所必需的军事阵地 ,对于保卫德国完全是不需要的 ,法国人也有同样的权利 ,甚至有更多的权利把莱茵河看做是自己的自然军事疆界 ,就像德国人对波河、明乔河和阿迪杰河所持的看法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3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9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历史上的类似现象

当路易-拿破仑决意要超过不太走运的威尼斯总督马林诺·法利埃罗,借助于违誓和叛变,夤夜阴谋和在床上逮捕那些不能收买的议会议员,并依靠开到巴黎街头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爬上了皇帝宝座的时候,欧洲的统治君主和贵族、大地主、工业家、食利者和交易所的经纪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为他的胜利欢呼,就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胜利一样。他们洋洋得意地嘿嘿窃笑,并异口同声地说:“罪行由他负责,而果实却归我们。路易-拿破仑在土伊勒里宫中称孤道寡,我们却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工厂、交易所和我们的事务所中更可靠地、更自由自在地为王称霸。打倒社会主义! Vive l'Empereur! [皇帝万岁!]”

侥幸的僭位者使出了自己一切手腕,以便继军阀之后把富人、有权势的人、吝啬人和投机家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他高呼“帝国就是和平”,而百万富翁们则几乎把他当做神一样来崇拜。罗马教皇亲切地称他为“我们最亲爱的耶稣基督的儿子”;而罗马天主教的僧侣们也(pro tempore[暂时])欢迎他,竭力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忠诚。有价证券的牌价上涨了;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各家银行开办并兴隆起来了;在新的铁路中,新的奴隶买卖中,新式的五花八门的投机活动中,大笔一挥就捞到了千百万财富。不

列颠的贵族把过去的一切置诸脑后,兴高采烈地欢迎新的波拿巴,并向他大献殷勤。他阖家访问了维多利亚女王¹⁷⁵,伦敦西蒂区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巴黎和伦敦的交易所碰杯相庆;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的使徒们中间发出了一片欢腾的祝贺声,所有的人都互相握手,并深信,金犊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神,而新的法国专制君主则成了它的亚伦。

七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拿破仑第三说的那句话永远不能收回或遗忘。不管是他自己像他的前辈在西班牙和俄国所作的那样,盲目地奔向毁灭,还是欧洲当权人物和资产阶级普遍愤懑的怨声迫使他暂时服从他们的意旨,反正魔力永远消失了。他们早就知道他是一个恶棍,但他们曾设想,他是一个愿意效劳的、顺从的、听话的和知恩图报的恶棍;现在他们看到自己错了并为此而懊悔。他始终都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而他们却以为他们在利用他。他完全像喜欢自己的饭和酒一样喜欢他们。迄今为止,他们都以一定方式为他服务;现在他们应当用另一种方式为他服务,不然就得准备对付他的报复。如果今后仍然“帝国就是和平”,那末这就是明乔河或多瑙河上的和平,是他的绣着帝国之鹰的旗帜在波河和阿迪杰河上胜利飘扬的和平,要不然就是莱茵河和易北河上的和平,这将是把铁制王冠¹⁷⁶戴在他的头上的和平,把意大利变为法国总督管辖区的和平,把大不列颠、普鲁士和奥地利变成绕着法国运转的、沐浴着查理大帝的新帝国这颗位居中央的巨星的光泽的简单卫星国的和平。

当然,从各个王宫中都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声音,但是在银行家和商业巨头的客厅里这种声音也迭有所闻。要知道,1859年一开始就出现了预示1836年和1856年的黄金时期¹⁷⁷重新到来的征

兆。由于工厂生产长期停顿,金属、商品和工厂制品的储备都已消耗殆尽。大批的破产显著地澄清了贸易气氛。船舶的价格重新上涨了;商品仓库又开始建设并堆满了各种货物。交易所活跃起来了,百万富翁们全都感到兴致勃勃;一句话,从来还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光辉的贸易前景,比这更明朗的预兆着吉利的天空。

仅仅一句话就把这一切都改亮了;这句话是 coup d'état(政变)的英雄,十二月的当选人和社会救主说的,是他无缘无故地、冷静地、完全有意地向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先生说的,而这句话显然表明了一种蓄谋已久的意图,就是打算和弗兰茨-约瑟夫争吵或者用恫吓的手段使他遭到甚至比吃三场败仗还要厉害的屈辱。虽然说这句话的目的是希望在交易所中能够产生瞬息的效果以利于交易所的投机生意,然而它也暴露了重新划分欧洲地图的强烈愿望。奥地利应当放弃那些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正被它占领着的(根据在它们的统治者同意下签订的条约)意大利国家,否则法国和撒丁丁就要占领米兰并将用一支波拿巴将军在意大利从来没有支配过的军队威胁曼都亚。教皇在教皇国内应当停止滥用教权制度——顺便提一提,这种滥用教权制度的行为曾长期受到法国武器的支持,——或者跟在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地那等国的小暴君的后面急急忙忙地逃跑到他们以为安全的维也纳去¹⁷⁸。由于波拿巴对许布纳尔的威胁而造成的证券的贬值使路特希尔德家族遭到了1100万美元的损失,他们为此而悲痛,并断然拒绝安慰。工厂主和商人们痛心地知道,他们所期待的1859年的丰收看来要让位于“死亡的丰收”了。恐惧、不满和愤恨到处都在动摇着总共不过几个月前十二月英雄的宝座那样牢靠地建立在上面的基础。

被推倒了、捣碎了的神像永远再也不能在它的台座上恢复

起来了。他可能由于害怕他自己所造成的风暴而退却,从而再次得到教皇的赞美和不列颠女王的垂青;但不管是赞美还是垂青都将是口头上的东西。现在教皇和女王都知道他就是各国人民早就知道的那种人了,——他是一个冒失的赌徒,是一个不顾死活的冒险家,只要赌博能使他赢钱,他情愿用各个皇族来作赌注,就像用任何其他东西作赌注一样。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像麦克佩斯那样经过血腥道路爬上皇位的人,这种人容易向前进,而不太容易退回到和平和安宁。路易-拿破仑从发表反对奥地利的威慑性的言论时起,在受过加冕典礼的人物中就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年轻的俄国皇帝 为了自己的目的看起来还好像是他的朋友;但这只是假象而已。1813年的拿破仑第一是1869年的拿破仑第三的原型。看来后者也将像前者当年一样急速地去迎接自己的厄运。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3月18日

原文是英文

左右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3月3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98号

弗·恩格斯 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路易·拿破仑同意关于召开会议来讨论意大利问题的建议，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欧洲和平的良好的征候，不如说是不祥之兆。这位君主在最近6个月内的每一个活动无疑都加速了战争的来临，如果他现在突然大转变，抓住那个表面看来是维护和平的建议，那末我们立刻可以得出结论说，幕后一定有阴谋，一旦这些阴谋被揭露，感到他的行为不合逻辑的疑问就会消除。欧洲会议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初看起来，它好像是为了维护和平，现在看来，不过是为了赢得时间完成战争准备的一种新借口。召开会议的提议提出来还不久，关于开会的地点和条件都还没有确定，即使肯定要召开，至少也要拖到4月底，可是法国军队已奉命在各团着手编组第四营，而6个法国师也要进行战斗准备。这些事实，值得研究一下。

法国步兵，除了猎兵、朱阿夫兵、外籍军团、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以及其他特种部队以外，共有8个近卫团和100个基干团。这100个基干团，在平时每团由3个营（2个野战营和1个后备营）组成，这样，一个团共有1500—1800名战斗人员。但是，除此以外，每个团还包括与此数字相同的、甚至更多的归休兵，他们在部队转入战时状态时必须立即回队。在这种情况下，3个营的总数将达3

600—4 000 人。其中除后备营 500—600 人以外,2 个野战营每营就有 1 500—1 700 人,这样多的人数使一个营根本不能灵活机动。为了在军事行动中有效地使用所有这些受过训练的兵士,必须立即在每个团内增编一个新的野战营,这样,作为战术单位的营的人数就可减少到大约 1 000 人,这是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队中所采用的平均数字。因此,编组第四营是法军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之前必须采取的一个步骤;只有那时,军队才具有为容纳现有受过训练的人员所必需的组织。这一情况使上述编组第四营的措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第四营的编成意味着准备发动战争。建立第四营的方法极其简单,就是把原有的 3 个营(每营 6 个连)的第五连和第六连合并成第四营,而其余 4 个连则拨出必要数量的官兵在每个营内组成两个新的连。新编成的营成为后备营,而第三营则成为野战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加上近卫军、猎兵和其他特种部队,那末法国军队中步兵营大约将有 480 个,这个数量足够安插 50 万人左右;如果这还不够,那末可以把第四营改为野战营,再新编第五营作为后备营。这种办法在克里木战争末期确实采用过,那时,法军共有 545 个步兵营。

法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步骤,实际上除了直接准备发动战争以外并不说明其他任何问题,这一点为紧接第一步而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所证实。6 个师奉命转入战时状态,也就是召回自己的归休兵。法军步兵师包括 4 个基干团(即 2 个基干旅)和 1 个猎步兵营,总共 13 个营,约 14 000 人。虽然法军没有指明这 6 个师的番号,但是不难猜出是哪些师接到了命令。我们看来首先是现在已经在罗尼河的 4 个师(其中有一个师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是由勒诺将军指挥的),其次是现在奉命在阿尔及利亚上船的布尔巴基师,最

后是巴黎军团的1个师,据报道,该师已奉命准备随时出动。这6个师约有85000名步兵,加上相应数量的炮兵、骑兵和辎重兵,可以编成大约10万人以上的一支军队。这些师可以看做是在当前的战争中组成意大利军团的那些兵力的基本核心。

由于法国国内普遍要求和平,在德国又爆发了强大的反法的民族运动,以及考虑到英国所采取的立场,看来路易-拿破仑还没有决心采取动员军队这样一个步骤,因为他还没有能使人相信,他不是非发动战争不可,而是乐意尽可能地通过会议使意大利的状况得到改善。备战的过程证实了这一看法,并揭露了路易-拿破仑的计划中之所以包含这样一个骗局的另一些原因。

当土伊勒里宫的新年接见刚表明他企图使对奥关系复杂化以后,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就开始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军备竞赛的活动。然而,这后一个强国立刻表明它超过了对手。整整一个军以惊人的速度在数日内调到了意大利,当法国军队和撒丁军队集结的消息具有更严重的威胁时,意大利军团的归休兵在3个星期以内就集结好了,并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这时意大利两省的归休兵和新兵也已征集入伍,并派往国内各驻防地点的自己所属的部队。这样有序地、迅速地完成这一切措施是奥地利军事制度达到完善程度以及奥地利军队具有充分的战斗力的最好的证明。诚然,奥军曾经以缓慢、守旧和笨拙闻名,但是拉德茨基在1848—1849年的用兵已经十分令人信服地改变了这个名声,然而整个机构能这样毫无故障地发挥作用,军队能在最短期限内达到这样的战斗准备,还是出人意料的。在这里,奥军不需要编组任何新的部队;在意大利的各野战营只要用预备兵员补充满额即可,同时后备营改编为野战营以及组织新的后备营的工作都是在深远后方进行的,

绝不会耽搁各野战部队的补充工作。

应当承认,撒丁也不需要编组任何新的部队。它的组织是十分令人满意的。而法军的情况则不同。整个动员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立第四营的工作必须在召集归休兵回队以前进行。此外,路易-拿破仑一旦进攻奥地利,必须预见到同德意志联邦作战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奥地利只有自己的意大利过境,即南部边境是暴露的,而西面则有德国作掩护,从而能够把绝大部分的兵力调到意大利,因此必要时能够立即开始战争,而法国政府却必须在决心采取进攻以前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因此首先就必须同时征集1859年的新兵和5万名志愿兵(这个数字是法国在发生战争时一般指望得到的)。这一切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仓卒发动战争绝对不利于路易-拿破仑。实际上,如果我们读一下“立宪主义者报”上关于法国军队的那篇有名的文章——读者们记得,这篇文章直接来自拿破仑本人——那末,我们就会知道,他确定法军扩充到约70万人的时间是5月底。这就是说,在此以前,奥地利对法国占有相对的优势;既然事态已经显然地迅速地走向公开的决裂,那末和平会议就是赢得时间的最好的手段。

还必须估计到另一个因素。俄国在这件事情中也插了一手,这一点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不言而喻,它力图削弱奥地利;同时也很显然,干预西欧的事务可以使它在多瑙河地区自由行动,从而挽回它在巴黎和约中所失去的东西;它对罗马尼亚各公国和塞尔维亚,以及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是有它自己一套算盘的,这一点已为不久以前它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所证实。¹⁷⁹俄国为了对奥

地利进行报复所能采取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当奥地利进行战争的时候在奥地利统治的数百万斯拉夫人中间挑起泛斯拉夫主义运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不止于此——它也必须集中自己的军队,并为此准备条件;但是进行这一切工作也需要时间。此外,为了对奥地利采取消极敌对的态度,也必须有个借口,而挑起一场轻松的争吵的好机会,再也没有比在这样的会议上更容易找到的了。因此,这个会议只要召开,就只不过是一种“骗局、笑柄和圈套”,而不是认真地、至少不是真心诚意地维护和平;恐怕用不着怀疑,所有列强现在都完全相信,整个这件事情虽只是空洞地走走形式,但必须进行到底,才能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和掩饰那些还没有公开暴露的真实企图。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4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4 月 2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18 号

卡·马克思 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

—

1859年4月8日于伦敦

印度的财政危机同战争传闻和竞选宣传一样,是吸引英国舆论界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个危机应该从西方面来看:它不但引起暂时困难,而且也引起经常的困难。

2月14日斯坦利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一个法案,建议授权政府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镑的公债来弥补印度事务管理机关今年的非常开支。6个星期后,约翰牛由于没有付出多少代价就把印度起义¹⁸⁰镇压下去而产生的沾沾自喜的胜利心情,被大陆寄来的一个邮件无情地打消了,这个邮件把加尔各答政府关于印度财政状况困难的哀号传进了它的耳朵。3月25日得比勋爵在上院站起来声称,为了弥补今年的需要,除了现在提交议会批准的700万英镑的公债以外,还需要再发行500万英镑的印度公债,而且就是这样,也还剩下一些要求支出的至少达200万英镑的赔偿费和奖金¹⁸¹没有着落,必须另行设法开销。斯坦利勋爵为了给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他在第一篇声明中只提到伦敦的印度金库资金缺乏,让印度的英国政府用自己的资金来开支,虽然他从收到的那些紧急报告中

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用的。坎宁勋爵根据普通收入增加 80 万英镑和军费开支减少 200 万英镑的情况,不算英国政府或伦敦的印度事务管理机关本身的开支,他估计今年(1859—1860 年度)加尔各答政府的预算赤字为 1 200 万英镑。加尔各答政府已经拮据到停发一部分文职人员的薪金,它的信贷下跌到连利率 5% 的政府证券的市价也要按票面额或低 12%,而它的财政混乱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只有在几个月内从英国经海路把 300 万英镑的白银运到印度去,才能使它不致于破产。这说明了三种情况。第一,斯坦利勋爵的最初声明是“支吾搪塞”:他不但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全部债务,而且甚至没有提到印度政府在印度的直接需要。第二,在整个起义期间,如果不算 1857 年从伦敦运到印度去的 100 万英镑的白银,那末加尔各答政府就只有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收入来抵偿大部分理应在印度支付的非常军费开支,安顿新补充的约 6 万名欧洲士兵和赔偿被抢走了的贵重物品所需的开支,以及由于起义而完全没有得到的地方管理机关的收入。第三,除了在英国的印度事务主管部门资金缺乏以外,还有今年必须弥补的 1 200 万英镑的赤字。借助各种手段(这些手段的可疑性质我们暂且不谈),这个数目将减少到 900 万英镑,其中 500 万英镑要用在印度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取得,400 万英镑要用于英国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取得。后一部分有 100 万英镑的银锭已经从伦敦经海路运往加尔各答,尚有 200 万英镑必须在最近期间启运。

从这个简短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英国主子们对待印度政府是相当不老实的,他们在印度政府处于困境时撒手不管,为的只是想蒙骗约翰牛;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坎宁勋爵在财政活动方面的庸碌无能甚至超过了他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功勋。直到 1859 年 1 月

底,他才通过在印度发行公债的办法获得了必要的资金,这些公债一部分是用政府有价证券的方式发行的,一部分是用国库期票的方式发行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努力在革命时期达到了目的,而在英国以武力恢复统治以后却彻底失败了。而且不仅失败了,甚至在对待政府证券方面也发生了混乱现象;各种证券价值空前下跌,以致孟买和加尔各答贸易局提出了抗议;在加尔各答,英国和当地的金融商人举行的公众大会纷纷谴责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不稳定、太随便、软弱无力、考虑不周。在1859年1月以前向政府提供资金的印度借贷资本在此以后开始涸竭,政府获得借贷的可能性看来也已经消失了。事实上,在1841至1857年间借贷的2100万英镑,仅仅在1857和1858年两年中就耗费了约900万英镑,几乎等于过去16年内贷入款项的一半。虽然这种资金不足的情况说明了后来把政府公债的利率从4%提高到6%是必要的,但是,它显然远不能说明印度证券市场的混乱状况和总督完全无力弥补最迫切需要的情形。这个谜可以从下述情况中得到解答:坎宁勋爵养成了常常采用这样一种手法的习惯,即在前一种公债尚未认购完毕时,他就以更高的利息发行新公债,而事先丝毫不告知公众,并且还完全不让公众对以后的财政措施有任何了解。由于采取这种手法造成的证券贬值估计在1100万英镑以上。坎宁勋爵因于国库涸竭,慑于证券市场的混乱情况,迫于各贸易局以及加尔各答各种集会的抗议,于是认为必须做一个乖孩子,并且尽力按照金融界的意愿办事;但是,他1859年2月21日的报告再次表明,人的理智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应该怎么办呢?他不该以不同的条件同时发行两种公债,而应该立即向金融界提出今年所必需的款额,不必用接二连三的、彼此矛盾的声明去欺骗他们。那末坎

宁勋爵在他报告中是怎样做的呢 起初他说 ,必须用在印度市场上发行利率为 $5\frac{1}{2}\%$ 的 1859—1860 年度公债的办法来弄到 500 万英镑 ,而且

“当这个数目推销完毕时 ,1859—1860 年度公债的认购就将停止 ,并且今年在印度将不再发行新的公债”。

然而在这个报告中他又说了一句话 ,使得刚才做的保证失去了任何价值 ,他说 :

“1859—1860 年度在印度将不发行利息更高的公债 ,除非是英国的印度事务管理机关有所指示。”

不但如此。实际上他正以不同的条件发行着双份公债。他一面宣布 ,“以 1859 年 1 月 26 日公布的条件发行的国库期票将在 4 月 30 日结束” ,一面又声明 ,“从 5 月 1 日起将宣布发行新的国库期票” ,并且 ,这次发行的期票的利率将是 $5\frac{3}{4}\%$ 左右 ,自发行之日起一年以后还本付息。两种公债是同时发行的 ,因为 1 月间宣布发行的公债尚未变购完毕。看来 ,坎宁勋爵所懂得的唯一的财政问题 ,就是他的年薪名义上是 2 万英镑 ,而实际上却达到 4 万英镑。因此 ,尽管得比内阁讥笑他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无能 ,但他出于“义务感” ,仍然抓住自己的职位不放。

印度财政危机对英国本国市场的影响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首先 ,在通常从墨西哥输入的白银由于那里发生严重骚动¹⁸²而不能运到的时期 ,由政府拨运出了一批白银 ,再加上根据商业结算拨运出的大量白银 ,结果自然使得银锭的价格上涨。3 月 25 日银锭价格暴涨到每盎斯 $62\frac{3}{4}$ 辨士 ,这就使欧洲各地的白银大量流入 ,结果伦敦的白银价格又回跌到 $62\frac{3}{8}$ 辨士 ,同时 ,汉堡的贴现率却从 $2\frac{1}{2}\%$ 上涨到 3%。由于白银大量输入 ,交易所的行市变得不利

于英国 ,金条也开始外流 ,这现在暂时使英国金融市场避免了货币过剩现象 ,但是 ,如果注意到 ,除了这种情况 ,还有相当数量的大陆公债 ,那末 ,归根到底 ,这将严重地影响英国的金融市场。不管怎样 ,印度政府证券和有保证的铁路股票在伦敦金融市场上的贬值——这对于将在本季度发行的政府公债和铁路公债会发生不良影响——无疑是印度财政危机在英国本国市场上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虽然印度铁路股票的 5% 的利息的收入是由政府保证的 ,但是许多铁路股票仍然按票面额减价 2% 或 3% 出售。

不过 ,我虽然注意到了这一切情况 ,但仍然认为 ,同印度国库的总危机相比 ,印度财政短时期的混乱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个总危机我也许还有机会来谈谈。

二

1859年4月12日于伦敦

最近的大陆邮件所带来的消息不仅没有谈到印度的财政危机有什么缓和,相反地,却透露了几乎难以预料的混乱状况。印度政府为了弥补自己最迫切的需要而被迫玩弄的诡计,可以从孟买总督不久以前采取的措施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孟买是一个每年平均可以销售3万箱马尔瓦鸦片的市场。马尔瓦每月可以供应2000—3000箱鸦片,这笔交易是用在孟买支付的期票计算的。输入孟买的鸦片每箱抽税400卢比,政府每年从马尔瓦鸦片中得到120万英镑的收入。现在,为了充实涸竭了的国库和预防即将到来的破产,孟买总督宣布,马尔瓦鸦片每箱的税额从400卢比提高到500卢比,但同时也指出,只是从7月1日起才开始按新税额征收,这样一来,马尔瓦鸦片的所有主还可以在4个月内,按旧税额输入他们的药物。因为6月15日才开始刮贸易风,所以从宣布提高税额的3月中旬起到7月1日,一共只有两个半月可以输入鸦片。不言而喻,马尔瓦鸦片的所有主将会利用给他们提供的这一段时间按照旧的税率来运入鸦片,因此在两个半月内,他们将把自己的全部现有存货推销给管区¹⁸³。由于马尔瓦最近两次收获的鸦片还剩下26000箱,而马尔瓦鸦片的价格每箱达1250卢比,因此马尔瓦的商人就要孟买商人支付300万英镑以上的期票,其中有100多万英镑将要落入孟买的金库。这种财政上的诡计目的非常明显。税

额的即将提高对鸦片商人说来 in terrorem(是一种威胁),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把全年的鸦片税提前弄到手,迫使做这种生意的商人立即把税款交出来。在这种发明的诈骗性质上耗费笔墨是完全多余的,这种发明现在正充实着国库,然而它将在最近几个月中造成国库的相应的空虚,不过,也很难举出更加令人吃惊的例子来说明大莫卧儿王朝的继承者们 184 资金涸竭的情况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最近一次起义之后印度财政的总的状况。根据最近的官方报告,不列颠人从他们在印度的领地上获得的纯收入是 23 208 000 英镑,按整数算是 2 400 万英镑。这样的年收入总是不够弥补年支出。从 1836 年到 1850 年,纯赤字共计 13 171 096 英镑,平均每年约 100 万英镑。甚至在 1856 年由于达尔豪西勋爵大肆吞并、掠夺和勒索,国库空前充实的时候,收支不仅没有达到平衡,反而还在已经积累起来的赤字上加上了约 25 万英镑。1857 年的赤字是 900 万英镑,1858 年达到 1 300 万英镑,而 1859 年的赤字根据印度政府自己的计算是 1 200 万英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甚至在一般情况下赤字也总是不断增加的,而在非常情况下赤字要达到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由于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印度政府的收支之间已有的差额已经扩大到了什么程度?甚至根据最乐观的英国财政学家们的估计,由于镇压西帕依起义而增加了新的长期债务有 4 000 万到 5 000 万英镑,而威尔逊先生估计,固定赤字,或者说必须从年收入中支付的这笔新债的年息至少在 300 万英镑以上。但是,如果认为,这 300 万英镑的固定赤字就是起义者留给胜利者的唯一的遗产,那就大错特错了。用于镇压起义的费用不仅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将来有关。甚至在平静的时

期,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至少也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因为这笔开支超过1200万英镑,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在起义初期,在印度的欧洲军队有战斗人员38000人,土著军队为26万人。而现在在印度服役的兵力却包括112000欧洲士兵和32万土著士兵。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随着使兵员增加到现有数目的非常情况的消失,这个空前的数目将会缩减到较为适当的程度。但是,不列颠政府任命的军事委员会却做出结论说,如果有土著军队20万人,在印度还需要有8万人的欧洲常备军,这就是说军费开支将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在4月7日上院辩论印度财政的时候,所有有声望的发言人在两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认为,一方面,仅仅军队的年开支几乎就要占2000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2400万英镑的印度纯收入不相容,另一方面,很难设想,目前局势会允许英国人在许多年内不在印度驻扎比起义开始前多一倍的欧洲军队而毫无危险。但是,就算欧洲军队在一个长时期内只比原有人员增加三分之一,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赤字至少也有400万英镑。可见,新的固定赤字一方面是由起义期间所形成的长期债务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印度的英国驻军人数不断增加造成的,这笔新的固定赤字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至少要有700万英镑。

此外还必须加上债务增加和收入减少这两项。根据伦敦印度事务主管部门所属铁路局不久前发表的声明,批准在印度修筑的铁路全长为4817英里,到现在才修成559英里。各铁路公司的投资总额为4000万英镑,其中1900万英镑已经支付,还有2100万英镑尚待支付,而且这个总额的96%是在英国筹措的,在印度筹措的只有4%。政府保证这笔总数为4000万英镑的款项能得到5%的利息的收入,因此,每年应该从印度收入中支付的利息达

200 万英镑 ,这些利息还必须在铁路通车并带来某些收入以前支付。据埃伦伯勒伯爵计算 ,这项投资给印度财政造成的损失在最近 3 年中为 600 万英镑 ,而这些铁路在以后带来的固定赤字将是 50 万英镑。最后 ,印度的 2 400 万英镑的纯收入中有 3 619 000 英镑是靠把鸦片卖给别的国家取得的 ,现在到处都承认 ,这笔收入的来源由于最近同中国签订了条约¹⁸⁵在很大程度上将要减少。可见 ,很明显 ,除了彻底镇压起义的必要性所造成的紧急开支以外 ,每年至少有 800 万英镑的固定赤字必须从 2 400 万英镑的纯收入中支出 ,这个纯收入 ,政府依靠征收新的赋税可能会增加到 2 600 万英镑。这种形势的必然结果是必须把印度债务的责任推给英国的纳税人 ,正如乔·康·路易斯在下院宣布的。

“每年要拨款 400 万或 500 万 ,作为对不列颠皇室的所谓重要的殖民地的补助金。”

必须承认 ,“光荣”收复印度的这种财政后果造成了远远不是令人愉快的印象 ,而为了保证曼彻斯特自由贸易派在印度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约翰牛不得不缴纳相当高的保护关税。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4 月 8 日

和 12 日

载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2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1859年4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虽然外交界还在尽一切力量设法召开会议,企图通过这个途径来和平解决意大利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一个人相信战争有可能避免了。英国内阁和普鲁士无疑是有诚意谋求和平的,但是法国和俄国参加目前的谈判,仅仅是为了赢得时间。法军进入意大利的必经之地蒙塞尼山口,现在积雪还很深。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还要编成一些新的法国团和阿拉伯团,而把军队从马赛和土伦运送到热那亚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结束。同时,俄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组织瓦拉几亚的国民军和塞尔维亚的非正规军。而在维也纳,占上风的是主战派,弗兰茨·约瑟夫渴望听见第一声炮响的心情已经胜过了一切。既然他知道外交上的拖延只会消耗他的财力和加强他的敌人,那末他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关于召开会议的提议呢?普鲁士亲王的立场就是答案。他没有受到控制着德国人的激昂情绪的影响,而企图寻找一个堂皇的借口来保持真正的中立,以避免迟早会导向战争的武装中立所造成的国力的大量损耗。如果奥地利为了消灭皮蒙特军队而发动战争,那末柏林内阁的这种政策,甚至在德国人看来都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法军在伦巴第进攻奥地利,那末弗兰茨·约瑟夫必然要向德意志联邦发出正式的呼吁,号

召联邦军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因为奥地利的真实企图正是这样，所以各方面的外交家都在勾心斗角，企图迫使对方首先进攻，这种情景看来实在可笑。法国抱怨奥地利人专制，那个把法国共和党人流放到拉姆别萨和凯恩的人，却对弗兰茨·约瑟夫把意大利共和党人塞满监狱这点感到愤慨。而另一方面，占领克拉科夫和废除匈牙利宪法¹⁸⁶的奥地利，却在一本正经地大声疾呼，说什么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突然想起纸币是一大祸害因而大量借债的俄国，当然也不希望战争，因此提出了四项条款作为召开会议的基础。这四项条款同大家都知道的克里木战争期间奥地利向俄国提出的四项条款¹⁸⁷如出一辙。这些条款要求：奥地利放弃对意大利各公国的保护，召开会议以调整意大利的管辖关系，解决意大利国内必要的改革问题以及修改许多重大条约的次要条款，例如关于奥地利在费拉拉、科马基奥和皮阿琴察保持驻军的权利的条款¹⁸⁸，因为这些驻军在意大利宣布中立以后将是多余的。英国真心诚意地赞同这些建议，并且用和缓的词句将这些建议通知了奥地利。布奥尔伯爵当然赶紧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是措词含糊，所以丝毫不用怀疑，他是希望彻底推翻这些建议的。他还补充了一项条款，就是首先要全面裁军。马姆兹伯里勋爵认为这一建议非常明智，并且请卡富尔伯爵解散一部分撒丁军队，以减轻国家的沉重负担。卡富尔伯爵一点也不反对这个出色的建议，但是指出奥地利在伦巴第有大量的兵力，并向布奥尔伯爵提出：“你们先裁。”布奥尔伯爵的答复是，在拿破仑没有裁军以前，不可能解散他自己的宝贵的部队。拿破仑冷淡地反驳说：“我没有扩军，因此不可能裁军。我既没有向路特希尔德借款，也没有向贝列拉借款，我没有军事预算。我是用国家一般的预算来维持自己的军队的；我怎么可能裁军呢？”马姆兹伯里勋爵对

于这一厚颜无耻的答复感到吃惊,但是仍然满怀希望地想在外交上碰碰自己的运气,又建议会议首先讨论和解决裁军问题;但是,交易所里的人以及欧洲一切明智的人士都暗中嘲笑他头脑简单,并且都作最坏的打算。德国民情激昂。但是,在汉诺威,受到宫廷鼓励的激烈的反法情绪突然转变了。觉醒的人们认为,在国内以及在国外清算的时候到来了,如果目前不稳定的局面再继续两个月左右,德国必定会行动起来反对法国,但是这需要有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统一作为这一行动的必要条件。普鲁士亲王对于他的同胞的这种情绪,比弗兰茨-约瑟夫或者巴伐利亚国王了解得更清楚,因此他设法阻止这种激烈情绪的扩展,国为这种情绪必然要威胁到他实行半专制统治的企图。

现在,俄国面临着一个良好的时机,或者是利用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起义来摧毁土耳其帝国,或者是对奥地利帝国进行报复。当然,俄国是不会采取战争的手段来反对弗兰茨-约瑟夫的,但是它可以煽动并支持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侵犯特兰西瓦尼亚,煽动并支持塞尔维亚侵犯匈牙利。沙皇正是企图通过瓦拉几亚人和斯拉夫人在匈牙利引起骚动,因为如果不这样,自由、独立的匈牙利会成为比被削弱的奥地利集权专制政体更严重的阻挠沙皇推行侵略政策的障碍。

那不勒斯国王已经奄奄一息。王国到处动荡不安;有些人在谈论宪法,另一些人在谈论缪拉特的拥护者的暴动。但是可能性最大的是组成以萨特里安诺公爵菲兰杰里为首的内阁,他是主张照普鲁士的样子建立开明专制政体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意大利的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编者注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危机,这种制度不可能是巩固的,它也许很快会首先让位给宪法,然后再让位给西西里岛的起义,而在这期间,繆拉特的拥护者将会混水摸鱼。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4 月 11 日
左右

载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62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

1859年4月14日于巴黎

不列颠政府终于认为需要让各界人士知道欧洲会议——这是俄国和法国的导演们看到自己在备战方面大大落后于奥地利而搬上舞台的 *deus ex machina* ——的正史了。首先可以指出,标明“1859年3月23日于维也纳”的布奥尔伯爵给俄国大使巴拉宾先生的照会,和另一个标明“3月31日于维也纳”的奥地利首相给不列颠驻维也纳宫廷大使奥·劳夫塔斯勋爵的照会,已于4月8日由奥地利政府秘密通知维也纳各家报纸,而约翰牛却在4月13日以后才看到了这些照会。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向伦敦“泰晤士报”透露的布奥尔伯爵给巴拉宾先生的照会只是奥地利照会的一部分;其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地方被删去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力求指出这些被删去的地方,好让约翰牛能够通过纽约去了解英国政府认为交给它那大智大慧的头脑去考虑是不无危险的那些外交新闻。

只要看一下布奥尔给巴拉宾先生的照会,就会明白,召开会议的提议是俄国提出来的,或者换句话说,这是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联合棋手们共同走出的一着棋。这个事实大概是想让我们为唐宁街

直译是:从降神机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转意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物或情况。——编者注

主子们的智慧或诚意而惊叹,这些人甚至在议会中野心勃勃地要求把这项发明的专利特许证发给他们。从照会本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奥地利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同意与其他大国会谈(法国“通报”关于奥地利赞成召开大会的建设的报道煞费苦心地掩盖了这一点)。

布奥尔伯爵说:“除了这个问题,即消灭‘撒丁的政治制度’以外,各大国如果认为还应当提出其他问题来讨论,就必须事先明确规定,既然这些问题将要涉及其他主权国家的国内制度,本人不能不首先坚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程序必须符合1818年11月15日亚琛议定书上规定的原则。”

可见,奥地利是根据以下四个条件接受俄国关于召开大会的建设的:第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贬斥撒丁并通过有利于奥地利的决定;第二,必须承认亚琛议定书¹⁸⁹是讨论的基础;第三,“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撒丁必须解除武装”;最后,需要讨论的问题“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第一点用不着再加解释。为了不致对这一点的意义有任何怀疑,布奥尔伯爵特意补充说,他认为这“对于从道义上安抚意大利是唯一的、极端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承认亚琛议定书——就是要法国直接承认1815年条约和奥地利同意大利各国签订的各项专门条约。但是,波拿巴所希望的,恰好是废除奥地利据以对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实行统治的1815年条约,以及废除保证奥地利对那不勒斯、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地那和罗马的重大影响的各项条约。第三个条件——预先解除撒丁的武装——是奥地利方面打算预先取得只有打胜仗时才能使它得到的优势。最后一个条件——预先规定需要讨论的问题——将使波拿巴失去他除了备战所必需的时间以外还希望依靠会议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即失去这样一些机会:出其不意地抓住奥地

利,使它陷入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的圈套,迫使它断然拒绝满足法国和俄国向它突然提出的要求,发出和谈破裂的信号,从而在欧洲舆论面前使它威信扫地。

奥地利在给俄国大使的同意参加大会的照会中提出的条件可以概括如下:奥地利可以参加欧洲会议来解决意大利问题,但在会议开幕前欧洲各大大国必须同意支持奥地利反对撒丁,强迫撒丁解除武装,承认维也纳条约和以维也纳条约为基础的各项补充条约,最后,还必须使波拿巴失去破坏和平的一切借口。换句话说,奥地利同意参加会议,只要会议在开幕前就接受一种义务的约束,即把奥地利现在宣称准备以武力去获得的一切都让给它。如果我们注意到,奥地利非常了解会议不过是决心要发动战争的敌人给它设置的一个圈套,那谁也不会因为它对俄法两国的建议采取如此讥讽的态度而责难它了。

我所评述的奥地利文件中的这些地方,恰好是不列颠政府认为适宜于发表的。而布奥尔信件中的下面几个地方,在马姆兹伯里的编辑部发表的奥地利照会中却被删去了:

“皮蒙特一旦解除武装,奥地利亦将解除武装。奥地利将用一切方法维护和平,因为它希望和平,也善于珍视和平。但是,它希望的是真诚的、持久的和平。它公正地认为,它在自己的威力和荣誉不遭受损害的情况下能够保证这样的和平。为了在意大利保持安定的局面,奥地利已经做出了许多牺牲。在上述先决问题未作规定和处理以前,奥地利可以减少自己的备战活动,但是不能完全停止。它的军队将继续开往意大利。”

在俄法两国的诡计因此被揭穿以后,英国由于受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它的至圣的盟友的唆使,也插进手来,想使奥地利接受关于召开大国会议来研究意大利问题上的纠葛的建议,并表示希望奥皇政府同意唐宁街草拟的初步建议。在外交编年史中,恐怕找不到

比布奥尔伯爵给英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复照更带有侮辱性讽刺的文件了。首先,布奥尔重申了他自己的要求,即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撒丁必须放下武器,从而听凭奥地利摆布。

他说:“在撒丁尚未完全解除武装并开始解散 corps francs(志愿军)以前,奥地利不可能出席会议。奥皇政府声明,如果这些条件实现了,它准备以最正式的方式提出保证,既然撒丁尊重帝国及其各同盟国的领土,因此在会议进行期间,奥地利将不进攻撒丁。”

可见,如果撒丁解除武装,奥地利只答应在会议进行期间不再进攻已解除武装的撒丁。布奥尔对英国的建议的答复完全是按照尤维纳利斯的精神写成的。至于英国建议“1815年各项有关领土的协定和条约原封不动”这点,布奥尔高声答道:“完全同意!”只是补充说,甚至连“为了履行1815年的条约而签订的条约也应当原封不动”。英国想找到保证维护奥地利和撒丁之间的和平的办法,这个愿望被布奥尔解释为“会议将研究迫使撒丁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方法”。对于“解放教皇国并讨论在意大利各国实行改革”这项建议,布奥尔同意让欧洲“全面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同时认为“直接有关的各国”“应保留最后是否接受拟定的建议”的权利。至于英国打算用以“代替奥地利和意大利各国之间的专门条约的计划”,布奥尔坚持“条约继续有效”,但是,如果撒丁和法国同意把关于它们的领地(撒丁据有热那亚,法国据有科西嘉岛)的问题作为讨论的对象,他同意修改这些条约。奥地利对英国的建议所做的答复,实质上也就是它已经对俄国的紧急公函所做的答复。在遭到了这第二次的失败以后,俄国和法国就促使倒霉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向奥地利提出全面裁军作为先决步骤。显然,在土伊勒里宫中人们都以为,奥地利在军备方面既然超过了

它的一切对手，对于这种建议就一定会断然拒绝。但是，波拿巴的这个主意又打错了。奥地利知道，波拿巴不使自己同时摆脱皇冠这种令他烦恼的负担，是不可能裁军的。因此，奥地利同意了这个以为它必然会拒绝而提出的建议。这使土伊勒里宫陷于极端仓皇失措的境地，它经过 24 小时的考虑以后，以一个发明丰富了世界，它说“各大国同时裁军除了意味着奥地利裁军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意思”。请读一下直接受拿破仑第三支持的报纸“祖国报”¹⁹⁰下面这篇蛮横无理的短文吧：

“无论如何，关于裁军的建议应当只涉及两个大国——奥地利和皮蒙特。奥地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意大利集结自己的兵力，皮蒙特由于伦巴第驻有奥地利军队，不得不准备防御以对付战争的威胁。奥地利提出的裁军问题，首先应该由它自己来解决；当它从意大利撤回自己的军队时，皮蒙特就只有效法它的榜样了。

至于法国，它没有理由要实行裁军(elle n'a pas à désarmer)，原因很简单，它没有进行任何特别的扩军活动，它没有陈兵边境，它甚至不愿意使用自己对付奥地利威胁的权利，这种威胁旨在反对皮蒙特，反对欧洲和平。对于法国来说，连裁减它的军队战斗人员中的一个士兵，把一门多余的大炮交回军火库的问题也谈不上。如果说事情与它有关，那末裁军只能意味着承担不进行扩军活动的义务。

我们不认为，奥地利对这一点全有什么异议；奥地利建议裁军(它非常清楚，它应当倡议裁军)，希望以此——毫无疑问，是怀着比较良好的情绪(mieux inspiré)——作为对维护欧洲和平的保证，而它的异议就等于使这种保证化为乌有。”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4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2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 扩军备战¹⁹¹

1859年4月22日于伦敦

在德国的大学里,每当学校领导在夜间11时左右把学生赶出啤酒馆以后,如果天气好的话,各社团的学生通常便聚集在市场的广场上。在这里,各个社团或“派别”的成员开始同其他“派别”的成员做互相“嘲笑”的竞赛,目的是想挑起一场流行的不太危险的决斗,这种决斗是大学生生活中最明显的特色。在市场的广场上进行这种挑衅性的口角竞赛时,主要的技巧在于嘲笑得体,不加正式的或公开的侮辱,但同时又能尽可能地激怒对方,使他最后失去冷静,破口辱骂,而你也就不不得不向他提出决斗。

正是这样的预赛已经在奥地利和法国之间进行了几个月了。法国在今年1月1日挑起了这场口角,奥地利也反唇相稽。双方言语来语去,指手划脚地越来越接近挑战了;但是,根据外交礼节,这种口角还需要进行到底。于是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建议、反建议、让步、条件、保留意见和诡辩。

下面就是外交口角的最近的一个例子。4月18日,得比勋爵在上议院宣称,英国正在作最后的努力,如果失败,它将放弃调停。只过了3天,即4月21日,“通报”就报道英国已向其他四大强国

提出了下列建议：(1)在和平会议召开之前就实行同时的全面裁军。(2)裁军应在军事的或非军事的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不受和平会议约束(这个委员会应由6名委员组成，其中1名由撒丁委派)。(3)上述委员会一开始工作，就同时召开和平会议讨论政治问题。(4)和平会议开幕后，应完全像1821年会议¹⁹²那样，立即邀请意大利各国的代表与列强的代表一起讨论。同时，据“通报”报道，法国、俄国和普鲁士都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议，而都灵发来的电报又带来了使欧洲各交易所安心的喜讯：路易·拿破仑促使皮蒙特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异乎寻常地平静，似乎召开会议的一切障碍必然会消除。实际上，计划是非常明显的。法国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而奥地利则准备好了。路易·拿破仑为了使人对他的真实企图不致产生任何怀疑，曾通过半官方的报刊清楚地表示，这次裁军只适用于奥地利和皮蒙特，因为法国并没有扩军，自然不可能裁军；同时他在官方的“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措词巧妙，对于把“裁军原则”扩大到法国来的义务推卸得干干净净。显然，他的下一步是把关于法国没有扩军的半正式声明变为正式声明；这样一来，就可以顺利地把问题置于谈论军事细节的捉摸不定的基础上，于是也就可以轻易地用主张、反主张、要求证据、反驳、发表公报和诸如此类的狡猾手段，把争论几乎永无止境地拖延下去。这时，路易·拿破仑就能够从容地做好准备，而根据他的新原则，他可以不承担这些准备是扩军，因为他需要的不是人(至于人，他在任何一天都可以征集)，而是军用物资和新编部队的组织。他自己宣布，在今年6月1日以前，他不能作好战争准备。实际上，如果他的准备工作在5月15日以前完成，他就能利用自己的铁路，在这个期限内召回归休兵，到6月1日前后，归休兵就能归队。但是，可以

有可靠的根据来设想,由于宫廷做出的好榜样,在法国军事主管部门内存在着大量盗用公款、混乱、受贿和挥霍的现象,因而物资的必要准备甚至在路易-拿破仑本人最初确定的期限内也不可能全部完成。不管怎样,战争的爆发每推迟一个星期,无疑都使路易-拿破仑占便宜,使奥地利吃亏。奥地利由于这一外交插曲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它在军事准备方面先于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军事优势,而且会被继续以现有规模进行军事准备所必需的大量军费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奥地利很了解目前的情况,因而不仅拒绝了英国关于根据来巴赫会议所依据的条件召开会议的提议,而且还第一个发出了战争的信号。居莱将军代表奥地利向都灵宫廷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裁军和遣散志愿军,而且限皮蒙特在3天以内作出决定,超过3天就要宣战。同时,奥军还有两个师计3万人开赴提契诺河。由此可见,拿破仑在外交上把奥地利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他迫使奥地利最先说出了这句神圣的话——宣战。然而,如果奥地利不因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威胁性的照会而放弃自己的步骤,那末,波拿巴的外交胜利可能使他失去皇帝的宝座。

与此同时,备战狂热也遍及其他国家。德国各小邦正确地认识到路易-拿破仑备战对它们的威胁,已使自己的民族感情发挥到从1813年和1814年以来在德国从未有过的高度。它们正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于这种“民族感情”。巴伐利亚及其邻近各邦正在征集预备兵和后备军,建立新的部队。德意志联邦军队的第七军和第八军(由上述各邦组成),原来的编制名额为66000名现役兵和33000名预备兵,将来参加战争时可能达到10万名现役兵和4万名预备兵。汉诺威和北德意志其他小邦(它们组成联邦军队的第十军),也

在同样程度上进行扩军,同时还加强海岸防御以防来自海上的袭击。普鲁士由于在 1850 年动员¹⁹³期间和动员以后进行了准备,在军事技术方面处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它已经从容地进行了动员军队的准备工作。现在,它正日益普遍地用针发枪装备自己的步兵,并在不久以前用十二磅炮装备了全部步炮兵;同时正在使莱茵河上的要塞作好战斗准备。它已经命令它的 3 个军作好军事行动的准备。同时,它在法兰克福的联邦军事委员会内的态度令人信服地证明,它非常了解路易-拿破仑的政策对它的危害程度。虽然它的政府还在犹豫不决,但是舆论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虽说这时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戾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少,但是毫无疑问,路易-拿破仑在德国方面将遇到法国从未遇到过的最齐心的、最坚决的敌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4 月 21—22 日

载于 1859 年 5 月 9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63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战争的前景

近两个月来,每当我们探讨目前将欧洲卷入其中的这场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开始以前各方面的潜力和战略形势时,总有人对我们提出一些肤浅的批评。对于这一切,我们曾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可是现在我们得到了证实我们观点的极其完备而详细的、而且无疑也是读者们很关心的论据,以致我们可以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这些论据就是今天本报满栏刊载的许多详细报道,这些报道鲜明地描述出这个可怕而激动人心的戏剧的最初几幕。

早在两个月以前,我们就已指出,奥地利正确的防御方法是进攻。我们曾经断言,虽然奥军驻意大利部队基本上已经集中在皮蒙特防御阵地附近,而且还有良好的装备和充分的战斗准备,但是如果利用他们对于还在分散中的敌人的这种暂时的优势,不迅速进入撒丁领土,首先击败撒丁军队,然后进攻那些必然以几个纵队通过阿尔卑斯山因而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的法军,那末,他们还是会犯大错误的。我们这个结论,在多少有些名气的、多少了解一些战略的各种评论家之中,遇到了相当多的反对意见。但是很清

楚,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的一切军事专家都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奥地利将军们的意见也是这样。不过,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很多了。

既然战争已经开始,那末就来看一看双方的兵力对比和取胜的可能性吧。

奥军在意大利有5个军——第二、三、五、七、八军,至少有26个步兵团(每团5个营,其中有1个掷弹兵营)和26个轻步兵营,共计156个营,192 000人。加上骑兵、炮兵、工兵和守备部队,他们的兵力至少有216 000人。我们不知道,在新锐的边屯团和预备兵员开入意大利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多少,但是兵力增加这点是几乎用不着怀疑的。不过我们还是以216 000人这个最低数字为准。其中为了防守奥军企图在伦巴第固守的一切要塞、堡垒和营垒,有56 000人就足够了。但是我们按最多需要66 000人计算,那末用来侵入皮蒙特的军队还有15万人。根据某些电讯报道,入侵的奥军为12万人,对这些材料当然是不能全信的。不过,为了防备万一,我们假定它用来作战的至多有12万人,那末同这支兵力充实的军队交战,法军和皮蒙特军队会怎样配置呢?

皮蒙特军队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之间,在我们几个星期以前所提到的那个阵地上。他们由5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组成,共有基于步兵(包括预备兵员在内)45 000人,猎兵6 000人,骑兵和炮兵将近9 000人,全部共计6万人。这是皮蒙特所能派出作战的最大兵力。其余15 000人要用来执行警备勤务。意大利的志愿军还不能用来和敌人在战场上作战。

我们已经说过,从战略上看来,皮蒙特的阵地不能从南面迂回,但可以从北面迂回;然而在北面,皮蒙特的阵地有在卡萨勒以东约4英里处流入波河的塞齐亚河作掩护,如果电讯报道可信的话,撒丁军队准备坚守该河。

6万人在遭到占一倍优势的敌军攻击时,要在这个阵地上进行决战,那是十分荒唐的。根据一切可能性看去,撒丁军队将在塞齐亚河上进行一些表面的抵抗,使奥军暴露全部兵力,然后放弃直通都灵的道路,退到卡萨勒和波河以南。假定英国的外交不使军事行动再次延期的话,这一行动可能在4月29日或30日发生。到第二天,奥军将企图渡过波河,如果渡河成功,他们会在平原上把撒丁军队驱逐到亚历山大里亚。他们可能让撒丁军队在那里停留一些时候。必要时,奥军纵队将由波河以南的皮阿琴察出动,来破坏热那亚和亚历山大里亚之间的铁路,并攻击由热那亚向亚历山大里亚运动的法军的任何一个军。

那末根据我们的推测,法军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当然,他们将仓卒地向未来的战场——波河上游谷地出动。当关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阿尔卑斯军团的兵力,驻在里昂附近的有4个师多一点,还有3个师可能驻在法国南部和科西嘉岛,也可能正在集结。此外有1个师由非洲开来,现正在途中。这8个师应编成4个军;法军的第一支预备队是驻巴黎的基干师,第二支预备队是近卫军,算在一起共有12个基干师和2个近卫师,编为7个军。12个基干师(每个师在归休兵回队以前计有1万人)共有12万人,如加上骑兵和炮兵,则有135000人,再加上3万近卫军,总数将为165000人。如把召回的归休兵计算在内,这支军队的总数将达20万人。目前一切都很顺利,这

是一支很出色的军队,并且人数也很多,足以征服甚至比意大利大一倍的国家。他们需要在5月1日或者在这前后到达皮蒙特谷地,但是到那时,他们可能在什么地方呢?麦克马洪军大约在4月23日或者24日已被派往热那亚;但因为事先没有集中,所以在30日以前不能由热那亚出发。巴拉盖·狄利埃军在普罗凡斯,有一个消息说,该军将经过尼斯和田达山口前进,另一个消息说,该军将乘船出发并在地中海岸登陆。康罗贝尔军必须经过蒙塞尼山口和蒙热涅夫尔山口进入皮蒙特,其余各部队则在先后到达边境后随即沿同样的道路前进。现在我们确实知道,在4月26日以前任何法军部队都没有进入撒丁领土,而巴黎军团中的3个师在24日仍然在巴黎,只有1个师在当天由铁路调往里昂。此外,可以预料到,近卫军出动不会早于27日。这样,假定我们前面列举的其余一切部队都已集中在边境,并准备出动,那末共有8个步兵师,即8万人。其中2万人正调往热那亚;2万人在巴拉盖指挥下,由田达山口进入皮蒙特(只要他们确实是开往皮蒙特);还有康罗贝尔和尼耶尔指挥的4万人将经由蒙塞尼山口和蒙热涅夫尔山口前进。这便是路易·拿破仑在皮蒙特军队急需他援助的时候,也就是奥军可能在都灵出现的时候,所能握有的全部兵力。同时顺便指出,这一切情况完全符合我们在几星期以前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但是,路易·拿破仑即使能控制全世界所有的铁路,也无法在最初几次战斗开始以前把余下的巴黎军团的4个师及时调来,他将不得不任奥军在整整两个星期内对皮蒙特人为所欲为;但即使在两个星期以后,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希望也非常小,因为他的8个师这时还分别在两条山道上,而在他们的会合地点则有着至少在数量上与他们相等的敌军。不过,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一个人,从政治上说是不

能允许敌人在整整两个星期内横行于皮蒙特的 ,因此一当奥军挑战 ,他就不得不应战 ,而且将在不利的情况下作战。法军通过阿尔卑斯山越早 ,对于奥军便越有利。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4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5 月 12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34 号

卡·马克思 金融恐慌

1859年4月29日于伦敦

昨天是外国证券和股票的支付日期，23日开始的交易所的恐慌状况也几乎达到了顶点。从上星期一以来，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宣布破产的就有28家，其中18家都是在28日发生的。引起破产的债额中有一家达到了10万英镑，大大超过了这种“死刑的执行”通常所要求的平均额。英格兰银行的经理们同时把贴现率从 $2\frac{1}{2}\%$ ——这是1858年12月9日规定的水平——提高到 $3\frac{1}{2}\%$ ，这种由于购买运往印度的白银所引起的黄金外流而产生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混乱现象更为加剧。利率3%的统一公债在4月2日是以 $96\frac{1}{4}\%$ 开盘的，4月28日就跌到89%，有几个小时甚至跌到 $88\frac{1}{4}\%$ 。利率 $4\frac{1}{2}\%$ 的俄国证券在4月2日按足价开盘，4月28日就下跌到87%。在同一个时间内，撒丁证券从81%跌到65%，利率6%的土耳其公债券从 $93\frac{1}{2}\%$ 跌到57%，虽然后来又回升到61%。利率5%的奥地利证券开盘牌份很低，只有49%。引起本国和国外的有价证券这样大跌价以及随之而来的铁路股票尤其是意大利铁路股票的同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关于奥地利军队侵入撒丁，法国军队开往皮蒙特，法国、俄国和丹麦签订攻守同盟条约¹⁹⁴的消息。诚然，在这一天，电讯曾报道说，“立宪主义者

报”对法国和俄国签订攻守同盟条约一事进行辟谣。但是，尽管证券交易所的聪明人无疑地具有一切轻信和乐观的秉赋，他们这一次却敢于不相信法国的这些半官方的声明。他们还不能够忘记，只不过在一个星期以前，“通报”曾大胆否认法国在进行武装或者打算武装起来。况且，虽然法国的预言家否认条约的存在，但是他承认，在东西方西位专制君主之间已经达成“协议”，所以，辟谣最多只不过是文字游戏。同破了产的不列颠经纪人一起垮台的还有 1200 万英镑的俄国公债。如果当时奥地利没有突然决定向撒丁发出最后通牒，这批俄国公债是一定会被伦巴特街吞掉的。伦敦“泰晤士报”金融论文的作者辛普森先生对于俄国公债这个肥皂泡是怎样破灭的，发表了如下有趣的意见：

“当前形势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公众摆脱了这次预定要发行的俄国公债。虽然从克里木战争由于我们‘盟国’的影响以及各国皇帝随后在斯图加特的会晤而提前结束的时候起，这个大国的阴谋就已昭然若揭，但是很明显，除了提出完全无可辩驳的证据以外，无论什么警告也不能阻止它得到它所希望的任何数目的款项，只要有一家殷实的银行肯承担这项交易就行了。因此，在一两个月以前，当取得 1 200 万英镑的方案提出来的时候，一切有关方面都显得精神振奋和充满信心。让英国的财主们随意去做吧，他们能够得到的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人们操心的是，想以比在伦敦市场上的售价高一两厘的利息得到这批公债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他们听取任何警告，那希望是很小的。的确，在这些事情上通常竞争得相当激烈的贝林先生和路特希尔德先生，在这一次并没有表现出想同公债发生关系的任何兴趣。此外，有消息说，在格鲁吉亚秘密地集结了 10 万俄国军队。还有消息说，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已经公开声明说，拿破仑皇帝关于修订 1815 年条约的要求是完全公正的；最后，不久以前想要废除巴黎和约有关多瑙河两公国这部分的努力，康斯坦丁大公在地中海所做的旅行，为了使考莱勋爵的和平使命遭到破产而作的巧妙的安排，——这一切可以料想得到已经足以引起波动了。但是，无论什么也不能影响抱着乐观情绪的英国存款人，他们贪恋一切能

使他们得到利率 5% 收入的证券,对那些危言耸听之徒鄙视到极点。所以,负责推销公债的那些人的希望不会减少,事实上就在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发出以前一两天还开过最后几次会议,为随时宣布发行公债做好一切准备。只要法国的‘通报’最后再作一次安定人心的保证,重申以前已经做过的关于法国没有进行武装也不打算武装起来的保证,就算万事大吉了。但是,不愿意坐待它的敌人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全部东西的奥地利采取了一个‘罪恶’的步骤,结果事情完全搞糟了,这样一来,为数 1 200 万英镑的款子现在仍旧不得不在英国了。”

在巴黎,金融市场上的恐慌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现象,当然要比伦敦交易所的混乱现象厉害得多。但是,刚刚通过自己在立法团中的奴仆为自己表决了发行 5 亿法郎的新公债的路易-拿破仑,严格禁止在报刊上对这些不利的事件作任何报道。不过,看了下面我从官方的行情通报上摘来的这个表以后,我们就能够对当前形势作出一个正确的估计:

	3月24日		4月7日		4月28日	
	法郎	生丁	法郎	生丁	法郎	生丁
利率 3% 的无斯公债.....	69	20	67	95	62	00
法兰西银行的股票.....	2865	00	2840	00	2500	00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	805	00	707	50	530 至 542	00
奥尔良铁路股票.....	1368	00	1257	50	1150	00
北部铁路股票.....	940	00	915	00	835	00
东部铁路股票.....	682	00	627	50	550	00
地中海铁路股票.....	850	00	830	00	752	00
南部铁路股票.....	523	00	503	75	412	50
西部铁路股票.....	600	00	537	50	485	00
日内瓦铁路股票.....	540	00	520	00	445	00
奥地利铁路股票.....	560	00	536	25	406	25
维克多-艾曼努尔铁路 股票.....	400	00	390	00	315	00
伦巴第-威尼斯铁路股票...	527	50	512	50	420	00

英国金融界的聪明人现在对不列颠政府非常愤恨,指责它使自己成了欧洲外交界的笑柄,更重要的是,它由于固执地无视事实和考虑不周贻害了商界。的确,得比勋爵在演这出谈判喜剧的全部过程中都让法国和俄国把他当足球一样踢来踢去。他并不满足于已往接连不断地失策,在得到奥地利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时,他又上了同样的当。他在伦敦市长家中进午餐时把奥地利最后通牒痛斥为“罪恶的”,可是甚至在当时,他对俄法条约也是一无所知。他那个自以为奥地利不可能不接受的最后的调停建议,只不过是一个竞选诡计,它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再给波拿巴 48 小时的时间去集结军队,阻碍奥地利必然要采取的行动。这个骄傲的贵族的外交洞察力不过如此而已,而他还在反抗议会的民主改革¹⁰⁵,说什么这种改革会从世袭政治家的老练的手中把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夺去。最后我要指出,托斯卡纳和各公国¹⁹⁵的起义为奥地利占领这些地方提供了理想的借口。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4 月 29 日

载于 1859 年 5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3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甜言蜜语

4月27日路易·拿破仑通过他的外交代表送交欧洲各国政府的照会，以及5月3日他向自己的立法团发出的呼吁表明，这位皇帝完全明白，干涉意大利事多的动机和最终目的遭到了多么普遍的怀疑，他正竭尽全力来消除这些怀疑。在照会中，他力图证明，在干涉的问题上，他一直不过是按照英国、普鲁士和俄国的意图行事的。他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所有的大国都和他一样不满意意大利的现状，同样都相信由于那里流行的不满和进行的秘密鼓动而造成的危险，都在同样程度上力图通过明智的预防措施来防止不可避免的危机。但是，当他举出考莱勋爵前往维也纳的使命¹⁹⁶、俄国提出的召开大会的建议和普鲁士对这些措施的支持作为证明时，他显然忘记了，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决不是意大利，这些措施的目的和促使采取这些措施的动机，是奥地利和法国之间已经形成的决裂，同这种决裂比较起来，意大利的不满和骚动就无足轻重了。

只是由于拿破仑对意大利事务突然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才使其他欧洲大国把意大利问题看得异常重要。虽然奥地利首先开始了军事行动，但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如果撒丁没有受到拿破仑的唆使（无论普鲁士或英国都没有参加这种唆使），并且随后又采取

了一些步骤,那就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设想,军事行动会开始。其实,法国根本没有协同其他大国一起来友好地调解奥地利和撒丁之间的纠纷;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是:只是在法国实际上已经卷入这一冲突的时候,其他国家才认为有必要较认真地关心这件事,并且已经不再把它当作意大利问题,而是当作全欧性的问题来看待了。只有法国一个国家感到自己负有使命来捍卫撒丁以反对奥地利的进攻,正是这个情况反驳了那种企图硬说法国在意大利问题上同其他大国步调完全一致的意见。无论是在这份照会中,或者是在向立法团的呼吁中,法国皇帝都特别坚决地否认他个人有任何虚荣心,有任何占领欲,有任何在意大利确立法国势力的愿望。他想使人相信,他只是致力于确立意大利的独立和恢复由于奥地利的优势而遭到破坏的均势。谁记得法皇所作的声明和他在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时所立的誓言,谁就未必会盲目地相信他的一纸宣言;甚至连他的这些安定欧洲的恐惧情绪和消除欧洲的怀疑的企图,也包含着在很大程度上指望产生相反效果的暗示。

谁也不会怀疑,路易·拿破仑现在真心希望防止英国和德国对他的反奥战争的任何干涉。但是,这远远不足以证明,他只是力图解决意大利问题。我们假定他是力图称霸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宁愿一个一个地对各个大国作战。他对笼罩着德国某些邦的激昂情绪感到惊异,虽然引起这种激昂情绪的仍然是他用来解释他急于帮助撒丁的那些原因。

如果说法国和撒丁接壤,并且由于已往的传统、共同的起源和不久前缔结的联盟而和撒丁联系在一起,那末在德国和奥地利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甚至是更密切的联系。如果拿破仑不想坐待自己有一天不得不面对奥地利战胜撒丁的既成事实,那末德国人也

不打算眼看着让法国彻底战胜奥地利成为既成事实。至于路易·拿破仑力图侮辱奥地利,至少力图把奥地利从意大利驱逐出去,这一点他是不否认的。诚然,他否认有任何占据意大利领土或在意大利获得势力的意图,他宣称,战争的目的在于恢复意大利的独立,而不是要强迫它更换主子。但是请大家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当有人打算恢复各意大利政府的对奥独立的时候,而那些被路易·拿破仑说成是“骚乱的煽动者和旧集团的不可救药分子”的人却要去惊扰——看来定会发生——这些政府。

那时会怎么样呢?

路易·拿破仑说道:“法国表示了它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

按照他的声明,他之所以享有现在的权力,正是归功于这种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他把这种对无政府状态的憎恨作为一种理由,用来替自己解散国民议会、违背自己的誓言、用武力推翻共和政府、取消一切出版自由、把所有反对他的绝对专制的人加以放逐或发配到凯恩去的行为辩护。扑灭无政府状态在意大利是否也能同样好地为他效劳呢?既然“对骚乱的煽动者和旧集团的不可救药分子的镇压”证明取消法国的自由是正确的,难道这就不能同样作为取消意大利独立的漂亮借口吗?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5 月 6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5 月 1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3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 对战争的态度

1859年5月10日于维也纳

战争的来势看起来是那样凶猛,而进程却很缓慢,这使维也纳公众产生了不耐烦和失望的情绪,于是政府只得在首都的所有墙壁上张贴下面的通告:

“奥地利报纸所发表的一切有关帝国军队调动的消息,完全有可能在几小时内就为敌人获悉并加以利用,因此我们有责任在向公众作所有这类报道时持最审慎的态度。根据最近的消息,帝国军队占领了波河和塞齐亚河大间的阵地,它可以作为进攻的基地。塞齐亚河上的一切渡口都在帝国军队的控制之下,虽然波河水势继续上涨,使帝国军队无法把足够的兵力调到右岸去,但是庞特库罗涅和沃格拉之间的地区仍有帝国军队重兵把守,同时瓦兰察附近的铁路桥梁已被我军炸毁。”

不言而喻,奥地利政府多少有些惶惶不安地在注视着意大利各小国中的局势。陆军部发表了下列有关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材料。

托斯卡纳。4个基干步兵团,每团2个营,每营6个连,共6833人;1个猎兵营,由6个连组成,共780人;1个海岛猎兵营,780人;若干志愿猎兵营,共2115人;1个老兵营,320人;1个惩戒队,150人;2个龙骑兵连,共360匹马;1个炮兵团,由8

个连组成，每连 6 门炮；1 个岸防炮兵营，计 2 218 人；1 个宪兵团，1 800 人。加上相应的司令部、工兵、水兵等等，共 15 769 人。

帕尔马。禁卫军、执戟兵和响导兵，共 179 人；2 个基干营，1 个猎兵营，共 3 254 人；1 个炮兵连，84 人；工兵 14 人；4 个宪兵连，共有 417 人；加上司令部、指挥人员、教导队和工役连，共有 4 294 人。

摩地那。4 个基干团，每团只有 1 个营，共有 4 880 人；1 小猎兵连，120 人；3 个龙骑兵连，共 300 人；1 个六门制野炮连，150 人；1 个十二门制岸防炮连，250 人；1 个工役连，130 人；1 个工兵连，200 人；此外，还有若干数量的老兵、执戟兵等等，共有 7 594 人。

圣马力诺。这个小共和国的军队共有 800 人。

罗马。2 个瑞士步兵团（第三个团目前正在建立），共有 1 862 人；2 个意大利团，人数同前；2 个驻地固定的营（相当奇怪的兵种），共有 1 200 人；1 个龙骑兵团，670 个骑手；1 个炮兵团，由 7 个连组成，每连 4 门炮，共有 802 人；宪兵 4 323 人；加上司令部、工兵等等，共有 15 255 人。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4 个瑞士团、2 个那不勒斯近卫掷弹兵团、6 个掷弹兵团、13 个步兵团、1 个有若干后备连的马枪兵团，共计 57 096 人；12 个猎兵营，共 14 976 人，再加上若干后备连，共 16 740 人；9 个骑兵团，2 个重龙骑兵团，3 个龙骑兵团，1 个马枪兵团，2 个枪骑兵团，1 个猎骑兵团，共有 8415 个骑手；2 个炮兵团，每团有 2 个野炮营和 1 个攻城炮兵营，或者说每一个团有 16 个共有 128 门火炮的野炮连和 12 个攻城炮兵连，连同辎重队共有 52 000 人。再加上拉戟兵、工兵、响导兵，禁卫军等等，总

计 130 307 人。

那不勒斯舰队包括 2 艘有 80 门和 84 门火炮的战列舰，50 艘有 10 门火炮的帆力巡航舰和 12 艘有 10 门火炮的蒸汽巡航舰，2 艘帆力轻巡航舰和 4 艘蒸汽轻巡航舰，2 艘纵帆船，11 艘不大的轮船，10 艘臼炮舰和 18 艘炮艇。

奥地利政府多少预见到了托斯卡纳事件¹⁹⁵，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估计到了这些事件。但是真正使它担心的倒是普鲁士政府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犹豫不决的和毫不友好的立场。普鲁士政府在进行武装，因为舆论的坚决要求迫使它这样做，但同时可以说，它进行的外交活动又在解除这种武装。读者都知道，目前普鲁士内阁的成员，尤其是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都是属于那个在德国以哥达党¹⁹⁷闻名的政党的。这个党自我陶醉于一种幻想，以为奥地利的复灭会帮助普鲁士建立起一个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新德国。这个党假装相信波拿巴外交家们的保证，他们说战争将“局限”在意大利，在南锡建立一个由佩利西埃指挥的法国监视军，其目的不过是稍稍安慰一下这位“名扬四海的军人”。*en passant*（顺便）提一下，宣扬这种安定人心的论调的那一号“通报”同时还公布了关于在巴黎建造一座洪堡雕像的敕令。这种手法至少表明，在波拿巴看来，用雕像收买哥达党，也像用腊肠收买法国的朱阿夫兵¹⁹⁸一样容易。据一个可靠的消息说，奥地利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提出了一项建议，要德意志联邦表明态度：波拿巴参加意大利斗争是不是对联邦本身的威胁，但是由于普鲁士的奸计，议会至今拒不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普鲁士是对的，它抗议大多数德

国小邦的《Landesväter》〔“国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的企图，但是，既然这样，它就应当自己采取主动，自己拿出捍卫德国所必需的办法来。它至今却遵循着完全相反的行动路线。4月29日，普鲁士向德意志联邦各个成员国发出了一份照会，相当坚决地劝告它们要慎重和小心。为了回答这份照会，南德意志各邦政府以意味深长的语调提醒柏林内阁记住一句罗马名言：《Caveant consules ne quib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¹⁹⁹。

它们宣称，它们相信，严重威胁德国安全的时刻已经到来，可以无所作为的时期无疑已经过去。普鲁士政府在自己的领地上，找到各种各样的同盟者。除了哥达党本身而外，首先还有，宣扬中立的亲俄派。其次是一个以“科伦日报”²⁰⁰代表的，由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商人组成的极有影响的党派，他们的物质利益从属于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因而也从属于波拿巴制度。最后，还有一个冒牌民主派，这伙人装作对奥地利暴行是那样的愤慨，以致打算把十二月英雄的政策看成是自由主义。我敢断言，这派人中的某些人无疑已经被拿破仑的金币收买了，这桩出卖良心的生意的主要组织者住在瑞士，他本人按国籍来说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曾是1848年德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和狂热的激进分子²⁰¹。你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维也纳这里人们正警惕地注意着普鲁士反中立主义的每一次表现；一位普鲁士十字军远征史专家弗里德里希·冯·劳麦先生以“普鲁士的观点”²⁰²为题写的一篇不长的、公开批驳哥达党理论的宣言被捧上了天。从下面摘录的几段文字中读者可以了解这篇宣言所流露的思想：

“有一派人硬说，普鲁士应该保持最充分的独立自主，既不要受各种事件的迷惑，也不要听信那些想把德国的政策引上错误道路并促使它采取仓卒措

施的人的迫不及待的要求。这派人说，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这种倾向；既然德国的大邦之一卷入了意大利战争，那末德国的其他各邦就应该团结在作为德国政治的天然中心的普鲁士周围。

不对这些规劝的真正意义加以详尽的分析，我们是不能随便听信的。首先，硬说普鲁士有最充分的独立自主，这是夸大其词。相反地，普鲁士完全正确地作了观察，它探询过、表示过愿望、警告过、劝导过，因为它处于四个强国包围之中，事实上不可能企求充分的独立自主，它要顾及自己邻邦的行动，而又不能牺牲自己的真正使命。普鲁士进入大国的行列，不是由于它的疆域，而是由于它的明智、它的决心和毅力。如果缺少这些品质，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它就会沦为二流国家，受其他大国的轻视，而且可能还会受其他大国的统治。

整整四个月，外交界在全力同拿破仑第三这样的敌人进行斗争，但是毫无结果，而且彻底破了产。饱经忧患的德国人深刻了解到，荣誉、责任和确保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是什麼，他们开始不能忍受，不愿意再把虚幻的云彩当成坚固的岩石，这难道不是自然的，难道不值得称赞吗？

当一切基本条件都已发生变化，而对我们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已经到来的时候，怎么还能死抱住旧有的观点！既然调停的立场没有带来什麼结果，那末，可以怀疑，这种立场是否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呢？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采取像在法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上采取的立场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呢？普鲁士持这种虚伪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德国没有任何好处，也没有博得法国人的同情，然而却减少了德国其他各邦对普鲁士的好感和信任。

我们再说一遍：没有德国，普鲁士归根到底不能成为一个大国。那种让奥地利听天由命和把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普鲁士身上的建议和忠告，无异于断送德国。有人建议：应当仿效美狄亚，把终于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德国切成碎块，扔进女妖的魔锅里；同时还要它相信外交厨师们会设法把它再拼在一起而使它复活。我们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公开宣扬和暗中偷运的关于奥地利德国和普鲁士德国的理论更荒唐、更缺乏爱国主义和更有害的了，因为正是这一应受谴责的关于某一条把我们祖国弄得支离破碎的分界线的理论，在 1805 年传播得很广，并导向 1806 年。

整个德国的利益同时也就是普鲁士的利益，而奥地利几百年以来，虽然

有许多缺点、错误和失败，却始终是德国反对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支柱。再过几个星期，意大利战争中决定性的转折必然要到来。如果拿破仑把莱茵河左岸当作将来的自然疆界以诱惑法国，而要求普鲁士根据巴塞尔和约表示同意，德国是否能在几个星期内就准备好呢？

直到现在总是谨慎有余，预见不足；事件赶过了一切等待时机的人，使他们忘记了一句精辟的古老谚语：“失去时间就是失去一切！”

为了不错过邮政班期，我把关于这个欢乐而淳朴的城市的商业恐慌和人民运动的情况的某些看法推到下一次再来叙述。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5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47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战 争

拿破仑第三在 5 月 11 日由马赛乘船到达热那亚,他将在那里担任法军总指挥,据说那里已经准备用特别隆重的仪式来迎接他。他在军事上的功绩是否能同他在外交上的不可争辩的辉煌胜利相提并论,这是一个问题,也许,我们不久就会有充分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用以证明他的战略才能的唯一证据是他的克里木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基本原则陈旧过时,是毕洛夫军事学派的东西,至于毕洛夫,大拿破仑曾指出,他的学说是失败的学说,而不是致胜的学说²⁰³。

不容争辩,法国皇帝是带着巨大的精神胜利进入意大利的。他由于更狡猾更诡诈而逼使奥地利负起宣战的重责以后,又侥幸地亲眼看到,奥军在没有实际行动的两星期内失去了他们在实行这个重要步骤时所凭借的唯一优势。奥军没有利用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和迅速的运动在法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击溃皮蒙特军队,坐失了良机,以致现在同它对敌的联军在兵力上完全同它相等,并且日甚一日地胜过它。奥军将不但不能采取攻势并乘胜前进,而且甚至很可能要迅速地被迫放弃米兰,向明乔河线退却,在那里,他们将只限于采取在大型要塞掩护下的单纯防御行为。这样,路易-拿破仑由于他的敌人犯了巨大的、几乎是无法解释的错误,而掌握了优

势,并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统帅生涯。他的福星如今依然高照着。

战争的最初两个星期,对奥地利来说是一段单调然而有趣的经历,同关于法国国王的有名的讽刺诗所描写的情形非常类似。4月29日,奥军前卫没有遇到什么重大抵抗就渡过了提契诺河,第二天,主力部队便紧随着过了河。根据奥军向阿隆纳(在马乔列湖旁)、诺瓦拉和维吉瓦诺方面的最初的调动情况来判断,奥军似乎要向韦尔切利和都灵大道进攻。5月1日或者2日晨奥军占领韦尔切利这一行动,以及从瑞士发来的关于入侵的军队集中在塞齐亚河岸的电讯,似乎证实了这个看法。但是这一进攻看来只是佯动,其目的是在提契诺河和塞齐亚河之间的所有地区索取军税,并破坏皮蒙特和瑞士之间的电报通讯。进攻的真正目的已为居莱将军的战报所指出,从战报中显然可以看出,科佐和坎比奥是主要的集中地点,5月2日傍晚他的大本营是在洛美洛。因为上述第一个地点位于塞齐亚河和波河汇合处附近(稍偏东),第二个地点位于波河河岸,博尔米达河与波河汇合处稍东的地方,第三个地点则较靠后方,但与前两者的距离相等,所以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奥军正在从正面进攻配置在波河彼岸从卡萨勒到亚历山大里亚一线而以瓦兰察为中心的皮蒙特阵地。在以后经由都灵所获得的报道中可以知道,5月3日奥军在坎比奥附近的波河上架了桥,并向波河南岸托尔托纳方向派出了侦察队;同时,他们几乎对皮蒙特阵地的整个正面、特别是在瓦兰察附近进行了侦察,在某些地方还与敌人进行了战斗,企图使敌人暴露兵力。此外还听到一个消息:奥军有一个军由皮阿琴察出动,正沿波河南岸直趋亚历山大里亚,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由于在坎比奥附近的波河上架了

桥,因此这个运动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5月5日前的战况便是这样。那时奥军机动的特点是极端的缓慢和谨慎,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以后情况也一样。由提契诺河到波河的瓦兰察,大概不超过25英里,也就是两天正常行军的路程,因为军事行动是在4月29日开始的,所以全部入侵的奥军本应在5月1日中午就集中在瓦兰察的对面。前卫也能够同一天完成侦察任务,而在夜间,奥军便能够下定次日展开决战的决心。由于我们手头仅有万德比尔特邮局送到的消息,因此我们和以前一样,仍然无法解释目前所发生的行动迟缓的现象。但是情况迫切要求奥军迅速行动,同时居莱将军作为指挥官享有果断、勇敢的盛名,因此我们自然设想到,他们是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慎重的行动的。是否他们原来有过经由韦尔切利前往都灵的计划,而只是由于以后接到消息,知道法军大量兵力到达热那亚,使这个迂回机动有了危险,然后才取消了这个计划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和皮蒙特军队到处截断和堵塞道路这种情形有关呢?或者是由于居莱将军(他作为总司令所具有才能,目前人们还完全不了解)受了他必须指挥的庞大部队的牵累呢?所有这些问题,很难答复。不过,观察一下另一方占领的阵地,就可能对情况多少有一些了解。

在奥军连一个兵士都没有越过皮蒙特疆界以前,法军已经开始大量进入皮蒙特。4月26日,第一批部队到达了热那亚;同日,布阿将军的师通过了萨瓦,越过了蒙塞尼山口,而于4月30日到达了都灵。在这一天,亚历山大里亚已有24000名法军,而在都灵和苏扎则约有16000名。从此以后,法军源源不断地开来,但是到达热那亚的法军兵力远比到达都灵的要多。他们由这两个地点继

续前进到亚历山大里亚。这样调到前线去的法军,数量当然不能确定,但是根据我们将在下面指出的情况来判断,无疑,到5月5日他们的数量看来已足以保证联军守住阵地,并阻挠奥军在韦尔切利附近迂回他们的阵地。联军原来的计划是:以皮蒙特军队的主力 and 可能由热那亚调来的法军部队扼守波河沿岸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卡萨勒这一线,而以皮蒙特军队其余的兵力(萨瓦各个近卫旗)会同经过阿尔卑斯山调来的法军扼守多腊-巴尔特亚河从伊符雷到基瓦索这一线,并以此掩护都灵。因此,奥军向多腊河一线发起任何进攻,都可能遭到来自卡萨勒的皮蒙特军队的侧击,而不得不分散兵力,以致使进攻归于失败。虽然如此,联军的阵地只适于作为临时阵地,并且实质上是一个不好的阵地。这一阵地由亚历山大里亚到伊符雷,长约50英里,有一个凸角和一个凹角;虽然这一阵地提供了侧击的可能性,从而大大加强了阵地本身,但是这样长的一条战线毕竟使敌人极便于进行佯攻,而且在这一阵地上不能组织有力的抵抗来对付敌人坚决的进攻。一旦奥军占领了多腊河一线,并用少量兵力在一定时间内抵住了侧击,胜利的奥军就能够自由地转到波河的任何一岸,并以优势兵力逼使亚历山大里亚地区的敌军退到该要塞的炮火掩护之下。如果奥军在战争开始的最初两三天内奋力作战,以上这一切是很容易实现的。那时法军还没有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之间,还不能威胁奥军的行动;但是在5月3、4和5日,形势改变了,到达这一阵地的以及不断由热那亚调来的法军,数量似乎已经相当庞大,足以使防守这个阵地的兵力大约增加到10万人,其中有6万人可以用来经过卡萨勒发起进攻。至于这个数量的兵力被认为足以掩护都灵,是间接地由以下事实证明的,这就是说,还在5月3日,无论是法军部队或者是撒丁

部队,就都已经由多腊河一线前进到亚历山大里亚。可见,奥军行动的迟缓使联军得以安然地完成了这个危险的机动——把兵力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阵地。这样,奥军的进攻便失去了任何意义,而联军却获得了我们所说的精神胜利。

到目前为止,奥地利将军先后似乎至少根据三个不同的作战计划行动过。看来,在最初渡过提契诺河时,他企图直抵韦尔切利和多腊河;以后当他知道法军大量兵力到达了热那亚,认为在卡萨勒附近进行侧敌行军过于危险时,就改变了进攻方向,转向洛美洛和波河;最后,他再次改变自己的意图,完全放弃了进攻,而在塞齐亚河上设防坚守,等待联军到来以便交战。诚然,关于奥军移动的消息,我们掌握得非常少,因为这些消息差不多都是取自法国和撒丁的电讯,但是奥军主力长时间没有活动,先头部队在5月5日到11日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各种机动又是无关紧要,而且看来是犹豫不决的,从这一切情况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上述的结论。

如果联军的进攻将因为某种事故再推延几天,我们很可能看到奥军又一次改变战略——甚至会不战而退向提契诺河,因为居莱的军队不能毫无活动地长久停留在疫病流行的沼泽般的稻田地区(根据最近我们得到的消息,他的军队正配置在那里),他们只有抱着非常不可靠的成功希望去冒险进攻,或者转移到对健康危害较少的地区占领新的阵地。但是,应当预料到,联军方面很快就会发起进攻和展开会战;我们很可能在最近的邮件中接到这个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得自维也纳的消息所报道的,那就无怪乎海斯——奥军总司令居莱的最可能的继任者——不赞成居莱的作法。我们几乎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奥军不在当前的会战中获得胜利,那末不必等到战争的第一个月结束,他们将

会有一个新的总司令，而这在奥地利军事史上也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5 月 2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43 号

卡·马克思 维也纳要闻

1859年5月14日于维也纳

普鲁士维利森将军(另一个同姓的普鲁士将军的弟弟。这位将军以其在军事科学方面的著作²⁰⁴获得了某些声望,但由于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指挥又失去了这些声望)显然是奉柏林之命到这里来会晤正在返回普鲁士途中的昏庸的普鲁士国王和王后。据说,他的真正目的有两个。第一,要求奥地利停止它在法兰克福议会中的阴谋活动,因为普鲁士不愿意服从以徒有其名的德意志联邦为掩护来进行活动的维也纳内阁的操纵。第二,给以这种方式送上的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即肯定地保证说,普鲁士已经坚决决定进行“武装调停”。这个含糊的名词可以作如下的解释:普鲁士先在本国整顿好秩序并使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然后再向波拿巴提出一些新的和平建议,在这些建议遭到拒绝后便把自己的剑扔到秤盘上²⁸⁶。在得知这一重要消息的同时,奥地利政府通过伯尔尼获悉,俄法条约¹⁹⁴除了还不知道的秘密条款之外,责成法国把军事行动限制在符合它公开宣布的解放意大利的目的范围内,而俄国则答应一旦德意志联邦真正开始干预斗争,就把为数不少于

30万人的军队开出自己的国境。

这里可以听到人们对居莱将军的过时战略的纷纷埋怨，甚至还流行着他要去职的传闻，而且据说海斯将军已被提名为他的继任者。但是，看来还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库恩上校（他是奥地利总参谋部最杰出的军官）已被派去加强以优柔寡断为其特色的居莱的领导。居莱本人是马扎尔人，1798年9月1日生于佩斯。16岁时以少尉军衔加入他父亲指挥的步兵团，之后被调到骠骑兵团，1827年9月成为帝国枪骑兵少校。此后不久，升为第十九步兵团团长。1837年获少将军衔并担任圣漂尔顿旅的旅长的职务。1845年指挥维也纳第三十三步兵团；1846年获得次帅的称号并以师长和总司令的身分被派往的里雅斯特。在这里，1848年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亲自负责统率海军之后，革除了有嫌疑的意大利军官和水兵，把军舰安全地停泊在达尔马威亚沿岸的各个基地，并救出了几艘正开往威尼斯的军舰²⁰⁵。他下令在的里雅斯特、波拉、皮腊诺和沿岸其他重要据点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加强了受到起义威胁的边境，并准备了在内地各省援兵开到后于1848年4月17日由炮兵总司令努根特伯爵实行的进攻。居莱所组织的桡桨舰队配合了沿岸军队的活动。5月23日，皮蒙特舰队出现在的里雅斯特前面，但是，由于居莱预先有准备，这支舰队不得不在相当远的地方行驶。舰队企图偷袭位于圣巴尔科拉的一个边远的炮垒，也遭到失败。皮蒙特舰队在6月8日对的里雅斯特进行了最后一次袭击，但是在确信居莱防范严密之后，便于7月4日离去，而经过库斯托查一战，舰队就完全撤离了亚得利亚海。由于这些功绩，居莱获得了皇帝颁发的各种勋章和的里雅斯特市政府授予的荣誉公民称号。1849年6月初他被任命为奥地利陆军

大臣之后，据说，他表现得很勤勉很干练。占领腊布²⁰⁶的时候，他是皇帝的侍从官。当他回到维也纳自己的部里以后，由于得到了阿契战败²⁰⁷的消息，就立即从维也纳赶到科莫恩，以便在那里采取必要的措施。不久以后，他被派去巡视帝国全境并向弗兰茨·约瑟夫提出自己的报告。1850年7月他由陆军大臣职务调任米兰第五军的指挥官以后，被提升为炮兵总司令并获得金骑士勋章。拉德茨基辞职后，他获得了第二军的指挥权，他现在正带领这支军队去反对皮蒙特。居莱是奥地利的那些按出身来说大多数是斯洛文尼亚人或马扎尔人，并由于鞭笞妇女及其他卑劣暴行而声誉败坏的将军之一。

维也纳志愿军的两个营已经开赴战场，第三个营今天也出发了。这些身穿1848年大学生军团的士兵²⁰⁸的制服和历来属于城郊贵族阶层的志愿军，起初是举世瞩目的风头人物。为他们举办了数不清的舞会、音乐会以及戏剧表演，甚至连奥地利圆舞曲的奥菲士——施特劳斯先生在自己极不爱国的彼得堡之行前也创作了一首新的进行曲献给他们。但是，不能否认，最近以来这些初露头角的军人的声誉已一落千丈了。这些城郊的粗野汉耽于啤酒和雪茄烟，他们对于女性过分放肆无礼，往往甚至超出了维也纳式“幽默”的范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从他们的一首心爱的歌曲中可以看出：

《Ich bin ein ächter Wiener ,
Für ein lustiges Leben ,
Und da hat mich mein Vater
Zu den Deutschmeistern gegeben ;
Deutschmeister ist ein

Gar lustiges Regiment ,
Hält in der einen Hand den Säbel ,
In der andern das Ciment》 .

（“我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我喜爱愉快的生活，因而我的爸爸把我交给了德国骑士团；骑士团是一个愉快的团队，一手拿着马刀，一手拿着威明特。”）

应该说明一下，威明特是一种容量极大的啤酒杯。

这些“自由而愉快的”人的英勇行为之一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转变，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报刊的严正申斥。我们这批朋友的兵营设在萨尔茨格里斯街，这条街和通往兵营的各条街一样，主要居住着犹太人。从加里西亚到维也纳来办事的犹太人通常也羁旅于这些相当污秽的地区。有一天晚上，当这些游手好闲的英雄们从“施佩尔”（在那里曾公开为他们举行了盛会，预祝他们英勇杀敌）回到自己的兵营时，兴致勃勃，憧憬着自己未来的业绩，突然袭击了不幸的犹太人。他们捣毁了一些犹太人家里的窗子，把另一些犹太人打倒在地上，把很多犹太人的胡子剪掉，他们甚至把一个不幸的犹太人扔进了煤焦油桶。他们询问和他们不相干的过路人：“你是犹太人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揍一顿，一面还大声狂叫：《Macht nichts, der Jud wird gefarn gelt》（“没关系，犹太人应该挨揍”）。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这些维也纳游手好闲之徒的崇高情操：有一个15岁的鞋匠学徒，由于招募新兵的中士不允许他参加志愿军而绝望地上吊了。

各个社会阶层，从最上层到最下层，在金钱和财政方面都遇到

了困难。第一,你们大概早已从欧洲报刊上获悉,皇帝本人已把他珍贵的传家宝典当了。第二,无论你们拿起哪一家维也纳报纸,都必然会看到登在显著地位的一栏醒目杞题:“爱国捐款”。这些爱国捐款或者用作一般军事目的,或者专门用来组织志愿部队,其数目多寡不定。有的少到只有 2 弗罗伦 12 克劳泽,有的则达到 10 000—12 000 弗罗伦之多。有的地方捐款和更带有中世纪性的馈赠掺杂在一起,如像武器商捐献两支手枪,造纸厂厂主捐献包装弹药的纸张,呢绒商捐献作制服的衣料,等等。在个人的捐款中被提到(很值得怀疑)的是在小市政官吏和市长的官方压力下在外省乡镇里募集的钱财。但是,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捐款都有一个特点,即它们不是用任何货币,而是用国家债券和国家有息证券的息票交付的。因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国家“自掏腰包”。小额硬辅币从日常货币流通中完全消失了,这是财政混乱的最正确无误和最显著的征兆。当官方刚一宣布停止现金支付和准备采取相应的财政措施之后,小额铸币,不论铜币或银币,好像魔术棍一挥一样,顷刻之简就不见了。居民采用旧的原始办法把大额银行券按倍数分成小块,这种办法曾使在 1848 年访问过维也纳的外国人感到困惑,因为每个持有价值为 1 弗罗伦的银行券的人都把它剪成他零购物品时所需要数量的小币。在维也纳和外省里,政府企图制止这种乱剪银行券的作法,并宣布收税人和银行将不收这种剪成小块的银行券。对银行来说,提出这种警告是不合法的,因为 1848 年颁布的一项法律中规定,银行应该收这种小块的银行券。这项法律直到现在还有效,在银行里甚至还有统计这种小块银行券的一整套方法。非官方的声明说,在流通中有 2 800 万弗罗伦小额铸币,这个数目似乎超过了实际需要的一倍。为此,当局

“决心以最严厉的办法来对付当前造成辅币不足的毫无意义的投机行为”。

当然,类似的关于小额铸币绰绰有余的臆测,决不能弥补这个必需品的显而易见的缺乏。

当局应该了解,银币票面价值的补加费急剧地增长了,甚至对于铜币,这一差额也达到了10%。因此,农民到处都把一切能发出金属声音的东西藏到钱罐里。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的总督向民众重申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凡是进行银币和铜币投机买卖的人处以50弗罗伦的罚金,甚至更重的惩罚,但仍然是枉费心机。这种惩罚措施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如果在采取这种措施时还发表一些像登载在“维也纳日报”²⁰⁹官方消息栏中的官方声明,规定从6月1日起价值为6克劳泽的银币在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将停止合法流通,那就更不会有结果了。政府到最后将不得不满足下奥地利贸易局的请求(不管这看起来多么有失尊严),发行票面额为5、10和25克劳泽的国家纸币以便在零售中流通。

现在我们撇开低级领域即零售中的流通,来看看金融市场和真正商业的领域。我们首先应当指出你们已经知道的阿恩斯坦和厄斯克勒斯大公司于5月5日宣布破产这件事。他们是首都的主要期票经纪人,银行不直接贴现的期票的贴现以及各省的工业期票和商业期票的再贴现主要由他们来办理。除了首都的以外,他们手里还集中了匈牙利、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企业主的金融业务。这家公司引以自豪的是它有80年的历史,它的老板冯·厄斯克勒斯男爵一人身兼数职:国民银行行长、驻丹麦总领事、下奥地利期票贴现公司董事长、国营铁路公司总裁、南部铁路经理,等等。总之,除路特希尔德之外,他就是帝国财政方面最有声势的人物了。在维

也纳会议期间,阿恩斯坦和厄斯克勒斯起了显著作用,那时候冯·阿恩斯坦夫人的沙龙是当时政治界和文艺界名人聚会的中心。导致破产(几乎欠下了3000万元的债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巴黎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拒绝支付维也纳公司的汇票。在这次破产之后,在维也纳证券交易所每天都有成批的公司登记破产。在这些破产的公司中最大的公司有:索洛蒙-康曼多公司、艾达姆股份公司、格·布兰克公司、普列歇尔股份公司、迪耶姆和印格利什公司、伊·弗·加尔特涅尔公司、弗·斯·施米特公司、姆·格莱格尔股份公司、波卡尔尼兄弟公司、莫里茨·科林斯基公司、卡尔·卓列尔公司、阿·基尔什曼公司和其他公司。在布隆、布拉格、赖兴堡、列姆堡等省,许多奥地利公司由于直接受到这一灾难的影响而破产了。其中最大的事件是里雅斯特的鲁帖罗特股份公司的破产,这家公司老板是普鲁士领事,他也是奥地利的劳埃德²¹⁰的经理。在奥地利境外,在布勒斯劳、马格德堡、慕尼黑、法兰克福有几家大银行以及加塞尔的借贷银行和商业银行破产了。总之,目前的恐慌和1857年秋天在汉堡发生的商业恐慌很相像,并且当时为减轻恐慌而采取的措施²¹¹也成了奥地利政府打算效法的榜样。有关汇票的法律将会放宽一些,国民银行正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支持那些由于普遍缺乏商业信贷因而只是在短期内不得不停止支付的公司,200万纸币将交给布拉格和布隆的银行。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5月14日

载于1859年6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5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况没有进展

我们昨天从“亚细亚号”轮船收到来自战场的最近电讯,报道了5月13日以前的消息,也就是说,比万德比尔特邮局多带来了3天的消息。这些电讯都是撒丁政府发出的一些简短而又极其混乱的战报,而奥军却没有发表关于他们行动的报告。在这3天中,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目前的战况同前一时期一样,就其迟缓程度来说,在现代战争史上要算第一位了。我们开始感到好像回到了被拿破仑突然而坚决结束了的、场面宏伟但没有积极行动的、过时的战争的时代。这里,我们看到两支庞大的军队在长达40余英里的战线上彼此对峙着,每一方面都可以用10—14万人来作战。一支军队正在逼近,另外一支军队正进行侦察,时而向敌人阵地的这一点,时而向那一点谨慎地前进,然后又退回,而第一支军队却不从他们所占领的地点前进;因此,两军现在相距大约8英里到20英里。

诚然,某些事实能够给予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以合理的说明,但是这种现象仍然是不正常的,这正是由于进攻一方在战争开始时所犯错误的结果。我们已经说过,奥军侵入皮蒙特的目的和任务已由于奥军运动的迟缓无力和犹豫不决而不能实现,这大概只能

归罪于居莱将军的优柔寡断,而不能归罪于其他。从那以后所得的消息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奥地利人对于自己军队这种离奇的行为没有给予任何说明,这显然证明,他们把责任完全归之于总司令。的确,直到战争开始一星期以后,奥军战报才谈到天气恶劣和各地洪水泛滥的情形,指出这就是迫使他们的将军不得不把部队从波河河谷疟疾流行的沼泽般的稻田地区开拔出来的原因。而现在,本报消息灵通的伦敦记者给我们写的报道说,奥皇已与海斯将军偕行,准备免去居莱的职务,并仿效路易·拿破仑的做法,亲自担任指挥。

根据我们目前所能作出的判断,战争看来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奥军右翼向诺瓦拉和韦尔切利方向前进,同时在马乔列湖方向上进行佯攻。中央,并且可能还有左翼,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沿着平行的路线通过维吉瓦诺和帕维亚前进。来自帕维亚的纵队主力在5月2日才到达洛美洛。右翼前进的目的,现在知道,第一是用进攻多腊河和都灵的威胁来转移联军的注意力,第二是夺取上洛美利纳的资源,以供军队的需要。直到5月3日,奥军主力才开始对卡萨勒和瓦兰察一线展开进攻;5月4日,对弗拉西涅托(在塞齐亚河与波河汇合外的对面)和瓦兰察方向进行佯攻,这时右翼已向中央靠拢;同时,奥军在坎比奥和萨累之间的波河上架设了桥梁,并在波河南岸构筑了桥头堡。根据某些报道,奥军第八军据说由皮阿琴察沿波河南岸行进,并在那里与主力会合,对托尔托纳和沃格拉进行了小规模进军,破坏了斯克里维亚河的铁路桥梁,以后渡到了波河北岸。但是根据其他报道(其中包括本报最近的一些电讯),奥军现在还在皮阿琴察和斯特拉杰拉之间的道路上。至于上述这个对沃格拉的进军,奥军是否把它作为对诺维以及对热那亚

和亚历山大里亚之间的交通线进行的一种佯攻,还难以断定。但至少这个进军迷惑了都灵、巴黎和伦敦各报纸大部分有经验的编辑,以致他们预言在诺维附近的旧战场上,即在马连峨附近某处将进行决战,但是奥军撤退到波河北岸和破坏他们架设的桥梁,就立刻否定了这个预言。此外,5月初又开始下暴雨。在帕维亚附近,波河水位涨到10—12英尺,支流的水位也相应上涨。波河河谷的稻田充水,在平时对于行军的军队不是障碍,因为道路设在高于水位的堤坝上,但是现在却由于整个地区和许多道路都被淹没而成为严重的障碍。同时,奥军又没有移动,仍然留在这些沼泽地上,被迫在道路上或者在潮湿的田野里露营。因此,他们在这个洪水中停留了几天以后,便感到迫切需要转移到比较高和比较干燥的地区。看来,他们由于疾病,特别由于霍乱和疟疾而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奥军便向摩尔塔拉和诺瓦拉地区退却和集中,这一退却不是敌人面前的退却(因为后者仍然十分安静地守在他们的阵地上),而是在自然威力面前的退却。以后奥军便在塞齐亚河上构筑了防御工事,并把侦察队和粮秣队派遣到联军阵地最左翼的多腊河一线。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行动可以说明军事指挥是良好的。实际上,在最初错过了对联军阵地攻击的有利时机以后,整个向洛美利纳的行进都已经完全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了。奥军右翼的推进无疑是一个错误。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假动作上;在敌人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扑向敌人,攻击并粉碎敌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如果贝奈德克将军的第八军真是沿着波河南岸前进的话,那末这就是第二个错误。因为这样,他和主力就被宽阔的河流隔开,如果雨要早下一两天,就无法在坎比奥附近架桥,奥军本身便会外于他们曾希望敌人所处的那种被

隔绝的状态中。奥军似乎是由于必须与贝奈德克会合而不得不渡过河去的。为什么贝奈德克最初不在波河北岸呢？在波河上架桥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行动，使奥军不得不在对身体极为有害的沼泽地多停留几天，如果采取其他行动，可能就不致如此。总之，整个战争看来进行得不好。奥军的一切行动都不果断；他们在各个方向都进行佯攻，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次真正的进攻。可见，他们沿敌军全线摸索前进，一直到最后洪泛区在两个交战军队中间造成了一个宽约数英里的不可通过的障碍时为止。到那时候，奥军由于无所事事，但又想表明自己正在采取一种行动，便在多腊河方向进行了侦察。但是所有这些侦察任务都是以兵力不大的机动部队来执行的，他们不能进行有力的攻击，而且一遇到敌人的先头侦察群几乎就得立刻退却。

就这样，奥军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作，而这时他们的敌人似乎也在玩这个把戏。现在法军已经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他们占据的这条漫长的战线上。他们的阵势是这样：最左翼在多腊河和波河一线到卡萨勒为止，为尼耶尔将军指挥的法军 1 小军（由 2 个师编成）所占领；左翼在卡萨勒附近，配置有皮蒙特军队 2 个师和在加里波第指挥下的 3 000 人的志愿军；中央在瓦兰察，配置有表克马洪将军指挥的法军 1 个军和皮蒙特军队 1 个师，共有 3 个师；右翼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配置有康罗贝尔指挥的法军 1 个军和皮蒙特军队 1 个师，共有 3 个师；最右翼在诺维和阿尔尼亚托附近，配置有巴拉盖·狄利埃指挥的法军 1 个军和皮蒙特军队 1 个师，共有 3 个师；预备队由配置在热那亚的法军 2 个近卫师组成。假定每师有 1 万人（这个估计数字已经相当高，因为法军没有时间召回归休兵，所以每师的人数小于这个数字，而撒丁师的人数则大于这个数

字),则总数是 15 万人,这个数字与当时联军的总人数大致相等。其中有 11 万到 12 万人可以直接参加作战。他们的行动极端消极,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法军准备不够,火炮和弹药都很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路易·拿破仑的命令造成的,他无疑是想亲自来获得战争的最初的荣誉。这个新统帅在 5 月 12 日到达热那亚,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13 日,他与国王会见,后者是为了这次会见而由兵营来到这里的。当天,他发表了拿破仑式的宣言(宣言见本报另版),5 月 14 日他就要到军队里去了。

现在,雨大概也停了,不久邮局可能给我们带来有关比较坚决的行的消息。这种犹豫不决和无所事事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太久。或者奥军将再次渡过波河,或者在洛美利纳进行会战。奥军可能在寻找和构筑足以击退联军猛攻的坚固的防御阵地。如果他们找到了这样的阵地,那将是他们所能采取的上策,因为他们不能不战而退,同时在这样的阵地上,他们能够利用现有的全部作战军队,而联军却会由于在卡萨勒、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留下守备部队而减弱。

目前,交战双方都在等待援军。奥地利把文普芬将军指挥的为数 5 万人的 1 个军派到的里雅斯特及其郊区,作为它的意大利军团的预备队;同时,路易·拿破仑又组织了两个军,编入他的意大利军团。现在还传闻,拿破仑亲王将率领一支杂凑的远征军,想要在半岛沿岸某处登陆,以便为自己夺取一个王国。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47 号

弗·恩格斯 会战终于发生了！

5月25日由利物浦启航于上星期四傍晚通过莱斯角的“华盛顿市号”轮船，给我们带来了比平常更有意思的来自战场的消息。奥军的退却和联军为了夺回洛美利纳的进攻无疑已经开始了，虽然，这一切行动看来进行得并不特别迅速。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5月19日奥军大本营转移到加尔拉斯科（提契诺河附近的一个庄园，位于维吉瓦诺到格腊波洛的道路上），到5月24日还在那里未动。但是在波河以南，在蒙特贝洛（斯特拉杰拉到沃格拉道路上的一个小城市）附近，施塔迪昂军的部队和巴拉盖·狄利埃的前卫发生了冲突。根据他们自己的战报，当时联军占绝对优势。到目前为止，本报关于这次冲突只能发表一些极其简短的报道。法军报道说，为数6000—7000人的福雷师（满额时为1万人）和皮蒙特1个骑兵团，对15000人的一支奥军部队，也就是对施塔迪昂的半个军进行了战斗；经过4小时激战，奥军被击退，伤亡1500—2000人，被俘200人，其中有一部分已被押送到马赛，而联军仅损失600—700人。但是，奥军的失败并不很严重，因此联军未能对退却的奥军进行追击。根据奥军的说法，施塔迪昂向波河南岸派出了一支侦察队。这个部队沿沃格拉方向前进到蒙特贝洛时，与数量占优势的法军遭遇，经过激烈的战斗后，秩

序井然地退回到波河北岸。双方战报上的这一分歧，应当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在没有确实可靠的正式报告时，在这类事情中经常都有夸大现象。要想判断战斗的意义及其真正的性质，我们还须等待比较确切的消息。但是无论如何，这仅仅是先头部队的冲突，而不是真正能考验交战双方军队的力量和统帅才干的那种大规模会战。

戏剧的第二幕无疑就这样开场了，这时伦敦“泰晤士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驻奥军大本营的记者所提供的极其重要的报道，充实了我们批判地研究第一幕的战斗行动的材料。如果没有这些通讯报道，对于奥军的行动，我们就只好根据那些目的本来就不在于说明真情的皮蒙特战报以及几乎毫无内容的奥地利战报来判断了。为了弥补许许多多的空白点，我们在初期除了利用现在在皮蒙特的军官和各报记者之间流传的一些互相矛盾的传说和猜测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材料，——当然，这些传说是十分不可靠的。同时，因为奥军握有战争的主动权，并且一直到他们退出韦尔切利为止，仍然保持着这个主动权，而联军则比较被动，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注意我们完全得不到消息的或者至多只能得到反面消息的那个军队。因此，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我们所作出的结论现在没有为事实所证实，这是不奇怪的。相反，比较奇怪的倒是，我们竟能侥幸地在总的方面正确地预见到战争的主要特点。只在一个要点上，我们与现在所宣布的奥军原定计划不一致；但是，这个计划究竟是像现在所说的那样最初就已经明确制定了呢，还是目前的这个“原定计划”是以后才想出来的，这个问题还有待查明。

我们最初接到奥军侵入皮蒙特的消息时曾认为，他们的企图仍然是（过去他们的企图显然总是这样的）在法军主力尚未开到之

前迅速袭击皮蒙特军队及法军前卫。现在我们得知，奥军早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看来，他们以为法军在4月24日就开始进入皮蒙特了，虽然法军没有一个团是在4月26日之前进入皮蒙特国土的，很可能是这个错觉促使他们放弃了对当面出现的任何部队进行 coup de main〔坚决攻击〕的一切企图。因此，奥军的入侵便失去了迅速的特点，如果他们追求更重大的目的，是会具有这种特点的。这不过是皇帝所规定的军事行动的开始，其目的只是为了占领敌人的一部分领土，夺取那里的资源，并使防御的军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假如目的是这样，那就非常明显，奥军的入侵便应当停止在塞齐亚河和波河沿岸韦尔切利和瓦兰察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匆匆前进便没有必要了。奥军有步骤地、缓慢地、确有把握地向皮蒙特境内深入。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奥军这种行动方式。奥军沿着由东到西通过洛美利纳的两条主要道路运动：一条道路由帕维亚到瓦兰察，另一条由阿比亚帖格腊索到维吉瓦诺和卡萨勒。北面由博法洛拉到韦尔切利的道路，奥军根本没有利用。前两条道路被从西北流向东南的许多河流截断，其中特尔多皮奥和阿哥尼亚两条河是比较大的。由于桥梁被破坏，道路坍塌的地方很多，而道路两旁的低地不是被水淹没，便是泥泞不堪，所以军队前进非常缓慢，而为数15—18万人的整个军队都要沿这两条道路运动。因此，现在当我们知道奥军最后一个军在5月1日以后才渡过提契诺河这个消息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因为30 000—35 000人的一个军，带着它的全部辎重，沿着唯一的一条道路运动，它的行军队形通常至少长达12—15英里，即一日行程的距离。而帕维亚到卡萨勒的道路上有3个军运动，由此可见，最后一个军比第一个军迟两天在帕维亚附近渡过了提契诺河。

前卫是在4月19日于帕维亚附近渡过河的,这是由费希泰提奇将军指挥的第五军的一个旅。随后跟进的是向格腊波洛运动的整个第三军(由施瓦尔岑堡指挥)。同一天,另外一个军,即第七军(由措贝尔将军指挥)在北面贝雷古阿尔多附近渡过了河,向汉鲍洛前进。30日,第八军(由贝奈德克指挥)紧随第三军在帕维亚附近渡过了河,第五军(由施塔迪昂指挥)紧随第七军在贝雷古阿尔多附近渡过了河。5月1日,第二军(由利希顿施坦指挥)在帕维亚附近渡过了河。按照这一次序,第七军在极右翼,第五军、第三军和第二军在中央,第八军在极左翼,先渡过了特尔多皮奥河,然后渡过了阿哥尼亚河,最后大约在2日傍晚到达了波河与塞齐亚河沿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皮蒙特的关于有大批奥军部队通过博法洛拉和阿隆纳的报道,是根本错误的(加里波第部队毫无阻挡地向马乔列湖附近的格腊韦洛纳前进,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这些报道中关于贝奈德克将军率领第八军由皮阿琴察出动,并作为独立的纵队沿波河南岸运动的推测,也同样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奥军是沿刚够15万人的一支军队运动的狭窄正面(12英里)前进的。他们尽可能集中地和有步骤地行动,只向自己的两翼——诺瓦拉、阿隆纳地区和波河南岸派出了几支机动部队。这种非常有步骤的推进,在我们看来,证明奥军并没有完全放弃进攻皮蒙特军队的想法。由于皮蒙特军队在奥军到达他们的防线以前显然无力进行坚决的抵抗,所以奥军如果没有这种想法,便一定不会使部队挤在这样狭小的地带,徒然地在行军中疲惫不堪。奥军本可以利用通往诺瓦拉的道路,这样作没有任何坏处,只有很大好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要占领洛美利纳和诺瓦列捷,就必师占领韦尔切利。既然奥军无视这些好处,那末在我们看来,这显然证明奥军大本营仍未

放弃在有利情况下以优势兵力在卡萨勒和亚历山大里亚附近攻击敌军的希望。我们认为，奥军无疑将对诺维(连接热那亚、亚历山大里亚和斯特拉杰拉各线的铁路枢纽)进行 coup de main(坚决攻击)。为此，奥军于5月2日夜在波河上的科尔纳列附近架设了桥梁，而且贝奈德克将军率领他的第八军通过了该桥。他的行动非常坚决，不到12个小时便占领了沃格拉、斯克里维亚河上的卡斯特努沃，并占领了托尔托纳，破坏了铁路桥梁；如果不是因为下雨，波河水位突然上涨，部分地冲毁了桥梁，而迫使他退却以便与主力保持联系的话，他很可能会决定向诺维挺进。后来，桥梁修复了，全部奥军又重新集中在波河北岸。但是因为天气不好，他们无法停留在被水淹没的低洼的波河河谷；因此，军队便向北移，在加尔拉斯科、摩尔塔拉和韦尔切利之间占领了阵地，利用主力靠近塞齐亚河这一有利条件，在该河以西地区进行侦察并征收粮秣。奥军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抵抗，便完成了这一任务，9日，除韦尔切利外，他们放弃了塞齐亚河西岸，把大本营转移到摩尔塔拉，如我们所指出的，他们在那里停留到19日。在这一期间，他们在贝耳焦伊奥索附近、靠近提契诺河河口的波河上架设了桥梁；并且有1个军(兵力编成不详)在斯特拉杰拉附近占领了阵地，开始在邻近帕尔马公国的南皮蒙特各地征收粮秣。我们猜测，这就是同福雷在蒙特贝洛附近进行战斗的那一个军。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等待更可靠的消息。看来，撒丁人不久就会体会到与法国结盟的一切好处了。他们的军队将不能编为独立的军，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得荣誉，而不得不分为几个部分，他们的5个师必须分别附属于法国的5个军，当然每个师将完全溶合在法军中，这样，全部指挥权和所有的荣誉都将完全属于法军。热那亚及其堡垒和其他的一切都已完全

转入法军手中，现在，撒丁军队也将只作为法军的附属品而存在。这真正显出了拿破仑解放意大利的曙光呵！虽然在撒丁人对奥军在洛美利纳的暴行和抢掠的非难中，并没有什么意料不到的或者难以置信的东西，但是必须公正地指出：伦敦“泰晤士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从奥军大本营发出的通讯报道对这个事件的说法却不同。根据这些可靠的材料，洛美利纳以及伦巴第的农民，对于地主的仇恨远超过他们对于外国压迫者的厌恶。至于洛美利纳（原先是奥地利的一个省）的地主，他们大部分是 *sudditi misti* [有双重国籍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既有奥地利国籍，又有皮蒙特国籍。米兰所有的大贵族在洛美利纳都有大块的领地。他们是皮蒙特人，在内心里仇恨奥地利人；但是这一省的农民，由于同这些贵族对立，所以比较倾向于奥地利。奥军在洛美利纳所遇到的热忱的接待就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奥军的征集物资和摊派捐税看来也是尽量只限于贵族和那些意大利爱国运动中心的城市，而对农民则尽可能地豁免。这是奥地利所特有的政策，它从 1846 年以来便一直奉行这样的政策。²¹²这一政策完全说明了为什么奥军征集物资虽然归根到底并未超过一般认为是现代战争中正常征集的规模，也还没有达到法军通常征集的程度，但是皮蒙特报刊却已对此议论纷纷。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24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6 月 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5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蒙特贝洛会战

“阿非利加号”轮船带来的邮件,对于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关于这个轰动一时的、被大西洋两岸的波拿巴派报纸这样大肆渲染的会战的情况,只提供了很少一点补充材料。

我们只得到了居莱的报告的简短的电讯摘录,至于法国和撒丁的许多报道,无非是巴黎和都灵散布的一些谣言而已,并且它们是如此不确切,甚至连参加这次会战的各团的番号都没有正确地指出。固然,在星期一傍晚“华盛顿市号”轮船到来之后,我们得到了福雷将军的报告,部分地弥补了资料的不足,但是福雷并没有提出有关奥军的数量和伤亡的数字。除了福雷师以外,巴拉盖·狄利埃军的一些部队也参加了这次会战,所以他的报告无疑会说明一些令人怀疑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从巴拉盖·狄利埃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在等待比较完整可靠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把一切现有的、毕竟还有一定价值的材料作了仔细的对照;并据此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奥军在得悉法军拟向帕维亚和皮阿琴察之间的波河一线运动以后,便在距帕维亚不远的瓦卡里察架设了通过波河的桥梁。由施塔迪昂将军指挥的一个军被派到了波河南岸,侦察敌人的这一阵地和意图。他占领了斯特拉杰拉阵地——波河附近的一条隘路,在这里,一个没有车马道的亚平宁支脉一直伸展到

波河，——同时又向沃格拉方向派出了3个旅(15个营,大约有18门火炮,可能还有一些骑兵)。无疑地,奥军在他们行进的道路上留下了有力的部队,以保障自己的撤退,而在卡斯泰卓附近,奥军与敌人先头部队遭遇,结果把敌人逐出了该城和蒙特贝洛村。随后,他们便向下一个村庄即向吉涅斯特列洛前进,但是在那里遇到了福雷师的一个旅(即贝雷旅,包括第十七猎兵营、第七十四和第八十四基干团),于是战斗便具有了阵地战的性质。到这时为止,奥军参加作战的部队显然不多,可能将近一个旅。而法军的增援部队——福雷将军的另一个旅的4个营(布朗沙尔指挥的第九十八团,以及第九十一基干团的一个营)迅速地开来了。这使法军在数量上占了优势。贝雷旅准备好了攻击;它夺取了吉涅斯特列洛,随后经过顽强的战斗又夺取了蒙特贝洛;而奥军在卡斯泰卓附近,即在该地附近的那条小河的右岸,停下来进行了战斗。看来,奥军这时得到了新的增援部队,因为他们击退了法军,使法军混乱地退向蒙特贝洛,当时奥军准备重新冲入该村,但是和维努亚师的部分兵力(第六猎兵营和第五十二基干团)发生了冲突。情况又转而对法军有利,于是奥军秩序井然地退到了卡斯泰卓,在那里留下了后卫,直到他们的纵队编成行军队形时才撤去。这样,奥军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查明了巴拉盖·狄利埃军(该军是法军的极右翼)的位置以后,便毫无阻碍地撤到了波河北岸,他们确信,联军目前并没有向皮阿琴察运动的意图。

当时奥军在战场上的兵力不会多于2个旅,因为至少有3个营必须留下保护道路,并且还有2个营必须在奥里欧罗附近和法军第九十一团的2个营进行战斗,因此那一个团只有1个营在蒙特贝洛作战。在这2个旅、即10个营中,只有一部分能参加战斗,

因为奥地利将军如果把预备队中最后的部队都用于侦察,那当然应当受到极严厉的责备。

法军方面有 3 个团(第七十四、八十四和九十八团)和 1 个基干营(属于第九十一团),此外还有 1 个猎兵营,总共 11 个营,到战斗快结束时,他们又得到第五十二团的 2 个营和第六猎兵营的支援。因此,总的说来,法军用 15 个营对付奥军 10 个营左右的兵力。虽然奥军的营无疑比法军的营大,但在战斗的转折时机,数量上的优势仍在法军方面。此外,不应当忘记,奥军这次作战与其说是为了战胜敌人,不如说是为了迫使敌人暴露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这个任务,奥军是圆满地完成了。因此,把这个不重要的战斗看作是重大的胜利,那是荒谬的。在两支庞大的军队于意大利平原上对峙的情况下,像蒙特贝洛这样的战斗,并不比规模较小的战争中一般前哨战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果说这是胜利,那末战果在什么地方?法军说,他们俘获了 140 个受伤的和 60 个未受伤的俘虏,这个战果并不比他们在夺取某一村庄的两小时战斗中所能得到的多。此外,他们夺得了一辆弹药车,但是也损失了一辆。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追击。虽然法军有相当多的皮蒙特骑兵,但是并没有试图获取战果。显然,奥军在最后一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以后,接着便毫无阻碍地、秩序井然地撤退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24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6 月 1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5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

1859年5月24日于柏林

法国专制君主所发动的战争,无疑地不仅不可能是政治术语中所指的那种“局部”战争,即战斗行动不应越出意大利半岛,而且相反,这场战争不会局限于两个专制政府之间进行的、由正规军的行动来决定的一般战争的规模。这场战争进一步发展下去将变成一场燃遍欧洲大陆的革命大火,看来,当代的统治者中间有许多人未必能从这场大火中救出自己的宝座和王朝。德国可能成为这一震荡的中心,因为当俄国准备把自己的剑扔到秤盘上去的时候,德国必定要成为军事行动的中心。用不着多加思考就能得出结论:在战场上的严重失败,将在法国或奥地利引起革命震荡。但是,要找到必要材料来说明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必须经受的严峻考验有多大的规模,柏林或许是个唯一的地方。几乎用肉眼就可以看出,那些成熟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巨大危机的前提在与日俱增,即使各种庸人恐怕也不会怀疑这种危机。风暴将临的征兆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如下:德国各邦君主的嫉妒和勾心斗角将使他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袖手旁观;人民的灾难和愤懑像燎原大火一样燃遍了从维斯拉河到莱茵河的一切地方,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不仅会有外来

的进攻,而且还会有人民的灾难和愤懑所激起的人民起义;最后还有德国境内斯拉夫族居民的起义,——这在对外战争和革命震荡以外又加上内部的民族间的斗争。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在局势发展终于迫使德国各邦君主采取某种协同动作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社会基础。众所周知,1849—1859年这个时期是德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空前未有的时期。在此期间德国可以说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就拿柏林这一个城市作例子来看吧。1848年柏林勉强有5万男女工厂工人,而现在他们的总数已达18万人。只拿一个工业部门来看:在1848年以前向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出口羊毛是德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现在德国加工的羊毛只勉强够本国工厂的需要。同时,随着工厂、铁路、轮船运输和地下资源勘探的发展,信用制度也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种信用制度按其规模来说不仅是和工商业的总的进步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像从法国剽窃来的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之类的经不起风险的发明,它的发展还超出了自己的合法范围。直到现在都占民族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1848年革命时依然固守着把现金存放在自己家里的古老的亚洲风俗;现在他们把现金换成了各种类别、各种颜色和各種面额的有息证券。1857年的汉堡危机²¹¹稍稍震动了一下这一新出现的繁荣的大厦,但并未使它受到稍微严重的损害,而现在这座大厦却被波河和提契诺河岸边传来的第一阵炮声震塌了。无疑,你们已经获悉,奥地利的商业危机怎样波及了德国的其余地区,在莱比锡、柏林、慕尼黑、奥格斯堡、马格德堡、加塞尔、法兰克福和德国的其他商业中心,破产是怎样迅速地一个跟一个发生。然而,这些灾难只不过是更高级的“实业”界中行将来临的滔天大祸的征兆。为了使你们对

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认为不妨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普鲁士政府刚刚发表的公告。普鲁士政府在这个公告中指出,在西里西亚、柏林、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成批地遣散工业大军是危险的,同时宣称,它不能同意柏林、布勒斯劳、施特廷、但泽和马格德堡的贸易局建议它大量发行币值不变的纸币来进行可疑试验的请愿书,它更加坚决地拒绝仅仅为了使工人就业和挣得工资这个唯一的目的而在公共工程中使用工人。在政府由于缺乏资金而被迫突然停止业已开始的公共工程的时候,后一种要求确实显得有些奇怪。战争刚刚开始普鲁士政府就不得不发布这样一个公告,仅仅这一事实就说明了很多问题。除了工业生活所遭到的这种突然破坏之外,再加上整个德国普遍征收新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以及由于征召预备兵员和后备军而引起的一切企业的普遍衰落,你们就可以大致想像到这一社会灾难再过几个月会有多大的规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习惯于把人世的灾难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天降惩罚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可以听到人民在低声但清楚地说:“责任啊!如果1848年革命没有被欺骗和暴力所扼杀,那末,法国和德国就不会重新互相武装对峙了。如果德国革命的残酷的扼杀者不向什么波拿巴或什么亚历山大低下自己的戴皇冠的头,那末,甚至现在也不会有战争。”这就是人民的喃喃怨言,这种怨言将逐渐汇成隆隆的雷声。

现在来看看德国各邦君主向很不耐烦的观众所表演的那出戏吧。从1月初起,奥地利内阁就玩弄种种外交阴谋,想促使德国各邦把一支庞大的、主要由奥地利兵力组成的联邦军队集中到南德意志的某一地点,而且这种集中一定要威胁到法国,使其东部边境有受到攻击的危险。这样一来,德意志联邦必然会卷入一场进

攻战中,而奥地利也会稳有把握地把这场战争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5月13日以汉诺威的名义向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提出的这种性质的决议案,遭到了普鲁士全权代表冯·乌泽多姆先生的反对,他宣读了自己政府的正式抗议。这样便引起了南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爱国主义愤懑的总爆发。于是,普鲁士便采取了一些相反性质的措施作为对自己这些行动的补充。

在议会解散之前,普鲁士政府为自己取得了广泛的声誉,因为它宣布决定坚持“武装调停”的政策。但是,议会刚一解散,这种“武装调停”的规模就大为缩小,变成普鲁士不顾法国和俄国的要求而拒绝宣布自己中立。这种出尔反尔的勇敢,虽然足以引起彼得堡宫廷的盛怒,但却绝不符合普鲁士人民的期望。武装西部和东部要塞同时征召预备兵员和后备军服役,其目的在于平息由此引起的人民的怨言。但是,5月19日冯·乌泽多姆先生代表自己政府请求联邦议会把联邦的监视军直接交给普鲁士指挥,而且在必须采取哪些军事措施的问题上,给监视军充分的主动权。现在是奥地利暗中支持的德国各小邦君主证明自己的爱国热忱的真诚的时候了。巴伐利亚宣称,把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军队交给霍亨索伦王朝指挥,还不是时候。汉诺威愤懑地说:《Tu quoque》[“你也一样!”],提醒普鲁士自己也曾反对把联邦的监视军集中在南德意志的某一个地点。萨克森则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它的至圣的君主,即使是为了制止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互相倾轧也应当这样做。维尔腾堡几乎准备承认,法国的入侵比普鲁士的领导还好些。于是,神圣德意志帝国112的一切弱点都在庆幸自己可耻的复活了。德国的势力已化为乌有,——这就是目前德国各小邦君主之间这些内讧的总结。恢复德国国民议会的要求不

过是对这些王朝纷争的第一个软弱的抗议,这一抗议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胆怯的爱妥协的资产阶级。

关于德国境内业已成熟的斯拉夫人的骚动,以后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5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6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5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意大利战争²¹³

继续了近一个月的意大利战争,发生了独特的出人意料的转变。两支各有近 20 万兵力的大军于 5 月初都已面对面地集中起来了。当双方的前哨接近到火炮射程以内的时候,双方军队都在监视着对方,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进行试探,并在某些地方进行小战斗,战线不断改变,忽而向前推进这一翼,忽而向前推进那一翼,但是都没有把主力投入战斗。这样的作战方法似乎不符合现代的、迅速坚决攻击的常规,同拿破仑神速进军和勇猛作战的方法比较起来,好像是倒退了一步。

从拿破仑时代以来,有两个新的因素使作战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一个因素是在适当地点构筑营垒和要塞体系,使国境线得到较好的掩护。拿破仑时代的要塞不是很坚固、彼此孤立,便是说在战略上无关紧要的地点,因此在采用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时,不能成为严重的障碍。拿破仑往往利用野战中取得的胜利或者迂回运动,迫使敌军退出要塞。

至于要塞究竟能起什么作用,1813 年的但泽、1848 年的伦巴第四边形要塞区、1849 年的科莫恩²¹⁴、1855 年的塞瓦斯托波尔都

已说明了这个问题。目前,法国—皮蒙特联军在波河和塔纳罗河那一边的卡萨勒、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之间所占的阵地,就是以这样一个强大的要塞体系为依托的,这一要塞体系使他们甚至能够抵挡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在奥军来到以前,法军在这一阵地上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使奥军在攻击中获取决定性胜利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而法军却因此赢得了时间来集中其余的兵力和补充武器装备。这时,奥军在卡萨勒和瓦兰察附近的进攻受阻,而且因为既不能进行正面攻击,又不能进行真正的迂回运动,所以只能在塞齐亚河以西、波河以南对法军的两翼进行佯攻,同时在这些地区征集军队所需的物资。

使拿破仑时代以来的作战方法发生极大变化的第二个因素是蒸汽。法军就因为掌握有铁路和轮船,才得以在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到他们入侵的五天内把相当数量的兵力运到皮蒙特,使奥军对皮蒙特阵地的一切攻击毫无结果,而在以后一个星期内,法军又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所以到5月20日在阿斯蒂和诺维之间至少有13万法军。

但是,由于在路易·波拿巴的欺诈政权统治下不可避免的营私舞弊现象以及管理上的混乱,法军终究没有得到及时的和足够的供应。而有充分战斗准备的奥军有秩序地、迅速地进入意大利,却与此形成了很好的对照。在战争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影响的。

奥军不能前进,是因为遇到了皮蒙特要塞之间的筑垒阵地,而法军之所以不能发起进攻,是因为运送军用物资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这就是双方行动迟缓的原因,而且也是不值得注意的蒙特贝洛的小冲突使人感到兴趣的原因。当时的全部经过如下。奥军获悉,

法军右翼向皮阿琴察方向运动 ;根据这一行动 ,有理由认为法军企图在帕维亚和皮阿琴察之间渡过波河 ,从而迂回奥军在洛美利纳的阵地 ,并向来兰方向前进。因此 ,奥军第五军(由施塔迪昂指挥)派出了 3 个旅 ,通过了瓦卡里察附近(帕维亚下方)波河的桥梁 ,目的是占领斯特拉杰拉附近的阵地和向沃格拉方向进行侦察。这 3 个旅在卡斯泰卓遇到了联军的前哨 ,而在蒙特贝洛遇到了法军福雷师的第一个旅 ,并把这个旅逐出了蒙特贝洛。法军另一个旅很快赶到了这里 ,经过顽强的战斗 ,把奥军赶出了蒙特贝洛 ,但是奥军击退了法军向卡斯泰卓的攻击 ,迫使法军混乱地退向蒙特贝洛 ;当时如果法军维努亚师的一个旅没有开来的话 ,奥军无疑是能占领蒙特贝洛的(当时奥军大部分兵力还没有投入战斗)。在法军这一增援部队来到后 ,奥军停止了进攻。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 :现在他们已弄清楚了法军右翼最近的配置地点 ,并毫无阻挡地从卡斯泰卓退向波河 ,以后渡到了波河北岸 ,与主力会合 ;他们确信 ,法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向皮阿琴察运动。奥军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全部军队调到波河南岸以前 ,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波河北岸 ,这是完全正确的。分兵 à cheval〔两岸〕的任何做法 ,都是错误的。奥军利用瓦卡里察附近的桥梁和桥头堡 ,随时都可以渡河 ,并在法军向斯特拉杰拉进攻时对他们进行侧击。

加里波第率领 5 000 人的志愿军 ,迂回了奥军的右翼 ,目前正在伦巴第。根据最近的报道 ,奥军已经插到他的后方 ,使他面临着退路被切断的严重威胁 ,这无疑会使波拿巴这个“解放者”感到非常高兴。

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受命在利伏诺(在托斯卡纳)组织一个军 ,向奥军进行侧击。法国兵气势汹汹 ,而奥地利人则在窃笑。

星期六和星期日,撒丁军队企图在塞齐亚河左岸巩固下来,但是奥军阻挠了他们的这一行动。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

左右

载于 1859 年 5 月 28 日

“人民报”第 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 略

我们对于最近论述蒙特贝洛附近的军事行动的那篇文章 只能作很少一点补充。从最后终于发布出来使本报在昨天增色不少的奥军公报中可以看出,在施塔迪昂将军率领下向蒙特贝洛运动的3个旅的部分兵力被留在后面,以掩护行军队形的翼侧。其余的兵力到达了卡斯泰卓,该地是由黑森亲王的那个旅占领的。当这个旅据守卡斯泰卓的时候,另外两个旅(不是全部)向前推进,占领了蒙特贝洛和吉涅斯特列洛。他们承受了福雷的全师兵力和德·桑纳兹将军的两个骑兵团(皮蒙特皇家团和蒙费拉托团)的主要攻击,而当他们最后被驱逐到卡斯泰卓时,看来黑森亲王旅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援,以致敌人不敢攻击,于是他们得以秩序井然地而且在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机撤走。但是,根据奥军公报推测,很可能至少有巴拉盖·狄利埃元帅的整整一个军曾在战斗将近结束时到达了战场。这个军由3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组成,共有12个步兵团、3个猎兵营、4个骑兵团(20个骑兵连)和相应数量的炮兵。这和奥军的公报相符合,该公报指出,从法军俘虏的供词中得知,那里有法军12个步兵团。同时这也和来自都灵的两个报道相

符合 ;按照第一个报道的说法 ,福雷曾得到维努亚师的支援 ,而按第二个报道的说法 ,他曾得到巴赞师的支援。这 3 个师便是巴拉盖的全部步兵。还有人说 ,那里曾经有法国骑兵和皮蒙特步兵 ,但是这个消息看来不大可靠。因此 ,战斗的结果是这样的 :除了侦察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的奥军(否则 ,以 3 个兵力薄弱的旅发起进攻 ,那是太愚蠢了) ,在迫使巴拉盖暴露全部兵力以后 ,完全达到了目的。在会战中 ,奥军和他们的敌人打得同样出色。当他们被逐出蒙特贝洛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面前退却 ,但追击在卡斯泰卓被阻住了 ,奥军在这里甚至掉转头来如此有力地赶走追击的敌人 ,以致敌人没有企图再袭击他们 ,虽然这时在战场上法军的人数比奥军多三倍。这样 ,如果法军以他们最后控制了蒙特贝洛而奥军在战斗后即行退却这一点为理由 ,说胜利是属于法军的 ,那末奥军也可以说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因为他们把法军从卡斯泰卓附近赶走而在战斗终结时得到了胜利 ,特别是因为他们圆满地完成了原定的任务 ,而进行这次会战的目的本来就在于同敌人的优势兵力接触 ,当然还要在敌人面前退却。

蒙特贝洛会战后 ,在奥军的中央和右翼也发生了战斗。根据“福尔顿号”轮船带来的、并在昨天发表的消息 ,撒丁军队于 5 月 30 日在韦尔切利附近渡过了塞齐亚河 ,攻击并占领了奥军在帕勒斯特罗、卡萨林诺和文察利奥附近的一些野战工事。战斗由维克多·艾曼努尔亲自指挥 ,经过白刃格斗后才获得胜利。根据撒丁军队的报道 ,奥军伤亡非常严重。我们从“欧罗巴号”轮船送到哈里法克斯的邮件得知 ,奥军曾两次企图夺回帕勒斯特罗 ,并且有一次几乎成功 ,但是朱阿夫部队赶来增援 ,把他们击退了。在这次战斗中 ,据撒丁军队说 ,他们俘虏了敌人 1 000 名。但是由于没

有任何可靠的详细资料，因此不可能对这次战斗加以判断。我们没有想到奥军（据说他们正全力向提契诺河东岸退却）在塞齐亚河附近的前进阵地上会进行这样顽强的战斗。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极右翼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5月25日，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阿尔卑斯猎兵和一些其他部队共约5000人迂回奥军的极右翼，渡过了提契诺河，向马乔列湖与科摩湖之间的华里斯进发，并占领了该城。5月26日，他击败了向他攻击的奥军部队，连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便开始扩大战果；27日，再次击败了奥军的这支部队（它已得到科摩守军的增援），并在同日夜间进入科摩城。乌尔班将军的机动部队开来对抗加里波第，曾把他赶入山区。但是我们从今天夜间刚由“欧罗巴号”轮船接到的最后消息得知：加里波第部队掉转头来，突然袭击奥军并夺回了华里斯。加里波第的胜利在科摩湖旁以及在瓦尔特林纳的各个城市，即在阿达河上游谷地，也就是在1848年起义中表现得比伦巴第平原上各城市更加坚决的那个山区中，引起了起义。科摩湖上的轮船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来自瓦尔特林纳的800人加入了加里波第的军队。据说，虽然加里波第暂时失利，但起义仍在伦巴第这一部分地区扩展。

加里波第这次的袭击是联军巨大胜利，而奥军则犯了很大的错误。奥军让加里波第占领了华里斯，这对他们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灾难，但是，他们应当用加里波第所不敢与之作战的强大部队来扼守科摩，并向塞斯托-卡兰德派出另一支部队截断加里波第的退路。这样，当加里波第被困在两湖之间的狭小地区时，奥军进行猛烈的进攻一定会迫使他放下武器或者进入中立的瑞士领土，而在那里他将被解除武装。但是，奥军低估了这个人，把他叫做土匪

头儿。其实,只要他们很好地研究一下罗马围攻战以及他由罗马向圣马力诺进军的历史²¹⁵,那末他们一定会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非凡的军事天才而且英勇超群和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不这样做,却对他的袭击漠然视之,就像对待1848年阿勒曼迪率领的伦巴第志愿军的入侵²¹⁶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加里波第是个要求严格的人,他的部下大部分在他指挥之下已经有四个月,在这个期间足以使他们学会小规模战争中常用的战法和运动方法。路易·拿破仑和维克多·艾曼努尔派遣加里波第到伦巴第,很可能是想借此把他和他的志愿军消灭掉,因为看来他们是这次王朝战争中过于革命的因素。这样的猜测可以从加里波第是在没有必要的支援之下进军的这一事实得到充分证明。但是,不应当忘记,在1849年他走的就是这同一条道路,并且摆脱了绝境。至少,他占领了莱科附近的桥梁,并控制了科摩湖上的轮船,这就保证了他在科摩湖以东方向上的行动自由。这里是一大片山地,它向北延伸到什普留根和斯特尔维奥两个山口,向东到加尔达湖,向南到贝尔加莫和布里西亚,——这是一个非常适于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在这里,正如乌尔班将军到目前才刚刚相信的那样,要想捉住他,是很困难的。如果以前有6 000—8 000人的兵力便足以在华里斯地区消灭他的话,那末现在可能需要16 000人以上。因此,加里波第的1个旅从此将牵制奥军整整3个旅。但是,在提罗耳集中一批兵力(有整整1个军沿铁路经过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由波希米亚进入了提罗耳)并且在伦巴第还驻有守军的情况下,尽管加里波第新近在华里斯击败了敌人,我们却不知道他怎样才能坚持下去,除非联军在最近的将来能取得对奥军的决定性胜利。而这却是一件难事。奥军又有1个军,即第九军,编入了作战军队,这样,作战军队便增加到

6个军,即不少于20万人;此外,还有其他几个军正在途中。但是,由于路易-拿破仑不能长期按兵不动,所以会战不久一定发生。据报道,他已率大本营和近卫军转到沃格拉——联军阵地的极右翼。这一报道说明会战可能在斯特拉杰拉郊区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奥军将从正面保卫斯特拉杰拉隘路,并企图通过瓦卡里察附近的桥梁而在法军翼侧和后方作战。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5月30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6月15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63号

卡·马克思 马志尼宣言²¹⁷

在目前情况下,马志尼的任何声明都是一个比互相角逐着的各个内阁的外交公文或来自战场的五光十色的公报更值得注意的事件。尽管人们对罗马三执政之一²¹⁸的品格看法多么不同,但谁也不会否认 30 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而且在这同一时期欧洲承认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如今他做出了一件英勇过人的、具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非凡壮举。他一个人冒着牺牲自己声誉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反对自我欺骗、盲目狂热和自私谎言这种巴比伦的混乱语言。他对波拿巴、亚历山大和这两个暴君的代理人卡富尔之间协商好的行动计划所作的揭露,尤其应当仔细地加以估量,因为大家知道,在欧洲所有非官方人士中,马志尼具有最广泛的手段来洞悉各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的见不得天日的秘密。他劝告人民志愿军要划清自己本身的事业和那些僭称王者的事业之间的界限,永不辱没自己的宣言,不让自己的宣言被路易·拿破仑这个可耻的名字所玷污,这些劝告都被加里波第准确地实行了。据伦敦“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报道,路易·拿破仑认为加里波第的宣言中没有提法国二字²¹⁹是个奇耻

见本卷第 291 页译者注。——译者注

大辱。关于加里波第和罗马三执政之一有秘密联系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恐惧,以致把他的军队从最初所答应给他的1万名 chasseurs d'Alpes(阿尔卑斯猎兵)削减到4000名,配属给他的炮兵部队被召了回去,应他的要求已经派出的唯一的一个炮兵连也被召回,而且还暗中派了两个老练的警探装成志愿军去做他的随员,他们奉命报告加里波第的一言一行。

下面我们把马志尼宣言的确切译文刊登出来,该宣言是在伦敦发表的,刊载在最近一期“思想和行动”上,标题是《La Guerra》(“战争”)²²⁰:

“战争开始了。所以,我们面临的不是应该讨论的或然性,而是既成的事实。战争在奥地利和皮蒙特之间爆发了。路易·波拿巴的士兵已在意大利境内。一年前我们告诉大家的那个俄法同盟已在欧洲面前露出了原形。撒丁议会把独裁权交给了维克多·艾曼努尔。托斯卡纳公国政府被武装起义推翻了,托斯卡纳接受了国王的独裁,后来他把独裁权让给了波拿巴。很可能,意大利的普遍骚动将在其他地方引起类似的后果。我们祖国的命运现在肯定要在战场上来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部分同胞只是醉心于行动,一心向往正规军的有力支持,迷恋于对引起公愤的奥地利统治的军事进攻,他们忘记了过去的错误及其原因,他们不仅牺牲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而且甚至放弃恢复自己的信念,他们抛弃任何预见性,任何判断的自由,毫无条件地欢迎任何一个愿意作战的人,不加分析地赞同法国和皮蒙特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就这样开始为自由而战,而同时却使自己处于奴隶地位。其他一些人,看到了宣传家们和追随他们的群众中任何类似政治道德的东西消失了,看到半世纪来作为自由的信徒的人民突然同专制主义结成联盟,看到昨天还信仰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人无条件向国王投降,而霍夫雷多·马美利的同胞们向那个使马美利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丧命的人²²¹欢呼《Viva l'Imperatore》(“皇帝万岁!”),便对未来感到绝望,并声称我们的人民不会享受自由。

至于我们,那我们是既不赞成一些人的盲目的奴才的希望,也不赞成另

一些人的沮丧绝望情绪。战争是在最不利的征兆下开始的。但是,意大利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战争引向良好的目的;我们也相信我们人民的高尚的本能。这些本能将通过宣传家们怂恿人民去犯的错误坚决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志愿军不是在会背弃他们希望的各强国的无限权力下统一起来,而是从容地在各自的国家里组织起义,并争取主动,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来领导这些起义,那也许会好些;但是神圣和崇高的精神推动着他们,他们要确凿地证明自己对共同祖国的忠诚,而意大利也把最伟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自发产生的未来民族军队的核心身上。接受国王独裁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的确可以招致致命的结果,并且有辱为自己的解放而奋起斗争的人民的尊严;罗马和威尼斯是一个例子,那里的人民大会和国防领导人之间的一致曾是强盛的泉源,也可以回忆一下英国的情形,它经受住了反对第一帝国的长时期和可怕的战争而丝毫没有破坏公民的自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一个具有忠于君主制度的议会的国家中,这种独裁显然不外是对联合起来的暴君的要求的一种让步,是实现旨在以领土问题偷换自由问题的计划的第一阶段;但是,人民热情地接受了独裁,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共同祖国的利益而作最高尚的自我牺牲,并且受到了这样一种意见的迷惑:说什么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这种权力的集中,因此愿意以自己的赞同来表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起义的各省向君主独裁者的专制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几乎必然会导致不幸的后果。起义的逻辑要求每个起义的省份服从当地的起义政权,并推举代表去成立全国起义政府;但是,甚至这个重大错误也是对民族统一的要求的贡献;这个错误坚决驳斥了欧洲报刊关于我们的分歧的无稽之谈,这个错误对意大利说来是可以理解的。在意大利,爱国主义在目前已经极其强烈,它一定能克服一切错误。善良的公民们不要再灰心丧气了,而应当给爱国主义指出应有的方向。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应该坚决主张说明事情的真相,不怕恶意的曲解。在这样极其严重的关头,不容许人们去注意直接的利益或各种责难。

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意大利运动和 1848 年一样,是力求争取,甚至是在更大程度上争取自由和国家统一。撒丁国王和路易·波拿巴完全是为了别的目的进行战争。民族的愿望和公认的领导人的愿望之间的对抗在 1848 年曾使战争彻底失败,现在,这种对抗和 1848 年一样有可能,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有可能使意大利陷入

绝望的境地。

国家统一——这就是意大利所要的东西。路易-拿破仑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除了皮蒙特为报偿路易-拿破仑帮助它在北部建立王国而已经让给他的尼斯和萨瓦之外,他还伺机使缪拉特在南部登上王位,使自己的堂弟在中部登上王位。罗马和教皇国仍旧由教皇暂时管理。

是否真诚,这无关紧要,但是目前执掌皮蒙特最高权力的大臣完全同意这一计划。

这样一来,意大利必然要分为四个国家:其中两个直接由外国人管理,而法国将间接地占有整个意大利。教皇在1849年以后成了法国的藩臣,撒丁国王出于感激之情和由于力量不足也将成为帝国的藩臣。

如果奥地利要抵抗到底,那末这个计划就会全部实现。但是,如果奥地利在一开头就吃了败仗,提出像在1848年某个时候曾向英国政府提出的那种条件,即在保留威尼斯的情况下让出伦巴第,——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受到整个欧洲外交界支持的和约将被接受;不过得到实现的将只有一个条件,即扩大撒丁王国并把萨瓦和尼斯转让给法国,意大利的统治者将向意大利大肆进行报复,而朝夕思慕的计划的完全实现将推到某个更有利的时候。

这个计划欧洲各国政府都是知道的。因此他们进行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因此在整个德意志联邦掀起了战争的狂热,因此便准备好了英国、德国和普鲁士结成同盟的因素,——尽管各国政府作了相反的保证,这个同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意大利和波拿巴结成联盟来捍卫自己的民族生存,那末保护奥地利和1815年的各项条约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同盟的中心问题。

路易-拿破仑害怕同盟。因此他就同不可靠的和背信弃义的盟友俄国结成联盟。但是,即使是做出严重危害自由的让步,例如法国以全部放弃波兰和承认沙皇对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全部保护权为代价来使地中海成为法国的内湖,俄国终究还是要进行干涉的。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并由于德国的干涉而具有了欧洲规模,那末在此以前早已准备好了的土耳其各省的起义以及匈牙利的起义将使这个联盟有可能采取一些显著的形式。

如果事情达到这个地步,就会产生一种把关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任何思想都淹没在领土的重新瓜分中的意图。俄国的诸侯将统治在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波拿巴王朝的亲王们将统治各个新的意大利国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还要加上其他一些国家。给不满的匈牙利人

已经内定了俄罗斯大公康斯坦丁,如同给教皇国和托斯卡纳的君主政体的宣传家们内定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样。像查理五世和克雷门特七世这两个死敌联合起来瓜分意大利各自由市²²²那样,两个真正彼此仇视的皇帝联合起来扼杀对自由的一切希望并使欧洲帝国化。因此便有了在一定时期内消灭被卡富尔备加蹂躏的皮蒙特的自由的法令。于是报刊不能说话,于是不允许对军事行动作任何解释,于是人民一无所知,而统治者也就可以一无顾虑地施展他们的策略了。被独立的幽灵迷住了的人民意识,——这种独立归根到底只是改头换面的从属关系,——就这样疏远了关于自由的思想,而自由却是任何独立的真正泉源。

联合起来的暴君们的计划就是如此。一些人可能会否认这些计划,正因为他们自己在准备执行这些计划,就像路易·波拿巴否认他有举行 *coup d'état*(政变)的任何企图一样,另一些人由于盲目相信统治者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由于使他们头脑模糊不清的盲目希望而否认这些计划,但是这些计划的现实性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少,我知道这些计划,各国政府也知道这些计划,并且这些计划一部分在路易·拿破仑和卡富尔伯爵的讲话中,一部分在他们的行动中已经暴露出来了。我只说卡富尔伯爵,因为我觉得,维克多·艾曼努尔没有参与在普伦贝尔和斯图加特进行的勾当。

如果卡富尔伯爵是意大利的真正朋友,那他就会利用由于掌握重要的物质力量和由于在意大利占优势的普遍趋势而产生的巨大威望来准备意大利的运动,并从皮蒙特方面给这个运动以刻不容缓的支持。对于仅仅由意大利的力量发起的斗争,欧洲是会表示赞成和同情的。现今对于应意大利的呼吁并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意大利的拿破仑采取威慑态度的欧洲绝不会容忍拿破仑没有得到请求而自动去援助奥地利。这本来是一件神圣和崇高的事业;卡富尔也是能完成这一事业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自由和权利,就必须和意大利革命结成同盟。这种作法是不合这位撒丁王国大臣心意的。对人民和对自由的憎恶促使他去同暴政结成联盟,同那个由于穷兵黩武的老传统而引起各族人民痛恨的暴政结成联盟。这一计划改变了意大利问题的原来性质。如果这个计划由于有了公认的作为意大利保护人的同盟者而获得成功,——那末国家的统一将会丧失,意大利将成为在法国保护下的重新实行分割的场所。如果这个计划同十二月英雄一起破产,那末意大利就要承担各种损失,意大利将遭受无穷无尽的压迫,而欧洲将不会为我们悲痛,而会说:

‘你们是罪有应得’(《Voi non avete, se non quello che meritate》)。人们的一切策略,所有的打算都是由道德规范主宰的,人民要是破坏这些道德规范,就不能不受到惩罚。一切罪过结果都不可避免地要求赎偿。法国——我们当时曾谈过这一点——要赎偿自己的罗马征伐。撒丁王国把由于半世纪来的牺牲、痛苦和善意良愿而成为神圣的事业同自私自利和暴政连在一起,但愿意大利不要去赎偿该由撒丁王国承担的严重罪过!

然而战争毕竟是事实——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它提出了新的义务并根本改变了我们自己的行动。意大利处在卡富尔的阴谋和联盟的威胁之间,处在路易-拿破仑和奥地利之间,处在这些同样可悲的可能性之间,——这种危险的情况越是严重,全民的力量就越应该联合起来挽救祖国于危亡。如果我们的各个政府之间进行战争,我们尽可以袖手旁观,等待交战各方互相削弱和民族自发势力向前冲去的时刻。但是这种自发势力已经迸发出来了。全国不管是否受骗都是群情鼎沸,它相信,利用皇帝和国王的战争它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托斯卡纳运动、意大利兵士和公民的自发运动,志愿军中的普遍的激昂情绪和振奋精神冲破了官方阴谋的圈子,然而这一切都是民族心脏的跳动。必须继之以实际行动;必须扩大战争,使战争意大利化(italianizzare)。共和主义者能够完成这一使命。

意大利只要愿意,就能拯救自己,免除我们所指出的危险。它能够摆脱目前的危机,达到国家统一。

必须使奥地利失败。我们可以对法皇的干涉表示遗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奥地利是意大利一切民族发展的死敌。每一个意大利人都应当促使奥地利复灭。这是所有的人的尊严和安全所要求的。欧洲应该知道,我们和奥地利之间正不断地进行战争。意大利人民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使之不受侵犯,并使欧洲相信,我们能容忍暴政的帮助,是由于意大利政府请求了这种帮助,但是我们却没有要求它,我们并没有因为它而放弃我们对各族人民的自由和联盟的信念。意大利人可以真心诚意地高呼《Viva la Francia》[“法兰西万岁!”],但是决不会喊《Viva l'Imperatore》[“皇帝万岁!”]……意大利必须到处实行起义……在北部是为了争取自由,而不是坐享其成;在南部是为了组织民族军队的后备队。在奥地利人设有兵营的一切地方或兵营附近,起义可以相当审慎地接受国王的军事领导;在南部,起义应当比较独立地进行……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能够保证意大利的事业并建立以民族阵营为代表的政权

…… 无论在哪里,起义的口号都应当是:“统一、自由和民族独立!”罗马的名字应当永远和意大利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罗马的义务是不派一个人去参加撒丁军队,相反地,要向帝制的法国证明,对任何一个国家说来,一面为了意大利的独立而战,同时却主张支持教皇的专制制度,——这是不体面的事情…… 意大利的命运现在取决于罗马、那不勒斯和志愿民兵队的行动。罗马代表祖国的统一,那不勒斯和志愿军能够组成它的军队。责任是重大的;如果罗马、那不勒斯和志愿军不能履行这些责任,他们就不配得到自由,他们也不能得到自由。听凭各个政府支配的战争将以缔结第二个康波福米奥和约²²³而告终。

被那些断送了 1848 年起义的人现在宣布为胜利秘诀的纪律,不外是叫人民奴隶似地服从和消极听命。我们所理解的纪律,可以要求同进行正规战争有关的一切紧密一致起来;它可以要求在一切形式问题上保持沉默;但是绝不能要求意大利不实行起义或屈服于专横暴虐的独裁者和外国暴君的意志。意大利永远不会放弃自己获得自由和统一的崇高决心!”

马志尼宣言的按语由卡·马克思于
1859 年 5 月底写成
载于 1859 年 6 月 17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66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军事行动的经过

在目前的战争中,到现在为止还只有加里波第一个人享有荣誉。根据各种情况看来,他不怕采取拿破仑第三告诫部下避免采取的那种迅速行动和猛攻。这位志愿军的首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成了意大利的英雄,虽然大西洋这面的波拿巴派报刊企图把他的功绩完全归之于他们自己的伟大的庇护人。这位游击将军的荣誉似乎也激起了维克多-艾曼努尔的竞争情绪。结果,便发生了帕勒斯特罗会战。关于这个会战,可惜我们目前只得到一些电讯报道,而且还是由撒丁兵营拍来的。

根据这些报道,查耳迪尼指挥的皮蒙特第四师几天前在韦尔切利附近渡过了塞齐亚河,此后一直与奥军前哨进行了小战斗,5月30日,该师似乎攻击了帕勒斯特罗、文察利奥和康芬察附近的敌人筑垒阵地。皮蒙特军队击败了占领该阵地的一个旅(很可能是加布伦茨将军指挥的旅),但是据报道,次日(5月31日)晨,25 000名奥军曾企图夺回这个阵地。他们企图迂回皮蒙特军队的右翼,但结果却使自己的翼侧受到康罗贝尔军(特罗胥师)的打击,该军在塞齐亚河上架桥渡河,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战场。法皇立即命令第三朱阿夫团驰援皮蒙特军队。朱阿夫兵“虽然没有得到支援”,但仍向奥军一个炮台发起攻击,缴获火炮6门,并将掩护部队赶入运

河,据说,有 400 人溺死。撒丁国王在战斗最炽烈的地方,并非常专心杀敌,以致“朱阿夫兵曾试图——不过没有成功——抑制他的热情”。据报道,查耳迪尼将军曾亲自指挥朱阿夫兵。最后,奥军被击退,联军俘获 1 000 人,缴获 8 门火炮。

皮蒙特报道称:“奥军伤亡极为惨重,我方伤亡尚未查明。”

与此同时,在康芬察附近发生了另外一场战斗。在那里敌军被凡蒂将军指挥的师击败。但在下午 6 时左右,奥军又企图攻击帕勒斯特罗,不过没有获得更大的胜利。6 月 1 日,尼耶尔将军看来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率领法军第四军进入了诺瓦拉。

自从 1849 年的和约使 Spada d'Italia(意大利之剑)纳入鞘中以来,我们就再没有读过比这更含糊不清而且前后矛盾的战报了。²²⁴其实在上述战报的摘要中,我们已经略去了关于会战的一些最无法解释的细节。奥军参加进攻的有 25 000 人。他们是否全部都被派去攻打帕勒斯特罗,还是其中包括了被凡蒂将军在康芬察击败的那些部队呢?既然后者的人数没有特别指出,那末如果我们考虑到皮蒙特战报是绝对真实的,从而得出结论说,参加 5 月 31 日会战的奥军一共将近 25 000 人,我们大概不会有错误。至于击败他们的兵力究竟有多少,我们将逐步查明。当皮蒙特军队处境危险时,法皇命令第三朱阿夫团向前开进,指挥他们的是查耳迪尼,而撒丁国王却推开他们,冲向战斗最炽烈的地方,朱阿夫兵还试图阻止他,但是无效。

多么壮丽的场面!角色的分配多么惊人!“皇帝”路易-拿破仑命令朱阿夫兵前进。将军,查耳迪尼,而且还是一个皮蒙特产人,率领他们进入战斗,——皮蒙特产人指挥法国的朱阿夫兵!“国王”则投入

他们中间,并且在他自己的将军指挥下在战斗最炽烈的地方作战。但同时我们又听说,国王曾亲自指挥皮蒙特第四师,也就是查耳迪尼的那个师。至于当查耳迪尼率领朱阿夫兵作战,而国王位于战斗最炽烈的地方的时候,第四师的情况如何呢?这个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但是,维克多-艾曼努尔这样的行为是不会使我们奇怪的。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诺瓦拉会战中,他也有过同样幼稚的轻举妄动,曾把自己那个师弃之不顾,因而对会战的失败和拉德茨基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虽然只有在接到法军和奥军的公报以后我们才可能明了这次会战的真相,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自相矛盾的战报中弄清某些有用的事实。联军的极左翼直到目前为止是尼耶尔将军指挥的法军的1个军,该军驻在韦尔切利以西的多腊-巴尔特亚河一带。距它最近的是在卡萨勒附近的查耳迪尼和杜兰多指挥的皮蒙特军队的2个师(第四和第三师)。在亚历山大里亚和瓦兰察附近有卡斯特尔博果和凡蒂指挥的皮蒙特军队的2个师(第一和第二师),以及麦克马洪和康罗贝尔指挥的法军的2个军和近卫军,他们构成中央。亚历山大里亚以东,在托尔托纳、诺维和沃格拉附近配置有库克基亚里指挥的皮蒙特军队第五师和巴拉盖·狄利埃指挥的法军的1个军。

我们知道,帕勒斯特罗和康芬察(这两个地点彼此相距不超过3英里)附近的会战,不仅查耳迪尼参加了,而且凡蒂也参加了;虽然关于尼耶尔一字未提,但是我们却在这里发现了康罗贝尔。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第三朱阿夫团,它既不属于康罗贝尔军,又不属于法军另外3个军中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们听说,路易-拿破仑把他的大本营转移到韦尔切利,并且尼耶尔将军在会战的

第二天占领了诺瓦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联军的部署有了根本的改变。原来由尼耶尔军（26个营）和查耳迪尼师（14个营）共40个营组成的左翼，现在得到了康罗贝尔军（39个营）和凡蒂师（14个营）共53个营的加强。结果，这部分联军现在共有93个营。其中，或多或少参加了帕勒斯特罗会战的，无疑有皮蒙特军队的2个师（28个营）以及康罗贝尔军的特罗胥师（13个营），全部共有25000名皮蒙特军队和至少11000名法军。这便是25000名奥军被击退的原因。

但是，加强左翼显然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尼耶尔将军向诺瓦拉前进和路易-拿破仑将大本营迁至韦尔切利便是证明。其次，近卫军可能也随后到达了那里，这使我们对联军的意图几乎不再有所怀疑。有了近卫军，塞齐亚河一带部队的数量便增加到127个营。此外，利用铁路，就如同在蒙特贝洛会战中那样，可以将极右翼的部队迅速调来适时地参加决战。因此，有两个可能性。或者路易-拿破仑继续原来已开始的运动，完全迂回奥军右翼并把军队的主力配置在韦尔切利直通米兰的大道上，也就是配置在韦尔切利到诺瓦拉一线，同时在波河一带进行佯攻以牵制奥军；或者他将在奥军右翼进行强有力的佯攻，而把主力集中在瓦兰察郊区。在这里，巴拉盖军、麦克马洪军和近卫军共有99个营，而库克基亚里、杜兰多和卡斯特尔博果各师共有42个营，并且这些兵力还要为迅速调往那里的康罗贝尔军和一定数量的皮蒙特部队所加强，因此在一个地点便可能集中170个营，以这样的兵力可以猛烈地攻击奥军的中央而将其消灭。

康罗贝尔军（实际上这里只可能有特罗胥师）和凡蒂指挥的皮蒙特部队在塞齐亚河一带的佯动以及路易-拿破仑的大本营迁

往韦尔切利的这一伴动，似乎说明了第二个可能性更大一些，但这只能是推测。

根据各种情况来判断，这时，奥军似乎仍然在阿哥尼亚河一带，虽然伦敦“每日新闻”²²⁵报道说，他们已退到提契诺河彼岸。他们的部队愈来愈集中在加尔拉斯科周围的狭小地区里。双方在某些地点都在互相试探虚实，一个在蒙特贝洛附近，一个在帕勒斯特罗附近，但是都努力避免分散自己的兵力。奥军至少有6个军，也就是160—200个营（根据拨出的守备部队多少而定）。因此，敌对双方兵力看来几乎相等。再过几天，乌云就将变成一场雷雨。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6月2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6月17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65号

弗·恩格斯 军事事件

从战场发来的电报片断不全而且互相矛盾，因此关于奥军退往提契诺河南岸及其在马振塔的失败，只能作出一些简略的评论。看来，震惊于尼耶尔将军占领诺瓦拉的奥军在6月3日和4日退往提契诺河南岸。6月4日清晨4点钟，法军和皮蒙特军从奥军右翼的土尔比哥和博法洛拉附近渡过提契诺河后，便以优势兵力向正面的敌人实行进攻，经过浴血苦战之后将敌人逐出了他所占领的阵地。联军采访员路易·波拿巴所公布的关于这次会战的详细情况，证明了这位“神秘的将军”的想像力，他仍然不能克制自己对《armes de précision》〔“线膛武器”〕的厌恶，因此便夹在辎重队当中跟在军队后面走，和战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但是“御体安康”。

硬把关于皇帝的健康状况的公报向全世界公布，这种令人厌恶的作法，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在法国贵族院讨论路易·波拿巴的布伦冒险事件时，目击者发誓作证说，在危急关头，我们这位英雄为了排除心头的烦恼，随心所欲采取各种方法，只是没有采取表明“御体安康”的方法。

奥军就像一只准备腾身猛扑的老虎一样，集结了起来，并占领了阿哥尼亚河阵地。他们的失败，应归咎于放弃这一阵地的居莱。

他们控制了洛美利纳并且在米兰前面约 30 英里处占领了阵地,可想而知,他们是不能控制可以通往这个首府的所有要冲的。联军面前敞开着三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奥军中央,到瓦兰察、加尔拉斯科和贝雷古阿尔多;另一条是通过奥军左翼,到沃格拉、斯特拉杰拉,然后再在帕维亚和皮阿琴察之间越过波河;最后,第三条是通过奥军右翼,到韦尔切利、诺瓦拉和博法洛拉。如果奥军想直接防守米兰,那末他们只能派军队挡住这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如果每条道路上各派一个军,那便是分散兵力,结果必然招致失败。但是,侧方阵地可以和正面阵地同样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这是一条现代作战原则。一支集中在不大的地区而且已经准备向任何方向行动的 15—20 万人的军队,敌人要想自己不受惩罚地不把它放在眼里,除非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当 1813 年拿破仑向易北河方向行进时,联军虽然在数量上要弱得多,但是有条件向他挑战。因此,他们在吕特岑,在由爱尔福特通往莱比锡的道路以南数英里处,占领了阵地。当联军使拿破仑的军队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时,有一部分法军已经通过了。这使全部法军运动受阻,已经向前推进的纵队被召回,随即展开了会战,结果,法军虽然在数量上有 6 万人的优势,但也只能招架而已。²²⁶第二天,两支军队平行地向易北河方向运动,而且联军的退却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如果这两支军队的力量不是这样悬殊,那末联军的侧方阵地至少也会和直接横贯在莱比锡大道上的正面阵地一样成功地阻止拿破仑的运动的。

居莱现在占据的正是这种侧方阵地。他率领着一支将近 15 万人的军队,驻守在摩尔塔拉和帕维亚之间,截断了由瓦兰察直通米兰的大道。他的两翼都可能受到迂回,但是他的阵地使他有办法对

付这种迂回。联军主力于5月30日、31日和6月1日集中在韦尔切利附近。它包括4个皮蒙特师(56个营)、尼耶尔军(26个营)、康罗贝尔军(39个营)、近卫军(26个营)和麦克马洪军(26个营),除骑兵和炮兵外,共计173个步兵营。居莱方面拥有6个军,虽然其中一部分被派往沃格拉,一部分被派去对付加里波第,一部分被派去占领各个据点,等等,因而兵力减少了,但仍然有150个营。按照他的军队的配置情况来看,只有在军事行动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作侧敌行军才能从右方迂回它。大家都知道,部队从行军队形改编成战斗队形,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即使在遭到正面攻击时也是如此,虽然这时行军队形是最适宜于作战了。如果编成行军队形的纵队遭到了侧击,这时打乱部署是极其危险的。因此,避免在敌人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进行侧敌行军,是一条确定不移的原则。联军违反了这条原则。它向诺瓦拉和提契诺河前进,好像对自己翼侧上的奥军毫不在意。这时居莱本来应当采取行动的。他应该留一个军在阿哥尼亚河下游监视瓦兰察,而在6月3日夜间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维吉瓦诺和康尔塔拉附近,然后在6月4日用现有的全部兵力打击前进中的联军的翼侧。使用大约120个营的兵力对联军的拉得很长的、断断续续的行军纵队采取这种进攻,几乎毫无疑问地是可以获得战果的。如果联军的一部分兵力已经渡过提契诺河,那对居莱就更有利了:他的进攻将迫使这部分兵力折回,但也不见得能及时对会战的结局起决定性影响。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进攻万一不成功,奥军也仍然能够安全地向帕维亚和皮阿琴察退却,例如在马振塔会战以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居莱的整个作战部署表明,奥军原来的计划确实正是这样。军事会议经过详尽的讨论后,决定把直通米兰的大道开放给法军,而只通过侧敌行军来

掩护米兰。但是,当决定性的时刻来到而居莱也看见他的右侧有大量法军向米兰急速前进时,这个纯血统的马扎尔人踌躇起来了,最后还是退到了提契诺河以东。这样一来,他就给自己准备了失败。当法军沿直线向马振塔(位于诺瓦拉和米兰之间)前进时,他自己却绕了一个大弯——起初沿提契诺河而下,并在贝雷古阿尔多和帕维亚附近渡过该河,然后又重新沿提契诺河而上,向博法洛拉和马振塔前进,以便截断直通米兰的大道。结果,他的军队一小股一小股地开到,不能集中足够数量的兵力来粉碎联军的核心。

如果联军仍然主宰着战场,即控制着直通米兰的大道,奥军就应退过波河、阿达河,或者退入自己的强大要塞,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尽管这样一来,马振塔会战就会决定米兰的命运,但是却还远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奥地利有3个完整的军,目前集中在阿迪杰河,如果居莱的犹豫不决这一次又未能“改正”这位“神秘的将军”的大错误的话,那末这三个军最后也还是能使它的力量保持均势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6月9日
左右
载于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
第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奥军的失败

“波斯号”轮船昨夜到达后,我们得到了关于马振塔会战的各种各样极有趣的文件,读者将在适当的地方看到它们。这些文件的实质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如下:马振塔会战对于奥军说来,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对于法军说来,则是打开广阔局面的胜利;联军进入了米兰并受到狂喜的人民的欢迎;奥军全线退却,贝奈德克军在马利尼亚诺附近大败于巴拉盖·狄利埃(关于他的退职,再也没有提到),被俘 1 200 人。联军充满胜利的信心,而奥军则士气沮丧,军心不振。

我们伦敦的报界同人照例认为会战是出于奥军意料之外的。在我们还没有得到现在所掌握的证明材料以前,我们的意见也一直是这样。现在我们明白了,与其说是居莱遭到了突然袭击,不如说是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现在便来谈谈这种看法的根据。当奥军在米兰前面约 30 英里处占领自己的阵地时,是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控制可以通往这个首府的所有的接近路的。联军面前敞开着三条道路:他们可以经过瓦兰察、加尔拉斯科和贝雷古阿尔多直接在奥军阵地的中央运动;其次,可以经过沃格拉和斯特拉杰拉,并在帕维亚和皮阿琴察之间渡过波河,在奥军的左翼运动;最后,可以直接经过韦尔切利、诺瓦拉和博法洛拉在奥军的右翼运动。如果

奥军想要防守米兰,那末他们只能把军队横置于这三条道路中的一条上而进行防守;如果每条道路各派一个军防守,那便是分散兵力,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侧方阵地可以和普通的正面阵地同样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这是一条公认的现代作战原则。任何一支军队,除非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否则从一支集中在不大的地区而且已准备好向任何方向行动的15—20万人的敌军附近经过时,是没有不受到惩罚的。例如,当1813年拿破仑向易北河方向行进时,联军虽然兵力比拿破仑少得多,却有条件挑战,他们在吕特岑,在由爱尔福特通往莱比锡的道路以南数英里处,占领了阵地。拿破仑的军队已有一部分通过后,才知道敌人就在附近,结果,全部法军的运动受阻,已进到前面的纵队被召回,随即展开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虽在数量上有6万人的优势,但也仅能招架而已。第二天,双方军队平行地向易北河运动,而联军的退却,甚至没有遭到敌人的骚扰。如果双方的兵力不是这样悬殊,那末联军的侧方阵地,至少也会和横贯莱比锡大道的正面阵地一样成功地阻止拿破仑的运动。居莱将军现在占领的正是这种侧方阵地。他率领着一支军队(如果需要,当然他可以使军队的数量达到15万人以上),驻守在摩尔塔拉和帕维亚之间,截断了由瓦兰察直通米兰的大道。他的两翼都可能受到迂回;但这就是他的阵地的特点,而这个阵地如果还有某种价值的话,那末他便应当从这个阵地给他提供的、可以击退敌人迂回的那些有利条件中,找出对付这种意外情况的有效手段。不过,我们现在完全不去注意奥军的左翼,而只研究实际上被迂回的那一翼的情况。5月30日和31日以及6月1日,路易·拿破仑把他的大部分军队集中在韦尔切利附近。31日,他在这里已经有皮蒙特军队4个师(56个营)、尼耶尔军(26个

营)、康罗贝尔军(39个营)和近卫军(26个营)。此外,又调来了麦克马洪军(26个营),在这里共集中了175个步兵营的巨大兵力,骑兵和炮兵尚未计算在内。居莱则掌握有奥军6个军的兵力,虽然其中一部分被派去担任守备部队,一部分被派去对付加里波第,一部分被派往沃格拉,等等,因而兵力减少了,但平均每军还有5个旅,总共有30个旅,即150个营。

如果像这样的一支军队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话,那末任何一个将军都不敢冒险地把它留在自己的翼侧或后方。此外,按照这支军队的配置情况来看,除了在这支军队可以达到的范围内作侧敌行军以外,从右方是无法迂回它的,而这样的侧敌行军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机动。一支处于行军队形的军队常常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变换成适当的战斗队形。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保持着充分战斗准备的。而如果甚至在正面、也就是在行军队形的抵抗力最强的一面遭到攻击时,它都不能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的话,那末在行军纵队遭到来自侧面的攻击时,准备程度就更差了。

因此,公认的战略原则要求避免在敌人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进行侧敌行军。路易·拿破仑仗着他的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有意违反了这个原则。他向诺瓦拉和提契诺河进发,显然对自己翼侧上的奥军毫不在意。居莱正应当在这时采取行动。他应当在6月3日夜间留一个军在阿哥尼亚河下游监视瓦兰察,而把部队集中在维吉瓦诺和摩尔塔拉附近,并于4日以他现有的全部兵力猛攻前进中的联军的翼侧。使用将近120个营的兵力对联军绵长的、互不联系的纵队进行这样的攻击,几乎毫无疑问地是会获得战果的。如果这时联军的一部分兵力已渡过提契诺河,那就更有利了。这一攻击将迫使这部分兵力折回,但是即使折回,他们恐怕也来不及

改变会战的结局了。不过即使这次攻击不成功，奥军随后也可以安全地向帕维亚和皮阿琴察退却，就像马振塔会战以后的退却一样。我们有理由假定，这就是居莱原来的计划。但当6月2日他看到法军已开始把主力集中在直通米兰的大道上、集中在他的右翼的时候，看来他却失去了果断的精神。如果他把法军放过，法军到达米兰的时间也许不比他迟，因为在那里几乎没有一兵一卒阻挡他们直通米兰的道路。即使法军一支不大的部队进入米兰，也会在整个伦巴第燃起一场大火。虽然这些意见很可能在居莱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多次讨论过，并且很可能大家坚持向法军的翼侧进攻，认为这样足以掩护米兰，但是当这样的情况成为事实而法军和奥军距米兰已同样近的时候，居莱却踌躇起来，最后还是退到了提契诺河以东。这便决定了他的命运。当法军沿直线向马振塔运动时，他进行了长距离的迂回：沿提契诺河谷而下，并在贝雷古阿尔多和帕维亚附近渡过该河，然后又重新沿河而上，向博法洛拉和马振塔前进，企图以此截断敌人直通米兰的大道，但已经太迟了。结果，他的军队一小股一小股地开到，不能以足够的大量兵力投入战斗来有效地抵抗联军的主力。奥军作战非常勇敢，这是不容怀疑的；至于会战中的战术和战略问题，我们打算另外再谈。但是，奥军的战报企图把奥军被击败以及这次会战决定了米兰的命运而且必将对整个战局发生影响这个事实隐瞒起来，这是徒劳无益的。奥军还正在阿迪杰河上集中3个军，这将使他们在数量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此外，居莱被解除了指挥权，指挥权让给了具有欧洲第一位战略家名声的海斯将军。但是，据说他身体很弱，不能长时间连续处理事务。

读者大概会注意到，关于奥军在洛美利纳暴行的报道，既为法

国也为英国的可靠消息所否认。我们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不只是为了要对双方严守公道,而且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报道的不信任曾被曲解为我们对于弗兰茨-约瑟夫的同情;其实,与此相反,我们甚至不希望这位帝王被推翻的日期延迟一天。如果他能和拿破仑互相残杀而同归于尽,那末这将是历史的公正判决的圆满结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6 月 9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6 月 2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6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马振塔会战²²⁷

法国和奥地利关于马振塔会战的公报,证明我们决定根据电讯所作出的推断是正确的。

6月4日晨,奥军完成了东渡提契诺河的退却,向马振塔和阿比亚帖格腊索进发,目的是向进攻米兰的法军的翼侧进行攻击。克拉姆-加拉斯将军刚刚率领他那个军(第一军)的1个师由米兰开到,就必须立即用这一师的兵力以及在马振塔附近同他会合的第二军(由利希顿施坦指挥)的兵力自正面攻击敌军。他的预备队是第七军(由措贝尔指挥)的莱沙赫师,配置在距马振塔数英里的科尔别塔附近。提契诺河一线由于不适于防守而被放弃以后,奥军的这七八个旅就需要扼守纳维利奥大运河,这条运河几乎与提契诺河平行,并且只能从桥梁上渡过。奥军必须防守博法洛拉桥和马振塔桥,这两座桥位于由马振塔通往提契诺河圣马尔蒂诺桥的两条道路上。第一军的1个师(由科尔登将军指挥)沿着通往土尔比哥的道路运动;第二军的2个旅占领了桥梁,1个师位于马振塔附近,而莱沙赫师(属第七军),如前所述,配置在科尔别塔附近。

法军分两路纵队进攻。第一路纵队名义上由萨托里英雄70指挥,包括1个近卫掷弹兵师、康罗贝尔军、尼耶尔军和巴拉盖·狄利埃军,共9个师,即18个旅(117个营)。这路纵队直接沿着通过

圣马尔蒂诺桥的诺瓦拉—米兰道路进攻,应当夺取博法洛拉桥和马振塔桥。第二路纵队由麦克马洪指挥,包括1个近卫轻骑步兵师、麦克马洪军和全部皮蒙特军队,共8个师,即16个旅(109个营,因为皮蒙特军队的师比法军的师多1个营)。这路纵队的前卫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就渡过了提契诺河,并在土尔比哥附近渡过了纳维利奥河;它必须向奥军翼侧机动,也就是自北方向马振塔直进,以支援第一路纵队的正面攻击。

正午,麦克马洪开始攻击。他以优势兵力把当面的科尔登师驱逐到马振塔。2时左右,追击奥军前哨的近卫掷弹兵,进抵运河,向博法洛拉桥和马振塔桥进行了攻击。这时在战场上,有法军8个旅对付奥军5个旅(第一军的2个旅和第二军的3个旅),奥军兵力还不到3万人,因为莱沙赫有2个旅甚至还滞留在科尔别塔附近。法国的“神秘的将军”模仿福斯泰夫,把不到3万人的奥军当作是超过了125000人的兵力。法军攻占了运河上的桥梁。在马振塔的居莱,命令莱沙赫转入进攻,夺回马振塔桥。这个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博法洛拉似乎仍在法军手中。这时会战停顿了。麦克马洪军和近卫掷弹兵的进攻被奥军成功地击退,而奥军为此把现有的每一名兵士都投入了战斗。其他各军到哪里去了呢?

到处都有他们,只是在应当有的地方没有。从德国调来的第一军第二师还在途中。当然,奥军不能等待它的到来。第二军的另一个旅没有任何消息。不过居莱本人的电报证明,第二军只有3个旅参加了会战。由里利阿将军指挥的第七军第二师,位于卡斯特列托,距马振塔6—7德里。第三军位于阿比亚帖格腊索附近,距马振塔5德里。第五军大概是从贝雷古阿尔多向阿比亚帖格腊索运动,会战开始时距马振塔至少有9德里。第八军正由比纳斯

科向贝斯塔齐亚行军，离作战地区 10—12 德里，而第九军 *incredibile dictu!* [简直是不可思议地!] 在帕维亚下方、离作战地区 20—25 德里的波河沿岸无所事事地游荡。由于兵力空前地分散，居莱使自己陷入了极其不利的境地，以致从中午到傍晚 5 时左右只能用 7 个旅来抵抗法军两路纵队的猛攻。奥军之所以能抵住这一猛攻，只是因为人数众多的法军仅仅沿两条道路运动因而前进缓慢的缘故。

当莱沙赫扼守马振塔桥并缴获了法军一门新式线膛炮的时候，居莱先生动身到罗贝科（运河沿岸的一个村庄，在博法洛拉下方约 3 德里处）去了，目的是加速第三军和第五军的行军并确定他们的进攻方向。结果第三军的 4 个旅被派到前面去了，其中，哈通旅和朗敏旅位于第一线，杜尔菲尔德旅作为预备队，这 3 个旅都沿运河行动，而维茨拉尔旅则沿提契诺河行动。他们应当猛攻法军的右翼。不过这时法军也得到了援军。皮卡尔旅（属康罗贝尔军勒诺师）开来援助掷弹兵，并将莱沙赫击退到桥东。随后又调来了维努亚师（属尼耶尔军）、让南旅（属勒诺师）和特罗胥师（属康罗贝尔军）。这样，法军在这一地点又集中了 2 个掷弹兵旅和另外 6 个旅。而奥军方面参加作战的，实际上只有第三军 4 个旅中的两三个旅。虽然兵力对比如此不利，奥军仍然接连几次地攻占了马振塔桥，法军只是在以优势兵力进行了殊死奋战以后，才夺取了该桥。

在进行争夺桥梁的战斗时，麦克马洪在自己的正面地段上准备对奥军第一和第二军的四五个旅进行第二次攻击。他的 2 个师成两个纵队再次开始向马振塔进攻，在他们后面第二线进攻的是卡穆指挥的近卫轻骑步兵师。因为埃斯潘纳斯师和拉莫特卢日师

(属麦克马洪军)被奥军顺利地击退了,所以轻骑步兵赶来增援他们。会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时机来临了。法军的第一路纵队通过了马振塔桥,并向麦克马洪纵队已经逼近的马振塔村进行了猛攻。最后,到日落时,在战场上出现了奥军第五军黑森亲王旅。它再一次企图把法军击退到马振塔桥以西,但未获成功,实际上也很难指望,一个兵力薄弱、在蒙特贝洛会战中已遭受重大损失的旅能够阻止并击退向马振塔桥猛扑的大量法军。正面、翼侧和后方都遭到攻击的奥军,从会战开始起就一直处于敌人毫不间断的火力袭击之下,最后不得不退却,而法军在进行了反复多次的猛烈攻击之后,到傍晚时占领了马振塔。

居莱将自己的军队撤到里利阿师占领着的科尔别塔和第三军扼守着的罗贝科,而第五军则在这两地之间露营。居莱企图在6月5日继续战斗,但是分发下去的命令发生了完全不可理解的混乱,因而打破了他的计划。半夜,居莱突然得到报告,第一军和第二军由于对命令理解错误而撤离战场数德里,而且到清晨3时还在继续撤退。这一消息迫使居莱放弃了原定在次日进行的会战。这时,奥军第三军的一个旅重新向马振塔进行了攻击来掩护军队退却,奥军的退却是非常有秩序的。

根据奥军的报道,奥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

第一军科尔登师	2个旅
第二军	3个旅
第七军莱沙赫师	2个旅
第三军	3个旅
第五军(夜晚才加入战斗)	1个旅
共 计	11个旅

根据法军的材料，联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

近卫军 2 个师	4 个旅
麦克马洪军	4 个旅
康罗贝尔军 2 个师（勒诺师和特罗胥师）	4 个旅
尼耶尔军 1 个师（维努亚师）	2 个旅
共 计.....	14 个旅

法军 14 个旅，即 91 个营，至少有 8 万人。但是法军报道中在提到维努亚师的进攻时说：

“损失最大的是第八十五基干团…… 马丹普雷将军在率领自己的旅作战时受伤。”

但是，无论第八十五团或者马丹普雷旅，都不属于尼耶尔军的维努亚师。第八十五团属于拉德米罗师的第二旅（由拉德勒·德·拉·沙尔耶尔将军指挥），而马丹普雷将军所指挥的是该师的第一旅。拉德米罗师属于巴拉盖·狄利埃元帅指挥的军。这便确凿地证明，参加会战的法军兵力比他们公报中所指出的要多。加上拉德米罗师，法军就有 16 个旅，即 104 个营，9 万名兵士；既然拉德米罗师竟被这样无礼地隐瞒了，因此可以怀疑，在战场上作战的法军数量总的说来比战报中所指出的要多得多。此外，从奥军报道中显然可以看出，在意大利的联军作战部队中几乎所有的团都有兵士被奥军俘获的。看来，法军在数量上拥有极大的优势，这使奥军获得了更大的荣誉。他们仅仅让出了曾经作过战的土地，缴获了 1 门火炮，损失了 4 门火炮，而且他们在撤离战场时坚信，如果兵力与法军相等，胜利必将属于他们。但是，关于他们的总司令，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将军，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6 月 4 日，他等待法军攻击。他有 13 个旅（初次参加战斗的 7 个旅、

里利阿师的 2 个旅和第三军的 4 个旅),距战场 8 德里;此外有第五军的 4 个旅,距战场 9 德里,第八军的 4 个旅,距战场 10—12 德里。这就是他的军队在早晨 8 时 30 分的配置情况。如果要求这些军队在发生会战的当天下午 4 时或者至迟到 5 时集中在距马振塔相当近的地区以便参加会战,这能够认为是过分的吗?在中午 2 时,当重要的会战开始的时候,参加会战的兵力难道不是应当至少是 13 个旅,而不是 7 个旅吗?如果这样,科尔登师和第二军就不致遭受重大的伤亡。而在第五军调来以后,奥军便能够转入进攻,并将法军驱逐到提契诺河以西。但是,奥军原有的臭名远扬的行动迟缓的习惯,看来再度控制了他们。真拿破仑曾经屡次说过,奥军常把最宝贵的时刻浪费在无益的仪式和空洞的形式上面。居莱又恢复了这些传统,这样,他就轻率地放弃了自己的胜利,而把它奉送给了“神秘的将军”。如果奥军兵士不是那么英勇,如果十二月十日会²²⁸的名誉会长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人物,那末法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的。

6 月 5 日晨,在居莱指挥的军队中未参加马振塔会战的兵力有:

第三军 1 个师	2 个旅
第五军的部队	3 个旅
第七军 1 个师 (里利阿师)	2 个旅
第八军的部队	4 个旅
共 计.....	个旅

这一兵力与居莱在会战前夕所掌握的兵力相等。在参加上一次会战的部队中,只有第一军和第二军的 3 个师失去了战斗力,其余的 8 个旅是具有战斗力的;这样,居莱一共有 19 个有战斗力的

旅，人数在 10 万以上。和他们对抗的敌军，是已参加了 6 月 4 日战斗的法军 16 个旅以及在 6 月 5 日应做好战斗准备的生力军 4 个师，此外还有皮蒙特军队的一两个师，他们还在离战场很远的地方，正在行进。可见，居莱在 5 日可以掌握有 19 个旅。如果有第九军的支援（居莱不知为什么把第九军配置在离战场很远的地方），这些兵力一定能改变前一天的战斗结局。居莱的错误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第一、当路易·拿破仑在奥军战斗行动所及的范围内由韦尔切利向土尔比哥作侧敌行军时，居莱没有利用敌人这一不利的形势，没有以他所有的兵力向易于攻破的敌军行军纵队猛攻；如果他那样做，他便能够重复 1849 年拉德茨基的战法，把敌人截为两段，并将其一部分兵力驱逐到阿尔卑斯山。

第二、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退到提契诺河以东，以此采取迂回行动来掩护米兰，而直通米兰的大道却被敌人所控制。

第三、退却时，他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并且退却又是如此迟缓，漫不经心，这种情况在演习场上也未必能够得到原谅。

第四、他把第九军完全置于集中地区以外。

第五、在会战过程中，军队的集中是如此混乱，以致遭到了无谓的伤亡，而把胜利白白奉送给了敌人。

居莱虽然犯了这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并且遇到了法军精锐部队这样的敌手，但是他仍没有遭到彻底的失败，在这方面，他完全要感激他的军队的英勇和他的敌人“神秘的将军”的“机智”。居莱的军队显示了人民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而他本人则表现了君主制度的老朽和昏聩。“神秘的将军”则看到，随着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会战的戏剧性的阶段结束了，真正的战争开始了。他

已经确信真拿破仑经常向他的哥哥约瑟夫提到的一句明智的格言的正确性。这句格言说，在战争中，任何捉迷藏的手法都不能摆脱个人的厄运。最后，康罗贝尔由于麦克马洪受到器重而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因此威胁要揭穿萨托里英雄在这次出征中所建树的某些功绩。所以，这位“英雄”就急于要回到包松涅尔郊区自己爱妻的身旁，并 at any price [不惜任何代价] 力图缔结和约。如果不能缔结和约，那末即使是进行和谈也可以，这样，“他这位要人退返巴黎”就有理由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6 月 16 日左右

载于 1859 年 6 月 18 日“人民报”第 7 号和 1859 年 7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7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斯普累河与明乔河

大家知道,伏尔泰在他费尔涅的家中养了四只猴子,他用他的四个论敌的名字来给它们命名,称它们为:弗莱隆、博麦尔、农诺特和弗兰克·德·庞比尼昂。这位作家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它们,不赏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不踩它们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不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对待它们。费尔涅的这位老头需要用这些批评的猴子来发泄肝火,消仇解恨并抑制他对论战武器的恐惧,就像路易·波拿巴如今在意大利需要革命的猴子一样。目前有人也正是这样在喂养着科苏特、克拉普卡、福格特、加里波第,给他们戴上金项链,然后就把他们锁起来,他们有时受到爱抚,有时则遭到拳打脚踢,这要看什么情绪在他们主子的心中占了上风——是对革命的仇恨还是对革命的恐惧。这些可怜的革命的猴子还应当成为革命的人质,保证十二月二日的英雄⁴⁹同革命党之间实行休战,以便这位英雄能够毫无阻碍地毁掉储藏奥尔西尼炸弹的军火库,能够在他自己的阵营里攻击他在土伊勒里宫长期为之战栗的敌人并置之于死地。

帝国应该重新意味着和平²²⁹,——否则就不值得为了创立它而去干这许多可耻的事,再三再四地违背背约并忍受那么多的屈辱。我在这个帝国已经无法保证使革命的炸弹不爆炸、使秘密团

体不活动、使蛮横无礼的资产者和放肆的士兵不捣乱了，对这样的帝国是不能忍受的！Marchons！〔前进！〕这些话就是拿破仑观念²³⁰，就是自由、民族原则、独立，就是你所希望的一切；因此，marchons，marchons！

把意大利变成捕捉革命的捕鼠笼的想法是够狡猾的了。不过这种想法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因为谁要是让人家把自己诱进捕鼠笼，那末只要他一入笼，他对革命党便立刻失去任何作用了。那种想把科苏特、克拉普卡、福格特和加里波第诸位先生头朝下地塞入革命的火山口来堵死火山的企图实在幼稚可笑，这只能加速火山的爆发。

纵然依靠他们的帮助在意大利清除了一颗奥尔西尼炸弹，另一颗炸弹也一定会在法国、德国、俄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爆炸，因为对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自然必要性，就像你们把自己的宝座建立其肩上的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的绝望状态一样普遍存在，就像你们那样得意洋洋地利用其贫困状况来趁火打劫的被掠夺的无产者的仇恨一样普遍存在。只是当革命像闪电一样，像只有在无法防止的致命的雷击发生以后你们才能听到霹雳声的闪电一样，成为无法估计的和无法防止的自然力的时候，革命的爆发才会成为不可避免的。

至于这个爆发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如何发生，这没有多大的意义。主要的是它一定要发生。看来普鲁士这一次要违反它自己的意愿，成为普遍革命要求的表达者。那个独自“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蠢话，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聪明事情”的摄政王完全是出于对保守主义的喜爱而不得不认真地扮演革命的角色，而路易·波拿巴只不过是出于恐惧、矫揉造作和任性而同革命玩弄打情

骂俏的把戏。

普鲁士的武装调停，就是同奥地利结成同盟，就意味着革命。

柏林报刊的普遍情绪说明，与动员军队相结合的中立会成为一种经不起批评的立场。“国民报”²³¹这家反映着内阁所沾染的自由主义狂热的机关报非常正确地指出：

“在目前条件下，中立对比利时、荷兰或者瑞士是合适的，对普鲁士来说，中立就是灭亡。”

这家报纸认为，如果波拿巴实现了他对意大利的“崇高”愿望，其唯一的后果就是确立法国对整个半岛的军事保护权，即使战争是局部性的，即使法国并没有因进行战争而直接得到任何领土，情况也将如此。这样一来，最近三年中本来就已十分明显的俄法两国对欧洲大陆的霸权将会大大加强，以致随时都可以开始早在圣海伦岛上就已经宣布的划分统治范围的工作。新帝国完全表现了其先驱者的趋向，不过它的处境更加有利，因为它没有外来的压力，可以自行选择时间、地点和条件去孤立自己的敌人，然后再把他们 en détail〔各个〕击破。为了阻挠这个直到现在总是巧妙地实现着的斗争计划获得成功，普鲁士不得不同奥地利一起行动，但决不是为了尾随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而是为争取它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前面提到的那篇被看作是摄政政府的政治纲领的文章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对于不久前委托威尔特尔先生进行的调停使命的成就，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如果拿破仑同意议和（这种和约最多只会助长他的官兵的不满），那末就不必再同他斗争了。在这种场合，霍雷修·沃尔波尔说的关于撒丁外交家德·维利侯爵的一句话对他倒是适用的：

“他死了,但是他还希望把他的死亡保守一两天秘密。更长的时间他是做不到的。”

如果上述未必会认真进行的调停不能成功,那时候爆发的就将不仅是拿破仑暴政和哈布斯堡王朝专制统治之间在明乔河上的战斗,而且还有在奥得河和维斯拉河上的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在离普鲁士边境两德里的卡利希已经集结了大批军队。有一个普鲁士军已奉命经汉诺威开赴莱茵河,另一个军正开往南方,而且已建议联邦军队各军军长到柏林参加军事会议。所有这些措施都只不过是动了员前卫。进行反对法国和俄国的斗争的军队还不存在,这支军队只能从人民中征集,但不是从正在朗诵空喊爱国主义的路德维希²³²所写的那些真正德意志的、空喊爱国主义的诗句的人民中去征集,而是从积极行动起来充满伟大的、所向披靡的革命热情和毅力的人民中去征集。如果不能唤起这种热情,那霍亨索伦王朝的动员、武装调停、宣战、进行战争等等就将是黄金海岸的一个黑人的幼稚想法为基础的,这个黑人认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敌人的大门口上吊,就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6 月 23 日
左右

载于 1859 年 6 月 25 日“人民报”
第 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

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敌人时得到的。追击愈猛，胜利愈大。俘虏、火炮、辎重、军旗等，与其说是在会战过程中获得的，不如说是在会战后的追击中获得的。另一方面，胜利的彻底程度取决于追击的勇猛程度。根据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对于马振塔会战的《gran-de-victoire》〔“巨大胜利”〕能够说些什么呢？在会战结束后的第一天，我们看到法国“解放者”正在“进行休整”，没有半点追击的企图！向马振塔进军时，联军事实上集中了全部战斗部队。相反地，在奥军方面则是一部分军队在阿比亚帖格腊索，一部分在通往米兰的道路上，一部分在比纳斯科附近，最后还有一部分在贝耳焦伊奥索附近，——这是如此分散、行动如此迟缓、相互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纵队的聚合，看来它们有意要敌人来攻击它们，一举把它们击溃，然后让敌人不慌不忙地把退路已断的整旅和整团抓去当俘虏。在这种场合，拿破仑，即真拿破仑一定会巧妙地运用那些据法军公报所称在前一天没有参加作战的15或16个旅。但是，假拿破仑、福格特先生的拿破仑、《Cirque Olympique》〔“奥林匹克马戏院”〕的拿破仑、圣詹姆斯街和阿斯特利圆剧场的拿破仑怎样呢²³³？他却吩咐在战场上用午餐。

直通米兰的道路已向他敞开。戏剧性的效果有了保证。这对

他自然是足够了。6月5、6和7日，整整三天奉送给奥军，以便让他们能够脱离险境。他们向波河运动，再顺波河北岸沿三条平行路向克雷莫纳行进。在这三条道路最北的地点，由距离敌军行进路线最近的贝奈德克将军率领3个师掩护这次退却。他从6月6日的驻地阿比亚帖格腊索经过比纳斯科向梅累尼亚诺进发。在最后一城中，他留下2个旅扼守阵地，直到中路纵队的辎重前进行得相当远时为止。6月8日，巴拉盖·狄利埃元帅接到了把这2个旅驱逐出城的命令，并且为了保障胜利，麦克马洪军也归他指挥。10个旅对2个旅！麦克马洪军被派到距拉姆布罗河不远的地方去截断奥军的退路，而巴拉盖的3个师则对梅累尼亚诺进行了攻击；2个旅自正面猛攻，2个旅由右方迂回，2个旅由左方迂回。奥军只有1个旅（罗登旅）在梅累尼亚诺，柏尔将军指挥的旅还在拉姆布罗河的彼岸（东岸）。法军攻击非常猛烈，他们以5倍于奥军的优势兵力，迫使罗登将军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放弃了城市并在柏尔旅的掩护下退却。柏尔旅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后方占领了阵地的，完成任务后，也同样秩序井然地退走了。在这次会战中，柏尔阵亡。作战最多的一个奥地利旅的损失无疑很大，但是十二月的crapauds所举出的数字（约2400人）完全是臆造的，因为该旅的全部兵力在会战前不超过5000人。法军的胜利又是没有战果的。没有得到一件战利品，没有缴获一门火炮！

而奥军虽然在6月6日放弃了帕维亚，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又在8日占领了该城，以便9日再度放弃它。同时，在马振塔会战后仅仅6天，即在6月10日，奥军就放弃了皮阿琴察。他

们从容不迫地沿波河退却，直到基泽河。在这里，他们转向北方，向洛纳托、卡斯提奥涅和卡斯特尔-霍夫勒多前进，并在那里占领了防御阵地，似乎在等待着“解放者”的新的攻击。

奥军起初由马振塔向南至贝耳焦伊奥索，然后向东至皮亚德纳，最后再向北至卡斯提奥涅，实际上成为半圆形的运动，而这时“解放者”却沿这个半圆形的直径前进，因此，他们走的路程比奥军近三分之一。但是，除了在梅累尼亚诺以及在卡斯特内多洛附近（加里波第曾在那里与奥军进行了小战斗），法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追上奥军。追击时的这种毫不认真的态度在军事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加西莫多最大的特色，他笨拙地模仿他的伯父（符合拿破仑法典中《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这一条文²³⁴的伯父），甚至在自己胜利时也是这样。

就在奥军主力在6月18日至20日之间于基泽河的后面占领自己的阵地的同时，联军的前卫到达了基泽河的前面。他们要把主力调到这里来，需要几天的时间。因此，如果奥军真正想要在这里应战的话，那末第二次总会战便可能在6月24日或者26日发生。如果“解放者”要想使自己的部队保持进攻的 *déan*（锐气），并且不给敌人在小战斗中打击他们的机会，他们就不能够在敌人眼前长久延宕。奥军的阵地非常有利。由洛纳托附近的加尔达湖南端到明乔河方向，是一片台地，在靠近伦巴第平原一面以洛纳托—卡斯提奥涅—圣卡西阿诺—卡夫里阿诺—沃尔塔一线为界。在这样的阵地上极便于迎击敌人。这个台地在加尔达湖方向上渐渐隆起，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良好阵地，而且，就这些阵地的坚固和严密程度而言，从前面到后面一个胜于一个，因此就是攻占台地的边缘也还不能保证获得胜利，而只不过是结束了会战的

第一幕。阵地的右翼为湖所掩护，而左翼向后弯得很深，因此明乔河线没有设防的一段几乎有 10 英里。但是，这不仅不是阵地的缺点，而且相反是它最大的优点，因为包括在四要塞——维罗那、培斯克拉、曼都亚和列尼亚哥——之间的沼泽地起自明乔河东岸，敌人如果在数量上没有极大的优势，是不敢进入这个沼泽地的。由于曼都亚控制着明乔河线的南端，而明乔河那一面的地区又处于曼都亚和维罗那两要塞控制的范围以内，所以轻视台地上的奥军而企图不顾他们在明乔河方向上前进的一切作法都会迅速失败。进攻军队的交通线会遭到破坏，而他们自己却不能威胁到奥军的交通线。不仅如此，在明乔河那一面，他们还没有攻击的对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围攻的），而由于没有攻击的对象，他们便不得不重新折回。这样一种机动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它必须在台地上的奥军的眼前进行。奥军只要全线转入进攻，由沃尔塔向戈伊托、由卡夫里阿诺向圭迪佐洛和切列扎拉、由卡斯提奥涅向卡斯特尔-霍夫勒多和蒙特克亚里等方向上袭击敌人的纵队，“解放者”就只能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这一会战。这个会战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奥斯特利茨，只是角色更换而已。

马振塔会战的“英雄”居莱被解除了指挥权。施利克代替他担任第二军团司令官，而文普芬仍为第一军团司令官。集中在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附近的这两个军团合在一起组成奥地利的意大利军团，由弗兰茨-约瑟夫担任名义上的司令官，而以海斯为总参谋长。从施利克在匈牙利战争中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中等才干的将军。海斯无疑是当前最有才干的战略家。危险在于臭名远扬的弗兰茨-约瑟夫亲自干预指挥。同拿破仑侵入俄国时的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在他的周围都是些形形色色的老朽的、无远见的、满

腮胡须的万事通，在这些人中间可能有一些是直接拿俄国人的钱的。如果法军听任奥军停留在他们的阵地上而直驱明乔河，奥军便可以从台地上了如指掌地、一团一团地历数整个法军。由于在距退却线最近的道路上出现敌人而产生的强烈影响，很容易使弗兰茨-约瑟夫这样的头脑糊涂起来。那些带有悲观情绪的、佩着肩章的万事通们的饶舌，对他那脆弱的神经来说，可能成为他放弃精选的阵地而退到要塞区的最好的借口²³⁵。当一个国家由一些愚蠢的年轻人来领导时，一切必然都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状态。深思熟虑的计划，被当作儿戏，听凭主观想像和一时的兴会任意处置。由于在奥军大本营有了弗兰茨-约瑟夫这样一个人，奥军除了指望敌人兵营里有个加西莫多以外，恐怕就再无其他胜利的保证了。但是后者至少曾在圣詹姆斯街的职业赌徒中间锻炼过他的神经，所以即使说他不象他的崇拜者所希望的那样是铁打的，但至少也是橡皮制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6 月 23 日
载于 1859 年 6 月 25 日“人民报”
第 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战争的消息²³⁶

“亚细亚号”轮船的到达，对于经纽芬兰拍来而在昨天早晨登载于本报的、报道明乔河大捷的简讯，并没有带来任何补充的消息。会战发生在6月24日星期五，由清晨4时继续到晚上8时，而轮船是在会战的第二天，在尚未能得到某些详细材料以前启航的。因此，我们必须等到“亚拉哥号”或“文格拉号”轮船到达魁北克才能获得关心时事的读者所迫切希望获得的详细报道。不过由于交战双方的人数大致相等，所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奥地利兵不能和法国兵相比。

在英国以及在我们这里，大多数军事家似乎都曾认为，在拿破仑亲王的那个军由托斯卡纳调来从后方攻击奥军以前，联军不会开始大规模的会战；同时还推测，将有一支小舰队被派到加尔达湖，这将使联军在该地区还能进行侧击。但是拿破仑第三什么都没有等待即进行了会战，并获得了胜利。从得自联军兵营的通讯（其中的一切要点，我们登载在另一个地方）中看得很清楚，会战是唯一现实的出路。迟延会挫伤获胜的联军的锐气，而使奥军有可能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而在小战斗中击败他们。

在施利克指挥的奥军军团的行动中，也出现了在这以前曾造成居莱败北和失宠的那种踌躇不决和优柔寡断的现象。起初，奥军曾准备在洛纳托—卡斯提奥涅—圣卡西阿诺—卡夫里阿诺—沃尔塔一线应战。在这里，向加尔达湖和明乔河的方向渐渐隆起的

台地，提供了许多良好的、一道接一道的阵地，其中每一道阵地都较前一道更坚固、更严密，因此占领这个台地的边缘并不能算是胜利，而只不过是会战的第一幕。奥军的右翼为湖所掩护，而左翼则相当靠后，因此明乔河线几乎有 10 英里的一段是没有设防的。但是，这并不是缺点，相反，实际上是这个阵地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因为在明乔河背后四个要塞之间有一个危险的地区，如果敌人在数量上没有很大的优势，便不敢冒险进入这个地区。明乔河线的南端由曼都亚控制着，而明乔河那一面的地区又在曼都亚和维罗那两要塞控制的范围以内。所以无视在台地上占领阵地的奥军而企图绕过他们在明乔河方向上前进的一切作法都会迅速失败。向前进的军队的交通线会被破坏，而他们自己却不能使奥军的交通线受到威胁。但是，这种机动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它必须在台地上的奥军的眼前进行，并且后者只要全线转入进攻，由沃尔塔向戈伊托、由卡夫里阿诺向圭迪佐洛和切列扎拉、由卡斯提奥涅向卡斯特尔-霍夫勒多和蒙特克亚里袭击分散的联军纵队，联军就只能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这一会战，这个会战很可能变成又一个奥斯特利茨，只是角色更换而已。

这就是奥军所占领的阵地的情况。他们的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对地形很熟悉，因为许多年以来他们的军队经常在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演习。如同我们所说的，这个地区对于当前的会战有着周密的准备，城市和乡村都已设防。但是由于某种在军事观点上完全不能理解的原因，奥军最后放弃了阵地，并顺利地退到明乔河的东岸。24 日，联军在明乔河发起攻击，最后击败了奥军。作战计划的这个突然的、重要的改变与普鲁士（据说它把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德国防御体系的

一部分)的行动是否有某种关系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今后能得到进一步澄清。至于谈到普鲁士,那末有一个情况似乎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的态度必然要妨碍路易-拿破仑把大量军队由法国增调到意大利。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普鲁士在它的9个军中已动员了6个,也就是说已经征集了那些服过3年现役而长期归休的、编入这些军的后备军兵士入伍。在这6个军中,有5个要在莱茵河下游及中游占领阵地。因此,在科布伦茨和麦茨之间的一线上,目前应有普军约17万;德意志联邦军队中人数共达10—12万的其他两个军,也就是巴伐利亚军和巴登、维尔腾堡及黑森—达姆斯塔德军,也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占领阵地,这是不容怀疑的。为了对抗这样一支兵力,拿破仑第三必须动用目前在法国的几乎全部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认为求助于匈牙利人的起义和利用科苏特是适当的;虽然我们几乎可以确信,不在不得已时,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普鲁士目前是否真正有意参战,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是,它想避免参战也不那么容易。它那种规定大部分身体合格的成年人都要当兵的军事制度,要求全国甚至自第一类后备军召集时起即保持非常紧张的状态,以致使普鲁士不能长期处于旁观地位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现在,在8个省的6个省中,所有身体合格的20—32岁的男子都已经武装起来。这种动员给普鲁士的整个工商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只有在军队迅速出征的条件下国家才能够支持这种局面。否则兵士本身也不能忍受这样一种情况,并且在两三个月以后,全军便会哗变。此外,民族感情的浪潮在德国十分高涨,已走到如此地步的普鲁士再不能后退了。德国人对于巴塞尔和约,对于1805年和1806年的摇摆态度以及对于莱茵联邦²³⁷的记忆犹新,

所以他们抱定决心,不允许他们诡诈的敌人现在又来各个击破他们。普鲁士政府不能压抑这种感情。它可能企图引导这种感情,虽然,它如果这样做,将使自己完全同民族运动联系起来,并且使任何一点动摇都被看作是叛变,只会使动摇者本身受到打击。毫无疑问,进行谈判的企图是会有有的;但是,现在各方面已经乱到如此地步,以致不论在哪一个方向都看不到一条走出这座迷宫的道路。

但是,德国一旦参战,那末没有疑问,舞台上很快还要出现一个角色。俄国曾通知德国各小邦,如果德国人对奥地利的崩溃不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它将参加战争。俄国目前在普鲁士边境附近集中 2 个军,在奥地利边境附近集中 2 个军,并在土耳其边境附近集中 1 个军。它可能在今年开战,但一定会很迟。从巴黎和约以来,俄国没有征过新兵;由于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伤亡巨大,归休兵的数量是不会很多的,如果每个军(甚至在召集归休兵回队以后)能有 4 万人,那已经是很多了。在 1860 年以前,俄国不可能采取进攻行动,但即使到 1860 年它也不会有 20 万或 25 万人以上的兵力。现在,德国可以用来在北方作战的有 4 个普鲁士军,共 136 000 人,还有联邦军队的第九军、第十军和 1 个预备师,约 8 万人,并且至少还有 3 个奥地利军,14 万人。因此,即使现在在防御战中,或者甚至在向俄属波兰进攻时,德国对于俄国都是一无所惧的。但是俄国不论在什么时候参加这次战争,都将激起强烈的民族感情并加剧阶级矛盾,而在那时斗争的规模很可能使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各次战争为之逊色。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6 月 24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7 月 8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82 号

弗·恩格斯 索尔费里诺会战

具有骑士风度、对假拿破仑的荣誉梦寐以求的弗兰茨-约瑟夫向我们表明，当“天生的统帅”掌握了指挥权时，其结果将会如何。我们在上星期已经看到，奥军最初本来应当占领卡斯提奥涅高地上的阵地，但是却向大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次会战的时候，毫无理由地不战而放弃了阵地，退到了明乔河东岸。但是弗兰茨-约瑟夫还嫌这样不足以说明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不合逻辑的行为。当军队刚一到达明乔河东岸，我们这位“年轻的英雄”就改变了他的决定（因为对于哈布斯堡王朝说来，没有抵抗就退出战场，是有伤体面的）——命令军队向后转，重新渡到明乔河西岸，攻击敌人！

弗兰茨-约瑟夫以这样幼稚的、时而向后时而向前的运动大大地加强了军队对自己的至圣的统帅的信任之后，就率领军队去攻击敌人。奥军最多有 15 万人；甚至连喜欢说实话的波拿巴也没有说出比这更大的数字。奥军在至少有 12 英里宽的正面上进攻。这样，每英里（2 100 步）正面上最多有 12 500 人，当正面比较窄时，

双关语：《angestammter》，既有“天生的”的意思，也有“世袭的”、“继承的”的意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 445—446 页。——编者注

这一密度在一定条件下当然是足够的,但是在如此宽阔的正面上无疑就不够了,而对进攻说来则更不合适,因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密度都不能保证在个别的重要地点进行足够强大的突击。加以敌人无疑地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因此,奥军的进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比较强大的敌人几乎必定能在任何地方突破进攻军队的如此薄弱的队形。6月23日星期四,奥军开始了总攻,他们到处都轻而易举地击退了敌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波佐伦哥、沃尔塔和圭迪佐洛,并于傍晚推进到索尔费里诺和卡斯特尔-霍夫勒多。第二天早晨,奥军又将敌军前卫向后压缩了一些,而左翼几乎进到基泽河岸,但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敌军主力,于是会战就全面展开了。奥军的两翼都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右翼,他们狠狠地打击了和他们对峙的皮蒙特军队。这里,奥军显然是胜利了。但是在中央却显出了错误的部署所造成的后果。索尔费里诺这一中央的锁钥阵地,经过顽强的战斗最后落到法军手中,同时法军还对奥军左翼造成了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这两个情况迫使弗兰茨-约瑟夫发出退却的命令,弗兰茨-约瑟夫大概已把自己的全部兵力一直到最后一个人,都投入了战斗。奥军显然在没有受到任何军队追击的情况下秩序井然地退却了,并且毫无阻碍地回到了明乔河东岸。

关于会战的详细情况的材料,我们没有及时得到,因此在今天的报上还无法谈论。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奥军在这一次作战也非常勇敢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这由以下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奥军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顽强地坚持了16小时,特别是他们在没有受到敌方任何阻扰的情况下秩序井然地进行了退却。看来,奥军对法国先生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尊敬之感;可能,蒙特贝洛、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只不过使他们相信,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不仅能够

对付法军,而且能对付自己将军们的愚蠢无知的后果。在这样的决战中,缴获 30 门火炮和似乎俘获了 6 000 名俘虏,这对于一个胜利者来说,是非常渺小的战果;在许多争夺村庄的战斗中,胜利者所取得的战果也不会比这更小些。但是,奥军在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作战时表现得多么英勇,他们的统帅就又一次表现得多么昏庸无能。犹豫、动摇、朝令夕改——目的好像是在故意瓦解自己军队的士气,——正是由于这些,弗兰茨-约瑟夫在 3 天内在自己军队面前无可救药地毁了自己。很难想像有什么人比这个傲慢的年轻人更可怜的了,他竟敢担负起统率军队的重任,而同时他自己却像随风摇摆的芦苇,受着极其矛盾的外来影响的支配——今天他遵循着老海斯的指示,明天却又听从与此完全相反的格律奈的建议,今天退却,明天却突然转入进攻,总之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不过,这对于弗兰茨-约瑟夫说来已经够了;他威信扫地,像个可怜虫似地回到维也纳,在那里,他将受到应有的接待。

战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只是在现在,奥军要塞才开始发挥作用。法军渡过明乔河,他们的兵力就将随之而分散,同时也将展开一系列争夺各个据点和阵地的战斗,展开一系列次要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奥军由于现在终于由老海斯来统率,因此总的说来即使兵力少些,仍然有较大的胜利的可能性。一旦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增援部队的到来而重新恢复了交战双方的均势,奥军将能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零散的敌军,重演索马康帕尼亚会战和库斯托查会战²³⁸,只是规模要比过去大 10 倍。当前 6 个星期的任务就是如此。不过,奥军只是现在才调集预备部队,这些预备部队将使奥地利的意大利军团至少得到 12 万人的增援,而路易-拿破仑自从普鲁士动员以后就处于困境,不知道从哪里能得到增援部队。

这样,索尔费里诺会战只是稍稍改变了战争的前途,但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果,这就是使得我们的主宰各邦的“国父”之一的威信完全扫地,并使他的整个奥地利古老的制度发生动摇。在奥地利各地,都流露出了对宗教条约²³⁹订立后所建立的各种制度、集权管理和官僚统治的不满情绪,人民要求推翻这种在国内进行压迫、在国外遭受失败的制度。维也纳群情激愤,以致弗兰茨-约瑟夫匆忙赶到那里去作出让步。但是与此同时,使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其他的“国父”也都出了丑。在具有骑士风度的普鲁士摄政王作为一个政治家表现出弗兰茨-约瑟夫作为一个将军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以后,各小邦由于普鲁士军队通过了它们的领土又开始与普鲁士吵闹起来,而德意志联邦军事委员会声称,它至少要经过两星期的考虑,才能就普鲁士关于使用上莱茵地区联邦各军的建议提出报告。事情混乱透顶。不过,执政老爷们的出丑,对于我们民族没有任何危险。相反地,在1848年革命以后完全变了样的德国人民,现在已足够强大,不仅对付得了法国人和俄国人,而且同时还对付得了自己的33个“国父”。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6月3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9年7月2日“人民报”

俄文译自“人民报”

第9号

弗·恩格斯 历史的公断

我们已经把接到的所有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公报以及来自双方兵营的大量报道(包括伦敦“泰晤士报”的出色的专讯在内)都发表了。既然这些文件已为我们的读者所了解,那末现在来说明在这次会战中弗兰茨-约瑟夫之所以战败和拿破仑第三之所以获胜的真正原因,也许是适时的。

当奥皇为了发起进攻而重新渡过明乔河时,在他指挥下共有9个军,除了要塞守备部队外,每军平均可有4个步兵旅开到战场,总共36个旅,各旅的平均人数为5 000—6 000人。因此,奥皇用于进攻的兵力大约有步兵20万人。虽然以这样的兵力完全足以发起进攻,但是奥军的人数仍然少于或勉强相当于联军,因为联军计有皮蒙特军队的10个步兵旅和法军的26个步兵旅。自马振塔会战时起,法军得到了大量归休兵和受过训练的新兵的补充,这些兵士已分配到各团,法军的旅无疑比奥军的旅要强。奥军的援军是两个新锐的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这样,旅的总数增加了,但各旅的人数未增。因此可以大胆地认为,联军的步兵是满额的(即法军17万人,撒丁军队75 000人),其中除去战争开始以来的伤亡约3万人外,还有步兵约215 000人。既然奥军把希望寄托在迅速而突然的行动上,寄托在自己的部队要求为马振塔的失败雪耻并

证明自己丝毫不弱于敌人的这种强烈愿望上,以及寄托在有利的阵地上(奥军只要向卡斯提奥涅背后的高地迅速前进便能重新占领这一阵地),因此,他们自然完全有理由实行进攻,但是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他们的部队要尽可能地集中并且迅速勇猛地前进。而这两条他们都没有作到。

他们不是在培斯克拉与沃尔塔之间全军展开进攻以便夺取至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为止的一带高地,不是留下骑兵或许还有一个步兵军来防守圭迪佐洛平原,反而留下一个军即第二军在曼都亚防守该要塞,以防备据估计配置在其附近的拿破仑亲王那一个军的突然袭击。如果曼都亚的守备部队没有另一个军的援助便不足以扼守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以抵抗敌人偶然的攻击,那末这必然是一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守备部队。但是,看来这还不是把第二军固定在曼都亚不动的理由。问题在于其他两个军(第十一军和第十军)被派出迂回在阿左拉(基泽河上的一座城市,在卡斯特尔-霍夫勒多西南约6英里处)附近的联军右翼,也就是说这两个军距战场相当远,在任何条件下都必然会过迟地到达战场。很可能,第二军的任务是在拿破仑亲王一旦到达时掩护这支迂回部队的翼侧和后方,并防止该部队遭到迂回。整个这一计划竟在这样大的程度上以奥地利旧学派的思想为依据,它是这样复杂,在任何一个经常研究作战计划的人看来是这样可笑,以致无疑地应当认为奥军参谋部对于该计划的制定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除了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侍卫官格律奈伯爵以外,谁也不会想出这种古董来。这样,3个军都顺利地配置在安全地点。对其余的7个军则做了如下的安排:第八军(贝奈德克军)扼守波佐伦哥与加尔达湖之间的高地上的阵地,以圣马尔蒂诺为它的中心和主要据点;第五军(施塔迪

昂军)占领索尔费里诺;第七军(措贝尔军)占领圣卡西阿诺;第一军(克拉姆-加拉斯军)占领卡夫里阿诺。向南,在平原上,第三军(施瓦尔岑堡军)由戈伊托沿大道经过圭迪佐洛向卡斯提奥涅进攻,而第九军(沙弗哥特希军)则向美多列以南进攻。这一翼侧向前推进了,为的是驱逐联军的右翼并在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到达战场的时候(如果大体说来能够到达的话)支援这两个军。

因此,奥军的实际兵力是真正投入战斗的6个军,他们展开在长达12英里的战线上,即每一个军的正面平均宽2英里(3540码)。阵地拉得这样长,便不可能有足够的纵深。但是这并不是它唯一的严重缺点。第三军和第九军由戈伊托发起进攻,他们的退却路线也通向该地;距他们最近的第一和第七军的退却路线通向瓦列卓。看一下地图,我们便可知,这样就形成了离心退却。在平原上的这两个军行动一无所获的主要原因无疑就在这里。

这24个旅(如果贝奈德克军曾得到从培斯克拉克守军中拔出有一些部队的加强,那末这就是25个或者26个旅)的拙劣部署,由于部队前进迟缓而更是漏洞百出。如果奥军于6月23日重新渡过明乔河时能够迅速进军,那末兵力集中的奥军便可能在中午与联军在德散扎诺、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附近突出的阵地上接触,而且可能在入夜前把联军驱逐到基泽河一带,也就是说在会战开始前奥军便会获得胜利。然而实际上他们在高地上所达到的最远的地点是距明乔河只有6英里的索尔费里诺。在平原上,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卡斯特尔-霍夫勒多,也就是说由明乔河前进了10英里。如果有适当的命令,他们也许会到达基泽河。以后在24日,他们不在拂晓出动,而决定在上午9时出动。这就是为什么在夜间2时出动的联军于早晨5—6时便袭击了奥军的原因!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

免的。33个强大的旅与25或26个弱小的旅(因为在这以前他们都参加过战斗并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作战,结果只能是奥军失败。只有贝奈德克率领他的5个或6个旅与皮蒙特军队相持了一整天(除了近卫军以外,皮蒙特的10个旅,全部参加了会战);如果不是中央和左翼的全线退却迫使贝奈德克退却的话,他也许还能坚守阵地。在中央,第五军和第一军(共8个旅)扼守索尔费里诺,与巴拉盖·狄利埃军(6个旅)和近卫军(4个旅)对抗到下午3时,而麦克马洪的4个旅则阻住了奥军的第七军(4个旅)。当索尔费里诺最后被占领时,法军近卫军便对圣卡西阿诺展开进攻,这样,便迫使奥军的第七军放弃了阵地。最后在下午5时左右卡夫里阿诺的陷落决定了在奥军中央的会战的结局,使奥军不得不退却。在奥军左翼,第三军和第九军与尼耶尔军及康罗贝尔军的1个师(勒诺师)展开了混战,一直到后来,在白天的时候,康罗贝尔军的另外1个师(特罗胥师)加入了战斗,才把奥军击退到戈伊托。虽然奥军这8个旅从一开始便和兵力大致相等的敌军作战,但是他们本来是可以起到更大得多的作用的。他们如果自主迪佐洛向卡斯提奥涅方向坚决前进,便能解救在圣卡西阿诺附近的第七军,从而间接援助索尔费里诺的守军,但是因为他们的退却路线通往戈伊托,所以每前进一步都会使退却路线遭受危险,于是他们采取了完全不适于这类会战的谨慎的行动。但是错误应当由命令他们向戈伊托退却的人来负责。

联军除3个旅(康罗贝尔军的2个旅和皮蒙特军队的1个近卫旅)以外,全部兵力都参加了战斗。因此,既然联军方面除了这3个旅以外不得使用全部预备队,才勉强取得了胜利,而且在胜利之后并没有追击敌人,那末如果弗兰茨·约瑟夫能够很好地利用当

时在南面相当远的地方游荡的那3个军,会战的结局会怎样呢?假定他派1个军给贝奈德克,把另外1个军配置在索尔费里诺和圣卡西阿诺背后作为预备队,再把1个军配置在卡夫里阿诺背后作为总预备队,那末会战的结局又将怎样呢?对于这种方案是用不着有任何怀疑的。皮蒙特军队和法军为夺取圣马尔蒂诺和索尔费里诺而进行多次徒劳无益的攻击以后,他们和阵线的中央将会被奥军全部兵力发起的、有力的和最后的进攻所突破,结果就不会是奥军向明乔河退却,而是在基泽河两岸结束会战。奥军失败了,但不是败于法军,而是败于他们自己的皇帝的傲慢和愚蠢。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由于统帅的碌碌无能,他们战败了,但在退却时仍然保持了队形,除了战场以外,再没有留给敌人任何东西。他们证明了自己是不会惊惶失措的,在这方面并不亚于其他一些世界闻名的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7月6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1859年7月2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92号

弗·恩格斯 索尔费里诺会战

关于索尔费里诺的惨败与弗兰茨-约瑟夫的极端愚蠢之间的直接联系,在“人民报”前一号上已经有了说明。以后发表的关于这一次会战详细经过的报道证明,我们对“年轻的英雄”的才能还是作了过高的估计。1859年对1849年的胜利者们说来,是一场国家考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落第了。

到6月23日,奥军兵力不少于9个军,其中第一、二、三、五、七、八军都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参加过战斗,而第九、十、十一军还完全是新锐兵力,与敌人一次也没有接触过。前6个军共有13万人左右,后3个军有75000人。这样,奥军可以用来对付敌人的兵力不少于20万。但是弗兰茨-约瑟夫作了些什么呢?他将第十军和第十一军从曼都亚派到阿左拉(在基泽河岸),企图从后方打击法军,而为了掩护军队的这一调动,以免受到据估计配置在附近的法军第五军(由拿破仑亲王指挥)可能进行的袭击,他又将第二军留在曼都亚。结果,弗兰茨-约瑟夫只剩下了6个军,即24个旅,而他就是企图用这些兵力对法国—皮蒙特联军的战线展开进攻的。但是,军队运动得如此缓慢,到6月23日傍晚,奥军还在离明乔河仅仅

6英里的地方露营。6月24日的进攻规定在上午9时才开始。6月28日联军先头部队被迫全线退却这一情况以及他们的侦察兵的报告,当然在法军中引起了忧虑,结果不是奥军在9时开始预定的进攻,而是他们自己在5时遭到了袭击。为了对付奥军21个旅(共约136000人),联军陆续投入的兵力不少于33个旅(皮蒙特军队9个旅,45000人,法军24个旅,15万人),换句话说,联军用来自对付他们的兵力不少于195000人;此外,联军方面还有皮蒙特军队的近卫军1个旅和法军布尔巴基师的2个旅作为预备队。这样,在战场上联军的兵力就不少于21万人。联军掌握了这样的优势兵力,胜利是有保障的。然而贝奈德克将军率领奥军第八军仍胜利地击退了全部皮蒙特军队的攻击,并在右翼大获全胜,虽然他自己的军只有4个旅,可能还从培斯克拉守军中得到了1个旅即第五旅的增援。由奥军12个兵力薄弱的旅占领的中央阵地,遭到了法军14个强大的旅的攻击,结果奥军被击退了。左翼8个旅,经过长时间战斗后也被法军配属有大量骑兵和炮兵的10个旅的优势兵力所击退。在左翼以及在中央阵地,奥军本应当集中大量炮兵,但是弗兰茨-约瑟夫却宁愿让预备队炮兵的13个连(104门火炮)安然无事地留在瓦列卓一弹未发!由此可见,法军炮兵占有火力优势的原因很简单,这完全不是因为线膛炮占有优势,而是因为奥地利皇帝的庸碌无能和不可救药的糊涂,他在战斗中根本没有使用自己

皮蒙特军队包括莫拉师、凡蒂师、杜兰多师(每师由2个旅编成)以及萨瓦各旅。法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兵力有近卫军4个旅,巴拉盖·狄利埃指挥的第一军(6个旅),麦克马洪指挥的第二军(4个旅),康罗贝尔指挥的第三军(4个旅,另有2个旅作为预备队)以及尼耶尔指挥的第四军(6个旅)。总共有33个旅,另有3个旅作为预备队。上述资料引自小拿破仑的公报。不过我们只引用了有关步兵的资料。

的预备队炮兵。

但是,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在哪里呢?当战斗在加尔达湖和圭迪佐洛之间进行的时候,他们正在南面相当远的平原上游荡。据说,第十一军远远地看到了一些敌军部队,而第十军甚至连这种情况也没有遇到。当会战胜败已成定局的时候,这两个军不仅没有来得及放一枪,而且还在很远的地方,因此,原来准备阻止奥军这一迂回运动(法军早就知道了奥军的这个行动)的康罗贝尔军,才得以把自己全部兵力直到最后一个师都用去对付奥军的主力,因而在奥军左翼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这时,第二军占领着曼都亚阵地,准备抵抗想像中的普隆-普隆亲王的攻击,而普隆-普隆亲王在那一天正和他的全军在离战场有8日行程远的帕尔马大设盛宴呢!

这里,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说明,当指挥权掌握在德国“天生的统帅”手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两个军(5万人)毫无目的地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漫游,另一个军(2万人)为了对付假想的敌人在曼都亚扼守着战线,而104门火炮则毫无目的地编在瓦列卓的辎重队里,也就是说整整三分之一的兵力和全部预备队以及炮兵,都被故意调离战场,以便使其余三分之二的兵力毫无理由地被敌军优势兵力所粉碎,——这种彻头彻尾的蠢事,只有德国的“国父”才作得出!

奥地利军队作战非常勇敢,以致兵力相当于他们一倍半的联军,只是在作了最大努力以后才把占领着三个阵地的奥军从两个阵地上逐出,而且联军的这些优势兵力甚至不能打乱奥军的队伍或者试图进行追击。如果把弗兰茨-约瑟夫没有利用的7万人和104门火炮配置在沃尔塔和波佐伦哥之间作为预备队,那末,会战

将取得怎样的结局呢？法军无疑将被击败，而战线将重新由明乔河、基泽河向前推到提契诺河。奥地利军队不是败于联军，而是败于他们自己的皇帝的愚蠢和傲慢。奥军兵士在前线犯了很小一点过失，就要挨 50 棒。而弗兰茨-约瑟夫如果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和荒谬行为稍有悔过之意的话，那末他至少也应当到海斯将军那里去接受自己完全应得的 50 棒的惩罚。

从此以后，战争就在四边要塞区激烈地进行了，而这些要塞对联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影响：联军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兵力。一支部队留在布里西亚附近，监视通往提罗耳的道路。法军第五军（由普隆-普隆指挥）配置在戈伊托以便对付曼都亚，并且还得到了 1 个师的增援。皮蒙特军队的大部分被用来围攻培斯克拉。培斯克拉曾经是一个不大的要塞，但是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从 1849 年以来那里构筑了许多向前突出的、配置成半圆形的堡垒，这一要塞已成为一个营垒了（见 1859 年 4 月 1 日“两大陆评论”²⁴⁰）。如果是这样的话，皮蒙特军队恐怕还要花费不小的力量，而用来进行路易·波拿巴所大肆宣扬的“维罗那战役”的兵力，就只剩下 1 个师和在索尔费里诺受到损失而被削弱的法军部队（25 个旅，略多于 13 万人）。如果现在当真由海斯担任统帅，并且掌握权柄不受限制的话，那末他也许很快就会找到机会进行几次胜利的会战，从而为取得更大的胜利作好准备。法军的增援部队有里昂军团的 3 个师，据说还有巴黎军团的 1 个师，共有 5—6 万人。奥军的增援部队有：从南提罗耳调来的第六军，从的里雅斯特调来的第四军以及从驻意大利的部队中抽出的每团的第四野战营，一共至少有 54 个有战斗经验的营。这样奥军增援部队共有 10 万人左右。但是归根到底，对于奥军说来有重要意义的，与其说是依靠生力军

不如说是依靠统一而合理的指挥来达到战场上力量的均势。而这一点,只有在庸碌无能的弗兰茨-约瑟夫停职、由海斯完全掌握指挥权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7 月 7 日

载于 1859 年 7 月 9 日“人民报”

第 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²⁴¹

反动派正在实现革命的纲领。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说明了至今仍在扮演 1789 年革命遗嘱执行人角色的拿破仑主义具有力量的原因,说明了集中起 1848 年关于统一的朦胧幻想并赋予这种幻想以明确的和实际的形式奥地利的施瓦尔岑堡政策获得胜利的原因,而且也正是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给德意志联邦议会改革的怪影增加了力量;承蒙普鲁士的恩典,这个怪影如今正在小德意志的道路上游荡,并同公民雅科布·费奈迭和蔡斯一起,在 1848 年革命的坟墓上跳着离奇的幽灵舞。的确,这个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的最厉害的杀人武器。要知道反动派是照路易·波拿巴实现意大利民族派的要求那样来实现革命的要求的。这个过程悲喜剧因素就在于,那些由于说空话和愚蠢而要被绞死的不幸的罪人在拚命喝采:“做得好!”而当刽子手已经在拉紧他们脖子上的绞索的时候,他们还为他们自己被处死而热烈鼓掌。

正像 1848 年由当时一个号称“革命的”党所提出的、由于传播工作组织得很巧妙而传遍了一切省议会,传遍了一切喧嚣骚乱的人群的著名三月要求²⁴²一样,现在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某种“声明”²⁴³正在凯歌行进。看来,这个“声明”是摄政王给符合他的愿望

的、支持武装调停的“人民运动”提出的 mot d'ordre〔口号〕。这个由摄政王一手策划出来的纲领有一个富有特征的名称,即“拿骚声明”,因为它获得了以我们的老相识蔡斯先生为首的拿骚的国父们的首先承认,声明宣布:

“在这次战争中不能不支持奥地利,因为这场战争可能会使德国的利益遭受打击。相反地,德国负有责任。冯·施莱尼茨先生一定会说——负有使命,要求奥地利实行改革,尤其是保证在意大利维持符合当前要求的秩序。在目前的斗争中,军事的和政治的领导权应当交给普鲁士。但是,仅把领导地位授予普鲁士,还不能!满足令人经常感到的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需要;德国人民一方面不能再拒绝改造德国的中央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能再拒绝制定宪法,这种宪法在德国的人民代议制中应当臻于完善。冯·加格恩则喜欢说——达到顶峰。”

这个还叫做“宣言”的拿骚声明已经为达姆斯塔德、法兰克福、维尔腾堡的立宪派和民主派的名流们所接受,那里在和谐的混乱中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有罗伊谢尔、肖特、费舍、杜维尔努阿、齐格勒等人。它现在也被德国西南部、法兰克尼亚和绍林吉亚的“自由主义的”报刊所接受并吹嘘为一种神奇的福音书,说它能够拯救德国,能从地球上消灭法兰西帝国,把议员的报酬归还给费奈迭先生并使蔡斯先生获得政治威望。

“原来龙犬皮里藏着这家伙。”

请看“普鲁士使命”的维护者们依靠多么可鄙的诡计,利用年老昏聩的帝国庸人们的极端的愚钝来进行投机,打算骗取联邦

原文是俏皮话:《nassauisch》(“拿骚的”,“拿骚族的”)和《Nassauer》(“食客”,“寄食者”)发音相近。——编者注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议会如此侠义地争得的、以那样的高价换来的布隆采耳桂冠！我们应该承认，对于“使命”的英雄们我们是不特别尊敬的，他们不是当众狠狠地给埃申海麦尔街²⁴⁴的先生们几记耳光（他们很想这样做，但就是不敢），而只是站得远远地嗾使肖特、蔡斯和罗伊谢尔先生去攻击他们，想以此来使他们伤脑筋。如果柏林的国家的圣贤君子除了从 second hand [第二手] 把已故的冯·拉多维茨先生及其倒霉的哥达党人的遗产抢购过来以外，再也知道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德国”，那就让他们随遇而安，乖乖服从法俄专政好了，因为他们对于意大利解放运动所开始的斗争的严重性甚至一无所知。

可见，现在仍然有爱国的代议机关，它们的孱弱无力在“拿骚声明”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它们用幻想安慰自己，以为稍微模仿一下 1848 年那套帝国议会的把戏，它们就能够唤起非常强大的，足以同俄国和法国的联合专制暴政相抗衡的人民运动。这只不过证明亨·海涅是多么正确，他说：

“真正的愚蠢也和真正的贤明一样罕见。”

但是要知道，拿骚族的作者们的愚蠢完全是假装的、虚伪的和怯懦的，这是这些先生们为了被人们看作是疯人院的不负法律责任的住户而胡乱给自己戴上的丑角的假面具，因为他们内心为自己可悲的优柔寡断和毫无作为而羞愧，想乞求社会的同情以逃避责任。

“实行人民代议制的改革了的中央政权”——这是多么好的武

原文是俏皮话：《selig》——“已故的”，《unselig》——“倒霉的”。——编者注

器啊 它可以用来对付疯狂的波拿巴主义和被弄得绝望了的 ,由于国内遭到了威胁而被迫在德国土地上争取自己生存的沙皇制度。我觉得 ,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我们已经充分领略了这二者的滋味 ,因此我们懂得 ,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耗费在高谈立宪的人民代议制上面的任何人民运动 ,都是注定要灭亡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9 日

左右

载于 1859 年 7 月 9 日“人民报”

第 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意大利赢得了什么？

意大利战争结束了。正像奥地利人突然地开始了这次战争一样,拿破仑也突然地结束了这次战争²⁴⁵。这次战争虽然为时不久,但是代价昂贵。在进行战争的那几个星期内,不仅功勋、入侵、反击、进军、会战、胜利和失败比比皆是,而且生命财产遭到了只有在许多历时长久得多的战争中才会遭到的大量损失。这次战争的某些后果是十分显著的。奥地利丧失了土地,它的军队的英勇善战的声誉一落千丈,它的自豪感遭到了严重的伤害。但是,我们担心,如果说它从这里吸取了什么教训的话,那也只会是军事方面的教训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教训,我们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只会使它在军训、军纪和军备方面作一些改变,而不会在政治制度或者管理方法方面作什么改变。可能,它已相信了线膛炮的功效。也许,它会在自己的军队中实行一些从法国的朱阿夫兵那里剽窃来的东西。它这样做的可能性比根本改变仍由它统治的意大利诸省的管理制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此外,奥地利至少现在对意大利没有监护权了,它以前一直不顾撒丁的抗议和不满,坚持保留这种权利,从而引起了这次战争。但是,尽管奥地利这次被迫放弃了监护人的身分,然而监护人的位子看来却没有空出来。有一个事实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关于意大利

问题的新协定是在法奥两国皇帝短促会见时签订的,就是说,是由两个各自统率一支外国军队的外国人签订的。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协定签订的时候不仅没有遵照手续哪怕表面上征询一下协定所涉及的各方的意见,甚至也没有通知他们,而他们也并没有怀疑会有人背着他们搞什么勾当和宰割他们。从阿尔卑斯山背后开来了两支军队,在伦巴第谷地相遇并打了起来。经过6个星期的斗争之后,这两支外国军队的外国首领没有让一个意大利人参加他们的会议,就动手安排和处理意大利的事务。在军事方面降到了一个法国将军地位的撒丁国王,就参与达成最后协议和对协议的影响来说,他所起的作用显然不会超过他即使是一个真正的普通法国将军所能起的作用。

撒丁所以一再大声疾呼地控诉奥地利,不仅因为奥地利图谋全面监督意大利事务,而且还因为它支持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它的政策是要保持现状,它干涉它的各个意大利邻国的内政和妄想取得用武力来镇压这些国家的居民改变或改善自己政治地位的任何尝试的权利。意大利人的感情和愿望或撒丁所保卫的实行革命的权利在新制度下是否比在旧制度下得到更多的注意呢?尽管在战争时期波河以南各意大利公国所提供的援助被接受了,可是根据和约却又把这些公国交还给它们的被赶走的统治者。在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区,对坏的管理制度的埋怨都没有像在教皇国那样厉害。这个国家的恶劣管理制度,奥地利对这种恶劣管理制度的同情和支持,不久以前被看作是意大利状况中的一种糟糕的,甚至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现象。尽管奥地利被迫放弃了自己对教皇国的武装保护权,但是这个国家的不幸的居民却没有因为这一改变而得到任何好处。法国像奥地利过去一样广泛地支持教皇的世俗权力;因

为教皇国政府的违法乱纪行为在意大利爱国者看来是同它的教会性质不可分割的,所以大概没有改善的希望。目前作为教皇的唯一保护者的法国,对于教皇国政府的违法乱纪行为实际上应当比过去奥地利负有更大的责任。

至于谈到构成新制度的一部分的意大利联邦,那末必须指出下述情况:这个联邦或者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权力和影响的政治实体,或者只是一种骗局。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大利绝不会得到统一、自由和发展。如果它确是一个实体,那末只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员,就可以预料从它那里究竟会得到什么好东西?要知道,被专制制度的利益所联合起来的奥地利(由于占领威尼斯省或王国而加入了联邦)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可以轻易地制服撒丁,即使其余的较小的国家都站在撒丁方面也无济于事。奥地利甚至可以利用这种新的形势来保证自己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至少会像它以前企图通过跟它们签订的专门条约而取得的一样,是不受欢迎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12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7 月 2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97 号

卡·马克思 媾 和

“欧罗巴号”轮船带来的消息使我们认为,拿破仑第三所宣布的、作为与弗兰茨-约瑟夫和谈基础之一的意大利联邦,是一个非常含糊而又不可靠的东西。目前它只是奥地利同意了的主张,但还必须提交意大利各国政府审查。甚至连撒丁(顺便说一句),看来法奥在缔结和约时是没有同撒丁国王商量的),我们也没有根据认为它已经同意接受这种主张,当然撒丁国王无疑是应当俯首听命的。同时据说预定担任联邦名誉首脑的罗马教皇,曾给路易-拿破仑写信说,他将请求各天主教大国的保护,而在目前,正当他希望得到法国保护的时候,这种手段是相当值得怀疑的。至于不久前被赶走的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君主,他们显然是要重登自己的宝座,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把什么联邦强加于他们,他们无疑都会接受的。但是,关于当今意大利唯一独立自主的君主——那不勒斯国王的态度,我们毫无所知,他断然拒绝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不能肯定,到底会不会组成什么联邦,即使能组成联邦,也完全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性质的。

直到现在才弄清楚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奥地利保留着所有

四大要塞,而且明乔河成了它的领地的西部边界。这样一来,它仍然掌握着北意大利的锁钥,并能利用任何有利的时机夺回它现在所不得不交出的东西。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已说明,拿破仑肯定说他已经真正将奥地利人赶出了意大利,是多么荒诞无稽。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说拿破仑在战争中战胜了奥地利,那末奥地利在缔结和约时显然战胜了拿破仑。奥地利只是放弃了已被夺走的东西,此外再也没有丧失什么。法国以数亿元的代价和将近5万子弟的生命,取得了撒丁的控制,为自己的兵士带来了很大的光荣,并使自己的皇帝获得了一个非常幸运的、但战绩不太大的统帅的声誉。对于法皇来说,这已经够多了,但是对于负担所有这些开支和蒙受所有这些损失的法国来说,这却太少了,难怪巴黎弥漫着不满情绪。

拿破仑用来解释这样突然结束战争的理由,是这次战争的规模日渐扩大,不符合于法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这次战争开始变成了以罗马起义和匈牙利起义为特征的革命战争。很有意思的是,就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以前,正是这个拿破仑还邀请科苏特到兵营去和他会见,实际上促使科苏特采取了革命行动来帮助联军。在这次会战以前他所不怕的危险,在会战以后却立即使他害怕了。情随事迁是由观察得出的一句老话,但是它正适用于目前这种场合。然而,我们用不着多找论据就能证明,拿破仑这个人不但自私自利,而且丧尽天良,他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使5万人流血牺牲,现在,他甚至打算背弃曾在口头上伪善地承认过的各项原则,而他正是以维护这些原则为名把他们引向屠场的。

这一协定所最先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撒丁的卡富尔政府的垮台——它不得不辞职。卡富尔伯爵是意大利最有远见的人士之

一 ,而且与缔结和约毫无关系 ,虽然如此 ,他在愤怒和失望的公众面前也还是站不住的。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 ,他才能重新执政。同样也要经过很长时间 ,路易-拿破仑才能重新使那些多愁善感和热忱的人们产生错觉 ,把他误认作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而在目前 ,意大利人对他比对其他任何暴君和叛徒都更加仇视。如果意大利恐怖主义者的匕首再次威胁到他的生命 ,那是不奇怪的 ,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让奥地利几乎和从前一样稳稳地骑在意大利的脖子上 ,同时却又装模作样地说 ,他为意大利争得了独立。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7 月 28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98 号

卡·马克思 维拉弗兰卡条约

如果说路易·拿破仑在解放意大利这个虚伪的借口下所策动的战争,引起了认识上的普遍混乱和态度的改变,造成了欧洲历史上空前的大骗局,那末,在维拉弗兰卡签订的和约便破除了这种制造祸患的魔法。不管人们怎样谈论拿破仑的远见,这个和约还是破坏了他的威信,甚至使法国人民和法国军队厌弃了他,而博取他们对王朝的好感却一直是他的主要目的。如果他向法国军队宣布说,缔结和约是由于既害怕普鲁士,又害怕奥地利的四边要塞区,那末他说的这些话正好只能引起他们的反感。如果他向人民(他们的每一个代表人物都是天生的革命者)说,他在胜利的道路上所以停止前进,只是因为再前进一步就会不得不与革命联合起来,那末他可以相信,这些人民对他将比对他借以吓唬人民的稻草人更不信任和更加反感。在现代的整个欧洲中,谁也没有像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战争中这样威信扫地。骗局在维拉弗兰卡暴露了。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商人因为这件事而兴高采烈,垂头丧气的煽动家被惊得目瞪口呆,受骗的意大利人气得发抖,“各调停国”,显出一副狼狽相,而那些相信路易·波拿巴的民主使命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用毫无意义的抗议和无法理解的解释来掩盖自己的耻辱。现在看来,只有那些敢于反抗自我欺骗的逆流,不惜冒着被指责为同情奥

地利的危险的人,才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首先我们看一看,和约是怎样缔结的。两国皇帝会面了;弗兰茨-约瑟夫把伦巴第割让给波拿巴,波拿巴则把它转赠给维克多-艾曼努尔,而维克多-艾曼努尔虽然似乎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却甚至没有被允许参加缔结和约的会议。有人曾主张征求一下这一被如此粗暴地买进卖出的活商品的意见,哪怕只是为了表示礼貌,但是这仅仅引起了缔约双方的轻蔑的冷笑。弗兰茨-约瑟夫好像是在处理自己的财产,拿破仑第三也是这样。即使是转交庄园,也得有法官在场和履行某些法律手续。但是在转交 300 万人口时却根本不要这一套。甚至没有征求最后接受这份财产的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同意。对于大臣来说,这样的侮辱是太过分了,因此卡富尔提出辞职。当然,撒丁国王关于给他的这块土地,也可以重复过去罗马皇帝关于搜刮来的金钱所说的一句话 Non olet〔没有臭味〕。也许,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侮辱的气味。

发生的这件事,用 *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的语言来说,大概叫做“民族复兴”。如果拿维也纳会议的协议和维拉弗兰卡的这桩交易相比,维也纳会议也可以被大胆地怀疑为拥护革命原则和同情人民。意大利民族在产生时,就遭到维拉弗兰卡协定的非常尖刻的侮辱,这个协定明目张胆地宣布,意大利不是对奥战争中的一方,因此在缔结对奥和约时没有发言权。加里波第和他的英勇的山地居民,托斯卡纳、帕尔马、康地那和罗曼足亚的起义 195,维克多-艾曼努尔本人和他的遭到蹂躏的国土,他的已经枯竭的财力和伤亡很大的军队,——所有这些都熟视无睹。战争好像是在

这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关于厕所税所说的话。——编者注

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拿巴王朝之间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似乎没有发生过。维克多-艾曼努尔甚至不能希望受到一个次要的盟国所能受到的重视。他不是交战的一方；他只是一个工具，因此不能享有按照国际法每一个参战国无论本身多小都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像缔结 1815 年和约时被兼并的德国各小邦的诸侯所受到的待遇²⁴⁶，他也没有受到。让这个寒酸可怜的穷亲戚忍气吞声地去吃他的富足而强大的同伴的残羹剩饭吧。

如果我们现在转而研究维拉弗兰卡条约的内容——这里是指条约的正式内容，——那就可以看到，它完全符合于缔结条约的方式。伦巴第应当割让给皮蒙特；但是，奥地利也曾在 1848 年向查理-阿尔伯特和帕麦斯顿勋爵提出过这个问题的建议²⁴⁷，不过当时的条件优越得多，而且也没有目前条约中的缺点。那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利用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来为自己服务。土地是打算割让给撒丁，而不是给法国；威尼斯也打算从奥地利分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不属奥地利皇帝管辖，而由奥地利大公统治。当时，这些条件被宽宏的帕麦斯顿轻蔑地拒绝了，他把接受这些条件看做是意大利独立战争的最可怜的结局。现在，同样是这个伦巴第，却作为法国的礼物赠给萨瓦王朝，而威尼斯，包括明乔河上的四边形要塞区，仍然留在奥地利的魔爪中。

这样，意大利的独立变成了伦巴第对皮蒙特的臣属，皮蒙特对法国的臣属。如果说奥地利的自尊心可能因为割让伦巴第而受到伤害，那末奥地利的实力却因为撤出这块土地而更为加强，因为这块土地占用了它的部分兵力，却仍然无法抵御外国的侵犯，也不能补偿为维持这些兵力所花的费用。在伦巴第白白地耗费的金钱，现在可以有益地用于其他地方。奥地利仍然掌握着具有决定意义的

军事阵地,在任何有利的时机都能从这个阵地进击弱小的邻国。后者获得了难以抵御侵犯的边界和住有不安分的、心怀不满和疑惧的居民的领土,实际上只是更加削弱了自己,同时,甚至还失去了自命为意大利利益的代表者的口实。皮蒙特进行了一件有利于王朝的交易,但是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使命。撒丁由一个独立国变成了依靠别人恩典生存的国家,它为了抵御东方的敌人,不得不在西方的保护者面前卑躬屈节。

然而事情还不仅仅这样。根据条约的条件,意大利应按照德意志联邦的形式,组成以教皇为名誉首脑的意大利联邦。目前,在实现这个“拿破仑观念”方面,看来还有一些困难,我们还要看一看,拿破仑第三怎样克服在实现他的“得意杰作”时所遇到的障碍。因为,不论事情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即这个以教皇为首的联邦正是拿破仑第三的“得意杰作”。然而,要知道推翻罗马教皇的世俗政权向来被认为是意大利解放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马基雅弗利早就在他的“佛罗伦萨史”²⁴⁸中指出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而现在,路易-拿破仑不但想解放罗马尼亚,反而打算使整个意大利归属于教皇的傀儡政权。实际上,如果这个联邦终于组成,则教皇的冠冕将成为奥地利统治的标志。奥地利与那不勒斯、罗马、托斯卡纳、帕尔马及摩地那分别缔结条约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领导下的意大利各国君主的联邦。在维拉弗兰卡条约规定建立的意大利联邦中,教皇、奥地利和复位的各公爵——如果他们能够复位的话——为一方,皮蒙特为另一方,这样的和约和联邦真是超过了奥地利的最大胆的期望。从1815年起,奥地利就力图建立意大利各国君主的联邦来对付皮蒙特。现在它可以使这个皮蒙特服从自己了。既

然意大利联邦名义上是以开除撒丁的教籍²⁴⁹的教皇为首,而实际上是由撒丁的死敌来领导的,那末奥地利就可以在这个联邦内,消灭这个小国的生命力。这样一来,不是解放了意大利,而是压迫了皮蒙特。与奥地利对抗的皮蒙特,注定要担任普鲁士的角色,但是它没有普鲁士在联邦议会中使对手难于活动的那些手段。法国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它对意大利可以采取与俄国对德意志联邦所采取的同样的态度,然而,俄国在德国的影响是建立在哈布斯堡王朝与霍亨索伦王朝保持均势的基础上的。皮蒙特能够恢复自己威信的唯一的方法,已由它的保护者明白地给它指出了。路易·拿破仑在告兵士书中说道:

“伦巴第归并于皮蒙特,这就为我们 即为波拿巴家族 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盟邦,它的独立将归功于我们。”

这样,拿破仑就是在宣布,独立的皮蒙特已经被他的一个总督管辖区取代了。维克多·艾曼努尔没有任何手段来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他只能诉诸被他欺骗了的信任他的意大利,或者诉诸把赃物分了一部分给他的奥地利。但是,很可能,意大利的革命会干预这件事情,以改变整个半岛的状况并且再次把马志尼和共和党人推上舞台。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8 月 4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04 号

弗·恩格斯 意大利战争

回 顾

—

“神秘的将军”急忙把他的近卫军调回巴黎，以便带领他们举行凯旋入城式，然后在卡鲁塞尔广场上让凯旋的军队接受他的检阅。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主要的军事事件，以便弄清这个处处仿效拿破仑的糊塗的真正功绩到底是什么。

4月19日，布奥尔伯爵作了一件最轻率的事，他通知英国大使说，他将在4月23日给皮蒙特人规定3天限期，逾期则开始军事行动并下令进攻。虽然布奥尔知道马姆兹伯里不是帕麦斯顿，但他却忘记了，普选的日子即将到来，而眼光短小的托利党人由于害怕他们会被蔑称为“奥国佬”因而实际上不得已成了波拿巴分子。4月20日，英国政府急忙将这个情报通知波拿巴先生。随后，法军立即开始集中，并下达了用归休兵编成第四营的命令。4月23日——英国普选前一天，奥地利人当真向撒丁提出了最后通牒。得比和马姆兹伯里急忙宣称这种行为是一种“罪行”，他们对此表示最坚决的抗议。波拿巴命令他的军队在最后通牒限期以前越过皮蒙特国界；4月26日，法军进入萨瓦和热那亚。但是，奥军为托利党

政府的抗议和威胁所阻,又失去了两天的时间,所以不是在4月27日,而是在29日才进入皮蒙特。

因此,“神秘的将军”在奥军入侵前9天便得到了关于他们的情报,并且由于英国内阁同他狼狈为奸,他比奥军早3天开始了行动。但是,“神秘的将军”不仅在英国内阁里,而且在奥军的统帅部里,都有自己的同盟者。原先每个人都认为,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将是海斯。然而担任总司令的却是在1848年和1849年从未与敌人交过手的居莱这个糊里糊涂、没有定见的十足的蠢才。海斯不是贵族出身,因此反动的、亲耶稣会的、形成弗兰茨-约瑟夫的权奸的贵族集团对他没有好感。当时,弗兰茨-约瑟夫同格律奈一起制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受到海斯的严厉批评,于是格律奈—图恩—巴赫的三执政就利用这点唆使软弱的弗兰茨-约瑟夫反对这个老战略家。这样一来,出身高贵的庸才居莱便作了总司令,他那主张侵入皮蒙特的作战计划也被采用了。海斯当时则建议严格地采取守势并且避免在明乔河以西进行任何会战。当时,奥军为暴雨所阻,所以在5月3日或者4日才到达波河和塞齐亚河,当然,要想对都灵或者对应蒙特的一个要塞进行突然袭击,已经是太迟了。法军大量集中在波河上游,这就给了无能的居莱以一种他所期望的按兵不动的借口。为了要充分证明自己确已无能为力,他命令在蒙特贝洛附近进行战斗侦察。这样,奥军13个营就光荣地同法军16个营进行了会战,一直到巴拉盖·狄利埃军的第二师和第三师到达战场时为止,此后奥军达到了目的便退走了。但是因为在这次侦察以后,奥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就证明,即使根本不进行这次进军,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时，“神秘的将军”必须等待军用物资和他的骑兵，而且很可能正在研究他爱好的毕洛夫的著作以消磨时光。法军在获得关于奥军部署和兵力的详细情报以后，可以很容易地制定出进攻的计划。一般说来有三种进攻的方法：直接从正面进攻以突破中央，迂回右翼，或者迂回左翼。“神秘的将军”决定从右翼迂回敌军。奥军为征收钱粮而毫无阻碍地把塞齐亚河与多腊-巴尔特亚河之间的整个地区劫掠一空以后，配置在由比耶拉到帕维亚的长长的一线上。5月21日，皮蒙特军队攻击了塞齐亚河一线，并在卡萨勒和韦尔切利之间进行了几天小战斗，这时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阿尔卑斯猎兵插到了马乔列湖附近，并在维列佐托发动起义，渗入卡马斯科和布里昂察地区。居莱仍然让他的军队处于分散状态，甚至还把他6个军中的1个军（第九军）派到波河南岸。到5月29日，准备工作终于进展到可以开始进攻了。大部分皮蒙特军队参加的、对第七军（措贝尔军）部队进行的帕勒斯特罗和文察利奥的战斗，给联军打开了通往诺瓦拉的道路，居莱命令军队不作抵抗就退出诺瓦拉。皮蒙特军队、法军第二、三、四军以及近卫军便立即被派往该地，第一军也随后开到。对奥军右翼的迂回已经完成，直通米兰的道路已经打开。

于是，奥军又出现在拉德茨基于1849年获得诺瓦拉胜利时所占领的阵地上。联军的纵队拉得很长，沿为数不多的平行道路向提契诺河运动。他们只能用缓慢的速度行军。居莱，即使把分散在外的第九军除外，也还有5个军。当皮蒙特军队于5月29日和30日认真发起进攻时，居莱便应当立刻集中他的部队。至于在什么地方集中，这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14—15万人集中于一地，敌人是无法置之不理的，而且任务并不是消极防御，而是 *a tempo*（适

时地)打击敌人。如果居莱在5月31日或者6月1日把军队集中在摩尔塔拉、加尔拉斯科和维吉瓦诺之间,那末一方面,当敌人在诺瓦拉迂回他的右翼时,他便可以攻击敌人的翼侧,把敌人的行军纵队截为两段,将其一部驱逐到阿尔卑斯山,并占领通往都灵的道路,另一方面,即使敌人在帕维亚下方渡过波河,居莱也还能适时赶到,截断敌人去米兰的道路。

军队确实开始集中了。但是在完成集中之前,居莱由于诺瓦拉失守而不知所措。因为敌人距米兰意比他还近了!不过,这样更好。现在正可以 *a tempo* 打击敌人,因为敌人会被迫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但是不管居莱个人怎样勇敢,他在精神上却是个懦夫。他不但不迅速前进,反而退却,想借强行军围绕敌人作弧形运动,重新在马振塔截断敌人直通米兰的大道。

部队在6月2日开始运动,大本营迁至伦巴第的罗察特。6月3日晨5时半,海斯将军到了那里。他要求居莱对于自己不可宽恕的错误加以说明,同时立刻命令军队停止运动,因为他认为还有可能向诺瓦拉方向进行突击。整整两个军,第二军和第七军,已经在伦巴第境内,正由维吉瓦诺向阿比亚帖格腊索行进。第三军正在通过维吉瓦诺附近的桥梁时接到了停止运动的命令,它便折回,并在皮蒙特境内的河岸占领阵地。第八军通过了贝雷古阿尔多,而第五军通过了帕维亚,第九军相距还是太远,完全在战场以外。

当海斯详细了解了军队的部署后,发现要想在诺瓦拉方向上取得胜利已经太迟,现在只剩下马振塔方向了,于是在上午10时向各纵队发出了继续向马振塔进军的命令。

居莱把马振塔会战失败的过错推到海斯身上,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干涉以及由于纵队的停顿而耽误了四个半小时所造成的。这

个借口是多么没有根据,由下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维吉瓦诺附近的桥梁距马振塔 10 德里,也就是短短一日的行程。第二军和第七军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时,他们已经在伦巴第,因此,他们平均最多还有 7—8 德里的路程。虽然如此,第七军只有 1 个师到达了科尔别塔,而第二军只有 3 个旅到达了马振塔。第七军的第二师到 5 月 3 日才到达卡斯特列托,即到达阿比亚帖格腊索附近,第三军至迟在上午 11 时就已接到由维吉瓦诺附近桥梁出动的命令,因此还有大半天的时间,但是该军竟没有走到距离 5—6 德里远的阿比亚帖格腊索,因为它只在第二天下午 4 时左右才在罗贝科附近(阿比亚帖格腊索以北 3 德里)进入战斗。毫无疑问,由于指挥官缺乏应有的指挥能力,纵队堵塞了道路,以致减慢了行军速度。如果一个军需要一昼夜以上的时间才能通过 8—10 德里的距离,那末耽误 4—5 个小时确实不起什么作用。经过贝雷古阿尔多和比纳斯科行进的第八军一定走了很多弯路,以致它即使不失掉那四个半小时,也仍然不会适时赶到战场。由帕维亚出发经过两日真正的强行军赶到的第五军,在 6 月 4 日晚才仅仅以一个旅加入了会战²⁵⁰,这个军用加速运动的办法弥补了它失去的时间。因此想把军队分散的责任推到海斯身上的这个企图,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

这样看来,马振塔会战胜利的有战略意义的序曲是:第一,路易·波拿巴自己的真正错误,因为他在敌人行动范围内进行了侧敌行军;第二,居莱的错误,因为他不集中兵力去袭击敌人拉得很长的行军纵队,反而进行反行军(而且是安排不当的反行军)和退却,以致完全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把疲劳而又饥饿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战争的第一阶段便是这样。关于第二阶段的情况,我们下一次再谈。

二

关于我们的“真正神秘的”拿破仑的情况,我们谈到他在马振塔战场为止。居莱给了他极大的恩惠,这样的恩惠只有总司令才能赐给他的敌人;居莱使自己的军队如此分散地开到马振塔,以致在会战时他只有相当少的部队,甚至到了傍晚军队也没有全部到齐。第一军和第二军退向米兰,第八军由比纳斯科开来,第五军由阿比亚帖格腊索开来,第九军被派到遥远的波河一带游荡。这正给真正的统帅造成了机会。这时候应当用夜间到达的大量生力军冲入分散的奥军纵队,这样便能得到真正的胜利,迫使整个整个的部队连同军旗和火炮一齐投降。平凡的拿破仑在蒙特诺特和密雷栖摩、在阿本斯堡和累根斯堡²⁵¹便是这样做的。但是,“高尚的”拿破仑却不这样做。他比这样愚蠢的经验主义要高明。根据毕洛夫的著作他知道离心退却是最有利的。因此,他对居莱的巧妙的退却战术给了相应的报答;他不向奥军前进,反而拍电报告知巴黎:军队正在休整。即使不这样,他也相信,全世界是很懂礼貌的,一定会把他在马振塔的笨拙的行动称为“巨大胜利”!

最可爱的居莱已经如此成功地对敌人进行过一次弧形的迂回机动,现在又来重复这个试验,并且这一次的规模更大。他硬要他的军队先向东南、向波河行进,然后以3个纵队沿3条平行道路顺波河到奥利奥河上的皮亚德纳,然后再转向北朝卡斯提奥涅前进。并且,他绝没有着忙。他到卡斯提奥涅需要走的路程约有120英

里,也就是说有 10 天正常行军或者 8 天强行军的路程。因此,6 月 14 日,至迟 15 日,他便可以在卡斯提奥涅附近占领阵地,但是实际上,他的军队大部分在 19 日才到达加尔达湖以南的高地。然而,信任换来信任。如果说奥军前进缓慢,那末“高尚的”拿破仑则证明,甚至在这方面他也胜过他们。平凡的拿破仑在这时一定会首先命令军队以强行军取捷径(全长不到 100 英里)向卡斯提奥涅前进,以便先于奥军到达加尔达湖以南的阵地和明乔河一带,并在可能的地点再次攻击奥军行军纵队的翼侧。但是,这个“完美无缺的”拿破仑却不这样做。他的座右铭是:“前进时切勿着忙。”他从 5 日到 22 日才把军队集中在基泽河一带,也就是说 100 英里的路程走了 17 天,或者说一昼夜仅仅行军两小时!

这些便是法军纵队所必须忍受的千辛万苦,而且是引起英国报纸的记者对 *pioupiou* 的那种坚韧不拔精神和无穷的朝气赞叹不止的千辛万苦。法军只有一次企图进行后卫战。这是指法军把奥军一个师(贝格尔师)逐出梅累尼亚诺这件事。该师有一个旅坚守城市,另外一个旅已在拉姆布罗河背后,准备掩护前者的退却,因此几乎没有加入战斗。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位“神秘的将军”就证明了:如果非这样做不可时,他也是通晓拿破仑的战略的,这就是集中主力于决战地点!根据这一原则,他派出了整整 2 个军,也就是 10 个旅,来对付这个唯一的一个旅。受到法军 6 个旅攻击的奥军这一个旅(罗登旅)支持了约 3—4 个小时之久,直到人员伤亡三分之一以上的时候才退过拉姆布罗河,在退却时没有遭受敌人的追击;奥军只以第二个旅(柏尔旅)的兵力就完全抵住了占

巨大优势的法军。由此可以看出,法军作战是非常有礼貌的。

在卡斯提奥涅,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位英雄——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真是棋逢对手!一个到处宣传自己是亘古以来最聪明的人,而另一个却喜欢把自己装扮成骑士。一个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成为当代最伟大的统帅,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继承真拿破仑的衣钵,你看他不是出征时也还带着拿破仑用过的酒杯和其他遗物吗?另一个硬是要把胜利同自己的旗帜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毕竟是自己军队的“天生的最高统帅”啊!在十九世纪革命的间歇时期盛行各处的各式各样的模仿者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的现象,再也不能比这更为明显了。

弗兰茨-约瑟夫的最高统帅事业是这样开始的:他首先命令他的军队在加尔达湖以南占领阵地,以便而后立刻撤至明乔河的东面。但是当部队刚刚退到明乔河的东面,他又立刻派遣他们去进攻。这样的战法也许使“完美无缺的”拿破仑也吃了一惊,而他很有礼貌,不能在自己的战报中公开承认这一点。由于他恰好也在同一天率领他的军队向明乔河运动,因此两支军队才发生了冲突,也就是索尔费里诺会战。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述这次会战的详细经过,因为本报过去已刊登了这方面的材料,况且奥军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公报又故意混淆视听,以掩饰“天生的统帅”的那些令人吃惊的失策。但是,由此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索尔费里诺会战失败的责任主要应由弗兰茨-约瑟夫及其权奸来承担。第一,海斯被故意地、经常地置于次要地位。第二,弗兰茨-约瑟夫本人贪图海斯的职位。第三,由于权奸的弄权,一群无能的、有时甚至在个人勇敢

方面也令人怀疑的人担任了重要的指挥职务。由于这种种原因,不用说什么原定计划,就是在会战的当天还这样乱七八糟,以致军队的指挥、运动的协调、战斗行动的方法和顺序都不存在了。看来在中央特别混乱。在这里的3个军(第一、五、七军)的行动是如此矛盾和不协调,在决定性时刻是如此缺乏联系,而且经常是互相妨碍,以致从奥军的报告中我们只能够得出一个、但却是不容争辩的结论:这一次会战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人数少,不如说是因为指挥极端拙劣。从没有一个军及时支援过另一个军。预备队到处都有,就是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偏偏没有。尽管索尔费里诺、圣卡西阿诺、卡夫里阿诺在顽强而巧妙的防御下是一道攻不破的阵地,但是它们就这样一一失陷了。既然索尔费里诺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据点在两个小时内便失掉了,所以会战也就随之失败了。索尔费里诺的失陷是因为受到了向心攻击,这种攻击只有用反攻才能击退,但是恰恰没有反攻。继索尔费里诺的失陷之后,其他居民点也同样因为受到向心攻击而失陷了,奥军仅以十分不够的、消极的防御来抵抗这种攻击。不过奥军仍然还有生力军,因为奥军的伤亡统计表证明:在参加会战的25个基干团中有8个团(罗斯巴赫、约瑟夫大公、哈特曼、梅克伦堡、海斯、格律贝尔、维恩哈尔德、文普芬各团),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团,每团伤亡不到200人,这说明他们只有少部分兵力参加了会战!而在上述的8个团中,有3个团和格腊迪斯卡边屯团一样,每团损失不到100人,至于在猎兵中,大多数的营(5个营)每营伤亡都在70人以下。因为右翼(贝奈德克的第八军)在敌人占巨大优势的情况下确实被迫以全部兵力加入了战斗,所以这就是说,所有上述那些仅以部分兵力参加战斗的各团和各营必定都是在中央和左翼,而且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一定是在中央。这便

说明,在这里的指挥是怎样的糟糕。其实原因很简单:弗兰茨-约瑟夫夫人以及他的权奸既然在这里,那末这里的一切必然是毫无计划的。预备队炮兵的13个连一炮未放!在左翼,似乎也同样缺乏指挥,特别是骑兵,在“老懦夫”们的统率下没有在战斗中使用。凡是有奥军骑兵团出现的地方,那里的法军骑兵便扭头奔逃;但是,8个团中仅有1个骠骑兵团真正参加了攻击,另有2个龙骑兵团和1个枪骑兵团只以部分兵力参加了攻击。普鲁士骠骑兵损失110人,2个龙骑兵团共损失96人,西西里枪骑兵的损失不明,其余4个团一共损失了23人!炮兵总共只损失180。

这些数字比其他一切更能说明奥地利的将领从皇帝到各军军长在指挥军队作战时的那种毫无信心和优柔寡断。如果再考虑到法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以及因不久前获胜而士气高涨的条件,那末我们便可以明了奥军不能取胜的原因了。唯一没有气馁的军长是贝奈德克,他完全独立地指挥右翼作战,而弗兰茨-约瑟夫无暇干预。因此,虽然皮蒙特军队在数量上比奥军多一倍,但是贝奈德克仍然有力地打击了皮蒙特军队。

“高尚的”拿破仑在指导战争方面不是像弗兰茨-约瑟夫那样的一个新手。他已经在马振塔取得了教训,根据经验知道自己在战场上应如何行动。他让老瓦扬计算应当占领的战线长度,由此自然得出了各军配置的方法;此后,他便让各军长自行指挥,因为他对他们的指挥能力是不用特别担心的。他自己则前往那些最便于为下星期六的一期巴黎“画报”²⁵²提供自己肖像的地方,从那里,他发出了虽然神气十足但却毫无意义的琐碎命令。

三

很多年以前,在杜塞尔多夫学院有一个俄国画家,他以后因为无能和懒惰而被送到西伯利亚。这个可怜人非常崇拜自己的尼古拉皇帝,常常带着激动的心情说:“皇帝伟人!皇帝万能!皇帝也能作画,但是他没有时间,所以皇帝常买一些风景画,然后在上面画一些兵士。皇帝是伟人!上帝伟大,但是皇帝还年轻!”

“高尚的”拿破仑和尼古拉有共同之处,他认为风景画只是为了在上面画兵士而存在的。但是因为他甚至连在风景画上画兵士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就满足于自己摆好姿势让别人来作画。Il pose(他正在摆姿势)。马振塔、索尔费里诺和整个意大利对于他只是一幅画的背景,只是一种借口,以便重新把他那装腔作势的精彩肖像登在“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²⁵³上。因为这件事只要少量金钱就可以做到,所以他总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向米兰人说:

“如果世界上竟有不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人,这个时代是广告宣传和投机取巧的时代,那末我是不属于这类人的。”

老拿破仑伟大,但是“完美无缺的”拿破仑已经不年轻了!

关于他已经不年轻了的这种想法,使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或许已经是应该缔结和约的时候了。单纯 succès d'estime(靠名声)所能达到的一切,他已经达到了。“在四次战斗和两次会战中”,他损失了5万多人(这只是在战场上的损失,病员不算在内),夺取

了与奥地利要塞毗连的地区,关于这个地区,奥地利通过它在明乔河上构筑要塞的事实早已向全世界表明,它并不打算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条件下认真防守这个地区,而这次之所以防守它,只是为了同海斯元帅呕气而已。“高尚的”拿破仑迄今一直以典型的镇静姿态和带着可疑的胜利统率自己军队所走的那条 *via sacra* [神圣之路]²⁵⁴ 忽然走不通了。在那边有一片乐土,这不仅是现在的“意大利军团”命中注定看不到的,也许连他们的子孙也是注定看不到的。里沃利和阿尔科列不在计划之内。维罗那和曼都亚马上就要给他们点颜色看,而“高尚的”拿破仑直到目前同他的军事随员所能进入的唯一的要塞是阿姆要塞,——当他能够离开这个要塞时,即使不举行任何仪式,他已经心满意足了。²⁵⁵ 落在他身上的赫赫战果是太少了;固然,他进行过 *grandes batailles* [大会战],但说他曾获 *grandes victoires* [巨大胜利],甚至连电报线都不会相信的。争夺营垒的战争,对付老海斯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而胜利机会逐渐减少的战争,需要作极大努力的战争,也就是说真正的战争,——这不是拿破仑这个圣马丁门剧场²⁵⁶和阿斯特利圆剧场的英雄所能进行的。此外,还要加上这样一个情况:他这方面如果再前进一步就会引起莱茵河上的战争,而在那时也许要出现一些困境,会使他立刻收起那些矫装英雄的丑相和装模作样的 *poses plastiques* [优美姿态],但是,“高尚的”拿破仑不是喜欢这种事情的人,所以他缔结了和约,收回了自己的计划。

当战争一开始,我们“高尚的”拿破仑便立刻想起了平凡的拿破仑的意大利远征,想起了蒙特诺特、德果、密雷栖摩、蒙特贝洛、马连峨、洛迪、卡斯提奥涅、里沃利和阿尔科列这条 *via sacra*, 现在让我们把摹制品和原作比较一下。

平凡的拿破仑,是当法国财政混乱,不能得到任何借款,但又不仅要在阿尔卑斯维持两个军团,而且还要在德国也维持两个军团的时候,担负起了指挥3万名半饥饿的、赤足的、衣衫褴褛的兵士的责任。撒丁和其他意大利国家不是和他站在一起而是反对他。与他对敌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组织上都超过了他的军队。虽然如此,他仍然率军进攻,迅速地连续不断地给奥军和皮蒙特军队6次打击,并且每一次都能够保证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因此逼得皮蒙特求和,而自己则渡过波河,又在洛迪附近强渡阿达河,围攻曼都亚。他将奥地利的第一支援军击溃于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附近,并在它发起第二次进攻时又以勇敢的机动迫使它困守于要塞之内。他将驰来援救被围的曼都亚的第二支援军阻于阿尔科列,使它蒙受打击达两个月之久,这支军队一直等到它的增援部队开到后才得以前进,但是在里沃利又被击败。然后他迫使曼都亚投降,迫使南意大利各国君主乞和,并越过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直抵塞美林山麓,在那里缔结了和约。

平凡的拿破仑是这样行动的。而“高尚的”拿破仑怎样行动呢?他握有一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和最强的军队,而国内的财政情况至少能使他通过借款很容易地弥补战争的费用。他有6个月的时间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准备战争。拥有坚固的要塞和数量众多的优良军队的撒丁站在他这一面。罗马在他手中;意大利中部只要一接到他的信号,就会参战并和他联合。他的作战基地不在滨海阿尔卑斯山,而在波河中游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附近。在他前辈走过的只有山间小道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铁路。但是他怎样行动呢?他向意大利派出5个强大的军,兵力众多,连同撒丁军队一起在数量上始终远远超过了奥军,并且超过奥军那样

多，以致他还能够把第六军为一支游览的军队让给他的堂弟来完成军事游历的任务。虽然有铁路，但他还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集中他的军队。最后，他进攻了。居莱的无能对他是一种难得的有利条件，借助于这一条件，本来打成平局的马振塔会战，却由于两军在会战后所处的偶然的战略情况（“高尚的”拿破仑完全没有错，而过错只应由居莱一人来负责）而变成了他的胜利。拿破仑不去追击奥军，而出自感激的心情放走了他们。在索尔费里诺，弗兰茨·约瑟夫几乎是硬要他得胜，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得到比马振塔会战更好的战果。正是现在出现了平凡的拿破仑施展他的全部本领的局面。战争正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进行，并且它的规模能使巨大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刚刚达到平凡的拿破仑的 *via sacra*〔神圣之路〕的起点，刚刚看到光辉的前景，“高尚的”拿破仑却已请求议和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7 月 20、28 日
和月 3 日左右

载于 1859 年 7 月 23、30 日和 8 月 6 日
“人民报”第 12、13 和 1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卡·马克思 被证实了的真理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论 1796 年和 1797 年意大利战局的著作中有一个地方指出：战争归根到底不完全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演戏，如果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战争胜败是往往与政治吹牛家们想像中描绘的景象截然相反的。²⁵⁷ 当我们对不久以前的那场战争的各个军事事件作出评价的时候，我国各种殷勤的然而不大明理的波拿巴派报纸——不管它们是用法文还是用英文出版的——常常情绪激忿地大叫大嚷。知道了上面这条真理，我们就可以对此处之泰然了。现在我们高兴地知道，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得到证实的时间比预料的要早得多，而且是由最主要的战争参加者——弗兰茨·约瑟夫和路易·拿破仑——证实的。

撇开细节不谈，我们那些评价实质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认为，奥军的失败不是由于联军表现了什么卓越才能，不是由于线膛炮的神话般的作用，不是由于臆造的各个匈牙利团的叛变，不是由于法国士兵的大受赞扬的勇敢，而完全是由于弗兰茨·约瑟夫和他的私人顾问们所任命的用来代替像海斯将军这样人的奥地利将军们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正是由于这种糟糕的战略，结果不仅聪明到在每一个据点上都用很弱的兵力去抗击敌人，而且在战场上竟能以最没有意义的方式去调遣现有的兵力。另一方面，即使在这种状

况下奥地利军队仍然顽强抵抗；虽然双方兵力不等，但在各次会战中差不多互有胜负；法国人犯了许多战略上的大错误；法军不可饶恕地按兵不动而使胜利大为减色，并且由于错过了追击的机会而几乎使他们丧失胜利的果实，——这一切使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奥军的最高指挥权由庸碌无能的人手中转交给有才能的人，交战双方的处境一定会同现在截然相反。早在战争开始以前我们就坚持的第二个论点，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论点是：从奥军由进攻转入防御的时候起，战争就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戏剧性的，在伦巴第表演；另一部分是认真的，在明乔河战线的后方，即在四个要塞组成的威力很大的要塞网内开始。我们说过，同法国人将会在前面阵地上遇到的考验比起来，他们的全部胜利是不足道的。为了攻克那个阵地，甚至真拿破仑也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虽然在他那个时候，维罗那、列尼亚哥和培斯克拉在军事方面是不值一提的，全部进攻的压力都只得由曼都亚来单独承担。海斯将军当然比我们更加了解奥地利最高军事领导的 *status quo*〔现状〕，现在我们从维也纳报纸上知道，他从战争刚开始就建议不要攻入皮蒙特，而是撤出伦巴第，只在明乔河以东应战。现在我们来听听弗兰茨·约瑟夫和路易·波拿巴在他们的辩护词中说了些什么——一个说他放弃了一部分领土，一个说他改变了他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作战计划。

弗兰茨·约瑟夫在谈到战争时，证实了“通报”并没有反驳的两件事实。他在告军队书²⁵⁸中说，同奥军对抗的始终是优势的兵力。“通报”不敢反驳这种说法，而这个说法只要能正确地看待，就会把全部罪责加到奥皇本人的身上。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是，从“特派记者们”的矛盾百出的各种说法中，从法国的谎言和奥

地利的虚夸中,我们能够吸取说明真实情况的东西来,并且在只有有限的不可靠的资料的情况下,在我们对从蒙特贝洛开始到索尔费里诺为止的历次会战所做的述评中,弄清楚了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弗兰茨-约瑟夫着重强调了另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在某些报纸的帮闲文人听起来应该是十分不平常的。现在把他的原话引在下面:

“尽管我们的敌人尽了最大的努力,用尽了为发动他们策划的战争而早就训练好了的大量兵力,甚至还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同样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他们在战斗中所获得的一切,只是次要的胜利。而奥军则以其坚毅不拔的力量和英勇气概守住了阵地,掌握这个阵地,就为它在将来收复失地的一切尝试中提供了很好的获胜的机会。”

弗兰茨-约瑟夫在他的告示中不敢明讲的,就是他和他的权奸们使奥军在整个战争中吃了败仗,因为他们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他所宠信的人,用自己荒唐的想法来束缚那些虽然出身于平民但是有才干的将军,并且用不可理喻的障碍来堵塞他们的道路,——就连这个罪过他现在也完全公开地承认了,即使不是在口头上,起码也是在事实上承认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海斯将军的建议一直不被重视,他曾被剥夺了按他的履历、他的年龄,甚至按他在奥地利官阶表中的职位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地位,现在却授予了他以元帅的称号;把意大利军团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弗兰茨-约瑟夫在到达维也纳之后,首先有意张扬地拜访了老将军的夫人。总之,哈布斯堡的专制君主对这个无论就其平民出身、自由主义的同情心、有点粗鲁的坦率性格、军事才干说来对雪恩布龙²⁵⁹的自命不凡的贵族界都是一种侮辱的人现在所采取的全部态度,就是对于不管具有哪种社会地位的人说来都是有失体面的认错,而

对于主宰人们命运的世袭君主们说来更是有失体面的认错。

现在我们来看看奥地利告示的法国仿制品,也就是波拿巴的辩护词²⁶⁰。他是否也同他那些以为他赢得了许多决定性胜利的崇拜者们一样在自欺自慰呢?他是否在想,将来局势也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他是否暗示过事件已达到决定关头,只要坚持就能获得彻底胜利呢?完全相反!他承认,戏剧性的斗争已经结束,战争很快就将不可避免地要改变性质,往后失败在等待着他,不仅革命的威胁,而且“他所面临的、隐蔽在大型要塞后面的敌人”的力量也使他感到害怕。他看到自己所面临的只是一场“长时间的没有结果的战争”。他一字不差地说了如下的话:

“当战云笼罩着维罗那城的时候,斗争不论在军事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改变性质。敌人隐蔽在大型要塞的后面,他的两翼由于周围的领土那已经中立而得到了掩护,我就不得不对这样的敌人的正面发动进攻,在临近长时间的没有结果的战争的时候,我迎面碰到了武装的欧洲,它不是准备夺取我们的胜利,就是准备加重我们将遭到的失败。”

换句话说,路易-拿破仑之所以签订了和约,不仅是因为他害怕普鲁士和德意志,以及害怕革命,而且还因为他害怕四个大型要塞。根据“比利时独立报”上一篇半官方的文章来看,围攻维罗那需要有6万人去增援。如果他同时在法国留下佩利西埃所指挥的北方军团所必需的兵力,他就不可能从法国调出这么大量的人来,而且即使他拿下了维罗那,他还要为夺取列尼亚哥和曼都亚而斗争。简言之,拿破仑第三和弗兰茨-约瑟夫在战后完全证实了我们早在战前和战时关于两国的军事力量和战争的性质所说的话。我们所以要引用这两个证据,是因为它们无意中维护了正确的看法和历史的真理,反对了肆意夸大和愚蠢妄想的洪流,这股洪流在最

近两个月里泛滥得这样厉害,恐怕不久以后未必能再次达到这种程度。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22

日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8 月 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0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入 侵！

在当代伪善政策的一切信条中，没有一条像“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一信条那样，闯下了这么多的灾祸。这个以包含着大谎言为主要特征的大实话，是一个战斗号召，它呼吁全欧洲武装起来，并且使那些雇佣兵产生了这样一种狂热，以致每一个新和约的签订都被看做是一次新的宣战，都成为进行有关的各种投机活动的对象。现在欧洲各国都已变成兵营，兵营内的雇佣兵都渴望互相厮杀，以便为了和平而互相割断咽喉，这样，在每一次新战争爆发之前必须弄清楚的就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站在哪一边。一旦负责外交的议员们借助于《*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个经过考验的例律，满意地解决了这个次要的问题，一次文明战争便开始了；这种文明战争，按其残酷野蛮的程度来说，应该是强盗骑士阶层繁荣鼎盛时代的东西，而按其阴险诈伪的背信弃义性质来说，又毕竟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新时期所特有的产物。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野蛮行为的普遍爱好成了正常的事情，不道德行为成了常规，非法行为有了它自己的立法者，暴力统治有了它自己的法典，那就毫不足怪了。因此，现在所以还有人常常回过头来请教《*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其原因就在于

阿姆要塞昔日的囚徒²⁵⁵的这些荒谬的狂想已经成了一种现代诈骗宗教的摩西五经，成了皇帝进行军事冒险和搞证券投机勾当的政策启示录了。

路易-拿破仑当年在阿姆要塞中说过：

“伟大的事业很少是在第一次就成功的。”²⁶¹

由于确信这一条真理，所以他具有在必要时实行后退，以便随即准备做新的跳跃的本领，并且在没有使他的敌人丧失警惕性，而他自己所宣布的那些 mots d'ordre(口号)尚未变得陈腐可笑，因而还是危险的东西的时候，一直不断地使用这种手法。这种为了欺骗社会舆论而伺机行动的本领，这种为了更加无阻碍地重新前进而后退的本领，一句话，ordre, contre-ordre, d'ésordre(朝令夕改，毫无秩序)的规则奥秘，曾经是他在政变时期的最有力的同盟者。

至于入侵英国这样一个拿破仑观念，那末看来他还是想采用老战术。这个曾经常被正式地加以否认的观念，多次受到嘲笑，多次沉浸在贡比鼻的香槟酒洪流中，它虽然似乎遭到过许多次失败，却一再地被提到欧洲的政治磋商和闲谈的议事日程上来。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但是任何人都感觉到，单只是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还没有被战胜的力量。像 84 岁的林德赫斯特勋爵或胆略过人的埃伦伯勒这种正派人，由于害怕这种观念的神秘力量而向后退却了。如果一句普通话竟能对政府、议会和人民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那末，这只不过是证明大家都本能地领悟到和意识到，这句话有 40 万大军作为后盾，你要想摆脱这种可怕观念，就非去同这支军队拚个你死我活不可。

“通报”上那篇根据对英法两国海军预算所作的比较把英国说成是应对昂贵的军备开支负责的祸首的文章,由至圣的手草就的这个文件²⁶²的开头和结尾部分的激愤语调,“祖国报”上那篇干脆急不可耐地进行威胁,随后又立即发出命令要把法国的军事力量转入平时状态的半官方评论,——所有这一切都是构成波拿巴策略的最有代表性的要素,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报刊和社会舆论要十分严肃认真地讨论入侵问题了。当有人说法国“没有武装起来”的时候,——在意大利战争开始以前,瓦列夫斯基先生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谁也不承认的清白无辜,曾经特别明确地声明了这一点,——紧接着就爆发了历时三个月的“解放战争”,如果法国把没有武装起来的军队解除武装,那我们可要提防着最突然的 coup [攻击]。

毫无疑问,除了入侵英国以外,波拿巴先生不可能率领他那帮御用军队去进行别的、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大陆更受欢迎的事业。布吕歇尔访问英国骑马经过伦敦街道时,由于他所固有的兵士本性,竟不禁得意忘形地感叹说:“天呀,这才是最适合于掠夺的城市啊!”对这个呼喊的诱惑力,法皇的御用军是能够作出评价的。但是,入侵的观念可能也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欢迎,理由也就是“泰晤士报”为了保持《entente cordiale [“诚意协商”]》²⁶³关系而提出来的那一条:

“我们高兴地看到法国的强大。只要我们是作为秩序的保卫者和文明的朋友而携手并进,它的力量也就是我们的力量,它的繁荣也就是我们的强盛。”

有一支由 449 艘战舰(其中²⁶⁵艘是蒸汽军舰)组成的舰队,有一支在意大利流过血和得到过光荣的 40 万军队,口袋里又有从圣

海伦岛得到的遗嘱,并且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大灾祸,波拿巴先生恰好是能够把最后赌注押在入侵英国上的人。他一定会 va banque〔孤注一掷〕!他早晚总是要下这笔赌注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9 年 7 月 30 日“人民报”

俄文译自“人民报”

第 13 号

卡·马克思 法国在裁军

拿破仑第三在他的“通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他打算把他的陆军和海军转入平时状态的声明，如果把这个声明同战争即将开始之前同一个专制君主在同一家“通报”上郑重声明从1856年以来他的陆军和海军从来没有转入过战时状态²⁶⁴的事实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这次声明是难令人信服的。他想要在官方机关报上发表一篇巧妙的短文就马上能使英国陆军和海军停止军备竞赛，这种意图太明显了，以致连怀疑都用不着。可是，如果把“通报”的报道看做是一个简单的圈套，那也是很大的错误。拿破仑第三的诚意是出于不得已：他不过是在做他不能不做的事情。

自从签订了维拉弗兰卡条约以后，路易·拿破仑就必须把自己的陆军和海军裁减到与平时预算相适应的程度。在意大利的冒险使法国付出了将近2亿美元和6万名最精锐的兵士的代价，而得到的除了某些军事荣誉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况且就连这些军事荣誉，也是颇令人怀疑的。用继续征收军税的办法来加深不受欢迎的和约所引起的绝望，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试验。周期性地向法国国外实行袭击，以战争的胜利来使居民陶醉，从而克服他们的敌对情绪——这就是复辟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把法国拖到全欧战争的边缘以后，又俨然装成使法国免遭这场战祸的救主

——这就是十二月政变的英雄 49 存在的第二个条件。在战争引起了不可避免的工商业的凋蔽以后，和平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不仅成了一件美事，而且具有一种新的魅力。在朱阿夫兵和密探的老一套的治理下，忧伤使和平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可是一旦单调的生活被战争所破坏，这种忧伤就会为适意的快感取代了。当法国人想到一个虽然不无机智但是毫无原则的冒险家篡夺了统治人民的权力时，强烈的屈辱感会使他们的意识感到压抑；但是当他们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和统治者即使不是实质上，而只是表面上也屈服于这同一个最高权力时，这种屈辱感便暂时得到减轻。大大缩减了的生产现在按照弹性规律获得了新的推动。骤然中断了的生意加倍兴隆起来了，突然瘫痪了的投机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样一来，拿破仑战争之后出现的和平又保证王朝得到了一个极其必要的间歇，在这以前不久，这种间歇看来只有靠宣战才能获得。当然，经过一段间歇以后，旧时的分解因素又会起导向战争的作用。市民社会和 coup d' état [政变] 之间的根本的对抗又会重新出现，当内部斗争再次达到一定的紧张程度时，又会诉诸新的武打的幕间剧，把这当做唯一现实的出路。十分明显，“社会救主”不得不借以拯救自身的条件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危险。在意大利的冒险比克里木的冒险危险得多。但是，与莱茵河上的冒险和更遥远的冒险，即入侵英国（这两场冒险拿破仑第三无疑正在考虑之中，而且也是他的臣民中最没有理智的人所渴望的事情）相比，意大利战争简直是一场儿戏。

但是，在进行这些新的冒险之前，还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相隔四年。但是现在，当路易·拿破仑还活着并掌权的时候，恐怕不会出现这样长的间歇了。他所赖以维持

政权的劫运注定的必然性，将愈益频繁地打搅他，而且间歇将一次比一次短。军队的渴望，他给人民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状况，将迫使他一步比一步快地走下去。战争是使他能够保住皇位的条件，但是，由于他毕竟只是一个假波拿巴，所以看来战争将始终是徒劳的，是在欺骗的借口下发动的，是浪费鲜血和物质财富而不会给他的臣民带来任何好处的。克里木战争是如此。刚刚结束的战争也是如此。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法国才能享有赋予它的幸福——成为这个人攫为己有的国家。可以说，法国不得不无休止地诉诸十二月日子的实践。只不过破坏行动的地点从巴黎的林荫道转移到伦巴第的平原上或者克里木的赫尔松涅斯去了，而大革命的可怜后裔不是被利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而是被利用来屠杀操别种语言的人们罢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 30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8 月 1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1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QUID PRO QUO²⁶⁵

—

克劳塞维茨将军在他的一篇论 1796 年奥法战争的文章中说，奥地利经常打败仗，是因为它的作战计划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不是考虑要实际地去取得胜利，而是要利用似乎已经取得了的胜利。²⁶⁶ 从两翼迂回敌人，包围敌人，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各个最远的据点上，以图截断想像中已被击溃的敌人的一切退路，——为了利用臆想出来的胜利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类似措施，每次都成了保证打败仗的最可靠的办法。对奥军作战方法的这一段评语完全适用于普鲁士外交。

普鲁士无疑是力图少花钱而办大事。某种本能曾使它感觉到，庸碌无能之辈青云直上的有利时机已经来到。维也纳条约的法国，路易·菲利浦的法国由于一道简单的命令就从王国改称为帝国²⁶⁷，而在欧洲却连国境上的一个界桩也没有移动。为了通过 12 月 2 日搞出一个雾月 18 日的摹制品来，不必再进行 1796 年的意大利远征和对埃及的讨伐²⁶⁸，只要成立骗子手十二月十日会和举行一次萨托里的腊肠检阅就够了。普鲁士知道，各大国并不完全赞同法国农民关于真拿破仑复活的幻想。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那个要在法国扮演拿破仑的冒险家担任了一个危险的角色，因此对官

方欧洲说来他随时都可能成为危险的人物。法国之所以能容忍了假帝国，仅仅是由于它觉得欧洲相信这出笑剧。因此，问题曾在于使小丑能够轻松愉快地扮演他的角色，保证在池座和下等楼座上都有一批热心的捧场者。过去每当法国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定的时候，——看来，这个洛可可式的帝国绕它自己的轴心旋转的最大周期是两年，——都要允许这位阿姆要塞昔日的囚徒 255 进行一场国外的冒险。那时在欧洲的议事日程上就出现了只有在法国国境的那一边才能实行的拿破仑纲领的某一条条文的摹制品。奥当斯的儿子一再被允许去进行战争，但是必须遵照路易·菲利浦的口号：《La France est assez riche payer sa gloire》〔“法兰西非常富有，足以为自己的荣誉付出代价”〕。普鲁士的老国王，这个有头没有脑的人有一次说，他的普鲁士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处于对基督教的抽象对立之中，而前者则克服了庸俗教化的过渡时代，达到了对神的启示的深刻的内心理解。老拿破仑也曾抱有庸俗的纯理性主义的偏见，认为只是在战争费用由其他国家负担，而战争果实由法国享受的时候，战争对法国才是合算的。与此相反，他的滑稽可笑的继承者得出一个意义深刻的结论，认为法国自己应当为自己的军事荣誉付出代价，保持法国的旧疆界是自然规律，他进行的一切战争都应该是“局部性的”，即在欧洲每次恩准他扮演他的角色的有限范围内进行。因此，他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只不过是周期性地给法国做放血手术罢了，这些手术每次都使法国增加一笔新国债，丧失一支旧军队。

但是，每经过一次这样的战争，总要发生一场纷争。法国感

到不满意，但是欧洲千方百计地极力劝说这个爱耍脾气的 belle France [美丽的法国]。它对 Dutchfish 扮演着巴纳姆的角色。难道在对俄战争以后，欧洲不是极力把他描绘成为具有一切戏剧性特征的仲裁者吗？难道冯·泽巴赫男爵没有从德勒斯顿到巴黎，又从巴黎到德勒斯顿往来奔走吗？²⁶⁹放毒者奥尔洛夫和伪造者布隆诺夫没有向他逢迎讨好吗？²⁷⁰难道门的内哥罗的公爵和雅科布·费奈迭没有相信过他的万能吗？²⁷¹难道没有允许过他打着反对英国的背信弃义的招牌来实现俄国的要求吗？帕麦斯顿用对卡尔斯的叛卖行为和他自己的将军威廉斯的反面的赞场²⁷²来确证的对俄和约，难道不是被“泰晤士报”宣布为波拿巴对英国的背叛吗？难道他没有博得欧洲最机灵的人这份光荣吗？难道在战争期间他没有占领即使不是现代世界那也是古代世界的一切首都吗？²⁷³他傲然扫荡了达达尼尔海峡不是说明他有一套深深隐藏着的计划吗？老拿破仑通常都是从那些最近的任务着手的。新出现的拿破仑的表面上的恭顺却说明权谋家的深奥莫测。他拒绝了好的东西，只不过是力求得到更好的东西。最后，难道巴黎和约不是以欧洲对比利时这样的“大国”的反波拿巴主义的记者的《Avis》〔“警告”〕而告成的吗？²⁷⁴

那时，假拿破仑的法国两年正常循环的时间过去了。欧洲的官方人物以为，他们为了这个人的尊严所尽的力现在已经够多了。他们曾允许他作为英国人的随行人员坐船到中国去²⁷⁵，并且受俄国的委托让库扎上校做多瑙河两公国的统治者¹⁴⁸。但是，只要路易-拿破仑想试一试跨越英雄和扮演英雄的小丑之间的难以辨别的

直译是：“荷兰的小鱼”；转意是：“荷兰的无赖汉”。——编者注

界限，他立即就会被人以嘲弄的口吻命令回到为他划定的活动场所的范围内去。他反对北美合众国的阴谋、他想恢复贩卖奴隶的企图²⁷⁶、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他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的反俄示威（他在俄国授意下负责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在约翰牛面前替帕麦斯顿在俄国的策动下对解决方案采取的反对立场作辩解），——所有这一切都告吹了。只是对于小小的葡萄牙，人们还允许他作威作福²⁷⁷，为的是勾划出他对待大国的那副可怜相。连比利时也开始构筑工事了，连瑞士也朗诵起“威廉·退尔”来了²⁷⁸。显然，正式控制着欧洲的那些势力碰到了一个过去经常把天文学家们弄得蒙头转向的问题——错算了天体运转的周期。

那时，《*lesser Empire*》（“小帝国”）两年循环的时间过去了。在从1852年到1854年的第一次循环期间，发生了无声无息的风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嗅到，但是不能听到。对俄战争在这时成了 *safety valve*（避风口）。在1856年到1858年的第二次循环中，情况就不同了。法国的内部发展把假波拿巴抛到政变的关头。奥尔西尼的炸弹预告了暴风雨的到来。库茨小姐的不幸的情夫不得不把政权让给他的将军们。法国被破天荒地按西班牙的习惯分成了5个镇守司令区²⁷⁹，而且全部手续都是在患有气膈病的欧仁妮的星光照耀下进行的。成立摄政王职位实际上是从加西莫多皇帝手中把政权交给奥尔良火烤阿拉伯人的专家佩利西埃手中。²⁸⁰但是，恢复 *terreur*（恐怖手段）已经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⁵²不是显得令人可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 !（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蒙塔郎贝尔能够在巴黎扮演汉普敦²⁸¹，蒲鲁东则能够在布鲁塞尔宣扬附有 *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的路易-菲利浦主义²⁸²。夏龙起义²⁸³证明，军

队本身就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即将演到最后一幕的哑剧。

路易·波拿巴又达到了决定命运的关头，这时官方欧洲应当明白，只有用旧拿破仑纲领的某一新条文的摹制品才能防止革命的危险。摹制品已从拿破仑用来收场的事件，即从俄国的远征开始了。那末，为什么不能用拿破仑用来开场的事件即意大利战争把它继续下去呢？在欧洲的所有主要成员中，奥地利是最不 grata [讨人喜欢的]。鲁普士希望为华沙会议、布隆采耳会战和对北海的远征向奥地利报仇雪恨。帕麦斯顿早就用对奥地利的仇恨来证实他的文明传播者的意愿。俄国满怀恐惧地看到，奥地利已再次宣布它的银行将用现款支付。当 1846 年奥地利国库自远古以来第一次没有出现赤字的时候，俄国就发出了发动克拉科夫革命²⁸⁴的信号。最后，奥地利对自由主义的欧洲说来是 bête noire。所以，波拿巴的第二次戏剧性的阿梯拉远征应当是反对奥地利，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不支付战费，不扩大法国的疆界，把战争“局限”在明智的界限内，即为了给法国再做一次光荣的放血手术所必需的范围。

喜剧既然开了场，普鲁士在这种形势下就认定，在上司批准和十分保险的情况下大显身手的时机对它说来也来到了。维拉弗兰卡和约使它在全欧洲面前受到愚弄，搞得臭名远扬。当它在立宪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表现在它的国债正以几何级数增加——的情况下，它认为，把 blue book of its own make²⁸⁵ 像一块膏药一样贴在伤口上是一个好办法。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要听取它自己的辩护词。

直译是：“黑色的野兽”，意即骇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编者注

二

当实行摄政的普鲁士所说的就像所写的一样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发现它在欧洲的“错误的喜剧”中不仅表现出有曲解别人的天才，而且还有被人曲解的天才。在这方面，它同不仅自己说刻薄话而且也使别人对他说刻薄话的福斯泰夫有某些相似之处。

4月14日阿尔勃莱希特大公来到了柏林，在那里待到20日。他要告诉摄政王一个秘密，并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秘密有关将要发出的奥地利给维克多·艾曼努尔的最后通牒。建议涉及莱茵河上的战争。预计阿尔勃莱希特应率领26万奥军和联邦的几个南德意志军在莱茵河上游西岸行动，而普鲁士军和几个北德意志军将在普鲁士统率下组成莱茵河上的北方军团。军队不设“联军总司令”，而应当受弗兰茨·约瑟夫和摄政王共同组成的大本营领导。

普鲁士不仅立刻忍怒拒绝了战争计划，而且“强烈反对阿尔勃莱希特大公突然提出最后通牒”。

普鲁士只要使出了它饶舌的 donkeypower〔驴力〕(大家知道，大型机器的功率是由 horsepower〔马力〕来计算的)，那是谁也不能抵挡的，最不能抵挡的则是奥地利人。摄政王和他的四个娄罗——施莱尼茨、奥尔斯瓦特、博宁和察贝尔博士先生——“深信不疑”，他们已使奥地利“深信不疑了”。

有一篇普鲁士的半官方通告说：“阿尔勃莱希特大公 4 月 20 日离开柏林的时候，大家都相信，已提到日程上来的大胆的计划被搁置起来了；但是，—— alas！〔可叹！〕——他起程几小时以后，维也纳来的电报就报道说最后通牒已经提出。”

在战争开始以后，普鲁士拒绝宣布自己中立。施莱尼茨在标明“6 月 24 日于柏林”“给普鲁士驻德国各邦宫廷使节的紧急指示”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英勇的决定的秘密。

他低声细语地说：“普鲁士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调停国 在另一个紧急指示中说是调解国 的立场。不但如此，从战争开始的时刻起，它的主要意图就是保持这个立场，为此，它才拒绝保证自己的中立，坚持不向任何一方面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它的调停活动才始终能完全不偏不倚地和自由地进行。”

换句话说，奥地利和法国这两个敌对的方面在一场“局限”在意大利舞台上的战争中将互相消耗自己的力量，英国则作为中立国 (!) 远远居于次要地位。各中立国自己使自己失去了活动能力，而交战双方又因为在斗争中要使用拳头而被缚住了双手。在这两者之间，“完全不偏不倚和自由的”普鲁士像欧里庇得斯的 *deus ex machina* 一样 在展翅翱翔。调停者历来总是比受调停的各方所得的东西多。基督所得的比耶和华多，圣彼得又比基督多，神甫又比圣徒多，而武装调停者普鲁士所得的将比敌对的中立的各国都多。说不定俄国和英国就要发出结束这场喜剧的信号。那时，它们将会悄悄地把它们的秘密指示塞进普鲁士的口袋里去，而普鲁士将给自己戴上布伦²⁸⁶的假面具。法国不会知道，普鲁士进行

调停是不是会让奥地利占便宜，奥地利也不会知道，普鲁士进行调停是不是会让法国占便宜，而它们两者都不会知道，普鲁士进行调停是不是会损害它们两国而让俄国和英国占便宜。普鲁士将有权要求“一切方面”的信任，也有权使人不信任一切方面。它的无拘束将会拘束一切人。如果普鲁士宣布自己中立，那就不能阻止巴伐利亚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国倒向奥地利方面。而作为武装调停者，既有各个中立大国掩护它的两翼和后方，又有那副老是虚张声势说将来要建树“德国的”功绩的难以捉摸的神气，它就能专心致志地去实现挽救奥地利的既神秘莫测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从而就有权利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了。作为英国和俄国的传声筒，它可以使德意志联邦尊敬自己，而作为德意志联邦的安抚者，它又可以骗取英国和俄国的信任。

普鲁士不仅是德国的一个大邦，而且是一个欧洲大国，同时又是一个“调停国”，并且还是德意志联邦的霸主！在事件的进程中将会看到，施莱尼茨怎样越来越陷入这个如此机智而又如此高超的思想进程中而不能自拔。至今都是欧洲国家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by courtesy》大国、《on sufferance》而成为欧洲要员的这个普鲁士人，现在居然被授予了《quos ego》的大权²⁸⁷！这一切都不必拔剑相向，而只要把枪扛上肩头，并且除了摄政王的眼泪和他的走狗的墨水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流出。普鲁士竟然没有博得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和力”中的米特勒的光荣，那实在不是它的过错。

普鲁士懂得，在第一幕中应当对奥地利板着脸孔，使路易·波拿巴不致有丝毫的怀疑，而首先要在俄国和英国面前大显一下

身手。

施莱尼茨在他那个我们已经引证过的紧急指示中自认：“在许多德国邦都笼罩着激愤情绪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个对我们的利益说来如此重要的目的，并不容易。加之我们政策的方针在这方面同大多数德国邦政府的政策有分歧，尤其是奥地利不同意我们的政策，这个情况未必需要赘言了。”

尽管有这一切困难，但是普鲁士还是成功地扮演了德意志联邦宪兵的角色。从4月底到5月底，它展开了它的调停活动，迫使它的德意志联邦中的伙伴们不得不按兵不动。

施莱尼茨委婉地说：“我们努力的第一件事，是要防止联邦过早地卷入战争。”

同时，柏林内阁打开了自由主义报刊的闸门。这些报刊直截了当地向市民解释说，波拿巴冲进意大利，只是为了让德国摆脱奥地利，并在英雄的庇护下建立德国的统一。这个英雄无疑地是属于民族的，因为他早已被宣布为“民族的财产”了。

普鲁士“当时”所负的使命不是简单地作为调停者，而是作为“武装的”调停者出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它的行动发生了困难。它必须一方面抑制好战的食欲，另一方面又要号召拿起武器来。它一面分发武器，同时又警告说不得动用武器。

“不要玩弄火枪，
它和你一样觉得疼痛。”

施莱尼茨说：“但是，如果我们为了保卫处于两个交战大国之间的德国而同时采取一切措施，如果联邦各机关在我们的协助下也不倦地采取防御措施，那末对我们说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责任——注意不要使这些措施突然变成进攻的手段，不要因此而使联邦的立场和我们自己的立场的名声大受损伤。”

可是，完全可以理解，“调停国”不能总是片面地朝着同一个

方向行动。何况还发现了危险的征兆。

施莱尼茨说：“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有些迹象说明，正在策划签订同我们的政策方针不一致的特别协定，局势的严重性理应引起我们的担忧，因为到头来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拆散联邦的趋势。”

为了防止发生这种“纷争”并揭开“调停”的第二幕，便把维利森将军的使团派到维也纳去了。使团活动的结果在施莱尼茨6月14日从柏林寄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威尔特尔的紧急指示中，已经讲过了。当施莱尼茨只给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写公文的时候，他用的是 in ordinary [普通的] 普鲁士公文体。当他给外国大国写公文的时候，幸而这事是用他不懂的语言办理的。但是，他给奥地利的是些什么样的紧急公函呀！全是长得不得了的句子，像一团团绞在一起的绦虫，经过“哥达主义”肥皂液的浸渍，又撒上了乌凯马尔克²⁸⁸的文牍主义的沙糖，一半还泡在诡谲多端的柏林 treacle [糖浆] 的洪流中。

我们之所以要对现在已经出世三个星期的柏林 Blue book (蓝皮书) 的某些部分仔细加以分析，并不是由于嗜古的怪癖，也不是由于对于勃兰登堡的历史感到兴趣。因为这里谈的是现在正被德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当做普鲁士未来帝国使命的凭借来加以吹嘘的那些文件。

施莱尼茨给维利森将军的最近一次紧急指示，是5月27日送到维也纳的。威尔特尔就奥皇内阁对维利森的接待给施莱尼茨的两个紧急报告标明的日期是5月29日和31日。这两个报告在半个月中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为了掩饰原来的“使命”和事后对它所作的“解释”之间的各种矛盾，在普鲁士的 blue book 中，施莱尼茨给维利森的那些紧急指示、威尔特尔给施莱尼茨的那些紧急

报告以及摄政王和布斯特拉巴²⁸⁹之间的全部会议情况都被抽掉了。奥地利外交大臣莱希堡无论如何也无法恢复原文，因为维利森和威尔特尔本来就不是要用书面把普鲁士的那些急件通知他的，而只是对他宣读一遍。可以想像一下，一个不能读到而只能听到下面这种长句子的大臣，处境是怎么样：

施莱尼茨说：“我切望把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完全澄清，所以就关心要在我给冯·维利森将军的函件中把我们对我们在一定情况下准备采取的措施以及那些必须成为我们安排采取的行动的基础的先决条件的观点十分明确地加以阐明。”

施莱尼茨在准备正式解释维利森去维也纳的使命以前，以他所特有的谨慎态度让事件自然发展。奥军在马振塔会战中打了败仗，撤出了所有伦巴第的要塞，急速地退到基泽河东岸。哥尔查科夫照会德国各小邦，以鞭子相威胁，责成它们严守中立。这个照会上报了刊。²⁹⁰被怀疑暗中同情奥地利的得比，把政权让给了帕麦斯顿。最后，在6月14日，即施莱尼茨给威尔特尔发出紧急指示那一天，普鲁士政府通报²⁹¹刊登了关于动员6个普鲁士军的命令。维利森使团被派往维也纳，随后便是这个动员令！整个德国都纷纷议论普鲁士的英勇的谨慎和普鲁士的谨慎的英勇。

最后，我们来看看施莱尼茨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的紧急指示。摄政王脱口说出了“宽宏大量的话”。接着，维利森就以先知的口吻预言了“最诚实的意图”、“最无私的计划”和“最真挚的信任”；莱希堡伯爵“表示同意我们所持的观点”。但是，同一位莱希堡，这位维也纳的苏格拉底，终于表示希望从漫无边际的空谈转入对平淡无奇的现实事实的讨论。他认为，“看到普鲁士的意图已经表达出来”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根据这一点，普

鲁士企图利用施莱尼茨的笔来“进一步明确”维利森的“使团”的“意图”。因此，他“进一步概述了在维也纳交换思想时我们所表述过的意图”。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进一步概述”扼要复述一下。维利森使团的用意是这样的。普鲁士“在具有一定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有“确定不移的意图”。施莱尼茨本来应该说，普鲁士在具有确定不移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有不一定的意图。先决条件就是要奥地利把德意志联邦的首倡权让给普鲁士，不同德国各王朝单独签订条约，总之，就是暂时把德国的霸权让给普鲁士；意图就是要保证奥地利“根据 1815 年条约对意大利一些地区的占有权”，并“争取在这个基础上缔结和约”。普鲁士认为，奥地利与意大利其他各国的关系和“这些意大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遭到了严重的威胁”，普鲁士就将试图“进行武装调停”，并且

“在调停成功时，它将继续采取行动以达到上述目的，因为作为欧洲大国的责任和德意志民族的崇高使命要求它这样做”。

非当事人施莱尼茨说：“我们自己的利益责成我们不能延缓干涉。但是，选择调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以后的行动的时机，应由王室自由决定。”

施莱尼茨断言：第一，由维利森所转达的“交换思想”被莱希堡说成是“交换意见”；第二，普鲁士的意图和先决条件“应当取得皇室的同意”；第三，莱希堡大概是纯思维的敌人，他想把“交换思想”变成为“交换外交照会”，变成为“两个内阁的有成文的文件作证明的协商”，总而言之，他希望把普鲁士的“先决条件”和普鲁士的“意图”看做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的”东西。但是，这时施莱尼茨的高尚意识感到愤慨了。莱希堡的要求所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要实际上变我们的“最秘密的、由于信

赖而通知的政治思想为束缚我们的诺言”。

施莱尼茨正在做政治思维方面的实际的、秘密的练习。而莱希堡却想把高不可攀的思想同卑微下贱的照会联系起来！对于柏林的思想家说来这是 *Quelle horreur* [多么可怕的事] 呀！况且这种交换照会会像是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的“保证”。好像普鲁士想保证什么似的！更何况被冒渎地变成了交换照会的交换思想“马上就会被法国和俄国理解为——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是 *engagement formel* [正式的责任]，是加入战争”。好像普鲁士什么时候曾打算参战，或者希望在什么人面前，尤其是在法国和俄国面前使自己名誉扫地似的！最后，也是主要的，这种交换照会“显然会使原定的调停企图无法实现”。奥地利应该了解，问题不在于它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不在于 1815 年的条约，不在于法国的篡位，不在于俄国的世界霸权，不在于一般的卑贱的利益，而在于要引起欧洲纠纷，以便出乎意外地为普鲁士造成一个“调停国”的新的崇高地位。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个入睡时是补锅匠，醒来就成了勋爵的流浪汉²⁹²所说的话，并不像施莱尼茨沉湎在普鲁士作为欧洲“武装调停国”的使命这个念念不忘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冠冕堂皇。《*uneasy conviction, that he ought to act up to his newborn sublimity of character*》[“关于他的行动必须符合于他性格中新出现的高贵品质的令人烦恼不安的信念”]像毒蜘蛛咬住他一样，老是萦绕在他的心头。

施莱尼茨凑近莱希堡的耳边把关于普鲁士作为一个调停国的使命这个念念不忘的思想悄悄告诉他时所表现的“信任态度”，正像他所说的，使他也“希望获得皇室的与我们的信任相当的信任”。莱希堡也要求得到施莱尼茨这份稀奇的照会的副本。威尔特

尔宣称，为了有文件证明普鲁士的信任态度，“根据自己得到的指示”，他受命宣读照会，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权利留下这个 *corpus delicti* [物证]。于是莱希堡要求威尔特尔和他一起到维罗那去见弗兰茨-约瑟夫，以便让后者“至少是从口头上能够准确地、详尽地知道普鲁士的看法”。但是，普鲁士的“信任”同样也起来反对这个要求，于是莱希堡便以讽刺性的恭顺态度指出，“如果他在他的回答中也许没有能够完全正确地把握柏林紧急指示的思想的全部进程”，那末这就应当归咎于施莱尼茨的这些长句子只是对他宣读的。

莱希堡给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科勒尔的回答标明的日期是：6月22日于维罗那。这个回答很使人怀疑5月底维利森使团的用意和6月中柏林对这一使命的解释之间是否一致。

莱希堡说：“根据我过去同他 威尔特尔 和冯·维利森将军的会谈，我没有得出结论，认为柏林内阁对我们仍将保持高度的戒备，以致避免用任何文件来证明自己的意图。”

但是，维利森的使团更没有使莱希堡准备承认普鲁士作为欧洲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按莱希堡的说法，主要的，即问题实质的真正所在，是“欧洲摆脱法国的最高领导而独立”。事件本身就揭穿了“我们的敌人在真实意图尚未成熟以前想冠冕堂皇地用来掩饰这些意图”的“那些借口”是空洞无物、不值一提的。“此外，普鲁士作为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所负的责任，同保持调停的作用随时都可能变得无法相容。”最后，奥地利希望看到普鲁士成为站在自己这方面的“盟国”，所以，一开始就否认它作为“调停者”的使命。因此，奥地利既然从意大利纷争一开始就反对普鲁士“采取调停者立场的企图”，那末显然它就更不会在某个时候赞

成“普鲁士的武装调停”了。

莱希堡说：“武装调停这个概念就其实质说来，包含有发生反对交战双方的战争的可能性。幸而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设想，在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普鲁士能进行武装调停。无论这个名称，还是它所隐藏的内容，看来都应当永远被排除于两个国家的关系之外。”

可见，莱希堡反对施莱尼茨的紧急公函及其对维利森所负使命的解释。他认为，从5月底起，普鲁士的调子变了；他坚决否认奥地利已经承认普鲁士负有作为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施莱尼茨有责任说明这第二号误会（第一号误会是在阿尔勃莱希特大公和摄政王之间发生的），办法是公布他给维利森的紧急指示和威尔特尔给他的那些紧急报告。

可是，莱希堡是以奥地利人的身分来回答的，那为什么奥地利人在同普鲁士人谈话时要改变自己的本性呢？为什么普鲁士就不“保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呢？难道这种保证——莱希堡问道，——不符合维也纳条约的精神吗？

“如果法国希望推翻由条约规定的欧洲局面的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从维也纳会议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中难道能希望哪怕有一个敌人是孤立的吗？法国根本不想用局部战争去侵犯那些领地的已定疆界。”

可是，“交换照会”还不是“有条约做根据的保证”。按莱希堡的说法，奥地利“只想了解”普鲁士的善良意图。但是，为了讨好施莱尼茨，对于他的绝对秘密的政治思想，它将绝对保守秘密。至于媾和，莱希堡指出，普鲁士可以向法国随便提出多少媾和建议，“条件是，这些建议要保持奥地利和其他意大利君主的1815年的版图和自主权利不受侵犯”。

换句话说,奥地利在给作为调停国的“普鲁士的秘密通知”中,根本不想越出没有任何意义的共同地区的界限。相反地,既然普鲁士“以积极的盟国的身分出现,那末,关于拟定媾和条件的问题也就只有在两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

最后,莱希堡触动了普鲁士的隐痛。照他的话说,奥地利同意普鲁士想在联邦议会中得到首倡权的“意图”,只是有一个“前提”:普鲁士的交换思想将变成交换照会。但是,结论连同前提一起失去了意义。甚至施莱尼茨以他所固有的理解能力也“会理解到”,由于柏林“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承担过束缚它的义务”,由于他自己“把做出关于武装调停的决定的时机推延”到未定的“将来,并且保留了选择这种时机的权利”,维也纳也“应当完全保持在德意志联邦关系方面的自由”。

这样一来,普鲁士诱使奥地利承认它在德国的优先地位并且具有充分权利担任欧洲调停国的崇高角色的企图便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曾动员了6个普鲁士军。普鲁士应当向欧洲解释。因此,施莱尼茨在他“6月19日致普鲁士驻欧洲各国使馆的通函”中宣布:

“普鲁士通过动员,采取了更加符合当前局势的立场,同时它并不放弃自己的温和原则……普鲁士的政策仍然是它从意大利问题的纷争开始时起就一直遵循的政策。可是现在它根据既成局势,也拿出了自己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为了使人不致对政策及其办法产生任何怀疑,通函最后声明,“普鲁士的意图是防止德国的分裂”。

摄政王政府认为,甚至连它的这个忏悔的罪人的声明也必须用给法国的“极秘密的”通知来缓和一下。早在战争即将开始之

前，布斯特拉巴和摄政王两人共同的朋友、战争画家吉 第一个受委托前往柏林。他带回来了对友谊的保证。在进行动员期间，也向巴黎发出了许多官方的和半官方的保证，内容是这样的：

“法国无论如何不应当向坏的方面解释普鲁士的军事措施。我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知道，同法国作战是多么不理智，这种战争将招致多么危险的后果。但是，请法皇体谅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各方面都向摄政王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处于别人对我们心存戒惧的状况下，对这点不得不加以考虑。”

或者：

“我们正在进行动员，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认为这是进攻法国的措施。quasi〔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德意志联邦首脑的摄政王，应该不是简单地捍卫联邦的利益，而且在国内也应该居于使他能够防止各种轻率行为并迫使德国其他各邦遵循他的温和政策的地位。请法皇重视这一点，并尽力使我们能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普鲁士在设置它那些滑稽可笑的圈套时，竟然要求法国政府：

“让政府的报纸不要过于贬损巴伐利亚、萨克森等而抬举普鲁士，这只会损坏普鲁士的名誉。”

于是，瓦列夫斯基便有充分权利在他 6 月 20 日的通函中声明：

“普鲁士所采取的新军事措施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任何不安…… 普鲁士政府动员它的一部分军队，这说明它除了保卫德国的安全，并确立使它能够同其他两个大国一起对今后的调停进程产生公正的影响的地位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意图。”

普鲁士作为武装调停国的崇高使命在各国已家喻户晓，以致瓦列夫斯基甚至敢于说出很难听的俏皮话，说普鲁士宣布动员并

不是反对法国，而是反对“其他两个大国”，因为它们想使普鲁士对“签订协定”失去“公正的”影响。

普鲁士调停的第二幕就这样收场了。

普鲁士调停的第一幕(从4月底到5月底)给德国做出了一个判决：《la mort sans phrase》²⁹³。在第二幕中(从5月底到6月24日)，“伟大祖国”的瘫痪状态被关于维利森使团的漂亮言词和普鲁士动员的阿拉伯图案装饰起来了。这第二幕的最后一场是在德国各小邦宫廷里演出的，它们在听取施莱尼茨的照会。施莱尼茨像施梯伯一样，喜欢“混合的”口述程序。在这里我们从他那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标明日期是“6月24日于柏林”的“给普鲁士驻德意志各邦宫廷使节”的照会中，只援引两个地方。为什么普鲁士不同意实现奥地利想使“交换思想”变成为“交换照会”的愿望呢？

施莱尼茨向德国各邦宫廷悄悄地说：“实现这个愿望，就等于是保证奥地利占有伦巴第。对那些不确定的事件承担责任对普鲁士来说是不现实的。”

所以，从柏林的观点看来，失去伦巴第并不是“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那些领地的严重的威胁”，也不是使普鲁士伺机拔剑而起的“确定事件”。

施莱尼茨接着说：“今后甚至是任何形式上的责任，只要会改变我们的调停国的地位，都应当拒绝承担。”

可见，普鲁士的调停并不是致力于为奥地利的利益而改变“不确定的事件”；可以说恰好相反，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其宗旨都在于使“普鲁士作为调停国的地位”仍然保持不变。正当普鲁士断然要求奥地利把德意志联邦的首倡权交给它的时候，它自己却献给了奥地利一件值得怀疑的等价物，这就是有善良的普鲁士意图作保证的普鲁士的善良意志。正如柏林的短工们²⁹⁴所说的，

放了葡萄酱的葱花汤。

在调停的第三幕中，普鲁士终于以欧洲大国的角色出场了，施莱尼茨在准备两份同样的紧急公函，一份给伦敦的伯恩施托尔夫伯爵，另一份给彼得堡的俾斯麦男爵；第一份应向约翰·罗素勋爵宣读，第二份应向哥尔查科夫公爵宣读。紧急公函中有一半全是赔礼求恕。普鲁士动员了它的一部分兵力，而施莱尼茨不遗余力地论证了这一大胆步骤。在6月19日给欧洲各大国的共同照会中，这个步骤被宣布是为了保卫德意志联邦的领土，为了普鲁士实现自己武装调停国的作用，特别为了“防止德国的分裂”。在给德意志联邦各成员国的公函中说，“这个措施应当束缚法国的军事力量，大大改善奥地利的处境”。在给英国和俄国的紧急公函中，作为动因的是“各邻国的军备活动”、“注意到事件的进程”、“军事行动临近德国的边境”、尊严、利益、使命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而且”，“我再重复一遍，伯爵先生和男爵先生”，普鲁士进行军备活动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它的意图“当然并不包括要制造新的纷争”。它所追求的，“仍然只是它最近在英国和俄国的同意下所力求达到的那个目的”。*Nous n' entendons pas malice!*〔我们不打算干什么坏事！〕——施莱尼茨这样大声说道。

“我们只希望和平”，并且“我们满怀信任地向伦敦内阁和彼得堡内阁呼吁，以便同它们联合起来寻求停止流血的办法”。

为了表明自己是值得英国和俄国信任的，普鲁士像捍卫不可动摇的教条一样捍卫着英俄的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奥地利以它的最后通牒惹起了战争；第二个论点是，斗争是为了实行自由主义的行政改革，为了废除奥地利对毗邻的意大利各国的保护权而进行的。使奥地利皇室的权利迁就民族自由主义的“改组活

动”——这就是普鲁士极力追求的东西。最后，正如施莱尼茨所说的，普鲁士相信路易·波拿巴的 selfdenying declarations [大公无私的声明]。

这些空洞无物的无稽之谈就是普鲁士“以充分的信任，光明磊落的坦率态度”，羞答答地悄悄告诉各中立大国关于它的“调停计划”的一切。“头脑清醒、态度谦恭的小伙子”施莱尼茨担心“更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把问题弄糟”。但是，他那念念不忘的思想终究还是迸发出来了。普鲁士认为自己的“使命是起武装调停国的作用”。但愿英国和俄国承认这个使命！但愿它们“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纷争，怎样才能使这种解决办法为互相斗争的各方面所接受，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愿它们首先向普鲁士发出指令，使它可以在最高上司的批准下，可以说是 *avec garantie du gouvernement* [在政府的保证下]，承担调停的狮子的角色！总之，普鲁士想扮演欧洲的 lion [狮子] 的角色，但是要像细木工史纳格那样扮演这个角色。

狮子：但是请你们放心，我实在是细木工史纳格，
既不是凶猛的公狮；也不是一头母狮，
要是我真的是——一头狮子而冲到这儿来，
那我自己会大倒其霉！

提修斯：一头非常善良的畜生，有一颗好良心。

莱散特：这头狮子按勇气说只好算是一只狐狸。

提修斯：对了，而按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说起来倒像是一只鹅。

施莱尼茨的紧急公函标明的日期是 6 月 24 日，也就是索尔费里诺会战的日子。当奥地利战败的消息传到柏林时，这个紧急公

函的两份副本还放在施莱尼茨的写字台上。同时，邮局也把约翰·罗素勋爵的急件²⁹⁵送到了，“其中布鲁姆先生过去的 little man [小人物]”，tom-tit of English liberalism (英国自由主义的小鸟)，爱尔兰《coercion bills》²⁹⁶的喉舌把帕麦斯顿的意大利计划告诉了普鲁士。马格德堡不在明乔河上，而比凯堡也不在阿迪杰河上，正像哈里季不在恒河上，而索尔福特也不在萨特里日河上一样。但是，路易·波拿巴声称，他并不向往马格德堡和比凯堡。为什么要用条顿人的粗鲁行为去激怒高卢雄鸡呢？约翰·罗素甚至发现，如果战场上的“胜利”是“决定性的”，那“敌人一定非常愿意同意停止消耗精力的斗争”。依据这个绝顶聪明的发现，罗素一面指责德国的好战贪欲，一面又赞扬普鲁士的“温和的、开明的行为”，并且建议施莱尼茨要“在德国局势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准确地模仿英国！最后，这个 Jack of all trades [万能行家] 回忆起了普鲁士的“崇高的调停使命”，带着一般的又酸又甜的微微的冷笑，向他这位立宪主义方面的学生说了下面一段安慰的话作为临别赠言：

“很可能，各友好的调停国的声音将被认真地听取，而签订和约的建议也不再是毫无成效的时间就在眼前了！”（罗素寄给柏林布卢婚菲耳德勋爵的紧急公函，日期：6月22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7 月底—
8 月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载于 1859 年 7 月 30 日和 8 月
6、13、20 日“人民报”第 13、14、
15 和 16 号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第一分册²⁹⁷

—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²⁹⁸，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迟缓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他们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城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接二连三地开拓着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藏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

展的最前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 1830 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随着关税同盟¹⁶⁹的建立,德国人才达到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地步。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真正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式把它加工制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的杂凑班里,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同这一派相对立,在四十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干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或者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²⁹⁹,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衷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拚命死记,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

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而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

见本卷第 6—11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8—9 页。——编者注

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事件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辞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辞句和法律辞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愈来愈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衷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

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那样深的程度。

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二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说明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这些先生们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虚弱，因此尽可能回避一切重大的问题；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在实证知识方面较强而保持着它的地盘；只是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

这个现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在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们³⁰⁰的统治下空谈成风，在此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

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 1848 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程度为止，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表示效忠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

无通过无到无”³⁰¹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³⁰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

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

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

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末，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像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

在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换过程时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来叙述。这里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读者可以在第 20—21 页上看到。我们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论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困难，反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解决这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转给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然后，在第二章中阐述货币或简单流通，即（1）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且在这里，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规定，（2）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3）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作为实在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一切物质财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简略。

在第三篇论文中，我们将说明本书的经济内容。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8 月 3—1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9 年 8 月 6 日和 20 日“人民报”
第 14 号和 16 号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贸易

不列颠贸易部刚刚公布了今年前 6 个月的出口情况报告,可是该部的进口申报价值的表格却只包括 5 个月,到 5 月 31 日止。³⁰³和 1858 年及 1859 年同期相比,我们就会发现,除了某些不大的、不值得一提的例外,不列颠从美国的进口总的说来是减少了,至少按价值来说是减少了,而不列颠对这个国家的出口,不论是数量,还是价值,却都增加了。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引用官方报告中的下列图表:

6 个月内(到 6 月 30 日止)不列颠对美国的出口情况

出口项目	数 目		申 报 价 值 (单位:英镑)	
	1858	1859	1858	1859
棉织品(码).....	60 150 771	110 360 198	1 031 724	1 924 951
五金商品(担)	35 349	78 432	242 914	534 101
亚麻织品(码)...	17 379 691	31 170 751	515 416	961 956
铸铁锭(吨).....	22 745	39 370	68 640	111 319
铁条、铁螺栓、 铁棒.....	21 463	56 026	175 944	457 384
锻铁.....	9 153	19 368	113 436	238 903

英担为长吨(1016 公斤)的 $\frac{1}{20}$,或 50.8 公斤。——编者注

(续)

出口项目	数 目		申报价值 (单位:英镑)	
	1858	1859	1858	1859
铁板和铁钉(担)	5 293	15 522	28 709	77 840
铅(吨).....	1 214	1 980	27 754	44626
油类(植物油)				
(加伦).....	411 769	930 784	50 950	111 103
丝织品(磅).....	47 101	134 470	51 277	144 413
毛呢(匹).....	76 311	81 686	273 409	421 006
各种毛织品(码)	13 879 331	30 893 901	562 749	1 188 859
精梳毛织品(匹)	185 129	489 171	229 981	758 914
陶瓷器.....	—	—	168 927	279 407
装饰品和帽类...	—	—	456 364	861 921
白铁(张).....	—	—	379 027	07 011

5个月内(到5月31日止)不列颠从美国的进口情况

进口项目	1858年	1859年
小麦.....	371 452 英镑	7 013 英镑
面粉和玉米粉.....	693 847 英镑	14 666 英镑
棉花(皮棉).....	11 631 523 英镑	10 486 418 英镑

总的说来,不列颠出口报告说明 1859 年出口不仅超过了 1858 年,而且也超过了 1857 年,这可以从下面的图表中看出:

6个月内(到6月30日止)不列颠的出口情况

申报价值		
1857年	1858年	1859年
60 826 881 英镑	53 467 804 英镑	63 003 159 英镑

但是,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那就非常清楚,1859年出口总

值之所以比 1857 年有所增加,是因为扩大了同印度的贸易额,此外,如果印度没有超额地弥补了不列颠的出口差额,1859 年不列颠出口贸易总额将比 1857 年减少 200 万英镑以上。可见,1857 年危机的痕迹在世界市场上还没有完全消失。毫无疑问,贸易部报告中最重要、最令人惊奇的特点是不列颠对东印度的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首先,我们用官方的数字材料来证明这个事实:

6 个月内(到 6 月 30 日止)对英属东印度的出口情况

(单位:英镑)

	1856	1857	1858	1859
啤酒和麦酒.....	210 431	130 213	474 438	569 398
棉布和细布等.....	2 554 976	3 116 869	4 523 849	6 094 435
棉纱.....	579 807	540 576	967 332	1 280 435
陶瓷器.....	30 374	23 521	43 915	43 195
装饰品和帽类.....	39 354	70 502	77 319	105 723
五金商品.....	84 758	101 083	139 813	153 423
马鞍和马具类制品	12 339	15 587	35 947	19 498
机器、蒸汽发动				
机和其他机器...	156 028	313 461	170 959	179 255
铁条、铁螺栓、铁				
棒(不包括钢轨)	306 201	228 838	166 321	172 725
钢轨.....	—	272 812	475 413	578 749
锻铁(不包括钢轨)	266 355	217 484	192 711	242 213
原铜.....	62 928	34 139	9 018	51 69
铁板和铁钉.....	144 218	228 325	318 381	205 213
盐.....	23 995	91 119	21 849	4 468
文具.....	66 495	19 968	86 425	89 711
呢绒.....	96 045	166 509	202 070	174 826
共 计.....	4 634 304	5 571 006	7 905 760	9 964 955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从 1840 年到 1856 年这大约 16 年间,不列颠对印度的出口贸易额虽然有时有少许增加,有时也有明显的减少,但一般说来是稳定的,平均数字是 800 万英镑,那末,就会感到惊奇:这种稳定的贸易额在短短的两年内竟增长了一倍,而且这种突然的增长还是发生在激烈的奴隶起义³⁰⁴的时期。这种贸易额的扩大只是由于暂时的因素呢,还是同印度的需求的真正发展有关?这个问题由于印度目前的财政状况而使人特别感到兴趣。印度的财政状况迫使不列颠政府不得不请求议会批准在伦敦发行新的印度公债,而且甚至迫使伦敦“泰晤士报”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归根到底,只占领原来的三个省份,把半岛的其他领土归还给当地统治者,对英国说来是否更好一些呢?

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很少,不可能对不列颠突然扩大对印度的出口贸易的真正性质作出定论,但是,我们已知的一些材料使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可以说是暂时的因素使这种贸易额突然膨胀到大于它所固有的数量。首先,我们没有发现不列颠从印度的进口情况有什么特殊的变动可以引起对印度的出口增加。诚然,某些商品的进口有些增长,但这几乎被其他商品进口的减少所抵销;总的说来,印度的出口情况波动之小,是不足以用任何方法来解释这个国家的进口发生的突然变化。当然,奴隶起义能够帮助英国人去探索以前不大了解的那些省份,因此,士兵也会为商人扫清道路。此外,近年来白银大量输入印度并在那里堆积起来,即使是印度人,在被刚刚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稍微打扰了一下以后,大概也会改变他们历来的爱储藏的癖好,多多少少会花费一些他们的白银,而不再埋藏起来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推测有多大的意义,何况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政

府一年内的非常支出近 1 400 万英镑。虽然这种情况足以说明英国对印度的出口贸易的突然增长,但是很难设想,它预告着这种新的变动会比较长久地继续下去。这种形势最久远的后果自然就是印度的民族工业遭到彻底破坏,因为读者从最后一个图表中已经看到,不列颠对印度的出口余额主要是由于不列颠的棉布和棉纱的输入所造成的。曼彻斯特方面的销售量的过度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不列颠出口图表数字膨胀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8 月 5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8 月 1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17 号

卡·马克思 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

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的言行,一天天明朗化了,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所说的“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利亚海”的自由的含义。对他自己来说,这次战争只是法国对罗马的第二次远征,诚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规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结果而论却和那次“共和主义”壮举³⁰⁵毫无二致。通过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把法国从欧洲战争中“拯救”出来之后,这位“解放者”现在又打算通过使那些被土伊勒里宫的主人一言废黜了的君主强行复位的办法,通过对意大利中部和教皇国的人民运动进行武力镇压的办法,来“拯救”意大利社会。当英国报刊上充满了关于苏黎世会议大概会修改维拉弗兰卡条约的条款的模糊的臆测和 on dits〔传闻〕的时候,当约翰·罗素勋爵持着他那固有的不可救药的轻率态度(这种轻率态度曾促使帕麦斯顿勋爵任命他为外交大臣),认为自己有权在向下院作的庄严声明中宣布波拿巴将拒绝把自己的刺刀交给那些被推翻的君主支配的时候,8月8日“维也纳日报”第一版上登载了如下的官方消息:

“苏黎世会议即将召开,以缔结最后和约,其主要条款已在维拉弗兰卡达成协议。任何一个注意到会议的明显作用的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不仅国外报刊,甚至连奥地利的报刊,都敢于对维拉弗兰卡条约条款的实现或实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为两位皇帝的亲笔签名所固定下来的和约的预备条款的执

行,是有两位君主的庄严诺言和权力作保证的。”

这说得非常明确。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受骗的意大利人在徒然地抗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用刺刀、线膛炮以及其他(*armes de précision*)〔“线膛武器”〕作后盾的弗兰茨-约瑟夫和路易·波拿巴则是《*sic volo, sic jubeo*》³⁰⁶。如果意大利的爱国者不愿听从甜蜜的劝导,他们就得对武力让步。别的选择余地是没有的,尽管罗素勋爵作了相反的断言。他这样说也许是完全出于真诚,因为通过他的口说出这种断言来,只是为了在预定让意大利遭到联盟暴君铁蹄践踏的期间,搪塞一下不列颠议会而已。至于教皇在教皇国的世俗政权,路易·拿破仑甚至不等战争结束就宣布,它将保存下主。维拉弗兰卡预备条约的条款规定让奥地利的君主们在托斯卡纳和摩地那复位。让帕尔马女公爵重新执政的规定没有包括在这些条款里,因为弗兰茨-约瑟夫想对这位公主公开拒绝把自己的命运同奥地利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行为实行报复;但是,路易·拿破仑出于自己天生的宽宏大量,俯允听取这个 *donna errante*〔流浪妇女〕的委婉哀求。他通过瓦列夫斯基向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同时也是女公爵的全权代表圣芒先生保证说,她的宝座将得到恢复,并且她的公国也将保有原来的疆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皮阿琴察要塞,——如果维克多-艾曼努尔在苏黎世会议上表现好的话,这个要塞应该转交给他。使这个暴发户感到无限欣慰的不仅是充当出身波旁皇族的姊妹的保护人这一念头,而且他还以为,他终于找到了博得圣热尔门郊区³⁰⁷的好感的可靠手段,这个郊区至今对他的巴结蔑然视之并且对他表现出高傲矜持的态度。

但是,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怎样才能成为“法制和秩序”的传教士、“现存社会”的救主呢?怎样才能成功地扮演这个不大富于

诗意的角色呢？这是急转直下的一步。使公众对维拉弗兰卡条约的预备条款的真正意义抱怀疑态度，并对这种态度加以支持，既纵容荒诞的传闻，又听任合理的猜测，其目的显然在于逐渐把欧洲引导到最坏的境地。憎恨奥地利、自称热爱意大利而且被公认为是拿破仑第三的代理人的帕麦斯顿勋爵支持了这位站在不可靠基础上的十二月英雄⁴⁹。帕麦斯顿利用得比政府对奥地利的同情把这个政府赶下了台，他显然已在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面前，替自己至圣的盟友，即拿破仑第三的意愿的真诚性作出了保证。这样一来，他有意识地把议会引入歧途，然后沉着镇静地推开了议会，或者说，甚至解散了它。他曾明确地声明，英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欧洲会议（这个会议可能会批准苏黎世会议的决定，从而把责任分摊到欧洲各国身上，以减轻否则要由拿破仑一个人承担的仇恨的重担）；这一声明遭到了普鲁士报纸的驳斥，它们发表了一则半官方消息，肯定说，英国和俄国已经一起向柏林宫廷提出了参加这次欧洲会议的建议。

拿破仑只是在舆论的激烈愤懑稍微平息之后才在撒丁王国采取了第二个步骤。他企图说服维克多-艾曼努尔代他去做这件棘手的事情。看来，维克多-艾曼努尔得到了奥地利及其藩属所丧失的一切。虽然还没有相称的封号，但他实际上已经成了意大利中部和教皇国的统治者，那里的居民到处都承认了他的王朝，虽然这不是出于对皮蒙特的热爱，而是由于对奥地利的憎恨。法国的自由保卫者向自己的这个新藩臣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他放弃对人民运动的正式领导。维克多-艾曼努尔无力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他命令撒丁全权代表离开各公国和教皇国，并且从佛罗伦萨召回了邦康帕尼，从罗马尼亚召回了马西莫·德·阿塞利奥，从摩地那召回

了法里尼(至少是作为正式全权代表)³⁰⁸。

但是,这位戴皇冠的“解放者”还不满足。他以前在法国的经验使他有足够的根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顺的基础上的最好的一种手段。因此就要求撒丁国王设法影响那些起义的省份的人民投票的进程,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些省份的君权是由人民的意志恢复起来的。自然,维克多-艾曼努尔对这种要求连听也不想听,因为实现这种要求,必定会永远断送意大利自由的前途,必定会把整个半岛高喊《aviva》[“万岁!”]的呼声变成同声咒骂。据说,维克多-艾曼努尔用下面的话回答了法国诱惑者德·莱泽伯爵:

“阁下,我首先是一个意大利君主。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对我说来意大利的利益比你们需要暗示的欧洲利益有更大的意义。我不能利用自己的声望来支持被推翻了的统治者复位,我绝不会这样做。我让这些事件自然发展,已经是非常宽容了。”

甚至有人说,这位侠义的国王还说了下面的话:

“如果要通过关于武装干涉的决议,你们还必须听听我的意见。至于说到联邦,我的利益和荣誉,都同样迫使我反对,因此我将同它斗争到底。”

这一回答转交给巴黎后,很快就出现了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的一篇有名的责斥意大利人忘恩负义的文章³⁰⁹,这篇文章包含着一个不祥的暗示:如果保护者抽回了强有力的手,那末奥地利的鹰徽很快就会挂到都灵王宫的前面。维克多-艾曼努尔立即得悉:他能否得到皮阿琴察,将依他的表现好坏而定,而意大利各国君主对正在准备成立的联邦能有多大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萨瓦居民的民族归属问题的讨论,使他受到了彻底的打

击；同时，这也暗示出，如果波拿巴帮助维克多-艾曼努尔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维克多-艾曼努尔也未必能拒绝把萨瓦从撒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些威胁很快就具有了一种明显的形式——骚动，这一骚动根据从巴黎发出的信号突然在萨瓦的拥护封建制度的和天主教的人士中开始了。

一家巴黎的报纸大声疾呼道：“为意大利的事业花费自己的金钱，让自己的儿子流血牺牲，萨瓦人对这种事已经厌倦了。”

对于维克多-艾曼努尔来说，这就是有力的 *argumentum ad hominem*，如果他不直接承担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那末就有一定的理由担心，他至少已经答应为法国的武装干涉扫清道路。8月9日帕尔马来电说：“皮蒙特军队已被逐出城市，红色共和国宣告成立，有产者和秩序之友慌忙逃命。”如果可以相信这则消息，那末，它对于未来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不管怎么样，不论这则消息是真是假，它对于“秩序和财产的救主”来说，完全可以成为进行干涉，派遣他的朱阿夫兵去反对“不可救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为各国君主的复位扫清道路的一种信号。这些君主其中的一个，托斯卡纳大公（已逊位予子）的儿子，已经在土伊勒里宫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而正在撤回来的法国军队，接到了留驻意大利的命令，因此，苏黎世顺利谈判道路上的障碍很快就将消失。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8 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 1859 年 8 月 2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2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针对具体的人提出的理由；不是根据客观材料而是根据被说服者的感情提出的论据。——编者注

列奥波特二世和斐迪南四世。——编者注

卡·马克思 政治评论

伦敦。建筑工人的罢工,或者确切些说,是企业主宣布的 Lock-out(同盟歇业),还在继续³¹⁰,并且敌对双方的态度也不像有什么重大改变。星期二工人代表开了会,到会的还有其他行业的代表;会上一致决定,不到任何一个要求保证不参加“协会”的老板那里去干活。同一个时间,“联合的”企业主在“自由石匠”小酒馆里开了会,不准任何记者采访。后来知道,这些害怕秘密会泄露出去的先生们经过热烈的商谈以后,决定在建筑工人没有正式放弃“协会”以前,在“特罗洛普先生的工人们没有停止罢工”以前,同业协会的任何会员都不应开业。后一点很快就调解好了,因为不久以前特罗洛普先生同工人们举行了谈判,他郑重其事地断言,对他的指责(解雇向他提交要求实行9小时工作制等的请愿书的工人),是出于一种误会。至于另一个条件,“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无论如何不会同意,除非是迫于极端的贫困。他们觉得,放弃“协会”、放弃任何组织,对他们说来就是变成资本家的真正奴隶,并且会丧失一个现代无产者还保有的那一点点独立性。老板们一意坚持,妄想得到像美国种植场主对待他们的奴隶那样的权力来对待自己的“人手”,这甚至引起了某些资产阶级记者的谴责。自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企业主表示不满:让他们尽自己的力量去加深劳资之

间本来就有很深的鸿沟吧,去加深已经积累起来的、自觉的阶级仇恨吧!这种阶级仇恨正是社会变革最可靠的保证。

伦敦总共有 1000 多家建筑企业。其中只有 88 家关了门,然而却都是最大的。lock-outs(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工人)人数达到 19000—20000 人,而不是起初说的 40000 人。全国各地给“协会”送来了大批捐款,但是挨饿的工人直到现在还拒绝接受这种支援。光荣归于勇士们!难道追求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资产者们能够做出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吗?

星期六闭幕的下院会议在最后几天几乎一直是处理议会中层出不穷的竞选丑事。这种贿赂的冲天恶臭同太晤士河的芳香混为一气,如果可尊敬的议员们不习惯这种气味的話,一定会闻之作呕的。事情时而牵涉到那些公开地(他们的罪行正在于此)做买卖羊群一样买卖一群群选民的人,时而又牵涉到某个自愿放弃自己高价买来的席位的可怜虫,因为他由于有人提出反对他当选的请愿书而无法保持这个席位了,这件事情至少也要花他 3 000 英镑。但是我们不去谈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去翻这堆脏东西呢?我们只想再补充一句,被揭露进行购买的议员几乎全是“自由”党³¹¹的党员。

御前演说未必值得一提。这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官方文件。关于正在酝酿的欧洲会议,御前演说中说,似乎女王陛下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这是撒谎!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帕麦斯顿勋爵立即向俄国政府声明,他准备派代表出席俄国建议召开的会议。可见,早在四个星期以前,他就已“作出了明确的决定”。

巴黎。我们不想用对巴黎庆祝胜利的宴会的描写去打搅我们的读者。皇帝虽然使尽了各种鬼蜮伎俩想让人们忘掉维拉弗兰卡的失败,冲淡巴黎居民的注意力,并且逼着被收买来的人从喉咙里

吐出祝词来,但是皇帝本人还是非常不满意对他的这种接待,所以,他不顾自己的“十二月的”顾问们的大力劝阻,毅然决定铤而走险,宣布大赦。巴黎的报刊也获得了大赦,从此以后各种“警告”全部废除了。³¹²

从柏林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听到的还是老一套空话和继续无望地鼓吹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对德意志联邦进行改革。哥达党同民主党人合并现在已成定局,这可以从下列报道中看出来。国王的处境仍然没有好转。

在爱森纳赫 8 月 14 日举行了一次新的“德国爱国者”会议,目的是要圣上恩赐宣布哥达党的一套看法是救国的唯一办法。³¹³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名人物有:汉诺威的冯·卞尼格先先生、柏林的蔡贝尔(你知道你是什么人?)、“萨克森立宪报”³¹⁴的编辑济格尔、班堡的梯图斯·舒尔采-德里奇等。新成立的德国政党所提出的纲领自然包括联邦改革、普鲁士的霸权、废除联邦议会有关反对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决议等。最后,下一届大会定于法兰克福召开,大概是为了距离圣保罗教堂³¹⁵近一些。

汉诺威消息,当地政府为了同亲普鲁士的爱国者进行竞争(为了反对这些爱国者,它采取了警察手段),再次提出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8 月 19 日

左右

载于 1859 年 8 月 20 日“人民报”

第 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

1859年8月23日于伦敦

在议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向两院提出了一个题为“联合王国从1844年至1858年最近15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³¹⁶的蓝皮书。不管这个官方出版的文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的一行行的数字看起来多么枯燥,这些数字事实上对英国总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比充满了漂亮废话和政治胡说的几部巨著都更珍贵的材料。它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人口数目表;但是,令人奇怪的是,15年内爱尔兰的人口变动数字根本没有。苏格兰的表格表明人口数目变动不大,我们且不去谈它。下面的数字说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变动的情况:

年 份	人 口 数	出 生 数	死 亡 数	结 婚 数
1844.....	16 520 000	540 763	356 950	132 249
1845.....	17 721 000	543 521	349 366	143 743
1846.....	16 925 000	572 625	390 315	145 664
1847.....	17 132 000	539 965	423 304	135 845
1848.....	17 340 000	563 059	399 800	138 230
1849.....	17 552 000	578 169	440 853	141 883
1850.....	17 766 000	593 422	368 986	152 788

(续)

年 份	人 口 数	出 生 数	死 亡 数	结 婚 数
1851.....	17 983 000	615 865	395 174	154 206
1852.....	18 205 000	624 171	407 938	258 439
1853.....	18 403 000	612 391	421 097	164 520
1854.....	18 618 000	634 506	438 239	159 349
1855.....	18 787 000	635 123	426 242	164 520
1856.....	19 045 000	657 704	391 369	159 262
1857.....	19 305 000	663 071	419 815	159 097
1858.....	19 523 000	665 627	450 018	154 500

除了这个人口表以外,我们还可以引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犯罪率和赤贫现象的材料:

年 份	被 控 告 者			被判罪者
	男	女	共 计	
1844.....	21 549	4 993	26 542	18 919
1845.....	19 341	4 962	24 303	17 402
1846.....	19 850	5 257	25 107	18 144
1847.....	22 903	5 930	28 833	21 542
1848.....	24 586	5 763	30 349	22 900
1849.....	22 415	5 401	27 816	21 001
1850.....	21 548	5 265	26 813	20 537
1851.....	22 391	5 569	27 960	21 579
1852.....	21 885	5 625	27 510	21 304
1853.....	20 879	6 178	27 057	20 756
1854.....	22 723	6 636	29 359	28 047
1855.....	19 890	6 082	25 972	19 971
1856.....	15 425	4 012	19 437	14 734
1857.....	15 970	4 299	20 269	15 307
1858.....	13 865	3 990	17 855	13 246

说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管理委员会所属的不同组织和教区领取补助金的赤贫者(流浪的赤贫者除外)的人数的表格是从1849年算起的。

年份	赤贫者总数	年份	赤贫者总数
1849.....	934 419	1854.....	818 337
1850.....	920 543	1855.....	851 369
1851.....	860 893	1856.....	877 867
1852.....	834 424	1857.....	843 806
1853.....	798 822	1858.....	908 186

我们把关于人口变动情况、犯罪率和赤贫现象的三个表格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在1844年至1854年间犯罪率比人口增加得快,而1849年至1858年间虽然不列颠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赤贫现象的数字几乎没有变动。1849年到1858年的10年中最突出的有三件大事,这些大事使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同十六世纪那些最辉煌的时代加以比较。废除了谷物法,发现了金矿³¹⁷,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也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欧洲从革命的震动转入了工业热潮。占领旁遮普³¹⁸、俄国战争和几次亚洲战争开辟了到那时为止几乎不知道的市场。最后,不列颠输入合众国的商品量增加到10年以前不能想像的程度。整个世界市场都扩大了,它的容量似乎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尽管如此,在这难忘的10年中,几乎稳定在100万左右的英格兰赤贫者的数字却只减少了26 233人,如果我们把1853年和1858年比较一下,那末这个数字甚至还增加了109 364人。

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诚然,如果我们把1855年同以前各年加以比较,那就

会看出，表面上 1855 年到 1858 年间犯罪率有相当的减少。1854 年被控告的人总数为 29 359 人，而 1858 年则减少到 17 855 人；被判罪的人的数目也有很大减少，虽然不是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但是，1854 年以后犯罪率的这种表面上的减少，其实应该完全看作是由于不列颠诉讼程序的某些技术性的改变所造成的，首先是少年犯处治法³¹⁹，其次是 1855 年的刑事裁判法，这个法律规定治安法官在逮捕人同意接受他的审判时，有权判处短期拘禁。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正如实施少年犯处治法所证明的，判定某些违犯由官方制定的法律的行为是犯罪还是过失，在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官方。这种名词上的区别远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道德面貌。法律本身不仅能够惩治罪行，而且也能捏造罪行，尤其是在职业律师的手中，法律更加具有这方面的作用。例如，像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所正确指出的，在中世纪，天主教僧侣由于对人的本性有阴暗的看法，就依靠自己的影响把这种观点搬到刑事立法中去了，因而他们制造的罪行比他们宽恕的过错还要多。

令人奇怪的是，联合王国中犯罪率大大减少（减少将近 50%，甚至 75%）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爱尔兰。这个事实怎么能同英格兰流行的一种意见调和起来呢，这种意见认为，爱尔兰人的过失不能由糟糕的不列颠管理机关负责，而要由爱尔兰人的性格负责，归根到底仍然不是不列颠统治者的什么措施，而仅仅只是饥饿的影响，大批的移民和促进了对爱尔兰劳动力需求的各种情况的总和，这一切因素引起了爱尔兰性格上的幸运的变化。无论如何，下列表格的意义是很明显的。

II 爱尔兰的犯罪率

年 份	被 控 告 者			被判罪者
	男	女	共 计	
1844.....	14 799	4 649	19 448	8 042
1845.....	12 807	3 889	16 696	7 101
1846.....	14 204	4 283	18 492	8 639
1847.....	23 552	7 657	31 209	15 233
1848.....	28 765	9 757	38 522	18 206
1849.....	31 340	10 649	41 989	21 202
1850.....	22 682	3 644	31 326	17 108
1851.....	17 337	7 347	24 684	14 377
1852.....	12 444	5 234	17 678	10 454
1853.....	10 260	4 884	15 144	8 714
1854.....	7 937	3 851	11 788	7 051
1855.....	6 019	2 993	9 012	5 220
1856.....	5 097	2 002	7 099	4 024
1857.....	5 458	1 752	7 210	3 925
1858.....	4 708	1 600	6 308	3 350

II 爱尔兰赤贫者的人数

年份	教区 数目	赤贫者 人 数	年份	教区 数目	赤贫者 人 数
1849.....	880	82 357	1854.....	883	78 929
1850.....	880	79 031	1855.....	883	79 887
1851.....	881	76 906	1856.....	883	79 973
1852.....	882	75 111	1857.....	883	79 217
1853.....	882	75 437	1858.....	883	79 199

可惜在关于移民人数的统计表中没有联合王国各地区的资料,也没有指出,每个地区的移民人数在总数字中占的百分比。根据现有的表格可以得出结论,1844年至1847年间迁往英属各北

美殖民地的移民人数接近迁往合众国去的移民人数,甚至可能还要多一些。但是从 1848 年起,迁往英属北美去的移民人数就只是迁往合众国去的移民人数的一个零头了。另一方面,1844 年至 1858 年这 15 年中,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大大增加了。迁往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人数在 1847 年达到了顶点,迁往合众国的移民人数在 1851 年达到顶点,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却在 1853 年达到最高点。从此以后直到 1858 年,移民人数不断下降,在 1853 年总数达 368784 人,而 1858 年则下降到 113972 人,即减少了 75% 以上。现在把上述表格援引在下面:

联合王国向各国移民的人数

年 份	向北美各殖民地	向合众国	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向其他国家	共 计
1844.....	22 924	43 660	2 229	1 873	70 686
1845.....	31 803	58 538	830	2 380	93 551
1846.....	43 439	82 239	2 347	1 826	129 851
1847.....	109 680	142 154	4 949	1 487	258 270
1848.....	31 065	188 237	23 904	4 887	248 093
1849.....	41 367	219 450	32 191	6 490	299 498
1850.....	32 981	223 078	16 037	8 773	280 869
1851.....	42 605	267 357	21 532	4 472	335 966
1852.....	32 873	244 261	87 881	3 749	368 764
1853.....	34 552	230 885	61 401	3 129	329 967
1854.....	43 761	193 065	83 237	3 366	323 429
1855.....	17 966	103 414	52 309	3 118	176 807
1856.....	16 378	111 837	44 584	3 775	176 554
1857.....	21 001	126 905	61 248	3 721	212 875
1858.....	9 704	59 716	39 295	5 257	113 972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8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9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4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工厂工业和贸易

1859年9月5日于伦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联合王国的人口变动情况,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生产动态。在下列表格中,每年出口的数字是从1844年算起的,而每年进口的数字则从1854年算起。产生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是已经计算出来的1854年以前的进口实际价值尚未得到正式证实。

1 出 口

联合王国出口的不列颠和爱尔兰
产品的实际申报总值

年份	英 镑	年份	英 镑
1844.....	58 534 705	1852.....	78 076 854
1845.....	60 111 082	1853.....	98 933 781
1846.....	57 786 876	1854.....	97 184 726
1847.....	58 842 377	1855.....	95 688 085
1848.....	52 849 445	1856.....	115 826 948
1849.....	63 596 025	1857.....	122 066 107
1850.....	71 367 885	1858.....	116 614 330
1851.....	74 448 722		

2 进 口

联合王国进口的商品
的实际计算总值

年份	英 镑	年份	英 镑
1854.....	152 389 053	1857.....	187 844 441
1855.....	143 542 850	1858.....	163 795 803
1856.....	172 544 154		

从第一个表格中可以看出，1844年至1857年期间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生产自然也是一样，然而，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数字所表明的，在同一段时期中，人口的增加还不到18%。这对于职闲薪厚的马尔萨斯神甫的学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而且第一个表格表明了一个生产规律，只要对比一下1797年以来关于不列颠出口的报告材料，这个规律就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加以证明。这个规律就是：虽然由于生产过剩和过度的投机活动而发生了危机，可是国内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容量毕竟增长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只是暂时离开已经达到的最高点，经过持续几年的若干波动以后，在商业周期的一个时期中繁荣的最高点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就成为下一个时期的起点。例如，在1837年至1847年这个商业周期中，生产力的发展在1845年达到了最高水平。1846年开始逆转，1847年发生了灾变，其影响只是在1848年才充分表现出来，当时出口数量甚至下降到1844年的水平以下。但是，在1849年就不仅已经恢复了1845年——前一周期中最繁荣的一年——的水平，而且还超过了300万，而在整个新的周期中，出口绝不会再降到这一年所标志的水平了。新的最高点是在1857年即在危机的那一年达到的，而危机爆发的表现则是1858

年出口的减少。但是，1847年至1857年期间的最高水平在1859年就成了新的商业周期的起点，生产力大概不会再下降到这个起点了。

把1、2两个表格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不列颠的出口大大落后于它的进口，这种比例失调的现象像出口数量一样，在经常增长着。某些英国作家这样来解释这种不寻常现象，说什么不幸的不列颠人对其他国家负了很多债，或者说他们贱卖贵买，结果把自己的一部分工业品当做礼物白白送给了别国。其实问题只是在于，大不列颠用从别国进口的方式得到某些收入，而自己却不拿出任何等价物来交换，例如，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榨取印度贡赋和用敛收以往各个时期借出的资本的利息的方式得到其他收入，就是这样。因此，不列颠进出口之间不断扩大的比例失调现象只是证明，英国对世界市场发挥它的债主作用比发挥工厂主和商人作用的速度还要快。

在进口商品中有四项很引人注目：贵金属、谷物、棉花、羊毛。过去“纽约每日论坛报”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不列颠输入和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例如在最近一次贸易危机期间，该报根据官方的数字证明，从开始开采新金矿³²⁰以来，流通的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与其说是增加了，不如说是减少了。因此，我们不再谈这个题目，而只想弄清楚一个据我们所知还没有被英国著作家们指出的事实。关于在国内流通的硬币数量，根据国家造币厂的工作状况可以做出相当可靠的结论。因此，为了阐明在开采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金矿的时期大不列颠国内硬币流通的情况，我们在下面引用一个表格来说明皇家造币厂铸造的硬币数量：

皇家造币厂铸造的金币、银币和铜币的数量
(单位:英镑)

年 份	金 币	银 币	铜 币	共 计
1844.....	3 563 949	626 670	7 246	4 197 865
1845.....	4 244 608	647 658	6 944	4 899 210
1846.....	4 334 911	559 548	6 496	4 900 955
1847.....	5 158 440	125 730	8 960	5 293 130
1848.....	2 451 999	35 442	2 688	2 490 129
1849.....	2 177 955	119 592	1 792	2 299 339
1850.....	1 491 836	129 096	448	1 621 380
1851.....	4 400 411	87 868	3 584	4 491 863
1852.....	8 742 270	189 596	4 312	8 936 178
1853.....	11 952 591	701 544	10 190	12 664 325
1854.....	4 152 183	140 480	61 538	4 354 201
1855.....	9 008 663	195 510	41 091	9 245 264
1856.....	6 002 114	462 528	11 418	6 476 060
1857.....	4 859 860	373 230	6 720	5 239 810
1858.....	1 231 023	445 896	13 440	1 690 359

我们将对比一下总数，因为银币和铜币必须看做是代替金币的普通符号，因此，在研究金属货币流通的总的变动情况时，不论在流通中的是金币，还是它的由金属符号代表的辅币，都无关紧要。

上述表格所包括的 15 年可以划分为两个几乎相等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感觉不到开采黄金的新国家对大不列颠的影响；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则是黄金从新产地迅速流入。1844 年到 1850 年我们算作第一个时期，1851 年到 1858 年算做第二个时期；1851 年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这一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金属开采

开始发生影响，同时从加利福尼亚州流入的黄金大量增加，它从 1848 年的 11700 英镑，1849 年的 160 万英镑，1850 年的 500 万英镑增加到 1851 年的 8 250 300 英镑。把 1844 年到 1850 年这个时期和 1851 年到 1858 年这个时期铸成硬币的金属数量分别加起来，然后算出各个时期每年平均的铸造数量，我们就会看到，前 7 年中每年平均的铸造量是 3 643 144 英镑，后 8 年中铸造量则达到 7 137 782 英镑。可见，在开发新的黄金产地期间，大不列颠的金属流通量几乎增长了 100%。这无疑地证明了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对英国国内贸易发展的影响，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金属流通量的增长是直接受新黄金流入的影响，那就完全错了。把发现金矿的前后两个时期逐年加以对比就可以证明相反的情况。例如，1854 年铸造量下降到 1845 年和 1846 年的水平以下，而 1858 年则下降到大大低于 1844 年的水平。可见，以硬币形式投入流通的黄金的数量并不是由进口的金条来决定。但是，进口的黄金大部分通常都是在第二个时期中用于内部流通的，因为工商业活动总的说来是扩大了；而这种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开采黄金的新国家的影响而造成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9 月 5 日

载于 1859 年 9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4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

1859年9月5日于伦敦

读者想必还记得,大约一年以前,我在“论坛报”上曾经做过一些有趣的揭露,那些揭露涉及一个叫班迪亚的人,涉及他到切尔克西亚去的使命以及因此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和波兰流亡者之间发生的纠纷。³²¹我当时所叙述的那些事实后来上了欧洲报刊,而且谁也没有一次试图否认过这些事实的确凿性。今天我想使贵报的读者注意现代史上另外的秘密的一章。我指的是科苏特和波拿巴之间的联系。同样一些人,他们一只手从扼杀法兰西共和国的凶手那里得到金钱,另一只手却打着自由的旗帜,他们同时扮演着受难者和帝王廷臣的角色,他们已经变成了残酷的僭位者的工具,却依然说自己是被压迫民族的全权代表,对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我认为此刻最适于披露我早已获悉的事实,就是波拿巴和他的走狗们以及科苏特和他的拥护者们都同样地极力掩盖这笔买卖,因为这笔买卖可能使他们一个在各国君主面前,一个在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威信扫地。

科苏特先生那些最盲目的崇拜者都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尽管科苏特有其他许多优点,可是遗憾的是,他始终缺少一种重要的品质——始终如一。在其一生中,他更像是一位触景生情的即

兴诗人，而不是要给世界打上自己独特思想的烙印的创造性的人物。这种思想的不稳定性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行为的两面性上。有些事实可以证实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居塔希亚，科苏特先生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发生了密切的 liaison [联系]，他马上就接受了这位罗曼蒂克的苏格兰人的偏见，毫不犹豫地说明马志尼是俄国的密探。他正式答应一定避开马志尼，可是刚一到伦敦，他就又同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一起建立了三人同盟³²²。戴维·乌尔卡尔特绅士在伦敦的“自由新闻”³²³上发表的拉·科苏特和他的来往书信，向英国公众提供了这种耍两面派手法的无可争辩的证据。科苏特在他刚一登上英国海岸时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称帕麦斯顿是他的知心朋友。帕麦斯顿通过一位颇为知名的议员告诉科苏特，说愿意在自己家里和他见面。科苏特要求英国首相把他当做匈牙利的执政者来接待，但是，这个要求当然被轻蔑地拒绝了。而科苏特先生却通过乌尔卡尔特先生和他的其他熟人告诉英国公众，说是他拒绝了帕麦斯顿的邀请，因为他在居塔希亚仔细地研究了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蓝皮书³²⁴，证实他的这位“知心朋友”帕麦斯顿取得了彼得堡朝廷的秘密同意，出卖了“亲爱的匈牙利”。1853年，当米兰爆发了由马志尼发动的 *émeute* [起义] 时，在这个城市房屋的墙壁上出现了告匈牙利士兵书，号召他们站到意大利起义军方面来；在这个告示上署名的是拉约什·科苏特。³²⁵ 当 *émeute* 遭到失败后，科苏特先生又赶紧通过伦敦各家报纸宣布那些告示是假的，这样就等于公开骂他的朋友马志尼 *d'émenti* [造谣]。其实与这种说法相反，告示是真的，马志尼的做法是得到了

科苏特的同意的。

根据只有匈牙利和意大利共同努力才能推翻奥地利的暴政统治这一固定的信念，马志尼一度企图以一个更加可靠的匈牙利领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因为匈牙利流亡者内部发生纠纷，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的不可靠的盟友，没有揭露那些会使科苏特在英国的威望一扫而光的事实。

谈到过去不久的事件，我可以提醒读者，1858年秋天，科苏特先生周游了苏格兰，在周游中，他在各个城市作了许多次讲演，郑重地警告英国人要防备路易·波拿巴的叛卖阴谋。例如，下面就是他于1858年11月20日在格拉斯哥所作的讲演的一段摘录：

科苏特先生宣称：“我在一次讲演中已经指出，现在路易·波拿巴正在制造一种民族仇恨的毒药。我不打算暗示，说他正图谋入侵你们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是希望这样做的，但是，正像寓言中的狐狸一样，酸葡萄并不使他垂涎。不久以前，波拿巴以其在瑟堡的大规模备战使得世界上一切外交家困惑莫解，——大概只有圣彼得堡的先生们是例外，因为他们一定知道其中的一切底细——那次备战耗尽了它那枯竭的国库中最后一些先令，那次备战他进行得那样匆忙，仿佛是否能赢得一分钟时间都关系着他的存亡……现在瑟堡仍旧是单为反对英国而筑的工事……波拿巴阴谋同俄国结伙在东方挑起新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打算限制英国海军机动的自由，把一大部分英国海军牵制在你们的岸边，同时给你们在东方的切身利益以致命的打击……难道克里木战争按其结果来说符合大不列颠和土耳其的利益吗？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得到了一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可诅咒的秘密外交的办公室中制定的宪法，一部在俄国和奥地利协助下由波拿巴炮制的宪法，而它们——当然都是人民自由的忠实朋友，这部宪法实际上恰恰就是奉送给俄国让它在多瑙河两公国作威作福的一部宪章……但是，不仅如此！难道亲爱的盟友波拿巴不是派他的军官们到门的内哥罗去教野蛮的山民们使用枪枝了吗？……只要他口袋里还没有一份新的提尔西特条约，他就一心想签订这样的条约。”

1858年秋天,科苏特就是这样公开揭露过他现在这位亲爱的盟友波拿巴。不但如此。1859年初,当波拿巴的争取自由的意大利远征计划初露端倪时,就是这位科苏特在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以激烈的言词揭露了荷兰的骗子手,并且警告一切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甚至还有德国人——不要替这位加西莫多皇帝火中取栗。总之,在当时情况下,他像回声一样重复着马志尼在他的5月16日的宣言中发表的观点——在波拿巴远征期间,科苏特仍然相信这种观点,而且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在“论坛报”转载的另一个宣言中,他再次庄严地复述了这种观点。

可见,1859年1月科苏特不仅清楚地看穿了波拿巴的骗局,而且尽了他的一切能力向全世界揭露这个骗局。他竭力促使“自由派的报刊”采取一种方针,这种方针后来使波拿巴的密探们惊呼为“反拿破仑狂”的“突然爆发”,并被他们谴责为有害地“同情奥地利”的症状。但是,在1859年1月至5月这一段时间里,在伟大的即兴作者的感情上和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怪的革命。这个为了警告英国人要防备波拿巴的血腥阴谋曾于1858年秋天在苏格兰做过巡回讲演的人,1859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巡回旅行,从伦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³²⁶,到处大作讲演,宣扬对十二月英雄的信任,并拿支持中立作为虚伪的借口,引诱英国人站到至圣的无赖那一边去。而在此以后他很快就最明确无疑地表现了他自己的中立。

这类回忆要多少我就可以补充多少,它们应该在科苏特的诚实的敬仰者头脑中引起某些忧虑——他们不是响亮名字的盲目崇

拜者,也没有因一己私利同民主派的达官贵人连结在一起。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否认,我现在打算报道的事实绝不是同这位号称自由英雄的过去不相容的。巴黎有三位匈牙利的领袖曾经巴结过著名的普隆-普隆,或者说 prince rouge(红色亲王),波拿巴家族的后裔普隆-普隆也像他的更高尚的堂兄向“宗教、秩序和财产”频送秋波那样,维妙维肖地扮演了向革命卖弄风骚的角色。这三个人就是: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将军。En passant(顺便)指出,普隆-普隆按其品行来说是海利奥加巴尔,按其个人的胆小懦弱来说是伊万三世,按其虚伪成性来说是真正的波拿巴。可是,除此以外,正如法国人说的,他是一位 homme d'esprit(精明机灵的人)。这三位先生说服了普隆-普隆(显然根本不是措手不及地被抓住了)同科苏特举行会谈,把科苏特叫到巴黎去,甚至答应把匈牙利的前任执政者介绍给土伊勒里宫诡计多端的执政者。

因此,科苏特先生弄到了一张英国护照,护照上他化名为布朗先生,于5月初离伦敦前往巴黎。在巴黎他首先同普隆-普隆作了一次长谈,陈述了自己对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的看法。他希望派4万名法国军队在阜姆沿岸登陆,马扎尔流亡者有一个军会接应他们。而且他还陈述了对他的爱国主义的心灵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即成立(哪怕是为了装门面)以科苏特先生为首的临时政府的问题的看法。5月3日下午,普隆-普隆坐自己的马车陪送科苏特去土伊勒里宫,介绍他同十二月英雄认识。在这次同路易·波拿巴会见的过程中,科苏特先生总算没有施展他那演说家的卓越才干,而是让普隆-普隆代表他讲话。后来,他对亲王几乎准确得一字不差地转述了他的看法表示钦佩。

路易·波拿巴仔细听完了堂弟的叙述后说,有一个很大的障

碍使他难于接受科苏特先生的方案,这就是后者的共和主义的原则和共和主义的联系。于是科苏特放弃共和主义信念这件事便以最庄重的形式发生了。科苏特声称,他现在和过去都不是共和主义者,只是由于政治必要性和各种情况的不平常的凑合,才迫使他暂时同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结合在一起。同时,科苏特为了证明他的反共和主义,竟以自己国家的名义建议把匈牙利王冠禅让给普隆-普隆亲王。实在说,被他这样支配的王冠并不是没有人戴着的,同时他根本没有权力拿王冠来做买卖,但是,凡是留心观察科苏特在国外的活动的人,一定都会发现,他早就习以为常地用近于地主贵族谈论自己的庄园的语调来谈论“亲爱的匈牙利”了。

至于说科苏特先生放弃共和主义信念的事,我认为这是真心诚意的。为了保持他的执行权的外表上的光彩,他在佩斯要了30万弗罗伦的皇室费;他把原来属于奥地利大公妃的对医疗机关的庇护权交给了他的亲妹妹;他企图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某些团;他希望在他的周围有一群佞臣;他在国外的時候顽固地抓住执政者的称号不放,虽然在匈牙利革命遭到浩劫的时刻他放弃了这个称号。他沾染上了一套与其说是流亡者不如说是覬覦者的派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是同共和主义的倾向截然相反的倾向。无论如何我可以坚决地断言,拉约什·科苏特在法国篡位者面前放弃了共和主义信念,当着十二月英雄的面建议把匈牙利的王冠禅让给普隆-普隆这位波拿巴主义的萨尔达尼拔。关于他在土伊勒里宫会见波拿巴的事实的某些流言蜚语,或许成了下面这个显而易见的讹传产生的原因。这个讹传就是:科苏特出卖了他过去的共和主义同道们的秘密计划。谁也没有要求他泄漏他们正在策划的秘密,何况他也不会同意这种卑鄙无耻的提议。在他完全打消了路易·拿

破仑对他的共和主义倾向的顾虑以后,在他承担了按照波拿巴王朝的利益行事的义务以后,便签订了一项合同,于是300万法郎就交由科苏特先生支配了。对于这项协定,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要按军事方式把匈牙利流亡者组织起来,就需要钱,在整个反雅各宾战争的过程中,欧洲各个专制国家都领过英国的补助金,科苏特先生为什么就不能拿自己新盟友的这笔补助金呢?可是,我不能沉默的是,科苏特竟为了他个人的需要马上就在他交给支配的300万法郎中,把一笔为数75000法郎的巨款攫为己有,而且除此以外,还讲定如果意大利战争没有导致攻入匈牙利的话,他还要领取一年的津贴。在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以前,已经商妥,他将在英国展开一个拥护中立的运动来反对众所猜疑的得比内阁的亲奥地利倾向。大家知道,辉格党人和曼彻斯特学派³²⁷的自愿支持使他在返回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以后能够顺利地履行他的义务的这个第一部分。

从1851年以来,稍许有名的、有政治威望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都离开了科苏特先生,但是,由于看到依靠法国军队的援助可能功入匈牙利的前景,由于看到颇有说服力的300万法郎的动力,——正如从前真拿破仑有一次突然蛮横无耻地说出的,要知道世界是受《le petit ventre》〔“胃”〕的要求支配的,——除了几个值得尊敬的人以外,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全都蜂拥到在拉约什·科苏特所举的波拿巴主义的旗帜之下。不能否认,科苏特同流亡者们签订的合同具有某种“十二月的”收买味道,因为,为了使那笔法国的钱大部分都落到他的新搜罗的信徒们手中,他就把他们提升为高级军官。首先,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到皮蒙特去的旅费,然后又领到了阔气的军官服(制服的价值达150英镑),预支6个月的薪

金,并得到了在和约签订以后支付1年薪金的诺言。所谓的总司令的薪俸是1万法郎,将军们每人6000,准将5000,中校4000,少校3000法郎,等等。

下面就是那些伙同科苏特,侵吞波拿巴那笔钱的最显要人物的姓名:将军有克拉普卡、佩尔采尔、费特尔、切茨;上校有埃梅里克·萨博和埃蒂耶纳·萨博、基什、亚·泰列基伯爵、贝特伦伯爵、梅德尼扬斯基、伊哈斯以及几个中校和少校。在文职人员中,可以指出拉·泰列基伯爵、普基、普尔斯基、伊兰尼、路德维希、西蒙尼、亨什尔曼、维勒什等人;除了少数几个人——舍·武科维奇(在伦敦或埃克斯敏斯特)罗奈(在伦敦,匈牙利的科学家)和贝·瑟美列(在巴黎,曾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住在英国和大陆上的匈牙利流亡者实际上全都在这里了。

如果以为这些人全都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这样行动,那是不对的。其中大多数恐怕都只是些受骗的、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人,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设想会具有明确的政治原则,或者具有使他们能够看穿各种外交上的阴谋诡计的洞察力。他们之中有些人,例如佩尔采尔将军,当事件刚一揭示出波拿巴主义的骗局时,便马上走开了。可是,拉约什·科苏特本人早在1859年1月在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发表的他的那些文章中就已表明,他对波拿巴的阴险手段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像这些军人一样被认为是无辜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9月5日
载于1859年9月24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574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

—

1859年9月13日于伦敦

当英国由于从天朝居民那里逼出了“天津条约”³²⁸而到处受人祝贺的时候,我曾设法指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而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³²⁹。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约”已成过去的历史,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和平的景象已经烟消云散了。³³⁰

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欧洲大陆邮电传来的一些事实。

可敬的普鲁斯先生已偕同法国的全权代表布尔布隆先生启程,英国远征舰队已得到命令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京。该远征舰队是由海军司令贺布统率的,包括有7艘轮船、10艘炮艇、2艘载运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和英国工兵队。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经由这条道路进京。因此,海军司令贺布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停留了9天(自6月17日至25日)以后,就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两国公使于6月20日赶上该舰队)。海军司令贺布进到白河时,才知道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所拆毁的大沽炮台,已经修复了,——我们应该 en passant(顺

便)指出,这个事实他早应知道,因为“京报”³³¹上曾正式报道过。

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两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远征队只得退却,并且在战斗中损失3艘英国战舰:“海鹭号”、“破风号”和“呼潮鸟号”,英军方面死伤464人,而参加作战的60个法国人当中,则死伤14人。英国军官死5人,伤23人,甚至海军司令贺布也受了伤。这次失败以后,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两位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而英国舰队则不得不停泊在宁波附近的镇海对面。

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一致高声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当然,伦敦的“泰晤士报”在激发自己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帕麦斯顿派的下流报纸却简直荒谬绝伦地扮演了Orlando Furioso(疯狂的罗兰)的角色。

例如,伦敦“每日电讯”³³²写道:

“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吊上十来个在桅杆上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应该在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我们能够像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从而使我们为俄国在帝国满洲边境所取得的势力找到补偿,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

然而我们姑且搁下帕麦斯顿派下流作家的这些胡言乱语而来看看各种事实,以便根据现有的一点材料来说明这个不快事件的真实意义。

这里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即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公使立即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反抗英国舰队强行驶入白河,是否就破坏了这个用海盗式的战争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条约呢?据欧洲大陆的邮电传来的消息,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中国当局曾经请普鲁斯先生由陆路入京,无须用军舰护送。天朝居民因为对不久以前炮轰广州的事件³³³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支舰队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应该明白地承认:英国人如此解释英国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是极其奇怪的,这至少和英国人在上次侵华战争中所发明的那种说法同样奇怪;当时他们说炮轰帝国的一个城市,并不是与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帝国一个省份发生地方性质的冲突。据英国人自己的记载,他们为回答中国人所提出的关于赔偿损失的要求,“曾采取一切办法,以便在必要时用武力进抵北京”,就是说统率威武十足的舰队沿白河上驶。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问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

其次,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天津条约赋予英国以设立使馆的抽象权利,但是额尔金勋爵难道没有至少在目前时期拒绝实际应用这种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女王陛下特谕刊行的额尔金伯爵赴华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³³⁴,每个公正无私的人都能深

信：第一，允许英国公使前往北京原不应在现时实行，而应在较晚的时候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驻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第三，英文条约底本中关于允许公使前往北京的一款，即有绝对意义的第三款，曾根据中国使节的要求，在条约的中文底本中加以修改了。额尔金勋爵本人也承认条约两个底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但是额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说，

“根据自己所得的训令，曾不能不要求中国人接受他们一字不识的条约底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

中国人的行动不是根据英文条约底本而是根据中文条约底本，同时据额尔金勋爵承认，英文条约底本与“协定的精确意思”本来稍有出入——试问能否根据这一点就来斥责中国人呢？

最后，我要援引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契泽姆·安斯提先生的正式声明，他在致伦敦“晨星报”³³⁵编辑的信中写道：

“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国至少已没有权利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和特权。”

印度的纠纷使英国感到不安，同时英国又得武装自己以防万一发生欧洲战争，因而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新灾难——这大概是帕麦斯顿一手制造的——也许会使英国遭到巨大的危险。最近将来的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垮台，因为该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的罪魁，而它的主要成员却因为这次战争而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无论如何，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应该采取下列行动：或者是退出现在的自由派联盟，或者是（这很少有可能）与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道皮尔分子³³⁶联合，迫使政府的首脑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

二

1859年9月16日于伦敦

内阁会议决定于明日举行,以求决定采取应付中国事变的方针。法国“通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使人确信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尺达成协议。他们想要发动另一次对华战争。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说:在即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米尔纳·基卜生先生首先将争论主张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其次他将反对任何事先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如果他的意见为多数票否决,他将退出内阁,从而又发出向帕麦斯顿内阁进行新攻击和自由派联盟瓦解的信号(这个联盟过去曾引起得比内阁的倒台)。据说帕麦斯顿对于米尔纳·基卜生先生企图采取的行动感到有些惊惶不安,因为基卜生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基卜生是一个特别善于“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这篇通讯同时,你们会从利物浦获得关于内阁会议结果如何的消息。此刻判断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最好不要根据报纸上已经发表的材料,而要根据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在起初发表最近的欧洲大陆邮电传来的消息时故意瞒过的那些事实。

首先,他们隐瞒了中俄条约已经批准,中国皇帝已经谕令他的官员接待并护送美国公使进京交换中美条约³³⁷批准书的消息。

隐瞒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一种自然会产生的猜疑,这就是:对英法公使执行职务时遇到阻碍这件事,应负责任的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俄国或美国同僚并未遭遇到这些阻碍。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最初也为“泰晤士报”和其他帕麦斯顿派的报纸所瞒过,但现在它们已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并且只要他们同意离开他们的兵舰和军队,就给他们派一支卫队。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末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谁都不会相信,可敬的普鲁斯先生破坏上一次对华战争所抱的表面目的,是他本人自作主张的行动,相反的,他只不过执行了从伦敦接到的秘密训令而已。诚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派遣而是由得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这样一件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首届内阁任内,阿伯丁勋爵长外交部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布尔韦尔爵士因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迫离开西班牙³³⁸;而当上院辩论这个“不快事件”时,证明了布尔韦尔并非遵循阿伯丁的官方训令,而是奉行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

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又在玩弄着一种手腕,这至少使那些熟悉近30年英国外交秘史的人们可以断定:究竟谁是白河惨案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真正罪魁。“泰晤士报”暗示说,安设在大沽炮台上使英国舰队遭受极大损失的大炮,是来自俄国而且是由俄国军官指挥的。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说得更明白,现引述于下:

“现在我们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是如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我们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我们见到大批哥萨克军队远在贝加尔湖以东、在旧大陆阴暗边陲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习；我们发现无数商队的来往，我们侦察到一位俄国专使（东西伯利亚总督木哩斐岳幅将军）正带着秘密阴谋，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绝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势力曾参与使我们蒙受耻辱并屠杀我们的陆海军士兵这件事，那末，我国舆论一定会愤激不已的。”

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曾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³³⁹。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曾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³⁴⁰，既然现在俄国想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帕麦斯顿便要匆匆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了。帕麦斯顿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则：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阴谋，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反而向那个亚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盗式的战争使这个国家和英国疏远，并且用这种绕圈子的方法逼得它不得不对俄国作某些本非情愿的让步。你们可以相信，帕麦斯顿的整个过去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查，因此，我请你们注意 1859 年 6 月 8 日下院命令刊行的阿富汗文件³⁴¹。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的阴险政策以及近 30 年来的外交史。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1838 年帕麦斯顿对喀布尔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结果英军遭到复没³⁴²。他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说多斯特·穆罕默德与波斯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对英国的秘密同盟。为了证实这种说法，帕麦斯顿于 1839 年向议会提出了蓝皮书，其内容主要是英国驻喀布尔公使亚·白恩士爵士与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³⁴³。白恩士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暴动时被杀，但是由于他生

前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他的某些官方信札的副本寄给他住在伦敦的哥哥白恩士博士。1839年帕麦斯顿编辑的“阿富汗文件”发表时,白恩士博士曾谴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白恩士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起见,刊印了若干文件的原稿。但这些隐情,直到今年夏天才暴露出来。在得比内阁任内,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将一切有关的“阿富汗文件”全部发表。这个命令以这样一种形式付诸执行,即令最愚钝的人也会明了: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确是实情。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

“注:这些信札在以前的文件汇编中仅部分刊载,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省略之处以括号()标出。”

保证这个文件汇编确属真实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机密司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学家”。

帕麦斯顿曾诡称他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为了反对俄国,要说明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暂且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够了。俄国代办维特凯维奇于1837年到喀布尔,他携有沙皇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一封信。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白恩士在他本人的发文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种文件内,曾一再提到这件事。但这份沙皇书信的抄件在1839年帕麦斯顿所提出的文件中整个被删去了,而且在凡是提及这件事的每一份文件内,都作了必要的修改,以求隐瞒“俄国皇帝”与出使喀布尔这件事情之间的联系。这种伪造文书的目的,在于隐瞒沙皇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以便在维特凯维奇回到圣彼得堡后,尼古拉可以正式声明不同意他的言行。举例来说,在蓝皮书第82页上,可以找到一封致多斯特·穆罕默德书信的译文,译文如

下,括弧内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麦斯顿删去的:

“一位由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到达德黑兰,他奉命在坎大哈拜访酋长,然后从该地去晋见阿富汗国王……他携有(皇帝的密函和)俄国驻德黑兰大使的书信。俄国大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谈判等等。”

帕麦斯顿为顾全沙皇的名誉而作的诸如此类的伪造还不是“阿富汗文件”所显露的唯一的奇迹。帕麦斯顿为入侵阿富汗辩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白恩士爵士曾主张以此作为破坏俄国在中亚细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白恩士爵士所做的原来恰好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而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麦斯顿版的“蓝皮书”中就被全删除了;而且,还用篡改和伪造的办法使得发表的信札与原意完全相反。

正是这个人现在打算用制止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虚假借口来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

三

1859年9月20日于伦敦

英国要对天朝人民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这件事,看来英国报纸现在一般都加以肯定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过去叫嚷要流血叫得最凶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显然由于爱国狂热而不能自己,对这种双重的背约行为大发雷霆,这就是:怯懦的蒙古人用精心伪装阵容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司令这样的 bonhomme〔老实人〕;北京朝廷以更狡猾的奸诈伎俩让这些蒙古吃人妖魔去干这种不可饶恕的恶作剧。奇怪的是,“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翻腾,然而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地把其中对于天数已尽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谨慎地删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热情狂发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无论怎样,在9月16日,也就是说仅仅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做了急剧的转变,悄悄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去掉了一个。

该报说:“我们恐怕不能责备那些抵抗我们向白河炮台攻击的蒙古人背约”;

这是指蒙古科尔沁旗亲王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部队。1859年他们驻守于天津的两个主要海口大沽和北塘,但在1860年被入侵的英法侵略军所击溃。——译者注

但为了弥补这个无可奈何的让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北京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这个庄严的条约”。

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

“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恳请满清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是有可能使这个条约获得批准的。”

既然如此,还能说北京朝廷背约吗?连丝毫背约的形迹也没有,但是“泰晤士报”对此还有两点疑虑。

该报说:“企图用这样的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来说,是否明智,也许值得怀疑。而动用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究竟是否合适,就更值得怀疑了。”

这家“主要的机关报”在一味发怒之余,竟做出了这样一个有破绽的结论,不过,根据该报自己的逻辑,尽管它说不出作战的理由,但并不放弃战争本身。自从詹·威尔逊先生就任印度财务大臣以来,另一家半官方刊物,即曾以热烈辩护炮轰广州事件而著称的“经济学家”,现在似乎更多地采用经济的观点而较少空谈了。“经济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经济性的³⁴⁴,前一篇文章用下面的话做结尾:

“就上述一切而论,显然,规定我们的公使有权去北京观光或在北京居住的条文,确实是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如果认为遵守条文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强制执行这一条文的时候,仍有不少表示谅解和忍耐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会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缓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表示,因而会是我们所能执行的最有害的政策。难道根据这样的理由,我们在处理同这些东方政府的关系时就有权利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家所应坚决奉行的原则吗?我们已经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让步,那末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

理，用对我们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彻底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人在当时克制了他们的畏惧心理，而显出相当的实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关于使条约生效的方式——那末，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约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准备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且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索取赔偿。但也可能是这样：守卫白河口，以防止再发生类似额尔金勋爵去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的事件，并未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由我方发动，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在任何时刻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护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末，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没有得到这种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之前——我们认为有理由保留我们的判断，而仔细想一想，我们对待野蛮人所采用的原则，是否能和野蛮人对付我们所用的没有什么差别。”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性。在1858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达287 600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平均每年在900万英镑以上，因此中英直接贸易的总额约计1 200万英镑。但是除了这种直接交易外，另有其他三种重要的贸易，在国际结算的范围内英国或多或少地与它们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

“经济学家”写道：“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麼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

这两种有利于中国的差额，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靠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来补偿这种交换的平衡。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贸易差额外，又由于澳大利亚黄金和美国棉花

的进口，要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差额，大部分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方面由于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而产生的贸易差额相抵销了。en passant〔顺便〕指出，中国输入印度的总额从未达到过 100 万英镑，而印度输入中国的总额折算起来竟达 1 000 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道：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像的灾难要大得多”；这种窘况所引起的困难，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感觉到，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经济学家”自然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如一般人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简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现时争论中的两个新特征”，这两个新特征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征是：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以及中国人对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

“经济学家”的这种论调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正如我在上一篇通讯中所预料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确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为了暂时防止内阁和自由派联盟的任何分裂，声明说，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中于中国海面，但是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将不作决定。这样一来，这个紧急问题就被搁下了。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黄色报纸

“每日电讯”透露出来 ,该报在最近某一期上写道 :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会引起不利于政府的表决 ,那必将诉诸全体选民了…… 宣称蒙古人完全有理的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们 ,应当归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一贯不怀好意的分子之列 ,下院有鉴于此 ,将要用对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考验自己的活动的结果。”

至于托利党人由于听任自己受骗去对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的弟弟)所执行的事件负责而陷入尴尬境地 ,我也许会找到别的机会来加以评论。

四

1859年9月30日于伦敦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肯定地说过,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迫使托利党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采纳当时的反对党首领,尊贵的子爵的计划。现在首先,认为中国的“意外事件”是由于英国现任首相所拟定的“训令”而发生的看法,已经毫不新颖了,因为在讨论划艇事件所引起的战争的时候,像迪斯累里先生这样一位熟悉真相的人物已经向下院暗示过这种看法了,而且奇怪的是,帕麦斯顿勋爵这样一位权威人士本人也已经确认了。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不是所援引的那种借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很久以前从国内收到的各种训令的结果。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我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违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来控制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如果保持下去,依我看来足以危害我国的利益。”

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这位可敬的绅士说,事变进程似乎是英国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事实确是如此。”

现在,我们约略看一下标题为“1857年至1859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这份蓝皮书,就会知道,6月25

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是额尔金勋爵在3月2日就打定主意要实行的。在该书第484页,我们找到下面两件发文:

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

1859年3月2日于“猛烈号”战舰

“爵士阁下:关于我在2月17日致阁下的发文,请允许我说明:我希望我在昨天的谈话中已经告知阁下的、女王陛下政府关于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通过的决定,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的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给以相当的接待。同时:毫无疑问,这种希望也可能并不会实现。无论如何,我相信当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女王陛下政府将愿意他有强大的兵力护送。在这种情况下,谨请阁下考虑,既然普鲁斯先生抵华日期不会推迟太久,可否尽速在最短期间,将足够的炮舰集中在上海以作此用。

额尔金并金喀尔田二郡伯爵”

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

1859年5月2日于外交部

“勋爵阁下:阁下今年3月7日来文已收到。现谨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阁下随件抄附的关于通知中国钦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

女王陛下政府对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将炮艇舰队集中在上海,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沿白河上驶一事,亦表赞同。

马姆兹伯里”

这样,额尔金勋爵预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强大的炮舰”来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沿白河上驶,而且他曾命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作好准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发文中,赞同了额尔金伯爵对舰队司令提出的建议。全部信件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而马姆兹伯里勋爵则是仆从。额尔金勋爵经常采取主动,根据原先从帕麦斯顿方面得到的各种训

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满足于一味服从他那傲慢的属僚预期他会感觉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英国人无权进入中国内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英国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的条款时，对中国人应持更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他本人过去的声明，而主张有权用“强大的炮艇舰队”强行驶入白河，他也毫不犹豫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可谓一模一样。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马姆兹伯里伯爵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呕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伯里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他还没有忘掉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埃伦伯勒勋爵竟敢公然反对尊贵的子爵对印度的政策，为了报答他的这种爱国勇气，他在得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品³⁴⁵。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结果使额尔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给帕麦斯顿的官场敌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使托利党人必须在对白河事件应采取何种方针这一点上进行难堪的抉择。现在他们或者是和帕麦斯顿一同鼓吹战争，从而使帕麦斯顿继续当政；或者揭开他们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拚命加以恭维的马姆兹伯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四幕第二场，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里。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难解决了。在 1857 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希望强迫开放中国市场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被从他们手里抢去,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没有大规模对华战争的更多纠葛,欧洲和印度的事情看来已经够危急了。他们并未忘记,在 1857 年茶叶进口量曾减少了 2 400 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的其他商埠。既然英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一个海盗的划艇而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那末,现在要想达到一个高潮,只需马上发动一次旨在以公使常驻北京这件麻烦事情来和中国为难的战争就是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9 月 13、
16、20 和 30 日

载于 1859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
10 和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50、5754、5761 和 576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贿选活动

1859年10月18日于伦敦

被委派去调查格罗斯特和威克菲尔德两个选区情况的委员会每天的发现,只是证明了曾经做过改革俱乐部³⁴⁶竞选代理人的柯波克老头儿的话。他说,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贿赂。格罗斯特历来就是一个“腐朽的市镇”³⁴⁷,而威克菲尔德则是由于议会改革³⁴⁸而建立的选区,在格罗斯特搞贿选活动的是托利党的头子,博得了道勃雷这一荣称的罗伯特·卡登爵士,而在威克菲尔德搞贿选活动的则是激进主义者布莱特先生的妹夫里瑟姆先生,这一情况使得目前的调查特别有趣。议会候选人在这两个地方表现出来的童稚的天真,在我们这个怀疑主义的堕落时代,实在令人感到欢欣不已。两位候选人都搞钱来收买选票,但是,两个人都尽力不让人知道这笔钱的用途。从选举开始直到结束,他们的代理人的帐单以几何级数在增加着,而他们认为选民们洁白无瑕这个信心也以同样的级数在增加。拿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在议会中代表这些选民是他们平生最大的宿愿。譬如,拿这位标准的战栗教徒,可敬的里瑟姆先生来瞧瞧吧。1857年他是威克菲尔德区的候选人,当时曾得力于据说是他的一位名叫威因莱特的代理人的“律师朋友”的帮助。威因莱特出于一片赤诚,把他这位战栗教徒朋友

拉到一旁去谈话,天真无邪的里瑟姆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他本来认为自己是*l'homme qu'on aime pour lui-même*(由于他本人,他个人的品德而受人爱戴的人),人们应该为了*pour le roi de Prusse*(那双美丽的眼睛而无报酬地)把他选入议会,而现在有人却很刺耳地告诉他,选举首先是英镑、先令和辨士的问题,因此“所需要的东西”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弄到。威因莱特肯定说所需的款项是1000英镑。里瑟姆感慨地说:“我没有这笔款子,但我一定设法借到。”于是,忠于诺言的里瑟姆靠伦敦伦巴特街的两位战栗教徒银行家奥维伦德和葛尼的帮助,寄给了威因莱特1000英镑。此后不久,这位威因莱特(看来他是一个喜欢进行秘密*pourparlers*(商谈)的人)又把里瑟姆叫到“一旁”,悄悄地对他说,原来竞选的开销比他以前估计的要大,还需要500英镑。天真无邪的里瑟姆“觉得这有点奇怪”,但是,他仔细一想,记起1852年的竞选花了1600英镑,于是又借了500英镑。这件事里面最有趣的是,他好像不太清楚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又过了两个星期,不讲情面的威因莱特又坚决要求再给他1000英镑。这时我们的里瑟姆——这位天真无邪的化身——表演了一出传奇剧。

他说:“这个要求使我很生气,我把这一点直接对他讲了,并且还说,在他办事房里搞的许多事情很不合我的胃口。我发现那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人物,但是,我仍然希望那里不会发生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威因莱特说:‘您应该把这件事交给我,并且不要提出任何问题。您应该把1000英镑交给我支配,虽热我不认为这笔钱是我需要的。’当时我没有很好考虑,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钱,我想,仍然是用那个老办法弄到的。”

“取钱的”那位神秘的陌生人是里瑟姆先生的伙伴,但是,当现在进行追查的时候,他却不露面了,因为尽管现在季节很不适宜,

他却突然决定去周游大陆了。

战栗教徒里瑟姆虽然具有轻信的性格,但仍然有点担心,他只是别出心裁地用“不提出任何问题”的办法来安慰自己的良心,罗·卡登爵士——要知道,“对于清白人一切都是清白的”,——却由于他有 1857 年参加格罗斯特竞选的经验而感到非常兴奋,所以,1859 年他又提出要做这个地方的候选人,虽然这一次没有成功。促使他企图踩着格罗斯特选民的肩膀走进圣斯蒂凡教堂³⁴⁹的真正动机在于,他认为格罗斯特真是完美无缺的,能成为它在议会中的代表真是一种荣幸和特别受尊敬的标志,“而柯波克同他那些侏儒通常却把格罗斯特称为干酪”,因为它“腐烂得令人馋涎欲滴”,说得简单点,是因为这个污水坑发出了一股贿选的臭气。竞选开支由最先谈妥的 500 英镑猛增到近 6 000 英镑,而且甚至当监察员在报告中查明合法开支为 616 英镑 8 先令 1 辨士以后,卡登勋爵认为在格罗斯特办的事无可指责的信念仍然毫不动摇。

“就在几天以前他还相信,选举工作的进行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一听到那些揭露出来的骇人听闻的事实以后,他不禁大为震惊。这些揭露对他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可见,议会候选人的全部竞选哲学就在于,他们不让自己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以便在天真无邪的水里洗净双手。打开自己的腰包,不提出任何问题,相信人类的美德,——这一切使他们感到最惬意不过了。

至于谈到法律界——竞选时要请来帮忙的辩护士、代理人、律师,那末,他们当然完全有合法的权利得到报酬。总不能要求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去白“干”一场吧。

有一位这种格罗斯特的议员制造者大叫道:“我为什么要白白地投他们

的票呢？看看那 24 位律师吧，他们每人一次就得到 25 英镑，每天还要拿 5 基尼，因此要白白地投他们的票我可不干！”

同罗·卡登爵士一起拉票的绅士乔治·布卡南先生说：

“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在拚命搞钱。使我感到不快的是，每天只挣 3 先令 6 辨士的穷人那样任人辱骂，不做什么事情而得到巨款的职业家们却一身清白。”

至于这些议员制造者们本身，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他们的特征了。罗·卡登爵士的代理人和拉票人符·克拉特尔巴克先生暗笑着说，“格罗斯特的贿卖价格并不比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高”。他立即看中了“库比一家”。库比这一家有八九口人，历来就在格罗斯特选举中起卓越的作用。克拉特尔巴克说：“这是些需要别人来逗乐的人。”因此他就到库比家中去了，他同库比全家人一起抽烟，一起聊天，但是，没有直接对他们许下什么诺言，是的，根本没有！但是，到底还是“给了他们一点希望”。在他之后，包工头约翰·华德先生接踵而去，提出给库比全家每人 5 英镑，据他说，有两个人收下了钱。诚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不过有人代他投了票。

包工头约翰·华德说：“我给了库比家九口人每人 5 英镑，而已故者给了 3 英镑。在 1857 年选举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世了，但是，他那一票还是投给了罗·卡登爵士。”

接着梅西先生发言。

他说：“我开一个小杂货铺，而我的职业是理发师。”

梅西确信，“贿选进入了高潮”，因此，他就以每张票 2—12 英镑的价钱来收买选民。有个叫伊文思的普通人幸运地得到了 12 英镑。

我们这位可尊敬的理发师说：“伊文思非常了解一切下层选民的情况。这个人作为一个选民和一个通风报信的人，能值 20 英镑。”

显然是这位能干的理发师梅西唆使了一个叫克雷门特的人率领一批暴徒，在提出候选人的那一天，绑架了“白狮子”小饭馆的一个名叫沃尔顿的老选民（不过他——梅西——本人没有露面），以便从这只“狮子身上剥一层皮”。梅西在审讯时说，这个人“又老又瞎，无力反抗，而且还喝醉了酒”。在威克菲尔德，价钱比格罗斯特高，每张选票值 5—70 英镑。而竞选者在这里也使用了更厉害的强迫手段。一位有多年经验的斯密斯先生认为，威克菲尔德是全欧洲贿赂之风最盛行的选区，在那里只要有钱和啤酒，就可以把随便什么人选出来。在战栗教徒、激进主义者里瑟姆同保守党人查理瓦特先生之间竞争的最后阶段，“全城都知道”，在我们那位洁白无疵的战栗教徒的代理人“威因莱特的公事房里，你要多少钱就可以得到多少钱”。保守党人同自由党人不同的唯一的重大特点是，后者一有机会就不择手段地发行“假银行券”，而前者付的则是足值的钞票。半打左右的威克菲尔德选民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为的是要在投票接近尾声时按他们的意愿来左右秤盘的轻重。有个叫特·弗·陶尔的理发师投了里瑟姆的票，因为里瑟姆的一个拉票人花了 40 英镑买了他的一把头发刷子。有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物，名叫约翰·威尔柯克斯，根本没有投票，因为他得了 25 英镑，答应投里瑟姆的票，又得了 30 英镑，答应投里瑟姆的竞选对手的票。结果“他认为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参加投票”。有个叫本杰明·英加姆的，投了里瑟姆的票，但他甚至说不上他得到多少钱，因为“当时他照例是喝醉了酒”。托利党人把一个叫做詹姆士·克拉克的算命和观星卜卦的先生骗进了一

个旅馆，把他灌醉，并“在旅馆的一个客房里把他关了好几天，让他尽情吃喝”。但是他最后还是溜走了，他投了里瑟姆的票，“这一方面是想气一气穿蓝衣服的家伙，因为他们把他关了起来，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捞到 50 英镑。”

其次，还有个叫威廉·狄克逊的，论职业是自来水工人，这天早晨他在提耳先生的漂白厂里干活。

“当他到楼上一个房间去想再拿几根水管把活干完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外面一下子把门关上了，上了锁并把门钉死。房间里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孩，强迫他要放老实些；他们拿着绳子，在必要的时候好把他捆起来。”

一句话，自由党人以造“假银行券”为特色，保守党人则因使用强力而出名。

鉴于对英国选举制度作了这些令人愤慨的揭露，布鲁姆勋爵认为有必要在布莱得弗德发表长篇演说，公开承认同贿选有关的罪行正在迅速增加，这些罪行在 1832 年以前比较少，但从 1832 年议会改革以来，却大大增加了。布鲁姆勋爵打算减少这种罪恶。布鲁姆勋爵找到的减少这种罪恶的奇妙办法是怎样的呢？在受贿的小资产阶级和收买小资产阶级的各上等阶级没有改正过来以前，不给各劳动阶级以选举权！这种奇谈怪论只能用年老昏聩来解释。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0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11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83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1859年10月20日于巴黎

法国和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在苏黎世签订的和约，就其要点而言，不过是维拉弗兰卡协定³⁵⁰各条款的翻版。由于有关最后和约的谈判所占的时间几乎比在曼都亚城下突然停止的军事行动的时间长一倍，因此有很多轻信的人便以为，和平缔造者们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路易·波拿巴的某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秘密计划。他们说，波拿巴想给意大利人充分的行动自由，即允许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以便在意大利的统一巩固起来之后，这位法国解放者能够轻易地摆脱他向弗兰茨-约瑟夫所作的令人悔恨的让步和承担的义务而诉诸最高的力量，即诉诸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的力量。政治协定也不能摆脱私人契约可能遇到的那种偶然事件的影响，按照 *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的规定，一旦受到 *force majeure*³⁵¹的阻挠，这种契约应予废除。持这种见解的人又一次暴露了他们不仅对他们心爱英雄的性格无知得可怜，而且对于从“红衣主教”到十二月英雄⁴⁹以及从执政内阁的“恶棍”到1848年的“蓝色分子”³⁵²的法国传统外交也无知得可怜。这种传

统外交的第一条原则是：法国的首要义务是不允许在它的周围成立强大的国家，因而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意大利和德国的反统一的宪法。闵斯德和约和康波福米奥和约³⁵³都是在这同一政策的指使下缔结的。无限期拖延下去的苏黎世谈判所追求的真正目的，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如果路易·波拿巴企图在7月初，就是说在他自己的军队正陶醉于胜利、意大利人民正热情澎湃、法国正妄诞地以为自己在家里忍受奴役是为了把自由赋予其他民族，并以此安慰自己受了很大委屈的自尊心的时候，来实现维拉弗兰卡条约的条件，那末，这位荷兰的僭位者就会助长狂暴的敌对势力的气焰，而同这种势力作斗争要比攻破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的坚固堡垒困难得多。这样他也许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军队，也许就会促使意大利行动起来，而且很可能就会为巴黎起义发出信号。要从为了适应当时情况而演出的崇高的传奇剧转到事先设下的骗局的细枝末节上去，除了时间之外，再不需要什么东西了。法军仍驻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但是它已经从解放军变成占领军了，而且它和当地居民的日常关系远不是友好的，因为，像常见的那样，密切的接触产生了厌恶感。从法国方面来讲，它已从短暂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它对出现欧洲同盟这个危险感到震惊，它在反复思虑：它丧失了旧的军队同时又欠下了新的国债；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对 *idées napoléoniennes* [拿破仑观念] 的不可信。至于意大利本身，它的状况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官方的声明来判断。我们看到加里波第不能筹出钱来替他的志愿军购买武器³⁵⁴，我们看到这支军队本身的力量和独立战争³⁵⁵期间汇集在普鲁士(当时它的领土比伦巴第小得多)旗帜下的广大群众比较起来几乎是滑稽可笑的。

马志尼本人在给维克多-艾曼努尔的信中³⁵⁶承认,全民族的热情的洪流正迅速地在各省的水洼里冻结起来,恢复原状的条件正迅速成熟中。诚然,在维拉弗兰卡条约和苏黎世和约之间的沉闷的间歇期间,在各公国和罗马尼亚上演了好几出由皮蒙特一手导演的、场面很大的官方把戏;尽管全欧洲的所有下等楼座上纷纷响起了掌声,但是这些政治魔术师所玩的把戏只是对自己的隐蔽的敌人有利。托斯卡纳、摩地那、帕尔马和罗马尼亚的居民被允许建立临时政府,把他们的逃跑的统治者的矮小的宝座掀倒,并宣布维克多-艾曼努尔为 re eletto [选举的国王]。但同时,他们接到了严格的训示:应满足于这些表面成就,要恭顺,其余一切都应听从打算在苏黎世决定他们的命运并对热情的奇想、人民激情的迸发和一切 allures révolutionnaires [革命的越轨行为] 特别不满的法国太上皇的旨意。他们不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上而应寄托在自己的品行端正上,不应寄托在自己的力量强大上,而应寄托在外国暴君的仁慈上。就是把一份地产从一个所有者手中转交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也不会像中意大利从外国的枷锁下转到民族自治那样平静了。在内政方面什么也没有改变,人民运动被完全镇压下去了,出版自由被取缔了,也许,看起来在欧洲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没有经过革命的考验而收获了革命的果实。由于这一切,意大利的政治气氛大大地消沉下来了,以致路易·波拿巴能够提出他事先拟就的决议,而任凭意大利人去发泄他们无力的愤慨。一支法军驻扎在罗马,另一支法军驻扎在伦巴第,一支奥军从提罗耳高地进行威胁,另一支奥军占据着四边形要塞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在皮蒙特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抑制了人民的热情的情况下,意大利目前没有多少希望了。至于苏黎世和约本身,

我们特别注意条约初稿³⁵⁷中所没有的两个条款。由于第一个条款，撒丁担负了 25 000 万法郎的债务，其中一部分应偿付给弗兰茨-约瑟夫，一部分是由于伦巴第-威尼斯银行的五分之三的债务转到它的身上而来的。除了在克里木远征和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期间举借的债款（路易·波拿巴在几天前提出的一笔数目不大的作为武装保护费的期票还不算在内）而外，再加上 25 000 万法郎的新债款，撒丁在财政繁荣方面很快就会处于和它所憎恶的仇敌相等的水平。我们所提到的另一个条款规定：

“没有参加最近这次战争的意大利各个独立国的疆界如需更动，必须征得参加建立这些国家并保障它们存在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意。”同时“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君主们的权利则由崇高的缔约国专门予以规定。”

这样，扮演完了分配给它们的角色的各意大利临时政府现在被极轻蔑地忽视了，而被它们抑制在那样寻常的消极状态下的居民，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到维也纳条约缔造者的大门口去乞求施舍。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0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8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德国的动荡局势

1859年11月15日于巴黎

现在 querelle allemande〔德国纷争〕提到日程上来了，不管这个纷争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是多么无关紧要，但是它却可能酿成全德国的、甚至是全欧洲的灾难。作为主要条顿大国之间纷争口实的一个小国，在合众国的历史上名声很坏。大家都知道，英国曾经在德国买了成千上万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奴隶，经过大西洋送到自己的起义的殖民地去，奴隶主要靠黑森—加塞尔提供，因为黑森—加塞尔的宗法制的选帝侯通常是靠用自己忠实的农民去换不列颠黄金的方法来取得收入的。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时代起，直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发出黑森—加塞尔革命的信号为止，历任选帝侯和他们的臣民之间的关系看来变得越来越敌对了。这场革命得到现任选帝侯的暗中支持，当时他非常希望同他的最亲爱的父亲分担最高权力。小小的革命为1831年1月5日的黑森宪法扫清了道路，而宪法现在则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斗争中的主要战斗口号。1850年，这部宪法使它们在布隆采耳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战斗，而在路易·波拿巴用“意大利问题”使大家厌倦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威廉二世。——编者注

了以后，如果情况顺利，这部宪法可能很快会使他从事“德国问题”的“研究”。为了说明当前的冲突，不妨简略地评述一下 1831 年的黑森宪法、它所经历的变迁沿革以及使它的命运同争霸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件。

1831 年的黑森宪法，抛开它所规定的选举办法，即由各旧有等级（贵族、城市居民、农民）选举代表的方法不谈，可以认为是欧洲曾经宣布过的一部最自由主义的根本法。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为了说明这个奇怪的事实，可以说，1831 年的黑森革命实际上是同各个“等级”中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们一致行动的律师、文武官员所进行的反对专制君主的革命。根据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凡是拒绝对宪法宣誓的黑森亲王都要被剥夺王位继承权。关于各部大臣的责任的法令绝不是空话，它使人民代表能够依靠国家法庭来解除任何一个只要被认为是犯有哪怕是曲解立法议会的某项决定之罪的大臣的职务。君主被剥夺了赦免权。他既无权让政府的成员退休养老，也无权违反政府成员的意志将他们革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随时可以向高等法院起诉。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实行监督，并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是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违反宪法，也不得例外。于是，官员便摆脱了王权的控制。另一方面，高等法院由于握有对行政机关的一切行动作出最后决定的全权，便成为全能的了。由人民选举的市议会议员，不仅应关怀地方当局的各种决定的执行，而且应当关怀国家的一般法律的实施。军官

们在就职之前必须宣誓效忠宪法，他们在对王权的关系上享有同文职人员一样的权利。代议机关只由一院组成，它在同执行机关不论发生什么冲突时，有权停止征收一切赋税。

1831年的黑森—加塞尔宪法就是如此。当今执政君主的父亲威廉二世选帝侯“在各个等级的完全同意下”宣布了这部宪法，并且

“衷心地希望它将作为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间和睦一致的牢固纪念碑永世长存下去”。

这部宪法的草案当时是由黑森政府提交联邦议会的，而联邦议会虽然没有批准，可是显然把它作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接受下来了。可以预料，尽管有一切 *pia desideria* [良好的愿望]，宪法机器在黑森—加塞尔也是注定不能顺利开动的。从1832年到1848年，立法议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了十次，其中有两届甚至任期没有满就更换了。1848—1849年革命使1831年宪法具有了更加民主的精神：等级选举制废除了，最高法院成员的任命权转交给了立法机关，最后，从君主手中收回了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并把它转交给了要对人民代表负责的人——陆军大臣。

1849年，当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一届黑森立法议会开幕的时候，德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反动；不过，一切都还处在蠢蠢欲动之中。旧联邦议会已被革命浪潮扫除了，而德国的国民议会连同它那虚有其表的执行机关也被用刺刀消灭了。这样一来，全德意志联邦的总的中心便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要求恢复法兰克福的旧议会，那里它的影响始终是占居优势的，而普鲁士则力图建立北方联盟，想利用这个联盟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把它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有四个德意志王国和巴登支持的

奥地利，实际上已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把旧联邦议会的渣滓聚集到自己周围，而普鲁士也稍微尝试了一下在一些较小的邦的参加下在爱尔福特组织联邦议会。不言而喻，受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立法议会领导的黑森—加塞尔被列入了奥地利的主要敌人之中，并且是普鲁士的拥护者。但是，当选帝侯刚一确信奥地利有俄国的支持，很可能在这场角逐中获胜时，他就抛开了假面具，表示赞成奥地利议会，反对普鲁士联盟，扶植以声名狼藉的哈森普弗鲁克为首的反动内阁上台执政，解散了拒绝表决通过赋税和持反政府立场的立法议会，并且在他企图依仗自己的权力去征收赋税而由于得不到军队、官僚和司法机关的支持遭到了失败以后，便在黑森—加塞尔实行了戒严。他采取了非常理智的预防措施，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去了，以便在那里受奥地利的直接保护。奥地利以它所恢复的旧议会的名义派出了联邦的一个军去废除黑森宪法，使选帝侯重登宝座。普鲁士则被迫表示赞同黑森宪法，反对选帝侯，以便加强它自己对恢复联邦议会的抗议，加强在它自己的庇护下建立北方联盟的尝试。于是，黑森宪法就成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斗争的口号。当时事态日益危急。联邦军队和普鲁士军队的前卫在布隆采耳附近相遇，但是，双方都吹了后退号。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于1850年11月29日在奥里缪茨会晤了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向他屈膝求和，在有关议会、黑森—加塞尔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所有问题上完全放弃了普鲁士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一切要求。普鲁士作为低头认错的罪人回到了议会。奥地利的一个军向北海海岸的胜利进军，使普鲁士的屈辱又加了一等。1831年的黑森宪法自然被坚决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最初是戒严状态，后来是1852年由哈森普弗

鲁克一手炮制、经选帝侯本人稍作更动并由联邦议会订正和批准的反动宪法。这部 1852 年宪法成了经常使国家和选帝侯之间发生纠纷的缘由，而且无论怎样调解，都是徒劳。不久以前的意大利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德国的运动，在普鲁士政府看来，为洗雪奥里缪茨失败之耻，并恢复自己以往同奥地利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普鲁士知道，1850 年曾经使奥地利取得优势的俄国，这一次将会朝相反的方向行动。直到现在角逐双方除了纸上交战以外，还没有任何别的接触。至于说 1831 年和 1852 年的两部黑森宪法，那只是它们斗争的口实。这从下面这一简单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主张根据 1831 年宪法的条文来修改 1852 年宪法，而普鲁士则坚持 1831 年宪法要根据联邦议会的总的（君主制的）原则加以修订后再行恢复。人民和黑森—加塞尔的议会依靠普鲁士的支持，要求恢复过去的宪法。如果德国人民不在适当时机转过身来反对“自己的两个统治王朝”，这一切由利害相关的顾问们从外面进行操纵的事情，可能会以德国的内战告终。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 15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12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07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对华贸易

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³⁵⁸。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了证实我们以前的论断，我们现在可以援引题为“额尔金伯爵赴华赶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³⁵⁹的蓝皮书。

每当亚洲各国的任何地方对于输入商品的实际需要与假定需要——这种假定需要，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以新市场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为根据而推算的——不相符时，商人们由于切望扩大交换范围，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措施阻碍了他们，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措施。正是这种谬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拚命支持每一个答应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的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商界人士认为能证明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均属正当的主要借

口。额尔金勋爵的蒙皮书中所包含的宝贵材料,将会使一切没有成见的人大大消除这些危险的谬见。

蓝皮书中附有 1852 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契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引录如下的一段: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 1852 年已将近十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 000 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直接在生产地区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十年以后,贸易部的表报告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 1843 年签订附约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 1850 年底所证明给我们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而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正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

米契尔先生承认,自从 1842 年条约³⁶⁰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白银与鸦片相交换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地发展了。但甚至对于这种贸易,他还补充说:

“它从 1834 年到 1844 年的发展,与从 1844 年到现在的发展,速率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假想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贸易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彰明昭著的事实,即在 1850 年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与 1844 年年底比较起来,几乎少了 75 万英镑。”

1842 年的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这可以从下表看出:

申报价值(金镑)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棉织品	1 001 283	1 020 915	1 598 825	1 905 321	1 408 433	640 820	883 985	1 544 235	1 731 909
毛织品	370 878	404 797	373 399	434 616	203 875	156 959	134 070	268 642	286 852
其他商品	164 948	148 433	189 040	163 662	137 289	202 937	259 889	403 246	431 221
共 计	1 537 109	1 574 145	1 61 268	2 503 599	1 749 597	1 000 716	1 277 944	2 216 123	2 449 982

现在我们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契尔说 1843 年达 175 万英镑的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内,英国的输出,有五年远远低于 1843 年的水平,而 1854 年只有 1843 年的十七分之十。米契尔先生首先用一些过于笼统而不能确切证明什么东西的理由来解释这惊人的事实。他说: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需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的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的重量的三倍。”

缺乏需要以及对于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乃是文明贸易在一切新市场上都会遇到的障碍。至于说到斜纹布的厚密和结实这一点,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工厂主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吗?但是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1844 年,米契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的一些样品送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契尔先生的话吧: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

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末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要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下面是额尔金勋爵对于当他溯航扬子江时所见到的农民的描述,可以看做是对米契尔先生的记载的补充: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的。我曾竭力想(虽然收获不大)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的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材料。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

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中
载于 1859 年 12 月 3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80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

1859年11月25日于伦敦

恐慌早已是英国工业体系中的通常现象,最近这一现象看来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也成为通常现象了。只要善于利用,恐慌能够给各个所谓自由国家的政府提供许多好机会。当人们被吓得神经错乱的时候,能够很容易使他们的头脑摆脱危险的幻想。就拿英国实行改革的问题来说吧。正当英国在研究是否永远放弃它对北美的监督的问题的时候,格雷勋爵提出了一项关于议会改革的冠冕堂皇的法案,以便消除上院对下院的传统影响。1780年里士满公爵提出了一项法案,他在这个法案中甚至要求每年进行一次议会选举和实行普选制。皮特(他的百年诞辰根本没有受到同胞们的注意就悄悄地过去了,因为那时他们完全为亨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奔忙)最先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议会改革”的口号³⁶¹。十八世纪统治阶级中最先进的人物梦寐以求的争取改革的运动现在消逝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运动被法国革命引起的恐慌所扫除,继法国革命之后又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欠下了骇人听闻的国债,出现了可耻的禁口律³⁶²。几年以前对俄国的丧胆的恐惧断送了两个改革法案³⁶³,现在对法国入侵的恐惧大概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对布莱特先生领导的英国

激进党人的阴暗的预感做出应有的评价。他们公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寡头政体及其出版机关故意散布他人恐惧的谣言，利用法国入侵的怪影来破坏改革，使糟糕透顶的管理制度万世长存。这件事情确实具有某些令人憎恶的、可疑的特征。制造将受到侵略的恐慌情绪的，主要是帕麦斯顿的报刊，而帕麦斯顿本人被公认为是路易·波拿巴的挚友。一个由于没有征得自己同僚们的同意就承认 coup d'état〔政变〕而被从一届政府中撵了出来，又由于提出关于法国阴谋家的法案而被逐出另一届政府的人³⁶⁴，能够是反对波拿巴阴谋的最合适的人物吗？帕麦斯顿的报刊一方面警告英国人民要提防波拿巴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又号召英国人民同这个人一道进行一次新的对中国的远征。

但是，不能否认，英国目前对战争的恐慌情绪，虽然被利用来为贵族政党的政策服务，但这种情绪并不是没有合理根据的。每当波拿巴签订一个新的和约，英国总会本能地自问，现在它该要遭到攻击了吧？可见，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欧洲的统治集团由于害怕革命而承认了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但是，周期性地发动战争却是这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他只有在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下，才能使各国政府摆脱对于可怕的革命的恐惧，这个条件就是各国政府让他逐一地征服自己。波拿巴登上他篡夺来的宝座还不到两年，对俄战争就成了延长他执政的时间所必须的条件了。同俄国签订和约还不到两年，又感到只有在意大利进行一场冒险才能使他免遭可耻的灾祸了。诚然，接二连三的战事并没有减轻他的困难，战争的结果从一方面说只不过是骗局，从另一方面说则是国债的增加和御用军的日益蛮横，更不用说除了国内已经存在的不稳定局面的其他因素以外，还出现了教权反对

派。在同俄国作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心怀不满的奥尔良党人就大胆地发表冷嘲热讽的言论,陷于悲观失望的革命家们又使用了炸弹。最近一场战争所引起的绝望情绪最明显的表现是:法国贸易陷于停滞、皇帝的大赦彻底失败、对报刊的迫害日益加剧、奥尔良派的希望正在复活。大多数法国人民都在抱怨毫无意义的战争耗尽了他们平时的全部积蓄,而军队却在咒骂和平,认为和平使它失去了战争的果实。再过几个月,路易·波拿巴所面临的困难就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他就只有一条出路——发动新的战争。但是,他迫于自己的处境而进行的这些接二连三战争,对他本人以及欧洲(英国可以说是它的最强大的代表)都是越来越危险了。克里木战争确切些说不是在欧洲领土上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之所以没有蔓延开来,只是由于它突然停止了。假如莱茵河上爆发了战争,特别是入侵英国,那末从一开始就会是全欧洲性的战争。可是,在确定下一次进攻的对象时,路易·波拿巴只能在普鲁士和英国中间进行选择。在两种情况下,英国都将参战,在一种情况下是作为交战的主要方面,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作为盟国。后一种情况可能性最大。但是,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在法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中引起哪些复杂变化,还不能预测。我们准备以后再研究英国鉴于即将发生的冲突而进行的备战活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 25 日

载于 1859 年 12 月 9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81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

我们早就在预料西班牙军队会在摩洛哥采取某种坚决行动,以便结束战争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³⁶⁵但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奥当奈尔元帅似乎并不急于离开他在塞拉利奥高地上的兵营,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他的军事行动差不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加以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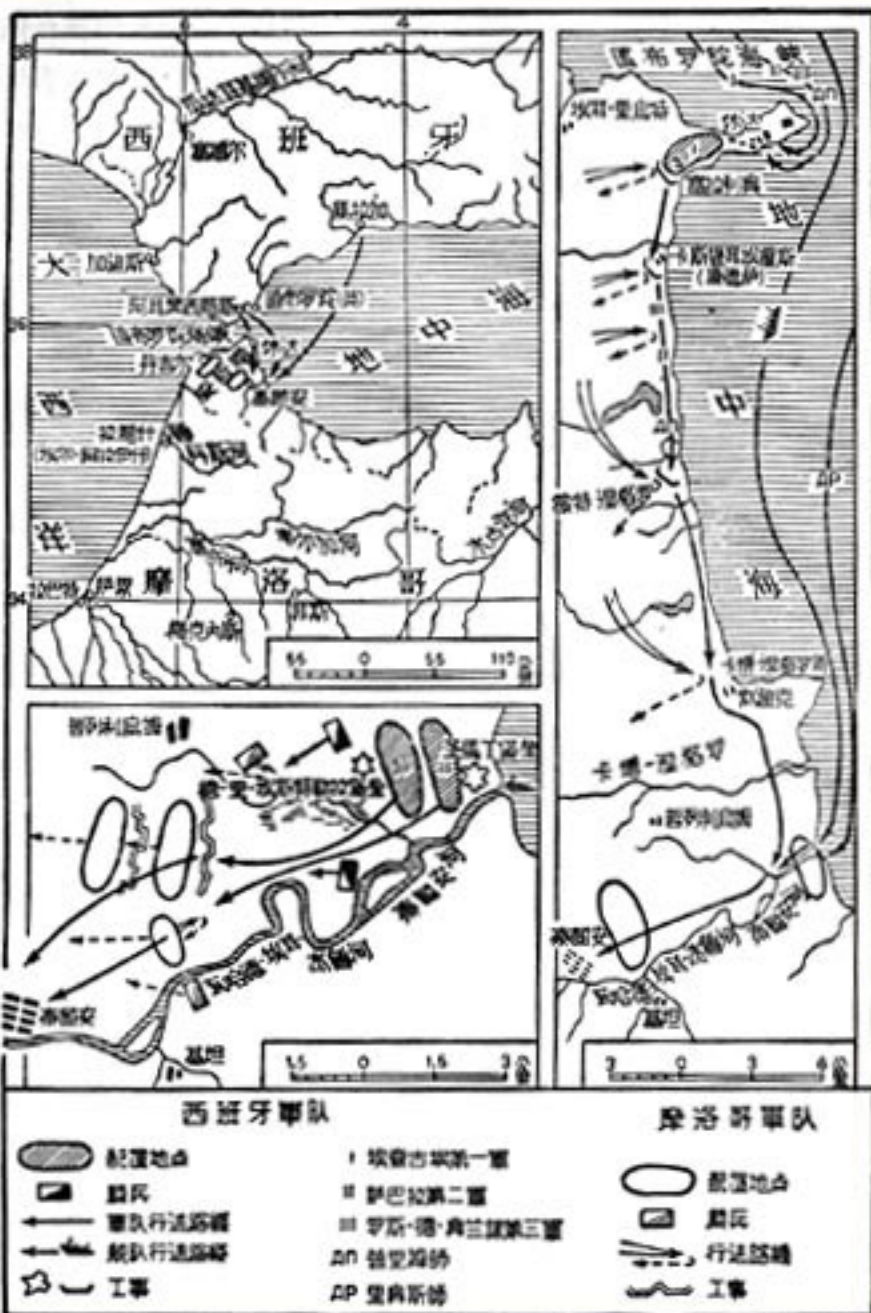
11月13日,埃查古埃将军指挥的西班牙作战军队第一师在阿耳黑西腊斯上船,几天以后在休达登陆。17日,这一师人开出休达,占领了塞拉利奥(或称白宫),即在休达的阵地前方约1.5英里的一座巨大建筑物。这一带的地形很不平坦、起伏很大,非常有利于散兵战和非正规战。当天夜间,摩尔人试图夺回塞拉利奥,没有成功,于是就退却了。而西班牙人则开始构筑营垒,作为以后军事行动的基地。

22日,塞拉利奥遭到了休达附近地区的摩尔族部落安哲腊人的攻击。从这一次战斗开始,整个战局到目前为止充满了一连串的毫无结果的战斗,而且每一次战斗同所有其余战斗都极相像。摩尔人用或大或小的兵力攻击西班牙人的阵地,试图靠突然袭击或机智夺取部分阵地。据摩尔人报道,他们的这些行动通常是成功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火炮,所以只得放弃所夺得的多面堡。西

班牙人则说，没有一个摩尔人看见过西班牙多面堡的内部是什么样的，摩尔人的所有的攻击都是完全不成功的。在第一次攻击时，安哲腊人不超过 1 600 名，第二天他们得到了 4 000 人的援军，于是立即重新发起进攻。22 日和 23 日全是小接触，但是在 25 日，摩尔人以全力进攻，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埃查古埃将军在这次战斗中手部负伤。摩尔人的这次攻击如此厉害，以致使奥当奈尔这位西得·康佩亚多尔从他在进行战争时一直保持着的那种昏睡状态中稍稍清醒过来。他立刻命令萨巴拉将军指挥的第二师和普里姆将军指挥的预备师上船，并且亲赴休达。26 日夜间，西班牙的作战军队全部在休达附近集中。29 日，摩尔人发动了另一次攻击，30 日再次攻击。在这以后，西班牙人开始设法改变他们所处的局限于一隅的地位；他们第一个行动的目标是休达南面约 20 英里、离开海岸 4 英里的泰图安。他们开始修筑一条通往该城的道路，摩尔人在 12 月 9 日以前一直没有进行任何抵抗。12 月 9 日晨，摩尔人突然袭击了两个主要多面堡的守军，但是，像往常一样，到日终便又放弃了多面堡。12 日，在离开休达约 4 英里的西班牙兵营前面发生了另一次战斗；20 日，奥当奈尔发出电讯说，摩尔人再度攻击两个多面堡，但是像往常一样被胜利地击退了。可见，12 月 20 日同 11 月 20 日相比，情况没有丝毫进展。西班牙人仍然采取守势，而且，同两三个星期以前的预告相反，看不出有任何前进的迹象。

西班牙军队的数量，包括 12 月 8 日以前所得到的全部援军在内，约有 35 000—40 000 人，因而有 3 万人可用于进攻。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夺取泰图安不应当有什么困难。诚然，没有好的道路，而且军队的给养全部要从休达运去。但是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

1859—1860 年摩洛哥战争图



以及英国军队在印度是怎样做的呢？何况西班牙的骡子和挽车马并没有被它们本国的好路娇惯到不肯在摩尔人的土地上行走。不管奥当奈尔怎样替自己辩解，这样继续按兵不动是绝对解释不通的。西班牙人现在拥有的兵力一般估计已是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要派出的最多的兵力了，除非有意外的挫折要求他们作特殊的努力。相反地，摩尔人一天比一天强大。由哈治·阿布德-萨勒姆指挥的、曾于12月3日派出部队进攻西班牙人阵地的泰图安兵营，其军队已经扩充到了1万人，城内的守军还不算在内。另外一个由穆莱·阿巴斯指挥的兵营在丹吉尔，它源源不断地得到由内地开来的援军。单是这一情况，就应当使奥当奈尔一等到天气许可时便发动进攻。但是，虽然有好天气，他却没有进攻。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决断的表现，这表明，摩尔人不是像他所预计的那种不堪一击的敌人。无疑地，摩尔人作战非常出色，西班牙兵营里纷纷抱怨休达前面的地形对摩尔人有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西班牙人说，摩尔人在丛林和山谷中是十分厉害的敌人，并且他们对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但是，一旦走进平原，西班牙步兵的坚强力量很快就会迫使摩尔人的非正规部队掉头逃跑。但是现在每次战斗都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在起伏地上进行散兵战，在这种条件下，这样一种辩解是大可怀疑的。如果说西班牙人在休达附近停留了6个星期以后还不能像摩尔人一样熟悉那里的地形，那他们就够糟糕了。起伏地比平原更有利于非正规部队，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即使是在起伏地上，正规的步兵也应当比非正规部队优越得多。在散兵线后面配置支援队和预备队的现代散兵战的方法，军队运动的规律性，保持对部队的指挥并且使它们相互支援以使用全部力量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使

正规部队比非正规部队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以致在最适合于进行散兵战的地形上,非正规部队即使以二对一,也抵挡不住正规部队。但是在休达,力量的对比正好相反。西班牙人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他们却不敢进攻。唯一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完全不懂散兵战,因此士兵个人对这种作战方法缺乏素养,纪律和正规训练所应当给予的优越性就抵消了。事实上,大概他们不得不经常使用长剑和刺刀来进行白刃战。摩尔人在西班牙人相当接近的时候,就像土耳其人所常做的那样停止射击,拿着刀剑向他们冲杀,而这对于像西班牙军队这样由新兵组成的军队确实是不很愉快的。但是经常发生的战斗,应当使他们熟悉摩尔人作战的特点和找到对付它的合适的办法;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位统帅仍然迟疑不决并且继续滞留在自己的防御阵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对他的军队作出很高的评价了。

根据现有事实来推测,西班牙人的作战计划,似乎是把休达作为作战基地而把泰图安作为第一个进攻目标。同西班牙隔海对峙的那一部分摩洛哥的地方,形成一个半岛似的地带,宽约30—40英里,长约30英里。丹吉尔、休达、泰图安和拉腊什(埃尔-阿拉伊什)是这个半岛上的主要城市。占领了这四个城市(其中休达已在西班牙人手中)就很容易征服这个半岛,并使它成为进一步进攻非斯和梅克内斯的基地。所以,夺取这个半岛可以说是西班牙人的目标,而攻占泰图安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这个计划看来是相当明智的;它把作战行动限制在一块不大的地区内,这个地区三面环海,第四面为两条河(泰图安河和鲁科斯河)所环绕,因此夺取这个地区要比夺取它南面的地区容易得多。这个计划也避免了进入沙漠的必要性,而如果把摩加多尔或拉巴特作为作战基地的话,那

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沙漠 ;同时 ,这个计划使战场接近西班牙的国境 ,其间只有直布罗陀海峡之隔。但是不论这个计划有什么优点 ,如果计划不能实现 ,这些优点就都是毫无用处的。如果奥当奈尔照原来那样继续下去 ,那末 ,不管他在公报上说得多漂亮 ,他也会使他自己和西班牙军队的名誉蒙受耻辱。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12 月 10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1 月 1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4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

摩洛哥的战局终于真正开始了，随着这个战局的开始，西班牙的报纸和热情的西班牙民众用来刻画奥当奈尔的一切浪漫色彩都消失了。奥当奈尔原来只是一个平庸的普通将军。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骑士，而是公主骠骑兵³⁶⁶，战争不是用托勒多的刀剑，而是用线膛炮和圆柱锥形炮弹进行的。

12月20日前后，西班牙人开始修筑一条供炮兵和轻重队通行的道路。这条道路要经过在休达城下的兵营南面的山地。摩尔人从未试图破坏这条道路；他们有时攻击掩护筑路队的普里姆将军的那个师，有时也攻击兵营，但都没有成功。这些接触从未超出前卫散兵战的范围；12月27日的战斗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西班牙人的损失也不过是6人死亡和30人负伤。这条不过两英里长的道路在年底前就修筑好了，但是一场新的暴风雨的袭击阻止了军队的行动。与此同时，好像是要把军队即将开始的调动通知摩尔人的兵营一样，由1艘帆力战列舰、3艘螺旋推进式巡航舰和3艘明输式蒸汽舰组成，共有246门火炮的一支西班牙舰队开到泰图安河口，并且在12月29日炮击河口的堡垒。在大约3小时内，这些堡垒被压制住了，它们的土质工事也被摧毁了。不要忘记，这些正是法军大约在一个月以前以少得多的兵舰轰击过的堡

垒。³⁶⁷

29日天气好转，西班牙军队终于在1月1日开始前进了。最先在非洲登陆的、由埃查古埃指挥的第一军（2个师），仍然留在休达前面的阵地上。这个军在最初几个星期虽因疾病而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现在已经能服水土了，并且，由于以后获得了增援，人数已达1万名，比第二军或第三军多得多。第二军由萨巴拉指挥，第三军由罗斯·德·奥兰诺指挥，这两个军和普里姆的预备师一起，共21 000—22 000人，已在新年的第一天出动。每个兵士随身携带6天的口粮，另有100万份口粮，即军队一个月的给养，由随同这支军队行动的海船载运。这支军队以普里姆师为前卫，由萨巴拉担任支援，罗斯·德·奥兰诺殿后，通过了休达南面的山地。新辟的道路向下通往离兵营2英里的地中海，这里有一片相当大的半圆形的平原，地中海形成它的弦，起伏地带构成它的圆周，这一地带愈来愈高，逐渐变成陡峭的山岭。普里姆师的大部分人刚刚离开兵营，散兵战就开始了。西班牙的轻步兵轻易地把摩尔人赶回平原，又从平原迫使他们退入位于西班牙军队行进路线侧方的山岗和丛林中去。在这里，公主骠骑兵的两个人数不多的连因为某种误会而投入了进攻。他们进攻得这样勇猛，以致一直穿过了摩尔人的战线而进入了他们的兵营。但是四面都是起伏地，而在有利地形上又找不到可以攻击的骑兵或步兵，于是他们只得退回来，除了损失兵士以外，还损失了7个或者说差不多他们全部的军官。直到目前，战斗主要是由成散开队形的步兵和一两个山炮连来进行的，有几艘炮艇和蒸汽舰在一些地方以火力进行了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支援。看来，在没有巩固地占领形成这片平原南端的山岭以前，奥当奈尔想停留在平

原上。可是，为了保证在夜间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奥当奈尔命令普里姆把山岭北坡上的摩尔猎兵赶走，然后在傍晚时撤回。但是普里姆这位西班牙军队中最勇猛的将军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果占领了整个山岭，当然他自己也遭到重大的损失。他的前卫在山岭上宿营，并沿正面筑起了工事。这一天西班牙人的损失共计死 73 人，伤 481 人。

这一天夺取的阵地就是因两座白色建筑物而得名的 Castillejos [卡斯提耳埃霍斯——双堡]，其中一座在靠近平原的内山坡上，另一座在普里姆白天占领的山岭上。但是这个兵营的正式名称大概是 Campamento de la Condesa [伯爵夫人兵营]。同一天，摩尔人攻击休达城下兵营极左端两个多面堡之间的间隙地和极右端的一个多面堡，试图对这个兵营进行一次小规模牵制战。但是埃查古埃的步兵和炮兵火力轻易地击退了他们。

作战军队在伯爵夫人兵营停留了 3 天。野炮和 1 个火箭连以及余下的骑兵（整个骑兵旅，包括 8 个骠骑兵连、4 个无胸甲的胸甲骑兵连和 4 个枪骑兵连，共 12 000 人）都来到了这个兵营。只有攻城炮兵纵列（其中有 1 个十二磅线膛炮连）还未到达。1 月 3 日，奥当奈尔向南面的一道山岭即蒙特涅格罗方向进行侦察。天气仍然晴朗，午间很热，夜间有重露。霍乱仍在一些师里严重流行，有一些部队因疾病而受了严重的损失。例如，受疾病危害特别严重的两个工兵营，各连人数已由 135 人减到 90 人。

到此刻为止，我们掌握有详细的报道，至于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只有根据内容贫乏而且互有出入的电讯来叙述了。5 日，军队向前推进。6 日，军队“通过了山口，没有遇到抵抗，然后在涅格罗谷地的北面”宿营。这是不是说军队已经越过了蒙特涅格罗，并

且在它的南坡宿营，还不清楚。9日，据报道军队距离泰图安1里加，并且击退了摩尔人的一次攻击。13日，夺取了卡博-涅格罗的全部阵地，大获全胜，并已兵临泰图安城下；只等火炮运到，就开始攻城。14日，原在马拉加集结的里奥斯将军的师（有10个营的兵力）在泰图安河口登陆，占领了两星期前被舰队击毁了的堡垒。16日，据报道说，这支军队即将渡河攻打泰图安。

为了说明这一切情况，必须指出，军队由休达到泰图安要通过四道各自分开的山岭。第一道就在兵营的南面，通向卡斯提耳埃霍斯平原；第二道在这个平原的南面。这两道山在1日被西班牙人占领。再往南，与地中海岸垂直的是蒙特涅格罗，和这一道山岭平行而位于更南面的，则是另一道更高的山岭，它一直到卡博-涅格罗海角为止，卡博-涅格罗的南面就是泰图安河。摩尔人在1月1日紧逼入侵军的翼侧，后来改变了战术，继续向南面移动，企图从正面堵住通往泰图安的道路。估计争夺这条道路的决战将在最后一道山岭即卡博-涅格罗的一些山口发生，而这一会战大概就在1月13日发生了。

从战术上来说，在这些战斗中双方都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对于摩尔人，除了以半野蛮人的勇猛和机灵进行非正规的战斗以外，我们不能再期望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们看来也还不够强。他们似乎没有表现出阿尔及利亚海岸山区的卡拜尔人甚至是里菲人所有的那种反抗法国人的狂热。在休达附近的多面堡正面进行的长时间的、没有成功的搏斗，似乎已经挫折了大多数部落原有的锐气和毅力。而在战略上，他们也不能同阿尔及利

亚人相比。经过第一天战斗，他们便放弃了他们的正确计划，即袭扰进攻纵队的翼侧和后方，并且切断或威胁它和休达之间的交通线。他们不这样做，却竭力赶到西班牙人的前面，想从正面去堵住西班牙人前往泰图安的道路，这样便引起了他们本应避免的一场决战。也许他们还会懂得，对于他们所拥有的这样的士兵来说，在像他们所居住的这样的国土上，小规模战争正是可以用来拖垮敌人的斗争方法，——尽管这个敌人在训练上和装备上占有优势，但是它的一切行动都被摩尔人所没有的那种庞大的 *impedimenta*〔轻重〕所拖累，而且它在一个不好客的又没有道路的国土上调动军队是十分困难的。

西班牙人继续像开始时那样作战。在休达按兵不动两个月之后，他们在 16 天内推进了 21 英里，速度是每 4 天 5 英里！即使把道路上的所有困难都估计进去，这种缓慢的速度仍然是现代战争中前所未闻的。西班牙的将军们大概完全忘记了怎样指挥大部队、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调遣一支按人数来说未必能够同上次意大利战争中法国的一个军相比的军队。否则怎样解释这种延宕呢？1 月 2 日，奥当奈尔所有的炮兵（除攻城炮兵纵列以外）都调到了卡斯提耳埃霍斯阵地，但是他还是等待了两天，直到 5 日才出发。行军看来还组织得不错，但这是行程很短的行军，所以也不算高明。在火线上，西班牙人很蔑视敌人，这是较严格的训练和一连串成功的战斗的必然结果；但是，当气候和战争（它最后必将变为困扰性的小规模军事行动）的困难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和体力的时候，这种对胜利的信心是否还能保持，这要在将来才能看出。至于指挥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说的还很少，因为除了第一次战斗以外，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整个战况的详细报

道。但是，这第一次战斗就暴露了两个明显的错误，即骑兵的攻击和普里姆将军的推进超过了预先规定的范围。如果这种事情成为西班牙军队中常有的现象，那末他们就更糟糕了。

泰图安的防御很可能是短暂的，反而是顽强的。工事无疑是不好的，但是正像在君士坦丁³⁶⁸和阿尔及利亚的其他许多城镇中的战斗所表明的那样，摩尔人在要塞围墙掩护下作战时是出色的战士。下次的邮件可能给我们带来泰图安已被攻陷的消息。如果确是如此，我们可以预期战斗会暂时停息，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时间来改善泰图安和休达之间的道路，把泰图安变成第二个作战基地，并等候援军。然后再从这里开始下一步行动，即进攻拉腊什或丹吉尔。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 月 1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2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6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萨瓦与尼斯

莎姆伯里省长肯定地宣称撒丁国王从来无意要把藏瓦让给法国，而英国外交大臣本月 2 日在下院却断然声明，去年夏天瓦列夫斯基伯爵就以法国皇帝的名义拒绝了这个方案。但是，约翰·罗素勋爵的声明谈的是几个月以前的情况，那时被否定了的事，可能现在已经实现了。当然，要使人相信在萨瓦居民中最近发展起来的拥护并入法国的运动纯粹是地方性的运动，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大概这个运动是由法国代理人煽动起来的，而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的政府则批准了这个运动，或者至少也是对它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萨瓦像瑞士西部各州一样，是法兰西民族占有完全和无疑的优势的一个省份。人民都操南法兰西方言（普罗凡斯方言或利木赞方言），但标准的和正式的语言到处都是法语。可是这丝毫也不能证明萨瓦人愿意并入法国，特别是并入波拿巴的法国。据一位于 1859 年 1 月为了军事目的曾经在这个地区旅行的德国军官的见闻录记述，除了莎姆伯里和下萨瓦的其他几个城市以外，主张并入法国的人无论在哪里都毫无影响，同时上萨瓦、莫里延和塔兰特兹认为最好是保持现状，沙布累、佛西尼和热涅维这三个北部地区则认为最好是加入瑞士联邦，组成它的一个新的州。但是，既然萨瓦

居民完全是法兰西人,它无疑会日益倾向于法兰西民族的基本中心,并且最后会并入这个中心,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尼斯的情况却不同。伯爵领地尼斯的人民也操普罗凡斯方言,但是这里的标准语、教育、民族精神都是意大利的。北意大利方言和南法兰西方言非常接近,几乎无法说明某种方言止于何地,某种方言起于何地。甚至皮蒙特和伦巴第的土语按其后缀来说也完全是普罗凡斯语,而具有拉丁语词根的词构成法实质上与意大利语相同。以这种土语为依据要求尼斯并入法国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只是根据设想中的尼斯对法国的同情要求它并入法国,可是是否存在这种同情,那还是大大值得怀疑的。即使有这种同情,即使有特殊的土语,尼斯也完全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最令人信服证明,就是朱泽培·加里波第的士兵 *par excellence* (主要)是由尼斯提供的。把加里波第看成法国人,那简直是个笑话。

单纯从财政观点来看,把这两个省割让出去并不会使皮蒙特受到很大的损失。萨瓦是一个穷省,虽然能为撒丁军队提供优秀的士兵,但是它自己的行政费用从来都是入不敷出的。尼斯的财政状况也好不了多少,而且只是那么一小块地方。损失显然是不大的。尼斯虽然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了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统一可以把它牺牲,而失去像萨瓦这样的一个外族人居住的省份甚至可以认为是合算的,因为这样能促使意大利的统一。但是,如果从军事观点看这个问题,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现在法国和撒丁从日内瓦到尼斯这一段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线。南面的海和北面中立的瑞士把通向意大利的一切道路都切断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发生战争,交战双方的处境是一样的。但是萨瓦和尼斯都位于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后

面，阿尔卑斯山的主脉则以一个宽广的半圆包围着皮蒙特，而且这两省都向法国敞开着。所以，在皮蒙特和法国的疆界线上双方各占有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斜坡，而在疆界的北部和南部，意大利却占有阿尔卑斯山的两个斜坡，因此它完全控制着各个山口。

此外，由于商业不很发达，由皮蒙特经阿尔卑斯山通往法国的一切道路全都秽塞不堪，而由皮蒙特经蒙塞尼山口通往萨瓦的道路和由皮蒙特经田达山口通往尼斯的道路却是欧洲贸易的干线，维修得非常好。所以，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历次战争中，如果进攻的方面是意大利的话，尼斯和萨瓦都是意大利进攻法国的天然的作战基地，而如果进攻的方面是法国的话，它就必须夺取这两个省，才能向阿尔卑斯山后面的意大利发动进攻。纵然意大利人面对着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不能守住尼斯和萨瓦，这两个省仍然使他们有可能及时把意大利的兵力集中到皮蒙特平原，从而保证意大利免遭突然的攻击。

如果意大利占有萨瓦和尼斯所得到的军事上的利益仅限于这些积极的利益，那末牺牲这两个省份，仍然不致有什么严重的损失。但是最重要的是消极的利益。我们假定勃朗峰、蒙特伊泽兰山口、蒙塞尼山口和田达山口都是标示法国疆界的一个个大界桩。在这种情况下，疆界就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条直线，而是以一个巨大的圆弧包围着皮蒙特了。莎姆伯里、阿尔贝维耳、穆蒂埃这样一些主要道路的汇合点就会变成法国的基地。法国人会在蒙塞尼山口的北坡构筑防御工事并保卫北坡；两个国家的前哨就将在距离都灵只有两天行程的这个山脉的各个山顶上相遇。在南面，尼斯将会成为法国各个基地的中心，而前哨将设置在距离热那亚只有四天行程的奥涅利亚。这样一来，即使在和平时期，法国人也

仍然待在意大利西北部两个最大城市的门口，而且由于他们的领土差不多从三面包围了皮蒙特，他们就可以阻挠意大利军队在波河上游谷地集结。把意大利兵力集中到亚历山大里亚以西的任何企图，都可能使军队在集中尚未完成以前就遭到攻击的危险，换句话说，可能使他们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这样一来，皮蒙特的防御中心便会立即从都灵移到亚历山大里亚；换言之，皮蒙特本身将会无法进行认真的防御，而处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中。路易-拿破仑正是把这一点称为

“自由的和感恩图报的意大利，它的独立只能归功于法国”。

注意一下北方，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经常威胁着意大利的东西，对瑞士来说也可能会成为致命的打击。如果萨瓦成了法国的领土，那末从巴塞罗到大圣伯纳德山口的整个瑞士西部就会四面都受法国领土的包围，一旦发生战争，连一天也守不住。这一点是这样明显，以致维也纳会议决定让北萨瓦和瑞士都中立化，一旦发生战争瑞士有权占领并防御这个地区。只有 400 万人口的小国撒丁不可能反对这个决定，但是法国是否可能并愿意让它的一部分领土因此在军事方面归属于一个别的而且还是较小的国家呢？一旦发生战争，瑞士能不能够试图占领法国的一个省份并把它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呢？当然不能。在这种场合，法国会在任何它觉得合适的时刻像吞并萨瓦和尼斯一样，轻而易举地吞并整个瑞士法语区——伯尔尼汝拉山区、纽沙特尔、窝州、日内瓦以及弗里布尔和瓦勒的那些它认为合适的地区；而在这个时刻尚未到来以前，瑞士会一直处于法国强有力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以致它会像是法国的一个简单的附庸。至于说到瑞士在战时保持中

立，其实只要一宣战这种中立就不会再存在了。如果一个强大的和好战的国家随时都可能击溃它的中立的邻邦，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中立。

这个表面看来是无恶意的吞并萨瓦和尼斯的计划无非是要在意大利和瑞士建立法国的统治，即保证法国在阿尔卑斯山的统治地位。在这个小步骤实现以后，到我们亲眼看到左莱茵河上也建立起法国统治的企图以前，难道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吗？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 月 30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2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74 号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

西班牙在摩洛哥发动的战争的第一幕，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幕，现在已告结束，而且所有详细的公报已经到来，因此我们可以再次谈谈这个问题。

1月1日，西班牙军队离开休达的阵地，去进攻距离仅21英里的泰图安。奥当奈尔元帅虽然从未受到过敌人严重的攻击或阻拦，却花了不下一个月的时间才把他的军队开到这个城市附近。没有道路的困难和必要的谨慎，都不能成为行动这样闻所未闻地迟缓的理由；而且西班牙人显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制海权。如果说不得不修筑一条道路以便运送重炮和辎重，这也不是一个理由。重炮和辎重都可以主要由舰船载运，军队只要带一星期的给养和山炮（用骡子驮载）而不带其他的火炮，至多5天就可以到达控制泰图安的高地，并与里奥斯的师会合，这个师在那时，正像在3个星期以后一样，也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在瓦哈德-埃耳-杰鲁河口登陆。2月4日的会战也许便可以在1月6日或7日进行，而且形势也许会更有利于西班牙人；这样，因疾病而丧失战斗力的数千人大概就可以保全下来，而且也许在1月8日就可以攻占泰图安。

这似乎是一个大胆的论断。的确，奥当奈尔渴望攻进泰图安

的心情并不比他的任何一个兵士差；他表现了勇敢、谨慎、冷静以及军人的其他素质。既然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泰图安城下，那末他用什么办法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做到同样的事情呢？当时奥当奈尔有两个办法把他的军队开到目的地。第一个办法是主要依靠陆上交通，舰船完全作为辅助。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组织了一个正规的陆上运输队来运送给养和弹药，并且给军队配备了大量的装备着十二磅炮的野战炮兵。在必要的情况下，他的军队可以完全不依赖舰船；舰船只是作为与休达联系的次要的交通路线，虽有用处，但绝不是必不可少的。按这个计划自然就要组织一支庞大的辎重队，有辎重队就要修筑一条道路。因此，就花了一个星期来铺设从已占领的阵地到海岸的道路；而且差不多每走一段路，整个行军队伍——军队、辎重队等等就都得停顿下来，等待供次日前进用的另一段路筑成。因此，行军时间的长短，便以西班牙工兵每天所能筑成的道路的长短来计算；而筑路的进度看来是每天平均半英里左右。这样，所选择的这种运送给养的方法本身，又要求大大扩大辎重队，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军队在途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它消耗的粮食当然也就越多。虽然如此，但是当1月18日左右暴风雨迫使汽般离开海岸时，军队就只好挨饿了，尽管他们休达的基地近在咫尺；要是再来一天暴风雨，那末三分之一的军队就不得不回去为其余的三分之二的军队搬运给养。奥当奈尔元帅就是这样在整整一个月中使18000名西班牙兵士沿着非洲海岸散步，每天前进三分之二英里。军队一旦采用了这种供应办法，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显著地缩短这个无可比拟的行军的时间了。但是采用这种办法难道不是一个错误吗？

如果泰图安是一个内陆城市，离开海岸不是4英里而是21英

里，那末自然不能有其他的选择。法国人在远征阿尔及利亚的内地时遇到过同样的困难，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克服了这些困难，当然他们做得更努力，更迅速。英国人在印度和阿富汗由于比较容易找到驮畜和饲料，所以避免了这种麻烦；他们的炮轻，不需要良好的道路，因为战斗行动只是在干燥的季节里进行的，这时军队可以越野行进。但是带着一支军队沿海岸走整整一个月，而且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总共只走 21 英里这样一段遥远的路程；这种事情只有让西班牙军队和奥当奈尔元帅来干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西班牙军队的实践和理论都是非常陈旧的。既然军队经常备有一支由蒸汽舰船和帆力舰船组成的舰队，那末这样行军就十分可笑了，而在行军期间因霍乱和痢疾丧失战斗能力的兵士则是偏见和无能的牺牲品。工兵修筑的道路并不是与休达联系的安全交通线，因为西班牙军队只是在他们偶尔宿营的地方才控制这条道路。在后方，摩尔人随时都可以使这条道路不能通行。要送一个情报，或者护送一个运输队回休达，至少需要一个有 5 000 人的师。在全部行军期间，与休达的联络都是靠汽船来保持的。尽管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随军的给养还是非常不足，以致不到 20 天，军队就濒于饥饿，只是靠舰船上的储备粮才得以幸免。那末，修筑这条道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炮兵吗？西班牙人一定很清楚地知道摩尔人没有野炮，他们自己的线膛山炮就足以胜过敌人所能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武器。那末，为什么还随军携带所有的火炮（既然全部火炮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沿海路从休达运到瓦哈德-埃耳-杰鲁河口或泰图安河河口的圣马丁）？充其量，随军带一个野炮连就可以了。西班牙的炮兵如果不能以每天 5 英里的速度在任何地区行进，那末它们就太笨拙了。

里奥斯师在圣马丁的登陆证明，西班牙人拥有的舰船每次至少可以载运一师人。如果进攻的是英国军队或者法国军队，那末无疑地，他们会从休达进行几次佯攻，把摩尔人吸引到该地，然后这一师人就立刻在圣马丁登陆。这样一个拥有 5 000 人的师一夜之间就可以筑起轻型的野战工事，有这样的工事就可以无所畏惧地等待任何数量的摩尔人的攻击。但是，如果天气好，每天都可以有一个师登陆，这样，军队便可以在 6 天或 8 天之内集中到泰图安附近。假定奥当奈尔不愿意让他的一个同其余军队隔绝的师在三四天内遭受攻击，因为他的军队是由新兵组成的，还没有战争经验，那我们就不能责备他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了。

但是无疑地他可以做到下面这一点。他可以让每个兵士带一个星期的口粮，同时携带他的全部山炮（可能再带一个野炮连）以及用骡马所能驮载的给养品，从休达出发，尽快地到达泰图安。即使把一切困难都考虑在内，日行 8 英里当然是够慢的了。不过就算 5 英里吧，那也只需要 4 天的行军就够了。再假定需要用两天的时间来作战，虽然战果不会很大，争不到 5 英里的土地。这样一共需要 6 天，包括因气候而耽搁的时间在内，因为一支不带辎重的军队差不多在任何气候下每天都可以走四五英里。这样，军队在耗尽他们所携带的给养以前就可以到达泰图安平原；必要的时候，汽船可以在行军期间把给养运给军队，而他们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的。就地形和气候条件来说，康洛哥并不比阿尔及利亚更差，要知道法国人在严冬季节在阿尔及利亚的行军要远得多，并且要深入山区，没有汽船进行支援和运送给养。其实只要一到蒙特涅格罗的高地并控制住通往泰图安的山口，就可以保证通过圣马丁的道路与舰队保持联系，而海就可以成为作战基地。所以，只

要稍微大胆一些，军队处于除自身以外别无作战基地的状态的时间就可以从一个月缩短到一个星期。可见，两种计划中最大胆的计划会是最可靠的计划，因为摩尔人越是可怕，奥当奈尔的迟缓的行军就越加危险。如果军队在前往泰图安的途中被击败了，退却起来也会比带着累赘的辎重和野炮时要容易得多。

奥当奈尔差不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通过了蒙特涅格罗，此后的行进还是完全同以前一样的迟缓。他在这里又赶筑和加固了多面堡，好像与他对敌的是一支组织得最优良的正规军队。整整一个星期就这样浪费掉了。其实只要挖一些简单的野战工事就足以对付这样的敌人了。他不可能受到相当于他的6门山炮的火力的炮兵的攻击，因此，构筑这样的兵营，本来只要几天就足够了。4日，他终于去进攻敌人的营垒。西班牙人在这次行动中看来表现得很不错，关于战术措施的优劣，我们无法判断，因为西班牙兵营中的少数几个记者把所有枯燥的军事细节略而不提，而醉心于绘声绘色的描写和热情的夸张。像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所写的，要判断一片地形的特点，就应当自己去看看，我给你描写一番有什么用处呢。摩尔人完全被击溃，泰图安在第二天便投降了。

这样就结束了战局的第一幕，如果摩洛哥皇帝不是过于固执的话，那末整个战争很可能就此结束。可是，西班牙人到现在为止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由于他们进行战争的方法而大为增加）表明，如果摩洛哥坚持到底，西班牙人还要花费不少的力气。问题不在于摩尔人的非正规部队的抵抗，因为他们绝不可能击败训练有素的军队，只要后者集结在一起而且能够得到给养；问题

在于这个国家非常落后，除了城市以外不可能夺取到任何别的东西，而且甚至从城市也不可能取得给养，因此必须把军队分散在大量的小据点上，而这些小据点终究不足以保证夺得的城市之间的变通经常畅通无阻，而且这些小据点要取得给养，就得派出大部分军队去护送运输队通过没有道路的、经常出现摩尔猎兵队的地区。大家知道，法国人在征服非洲的战争的最初五六年间，是怎样向布利达和梅代阿这样的城市供应粮食的，更不必说离开海岸较远的驻地了。应该知道，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欧洲军队很快就会疲惫，因此进行历时6个月或12个月的战争对于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是非同儿戏的。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首先进攻的目标当然是丹吉尔。从泰图安到丹吉尔要经过一个山口，然后往下进入一个河谷。这完全是内陆地区，附近没有汽船运送给养，也没有道路。距离大约是26英里。奥当奈尔元帅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走完这一段距离而且必须留多少人在泰图安呢？据报道，他曾说好像需要两万人来扼守该城，但是这显然过分夸大了。用一万人驻守泰图安及其郊区，以一个旅驻守圣马丁的营垒，这一个地区就很安全了。这样一支队伍随时都可以作战，而且有足够的兵力击退摩尔人的任何进攻。对丹吉尔，可以由海上进行轰击来夺取，守备部队也可以由海上运往这个城市。关于拉腊什、萨累和摩加多尔情况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西班牙人打算这样做的话，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行军到泰图安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摩洛哥再坚持一年，那末西班牙人要迫使摩洛哥求和，还必须在军事方面好好学习一番。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2月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0年3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96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萨瓦、尼斯与莱茵³⁶⁹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2 月

1860 年 4 月初以单行本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

—

自从波拿巴、皮蒙特、俄国三者之间的阴谋开始暴露在大众眼前以来，已经一年了。起初是新年谈话，接着是向“意大利的伊菲姬尼亚”求婚，然后是意大利的哀鸣，最后是哥尔查科夫承认他和路易·拿破仑缔结了书面条约。³⁷⁰而在这中间，又是扩军备战，调动军队，威胁恫吓和调解的尝试。当时，在最初的时刻，整个德国都本能地感觉到：现在问题不在于意大利，而是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利害。问题将起于提契诺河，但最后将在莱茵河结束。一切波拿巴战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夺回法国的“自然疆界”——莱茵河疆界。

但是，因为法国人对于莱茵河这一自然疆界的隐蔽要求而陷于不可言状的恐怖中的那一部分德国报纸，即以奥格斯堡“总汇报”为首的报纸，却以同样不可言状的狂热替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作辩护，所持的理由是：明乔河与波河下游是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自然疆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奥尔格斯先生发动了他的全部战略机构来证明：没有波河和明乔河，德国就要灭亡，放弃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就是背叛德国。

这样，事情就被弄颠倒了。非常明显，说莱茵河受到威胁只不过是借口，其目的在于保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专制统治。所谓莱茵河受到威胁，就是要唆使德国一致拥护奥地利对北意大利的奴役。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滑稽的矛盾：同样的理论，用在波河他

们就加以维护，用在莱茵河他们却加以非难。

本文作者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波河与莱茵河”。正是为了民族运动的利益，作者反驳了明乔河疆界论；他试图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末法国要求占有莱茵河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总而言之，作者想使德国人能以洁白之身投入当前的斗争。

作者的目的究竟达到了多少，可以让别人去判断。我们没有见到有任何人企图本着科学的精神反驳那本小册子所作的分析。虽然那本小册子反对的主要对象——奥格斯堡“总汇报”曾答应要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论文，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它只是从“东德意志邮报”³⁷¹转载了三篇论文，而这些论文的批评也仅仅限于宣称“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是“小德意志派”，因为他想放弃意大利。但是无论如何，据我们所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此以后就不再提明乔河疆界论了。

然而，这种迫使德国一致拥护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和政策的企图，却外北德意志的哥达党的庸人们造成了反对民族运动的有利借口。最初的运动是真正的民族运动，它比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旧金山的一切席勒纪念活动³⁷²都具有更强烈得多的民族性质；这个运动是自然地、本能地、直接地发生的。至于奥地利对意大利是否享有权利，意大利是否要求独立，明乔河线是否需要，——这一切在当时对这个民族运动来说都无所谓。既然我们之中的一个遭到攻击，并且是遭到与意大利毫无关系而对于夺取

见本卷第 247—299 页。——编者注

莱茵河左岸地区却有很大兴趣的第三者的攻击，那我们就应当联合起来反对他，反对路易-拿破仑和法兰西帝国的传统。人民本能地而且是完全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是，哥达自由派的庸人们老早就不把德意志奥地利看做是“我们之中的一个”了。战争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为战争可以削弱奥地利，从而最后促成小德意志帝国或大普鲁士帝国的产生。北德意志的庸俗民主派有许多人附和他们，这些人指望路易-拿破仑能打败奥地利，然后让他们把整个德国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有一小部分住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侨民也附和他们，这些人竟恬不知耻地公开和波拿巴主义勾冶。但是，我们坦白地说，他们的最有力的同盟者是那些永远不敢正视危险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怯懦性；为了哀求把自己的死刑缓期一年执行，他们会背叛自己的忠实的同盟者，从而在没有同盟者的情况下为他们自己今后的失败作出更可靠的保证。和这些怯懦之辈携手同行的是某些过于聪明的人，他们经常有千百个决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理由，但是却有更多的借口来高谈阔论。除了上述借口之外，他们对一切都表示怀疑。对于规定把莱茵河左岸地区让给法国的巴塞尔和约表示欢迎，而当奥军在乌尔姆³⁷³和奥斯特利茨败北时又暗中庆幸的，就是这班过于聪明的人，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耶拿的来临，柏林是他们的聚集地。

这伙人的同盟胜利了。德国背弃了奥地利。然而，奥军在伦巴第平原上打得非常英勇，使敌人为之惊讶，使所有的人都为之赞叹，但只有哥达党人及其追随者除外。操场上的刻板操练、驻

耶拿——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1806年10月14日普军在耶拿城下遭到失败。由于这次失败，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屈膝投降。——编者注

地内的严酷管教、军士的棍棒，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磨灭德国人的无穷无尽的战斗力。虽然装备简陋、装具沉重，但这些未经战火、没有经验的部队面对着久经战斗、服装轻便、装备灵巧的法军，行动像老兵一样镇定；只是由于奥军指挥的极端无能和步调不一，才使这样的部队打了败仗。但这是怎样的败仗呢？敌人没有得到战利品，没有得到军旗，几乎没有得到火炮，也几乎没有俘虏；敌人所缴获的唯一的军旗是在战场上尸体堆中捡来的，而未受伤的俘虏也只是意大利或匈牙利的逃兵。奥军从普通兵到少校都获得了荣誉，而这个荣誉差不多完全属于德意志奥地利人。意大利人是不能用的，他们大部分已被遣散，匈牙利人不是成群结队地投降，便是非常不可靠，克罗地亚人在这次战争中比平时的表现坏得多。只有德意志奥地利人才完全有资格享受这个荣誉，尽管他们因为指挥不良而首先蒙受了耻辱。

这种指挥是道地的旧奥地利式的。居莱一人的无能所不能做的事，却由于权奸和弗兰茨·约瑟夫的存在而造成的指挥不统一所完成了。居莱向洛美利纳进攻，刚一到卡萨勒—亚历山大里亚地区，便立即停止前进；结果进攻全部失败。法军毫无阻挡地和撒丁军队会合了。为了充分表明他确已无能为力，居莱命令在蒙特贝洛附近进行侦察，就好像他预见想要表示，在军事指挥上那种猜疑摸索和慎重考虑的旧奥地利精神至今仍然存在，犹如在已寿终正寝的宫廷军事会议³⁷⁴时代一样。他把主动权完全让与敌人。他把自己的军队由皮阿琴察一直摆到阿隆纳，以便按照惯用的奥地

参看“泰晤士报”记者自奥军兵营发出的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的报道。在卡夫里阿诺，以志愿者资格参战的老炮兵总司令努根特，曾尽一切力量派遣一些边屯营投入战斗，但枉费心机。

利方式，做到各地都有直接掩护。拉德茨基的传统仅仅过了 10 年就被遗忘了。当敌人在帕勒斯特罗附近进攻的时候，奥军各旅进入战斗如此缓慢和分散，以致每一个旅总是在其他旅还未到达以前便被逐出阵地。而且，当敌人真正进行机动（这一机动的可能性使洛美利纳附近的整个阵地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即由韦尔切利向博法洛拉侧敌行军的时候，当终于有机会向诺瓦拉攻击，以阻止敌人这个大胆的机动，并利用敌人所处的不利态势的时候，居莱却惊惶失措，急忙回头渡过提契诺河，想绕一个弯从正面拦阻进攻的敌人。6 月 3 日晨 4 时，正在退却的时候，海斯到了罗察特的大本营。在维罗那重新恢复了的宫廷军事会议，看来恰好在这个决定性时刻对居莱的能力发生了怀疑。因此，现在这里便出现了两个总司令。根据海斯的提议，所有纵队都停止不动，一直到他确信对诺瓦拉攻击的时机已经错过而不得不让事态自然发展时为止。这其间几乎过了 5 小时之久，而部队的运动也中断了 5 小时。在 6 月 4 日整整一天内，零零落落的纵队才陆续到达马振塔，既疲倦又饥饿；但是他们仍然英勇作战并且获得了卓越的胜利，一直到麦克洪违反由土尔比哥直取米兰的命令，转向马振塔并袭击奥军翼侧时为止。这时，法国其余各军都来到了，但奥地利各军却迟迟不到，于是会战失败了。奥军的退却非常缓慢，以致有一个师在梅累尼亚诺遭到法国整整两个军的攻击。其中一个

参看“泰晤士报”驻奥军的第一个记者布莱克利上尉的说明，他曾就这一事实在“泰晤士报”上做了报道。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³⁷⁵替居莱辩护，说行军中中断 5 小时乃是由于一种从工作上考虑不能向外宣布的事件所致，不过不管居莱的意愿如何，这一事件却决定了战斗的失利。但是，布莱克利已经说明了这个事件是什么。

旅抗击法国六个旅，坚守这个据点达数小时之久，一直到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员以后才开始退却。最后，居莱被撤换了。军队由马振塔绕过米兰沿一个大圆弧退却，但是仍然来得及比沿较短的弦运动的敌人先到达卡斯提奥涅与洛纳托附近的阵地（对追击竟考虑得这样少！）。据说这个多年以来便为奥军周密勘察过的阵地，好像是弗兰茨·约瑟夫亲自为他的部队选择的。事实上这个阵地早已列入四边要塞区的防御体系，是一个可以用反冲锋的方法进行防御的极好的阵地。在这里，奥地利军队终于与现在开来的或在这以前一直留作预备队的增援部队会合了。但是当敌人刚到达基泽河的西岸时，又立刻发出了退却的信号，于是军队退到了明乔河东面。这个行动刚结束，奥军就又回头渡过这条明乔河，想从敌人手中夺回刚才自愿让给敌人的阵地。奥地利军队就是在这种 *ordre, contre ordre, désordre* [朝令夕改、一片混乱] 的情况下，在对最高统帅已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在索尔费里诺进入战斗的。这是一场混乱的厮杀；无论在法军方面或者在奥军方面，都谈不上战术的指导。奥地利将军们的较严重的庸碌无能、惊惶失措和怕负责任的情况，法军师、旅长们的较坚强的信心，以及法军所固有的并在阿尔及利亚达到了完善地步的那种成散开队形和在居民点作战的优越性，——这一切正是使奥军最后被逐出战场的原因。于是，战争便结束了。有谁能比可怜的奥尔格斯先生更欢欣若狂呢？他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方法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夸奖奥军的最高统帅，而且用一些明智的战略理由为他的行动辩解。

路易·拿破仑也完全满意了。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给他的荣誉虽然不算很大，但已经比他有权期望得到的为多了；并且在险恶的四要塞之间，奥军不再由于自己将军的无能而挨打的时候

刻总是会到来的。此外，普鲁士也进行了动员，而无论是法国在莱茵的军团，或者是俄国军队都没有作战准备。简单地说，在直至亚得利亚海的地区内建立自由意大利的想法被放弃了。路易·拿破仑提议媾和，于是签订了维拉弗兰卡条约。法国没有得到一寸土地；它把割让给它的伦巴第慷慨地赠给了皮蒙特；它是为了观念而战，它怎么能考虑莱茵疆界呢！

在这时候，中意大利暂时并入皮蒙特，北意大利王国成为当时颇为可观的力量。

意大利本土旧有各省和撒丁岛共有人口	4 730 500 人
伦巴第(曼都亚除外)	约 2 651 700 人
托斯卡纳	1 719 900 人
帕尔马与摩地那	1 090 900 人
罗曼尼亚(博洛尼亚、费拉拉、腊万纳与佛利)	1 058 800 人
共 计(根据 1848 年资料).....	11 251 800 人

国家的面积由 1373 平方德里 增加到 2684 平方德里。因此，如果北意大利王国最后能建成，它就可能是头等的意大利国家。除它以外，剩下的只有：

威尼斯	2 452 900 人
那不勒斯	8 517 600 人
教皇国的其余部分	2 235 600 人
共 计.....	13 206 100 人

因此，仅仅北意大利拥有的人口就相当于意大利其余各地区人口的总和。根据财政和军事力量以及居民的文明程度，这样一

1 德里等于 7420 米。——编者注

个国家在欧洲可以要求取得高于西班牙而仅次于普鲁士的地位，而且，因为它确信意大利其余各地对它日益增长的同情，所以它无疑是会要求这个地位的。

但这却不是波拿巴政策所希望的。法国大声疾呼地宣称，它现在不能容许，并且将来也不会容许意大利统一。法国人把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理解为在波拿巴庇护下以教皇为名誉首脑的意大利的莱茵联邦之类的东西，理解为以法国霸权代替奥地利霸权。同时，在中意大利建立厄特鲁里亚王国，即为日罗姆·波拿巴的继承者建立意大利的威斯特伐里亚王国³⁷⁶这种善良的想法也流传开来了。但是北意大利王国的团结把所有这一切计划都打破了。junior [小] 日罗姆·波拿巴在周游各公国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甚至连一张选票也没有得到；建立波拿巴主义的厄特鲁里亚，和复辟一样，都是不可能的；除了并入皮蒙特以外，别无他法。³⁷⁷

但是，随着北意大利统一的不可避免性的日益明显，法国进行这次战争所追求的“观念”也就更为明确了。这就是把萨瓦和尼斯并入法国的观念。还在战争期间，便已经发出了种种呼声，指出这种合并是法国干预意大利事务的代价。但是没有人听。难道维拉弗兰卡条约不是驳倒了这种说法吗？虽然如此，全世界还是突然得知：在 *regalantuomo* [温雅的国王] 的民族的和立宪的制度下，两个法国省在外国的统治下呻吟，这两个只是由于粗暴的力量才离开了祖国的法国省，以充满泪水和期望的双眼凝视着伟大的祖国；路易·拿破仑再不能对于由尼斯和萨瓦发出的绝望呼号充耳不闻了。

无论如何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尼斯和萨瓦是路易·拿破仑同意威尼斯和伦巴第归并于皮蒙特而要求的代价，他所以要求以这个为代价而同意中意大利并入皮蒙特，是因为目前不能取得威尼斯。现在，波拿巴在尼斯和萨瓦的代理人开始玩弄无耻的手腕，被收买的巴黎报纸也开始叫嚣说，皮蒙特政府在这些省份中压制大声疾呼地要求与法国合并的人民的意志。现在，在巴黎竟有人公开地说，阿尔卑斯山是法国的自然疆界，法国有权占有这些山脉。

二

如果法国报纸说，萨瓦在语言上和风俗上和法国接近，那末这种说法至少用于瑞士法语区、比利时瓦伦区以及拉芒什海峡的英属诺曼底群岛也是同样正确的。萨瓦人民讲的是南法兰西方言；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标准语到处都是法语。意大利语的成分在萨瓦是如此之少，以致法兰西民间语（即南法兰西或普罗凡斯民间语）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渗入皮蒙特直到多腊-里帕里亚河和多腊-巴尔特亚河上游地区。虽然如此，在战前并没有听到过任何同情并入法国的说法。只是在同法国有某些贸易来往的下萨瓦的个别人中间偶尔有过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对当地广大居民来说，就像在其他所有与法国接壤而操法语的地区一样，是毫不相干的。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在1792年到1812年期间曾受法国统治的那些地区中，没有一个有丝毫想要回到法国鹰的卵翼之下的愿望。虽然它们已尝到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果实，但是它们极端厌恶严格的集权统治、地方长官的管辖以及巴黎派来的文明传教师永无过错的说教。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法国的同情，但是波拿巴主义立刻又断送了这种同情。谁也不愿意输入拉姆别萨、凯恩和*loi des suspects*³⁷⁸。此外，法国对一切进口贸易几乎都采取了中国式的闭关自守政策，这一点在边境地区感到特别厉害。第一共和国在各个边境地区遇到的都是被压迫的、民生凋蔽的省份，都是四分五裂的、被剥夺了普通的自然

利益的民族，它使这些省份和民族的农村居民得到了解放，使那里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得到了振兴。但是第二帝国在各个边境地区所碰到的情况，却是那里原来享有的自由比它所能给与的自由还要多；它在德国和意大利所碰到的是强烈的民族感情，在各个小国内所碰到的是结合在一起的个到的利益，在这工业发展非常迅速的 45 年中，这种利益增长了，并且在各方面都和世界贸易交织在一起。除了罗马凯撒时代的专制统治，除了把商业和工业关闭在它那关税壁垒的大牢狱之内，第二帝国没有给它们带来任何东西，最多不过是给它们一个可以自愿滚开的权利。

萨瓦与皮蒙特被阿尔卑斯山主脉隔开，因而萨瓦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差不多都是从北面的日内瓦和部分地从里昂取得的，正如位于阿尔卑斯山山口以南的德森州仰赖于威尼斯和热那亚一样。即使这种情形是使萨瓦和皮蒙特分离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萨瓦并入法国的理由，因为萨瓦的商业主要仰赖于日内瓦。这不仅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而且也是法国的关税立法过于聪明和法国海关吹毛求疵的结果。

但是，尽管种族上血统亲近、语言上有共同性，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但是萨瓦居民似乎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他们有一种传统的意识：不是意大利征服了萨瓦，而是萨瓦征服了皮蒙特。当时，全省强悍的山民以萨瓦为中心，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家，后来又下山进入意大利平原，采用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依次兼并了皮蒙特、蒙费拉托、尼斯、洛美利纳、撒丁和热那亚。这个王朝建都于都灵，成为意大利王朝，但是萨瓦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发源地，并且萨瓦的十字徽号到现在还是由尼斯到里米尼、由桑德里

奥到锡耶纳的北意大利的国徽。法国在 1792—1794 年的战争中征服了萨瓦，在 1814 年以前，该地被称为 Département du Mont-Blanc [芒勃朗省]。但是在 1814 年，它根本不想再成为法国的领土了；当时唯一的问题是：并入瑞士呢，还是与皮蒙特恢复旧关系。虽然如此，这个省仍然是法国的，一直到“百日”³⁷⁹终了时为止；后来，它被归还给皮蒙特。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历史传统逐渐减弱了；萨瓦不被注意了，而皮蒙特的意大利各省却获得了压倒一切的意义；皮蒙特的政策愈来愈着重于关心东方和南方。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立主义倾向表现得最多的仍是那个自命为历史传统的特权代表的阶级——旧的、保守的、教皇至上主义的贵族；当旧的寡头政治的贵族制度还在瑞士居于统治地位时，这个阶级一直企图使萨瓦并入瑞士；只是从瑞士普遍施行民主制时起，他们这种企图看来才改变了方向；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之下，法国已变成了极其反动的、教皇至上主义的国家，因此它就成了萨瓦贵族逃避革命的皮蒙特政策的避难所。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根本不存在任何想要使萨瓦与皮蒙特分离的要求。在萨瓦的上部地区，即在莫里延、塔兰特兹和上萨瓦，居民坚决主张维持 status quo [现状]。在热涅维、佛西尼和沙布累，如果什么时候有必要变动时，居民宁愿并入瑞士。只是在下萨瓦的某些地方，以及在全省的反动贵族中间，有人发出赞成并入法国的呼声。但是这种呼声是这样微弱，甚至在莎姆伯里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坚决表示反对，连反动贵族（见科斯塔·德·波勒加尔的宣言）也不敢承认他们同情这种呼声。

这便是关于萨瓦民族成分和民意的全部情形。

那末，从问题的军事方面来看，情形怎样呢？占有萨瓦对于

皮蒙特有什么战略上的利益，而对于法国又有什么利益？萨瓦转入他人之手，对毗邻的第三个国家——瑞士又有什么影响呢？

由巴塞尔到布里昂松，法国的疆界形成一个凹度很大的大圆弧，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和萨瓦的全部都在这里嵌入法国疆界。如果我们在这个圆弧上作一弦，那末为它所切断的这一块弓形地将几乎完全为瑞士法语区和萨瓦所填满。如果法国的疆界推进到这个弦上，那末从洛特布尔到弗列茹斯的一段疆界便会形成一条像从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那样的直线，不过这条线在防御上具有与洛特布尔—敦克尔克线完全不同的意义。北部疆界仍然是完全暴露的，而东部疆界的北段则有莱茵河作掩护，南段则有阿尔卑斯山作掩护。事实上，在巴塞尔和勃朗峰之间的那段疆界，没有一处是用自然界线划分的，正确些说，这里的“自然疆界”是沿着到埃克留斯堡垒的汝拉山脉这一条线走的，从那里起再经过阿尔卑斯山支脉，这些支脉从勃朗峰向南延伸，环绕阿尔夫河谷，最后也伸展到埃克留斯堡垒附近为止。不过，如果自然疆界成为一个凹形的圆弧，那末它便不能完成它的任务，因此也就不再是自然疆界了。既然如此不自然地使我们的疆界向里弯进去的这个凹曲的弓形地带的居民在“语言、风俗和文化”方面说来又都是法国人，那末难道就不应当改正自然界所造成的错误，实际上恢复理论所要求的外凸形状或者至少使它成为一条直线吗？难道住在自然疆界那一边的法国人就应当作为 *lusus naturae*（自然界恶作剧）的牺牲品吗？

这种种波拿巴主义的理由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兼并的阴谋没有彻底失败以前一直接二连三地实行兼并的第一帝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最完善的疆界也有可以修正和改善的缺陷；如果不是需要节制一下的话，这种兼并可以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至少从

上述论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民族成分方面或者从法国的军事利益方面来说，为吞并萨瓦而制造的一切说法，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瑞士法语区。

由田达山口向北北西方向延伸的阿尔卑斯山脉，在很像皮蒙特、萨瓦和法国三国边界上的界桩的蒙塔博尔山整个转向北北东，而在皮蒙特、萨瓦和瑞士三国交界处热安峰更向东偏折。所以，要想使阿尔卑斯山脉成为法国由蒙塔博尔山到热安峰的自然疆界，就只有使这一疆界从热安峰成一直线直达巴塞尔。换句话说，就是使萨瓦并入法国的要求内包含着兼并瑞士法语区的要求。

在阿尔卑斯山主脉形成两国目前疆界的这整个地段上，总共只有一条石铺的山道——蒙热涅夫尔。除此以外，还有达尔仁特腊山口，这个山口由巴尔塞洛内特通至斯图腊河谷，这里可以通行炮兵；另外可能还有一些骡马道，这些道路稍事修补，便可以通过各种兵器。但是，因为萨瓦和尼斯各有两条石铺山道穿过阿尔卑斯山主脉，所以任何一支进攻的法国军队，如果还没有控制这两个省，至少要先占领其中的一条山道，才能越过阿尔卑斯山。不仅如此，如果法国进攻，出蒙热涅夫尔山口只能保证对都灵的直接攻击，而萨瓦的两个山口——蒙塞尼，特别是小圣伯纳德却造成侧击的可能。对于进攻的意大利军队来说，经由蒙热涅夫尔山口去攻击法国的心脏必须进行很大的迂回运动，而通过蒙塞尼山口却有由都灵去巴黎的大道。因此，任何一个统帅都不会想到把蒙热涅夫尔山口作别的用途，除非是把它用作辅助纵队的通路，然而主要的作战线则一定要通过萨瓦。

所以，占有萨瓦，首先就会使法国获得一个进攻意大利时必不可少的地区，不然，它就得预先夺取它。采取守势的意大利军

队当然任何时候也不会为了保卫萨瓦而进行决战，但是他们可以用积极的山地战和破坏道路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把敌人的进攻牵制在阿尔克河和伊泽尔河上游河谷（蒙塞尼大道和圣伯纳德大道正经过这里），然后凭借封锁山道的堡垒，在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北坡再据守一些时候。在这里，就像在一般的山地战中一样，当然谈不到绝对的防守；决战将拖到敌人冲下平原时进行。但是，这无疑将保证赢得时间，这对集中兵力进行大会战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像意大利这样一个狭长而缺乏铁路的国家（和密集地布满良好的战略铁路网的法国来比较），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法国在战前就已占有萨瓦，意大利无疑会失掉这段时间。意大利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单独与法国作战；如果它在将来有同盟者的话，那末两军在萨瓦可能势均力敌。这样一来，阿尔卑斯山脉的争夺战将具有持久的性质；在最坏の場合，意军总能在山脉的北坡支持一段时间，如果北坡失守，它就会与法军争夺南坡，因为只有控制了这两面山坡并越过山脉，才能成为山脉的主人。但是，进攻者是否有力量和决心在平地上追击防御者，这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1792—1795年间在萨瓦进行的各次战局便是这种持久的山地战的例子，当时双方的军事行动都拖沓、犹豫和没有信心。

1792年9月21日，孟德斯鸠将军侵入萨瓦。防守该地的1万名撒丁军队以当时惯用的方法分散为极长的哨兵线，以致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集中足够的兵力进行抵抗。莎姆伯里和蒙美利安被占领，法军迅速地沿山谷一直挺进到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山麓。当时山岭还完全在撒丁军队手中，他们于1793年8月15日经过几次小战斗后，即在戈登将军指挥下转入进攻，当时法军因派遣部队围攻里昂而被削弱，被他们从阿尔克河和伊泽尔河谷地赶回蒙

美利安。被击败的法军纵队在这里同他们的预备队会合。凯勒曼从里昂折回，立即（在9月11日）转入进攻，没有遇到很大困难又把撒丁军队击退到阿尔卑斯山的山口；不过他的力量也因此而用尽了，于是他到了山麓附近就不得不停止前进。但是，1794年阿尔卑斯军团增加到75000人，而与之对抗的皮蒙特军队则只有4万人，此外大概还有一支未担负任务的由1万名奥地利人组成的预备队。虽然如此，法军起初的攻击，无论在小圣伯纳德山口或者在蒙塞尼山口，都没有成功，直到4月28日法军才终于占领了圣伯纳德，5月14日才占领了蒙塞尼山口，于是整个山岭才落入法军之手。

总之，为了在山这面从皮蒙特军手里夺得进入意大利的通道，法军曾不得不进行三次战局。如果说在目前条件下已不可能在这种有限的地区内在几次战局中这样毫无效果地作战，那末在双方兵力处于一定的均势的情况下，法军不仅将难以强行通过阿尔卑斯山山口，而且也将难以保留充分的兵力，以便迅速冲到平原。虽然萨瓦不能给意大利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一点也已经足够了。

反过来说，我们假定萨瓦与法国合并。那时意大利的处境将怎样呢？阿尔卑斯山的北坡在法军手中，意军只能够防守南坡，法军却可以从高高的山顶上瞰制南坡的堡垒和意军的阵地，或者至少可以监视它们，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可以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对它们进行迂回。这样，山地防御便成了意军最后的、最软弱的、而且可能引起重大伤亡的行动。萨瓦山地战所能提供的那种进行侦察的可能性也就完全没有了。但还不仅如此。法国在夺取萨瓦以前，它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以此为满足，从而迫使意大利采取消极防御；得到一定的结果后，它可以把军队更好地用到其他地方去；

不把过多的兵力放在这个战场上，对法国是有利的。相反，如果萨瓦完全成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末按法国方式进行攻势防御是有利的。消极防御在整个战局过程中造成的人员牺牲会和进攻意大利时同样的多；进攻所需的兵力多不了多少，而前途却完全两样！

在兼并萨瓦后的第二天，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将进入阿尔克河和伊泽尔河的河谷，探索偏谷，翻山越岭，讯问最好的阿尔卑斯山的向导，丈量距离，测绘地形，详细地记录一切情况；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旅行者偶然的兴会，而是根据既定的，也许是现在就已经准备好的计划进行的。随着这些军官的到来，很快就会出现工程师和承包商；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在这些高山中最僻静的深处，将会敷设道路，建筑石质工事，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偶然的旅行者大概都不能说出它们的用途来。它们既不是为当地农民而修，也不是为旅行者而建，它们的目的仅在于使萨瓦天然的战略特性臻于完善。

蒙塞尼山口和蒙热涅夫尔山口一样，都是通往苏扎的。如果这两个山口的南坡受到法军攻击，防守山口的意大利部队就会陷入真正的陷阱。他们无法知道，主攻将来自何方；但是，他们预先知道，如果法军强行通过其中的一个山口并占领苏扎，那末防守另一个山口的部队将被截断后路。如果蒙塞尼山口首先被强行通过，那末防守蒙热涅夫尔山口的部队还可以由山径避开费涅斯特雷利谷地而仅仅损失其马匹、火炮和辎重；但是如果进攻者通过蒙热涅夫尔山口进入苏扎，那末蒙塞尼山口的守军就会丧失一切退却的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两个山口的防御就只限于采取简单的佯动。同时，构成法军的两条作战线的两条道路，即由格勒诺布尔到布里昂松和由莎姆伯里到兰列布尔的两条大道，大

致上是平行的，中间只隔着一条起自蒙塔博尔山的密布着许多人行山道和骡马道的山脉。只要在这个山脉上修筑一条 4 德里长的横贯道路，法军便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兵力由这条大道调到那一条大道；这样，陷阱就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阿尔卑斯山战线为对付来自意大利的进攻而进行的防御在这一边也将会格外加强。

其次，在萨瓦还有一个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小圣伯纳德。法国许多权威人士都断言，如果拿破仑在跨越阿尔卑斯山时所选择的山口不是大圣伯纳德而是小圣伯纳德，那也许要更正确一些；因为小圣伯纳德比较低，因此春季融雪较早，并且一般比较容易通过。由里昂和伯桑松出动的法军纵队至少可以同样容易地在阿尔贝维耳和洛桑会合；这两个山口又都可以通往阿奥斯塔和伊符雷。关于究竟哪一个山口对于拿破仑在 1800 年的战局更有利这个问题竟能引起争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小圣伯纳德山口在军事上多么重要。当然，要想使小圣伯纳德山口能够用来重复以前在马连峨进行过的那种战略的迂回运动，必须有完全特殊的条件。在现代战争中，作战的兵力要巨大得多，排成一个纵队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我们时代，谁敢用 3 万人的纵队去进行迂回运动，在大多数场合无异是自取灭亡。对于第一次或第二次战局说来，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当双方顽强进行的一切战争由于出现了现代的要塞群和营垒而具有另一种性质——持久性的时候，当双方的力量没有被一连串的战局逐渐消耗殆尽，战争的结局就不能最后决定的时候，军队的人数最后就会愈来愈少。假定说，战争在北意大利平原上进行数年之久而双方互有胜负；这时已占领了卡萨勒或者亚历山大里亚，或者把两个城市全都占领了的法军，后来又被逐回阿尔卑斯山那边；在这里

双方兵力都已大大削弱，那他们就会停止行动。但是，在现代，在有铁路网以及到处都已把火炮的重量减轻了的情况下，通过小圣伯纳德山口把 3—4 万或者更多的军队调到伊符雷去，难道还会费很大的事吗？法军可以由伊符雷开向他们平原上的筑垒基地，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必需的一切，并且可以从守备部队中得到补充；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话，那末即使更强大的敌军部队也不能把他们通往都灵的道路和通过这两个最近的山口的退路截断。那时，上述的 3—4 万军队加上守备部队便会形成相当可观的力量；在最坏的场合也可以先击退当面的敌军，然后在自己营垒周围作战，并且有很大的希望获得胜利。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到 1814 年时军队缩减得多么厉害，而拿破仑在这一年又以怎样少的兵力获得了怎样大的战果，这就可以明白了。

如上所述，通往圣伯纳德山口的大道是沿着伊泽尔河谷走的，而通往蒙塞尼山口的大道则是沿着阿尔克河谷走的。这两条河流都发源于蒙特伊泽兰山口附近。在布尔克-圣莫里斯上方，通往圣伯纳德山口的大道离开河流而越过山岭，而狭谷（廷恩谷地）则向右转向南逐渐升高。在兰列布尔下方，即特尔米尼昂附近，有一小偏谷（圣巴特耳米谷地）伸入阿尔克河谷。自廷恩谷地起，有三条小道经过蒙特伊泽兰山口与蒙沙弗卡列之间的山岭通往圣巴特耳米谷地。这三条小道中有一条完全可以铺成石路。如果在这里敷设一条道路，同上述的横贯道路联结起来，萨瓦——作为法国边境的一省——的战略道路网就相当发达了。如果在阿尔卑斯山主脉后面直接有一条道路联结三个主要山口，就可以在两天内把主力部队从圣伯纳德和蒙热涅夫尔调到蒙塞尼地区，并在四五天内从这一翼调到另一翼。如果再在这个道路网上加上两条道路：

一条从穆蒂埃经过普罗洛尼恩的山口到圣巴特耳米和兰列布尔，一条从穆蒂埃到圣让德莫里延，那就很难再增加什么了。留下的事情仅仅是为了加强（但不是为了完全阻塞）而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并保护作为中央基地的主要道路交叉点穆蒂埃不受强大敌人的攻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铺设不到 25 德里的新道路。

如果这些道路或类似的道路修成了的话——毫无疑问，法国总参谋部已经有了在战略上充分利用萨瓦的现成计划，——阿尔卑斯山南坡的防御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如果有这样的道路网使得新的勒库尔布能够调动他的军队，那末他凭借着筑有工事的中央基地和小堡垒，在防御的情况下能够打出怎样出色的仗来呢？还是不要说，山地战在我们现代军队庞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可能的了。只有在军队真正庞大和决定的优势在某一方时，这种提法一般说来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夺取现代要塞时，军队在数量上将要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优势为均势所代替的情形也会经常出现。当然，没有必要是不会进入山地的，但由巴黎到意大利或者由意大利到巴黎的道路总是要通过萨瓦或者瓦里斯的。

总而言之，萨瓦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是由于它那些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如作为法国的一个省，能够使法军甚至在数量优势不大的情况下占领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境内的山坡，并向谷地出击，因而会发挥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作用。如果在战场上事先构筑一些工事，法军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即使在其他方面完全处于均势，他们也能够立即取得对敌人的优势；不仅如此，小圣伯纳德山口还会迫使意军向很远的地方派出掩护部队，那时法军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个山口进行决定性的攻击。

萨瓦在法国手中，与在意大利手中相反，只能成为进攻的武器。

那末，从瑞士的利益来看，情形怎样呢？

在现在的形势下，瑞士的一切邻国只能从正面进攻它。在这里，我们把不包括奥地利的南德意志看作一个邻国，而把奥地利看作另一个邻国，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两个国家并不总是一定采取一致行动的。南德意志只能沿巴塞尔到康斯坦茨的方向进攻，奥地利只能沿兰涅克到闵斯德一线进攻，意大利只能沿波斯基亚伏到日内瓦的方向进攻，而法国也只能沿日内瓦到巴塞尔一线进攻。瑞士军队的退却线到处都是在正面之后，与正面垂直；而与瑞士接壤的中立国家的领土到处都或多或少地掩护着它的翼侧。因而，如果只有一个邻国进攻瑞士，那末在战斗开始之前，是无法进行战略迂回的。只有奥地利在格劳宾登州附近占有侧击之利，但是，即使不是这样，瑞士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去格劳宾登州附近进行决战来回击奥军的进攻，而会在更靠西北方，在阿尔卑斯山麓进行决战。奥地利放弃了伦巴第，就使瑞士的这种有利形势变得更加有利；无论如何，在去年以前，奥地利本来有可能对瑞士的西南部进行向心进攻，这种可能性在山地的条件下而且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往往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样一种进攻的威胁也只限于格劳宾登、德森、乌利和格拉鲁斯诸州，就是说只限于人口最稀少而又极为贫困的这部分地区。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敌人由意大利来的道路不得越过哥达山口，他们的兵力就必然会大为分散。诸邻国目前这种对瑞士有利的配置，对瑞士来说具有比欧洲保证中立还要大的价值。这样一种配置使瑞士在受到一个邻国的进攻时，能够长期支持战斗，而这一点归根到底是这样一个小国所能指望的唯一的東西。

如果萨瓦属于法国或者为法军所占领，那就谈不上保卫由伯

尔尼汝拉山脉到下瓦里斯的整个瑞士法语区了。那时，日内瓦可能在一昼夜之内变成法军的基地；汝拉山脉如同策勒河到纽沙特尔湖和比尔湖防线一样，都是可以绕过的；法军将用不着在狭谷中作战，然后强行通过位于这两湖之间并穿过大沼泽的狭道，他们可以安然地通过瓦得州富庶的丘陵地区进行迂回，于是进行真正抵抗的第一道阵地也就会成为在伯尔尼之前、萨涅河和森泽河之后进行第一次大会战的阵地，因为由萨瓦经过维耳讷夫和斐维进行迂回的纵队将使在瓦得州进行的一切抵抗毫无作用。

截至目前为止，汝拉山仍是瑞士对付法国的第一道防线，对缺少经验但熟悉地形并有居民援助的民兵来说，这是一个出色的战场。但是由于蜿蜒曲折的国境线常常横断汝拉山的平行山脉，所以也不能够过分看重它。第二道更为重要的防线是策勒河，策勒河连接纽沙特尔湖和比尔湖并由比尔湖流入阿勒河。这道防线在右方为阿勒河下游所补充，左方为奥尔勃河所补充；后者在伊韦尔登附近流入纽沙特尔湖上端。策勒河在这两湖之间的长度仅半德里，而由比尔湖到阿勒河的长度也只是一德里。实际上，这个阵地的正面仅在这两个湖之间，它为低洼地上的大沼泽所加强，因为这个大沼泽由纽沙特尔湖扩展到阿尔堡，而且只有沿大道才可以通过。当敌军从右翼经过比尔格伦迂回这个正面时，可以用预备队在阿尔堡附近将其击退。更为深入的迂回则须要在阿勒河上架设桥梁，而且迂回者的交通线也会受到威胁。从左翼的迂回只有经过瓦得才可能实现，并且会依次遇到奥尔勃河、曼丘河、布鲁阿河等障碍。瑞士军队在这一线上的抵抗也不可能被敌人沿日内瓦湖向弗里布尔进行的迂回所粉碎，因为沿纽沙特尔湖退却的瑞士军队总是掌握有较短的道路。因此，虽然只有在特别有利的

情况下，在敌人犯了很大错误的条件下，策勒河上的阵地才适于进行决战，但是它仍然能够满足瑞士对它的一切要求：它能使瑞士阻滞敌人，甚至能使瑞士从西南部抽调出部队来。

但是，如果萨瓦掌握在敌人手中，由圣让哥尔弗经过维耳讷夫和夏特耳-圣德尼进攻的纵队就将使得在瓦得州进行的一切抵抗毫无作用，因为这个纵队既然到达斐维附近，它距弗里布尔的距离就差不多只比奥尔勃河上的瑞士军队距弗里布尔的距离远 2 德里，因此能够截断他们的退路。由圣让哥尔弗到弗里布尔约 12 德里；弗里布尔处在两湖之间的策勒河阵地左后方约一天行程的地方，距彼得林根（佩埃恩）3 德里，通过瓦得前进的法军纵队和萨瓦部队可能在彼得林根会合。因此，进攻者如占有萨瓦，便能够在三四天内通过罗尼河谷截断瑞士军队与瓦里斯的交通，夺取日内瓦、瓦得和弗里布尔直到萨涅河一带，而且主力能直捣策勒河阵地的后方，于是巴塞尔、左洛图恩、伯尔尼汝拉山脉和纽沙特尔便会落到他们手中。这些地方绝不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地区，恰恰都是瑞士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州。

因为瑞士感觉到萨瓦在战略上对它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它在 1814 年便完成了它的北部地区的有名的中立化，而在 1816 年又从撒丁取得条约的许诺：沙布累、佛西尼和热涅维除瑞士以外将不让与其他任何国家。因此路易-拿破仑到处放出风声，说他仅仅要求得到萨瓦的南部，而沙布累、佛西尼和到伊斯河畔为止的热涅维的一部分应归属于瑞士。但是要礼尚往来，据“泰晤士报”消息，他正利用福格特先生顺便询问一下瑞士州议会，问它是否同意因此而赋予他自由支配辛普朗山口的权利。这是第一次暗示说：辛普朗也是法国的一个自然界桩，正像它在第一帝国时代真的曾

经是法国的界桩一样。

假定说瑞士多了一个新的州——北萨瓦，那末，疆界就会由在勃朗峰和小圣伯纳德山口之间离开阿尔卑斯山主脉而通向罗尼河狭谷（埃克留斯堡垒）的那条山岭所形成，而且，看来这条疆界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个山岭却为来自伊泽尔河谷与罗尼河谷的下列道路所截断：（1）塞塞耳—日内瓦道路，（2）安讷西—日内瓦道路，（3）安讷西—崩维耳道路，（4）阿尔贝维耳—萨兰什道路。崩维耳和萨兰什一样，都有道路经过阿尔夫河谷的北面山岭通往托农。因此，瑞士是毫无屏障来阻挡对日内瓦湖南岸的托农的入侵的，并且因为由塞塞耳或者阿尔贝维耳到托农不超过15德里，所以占有北萨瓦，最多只能使瑞士多防御5天。但是因为对于这个新州的防御除了民团以外再不能派出什么部队，所以进攻的纵队也同样可以成功地由日内瓦直扑托农（5德里），而由这里去圣让哥尔弗仅约4德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北萨瓦只能使瑞士赢得仅仅3天的时间。况且，这只能使瑞士分散防御力量。受法国攻击的瑞士军队的退路，显然是沿低洼地区经过伯尔尼的这一路线，在那里如有可能就沿阿勒河到苏黎世，不然便是到琉森，然后由这两地进入莱茵河上游谷地。因此，瑞士军队不应当把他们的阵地向南推移得过远，以免被敌人赶出这些防线而逼进高山地区。我们已经看到，把瓦得州包括到瑞士的防御体系中还比较容易，但北萨瓦和因萨瓦不复中立而被暴露出来的瓦里斯肯定是不能够包括在这一体系中的。但是，大家知道，在这个以民兵担任防御的联邦制国家里，一旦遭到威胁时，每个公民都会多么强烈地希望保卫自己的乡土。显然，如果整个整个的城市和州毫无抵抗就让给敌人，军队就会抱怨，国民院议员就要

大声疾呼，何况这还是瑞士专门为了自己的防御而取得的一个新州呢！在总参谋部里，每个人都会竭力设法特别有效地保卫自己的疆土，而在民兵中，由于受平时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和温和态度的影响，纪律至少也是很松弛的，所以官长将很难维持部队的秩序。可以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官长十次有九次会犹豫不决，或者不得不忍让妥协。因此，占领北萨瓦的部队，将不会对防御有什么好处，而在退却之际还一定会吃尽苦头，其中有一部分会被驱逐到瓦里斯，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格米或者富尔卡的山岭重新和主力军会合。

对瑞士来说，唯一的保证就是北萨瓦既不属于法国也不属于瑞士；在这种情况下，北萨瓦在战时就能对于两国切实保守中立，而实际上却掩护了瑞士。如果它属于瑞士，那对于瑞士来说并不比它属于法国要好多少。萨瓦的意义只在于使瑞士赢得3天至多5天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大部分将会在以后防御瓦得州时失去。这与肯定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够在巴塞尔和日内瓦湖之间进攻比较起来，还有什么价值呢？

北萨瓦对瑞士来说等于丹璫人的礼物³⁸⁰。不仅如此，这种礼物还包藏着一种威胁。在这种场合下，法国将在军事上控制整个瑞士法语区，使它无法进行任何积极的防御。法国兼并南萨瓦以后，就会立刻提出把瑞士法语区也归并于它的要求。

三

大家知道，伯爵领地尼斯位于滨海阿尔卑斯山麓，它和热那亚省的疆界，通过切尔沃河附近的奥涅利亚以东一德里处向下一直伸到海边。尼斯西部操普罗凡斯方言，东部，即卢艾亚河东岸地区，则操意大利方言。但是除瓦尔河上一些村庄以外，标准语到处都是意大利语，只是在尼斯城里，由于外国人大量流入，法语和意大利语才不相上下。

为了正确地研究民族成分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下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地区各种语言的相互关系。

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凡是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交错的地方，意大利语总是处于劣势。它没有渗入阿尔卑斯山脉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格劳宾登和提罗耳的罗曼方言完全与意大利语无关。相反，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一切边缘地区的语言却夺取了意大利语的地盘。在威尼斯省的西部山区乌迪纳，说的是克莱纳—斯洛文尼亚语。在提罗耳，德语的成分在整个南坡和艾契河上游谷地占统治地位；更向南，在意大利语地区的中部，只有 *Sette comuni* 和 *Tredici comuni*³⁸¹ 是孤岛般的德语区；格里斯山南麓、德森的卡维尔诺谷地、皮蒙特的福尔马察谷地、辛普朗山麓附近的上迪韦德罗谷地，最后，还有玫瑰峰的整个东南坡、利斯、上塞齐亚和安察斯卡等谷地，都说德语。法语的疆界起自利斯谷地，包括整个阿奥斯塔谷地和从蒙塞尼起的科特阿尔卑斯山的东坡，因此，一

般都认为，波河上游所有河流都发源于法语区。通常认为，这个疆界是由德蒙特（斯图腊河畔）起，即田达山口稍西的地方起，到卢艾亚河并且沿卢艾亚河直到海边。

关于德语或斯拉夫民间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界限的问题，是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但是如果两种罗曼语相遇，而且它们既不是意大利标准语即 *il vero toscano*（真正的托斯卡纳语），也不是北法兰西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而是意大利语的皮蒙特方言和行吟诗人所使用的已经衰落了、变成无数种方言的南法兰西语（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一个不太确切但却是通用的叫法——普罗凡斯语——来称呼它），那末问题就不同了。无论谁，只要他哪怕是肤浅地研究过罗曼语比较语法或者普罗凡斯文学，都一定会立即看出，伦巴第民间语和皮蒙特民间语与普罗凡斯语非常近似。固然，在伦巴第语中，这种类似处仅仅限于方言的外形，例如：阳性元音词尾要省略，而阴性词尾在单数中仍然保留；同样，大部分元音词尾在变位时使这种语言带有普罗凡斯语的性质，而鼻音《n》以及《u》和《oeu》的发音却好像北法兰西语；但是构词法和语音实际上仍然是意大利语的，而特殊变化则正如勒托—罗曼语³⁸²中的特殊变化一样，多半很像葡萄牙语。皮蒙特方言在主要特点上和伦巴第方言

钥匙在拉丁语是 *clavis*，意大利语是 *chiave*，葡萄牙语是 *chave*，伦巴第语是 *cià*（其发音为“恰乌”）。去年夏天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登载的来自维罗那的一篇通讯（见奥地利大本营的报道）说：在街上，大家见面时常常说“恰乌，恰乌”。这家常常在语言方面犯错误的聪明的报纸，显然找不出一个钥匙来打开这个“恰乌”之迷。这个字应读为《s-ciau》（斯恰乌），类似于伦巴第语中的《schiauo》——奴隶，仆役，就如在我国彼此寒暄时说：“您的仆人，顺从的仆人”等一样。在伦巴第方言中，真正普罗凡斯语的形式我们记得只有两个：阴性过去时形动词的词尾为《da》（*am à, amada*）与动词现在时第一人称的词尾为《i》（*ami*——我爱，*saluti*——我致敬）。

非常类似,但是它比后者更接近于普罗凡斯方言,而且无疑的,科特阿尔卑斯山和滨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这两种方言非常相近,很难在它们中间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此外,南法兰西方言大部分甚至并不比皮蒙特方言更接近于北法兰西标准语。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民间语并不能作为解决民族归属问题的标准。操普罗凡斯语的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农民既容易学会法语,又同样容易学会意大利语,但是两种语言都同样用得很少;他们非常熟悉皮蒙特语,并且这一种语言也完全够用了。如果需要确定比较巩固的联系,那末只有使用标准语,而这种标准语在全皮蒙特和尼斯,显然是意大利语;唯一的例外是阿奥斯塔谷地和瓦尔德锡谷地,在这两个地区有些地方占优势的是法兰西标准语。

可见,企图以普罗凡斯方言作为论据(况且只是在半个省份使用的普罗凡斯方言)来论证尼斯在民族上属于法国,这根本没有道理。如果注意到在比利牛斯山的西面,包括阿腊贡、卡塔卢尼亚和瓦伦西亚,普遍都说普罗凡斯方言,虽然它在这些西班牙省份里受到加斯梯里亚语的一些影响,但不仅在总的方面仍然保持着远较法国任何地方都纯粹的形式,甚至还作为书面语存在于民间文学中,——如果注意到这点,那末,上述论证就更没有道理了。如果路易·拿破仑在最近的将来也以这三个省份在民族上属

意大利方言和普罗凡斯方言的不同点是:(1)在意大利语中⟨l⟩在辅音后面要元音化(fiore, piu, bianco),普罗凡斯语则不然;(2)名词复数由拉丁语的主格构成(donne, cappelli)。固然普罗凡斯方言和古法兰西方言,在中世纪同样有过这样一种主格的构成法,而其余各格则由拉丁语的宾格(词尾-s)构成。但是据我们所知,所有现代的普罗凡斯方言,都只是保存着后面这种形式。然而,在这两种方言交错的地区,还可能发生疑问:现在保留下来的主格形式是来自意大利方言还是来自普罗凡斯方言。

于法国为理由而要求占有它们，那西班牙该怎么办呢？

在伯爵领地尼斯要博得对法国的同情，似乎比在萨瓦还要难些。在农村中没有半点反应，在城市中，一切尝试遭到了比在莎姆伯里更加彻底的失败，虽然在这个海滨胜地，纠合一批波拿巴分子要容易得多。想使尼斯人加里波第成为法国人，——这个念头倒真是不坏！

如果萨瓦对于皮蒙特的防御具有巨大意义，那末尼斯就具有更巨大的意义。由尼斯去意大利有三条道路：一条是沿海岸直达热那亚的科尔尼切大道，第二条是经过奥涅利亚附近的纳瓦山口进入塔纳罗河谷到达切瓦的道路，最后，第三条是经过田达山口到达库内奥(科尼)的道路。固然，第一条道路最后为热那亚所遮断，但是进攻的纵队在阿尔班加附近以及更往下在萨沃纳附近都有机会经由良好的石铺大道越过亚平宁山，此外还有许多通过山脉的骡马道和人行小径；至于作战时如何利用这些道路，拿破仑在1796年已经做出了榜样。第三条道路(经过田达山口)对于尼斯说来，等于蒙塞尼对于萨瓦；它直通都灵，但没有任何侧击之利，即使有，也很少。而中间那条经过纳瓦山口的道路则直通亚历山大里亚，它在南方的重要性和小圣伯纳德在北方的重要性相同，不过它的作用更直接得多，偶然条件的影响也更小得多。另外，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距沿海道路非常近，在进攻时能够从那里得到很大的援助。沿纳瓦大道进攻的纵队在加列西奥附近便可以与顺沿海道路进抵阿尔班加的军队重新会合，因为由阿尔班加有一条横贯道路通到这里；过了切瓦以后，这条大道往下直通亚历山大里亚，途中经过位于切瓦与萨沃纳之间的卡尔卡勒，而与来自萨沃纳的另外一条路相连接。但是，在切瓦、萨沃纳和奥涅利亚之间有一些高山，因此不

能固守。此外，塔纳罗河的发源地一带的纳瓦山口的北坡也在尼斯境内，因此，谁在战前占有尼斯，山口便属于谁。

如果法国军队在战争开始之前便控制了尼斯，他们就可以由此地威胁向亚历山大里亚以西出动的任何意大利部队的翼侧、后方和交通线。所以，把尼斯让给法国，在军事上就等于把意大利军队的集结地点向后移到亚历山大里亚，并放弃皮蒙特本土的防御，因为整个说来，只有在萨瓦和尼斯才能够防守皮蒙特。

革命战争的历史在这方面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

1792年10月1日，昂塞尔姆将军率领9000人的一个师渡过瓦尔河，同时法国舰队（12艘战列舰和巡航舰）在尼斯前面离海岸1000步远的水面上抛了锚。尼斯居民因为同情革命而起义，力量薄弱的皮蒙特守备部队（2000人）匆匆退到田达山口，在萨沃尔日附近占领阵地。尼斯城热烈欢迎法军，但是法军却到处抢掠，焚烧农民的房屋，强奸农民的妻女，无论昂塞尔姆将军的命令或国民公会委员们的布告都无法维持秩序。这便是后来的意大利军团的最初的核心，波拿巴将军以后靠他们为自己取得了最初的荣誉。看来，波拿巴主义在初期总是要依靠流氓无产者的；没有十二月十日会他就永无出头之日。

交战双方对峙很久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法军占领了尼斯城及其四郊，以一个奥地利师加强了了的皮蒙特军队占领了以萨沃尔日附近地带为中心的坚固的筑垒阵地，在山上居高临下。1793年6月间，法军进行了几次总的说来没有什么效果的攻击；7月间，他们占领了通向敌人阵地后方的达尔仁特腊山口。在占领土伦（1793年12月）后，意大利军团得到很大的增援，同时波拿巴将军也暂时被派遣到他们那里。第二年春天，他向萨沃尔日附近的敌方兵

营发起进攻，4月28日大获全胜，于是法军就控制了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切山口。当时波拿巴建议让法军的阿尔卑斯军团与意大利军团在斯图腊河谷会合而攻占皮蒙特；但是他的计划未被采纳。不久以后，由于热月九日的政变³⁸³，波拿巴失掉了自己最有力的庇护者小罗伯斯比尔，同时也就丧失了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势力；他又成为一个普通的师长了。军队转入守势。只是在奥地利将军科洛勒多开始以惯常的迟缓行动向萨沃纳前进，企图截断法军与中立的热那亚之间的对法军极端重要的交通线时，波拿巴才有了攻击他的机会，并打败了他。虽然如此，通热那亚的道路仍然受着威胁；同时1795年的战局一开始就是把法军驱逐出整个热那亚沿海地区。这时，由于法国与西班牙媾和³⁸⁴，东比利牛斯军团得以抽出来调往尼斯，到11月已全部在那里集中。左滨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负责指挥的舍勒尔，根据马森纳制定的计划立即转入了进攻。当塞律里埃把皮蒙特军队箝制在田达山口时，马森纳沿高山地区作迂回运动，从后方到达洛阿诺，同时奥热罗又从正面攻击洛阿诺（11月23日）。计划完全成功了，奥军阵亡2000人，被俘5000人，损失火炮40门，并且同皮蒙特军队的联系完全被截断了。与热那亚的交通现在又有了保障，于是法军在整个冬季就稳然成为山地的主人。1796年春，波拿巴终于取得意大利军团的指挥权，于是情势大变。他凭借原由他控制的尼斯和波南特海岸，从萨沃纳向山地运动，在蒙特诺特、密雷栖霞和德果87大破奥军，并把他们与皮蒙特军队隔开，后者因被法军优势兵力包围，陷于孤立，经过几次后卫战以后，即匆匆签订和约。这样，在博尔米达河上游谷地与塔纳罗河谷地的四次胜利的会战保证了法军对整个皮蒙特的军事占领，直接攻击都灵甚至已经没有必要了。战争

立即转移到伦巴第，皮蒙特则成了法军作战基地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在战争的头三年中，意大利是完全以尼斯为屏障的。只是在第三次战局中，意大利才丧失了滨海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最后，只是在第四次战局中这些山口才被利用，并且是非常坚决地被利用了。在第一个星期的山地战斗后，仅仅经过一次有力的佯攻，就使皮蒙特军队了解到自己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必须投降了。这一次进攻几乎可以向米兰长驱直入；博尔米达河、德森州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整个地区，就轻易地落入了法军手中。

如果尼斯成为法国的一个省，那末，意大利对于法国就陷入了1794年战局后所处的那种地位。对法军敞开的就不仅是经田达山口到斯图腊河谷地的道路和经纳瓦山口到塔纳罗河谷地的道路了。因为要阻挡转入攻势的法军优势兵力向阿尔班加和萨沃纳前进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军在攻势开始三四日后就将位于1796年战局的出发地点。意大利军队的主力应当在哪里抵抗法军呢？在热那亚的沿海地区，没有他们展开的余地；而在贝尔博河和塔纳罗河以西，他们和亚历山大里亚、伦巴第及亚平宁半岛之间的交通线将受到威胁。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亚历山大里亚以南进攻并以联合兵力攻击由山地走出的独立纵队。但是，这当然一开始就要以放弃阿尔卑斯山疆界的防御为前提，因为不然的话，位于田达山口附近及其西部和西北部的部队就会被截断。换句话说，占有尼斯就会使法国控制阿尔卑斯山脉，使阿尔卑斯山不再成为意大利的屏障，同时，又使法国在军事上控制皮蒙特。

尼斯在南方给法国提供的侧击之利，和萨瓦在北方给它提供的侧击之利一样，只是尼斯提供的侧击之利更加直接、更加充分。既然尼斯和萨瓦各自都有使皮蒙特本土完全暴露在法军攻击面前

的作用，那末法国同时占有了这两省，会对皮蒙特具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啊！皮蒙特将被这两省像锯子似地夹住；沿着由小圣伯纳德四周直到纳瓦山口和萨沃纳上方的山道的全线，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佯攻，直到在一个翼侧阵地上发动真正的攻击并截断死死地堵在山地中的一切意大利部队时为止。意大利军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附近，在阿尔卑斯山一带仅留下警戒部队，一当发现主攻方向，立刻把集中的兵力派往该处。如果这竟成为事实，那末换句话说，这就等于不仅把阿尔卑斯山脉，而且把皮蒙特境内整个波河流域都拱手让给敌人，而意军抵抗法国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就将位于亚历山大里亚筑垒线以后。有萨瓦和尼斯作为前进堡垒，皮蒙特就是意大利的第一个作战基地；如果没有它们，从军事观点来看，皮蒙特便成了法国进攻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在皮蒙特领土上取得胜利并夺回在萨瓦和尼斯的各个山口，才能从法军手中重新夺回皮蒙特。

法国兼并萨瓦和尼斯，在军事上（就算不是在政治上）同兼并皮蒙特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将来维克多-艾曼努尔由都灵附近的 Villa della Regina〔女王别墅〕眺望那雄伟的但是一座山峰也不属于他的阿尔卑斯山时，他就会明白这一切了。

但是有人说，既然在北意大利正在形成一个军事强国，那末法国为了它本身的防御便需要占有尼斯和萨瓦。

萨瓦会显著加强法国的防御体系，这我们已经看到了。至于尼斯，如果说它能加强法国的防御体系的话，那只是因为敌人想侵入法国阿尔卑斯各省时不得不预先占领它。但是，是否会有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意大利国家对法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以致法国需要对它进行特别的防御，这还是一个问題。

意大利纵然完全统一了，也永远不可能靠它的 2 600 万居民去进攻法国，除非它同德国联合。但在这样的战争中，主要的兵力总是德国提供的，意大利只会起配角作用。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进攻的主力从阿尔卑斯山转移至莱茵河和麦士河。此外，还应当看到，进攻的最终目标——巴黎——位于法国的北部。对法国最致命的攻击总是来自比利时；如果比利时保持中立，那这种攻击总是来自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和来自巴登的莱茵河上游。一切其他的攻击都要采取迂回运动，而且多多少少总是偏向一旁，而不是直接指向巴黎。克劳塞维茨（在他所著的“论战争”第 6 篇第 23 章中）早就嘲笑过 1814 年那一支 20 万人的军队，他们不直接进攻巴黎，却按照最愚蠢的理论，经过瑞士向兰格尔高原迂回；如果他看到一个企图经过北意大利和萨瓦或者甚至经过尼斯来对巴黎进行主攻的作战计划，他会作何评价呢？一切经由萨瓦的进攻比起从莱茵的进攻来都有极大的缺陷，首先，交通线长，并且还要经过阿尔卑斯山，其次，离巴黎远，最后，里昂的巨大营垒具有很大的箝制力，——所有这些情况在大多数场合下将迫使敌人中止进攻。因此，在 1814 年战局中，经过意大利向法国进攻的那部分军队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法国在它这段本来就掩护得很好的疆界上，握有这样一些防御手段来对付最软弱的邻国，实际上是无需乎扩充领土了。如果法国现在的国境线到处都和法意交界线一样，距离巴黎很远，都有天然的障碍、人为的工事以及不利于敌人的交通线，因而都那样可靠，那末法国会是无法攻克的。如果波拿巴主义正好看中了这一点，才借口法国没有自然疆界便无法进行防御而提出所谓自然疆界的要求，那它为占有莱茵河的要求找根据就不知要容易多少倍！

尼斯即使现在割让给法国，它也将永远属于意大利。萨瓦可能自愿归并法国，将来当欧洲的各大民族在更大的规模上统一起来的时候，它很可能会愿意这样做。但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从政治和军事方面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从而显著地提高了自己在欧洲的威望以后，是萨瓦自愿成为法国的领土呢，还是像路易-拿破仑这样一个靠征服别人过日子的统治者，为了永远统治萨瓦，并为了给自然疆界论创立先例而从还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取得萨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四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在围绕尼斯和萨瓦问题进行的这场交易中，关系重大的是下面三个主要情况。

第一，是路易·拿破仑在实践上这样宣布了意大利的独立：意大利至少被分裂为三个或者甚至四个国家；威尼斯属于奥地利；法国由于占领萨瓦和尼斯而控制着皮蒙特。教皇国在罗曼尼亚分出去以后将把那不勒斯同北意大利王国完全分割开来，从而使北意大利王国无法向南方作任何扩张，因为领地的其余部分必须“保证”归教皇占有。同时，对北意大利王国来说，威尼斯仍然是一种诱饵，意大利的民族运动也就会以奥地利为直接的和主要的敌人；而为了使这个新的王国能够按照路易·拿破仑的愿望出来反对奥地利，法军占领了可以控制阿尔卑斯西部的一切阵地，并把前哨推进到距都灵 9 德里的地方。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在意大利布下的阵势，一旦发生争夺莱茵河疆界的战争，这种阵势可以代替它整整一个军团。而奥地利从这里得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派遣自己盟军的好借口——甚至这一点也未必做得到。在这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完全改变德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德国并不需要到明乔河和波河为止的威尼斯领土，这一点我们认为已经在别的地方说明了。对于教皇的统治和那不勒斯的统治，我们也完全不感兴趣，相反，我们所关心的只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奉行自己政策的、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比波

拿巴主义对意大利作更多的贡献。也许不久会发生一些情况，那时注意到这一点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是法国公开宣扬自然疆界论。法国报纸重新高唱这种论调，不仅是得到政府的同意而且是根据政府的直接命令，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理论目前只应用于阿尔卑斯。这件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无害的。萨瓦和尼斯只是两个不大的省份，一个只有 575 000 人，另一个只有 236 000 人，总共不过使法国人口增加 811 000 人；它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意义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由于对这两个省份的领土要求，使法国人重忆起了自然疆界论的观点；欧洲人不得不再习惯于听这个口号，就好像习惯于听 10 年来不同时期所宣布而后又被抛弃的一些波拿巴的口号一样，——这些就特别同我们德国人有关了。在“国民报”³⁸⁵的共和主义者们十分卖力地继续使用的第一帝国的语言中，所谓法国自然疆界 *par excellence*〔主要〕是指莱茵河。就是今天，一谈到自然疆界，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想到尼斯或者萨瓦，而只会想到莱茵河。哪一个政府，并且是依仗自己国家的侵略野心和侵略传统的政府，有权重新宣布自然疆界的原则，却建议法国满足于尼斯和萨瓦呢？

法国重提自然疆界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这件事不能小看，它证明一年前在德国表露出来的民族感情是正确的。固然，现在不是路易·拿破仑，而是他操纵的报纸在大叫大嚷说：当然，过去和现在都仅仅是指莱茵河而言。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就是俄国对于这整个阴谋的态度。去年爆发了战争，哥尔查科夫本人承认俄国对路易·拿破仑有“条约上的义务”，那时这些义务的内容就已经逐渐传开了。这些传说来自

各个不同的方面,并在主要问题上都互相印证了。俄国答应动员4个军配置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边境上,使路易-拿破仑更容易施展他的计谋。对于战争过程本身,似乎已经预先考虑了下面三种情况。

或者是奥地利同意以明乔河为边界而缔结和约。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丧失伦巴第,同时,由于与英国和普鲁士隔离,就很容易被拉入俄法同盟,而这个同盟下一步的目的(瓜分土耳其,把莱茵河左岸地区让给法国)将用其他方法来实现。

或者是奥地利为占有威尼斯而继续战斗。那时,它将被彻底逐出意大利,匈牙利将爆发起义,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被转交给俄国康斯坦丁大公;伦巴第和威尼斯将归属于皮蒙特,而萨瓦和尼斯将归属于法国。

最后,或者是奥地利继续战斗而德意志联邦支持它。这时俄国将积极地加入战斗;莱茵河左岸将转归法国,俄国则将得到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

再说一遍:关于法俄同盟协定中最重要部分的这些材料,自战争爆发时就开始为大家获悉并且已经公布出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为各种事件所证实。其余的部分情况怎样呢?

对于事态的真相,现在不可能提出文件来作证据。只有在事件本身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这些证据才会出现。只有根据事实与文件(例如1830年在华沙发现的俄国的公文³⁸⁶)查明的俄国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才是揭开这个错综复杂的阴谋的钥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查明政策就足够了。

在这个世纪内,俄国曾两次与法国结成同盟,并且每一次都是以瓜分德国为其目的或者基础。

第一次是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木筏上。³⁸⁷俄国当时让法国皇帝

完全支配德国而自己仅取得普鲁士的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为此它取得了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于是就赶忙夺取贝萨拉比亚和莫尔达维亚，并驱军渡过多瑙河。但是不久以后，拿破仑就开始“研究土耳其问题”并根本改变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情况对俄国说来便成了 1812 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在 1829 年。俄国与法国缔结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应取得莱茵河左岸，俄国则再度取得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这个条约后来被七月革命废除了；达来朗在准备对波林尼雅克内阁的起诉时，发现了有关的文件，但为了避免使法国和俄国的外交出丑，他把这些文件付之一炬。在广大群众面前，各国外交家结成了一个秘密的同盟，他们永远也不会公开地彼此诋毁的。

在 1853 年战争中，俄国曾把希望寄托在神圣同盟 142 身上，据它的估计，神圣同盟已经由于对匈牙利的干涉和华沙的失败而复活了，而且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路易-拿破仑的不信任而加强了。但是它打错了算盘。奥地利已经以其忘恩负义的崇高行为³⁸⁸（其实，它早已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华沙用高额利息偿还了它欠俄国的债）和它在多瑙河地区传统的反俄政策的彻底复活，使全世界吃了一惊。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失算了，但在另一个问题上，敌人阵营中的叛卖行为却挽救了它。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个固执的想法，现在只有和法国结盟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在法国又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路易-拿破仑政府那样需要夺取莱茵河左岸。因此情况比 1829 年更为有利。形势对于俄国是有利的；路易-拿破仑只能为它火中取栗。

首先必须消灭奥地利。奥地利从 1792 年到 1809 年在战场上

顽强地反抗过法国，而从 1814 年以来它又在同样顽强地（这是它仅有的然而却是无可争辩的功绩）从外交上反对俄国侵略维斯拉河和多瑙河的计划。在 1848—1849 年间，当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使奥地利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时，俄国拯救了奥地利——它的崩溃不应该是革命的结果，因为革命会使帝国的已解放的地区摆脱俄国政策的统治势力。然而，从 1848 年起就具有独立性的各个民族的运动，使奥地利失去了反抗俄国的可能性，从而也使奥地利的存在失去了最后的内在的历史根据。

这个反奥的民族运动现在应当成为分裂奥地利的因素，运动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是在匈牙利。俄国的作法和拿破仑第一不一样；在西方，特别是在那些人口稠密、文明程度超越它本国人民之上的地方，它前进得很慢。俄国征服波兰的最初阶段在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完成。缓慢的然而可靠的胜利使俄国得到的满足，和迅速坚决而收获巨大的攻击使它得到的满足相同；但是，它总是同时考虑到这两种可能性的。它在 1859 年战争中利用匈牙利起义的作法，即把这次起义留作第二步使用的作法，清楚地暴露了俄国的手法。

难道俄国只满足于在短促的 1859 年战局中削弱奥地利，而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了吗？难道它动员第一批的 4 个军就只是为了得到这种满足吗？如果奥地利不让步，那又将怎样呢？如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局势迫使普鲁士和德国其余各邦（在战争继续的条件下是不得不如此的）出来援助奥地利呢，那时又将怎样呢？在这种场合下，俄国对法国又会承担些什么义务呢？

特尔西特条约和 1829 年条约给这个问题做出了答案。如果俄国把它的领土扩张到多瑙河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地统治了君士坦丁

堡，法国也应当取得它自己的那一份战利品。俄国所能提供给法国的唯一的抵偿就是莱茵河左岸。德国只得再次承受牺牲。俄国的自然的和传统的对法政策，是允许法国占领莱茵河左岸或者在某种场合在这方面加以帮助以换取法国对俄国侵占维斯拉河和多瑙河的承认和支持；对由于感恩图报而承认俄国侵占行为的德国，则帮助它从法国手中收复失地。自然，这个计划只有在发生重大的历史危机时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绝不妨碍俄国在 1859 年很好地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像在 1829 年那样。

侵占君士坦丁堡是俄国对外政策一贯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如果现在还来论证这个事实，那就可笑了。我们在这里只准备提醒一点，就是俄国除非与法国或者英国结盟，否则永远不能实现瓜分土耳其的目的。1844 年，当俄国感到向英国直接提出建议是适时的时候，尼古拉皇帝曾去英国并亲自带去了俄国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备忘录，当时还把埃及许给了英国人。建议被拒绝了，但是阿伯丁勋爵把这份备忘录放在一个小匣内，加了封签传给了他外交部的继任者。以后历任外交大臣都看了这个文件，然后重新加封传给自己的继任者，直到 1853 年上院辩论时，这件事才终于被公开出来。同时公布的还有尼古拉一世同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之间关于“病夫”的有名会谈，会谈中埃及和克里特岛同样被许给了英国，而俄国似乎只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就满意了。³⁸⁹可见，俄国在 1853 年对英国的许诺和在 1844 年是一样的，那末在 1859 年对法国的许诺难道会比 1829 年吝啬些吗？

无论从所处的地位或个人的品格来看，路易-拿破仑都注定要替俄国计划服务。他既然自命是伟大的军事传统的继承人，所以也把 1813 年和 1815 年的失败作为遗产接受了下来。军队是他的

主要支柱；他必须以新的军事胜利使军队得到满足，必须惩罚那些使法国在这几年来遭受失败的国家，恢复法国的自然疆界。只有当法国的三色国旗飘扬在整个莱茵河左岸时，才能洗雪巴黎两次被占领 132 的耻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强大的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俄国与英国之间选择。英国的内阁经常更换，即使有一个英国首相能同意这些计划，这个国家至少也是不可靠的。那末俄国呢？它已经两次表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法国结为同盟，只要求得到适中的代价。

从所处的地位对俄国的政策有利这一点来讲，俄国的政策从来没有找到过比路易-拿破仑更为适合的人了。居于法国王位的是这样一个统治者，他被迫进行战争，他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进行侵略，他需要同盟，并且只能和俄国缔结这个同盟，——这样一种形势是俄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自从在斯图加特会见³⁹⁰以来，法国政策的全部最后的原动力便不应到巴黎，到路易-拿破仑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该到彼得堡，到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办公室里去寻找。德国的庸人们如此敬畏的这位“神秘的”人物被降为俄国外交所玩弄的傀儡，俄国外交让他摆出伟人的姿态而自己却享受实际的利益。俄国从来都是非万不得已不肯牺牲一个戈比和一名兵士，但一有机会就要在欧洲各国间挑起纷争并削弱它们，因此，在路易-拿破仑还没有得意洋洋地摆出意大利解放者的姿态以前，当然要由俄国通过哥尔查科夫的条约来加以认可的。当俄属波兰的民情报告已经证实形势非常不妙，以致在毗邻的匈牙利不能允许发生任何起义的时候，当动员俄国第一批 4 个军的尝试表明国家的元气尚未恢复的时候，当农民的骚动和贵族的抵抗的规模在对外战争期间会成为一种威胁的时候，俄皇的将军衔侍卫

长就来到了法军大本营，于是就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俄国暂时可以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了。奥地利因为 1854 年的“忘恩负义”而遭到了残酷的惩罚，其残酷程度远比俄国所能指望的要厉害得多。在战前眼看就能整顿就绪的奥地利财政，受到了惨重的破坏，要几十年才能恢复，整个国家机构摇摇欲坠，它对意大利的统治不存在了，领土被割据了，军心涣散了，军队对自己的长官失去了信任，匈牙利、斯拉夫和威尼斯的民族运动已经大大加强，与奥地利分离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公开提出的目标。自此以后，俄国可以完全不再把奥地利的抵抗放在眼里，可以指望逐渐把奥地利变成自己的工具。这就是俄国的成就。而路易-拿破仑，除了为他的军队争得了极为渺小的荣誉，为自己争得了非常值得怀疑的荣誉，以及取得了关于有权占有萨瓦和尼斯的极不可靠的许诺而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这两省对他说来至多也不过是丹璫人的礼物³⁸⁰，它们会使他更加仰承俄国的鼻息。

进一步的计划暂时搁了下来，但并没有放弃。搁多久，那就要看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情况，要看路易-拿破仑能把自己的御用军队控制多久以及新的战争对俄国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而定了。

俄国在对我们德国人的关系上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去年哥尔查科夫公爵致德国各小邦的有名的照会³⁹¹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从来还没有人以这样的口气对德国说过话。我们希望，德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俄国竟敢禁止他们去援助遭到攻击的德国的一个邦。

我们想，德国人一定不会忘记俄国以及其他许多事情。

1807 年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的时候，俄国曾坚持要把它的同盟者普鲁士的领土——别洛斯托克省划归自己，而把德国出卖给

了拿破仑。

1814年，甚至奥地利也承认波兰有独立的必要（见卡斯尔里回忆录³⁹²）时，俄国还把华沙大公国（也就是以前属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几个省³⁹³）几乎全部并入了自己的版图，从而对德国采取了进攻的立场，直到我们把它从那里驱逐出去以前，它将一直威胁着我们。在1831年后筑成的要塞群——莫德林、华沙、伊万城——甚至连亲俄派哈克斯特豪森也认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

1814年和1815年，俄国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使德意志联邦条例³⁹⁴以现在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德国永远孤立无援。

自1815年到1848年，德国处于俄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奥地利在多瑙河上曾同俄国抗衡，而在来巴赫、特劳波和维罗那等会议³⁹⁵上，它却实现了俄国对西欧所抱的一切希望。俄国能这样控制是德意志联邦条例造成的直接后果。普鲁士在1841年和1842年曾企图立刻摆脱这一条例的约束，但立即就被迫恢复原状。因此，当1848年革命爆发时，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³⁹⁶，把德国的运动说成是儿童室里的吵闹。

1829年，俄国和波林尼雅克内阁缔结了自1823年就开始由沙多勃利昂草拟的（并经他正式确认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莱茵河左岸被割让给了法国。

1849年，俄国在匈牙利支持了奥地利，条件是要奥地利恢复联邦议会和摧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抵抗；伦敦议定书³⁹⁷保证俄国在最近期间获得对整个丹麦君主国的继承权，并使它有希望实现自彼得大帝以来就渴望实现的进入德意志联邦（以前是德意志帝国）的计划。

1850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被召到华沙受沙皇审判。虽然许多

庸俗的政客认为只有普鲁士受到了屈辱，其实奥地利所受的屈辱并不见得少些。

1853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在同汉·西摩尔爵士交谈中任意摆布德国，就好像德国是他的世袭领地似的。他说奥地利是忠实于他的；至于普鲁士，他根本不屑于一提。

最后，1859年，当神圣同盟看来已彻底瓦解的时候，俄国就同路易-拿破仑缔结条约，法国在俄国的同意和支持下进攻奥地利，哥尔查科夫还发出照会，非常放肆地禁止德国人向奥地利提供任何援助。

这就是从这个世纪开始以来我们要感激俄国的一切，但愿我们德国人永远不要忘记。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受到法俄同盟的威胁。法国本身只有在个别时机并且也只有在与俄国结盟后才能威胁我们。但是俄国却时时刻刻在威胁我们，侮辱我们，每当德国起来反抗时，它就以莱茵河左岸作为许诺来策动法国宪兵。

难道我们应该永远容忍俄国这样玩弄我们吗？俄国把我们最美丽、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一个地区永远当作诱使法国御用军政权上钩的诱饵，难道我们4500万人民还要继续忍受下去吗？难道莱茵地区除了作为战争的牺牲品，帮助俄国取得在多瑙河和维斯拉河上行动的自由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用处了吗？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希望德国能迅速地手持利剑来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能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把法国御用军和俄国“毛虫”一起驱逐出去。

同时，我们已经有俄国农奴这样一个同盟者。现在俄国统治阶级和被奴役的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它正在动摇俄

国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只有当俄国内部在政治上还没有发展以前，才可能存在。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由政府与贵族共同大力促成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使现存的社会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的程度。这种社会关系的废除一方面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不经过暴力变革又是不可能的。随着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毁灭，它的对外政策也将遭到毁灭。

看来，德国注定不仅要用笔墨而且要用刀剑来向俄国说明这一点了。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时德国就将恢复自己的名誉，洗净几世纪来蒙受的政治耻辱。

附 录

“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

“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

为了消除关于本报编辑部成员的一切谬传和荒诞谰言，我们必须声明，编辑部成员没有变更，而且也不打算作任何变更。但是，本报撰稿者的范围扩大了，我们可以满意地告诉本报读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也就是我们党的最出色的一批写作力量——决定支持“人民报”，并通过撰稿使编辑部能够很好地和全面地代表我们党的利益。

载于 1859 年 6 月 11 日
“人民报”第 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报刊述评³⁹⁸

“我们的读者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有时，当我们接到他们对‘海尔曼’³⁹⁹的批评时，我们总觉得，不可数计的多数读者要知道，600个读者中的不可数计的多数，就是599个比我们自己要通情达理得多。”（“海尔曼”）

自愿坦白总是好的，即使像这次这样，做得稍微迟了一点也不妨。但是，尽管如此：

“老人们，你们鼓起劲来吧，
血管里的血液不应该冷却！
履行你们神圣的义务吧，
你们有力气把战壕挖掘，
并且用筐子挑走泥土。”

（图斯涅尔达安慰海尔曼⁴⁰⁰）

“在那些值得称道的州中最值得称道的威斯康星州派出它最卓越而有才干的演说家卡尔·叔尔茨先生到马萨诸塞去，为了用他大胆的言词去鼓动……他在他一篇出色的、陈辞激昂的演说中证明了……”

什么？——实在很难说，如果没有下文的话：

“他不认为他是那个叫做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家辈出的伟大民族的代表。”
（大学生叔尔茨扮演了完全可以数计的少数和自传作者的角色⁴⁰¹）

“呵，青年们，把剑磨快！
愿你们像海尔曼一样勇敢！”

（图斯涅尔达）

“我们亲眼看到了这种耐火的凡而纱的货样，并且在烛火上检验过它。如

果把它在火上慢慢地移过，它一点也不会烧着，但是，如果把它在火中稍微放得久一点，它就会烧成灰，不过，火不会向旁边烧开去。可是，听在展览会上见过一块大幅料子的一位英国太太说，这种布不像未经加工的凡而纱那样闪闪发光，色泽也没有那样鲜艳夺目。”（“海尔曼”。——编者注）

“呵，妇女们，你们的使命
你们应该在祈祷中找寻！”

（图斯涅尔达）

我们的世界主义的肝脏很高兴地看到，当阿尔米纽斯记起他把西方革命奉献给科苏特先生以交换东方革命⁴⁰²的崇高时刻，他庇护了

“奥地利的 1 700 万斯拉夫人”，并且“因此他不仅把紧靠社论的地方辟给相应的通讯员，而且吁请他代表他的人民在‘海尔曼’上发表言论”。因为“对于共和党人说来，在意大利战争中站在哪一方面，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所以，该报表示部分地赞同普鲁士，部分地赞同路易·拿破仑，部分地赞同意大利，部分地赞同小德意志，部分地赞同大德意志，部分地赞同成立摄政王职位，部分地赞同帝国议会，而它表示完全赞同的，则是“小新港街莱斯特广场 8 号的本德尔”。“任何一个学过阅读（“出版界和印刷所”）的人”，只要请教一下这位本德尔，“用不着在书籍和演讲录上下功夫，”就可以通晓各种自然科学的奥秘。

* * *

在最近一号“海尔曼”上，有一位捷克人声明说：

“我们是……第一批……为社会思想……而斗争的人。”

现在是这个“论坛”的所有主的这个牧师⁴⁰³关于这一点指出：

“难道在捷克人之前瑞士人不是第一批吗？”

瑞士人真的第一批为之而斗争的唯一的社會思想，可以用如下的話表述出來：《Point d' argent, point de Suisses》（“沒有克勞澤，就不會有瑞士人”）⁴⁰⁴。初露頭角的“瑞士人”福格特和新近鑄造的“克勞澤”金克爾⁴⁰⁵當然會善于按其功績來評價這一社會思想的全部的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這個“論壇”上還說：

“我們認為，英國各家保險公司以後不願意再接受！準備銷到海外的世界市場去的德國商品的保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這位“牧師”究竟知道幾個“世界市場”呢？

下面就是“倫敦週報”，即“海爾曼”的條理分明的敘述的標本：

“在撒滿了桂冠的洪堡的墳墓上，棲息着一對小燕子。剛在萌芽狀態就應當用頗相學和物理療法各種手段加以根除的兒童犯罪行為，又被施米德堡一個九歲的男孩最駭人聽聞地表現出來了。”

“海爾曼”對梅特涅的判斷。——對梅特涅政策的看法是這樣表達的：

“在梅特涅及其同伙在幾乎整整一百年中捉弄別人、做盡各種卑鄙勾當的地方，任何和平天使也不能在小溪旁安身，以便像席勒所說的那樣，甜甜地打一個盹。”“他——即席勒——倒會設法比如說在明喬河上做這件事。”

只有“海外的世界市場”的發明者能夠把明喬河變成“小溪”。

“海爾曼”在文章中關於

“倫敦的薩瓦教堂的空缺”聲明說，“它——海爾曼——無論對它在倫敦還是在祖國的鄉親們來說，都一天天變得愈來愈珍貴了”。

也許這是符合事實的。價值三辨士的海爾曼提供的材料一星期比一星期少了。很可能，這也就是要對那些自由的“收入條

款”进行精确计算的原因，——顺便指出，这种计算泄露了想把“论坛”迁移到“萨瓦教堂”去的秘密愿望。

* * *

在“哥特弗利德”第26号上刊登了“海尔曼”的一篇辞职声明。声明说：

“致我们的读者

今天的这一号出版后，完成了我作为本报编辑的活动。我辞职的唯一原因是，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除了我过去的教育家的职业以外再从事另一种如此消耗精力的活动。就是说，教育家的职业是除了那个另一种活动以外的一种活动。由于我根据这一点 根据哪一点？今后将不再对本报的内容负责 不如说是他将不对本报今后的内容负责，所以，我同时也把所有权转交给别人。这个成就现在已经有了保证 由于金克尔离去了 的企业，将根据过去的精神进行工作 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由于以前我自己几乎没有时间和地方来为它 即为这个企业 撰稿，所以，在将来 以后 摆脱了与问题的外部方面相联系的操劳的负担以后，我作为一个通讯员将提供更加大量的材料。如果哥特弗利德过去为这些材料找到的地方愈少，将来作为通讯员就愈能提供“更加大量的材料”，那末，由于没有哥特弗利德作编辑而成就现在应该有所保证的这个企业的情况，将会怎么样呢？值此同读者和同事们分别之际，我深深铭感你们友好的同情和支持。

哥特弗利德·舍克尔”

上述的“哥特弗利德”最后刊登了下面这篇编辑部的短文，作为那种海尔曼对之说这样友好的“再见”的如此“消耗精力的活动”的标本：

“当我们 正就是哥特弗利德 哪怕是有一次能够从我们的哪一个通讯员那里捉到一个好跳蚤的时候，我们每次总是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幸灾乐祸的感

情，因为在我们的全体读者中照例总会找到一个人！，这个跳蚤将推动为什么不是推开呢？他对所涉及的事情即对于被捉到的跳蚤的这件令人非常难堪的事情发表一篇有教益的，包含全部细节的包含有关的全部细节的报道。正是由于这种粗枝大叶的错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什么情况？也就能够刊登有价值的更正，根据这个更正，每一位读者但无论如何不是一位通讯员！立即就会断定，它的作者是像莱茵河上人们常说的那种大人物不是这样吗，美丽的女读者？。遗憾的是，刻不容缓的政治材料，特别是我们的通讯员们关于令人极端厌恶的崇高的政治的那些文章急剧涌来，使我们直到今天才得以刊登这篇文章即这个编者注。

于是，我们看到，海尔曼不顾自己如此深挚的感激之情，不无苦痛地同“通讯员们”告别。这个苦命人“以前”在他自己的论坛上没有为关于“被捉到的跳蚤”和“大人物”的“这篇文章”找到地方。

而我们在分别之际向“以前”的“哥特弗利德”的编辑感叹地说道：《De mortuis nūl nisi bene》〔“对于死者，是记善不记恶的。”〕但是，我们对“以后”的“海尔曼”的通讯员说：“菲利浦城下再见！”⁴⁰⁶

战略外交的发明

“海尔曼”声称：

“据说，普鲁士的武装调停要以明乔河线为基础。很好，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之后这一线是划得更加明显了。只是曼都亚和培斯克拉那些要塞的墙壁的阴影仍然还遮掩着它。但是，围攻应当照亮它。”

“海尔曼”的机智的小品文作家在伦敦使用了他的那些文章以后，又把它们寄给莱比锡的“凉亭”⁴⁰⁷。为了把“德国大人物协会”组织的洪堡纪念会⁴⁰⁸描写得尖刻泼辣，有人通知我们说，

“某个现在正出版一家周报的共产主义团体，抱有特殊的目的，想用最卑鄙的方式不仅诬蔑金克尔的报纸，而且诬蔑他本人；而且他们甚至不惜使用最明显不过的谎言等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想指出，我们的报纸完全不是“某个团体”的机关报，这一点小品文作家从我们屡次的言论中是应当知道的，而我们对金克尔先生的指责，是不应当称为谎言的，除非它被驳倒，但是这一点直到现在谁也没有做到，而且永远也做不到。顺便指出，我们感谢通讯员先生报道说，

金克尔的“散发着节日气氛的芳香”的说教的基础，是一句名言：“如果你忘记了锡安，那你自已也会被人忘记。”他是“拜倒在黑红黄三色旗之下”开始说教的。

“海尔曼”在说俏皮话。“海尔曼”关于奥地利的一篇文章中说，哈布斯堡王朝对其世袭的领土是以继父的身分出现的，而对德意志帝国是以继母的身分出现的。至于一个老头儿或者一个青年人可能成为一个老姬，这一点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也就是从佩利茨著的“世界通史”⁴⁰⁹中为少女们作了大量摘录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证。但是，继父同时又是继母——这一点直到现在我们还认为是不可可能的。

* * *

由于爱·约·尤赫之流担任主编而以返老还童的面貌出现的“海尔曼”是值得我们刊登详尽的短文来谈谈的。我们就立即从关于“普鲁士的立场”的 first leader〔第一篇社论〕开始吧。

如果法国和奥地利签订了和约，

“普鲁士在一段时间内所处的状态将同它在此之前所处的状态大体相同。可是，它慢慢地将处于另一种状态中。但是，既然！战争将会继续下

去，那它就应该还要更快地 比慢慢地还要更快吗？改变自己的立场，因为那时它将被迫采取行动，如果它没有及时地为自己找到 ！一个可靠的立场，那它就将失去任何坚固的支柱，以便同德意志联邦的其余各邦一起灭亡 也许普鲁士并不反对失去“任何坚固的支柱，以便灭亡”吧。”

接着，作者让普鲁士表演各种不同的多少有些奥妙难解的 poses plastiques〔优美姿态〕给我们看。首先，普鲁士可能会把自己装扮成欧洲大国，而且这也有两种方式。

“普鲁士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出面采取行动，独自承担全部风险 独自？。这个 行动！是纯粹欧洲的观点，其目的 观点的目的 ……将会确定为权力问题，因为签订条约是为了保持均势，而保持均势就是要使为国家 什么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权力均等。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可能会以这一次战争所引起的违背 1815 年条约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因为它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不是几个父亲之一，而是一个父亲，并且它可能会企图得到物质保证，以奖励它在这种情况下 在违背条约的情况下 为欧洲君主制度立下的功劳。”除了这个苦心孤诣的安排以外，“普鲁士可能会以一个欧洲大国的身分采取纯粹政治的立场，从保全自身的考虑出发，反对它的法国对手加强力量 non bis in idem〔一事不重罚〕——要知道，关于使力量均等的问题已经提到过了。这时它可能会借口说，英国目前还是公开的敌人，而俄国已经是法国的秘密的盟友——奥地利的敌人了 ！！”，等等。

在普鲁士作为欧洲大国如此多方面地表现了自己以后，

“它在今后可能会采取完全是德国的观点。在这里它也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就是说，它可以作为德国的一个大邦使其余各邦 包括土耳其 听命于它，或者以联邦的一个谦逊的、平等的成员国行事，听命于各个小国 是瑞士各州吗？，或者同它们并立。叫人弄不太清楚，为什么联邦的平等的成员国必须听命于人。”

换句话说，或者是普鲁士帝国，或者是保全德意志联邦。

前者“意味着一个懂得需要可以产生法令 对于普通凡人说来是需要可

以不顾法令,但是对于哥达党人来说是需要可以创造法令,不过绝对不是严格的法令 的大国要坚决充当德国的魁首,由于需要可以创造法令,所以它 需要 被迫不得不拒绝那些束缚着它的框框等等,因为它的存亡处于决定关头 也就是说,需要的存亡处于决定关头”。

“普鲁士可能会用来为这种革命政策辩解”的那些根据,对于我们的作者说来真是 *embarras de richesses* [货多难选]。

其中“敌视德国统一的外国大国俄国和英国依靠一个德国均势的秋干的复杂体系,通过经常的相互削弱的办法阻碍了德国各大邦的壮大,在成立联邦时它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而不是德国等等 好一个独出心裁的计划,为了防止普鲁士实力的壮大,外国大国俄国和英国应该彼此削弱!。最后,它 普鲁士 表明它已经完全领悟了目前这场战争的实质,这场战争像三十年战争一样,目的是要完成 1848 年革命。由于这个原因 即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目的是要完成 1848 年革命 ,所以普鲁士不再承认联邦议会,并且

……认为其他一切德国诸侯的主权已经失效等等。”最后,“如果它 即普鲁士 觉得这种革命政策太冒险,普鲁士政府可能也会选择保守的观点。它可能会选择保守的观点……因为统治着普鲁士的王朝作为平等的 与谁平等? 的王朝,应当支持保全其余的 其余的什么? ……因为普鲁士不是独立的,它应当使自己的立场同中立的英国将要采取的立场相一致,等等。”

到这个时候,它“动摇了”。它也容许它的“对手奥地利”被击溃了。

“它依靠条约经常企图扯各个小邦 是把它们的财富扯出来,扯起鞭子抽它们,或者把它们扯到自己方面来吗? ,它几乎带着就是那些建议回到了法兰克福 从爱尔福特⁴¹⁰,这些建议如果是来自汉诺威或巴伐利亚的话,普鲁士就不会接受了。”

最后,作者把这一点称为“巧妙的一步”,虽然这里在 *consecutio temporum* [时间的一致] 方面:表现得不很高明。

很遗憾,维拉弗兰卡条约一举把哥达党人的幻想所能企及的

普鲁士的一切步骤全盘粉碎了。因此，我们且把尤赫之流的“崇高的政治”撇下不谈，而去请教一下通过返老还童的“海尔曼”歌颂索尔费里诺会战的梯尔泰。看来这位梯尔泰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连一分钟也不怀疑，在索尔费里诺城下彼此厮杀的一切朱阿夫兵、土尔科兵、克罗地亚兵、塞尔维亚兵、捷克兵 et autres Zéphytes⁴¹¹，

“如果不是有两个皇帝的話，偶然的機會無論在世上的什麼地方把他們湊合在一起，他們都會像不懷惡意的、彬彬有禮的人們一樣彼此相待，他們會彼此致敬、吃、喝 彼此吃掉、喝掉！什麼禮貌——吃人的禮貌！”

歌頌會戰的那首詩的韻律是英雄史詩的韻律，是六腳韻。大家知道，克萊斯特在六腳韻前面增加了一個短音節。我們這位歌頌英雄的詩人超過了克萊斯特：他非常慷慨；韻腳多少對他說來是無所謂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六腳韻剛從沙場上回來，缺少一個腳，或者膝蓋脫了骹，那也不能責怪六腳韻。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十分疲憊，
精疲力竭！炎熱逼人，口乾舌焦。”
“在這可詛咒的年代，在這十年中，”
“在灼熱的太陽的曝曬下，在血泊中，活活地渴死，有時幸而身受一
刀當即斃命，多數只是被砍斃得半死不活，遍體鱗傷，痛不欲生。”
“酷熱的、光禿禿的小丘鮮血遍染，
一個個殘缺不全的軀體在血泊中輾轉，”
“有的少腳，有的缺手，有的沒有了下巴，有的剩下半個腦瓜。”
“最後，
萬籟俱寂，黑暗降臨。
只是山谷里和小丘上傳來了呻吟，
忽此忽彼，在幾個鐘頭的距離以內，隨處可聞。”
“在艱苦的热战中，他們連一滴水也沒有，

其他的人都渴死了，
在临死前的嘶哑声中，他们那永远熄灭了的视线碰上了来得太晚了
的外科医生。”

在歌唱了会战之后，紧接着便是历史性的批评。返老还童的
“海尔曼”的“思想家”在从巴黎寄来的一篇文章中向我们披露了
路易·波拿巴对革命的态度。

“革命是合法的，因为它受到皇帝的庇护并且经他批准……但是，它保
留着自己过去的性质并且应当被镇压，因为它同皇帝的利益发生矛盾，或者
破坏他的计划。”

这些诗的韵脚中文难以标出，这里附上原文以供参考。——译者注

这就是全部奥妙所在。

“我终于摸到了海底，
我的锚牢牢地扎在这里。”

我们从“如此令人厌恶的崇高的政治的领域”，从隆隆的炮声和历史性批评的领域中跌了下来，落到一间简朴的孤单的修道院——“印刷所”中，我们的老朋友哥特弗利德已经作为新的通讯员在这里隐居下来。他见到我们就喃喃地抱怨道：

“这家报纸由于经常的战争和一味谈论政治，直到现在还没有腾出地方来，等等。”

这种老一套的抱怨话我们是熟悉的。哥特弗利德作为有很好的艺术素养的向导，建议陪我们去参观“特拉法加广场的科学院展览会”。

“这个几乎是英雄的人物，像甚至在有毒的花卉上采蜜的蜜蜂一样”（见“凉亭”），

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说了一大堆众所周知的悦耳动听的话，他告诉我们说，

“列斯利那些欢快活泼的画……是美术的真正的珍珠。”

但是，他最感兴趣的是前拉斐尔派⁴¹²，因为具体的实例胜于一切说教，所以他在自己的“印刷所”展出了几幅前拉斐尔派的wordpaintings〔文字绘画〕，这就使我们不必再劳神去游览特拉法尔加广场了。

前拉斐尔派的第一幅画

“从上午 11 点起，大厅里整天都为上流社会的钟式裙所统治，在观众喜爱的那些作品的旁边经常总是磨破了长裙的下摆。”

前拉斐尔派的第二幅画

“一切在某一点上来看是达到了完善地步的东西，都是珍贵的。例如裤子，如果缝制得很好，又不窄不紧。”

前拉斐尔派的第三幅画

“在修道院的墓地上，有两个尼姑正在从事挖墓…… 这是两个粗里粗气的妇女，她们在轮流交替着从事黄昏的忧郁的劳动。两个粗里粗气的人在轮流交替，而黄昏在替她们从事劳动。其中有一个跳进坟墓，用洗衣妇的青筋条条的手抛出沉重的、潮湿的黑土，它长满了树根，她是一个平庸的、冷淡的、普普通通的人物。”

也许长满了树根的人物是十分平庸的，但无论如何她是绝非普普通通的。这个人不是用自己的手，而是用洗衣妇的手挖土所表现的那种 *sans gêne* [不讲礼貌的神气]，的确说明了某些冷淡。

这几个实例已足以使任何一个“手工业者”懂得，哥特弗利德如此执拗地强迫他“考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强迫他们考虑：这些被阉割了艺术趣味的人

“在他的事业中对他说来”，会比“星期日到埃平的森林或居尤郊区的植物园去作任何游玩”，比“城郊的任何热闹的饭馆”，比“那些傍晚的聚会”和“关于即使在下一革命以后会不会出现打着工人专政的招牌的裁缝匠帮工们的千年统治这个陈腐问题的无休止的议论”，“要有益得多 *utile cum dulci* [愉快而有益]”。

但是 我们同前拉斐尔派画家相反 我们像从前一样坚持一句古代表明智的格言：《*Cacatum non est pictum*》[“涂抹并不是绘画”]。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6 月 3 日和 24 日，
7 月 8 日和 15 日

载于 1859 年 6 月 4 日和 25 日，7 月 9 日
和 16 日“人民报”第 5、8、10 和 1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 1 马克思的卓越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1858年8月—1859年1月写成的。这一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作这本书以前,进行了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文献,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原理。

1857年8月,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整理他搜集的材料,并着手写作经济学巨著。1857年8—9月,马克思草拟了这一著作的提纲的初稿。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更加详细地拟定了自己的计划,并在1858年4月决定把整个著作分成六册来写。第一册打算考察资本,并且作者想在阐述资本之前先写若干绪论性章节;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包括四篇,而在马克思称为“资本一般”的第一篇中包括三章:(1)价值,(2)货币,(3)资本。

在写作第一册即“资本”时,马克思从1857年8月到1858年6月写的手稿就约有50个印张,这些手稿已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39—1941年期间用德文出版,书名是《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这一手稿包括总的导言、关于货币部分以及篇幅相当大的关于资本的部分,在这里马克思粗略地阐述了自己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的初步成果,其中包括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1857—1858年的手稿实际上是那时马克思所计划的一部经济学巨著的第一部分的未完成初稿。

1858年初,马克思决定分册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同柏林出版家弗·敦克尔签订了初步合同后,就写作第一分册。1858年8月—1859年

1月间,他对货币一章进行了加工,写成商品一章,校订了手稿的最后定稿,加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并于1859年1月26日寄给柏林的出版者。第一分册超过计划中的5—6个印张,而扩大到12个印张,并且不像预计的那样包括三章,而是两章:“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1859年2月,马克思把序言寄给出版社。同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问世。“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小标题是:“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这证明这本书是所计划的六册书中的第一册的开端。

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曾准备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本应阐述资本问题。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使马克思改变了他写作这部巨著的原定计划。他拟定了四卷“资本论”的计划以代替六册书的计划。因此,马克思不再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和其他各册,而着手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某些基本原理经加工后也包括到“资本论”中去。

马克思在世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再版。只有序言是个例外,它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上,但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本书第二章中批判格雷关于劳动货币的空想主义理论的部分,恩格斯曾作为附录列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1885年和1892年的德文版。189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本书俄文第一版。编入本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作者准备付印的德文第一版原文为基础。同时参考了:第一,马克思在他的校正本上加的修改和注;第二,马克思在1859年8月19日赠给威廉·沃尔弗的那本书上所加的修改和注。作者的某些修改和注,已由恩格斯在准备付印第三卷“资本论”时加进去了。恩格斯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各段文字都以马克思修改过的和表述得更加准确的文字为准。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里,藏有这些带有马克思的修改和注的原本的照相复制品。——第3页。

- 2 指马克思为一部经济学巨著写的、但没有完成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33—762页)。——第7页。
- 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

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7页。

- 4 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5—181、210—243页）。——第8页。
- 5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种反动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莱茵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0—134页）。——第8页。
- 6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8页。
- 7 指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页）。——第9页。
- 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第9页。
- 9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 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第10页。
-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和第444—459页。——第10页。
-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10页。
- 12 指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第10页。
- 13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10页。
- 14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编辑有恩格斯,还有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亨·毕尔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师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大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它的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

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10页。

- 15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到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叶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是在曼彻斯特写的，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真正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是在伦敦写的，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给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还删改文章的原文，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与实

- 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 10 页。
- 16 马克思引用威·配第匿名出版的著作“赋税论”1667 年伦敦版（《A Treatise of Taxca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第 24 页。
- 17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每日出版的文学杂志，1711—1714 年在伦敦出版。——第 42 页。
- 18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 年伦敦第 41 第 21 页（《On 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 Fourth ed . London, 1822, p . 21）上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常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总形”这一名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第 50 页。
- 19 马克思称为《Theory of Exchanges》的这篇著作是亨·丹·麦克劳德的文集“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 年伦敦版（《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8）的第 4 章。——第 51 页。
- 20 1844 年英国政府力图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倡议，实施了英国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的黄金保证的固定定额。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 1 400 万英镑。但是，1844 年的银行条例没有起到作用，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要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对货币需要特别感到尖锐，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 1844 年的条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第 54 页。
- 21 指 1707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解散了苏格兰的议会，两国间存在的一切经济上的障碍也消除了。——第 62 页。
- 22 野蛮人的法典（Leges barbarorum）是五世纪至九世纪期间所编纂的日

耳曼各部落的习惯法的纪录。——第 64 页。

- 23 马克思引自约·洛克的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结果。给一议员的信，1691 年”（《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In a Letter sent to a Member of Parliament 1691》），根据“约翰·洛克全集”四卷集 1768 年伦敦第 7 版第 54 页（《The Works of John Locke》. In four volumes. The seventh edition, London, 1768, p. 54）。——第 68 页。
- 24 指《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总公司”），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公司，由贝列拉兄弟于 1852 年创立并为 1852 年 11 月 18 日法令所批准。Crédit Mobilier 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证券交易所的投机买卖。Crédit Mobilier 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财产的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Crédit Mobilier 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 年该公司破产，1871 年停业。Crédit Mobilier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建立了类似的机关。马克思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几篇文章中揭露了 Crédit Mobilier 的真正实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23—40、218—229、313—317 页）。——第 85 页。
- 25 指詹·穆勒的著作“为商业辩护。对斯宾斯先生、科贝特先生等人借以证明商业不是国民财富的来源于的证据所作的回答”1808 年伦敦版（J. Mill. 《Commerce defended. An Answer to the Arguments by which Mr. Spence, Mr. Cobbett, and others, have attempted

- to prove that Commerce is not a Source of National Wealth》. London, 1808)。——第 87 页。
- 26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96 页。
- 27 彼得·施莱米尔是德国浪漫派诗人夏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 106 页。
- 28 Patrem familias vendacem, non emacem esse（家长该卖不该买）——这是老卡托在他的著作“论农业”（《Dererustica》）中的用语。——第 118 页。
- 29 指 1810—1826 年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经过这次战争，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第 125 页。
- 30 指 1727 年 10 月 21 日中俄签订的关于贸易和边界的恰克图条约。由于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中俄贸易，主要是以货易货的贸易大大扩大了。——第 140 页。
- 31 指英法为了获得新的在华特权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附庸国而对中进行的侵略性的、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中国失败，签订了掠夺性的天津条约。——第 140 页。
- 32 马克思引证昂吉埃腊（殉道者彼得）的著作“新大陆”（《De Orbe Novo》）是根据下面这本书：威·希·普雷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附古代墨西哥文化概述。征服者艾尔南·科尔特斯的生平”1850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23 页（W. H.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with a Preliminary View of the Ancient Mexican Civilization, and the Life of the Conqueror Hernando Cortez》 Vol. I, London, 1850, p. 123）。——第 144 页。
- 33 Jakob Grim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Bd. I—II, Leipzig, 1848. ——第 145 页。

- 34 法的历史学派是十八世纪末产生于德意志的历史学和法学中的一个反动流派。关于这一学派的特征，见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97—106页和第454页）。——第157页。
- 35 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似乎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所的空买空卖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1720年国家银行完全倒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第159页。
- 36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第160页。
- 37 大陆封锁，或大陆体系，是拿破仑第一于1806年宣布的。它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实行大陆封锁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俄罗斯、奥地利等国。——第168页。
- 38 指1807年为反对拿破仑第一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而颁布的一些“敕令”（orders in council），即禁止中立国家同法国以及加入大陆体系的国家进行贸易。——第168页。
- 39 汉鲁斯泰特是伦敦29个区之一。——第172页。
- 40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伊索寓言中的“牧童和农夫”的故事。——第178页。
- 41 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从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时起就驻扎在罗马和教皇国的领土上，瑞士雇佣军则是罗马教皇的近卫军。——第178页。
- 42 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并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的威尼斯和伦巴第发生了意大利居民反对奥地利的群众性发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在1848年初被奥地利当局封闭的帕维亚城内的一个大学是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当时到处都发生了要求实行行政

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请愿运动。为了对苛捐杂税、对限制意大利工商业的措施以及对奥地利人实行的烟草垄断表示抗议，居民一致抵制奥地利的工业品和烟草；共和党人的地下小组组织了游行示威，示威者经常与军警发生冲突。——第 179 页。

43 指 1848 年 3 月 18—22 日米兰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为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奠定了基础。经过人民群众五天的斗争，奥地利军队被逐出米兰，3 月 22 日成立了有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第 179 页。

44 1859 年 1 月 1 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接见外交使团时，向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表示遗憾，说法奥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如以前那样友好”。这次谈话引起了拿破仑第三与奥地利的外交冲突。而关于对奥发动战争的问题早在这以前很久就已决定了：1858 年 7 月法国和皮蒙特在普龙比埃尔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法国将参加即将发生的对奥战争，为此，皮蒙特答应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第 179 页。

45 1842—1846 年，加里波第参加了乌拉圭人民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所建立的意大利侨民革命军团在乌拉圭共和国的首都蒙特维多的保卫战中和其他决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乌拉圭政府曾颁发特令表彰加里波第军团的功勋。

1849 年 2—7 月，加里波第实际上领导了由于人民起义而建立的罗马共和国的保卫战。共和国的军队在几个月内胜利地击退了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军队为镇压革命而举行的进攻。1849 年 7 月 3 日，由于反革命力量占优势，同时法国将军乌迪诺背信弃义地破坏停战协定，占领了罗马城，因而罗马共和国被颠覆。——第 180 页。

46 指 1858 年 8 月俄国和皮蒙特所达成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俄国航运贸易公司有权临时使用尼斯附近的维拉弗兰卡港湾的东部来停泊船只、添燃料和修理船只。——第 180 页。

47 马克思讽刺奥地利因为沙皇俄国帮助它镇压了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而“感恩图报”。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东方问题的尖锐化奥地利在对外政策上转而敌视俄国，这种转变表现在据说是奥地利政府首脑

施瓦尔岑堡说的、后来成了成语的一句话中：“奥地利还要以其忘恩负义的崇高行为使全世界惊奇。”——第 180 页。

- 48 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这个字眼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被人使用的。由于英国政府进行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许多阴谋活动并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所以法国共和党人这样称呼英国。——第 180 页。
- 49 指拿破仑第三。他在 1851 年 12 月 1 日夜间接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1848—1851 年）。——第 182、196、307、435、501、543、592 页。
- 50 皮蒙特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因害怕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运动扩大，千方百计地拒绝帮助在 1848 年 3 月发动起义反对奥地利统治的威尼斯和米兰。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他被迫对奥地利宣战，但是在皮蒙特军队最初几次失利以后，他却在 1848 年 8 月与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定，1849 年春季又恢复了军事行动，虽然皮蒙特军队和意大利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他在诺瓦拉会战失败（1849 年 3 月 23 日）后，竟向奥地利投降。恩格斯在 1849 年给“新莱茵报”写的许多文章中揭露了皮蒙特君主国的这种叛变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58—468 页）。——第 183 页。
- 51 这篇注明写于巴黎的文章是马克思在伦敦写的。根据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协议，马克思把引用了欧洲大陆个别国家的材料的某些文章相应地分别注明巴黎、柏林或维也纳，有时注明的日期也比实际写作的时间早。——第 185 页。
- 52 指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的，即 1806—1810 年期间占据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马克思称拿破仑第三为“奥斯特利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政变正好安排在拿破仑第一粉碎了俄奥联军的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 年 12 月 2 日）的周年纪念日。——第 185、506 页。
- 53 指的是普鲁士亲王威廉（从 1861 年起即位为国王）在 1858 年 10 月开

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的。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改革，一项也没有实行，同时在 1860 年却实行了早就策划好的军事改革，这项改革把从 1813—1815 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来在普鲁士军队中还保留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残余也消除净尽了；改革规定后备军（按民团形式组成的军队）以后只用于警备勤务，规定在平时要大大扩充军队人数。“新纪元”实际上为 1862 年 9 月俾斯麦执政时开始的公开的容克地主的军事专政作好了准备。——第 186 页。

- 54 Cr édit Mobilier——见注 24。——第 186 页。
- 55 “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从 1789 年至 1901 年在巴黎出版；从 1799 年至 1869 年是官方政府机关报。——第 186 页。
- 56 礼拜堂街、伦巴特街都是伦敦西蒂区的街道，那里有英国最大的银行和商业企业；针线街——见注 36。——第 186 页。
- 57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在中亚细亚和远东的阵地的加强。在这个时期俄国在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的势力大大加强了；由于同中国签订了各种条约，1858 年黑龙江北岸地区归属于俄国，此外，为俄国贸易开辟了五个中国商埠。——第 187 页。
- 58 “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给路易·波拿巴起的带讽刺性的绰号，在他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1852）问世以后，这个绰号得到了广泛流传。——第 187 页。
- 59 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自 1855 年即位以后，慑于国内农民骚动的声势浩大而不止一次许诺过的关于废除农奴制的诺言。——第 188 页。
- 60 《L' Empire c' est la paix》（“帝国就是和平”）是 1852 年 10 月 9 日路易·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中的话。——第 188 页。
- 61 根据 1859 年 1 月 15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在寄往美国以前经马克思修改和补充。——第 189 页。

- 62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创办于布鲁塞尔;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189页。
- 63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从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89页。
- 64 巴黎条约是1856年3月30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所签订的和约,也就是约束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俄国应当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和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庇护权,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国的军舰通过海峡,同意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军火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来换回联军在克里木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媾和条件纵然对俄国来说是苛刻的,但是英国和奥地利仍未能全部实现其侵略意图。影响谈判结局的原因之一,是俄国外交方面很好地利用了英法之间的矛盾。在会议上法国不支持英国想从俄国手中夺取高加索的要求以及奥地利想使贝萨拉比亚并入土耳其的要求。在会议上形成的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接近后来又进一步加强了。——第190页。
- 65 意大利烧炭党最高温特是十九世纪初出现的,以把外国侵略者赶出意大利和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为目的的烧炭党人的密谋性团体的领导机关。1831年,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加入了烧炭党人的团体,一度还参加过该党的活动。——第190、196页。
- 66 埃普塞姆——伦敦的一个郊区,那里每年春天都举行赛马会。——第191页。
- 67 指的是费利切·奥尔西尼在1858年2月11日和3月10日写的信,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信件是奥尔西尼由马扎斯监狱和拉·罗克特监狱寄给拿破仑第三的,这位意大利爱国者在行刺拿破仑第三未遂后被囚于这两个监狱。第一封信是在审讯奥尔西尼时宣读的,后来于1858年2月27日载于“通报”;第二封信是奥尔西尼被处死后公布的。奥尔西尼写这两封信给路易·拿破仑的事实是否确凿,直到现在还是历史文献中

的疑案。——第 191 页。

- 68 Cr *édit Foncier* (土地信用公司) 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 1852 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Cr *édit Foncier* 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 50 年)。Cr *édit Foncier* 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第 191 页。
- 69 德意志联邦是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国各邦的联盟,最初它包括 34 个邦和 4 个自由市。在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第 193 页。
- 70 暗指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于 1850 年 10 月 10 日在萨托里平原(靠近凡尔赛)举行总阅兵一事。正在策划政变的波拿巴,为了博得兵士和军官的好感,在阅兵时犒赏了他们。——第 196、307、427 页。
- 71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军事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 年 10 月 30 日,他依靠一些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军官的帮助,煽动了斯特拉斯堡守备部队的两个炮兵团实行叛乱,但是,仅仅经过几个小时,叛乱者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逮捕并流放到美洲。1840 年 8 月 6 日,他趁波拿巴主义情绪在法国又有抬头之际,同一伙阴谋分子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守备部队中掀起叛乱。这一企图也彻底失败了。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在 1846 年逃往英国。——第 196 页。
- 72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 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 1848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 12 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197 页。
- 73 暗指拿破仑第一出于政治考虑而同奥皇的女儿玛丽亚-路易莎结婚一事。——第 198 页。
- 74 指 1858 年 7 月拿破仑第三在普仑贝尔(法国)同皮蒙特首相卡富尔会晤时所签订的协定。协定规定,取消奥地利对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治,

- 建立在萨瓦王朝领导下的北意大利国家，皮蒙特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1859年1月以前，这个协定一直是秘密的。——第198页。
- 75 帕勒-乐雅尔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在五十年代是约瑟夫·波拿巴（普隆-普隆）亲王的官邸。——第198页。
- 76 “新闻报”（《La Presse》）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五十年代站在反对第二帝国政体的立场上；该报的编辑是艾米尔·德·日拉丹。马克思把这一报纸讽称为普隆-普隆的“通报”，即普隆-普隆的官方通报。——第198页。
- 77 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根据这一决议，法国不得再占有欧洲的领土。但是，对于作为法国掠夺性的殖民政策对象的北非和其他领土，没有作出保留声明。——第199页。
- 78 指1859年1月30日“立宪主义者报”第30号上发表、由法国记者路·博尼法斯署名的一篇文章。——第200页。
- 79 “美国信使报”（《Le Courier des Etats-Unis》）是一家法文日报，从1828年到1938年在纽约出版，反映法国政府的立场。——第200页。
- 80 指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第201页。
- 81 朱阿夫兵是从1830年起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由当地居民和法国移民组成的法国殖民部队，后来，这支部队完全由法国人组成。当地居民被划出组成阿尔及利亚猎兵特别团。
捷菲尔兵是法国军队中由犯人组成的非洲步兵部队的非正式名称。——第202页。
- 82 近卫军是拿破仑第三在1854年仿照1815年解散的拿破仑第一的皇家近卫军建立的。——第204页。
- 83 边屯区——十六至十九世纪时期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巴纳特）被称为边屯区。边屯区居民必须担任边防勤务，才能耕种土地。——第207页。

- 84 指 1848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奥军强攻革命的维也纳时参加战斗的斯拉夫部队。——第 209 页。
- 85 瑞士武装力量是在民兵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平时，凡是能够服兵役的公民都要进行短期的训练，一旦发生战争就宣布总动员。——第 210 页。
- 86 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 1795 年 4 月 5 日同法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
1806 年 10 月 14 日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击败，这促使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
关于奥斯特利获会战见注 52。
1809 年 7 月 5—6 日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拿破仑第一对奥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 212 页。
- 87 指 1796—1797 年波拿巴在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在意大利战局最初阶段进行的几次会战。1796 年 4 月，波拿巴的军队从尼斯经由山道向波河河谷发起进攻，4 月 12 日在蒙特诺特击败了一股奥军；4 月 13—14 日在密雷栖摩粉碎了在与奥军结盟的皮蒙特军队编制中的一股奥军；4 月 14—15 日在德果击败了前来援救这一股军队的奥军。1796 年 4 月 22 日，法军在蒙多维与皮蒙特军队进行决战，结果皮蒙特军队向都灵溃退。——第 213、234、665 页。
- 88 波拿巴围攻曼都亚是在 1796 年 6 月开始的。当时，波拿巴的主要兵力正在对那些企图替要塞解围的奥军作战。1796 年 8 月 5 日，波拿巴在卡斯提奥涅击败了乌尔姆捷尔指挥的奥军，1796 年 9 月上半月在布兰塔河河谷再次击败了乌尔姆捷尔的军队；1796 年 11 月 15—17 日，法军在阿尔科列会战中粉碎了新派往曼都亚解围的奥军；1797 年 1 月 14—15 日波拿巴在里沃利会战中又一次打败了奥军。经过 9 个月的围攻，法军终于在 1797 年 2 月 2 日迫使曼都亚守军投降。——第 213 页。
- 89 拿破仑的军队围攻但泽(格但斯克)是在拿破仑第一对欧洲各国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间，于 1807 年 3 月开始的。守备要塞的普鲁士军队

和俄国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守军的行动得到另一支曾多次企图解围的俄国部队的支援。直到 1807 年 5 月底，在不受侮辱的条件下，要塞守军才向优势敌人投降。——第 213 页。

- 90 1515 年 9 月 13—14 日的马利尼亚诺会战，是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在 1494—1559 年进行的意大利战争中最重大的会战之一。在会战中，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的军队打败了米兰公爵的瑞士雇佣军。1525 年 2 月 24 日，弗朗斯瓦一世的军队在帕维亚被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所击败。

1706 年在都灵会战中，意大利军队粉碎了围攻都灵 117 天的法军。

1799 年 8 月 4 日（俄历 15 日）在诺维会战中，由亚·瓦·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奥联军，粉碎了茹贝尔的法军，最后把法军逐出北意大利。

1800 年 6 月 14 日在马连峨会战中波拿巴的军队击败了奥军。

1848 年 7 月 25 日在库斯托查，由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使皮蒙特军队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关于诺瓦拉会战见注 50。——第 213 页。

- 91 原文是双关语，《captain》既有“统帅”的意思，又有“上尉”的意思。前瑞士炮兵上尉是指路易·波拿巴，他在瑞士住过很长时间，曾入瑞士国籍，1834 年曾任伯尔尼州炮兵团的上尉。——第 214 页。
- 92 1830 年法国政府开始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由于殖民者遇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顽强的抵抗，这一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 40 年。直到 1871 年，法国资产阶级才最后把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第 218 页。
- 93 指 1800 年的意大利战局。奥军总司令梅拉斯最初在瓦尔河附近胜利地攻击了法军右翼，但是在 1800 年 5 月下半月，波拿巴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奥军的后方。6 月 2 日，法军占领米兰，并渡到波河南岸，1800 年 6 月 14 日奥军在马连峨被击溃。——第 220 页。
- 94 指“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政大臣所作的截至 1858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报告”1858 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8》. London, 1858)。——第 221 页。
- 95 阿木斯堡会战和埃克缪尔会战是 1809 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和奥军于 1809 年 4 月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进行的历时 5 天的会战的两个阶段。累根斯堡会战以奥军的失败和退却而告终。——第 234 页。
- 96 1848 年 7 月 23 日在索马康帕尼亚会战中，奥军在拉德茨基指挥下打败了皮蒙特军队，这一会战之后皮蒙特军队紧接着就在康斯托查被击溃。——第 234 页。
- 97 除了本文以外，马克思还在 1859 年 3 月 22 日和 4 月 1 日写了两篇文章，论述 1859 年的议会改革法案，但是它们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我们也没有搜集到。——第 235 页。
- 98 1851 年 2 月提交下院讨论的洛克·金法案规定把土地租赁者的选举资格限制从每年收入 50 英镑降低为 10 英镑，从而就使他们同城市中房屋租赁者在权利上平等了，这一法案遭到议会否决。——第 235 页。
- 99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有者”。自由农向贵族缴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且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为自由农规定的选举财产资格限制是很低的，即每年纯收入为 40 先令（2 英镑）。——第 235 页。
- 100 1831 年经英国下院通过、1832 年 6 月经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它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院打开了大门。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骗，没有获得选举权。有一条条文规定，只有每年缴纳租金 50 英镑以上的租地者才能享有选举权，这一条文是被当作对契安多斯（格伦维耳）公爵法案的修改而提出的。——第 235 页。
- 101 1852 年 2 月，约翰·罗素作了一个关于提出改革法案的预先声明。法案规定的各项措施——取消 1832 年改革以后仍然保留下来的居民在

500 人以下的、过去曾经选派议员的所谓“腐朽的市镇”，重新分配议员的席位，使之有利于大城市，以及降低选举资格限制和财产资格限制——是为了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一法案也没有提交议院讨论。

1854 年 2 月，约翰·罗素提出了一个新法案，提出对农村选区和城市选区应权利平等，凡是每年薪金达 100 英镑以上的人，或者持有国家有价证券、银行股票或东印度公司股票而每年收入的利息在 10 英镑以上的人，或者在储蓄所有 50 英镑以上存款的人，那可以享有选举权；并且提出要给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以选举权。约翰·罗素的这个法案遭到下院否决。——第 237 页。

- 102 指埃伦伯勒起草的印度管理法案。1858 年春天提出的这个法案规定要通过英国各居民阶层的代表进行选举的极其复杂的程序来成立印度事务委员会。这一法案遭到议会否决。——第 237 页。
- 103 契约农是根据租佃权而占用土地的人，租种的期限和条件由大地主和佃农订立的契约来确定。契约农同时也可能是小土地所有者。——第 237 页。
- 104 指“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英国政府的机关报；1666 年起，以这个名称每周出版两次。——第 239 页。
- 105 1859 年 3 月—4 月初在二读时，选举改革法案因为没有获得多数票的通过，遭到议会否决。——第 239、355 页。
- 106 指 1844 年的法律，该法律禁止工厂雇用 8 岁以下儿童，并把 8 岁至 13 岁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六个半小时。这一法律同时也承认了 1833 年法律所规定的对重工的义务教育，但作了若干改变。——第 240 页。
- 107 指的是由于通过 1844 年的法律而更改 1833 年的法律。按照新法律，丝织业中年龄在 11 岁以上的童工可以不上学。——第 242 页。
- 108 “波河与莱茵河”这一著作是弗·恩格斯在下述情况下写的，当时在意大利即将发生冲突，有必要明确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欧洲的民主派对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的道路问题所应采取的立场，以反对资产阶级的，

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还提出了一项任务：揭穿欧洲各国统治集团用来为其侵略和掠夺政策辩护的各种沙文主义理论，并证明这些理论从战略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著作恩格斯在2月计划撰写，3月9日就已写成，并将手稿送给马克思校阅。马克思看过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1859年3月10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妙极了，就连很难处理的这一问题的政治方面，也阐述得非常出色。”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为了避免官方以沉默来抵制的阴谋，这一著作是在德国匿名刊印的。1859年4月它由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印数是1000册。这一著作对当时德国的社会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它在军界也很有影响；许多人都以为，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将军。1859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让广大读者了解这一著作出自哪一党派，于是就在“人民报”第2号指出，它的作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稍晚一些时候，在6月4日“人民报”第5号上公布了恩格斯的名字。——第247页。

- 109 指1848年8月12日拉多维茨在德国国民议会会议上的讲话。从1848年5月18日到1849年5月30日，国民议会的会议都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的。——第250页。
- 110 威·维利森“1848年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W·W illisen.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第250页。
- 111 根据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原来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阿尔萨斯和部分洛林转归法国。1766年整个洛林都归属法国。——第251页。
- 112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创立于962年的一个中世纪的帝国，其领土包括整个德国和部分意大利。后来，法国的部分领土、捷克、奥地利、尼德兰、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个帝国。这个帝国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是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力的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哈布斯堡王朝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第251、395页。

- 113 指南尼德兰（即现在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南尼德兰从 1714 年到 1797 年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当时被称为奥属尼德兰。——第 251 页。
- 114 指对拿破仑第一的大陆体系（见注 37）的模仿。——第 251 页。
- 115 见注 90。——第 253 页。
- 116 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大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法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战争的结果是，不列颠殖民帝国靠占有法国的领地而得到扩张和俄国实力的增长；奥地利和普鲁士基本上保持原来的疆界。——第 262 页。
- 117 这是若米尼在他著的“军事学术概论，或战略、大型战术和军事政策的配合的新分析表解”（《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ou Nouveau tableau analytique des principales combinaisons de la stratégie, de la grande tactique et de la politique militaire》）一书中所用的术语。该书的第一版于 1838 年在巴黎出版。——第 263 页。
- 118 见注 43。——第 265 页。
- 119 在 1848 年的三月日子里，在全意大利奋起反对奥地利统治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教皇庇护九世和那不勒斯的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派军队去北意大利参加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但是这些军队参加解放战争是暂时的，不久斐迪南二世和庇护九世便公开投入意大利革命的敌人的阵营。——第 266 页。
- 120 1848 年 5 月 15 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实行了反革命政变，残酷地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义。原来在伦巴第支援革命军的一个那不勒斯军被斐迪南二世召回那不勒斯，这减轻了拉德茨基在北意大利的负担。——第 266 页。

- 121 所列举的是 1796—1797 年波拿巴所进行的意大利战局中在围攻曼都亚时期（见注 88）发生的几次会战：在美多列，奥军败于法军；在巴萨诺，波拿巴于 1796 年 9 月 8 日击败了武尔姆泽尔指挥的奥地利军队；由于在 1796 年 11 月 6—7 日的卡利阿诺会战中遭到失败，法国军队被奥地利军队击退到里沃利。——第 268 页。
- 122 指 1809 年提罗耳农民在安德列阿斯·霍弗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次起义战争中，提罗耳人广泛地采用了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法。1809 年 10 月奥地利政府同拿破仑法国签订和约以后，提罗耳农民由于得不到奥地利正规军的支持，于 1810 年被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击溃。——第 269 页。
- 123 指法国反对第二次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时期于 1800 年 12 月 3 日发生的霍根林登会战。法国军队在莫罗指挥下击败了约翰大公的奥地利军队。——第 269 页。
- 124 指毕洛夫著的“德国和意大利 1800 年战局史”（Bulov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00 en Allemagne et en Italie》）一书。该书第一版于 1801 年在柏林以德文出版。——第 269 页。
- 125 指 1808—1814 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西班牙人广泛地采用了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法。——第 271 页。
- 126 莱茵联邦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有 16 个德国邦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 5 个邦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1813 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遭到失败以后，莱茵联邦便瓦解了。——第 272 页。
- 127 根据 1805 年 12 月 26 日法国和奥地利在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签订的和约，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意大利部分领土（皮蒙特、热那亚、帕尔马、皮阿琴察等）的占领，并把亚得利亚海的沿海地区（威尼斯省、伊斯的利亚半岛和达尔马威亚）让给了意大利王国（也就是让给了意大利

利国王的拿破仑第一),自己仅保留了的里雅斯特。拿破仑把提罗耳转让给与他结盟的巴伐利亚。——第 272 页。

- 128 指 1806 年 10 月 14 日法军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战胜了普鲁士军队以后,在拿破仑第一率领下在普鲁士疾速地、几乎毫无阻挡地向前推进的事实;10 月 28 日法军就已进入施特廷(兹杰辛)。——第 277 页。
- 129 公元前 321 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峡谷”的说法,即遭受莫大的侮辱。——第 278 页。
- 130 指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意大利的革命事件。1820 年 7 月资产阶级革命者烧炭党人在那不勒斯发动起义,反对专制制度,争取实行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宪法。1821 年 3 月皮蒙特发生起义。领导起义的自由党人颁布了宪法,并企图利用北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运动,将整个国家在皮蒙特执政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由于神圣同盟各大国的干涉以及奥地利军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皮蒙特,这两个国家又恢复了专制制度。——第 278 页。
- 131 1808 年秋,当拿破仑第一到爱尔福特同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谈判时,几乎整个德国都向法国屈服了,只有奥地利还对拿破仑作过抵抗。为了向拿破仑表示忠诚而聚集到爱尔福特的德国各邦君主,同意共同反对奥地利。

1850 年 5 月和 10 月,在华沙举行了有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参加的会议,会议是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尖锐化而由俄国倡议召开的。在会议上,俄皇以奥普争端的调停人的身分出现,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迫使普鲁士放弃了在它的保护下建立德国各邦的政治联盟的企图。

布隆采耳会战在这里是对库尔黑森(黑森—加塞尔)起义时期于 1850 年 11 月 8 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先头部队发生的一次小战斗的讽刺;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涉库尔黑森内政以镇压起义的权利。在与普鲁士发生的这次冲突中,奥地利又得到了俄国在外交上的

- 支持，普鲁士被迫让步。——第 280 页。
- 132 指反拿破仑同盟的军队于 1814 年 3 月 30—31 日和 1815 年 7 月 6—8 日占领巴黎的事实。——第 282、676 页。
- 133 奥登纳德会战发生在 1708 年 7 月 11 日，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时期。法军被英奥联军所击败。
1792 年 11 月 6 日，法国革命军在杜木里埃指挥下于热马普大胜奥军。1794 年 6 月 26 日在弗略留斯会战中，法军击溃了科堡公爵的军队。这项胜利使法军得以进入比利时境内并占领比利时。
1815 年 6 月 16 日，普鲁士军队在布吕歇尔指挥下于利尼被拿破仑的法军所击败。这是拿破仑第一获胜的最后一次会战。1815 年 6 月 18 日在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指挥的英荷联军和普鲁士军队所击溃。——第 285 页。
- 134 指 1814 年 2—3 月拿破仑第一在蒙米赖、梯叶里堡、里姆等会战中战胜了第六次反法同盟的优势兵力。——第 286 页。
- 135 威塞尔、卡斯特尔和克尔于 1808 年并入法国；在联军粉碎了拿破仑法国以后，这些莱茵河上的筑垒据点归还给了普鲁士。——第 288 页。
- 136 丹麦到埃德尔河！——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丹麦自由党（即埃德尔丹麦人党）提出来的口号，他们要求把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并且与邻近的其他德国地区有埃德尔河一河之隔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完全与丹麦合并。——第 293 页。
- 137 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是讽指德国的各小邦，它们的正式名称是弟系罗伊斯和长系罗伊斯。——第 293 页。
- 138 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比利时和荷兰组成一个统一的尼德兰王国，而比利时实际上是隶属于荷兰。由于 1830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比利时成了独立的君主立宪国。——第 294 页。
- 139 暗指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格·弗·科尔布在 1859—1866 年由他担任编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法兰克福报”上发表的充满普鲁士大国

政策精神的好战言论。——第 295 页。

- 140 这是 1748 年 8 月 14 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给骑兵少将们的训示中的话。——第 296 页。
- 141 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时期，在 1757 年 11 月 5 日的罗斯巴赫会战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打败了法国和与普鲁士为敌的德国各邦的联合兵力。1758 年 8 月 25 日（俄历 14 日）在措尔恩多夫，弗里德里希二世同俄国军队进行了会战，结果双方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未分胜败。
- 在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40—1748 年）时期，在 1745 年 6 月 4 日的霍恩弗里德贝尔格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指挥下击败了奥地利—萨克森的联军。在这几次会战中，普鲁士骑兵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296 页。
- 142 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和维护那里的封建君主制度于 1815 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 296、673 页。
- 143 指波拿巴分子拉·格隆尼埃尔匿名出版的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1859 年巴黎版（《L'Empereur Napoléon III et l'Italie》Paris, 1859）。——第 297 页。
- 144 1858 年底到 1859 年初，在 1815 年确立了英国保护权的伊奥尼亚群岛上当地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他们要求取消不列颠高级专员对该岛的专制统治，并与希腊合并。从 1815 年以来一直延续不断的斗争在 1864 年以伊奥尼亚群岛转归希腊而告终。
- 1857—1859 年印度发生了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 1857 年春在孟加拉军队中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所谓西帕依部队发动的，起义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极其广大的地区。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贫苦的手工业者。由当地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上的分歧以及殖民者在军事技术上占着优势，结果遭到了失败。——第 298 页。

- 145 恩格斯关于一些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看法，即他认为这些小民族通常没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下去，而在集中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更大的、生命力更强的民族所吞并的意见，是不确切的。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集中的趋势，建立大国的趋势，但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另一种趋势——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的斗争的趋势，它们力求建立自己的国家的趋势。历史表明，有许多小民族，而且首先是以前参加了奥地利帝国的那些斯拉夫民族，不仅表现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发展的能力，而且成了建立新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参加者（关于这一点详见本版第 6、8 和 11 卷的说明）。——第 298 页。
- 146 本文和下一篇文章“土伊勒里宫的叹息”原是马克思写的一篇文章，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它作为两篇独立的社论分别发表在本报的两号上。——第 300 页。
- 147 指 1859 年 3 月 5 日“通报”非官方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曾予转载。——第 300 页。
- 148 法国外交曾利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希望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愿望来巩固拿破仑第三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1859 年 1 月在法国和俄国的协助下亚历山大鲁·库扎上校被选为两个公国的国君（执政者）。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到 1862 年才建立。——第 301、505 页。
- 149 指拿破仑第三写给英国作家弗兰西斯·赫德的信。这封信刊载在 1859 年 3 月 5 日的“泰晤士报”上。——第 302 页。
- 150 暗指弗·赫德的著作“拿骚泉源的肥皂泡”。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他就获得了从男爵的封号。——第 302 页。
- 151 暗指路易·波拿巴亲王在 1838—1840 年和 1846—1848 年间作为流亡者侨居英国一事。——第 302 页。
- 152 指路易·波拿巴在 1836 年和 1840 年先后企图在法军中掀起叛乱都遭到失败的事实（见注 71）。——第 303 页。

- 153 1846年2月在波兰领土上准备进行一次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叛卖行为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所逮捕,总起义遭到了破坏,只是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获得了胜利,成立了国民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了。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条约,把克拉科夫归并奥地利帝国。——第306页。
- 154 指1848年奥地利的尖锐的财政危机。危机的表现是:国债大量增加,货币贬值,纸币大量发行。——第306页。
- 155 指拿破仑第三在1859年1月1日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所作的反对奥地利的谈话(见注44)。——第306页。
- 156 1858年2月在指责英国允许政治侨民避难的法国政府的威胁的影响下,帕麦斯顿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外侨管理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参加阴谋活动的外国人,同英国人一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法案在群众抗议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决了,帕麦斯顿也被迫辞职。——第307页。
- 157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区的一条街道,英国政府的所在地。——第307页。
- 158 1852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从非洲(包括葡属非洲领地)把黑人迁移到法属西印度殖民地的种植场去劳动的计划。这个实际上恢复了奴隶买卖的计划的实行,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1857年11月载有黑人的法国商船“沙尔和若尔日号”在东非洲海岸的葡属领地被扣留了,欧洲报纸对这件事反应频繁。——第307页。
- 159 1801年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吕内维尔和约和1802年法国和英国之间签订的亚眠和约结束了法国和第二次反法同盟之间的战争。但是,和平是非常短暂的。由于英国不履行亚眠和约中规定的撤出它在1800年占领的马耳他岛并将其交由各列强共同保护的条款,拿破仑第一便以此为借口重新恢复战争。1803年3月拿破仑在土伊勒里宫接见英国

- 大使惠特沃思勋爵结束谈话时尖声喊道：“马耳他或者战争！”——第 307 页。
- 160 1858 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是反对得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阁的辉格党反对派的领袖）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到贡比昂去阐明他对行将来临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见时，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但是在 1859 年 2 月 3 日议会开幕时，帕麦斯顿在演说中谴责了法国的行动。——第 307 页。
- 161 英国公爵的幼子们获得“礼貌上尊称的”（《by courtesy》）勋爵的封号，就是说，他们只是由于习惯而获得这样的封号，在法律上并没有继承这个封号和成为上院议员的权利。《by courtesy》这个常用语适用于一切不是由法律保证的，而是恩赐的或相沿成习的东西。——第 308 页。
- 162 1840 年 7 月 15 日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背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以反对受法国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协定。由于这个协定的缔结，法国和欧洲各国同盟之间便产生了爆发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菲力浦国王没有下定决心打仗，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第 309 页。
- 163 奥地利在 1859 年 2 月 22 日向普鲁士递交了一份照会，该照会同时分发给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德国其他各邦，在照会中奥地利要求普鲁士履行自己对盟邦所负的义务，参加行将来临的反法斗争。——第 309 页。
- 164 暗指意大利烧炭党人的秘密团体（见注 65）。
菲麦（Vehme）是中世纪德国秘密法庭的名称，它们以秘密审判的方式对被告做出缺席判决，并且秘密加以执行。——第 310 页。
- 165 指奥地利，它曾在 1855 年和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签订了一个宗教条约。根据这个条约，1848—1849 年革命期间被废除了的许多天主教会的特权恢复了。主教们重新获得了同罗马直接联系的权利，设立了最高宗教检查机构，学校的课程受到教会的监督。为监督宗教条约的执行，在维也纳成立了一个特别宗教会议，由圣使担任主席。——第 311 页。
- 166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是在北非古罗马的一个同名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

来的感化移民区；从 1851 年不 1860 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一个城市,政治犯流放和服苦役的地方。——第 312 页。

- 167 关于华沙会议和布隆采耳会战见注 131。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是 1848—1850 年间奥普关系尖锐化的原因之一。1848 年 3 月,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普鲁士站在起义者方面,参加了战争。奥地利在此时期和其他的欧洲列强一起支持丹麦君主国,并对普鲁士施加压力,迫使它在 1850 年 7 月和丹麦缔结和约。1851 年冬,德意志联邦的军队(奥军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对起义者进行了讨伐,迫使后者放下武器。

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 年)期间,在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间投机取巧的普鲁士在奥地利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被迫在 1854 年同意奥地利关于俄军必须从多瑙河两公国撤退的要求,并答应在战争结束时支持奥地利向俄国提出的敦促沙皇政府接受联军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最后通牒。——第 312 页。

- 168 指 1858 年 5—8 月在巴黎召开的各大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土耳其、普鲁士、撒丁)会议上普鲁士所持的反奥立场,在会上普鲁士不顾奥地利的反对,支持了关于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的建议(见注 148)。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见注 69)的中央机关,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德国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是执行德国各邦的反动政策的工具。

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从 1851 年起是俾斯麦。他在开始进行活动时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 年初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第 313 页。

- 169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国各邦的关税同盟,是 1834 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国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德国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第 313、525 页。

- 170 关于巴塞尔和约见注 86。——第 313 页。
- 171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 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 6 月起在柏林出版,它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家报纸也称为“十字报”,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一个十字。——第 313 页。
- 172 指 1859 年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普鲁士人和意大利问题”(《Preu en und die Italienische Frage》)。——第 313 页。
- 173 贝奥提亚人——贝奥提亚省的居民,这个省被认为是古希腊的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省份。——第 314 页。
- 174 指 1848 年 6 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宣布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摄政王,授权他在帝国宪法生效以前掌管执行权;1849 年 12 月以前担任摄政王的约翰实际上是德国君主们的反革命政策的执行者。——第 314 页。
- 175 1855 年 4 月拿破仑第三和皇后欧仁妮一起访问了英国。——第 317 页。
- 176 指伦巴第的王冠。——第 317 页。
- 177 指的是 1836 年和 1857 年的危机前夕在 1836 年和 1856 年出现的经济上的景气现象。——第 317 页。
- 178 暗指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初期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的公爵们从自己的领地上逃跑一事。——第 318 页。
- 179 根据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于 1856 年签订的巴黎和约(见注 64),俄国丧失了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并被迫放弃对多瑙河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

后来,俄国由于力图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援助了巴尔干各国人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和法国一起,支持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和建立罗马尼亚国家的要求,俄国还支持了 1858 年 11 月底发生的塞尔维亚王朝政变,由于政变的结果,在对外政策上依

附于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王朝被奥布廉诺维奇王朝所代替。——第 323 页。

- 180 见注 144。——第 325 页。
- 181 奖金是政府决定授予参加消灭或截获敌人船只以及走私的中立船只的战舰舰员的款项。——第 325 页。
- 182 1854 年墨西哥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接着发生了内战，一直继续到 1860 年底，结果封建主和僧侣的反动势力被粉碎了。——第 328 页。
- 183 指的是孟买，根据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孟买和孟加拉、马德拉斯一起被划为由总督统辖的特别管区。——第 330 页。
- 184 马克思讥笑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是大莫卧儿王朝的继承者。大莫卧儿帝国（当时对一个执政王朝的称呼）是 1526 年由突厥族征服者——莫卧儿人（现代人认为就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它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领土和一部分阿富汗的领土以后，达到全盛时期。但是，由于多次的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族人民对征服者不断反抗，同时它内部经常发生内讧以及封建分离主义的倾向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开始衰落，十八世纪上半期实际上就已经瓦解了。——第 331 页。
- 185 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 年）——英法反对中国的掠夺性战争——以后，于 1858 年 6 月签订的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的附件。这个条约规定，除了以前已经开辟的 5 个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以外，在扬子江、满洲、台湾和海南岛再开辟 5 个商埠；允许外国在北京驻经常的外交代表，外国人在中国国内自由来往和在河内自由航行，保证传教士受到保护。英国殖民者根据天津条约大大扩大了在中国的特权以后，同意限制鸦片贸易；鸦片贸易耗尽了中国的资源，同时也限制了殖民者本身开发这些资源的可能性。
- 条约的附件谈到要调整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规定向中国输入鸦片要征收高额税款：外国商人只能在条约严格规定的商埠上贩卖鸦片，外国人在中国国内贸易方面的一切优惠条件不适用于鸦片贸易——第 333 页。

- 186 克拉科夫在 1846 年起义（见注 153）遭到镇压以后被并入奥地利帝国。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奥地利当局在匈牙利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不仅匈牙利革命期间通过的一切法律被废除了，而且匈牙利早在革命前所有的部分自治权也被取消了。——第 335 页。
- 187 四项条款是参加克里木战争的各大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 1854 年 8 月 8 日的照会中作为开始和谈的先决条件向俄国提出的四项要求，就是：俄国必须放弃对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这些地区由全欧洲共同保护；开放多瑙河，使各国可以自由通航；同意修改 1841 年签订的关于海峡的伦敦公约；放弃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俄国政府起初拒绝接受这些条款，但是 1854 年 11 月它同意以这些条款作为将来进行和谈的基础。——第 335 页。
- 188 1815 年维也纳条约规定，奥地利有权在费拉拉、科马基奥和皮阿琴察驻军。——第 335 页。
- 189 1818 年 11 月 15 日的亚琛议定书是五大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法国）在神圣同盟（见注 142）第一次会议上签订的。议定书重申忠实于 1815 年的条约以及维也纳会议上确定的欧洲的国家制度；议定书宣布各大国愿意支持各地的封建专制制度并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 339 页。
- 190 “祖国报”（《La Patrie》）是 1841 年创办的一家法国日报，1850 年它代表了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以后，它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342 页。
- 191 从 1859 年 4 月 22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根据新的材料对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和补充。——第 343 页。
- 192 指 1821 年 5 月神圣同盟在来巴赫（柳布梁纳）举行的会议。在来巴赫会议上，神圣同盟各大国公开宣布了干涉他国内政以维持当地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来巴赫会议决定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去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根据由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

- 里的坚决要求而加入 1818 年亚琛议定书中的限制性条款的规定，意大利各国君主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按照这一条款，干涉别国内政，只能按照这些国家的“愿望”进行，并应给予它们以参加谈判的权利。——第 344 页。
- 193 1850 年 11 月，奥普两国的关系由于争夺德国的霸权而尖锐化，普鲁士因而宣布总动员。这次动员暴露了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普鲁士军队装备的落后，这促使普鲁士政府采取了克服这些缺点的有力措施。——第 346 页。
- 194 指的是 1859 年 3 月 3 日（俄历 3 月 19 日）俄国和法国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如果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之间发生战争时实行中立和合作的秘密条约。报刊披露了关于条约的消息，但是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公开否认存在对法国有任何书面规定的义务。关于丹麦参加条约的消息后来没有得到证实。——第 352、371 页。
- 196 1859 年 4 月，在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都爆发了人民起义，统治这些地方的公国王朝中的人物纷纷逃出他们的领地请求奥地利军队保护。由于起义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国民议会宣布各公国的人民愿意加入皮蒙特。关于各公国并入皮蒙特的问题，1860 年 3 月通过全民投票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第 355、361、473 页。
- 196 1859 年 2 月中，英国得比政府建议正式调解法奥之间的冲突。为此目的，1859 年 2 月末，考莱勋爵经拿破仑第三的同意，被派往维也纳。他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进行了谈判。但是考莱勋爵的使命没有胜利完成。——第 356 页。
- 197 哥达党于 1849 年 6 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提出了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第 361 页。

- 198 暗指在萨托里阅兵时犒赏士兵一事（参看注 70）。——第 361 页。
- 199 《Caveant consules ne quid res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为了共和国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是古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遭到外部或内部危险的威胁时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就被赋予独裁的权力。——第 362 页。
- 200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 1802 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时期，反映着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第 362 页。
- 201 指卡尔·福格特。关于福格特的详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4 卷卡·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第 362 页。
- 202 指劳麦的文章“普鲁士的观点”（《Der Standpunkt Preuens》），1859 年春发表于“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不久后又和他的其他一些文章一起转载于名为“论当代政治”（《Zur Politik des Tages》）的文集中。——第 362 页。
- 203 指拿破仑第一对毕洛夫所著的“德国和意大利 1800 年战局史”一书的一条批语。1819 年拿破仑第一在圣海伦岛读过该书。关于这一点详见本卷第 269—272 页。——第 365 页。
- 204 威·维利森最有名的著作是：“关于 1831 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共分两册，1840 年柏林出版（《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 In zwei Theilen. Berlin, 1840）；“1848 年意大利战局”1849 年柏林版（《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第 371 页。
- 205 1848 年 3 月威尼斯发生革命，奥军被驱逐，政权转入以丹尼尔·马宁为首的临时政府手中。临时政府在威尼斯宣布成立共和国，它一直存在到 1849 年 8 月。——第 372 页。
- 206 1848—1849 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奥军于 1849 年 6 月 28 日在

- 腊布(迪厄尔)城下击溃了匈牙利军队并占领了该城。——第373页。
- 207 指1849年8月3日奥军被匈牙利革命军击败于阿契(在科莫恩附近)。——第373页。
- 208 指1848年三月革命时期在维也纳建立的大学生武装组织——大学生军团的战士。——第373页。
- 209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是官方政府报纸“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的简称,从1780年起以该名称出版。——第376页。
- 210 马克思把1833年在的里雅斯特成立的轮船公司称为奥地利的劳埃德。劳埃德是伦敦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他在伦敦成立了英国第一家海船保险公司(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因此欧洲国家有许多轮船保险公司都以劳埃德的名字命名。——第377页。
- 211 马克思指1857年11月周期性危机时期在汉堡成立保证贴现公司,以及发行1500万马克的有息证券作为以商品或国家证券作抵押的贷款;贷款数应相当于作抵押的商品价值的50%至 $66\frac{2}{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66—371页卡·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一文)。——第377、393页。
- 212 指1846年2—3月加里西亚农民大起义期间奥地利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政策,加里西亚农民大起义是和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见注153)同时发生的。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起义的加里西亚农民和准备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挑起了冲突。农民起义从解除波兰小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随后具有了大规模摧毁地主庄园的性质。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兰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388页。
- 213 从本文开始恩格斯给“人民报”撰稿。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
-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正

式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2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经常提出建议和帮助,为报纸审稿,组织对该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6月11日的第6号上,该报编辑部正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为该报撰稿(见本卷第683页)。从此以后,马克思实际上是该报的编辑,该报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从7月初起,马克思成了该报的编辑和行政负责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该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该报上,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各个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揭露了英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拥护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载了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马克思的5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组未完成的文章《Quid pro quo》)、恩格斯的9篇文章、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评论、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评”栏的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评论。此外,许多文章和政治评论都带有马克思直接参加编辑工作的痕迹。该报总共出版了16号。1859年8月20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397页。

- 214 1849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科莫恩(科马罗姆)要塞是匈牙利革命军的一个据点,他们在那里经受住了奥军两次(1—4月和7—9月)长时间的围攻。——第397页。
- 215 在罗马共和国倾复(见注45)前夕,当罗马制宪议会决定停止斗争以后,加里波第于1849年7月2日率领4000人的一支志愿军离开了罗马,前去援助反抗奥军的威尼斯共和国。加里波第巧妙地在奥军后方进行机动,多次突出重围,但是未能冲入被围困的威尼斯,1849年7月30日他被迫进入中立国圣马力诺的国境,解散了自己的队伍。——第

404 页。

- 216 指伦巴第志愿军在阿勒曼迪将军指挥下反对奥军的行动。伦巴第志愿军于 1848 年 4 月封锁了提罗耳从托纳列至斯特尔维奥的各个山口。——第 404 页。
- 217 本卷刊登的马克思为马志尼的宣言“战争”所写的按语，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给予在波拿巴干涉意大利解放事业这个问题上采取正确立场的马志尼以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许马志尼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反波拿巴言论，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他们仍继续不断地批评马志尼的整个观点和策略。——第 406 页。
- 218 从 1849 年 3 月起马志尼是三执政的首领（马志尼、萨费和阿尔美利尼），罗马共和国制宪议会授予三执政以执行权和保卫共和国的全权。——第 406 页。
- 219 指的是加里波第在 1869 年 5 月在他的志愿军进入伦巴第领土时所发表的告伦巴第居民书。——第 406 页。
- 220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 zione》）是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1859 年在伦敦出版，1860 年在罗迦诺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马志尼宣言“战争”发表在 1859 年 5 月 16 日的“思想和行动”上，后来转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略有删节。——第 407 页。
- 221 指的是意大利诗人和爱国者霍夫雷多·马美利于 1849 年 7 月在保卫罗马共和国、抵抗路易·波拿巴派去的法国军队时牺牲一事。——第 407 页。
- 222 指查理五世在最后战胜了教皇过去的盟友法国人并把他们赶出意大利之后，于 1528 年在博洛尼亚同教皇克雷门特七世所签订的条约。从那时起，帝国政权和天主教会便团结一致来消灭意大利各城市国家残存的独立活动。——第 410 页。
- 223 康波福米奥和约是法国同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于 1797 年 10

- 月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法国把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领土连同威尼斯城以及伊斯的利亚半岛和达尔马威亚转让给奥地利以换取奥地利在莱茵河疆界上的让步;另一部分则并入拿破仑第一于1797年夏季在意大利北部夺来的土地上建立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归属法国的还有伊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沿岸地区的领地。——第412页。
- 224 暗指关于1849年3月23日诺瓦拉会战(见注50)的内容含糊的战报。恩格斯在“皮蒙特军队的失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58—468页)为题的那组文章中分析了这些战报。皮蒙特在诺瓦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王查理-阿尔伯特行动胆怯。在这以前,各君主集团和拥护在萨瓦王朝政权下统一意大利的人们,百般颂扬这位国王的“英勇”。他们称查理-阿尔伯特是“意大利之剑”(《Spada d'Italia》)。在查理-阿尔伯特退位后,他的儿子维克多-艾曼努尔被迫于1849年8月在米兰与奥地利缔结和约,根据和约规定,奥地利保住了它在意大利的全部领地,并得到皮蒙特的赔款7500万法郎。——第414页。
- 225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46年到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417页。
- 226 1813年5月2日(俄历4月20日),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和维特根施坦指挥下的俄普联军在吕特岑(属萨克森)发生了会战,双方都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第419页。
- 227 本文在略加修改后曾以“历史的一章”(《A Chapter of History》)为标题用英文发表在1859年7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个修改稿曾译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内。——第427页。
- 228 十二月十日会是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一书中对这个团体作了详尽的评

- 述。——第 432 页。
- 229 暗指路易·波拿巴说的一句话：“帝国就是和平”（见注 60）。——第 436 页。
- 230 暗指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写的“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一书。——第 436 页。
- 231 “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1848—1915 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 437 页。
- 232 指在德国庸人中间流行一时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诗，他的诗是崇尚辞藻而内容空洞的诗歌的典型。——第 438 页。
- 233 “奥林匹克马戏院”（《Cirque Olympique》）——巴黎的一个剧院。
圣詹姆斯街——伦敦的一条街道，那里有许多俱乐部和赌场。
阿斯特利圆剧场——伦敦的一个露天马戏院。——第 439 页。
- 234 拿破仑法典是 1804 年拿破仑第一颁布的民法典。恩格斯称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不许寻究父方”（《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是拿破仑法典第 340 条的条文。——第 441 页。
- 235 这里，“人民报”编辑部加了如下的附注：“大家知道，据最近报道，奥军确实退到了他们在明乔河东岸的要塞区。这一退却即使在战略上没有带来任何损失，但是终究不能不对军队的士气造成极有害的影响。”——第 443 页。
- 236 本文（特别是开头部分）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篡改过。——第 444 页。
- 237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政策。他在欧洲各大国第三次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第一之间采取随风转舵的策略，结果使拿破仑第一起初在 1805 年击败了奥地利，接着又在 1806 年击败了普鲁士。

- 关于巴塞尔和约见注 86。
关于莱茵联邦见注 126。——第 446 页。
- 238 见注 90 和 96。——第 450 页。
- 239 见注 165。——第 451 页。
- 240 “两大洲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和政治性的双周刊，从 1829 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460 页。
- 241 暗指普鲁士同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国君以及支持他们的德国其他十七个邦的君主结成同盟，排除奥地利，以普鲁士为霸主统一德国，并实现建立“小德意志”计划的企图。这个计划得到了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联合组成所谓“哥达党”（见注 197）的右翼自由派的支持。哥达党曾积极参加了为通过根据反革命精神修改的全德意志宪法草案而于 1850 年 3 月 20 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议会的选举。在奥地利君主国和俄国沙皇政府的压力下，以前支持普鲁士的许多德国邦倒向了奥地利那边，而普鲁士政府也因为害怕违抗尼古拉一世的意旨，而于 1850 年 4 月 29 日解散了爱尔福特议会。——第 462 页。
- 242 三月要求是表达了人民情绪的四个基本政治要求，这些要求是 1848 年 2 月由巴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来的，它们很快就传遍了德国的西南部。这些要求就是：一，武装人民，人民有权选举军官；二，出版自由不受限制；三，成立陪审法庭；四，立即召开德国议会。德国各邦的自由资产阶级在人民的压力下把这些要求变成了他们在同君主制作斗争中的纲领，但是，刚刚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掌握了政权，就出卖了人民的利益，同君主集团进行妥协。——第 462 页。
- 243 指“拿骚公民们的声明”，1859 年 6 月 21 日在维斯巴登发表，是图谋以普鲁士为霸主统一德国的德国各邦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第 462 页。
- 244 埃申海麦尔街——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条街道，1816—1866 年德国联邦议会设在这里。——第 464 页。
- 245 1859 年 7 月 8 日在维拉弗兰卡城举行了法奥两国皇帝在没有皮蒙特

- 国王参加下的单独会晤。这次会晤是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建议举行的,因为他害怕战争拖下去会加强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这次会晤中签订了停战协定。7月11日法奥双方签署了初步和约,根据和约,伦巴第(曼都亚和培斯克拉两要塞除外)转归法国(但是拿破仑第三后来为了换取萨瓦和尼斯,把伦巴第让给了撒丁),威尼斯仍然受奥地利统治,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应该复位。和约规定建立以教皇为首脑的意大利联邦。尽管初步和约中的某些条文没有实行(例如,建立意大利联邦、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复位等条)或者有了改变,但整个说来和约的条件为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订的最后和约打下了基础。——第466页。
- 246 指那些丧失了政权的德国小邦君主,他们的领地被兼并了,即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期间由于德国版图的重新划分而被并入德国较大的各邦。许多被兼并的小邦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维也纳会议。——第474页。
- 247 1848年,帕麦斯顿为了限制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执行英国传统的“欧洲均势”政策,曾力求使伦巴第归并于皮蒙特君主国。奥地利政府慑于国内的革命事件和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被迫在5月24日的备忘录中同意让出伦巴第,并让威尼斯分立,成为一个以奥地利大公为首的独立国家,但在皮蒙特战败以后,奥地利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见。——第474页。
- 248 尼·马基雅弗利著:“佛罗伦萨史”(N. Machiavelli 《Le Istorie Fiorentine》)。该书的第一版于1532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第475页。
- 249 由于席卷北意大利和教皇国的争取和皮蒙特合并的运动日益加强,教皇庇护九世于1859年6月发布通告,威胁说凡是敢于侵犯教皇世俗政权的人,一律开除教籍,这首先是针对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说的。——第476页。
- 250 “人民报”刊登恩格斯这篇文章时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如果不停留这四个半小时,这个军未必能经受住它赶往战场时的那种极端紧张的行军”

- 1859年7月25日恩格斯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这句话与上下文的意思是矛盾的，因此在本版中取消了这句话。——第481页。
- 251 见注87和95。——第482页。
- 252 “画报”（《L' Illustration》）是一种法国文艺画刊，从1843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86页。
- 253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是一种英国画报周刊，从1842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87页。
- 254 神圣之路（Via sacra）是指古罗马获胜而旧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后来“神圣之路”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泛指一般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军。——第488页。
- 255 暗指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伦兵变失败后被囚禁于阿姆要塞一事；1846年路易·波拿巴从要塞逃出（见注71）。——第488、497、504页。
- 256 圣马丁门剧场——巴黎一个剧院，1851年12月政变时，在该剧院附近曾发生波拿巴兵痞殴打共和党人的事件。——第488页。
- 257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论战争”（《Vom Kriege》）一书中提出了这种思想。该书第一版于1832年在柏林出版。——第491页。
- 258 指1859年7月15日的弗兰茨-约瑟夫宣言，宣言发表在1859年7月16日的奥地利官方机关报“维也纳日报”上。——第492页。
- 258 雪恩布龙——维也纳的一个宫殿，奥皇的夏宫。——第493页。
- 260 指1859年7月19日拿破仑第三在圣克鲁接见国务会议、参议院和立法团成员时的讲话。讲话载于1859年7月20日“通报”第201号。——第494页。
- 261 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著：“1688年和1830年的历史片断”（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Fragments historiques 1688 et 1830》）。该书是路易·波拿巴被禁于阿姆要塞时写的，第一版于1841年在巴黎出版。——第497页。

- 262 指 1859 年 7 月 26 日刊登在“通报”第 207 号的非官方栏中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第 498 页。
- 263 “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是英法之间在 1830 年七月革命以后建立的,由于 1834 年 4 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所谓四国同盟条约而形成的同盟关系。但是在签订这一条约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了英法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后来不止一次地导致两国关系的尖锐化。——第 498 页。
- 264 拿破仑第三关于把陆军和海军转入平时状态的声明载于 1859 年 7 月 28 日“通报”第 209 号;在战争前夕所作的声明也发表在 1859 年 3 月 5 日“通报”第 64 号上。——第 500 页。
- 265 《Quid pro quo》(“偷梁换柱,混淆视听”)是 1859 年 7 月底—8 月中在“人民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一组文章的标题;由于“人民报”停刊,这组文章没有登完。——第 503 页。
- 266 克劳塞维茨著“1796 年意大利战局”(Clausewitz.《Der Feldzug von 1796 in Italien》)。——第 503 页。
- 267 指 路易·波拿巴总统 1852 年 12 月 2 日颁布的关于法国恢复帝制并宣布路易·波拿巴本人为皇帝、号称拿破仑第三的命令。——第 503 页。
- 268 对埃及的讨伐是根据拿破仑·波拿巴的提议并在他的指挥下于 1798 年 5 月进行的,其目的是要征服埃及并破坏英国和印度的交通线。这场延续三年多的冒险的远征结果破产了。
雾月十八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是完成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一次政变;政变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第 503 页。
- 263 指 1855 年法国和俄国之间的秘密和谈,这次谈判是通过在俄国宫廷有广泛联系的萨克森驻巴黎公使泽巴赫男爵进行的。——第 505 页。
- 270 1856 年,在巴黎会议上,俄国代表团团长奥尔洛夫伯爵和团员布隆诺

夫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利用英法矛盾的基础上；在会议上形成了法俄的接近。——第 505 页。

- 271 在 1856—1860 年间，拿破仑第三力图加强他在巴尔干的影响，因此他支持门的内哥罗的公爵丹尼洛一世反对土耳其蓄谋侵犯门的内哥罗的斗争。因此，丹尼洛一世寻求同拿破仑第三建立私人的密切关系；后者便成了门的内哥罗的继承者的教父。

在 1851—1852 年间，费奈迭在他于波恩出版的“北德意志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上发表了许多关于路易·波拿巴及其政变的文章。——第 505 页。

- 272 由英军据守的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于 1855 年 11 月投降俄军。虽然领导要塞防御的是以威廉斯将军为首的英国军官，但是，英国政府由于暗中关心的是削弱“盟国”土耳其，所以对卡尔斯守军的行动极其暧昧。卡·马克思对这点的看法详见“卡尔斯的陷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673—712 页）。而且威廉斯被俄国俘掳后于 1856 年回国时，英国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给他以各种奖赏和荣誉称号。——第 505 页。

- 273 指 1849 年被法军占领的罗马，以及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法国军队曾经驻扎的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第 505 页。

- 274 指法国外交部长瓦列夫斯基在 1856 年巴黎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要求比利时报刊停止对拿破仑第三的人身攻击，这个发言得到了其他各国代表的支持。——第 505 页。

- 275 暗指法国参加反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见注 31）。——第 505 页。

- 276 见注 158。——第 506 页。

- 277 见注 158——第 506 页。

- 278 暗指拿破仑第三干涉瑞士内政在瑞士引起的不满，拿破仑第三于 1858 年初要求瑞士政府引渡被控参与奥尔西尼阴谋的那些政治流亡者。——第 506 页。

- 279 指 1858 年 1 月 27 日的命令,该命令按照西班牙的榜样,把第二帝国的领土划分为五个军区,分别由元帅管辖。——第 506 页。
- 280 关于摄政和建立枢密院的命令是 1858 年 2 月 1 日,在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第三以后不久颁布的。佩利西埃做了枢密大臣,如果皇太子即位时年岁尚幼,枢密院就成为摄政会议。
马克思暗指 1845 年佩利西埃的野蛮行为,他在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期间,曾命令燃起烟火熏死躲藏在山洞中的一千名阿拉伯起义者。——第 506 页。
- 281 暗指 1858 年底的对法国政论家蒙塔郎贝尔的审判案,因为他发表文章谴责了第二帝国的制度。拿破仑第三赦免了被告者,但是,蒙塔郎贝尔拒绝赦免,要求宣判无罪。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案件比做是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约翰·汉普敦的审讯,汉普敦在 1636 年曾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未经下院批准的赋税——“造船费”。由于汉普敦拒绝纳税而引起的审判案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政体的反对派的壮大。——第 506 页。
- 282 马克思指的是蒲鲁东于 1858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自一本小册子“教会所恪守的正义”(《La Justice poursuivie par L' Eglise》)。在这本小册子中,蒲鲁东把波拿巴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作了对比以后,认为奥尔良王朝宣布的带有关于必需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的保留条件的管理原则比较好。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些保留条件比作是补充条例(Acte additionel)——拿破仑第一在他从厄尔巴岛上回来以后于 1815 年在法国实行的宪法。——第 508 页。
- 283 指 1858 年 3 月 6 日在索恩河岸夏龙发生的军队的共和主义发动,发动遭到了失败。——第 506 页。
- 284 见注 153。——第 507 页。
- 285 Blue book of its own make(自制的蓝皮书)——是马克思对 1859 年奥意法战争的那些很像英国的蓝皮书的外交文件的称呼,这些文件于 1859 年 7 月由普鲁士政府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随后于 7 月 30—

31 日由奥格斯堡“总汇报”加以转载。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蒙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 507 页。

286 据传说,公元前 390 年,侵入罗马帝国的高卢军在长期围攻卡皮托里以后,表示同意在获得大量赎金的条件下撤离该城,但是,当黄金已经称出的时候,高卢人的领袖布伦高呼《Vævicti》(“战败者罪该万死!”),把自己沉重的剑扔在放有砝码的称盘上,于是破坏了最初的协定。——第 371、392、509 页。

287 《By courtesy》(“礼貌上尊称的”)。——见注 161。

《On sufferance》(“出于体恤”,“由于恩赐”)——在英国法律中表示一个人由于恩赐,而不是根据法律得到某领地或封号的权利。

《Quos ego》(“看我来教训你!”)——在味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中,尼普顿向未经他同意就在海上掀起了风暴的风这样厉声唱道。——第 510 页。

288 “哥达主义”——马克思对哥达党(见注 197)拥护者的装腔作势的言词的称呼。

岛凯马尔克是勃兰登堡省(属普鲁士)的北部地区,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堡垒。——第 512 页。

289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经企图在斯特拉斯堡和布伦举行波拿巴主义的暴乱(见注 71),也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巴黎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的专政。——第 513 页。

290 哥尔查科夫 1859 年 5 月 27 日(俄历 15 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紧急指示全文刊载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并于 1859 年 6 月 16 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167 号上转载。——第 513 页。

291 指“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 ischer Staats-Anzeiger》),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该报从

- 1851年到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513页。
- 292 指莎士比亚的戏剧“驯悍记”中的人物补锅匠克里斯多弗·史赖(见序幕、第一场和第二场)。——第515页。
- 293 《La mort sans phrase》(“无话可说,坚决处死”)——据说,1793年1月在国民公会议员对原任国王路易十六的判决进行记名投票时,神甫西哀士说了这句话。——第520页。
- 294 马克思指的是在德国各大城市首先是柏林的十字街头上等待受雇的那一类短工(即所谓《Eckensteher》)。这些短工的语言具有独特的人民的幽默感的特点。——第520页。
- 295 指1859年6月22日约翰·罗素给英国驻普鲁士大使布卢姆菲耳德的紧急指示;指示全文刊载在1859年7月18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99号的附刊上。——第523页。
- 296 《Coercion bills》是为了镇压爱尔兰革命运动于1833年和1847年通过的几项特别法律。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范围内实行了戒严,并且授予英格兰当局以各种专制的全权。——第523页。
- 297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是不全的。只发表了开头的两部分。恩格斯打算分析该书经济内容的第三部分,没有在报上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第524页。
- 298 荷兰在1477年至1555年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在帝国被分割后,处于西班牙的管辖下。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末期,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 由于荷兰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丧失了最重要的海上贸易航路,并且依赖于荷兰人的中介贸易,这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第524页。
- 299 官房学是由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讲授这门课程;官房学实质上是“各种极其不同的知识的混合物”(马克思)。——第525页。

- 300 这是讽刺右派黑格尔分子，他们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德国大学中开设很多讲座，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攻击哲学上较激进的派别的代表人物；右派黑格尔分子以反动的精神解释黑格尔的学说。
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统帅们叫做狄亚多希，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瓜分他的帝国而彼此进行激烈的厮杀。——第 529 页。
- 301 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 1 部第 2 册；“黑格尔全集”1834 年柏林版第 4 卷第 15、75、145 页（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 . 1 , Abt . 2 ; Werke , Bd . IV , Berlin , 1834 , S . 15 , 75 , 145）。——第 531 页。
- 302 指乔·威·弗·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1807 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und Würzburg , 1807）；“美学讲义”第 1—3 卷；“黑格尔全集”1835 年、1837—1838 年柏林版第 10 卷（《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Bd . I — III ; Werke , Bd . X , Berlin , 1835 , 1837—1838）；“哲学史讲义”第 1—3 卷；“黑格尔全集”1833、1836 年柏林版第 13—15 卷（《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 I — III ; Werke . Bd . X III — X V , Berlin , 1833 , 1836）。——第 531 页。
- 303 指发表在 1859 年 7 月 30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831 期上的出口报告和进口申报价值图表。——第 536 页。
- 304 指 1857—1859 年间印度反对英国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见注 144）。——第 539 页。
- 305 指 1849 年 4 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了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而派遣远征军到意大利去一事。——第 541 页。
- 306 《Sic volo, sic jubeo》原文应为：《Hoc volo, sic jubeo》（“我怎样想，就怎样下命令”）——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第六篇中的话，作者在诗中抨击了贵族的贪得无厌的权力欲。——第 542 页。
- 307 圣热尔门郊区——巴黎的贵族聚居区。——第 542 页。

- 308 列举出的这些撒丁特命全权代表,是维克多·艾曼努尔派到起义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各公国和罗马尼亚(教皇国)去的,目的是策划这些地区归并于皮蒙特。当在意大利全境引起抗议运动的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245)签订以后,维克多·艾曼努尔在法国的压力下,召回了这些代表。——第544页。
- 308 指法国记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意大利忘恩负义”,发表在1859年8月3日的“立宪主义者报”上。——第544页。
- 310 1859年夏天,英国发生了争取九小时工作制的群众运动;在伦敦,这个运动席卷了组织在工联中的建筑工人。1859年7月底,特罗洛普家族一个公司的建筑工人,由于企业主拒绝满足在保留原工资的条件下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宣布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有木匠、石匠、砖瓦匠和其他工人。7月27日企业主们在联席会议上向工会公开宣战,一致决定不招收参加工联的工人,而8月6日又对两万多工人宣布实行同盟歇业,在此以后,伦敦和其他城市的罢工运动更加加强了。参加罢工的和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的伦敦建筑工人得到了伦敦和英国80个城市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援。罢工一直持续到1860年2月,并以妥协的办法结束:企业主同意招收工联会员,而工人则被迫收回关于九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第546页。
- 311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在英国形成了自由党,它的成员包括辉格党人、曼彻斯特派(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皮尔分子(温和的托利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地位的自由党人遭到了同时期形成的,代托利党而起的保守党的反对。——第547页。
- 312 指1859年8月16日拿破仑第三宣布的大赦令。
大赦令第一条规定废除对报刊的各种行政“警告”,在以前如果报刊发表了不利于政府材料,政府当局有权根据1852年的出版法提出警告。这种警告是政府公开压制出版事业的手段之一。——第548页。
- 313 指1859年8月14日在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北部和中部各邦自由资产

阶级的代表会议,会上讨论了自由资产阶级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中规定实行德意志联邦的改革,组织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等。1859年9月15—16日于法兰克福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基于这个纲领成立了定名为民族联盟的新党,联盟的基本核心是哥达党(见法197)。——第548页。

- 314 “萨克森立宪报”(《Sächsische Konstitutionelle Zeitung》)是一家德国自由党的报纸;该报从1850年至1859年以这个名称在德勒斯顿出版,从1859年4月至1874年该报称为“立宪报”(《Konstitutionelle Zeitung》)。——第548页。
- 315 暗指1848—184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德国国民议会。——第548页。
- 316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each of the last fifteen Years, from 1844 to 1858》, London, 1859. ——第549页。
- 317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1846年6月通过的。在英国实施旨在限制和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1846年的法案的通过表明在贸易自由口号下反对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
-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的蕴藏丰富的金矿的发现对欧美各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第551页。
- 318 旁遮普(印度的西北地区)由于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两次英国对锡克教徒的战争,被英国殖民者占领;旁遮普被占领后,整个印度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第551页。
- 319 1854年英国建立了所谓感化学校,12—16岁的少年犯不处短期徒刑,就送入这些学校。——第552页。
- 320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79—583页)。——第557页。

- 321 指卡·马克思在“历史上有趣的一页”和“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两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08—515页和592—599页）中所做的揭露。——第560页。
- 322 指科苏特参加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不一的组织存在得不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561页。
- 323 科苏特和乌尔卡尔特之间的来往书信发表在1858年5月12日的“自由新闻”报第16号上。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是反对帕麦斯顿政府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从1855年至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报发表过几篇马克思的著作。——第561页。
- 324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函件。1847—1849年。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于1850年8月15日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Hungary . 1847—1849 .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August 15 , 1850》. London）。——第561页。
- 325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于1853年2月6日在米兰发动的，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根据密谋性策略组织的，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所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4、599—602、621、624—625页）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第561页。
- 326 自由贸易大厅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大厅，自由贸易派聚会的地方。——第563页。
- 327 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经济学思想中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派

别。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 1838 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特别的政治集团，后来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566 页。

328 见注 185。——第 568 页。

329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和弗·恩格斯的文章“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21—626 页和第 661—665 页）。——第 568 页。

330 本文下面所描写的白河挑衅事件成了 1860 年夏天开始的第三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英法殖民者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强迫中国接受新的奴役性的条件；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于 1860 年 10 月在北京签订了新的掠夺性的条约，并且批准了天津条约（见注 185）。

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英国和法国得到了大量赔款，开天津为商埠，英法有权在中国招募工人到殖民地去做工，英国兼并了九龙半岛的南部。——第 568 页。

331 “京报”——著名的中国政府的官方通报的名称，从 1644 年到 1911 年在北京出版。——第 569 页。

332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一家英国日报，起初属于自由派，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属于保守派；该报以这个名称从 1855 年至 1837 年在伦敦出版；从 1937 年起，与“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的名称出版。——第 569 页。

333 指 1856 年 10 月英军野蛮地炮轰广州一事；英国人利用广州的中国当局逮捕走私船“亚罗号”划艇的水手一事作为借口，英国领事硬说这只船处于英国国旗保护之下。炮轰广州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第 570 页。

334 指“1857 年至 1859 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一

- 书, 185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69》. London, 1859.)。——第570页。
- 335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 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 从1856年到1869年伦敦出版。——第571页。
- 336 皮尔分子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罗·皮尔周围联合起来的一批温和托利党人, 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 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废除了谷物法, 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 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 从而皮尔分子集团便独立出来了。1850年皮尔逝世以后, 皮尔分子成了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五十年代末, 他们加入了当时形成的自由党。——第571页。
- 337 指1858年6月中国与俄国和美国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的内容同中国与英国和法国签订的条约相类似。——第572页。
- 338 指英国驻马德里公使布尔韦尔粗暴地干涉西班牙的内政, 结果使西班牙和英国于1848年7月断绝外交关系一事。——第573页。
- 339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 这次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当局在广州销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储备。这次战争结束以后, 发生了俄国同中国的接近, 使俄国能够在1851年7月与中国签订伊宁条约, 给予俄国在华北贸易的优惠条件。——第574页。
- 340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 中国政府在与英国和法国签订天津条约以前, 就于1858年5月与俄国签订了璦琿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 黑龙江北岸土地并入俄国。——第574页。
- 341 “东印度(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日的决议刊印”(《East India (Cabul and Afghanistan),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June 1859》)。——第574页。

- 342 指 1838—1842 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 年 8 月英军占领了喀布尔，但是，由于 1841 年 11 月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 1842 年 1 月开始退却，最后英军完全被击溃。——第 574 页。
- 343 “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 1839 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Persia and A fghanistan》. London, 1839）。——第 574 页。
- 344 指 1859 年 9 月 17 日在“经济学家”杂志第 838 期上刊载的“中国的贫困”和“中国的贸易”两文。——第 578 页。
- 345 指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勋爵和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之间的冲突。主张对印度的封建上层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埃伦伯勒在 1858 年 4 月 19 日的紧急报告中，激烈地抨击了坎宁关于没收曾参加民族解放起义的奥德封建主的土地的通告。但是埃伦伯勒的紧急报告并没有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赞同，于是他不得不于 1858 年 5 月辞去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得比内阁力图以埃伦伯勒辞职为代价来保持政权。——第 584 页。
- 346 改革俱乐部——伦敦一个自由派政治俱乐部，于 1834 年成立；是自由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第 586 页。
- 347 “腐朽的市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起享有选举代表到议会中去的权利。“腐朽的市镇”的代表，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腐朽的市镇”的这种特权被 1832、1867 和 1884 年的改革所取消。——第 586 页。
- 348 指 1832 年的议会改革（见 100）。——第 586 页。
- 349 指英国议会；从 1547 年起，下院历次议会都是在圣斯蒂凡教堂（韦斯明斯特宫）举行的。——第 588 页。
- 350 1859 年 10 月 16 日在苏黎世召开了有奥地利、法国和撒丁参加的会

议,以拟定最后和约的条款;同年11月10日签订了和约。略加修改的维拉弗兰卡初步条约(见注245)的条款成了苏黎世和约的基础。苏黎世条约由三个单独的外交文件组成,即奥法条约、法撒关于把伦巴第转交给撒丁的条约以及奥法撒共同条约。——第592页。

351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 见注234。

Force majeure(无法抗拒的力量,无法预见的情况)——从拿破仑法典第1148条中摘引出来的说法,这一条宣称:“如果由于无法预见的情况或偶然事件妨碍了债务人,使他不能履行他应尽的义务,或者做了禁止他做的事情,不得向其追索任何赔偿。”——第592页。

352 执政内阁(由五个执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1794年雅各宾派革命专政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在1799年波拿巴政变以前,执政内阁是法国的政府,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1848年“蓝色分子”是对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称呼,以区别于“红色分子”(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所谓山岳派)和“白色分子”(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君主主义者)。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蓝色分子”的专政是在1848年6月镇压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期间建立起来的,这个专政存在到同年12月总统选举时为止。——第592页。

353 闵斯德和约(1648年10月)是结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历史上总称为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约之一。这个条约是在德意志帝国的代表和德国各邦诸侯一方同法国一方之间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不包括斯特拉斯堡),法国对麦茨、土尔、凡尔登等三个主教管区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德国各邦诸侯被承认为独立的君主,他们有权签订对外政治条约和协定而不受德国皇帝的干预。闵斯德和约促进了德意志帝国的进一步削弱和法国在中欧和西欧的优势地位的巩固。

关于康波福米奥和约见注223。——第593页。

354 由于害怕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剧,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在同奥地利作战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限制受到人民支持的加里波第志愿军的行动,使

- 他们处于最不利的条件下。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之后，加里波第建议继续对奥地利人进行斗争，但是 1859 年 11 月，志愿军在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坚持下被解散了。——第 593 页。
- 355 指 1813—1815 年普鲁士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第 593 页。
- 356 指马志尼于 1859 年 9 月 16 日写给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信。他在信中建议国王出来领导解放全意大利的斗争，在加里波第的帮助下发动意大利南部起来斗争，并组织向罗马进军。马志尼的信没有获得结果。——第 594 页。
- 357 指维拉弗兰卡初步条约。——第 595 页。
- 358 指卡·马克思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21—626 页）一文。——第 601 页。
- 359 见注 334。——第 601 页。
- 360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见注 339）结束后英国殖民者于 1842 年 8 月 29 日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规定，为英国对华贸易开辟了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把香港一岛割让给英国作为“永久的属地”，中国必须付出巨额赔款，实行对英国人有利的新关税税率。1843 年 10 月 8 日签订了虎门附约，对外国人作了新的让步：外国人有权在开放的商埠建立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即外国臣民不受中国法庭的审讯，实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即英国可以机械地获得其他大国从中国得到的特权。——第 602 页。
- 361 由于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加强了。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本文列举的主张同工业资产阶级妥协的贵族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物提出的那些议会改革法案。1780 年里士满公爵提出的法案规定每年要进行议会选举，给成年的男性居民以选举权，并且重新划分选区。小皮特于 1782 年以下院议员的身分提出，1785 年他又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再度提出的法案，规定要消灭“腐朽的市镇”（见注 347），重新划分选区，以利于工业中心。

- 查理·格雷在 1793 年和 1797 年提出的那些改革法案也建议消灭“腐朽的市镇”，规定在农业区要增加选民人数等等。所有这些法案都被议会否决。——第 606 页。
- 362 指“禁口法”（Gagging act）——1819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人身不可侵犯和限制出版、集会自由的六项特别法。——第 606 页。
- 363 指洛克·金的法案和约翰·罗素的法案（分别见注 98 和 101）。——第 606 页。
- 364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发生波拿巴政变以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同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时，赞同了路易·波拿巴的篡夺行为。帕麦斯顿采取这一步骤并没有征得辉格党内阁其他成员的同意，结果他就在 1851 年 12 月辞职，虽然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没有分歧，而且它在欧洲第一个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体。帕麦斯顿领导内阁后，由于他的外侨管理法案（见注 156），又于 1858 年 2 月被迫提出辞职。——第 607 页。
- 365 1859 年 11 月，西班牙为达到其侵略目的向摩洛哥宣战，派奥当奈尔将军率军侵入摩洛哥境内。军事行动一直延续到 1860 年 3 月，但是西班牙军队遭到爱好自由的摩洛哥人民的顽强抵抗，并没有取得特别明显的胜利。1860 年 4 月缔结了和约，根据该和约西班牙获得了赔款和小块割地。——第 609 页。
- 366 公主骠骑兵——西班牙轻骑兵的一个团。——第 616 页。
- 367 1859 年 11 月，法国政府再次企图破坏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边界，但是遭到了摩洛哥人的抵抗。为此，由四艘军舰组成的一支法国舰队轰击了泰图安堡垒。——第 617 页。
- 368 1836 年秋，阿尔及利亚军队在哈治·阿罕默德贝伊指挥下在康士坦丁胜利地击退了企图以强攻夺取该城的法军，并给以惨重的杀伤。直到 1837 年秋，在第二次远征时经过围攻后，法军才攻占该城。——第 621 页。

369 “萨瓦、尼斯与莱茵”这一著作是弗·恩格斯于1860年2月写成的，这是他的另一著作“波河与莱茵河”（见本卷第247—299页）的续篇。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拿破仑第三声明法国要求占有萨瓦和尼斯。恩格斯的“萨瓦与尼斯”（见本卷第622—626页）一文也是为揭露这种要求而写的。恩格斯利用他在军事科学、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渊博知识，揭穿了波拿巴对萨瓦、尼斯以及莱茵河左岸地区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另一个目的是根据对奥意法战争的经过和结果的分析，证明马克思和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坚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的正确性。

曾经匿名出版过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柏林出版商敦克尔，这次由于在对德国各政党的立场的估计上同恩格斯发生分歧，提出只有在作者在扉页上署名的条件下才同意出版这部新的著作。恩格斯不愿意正式署名，以免过早地让军界读者知道这两部著作均出于非军人之手，所以认为只要指出这本新出的小册子出于“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之手就够了。于是，这本小册子便于1860年4月在柏林的贝伦兹出版社匿名出版。——第633页。

370 指：拿破仑第三对奥地利大使所作的新年谈话（见法44）、拿破仑第三的堂弟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和克洛蒂尔达公主的联姻（见本卷第196—197页）以及1859年的俄法条约（见注194）。马克思把克洛蒂尔达讽称为伊菲姬尼亚，伊菲姬尼亚是国王亚加米农的女儿，根据希腊神话，在希腊人进行特洛伊远征前，亚加米农把她当作祭祀诸神的祭品。——第635页。

371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是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从1848年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636页。

372 指1859年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第636页。

373 1805年10月17日，奥地利军队在乌尔姆向拿破仑第一投降。——第637页。

374 宫廷军事会议是奥地利宫廷的最高军事会议（1556—1848年），它在战时掌管军事部门的工作并对军事行动执行最高指挥权。宫廷军事会议

- 是远离战场的,它经常干预战事,所以箝制了最高指挥官的行动。——第 638 页。
- 375 指 1859 年 6 月 10 日登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通讯。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是有关军事问题的一家德国报纸,从 1826 年起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六十年代该报曾登过恩格斯的几篇文章。——第 639 页。
- 376 威斯特伐里亚王国 1807 年拿破仑第一在德国中部建立的,一直存在到 1813 年。威斯特伐里亚的王位授予了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日罗姆·波拿巴,其子即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第 642 页。
- 377 指维拉弗兰卡条约和苏黎世条约中规定的摩地那、帕尔马和托斯卡纳各公国王朝的复辟,他们是由于这些公国在 1859 年爆发了起义(见注 195)而被赶下台的。摩地那、帕尔马和托斯卡纳争取并入皮蒙特的人民运动的加强使过去的执政者无法进行复辟。1860 年 3 月上述各公国都加入了皮蒙特。——第 642 页。
- 378 *Loi des suspects* (嫌疑犯处治法)是 1858 年 2 月 19 日由立法团通过的一个社会治安法的名称。该法律授予法皇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逐出一切法国领土。——第 644 页。
- 379 “百日”是指拿破仑第一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 1815 年 3 月 20 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 6 月 22 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第 646 页。
- 380 丹璫人的礼物是指谁得到谁就可能死亡的礼物。根据关于夺取特洛伊城的传说,希腊人(根据希腊部族之一的名称也称为丹璫人)送给特洛伊人一只木马表示和解,其中藏有武装的军士。这就是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第二部中的一个主人公所说的一句获得了广泛流传的话“我害怕丹璫人,甚至害怕送礼的丹璫人”的由来。——第 659 页。
- 381 *Sette comuni* (七村社)和 *Tredici comuni* (十三村社)是位于威尼斯省

- 境内阿尔卑斯山南部支脉上由德国人居住的两个小山区的名称。这两个德国移民区出现在十三世纪下半叶；这两个移民区的居民所说的德语方言现在只是在几个村子中还保留着。——第 660 页。
- 382 勒托-罗曼语（由古罗马的勒威亚省的名称而来）属于罗曼语族；主要是在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高山地区作为口语流行。——第 661 页。
- 383 热月九日（1794 年 7 月 27—28 日）是指导致雅各宾派政府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的反革命政变。——第 665 页。
- 384 指 1795 年 7 月 22 日法国和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西班牙在巴塞爾签订的单独和约。——第 665 页。
- 385 “国民报”（《Le National》）是法国的一家日报，从 1830 年到 1851 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 671 页。
- 386 在 1830—1831 年的波兰起义期间，波兰起义者占领了康斯坦丁大公在华沙的档案库，其中有许多沙皇外交文件。这些文件一部分曾发表在戴·乌尔卡尔特于 1835—1836 年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丛刊“国家公文集，公文汇编”（《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一部分发表在 1854 年巴黎出版的“有关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第 672 页。
- 387 指 1807 年的提尔西特条约。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一次会见是在停在尼门河中心的木筏上举行的。——第 672 页。
- 388 据说是施瓦尔岑堡说的话（见注 17）。——第 673 页。
- 389 关于 1853 年初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尼古拉一世关于土耳其问题的谈判，可参看卡·马克思的“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48—177 页）两文。——第 675 页。

- 390 拿破仑第三 1857 年 9 月 25 日在斯图加特同亚历山大二世会见时，亚历山大二世曾向他保证一旦法国和奥地利因意大利问题爆发战争，一定支持法国。——第 676 页。
- 391 指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 1859 年 5 月 27 日（俄历 15 日）的照会（见注 290）。——第 677 页。
- 392 “卡斯尔里子爵的回忆录和书信集”（《Mémoir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Viscount Castlereagh》）。——第 678 页。
- 393 华沙大公国是拿破仑第一在 1807 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划出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所建立的藩属；1809 年，奥地利被击溃后，奥地利占有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也并入这个公国。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公国的领土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所瓜分。——第 678 页。
- 394 德意志联邦条例是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根据这个条例，为数众多的德国邦形式上联合成为所谓的“德意志联邦”（见注 69）。——第 678 页。
- 395 特劳波（奥帕瓦）会议——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第二次会议，于 1820 年 10 月开幕，1821 年 5 月闭幕。
关于来巴赫会议见注 192。
维罗那会议——神圣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于 1822 年 10—12 月举行，通过了关于法国干涉西班牙的决议，延长了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占领，谴责了希腊起义者。这几次会议的努力，其目的都是要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第 678 页。
- 396 指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 1848 年 7 月 6 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代表发出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42—349 页）。——第 678 页。
- 397 指 1852 年 5 月 8 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的代表同丹麦的代表共同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这个议定书的基础是伦敦会议的上述各参加国（普鲁士除外）于 1850

年8月2日通过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丹麦王室的领地(包括同时加入德意志联邦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不可分割的原则。伦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称号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王位让给了被宣布为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者的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终结时要求取得丹麦王位开创了先例。——第678页。

- 398 在“人民报”(见注213)“报刊述评”栏上发表的这篇评论的目的,是反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当时在伦敦出版的报纸“海尔曼”(《Hermann》)。除了马克思以外,埃拉尔特·比斯康普也参加了这篇评论的某些写作工作。由于1859年的奥意法战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活动的活跃,马克思认为,为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无产阶级代表的影响而斗争是“人民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评论中,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性和幻想、他们的小市民趣味和不学无术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马克思的反对金克尔的言论迫使金克尔不得不辞去“海尔曼”编辑的职务。1859年8月“人民报”由于缺乏资金而停刊,这使得马克思未能彻底地打击这家小资产阶级报纸。

在这里发表的评论中,对1859年5月28日、6月18日、7月2日和9日出版的“海尔曼”第21、24、26和27号的内容进行了批判。——第684页。

- 399 “海尔曼”——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W ochenblatt aus London》)的简称;自1859年在伦敦用德文出版;从1859年1月至7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任该报编辑。

该报是以凯拉赛人的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十七世纪末洛恩施坦的长篇小说“英勇的人民英雄阿尔米纽斯,或海尔曼”问世以后,阿尔米纽斯也不正确地被称为海尔曼。公元9年,日耳曼人在阿尔米纽斯的率领下,在条多堡森林中击溃了罗马的总督瓦鲁斯的几

个军团。——第 684 页。

- 400 指署名卡田卡·齐茨在该报上发表所引这段诗的作者和“海耳曼”的编辑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据传说，图斯涅尔达是凯拉赛人的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夫人。——第 684 页。

- 401 讽刺地暗指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叔尔茨的过去和他与金克尔的联系，叔尔茨在青年时期曾参加过金克尔创建的名为“小金虫协会”的文学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文章“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79—284，296—297 页）中对金克尔这一个时期的活动作了评价。——第 684 页。

- 402 指金克尔在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的反动时期中的活动。金克尔作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首领之一，他的政策不是从当时欧洲存在的客观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出发，而是从认为欧洲革命随时都可能开始的主观的、唯意志论的概念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所著的抨击性文章“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页）中，揭穿了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袖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空想的，也揭穿了他们的策略的冒险主义的性质。——第 685 页。

- 403 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他以一个牧师的助手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第 685 页。

- 404 《Point d'argent, point de Suisses》（“没有克劳泽，就不会有瑞士人”）——据说是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1515—1547 年）国库枯竭时，拒绝为他服务的瑞士雇佣兵说的话。法国剧作家拉辛在他的剧作“讼棍”中用了这句话。——第 686 页。

- 405 马克思暗指福格特加入瑞士国籍，福格特在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马克思把金克尔称为“克劳泽”（德国的小铜币），是讽刺金克尔在金钱问题上的吝啬小气。——第 686 页。

- 406 “菲力浦城下再见！”——据传说，是菲力浦（色雷斯的古城）会战前夜布鲁土斯梦见被妖魔所杀的凯撒所说的话。公元前42年罗马三执政的巨头马可·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军队在菲力浦击溃了由布鲁土斯和卡西乌斯所率领的罗马贵族共和国的拥护者的军队。——第688页。
- 407 “凉亭”（《Gartenlaube》）是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一家德国文学周刊“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的简称，1858—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1943年在柏林出版。——第688页。
- 408 指卓越的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逝世（1859年5月6日）的追悼会，德国流亡者的各种组织以及“海尔曼”报都参加了追悼会。——第688页。
- 409 指十九世纪流传很广的佩利茨所著的“供有学识的读者和大学生阅读的世界通史”（《Die Weltgeschichte für gebildete Leser und Studierende》）一书。该书的第一版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第689页。
- 410 暗指爱尔福特议会（见注241）。——第691页。
- 411 Et autres Zéphyres 以及其他的捷菲尔兵（见注81）。——第692页。
- 412 前拉斐尔派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写生画的一个流派。前拉斐尔派画家模仿拉斐尔以前的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艺术家（这个流派因此得名）。前拉斐尔派画家的创作是小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现实的浪漫主义的抗议的表现，他们以虚信宗教和充满神秘主义的中世纪来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现实。脱离当前现实导致前拉斐尔派画家走向象征主义和风格模拟主义。——第694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9年1月—12月)

1859

- 1月 马克思的旨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计划写成6卷的经济学巨著的第一分册脱稿,马克思还在1858年8月就开始了这一分册的写作。在第一分册中他研究了商品、劳动、价值和货币等问题;马克思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把它印成单行本,他根据与柏林出版商敦克尔商定的合同,整理手稿准备付印。
- 1月5日左右 马克思写“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一文,指出意大利争取民族统一和驱逐奥地利人的运动正在加强,路易·拿破仑企图利用这一运动来为自己王朝的利益服务。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月6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德国诗人、前“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弗莱里格拉特,希望他不要参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办的周报“海尔曼”,因为这家周报的方针是和无产阶级运动格格不入的。
- 1月6日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请他写信告诉弗莱里格拉特,不能同舍克尔作任何妥协。
- 1月11日 马克思写“欧洲战争前景”一文,分析了欧洲各个主要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关系,并得出结论

- 说：第二帝国的波拿巴统治集团力图发动一场新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可能成为“这一假帝国的丧钟”。这篇文章发表在1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月13日 马克思校订和补充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来的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欧洲的金融恐慌”一文。文中揭穿了反革命的波拿巴集团企图用发动局部战争的方法来延长自己在法国的统治的阴谋。文章发表在2月1日该报上。
- 1月21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整理好以后，写信给恩格斯说，由于没有钱付邮费，他不能把手稿寄给柏林的出版商，他请求恩格斯寄给他两英镑；并且还同恩格斯商量该书外文译本的版权问题。
- 1月25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经济评论。这篇文章没有发表。
- 1月25—26日 恩格斯写信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表示自己反对他支持金克尔。
- 1月26日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寄给柏林出版商敦克尔。
- 1月28日 马克思写一篇关于法国国内政治状况的文章，文中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材料。文章以“路易·拿破仑的处境”为题发表在2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由于马克思标明他这篇文章是巴黎通讯，所以他在文章上写的日期是1月26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工业发展前途的文章。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大概被邮局扣压，没有送到马克思手里。
- 1月31日 恩格斯写“法国军队”一文，分析法国的军事力量，他利用了根据路易·拿破仑的命令在“立宪主义者报”上公

- 布的官方数字。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 2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 月 1 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好定期特约文章。文章没有发表。
- 马克思写信给在美国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社会主义者约·魏德迈，告诉他已同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断绝关系，因为琼斯企图和资产阶级急进派订立协议；同时谈到了党内同志、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恩格斯、沃尔弗、弗莱里格拉特、维尔特、德朗克、伊曼特等人的情况。马克思还告诉魏德迈，正准备在德国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向他介绍了该书的大纲。
- 马克思回信给纽约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团体的领导人阿·康普，说他在这段时间没有和任何组织发生关系，因为他在从事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所必需的理论工作。
- 2 月 2 日 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对寄给敦克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的下落感到不安，他担心手稿落入了警察手中。
- 2 月 4 日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研究了欧洲的战爭前景，他相信，战爭将导致严重的、而且归根到底是革命的后果。
- 2 月 8 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文章，评论拿破仑第三在 2 月 7 日立法议会开幕时所作的御前演说以及在他的授意下写的一本匿名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文章没有发表。
- 2 月 9 日 马克思接到敦克尔的通知，说他已于 2 月 1 日收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

- 2月10日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德国的兵力”一文；他根据德国官方材料估计了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各邦可能用来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武装力量；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导致德国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3月12日该报上。
- 2月12日 马克思为了帮助患重病的党内同志、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格·埃卡留斯，在伦巴第典当衣服。
- 2月中 马克思向“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查·德纳打听，能否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英译本。在美国出书一事未获成功。
恩格斯写“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一文，分析了奥地利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在四边形要塞区（曼都亚、培斯克拉、列尼亚哥和维罗那）的阵地的战略优势。文章发表在3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月23日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寄给柏林的敦克尔。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
- 2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打算以“波河与莱茵河”为题写一本小册子，来阐述他和马克思对正在策划中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观点。
- 2月25日 马克思请拉萨尔为恩格斯拟写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寻找出版商。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认为“波河与莱茵河”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劝恩格斯尽快把手稿写出来。他建议匿名出版这本小册子，以便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本书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军事权威。
- 2月25日和3月4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以“不列颠工厂工

-
- 2月28日—12月 业的状况”为题的文章,分析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统计报告。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3月15日和24日该报上。马克思写研究资本诸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因此,马克思继续在英国博物馆里从事研究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威兰德、配第、马尔萨斯、穆勒、莫利纳里、加利阿尼等人的著作,并且作了许多摘录。
- 2月底 恩格斯写“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一文,分析了以奥地利为一方,以及以法国和意大利各国为另一方的作战双方的战略阵地。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3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月底—3月9日 恩格斯写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这个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 3月1、22日和4月1日 马克思写三篇评论迪斯累里向议会提出的选举改革法案的文章。第一篇以“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为题发表在3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余两篇没有发表。
- 3月10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已收到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手稿,他给这本小册子以很高的评价。当天他就把手稿寄给柏林的出版商敦克尔。
- 3月11日左右和15日 马克思写“法国的战争前景”和“普鲁士的战争前景”两文,发表在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法国的战争前景”一文,标明写于巴黎,署的日期是3月9日。
- 3月18日左右 马克思写“历史上的类似现象”一文,把1813年拿破仑第一的政治状况和1859年拿破仑第三的政治状况加以对比。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3月27日—5月 马克思再次接到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编辑麦克斯·弗里德兰德通过拉萨尔向他提出的为该报撰稿的建议,这一次马克思同意了,因为自从马克思由于该报对帕麦斯顿的政策抱同情态度因而拒绝了1857年12月接到的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以来,该报已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针。但是,和弗里德兰德的商谈,由于奥意法战争的爆发未获成功。
- 3月底 马克思接到查·德纳请他为其在纽约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筑城学”和“步兵”两个条目的建议。
- 4月初 恩格斯就俄国提出的召开和平会议以解决奥法冲突的建议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以“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为题,作为社论发表在4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4月5日 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在柏林匿名出版,印数为1000册。
- 4月8日和12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评论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由于镇压1857—1859年印度人民民族解放起义的耗费而引起的严重财政困难;文章以“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为题,发表在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4月11日左右和28日 恩格斯写两篇评论法国、皮蒙特和奥地利的备战情况的文章。文章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战争的前景”(社论)为题,分别发表在4月30日和5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4月14日—5月6日左右 马克思密切注意国际局势,尤其是备战情况;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4月30日、5月12日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财政恐慌”、“甜言蜜语”(社论)。
- 4月19日 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对地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

- 根”提出了批评意见。拉萨尔在这个剧本里,极力颂扬以 1522—1523 年贵族起义的领袖济金根为代表的十六世纪德国骑士阶层。马克思在信中指出,拉萨尔把路德-骑士式的反抗看得高于闵采尔-平民式的反抗,从而歪曲地表现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德国的革命事件。马克思在信中揭露了拉萨尔主义极其有害的特点之一,就是否认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质,力图把农民描绘成反动阶级。马克思在分析拉萨尔的剧本时,阐述了一系列有关文学和美学问题的重要原理。
- 4月20日左右 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见了面,弗莱里格拉特把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庸俗唯物主义者卡尔·福格特由于战争的日益迫近而提出的政治“纲领”给他看了。马克思发现福格特的“纲领”对波拿巴颇为推崇。
- 4月21—22日 恩格斯写“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一文。马克思作了补充并署名写作日期(4月22日)后,把它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发表在5月9日该报上。
- 5月初左右 马克思看到了1859年4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这本小册子使他确信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福格特从路易-拿破仑那里领取津贴一事,在1871年为文件所证实。
- 5月1日以后 马克思召集一批德国流亡者、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罗赫纳、普芬德、李卜克内西等人——开会。在会上他严厉批评了该会机关报“新时代”,因为“新时代”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埃德加尔·鲍威尔的工具。在这次会议上,对一般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机关报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 5月9日 马克思出席英国政治活动家戴·乌尔卡尔特因意大利

- 战争而组织的一次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大会期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说，福格特从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那里领取经费来宣传波拿巴主义，并企图用收买的办法使某些政论家发表有利于路易·波拿巴的言论。
- 5月10—24日 马克思就4月底开始的意大利战争写了“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维也纳要闻”和“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5月27日、6月6日和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5月11日 李卜克内西和德国政治家比斯康普拜访马克思，请他为比斯康普在不久前创办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以及其他工人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报”撰稿。马克思由于时间不够谢绝了这一请求，但是答应帮助该报，为该报在朋友中组织订户，给以金钱上的支持，向该报提供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等。马克思提出要他帮助，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人民报”同站在亲普鲁士和亲波拿巴立场上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谈话中，把福格特“纲领”的内容和1859年5月9日群众大会上从布林德那里得到的关于福格特充当波拿巴走狗的活动的材料告诉了他们。比斯康普事先没有通知马克思就把这些材料用到他反对福格特的文章“帝国摄政王”中去了，这篇文章发表在5月14日“人民报”上。
- 5月12日—24日左右 恩格斯写“战争”、“战况没有进展”、“会战终于发生了！”、“蒙特贝洛会战”等四篇文章，评论意大利军事行动的进程和最初几次会战。文章作为社论分别发表在5月23日、27日，6月6日和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5月14日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人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一篇评

- 论恩格斯的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文章,文中引证了小册子的几个地方,指出小册子的作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
- 5月18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约·魏德迈和阿·康普从美国寄来的信。他们告诉马克思说,在美国预订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已经不下100人。
- 5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给拉萨尔,对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提出批评意见,从文学观点和剧本的历史内容的观点分析了这个剧本。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从党的立场出发分析了拉萨尔的剧本,指出剧本的根本缺点是低估了农民运动的作用。
- 鉴于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出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建议出版“党的宣言”,阐述无产阶级革命者对战争的态度,并批判拉萨尔所维护的主张德国中立的立场。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小册子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他把拉萨尔所维护的对奥意法战争的观点看成是替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反革命统治集团的政策作辩护。
- 5月24日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的阵地,马克思通过普芬德介绍卡·沙佩尔加入协会并担任协会的领导工作。
- 5月27日左右 马克思认为恩格斯关于军事事件的文章可以增加“人民报”的订户,因此,在他的请求下,恩格斯为该报写了“意大利战争”一文,发表在5月28日该报上。
- 5月30日—6月9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三篇文章,评论意大利军事行动的进程和第一次马振塔大会战。恩格斯这三篇文章分别以“战略”、“军事行动的经过”、“奥军的失败”为题,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15、17和22日该报上。

- 5月底 马克思给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发表在5月16日“思想和行动”报上的宣言写按语。马克思的按语同宣言的译文一起发表在6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6月3日左右—7月15日 马克思同比斯康普协作，为“人民报”写评论，嘲笑“海尔曼”报的内容和文风。评论以“报刊述评”为题发表在6月4、25日，7月9日和16日“人民报”上。
- 6月4日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人民报”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的大部分。马克思的序言同时也为许多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所转载。
- 6月7日左右 马克思在1859年6月2日瑞士报纸“瑞士商业信使报”的附录中读到了福格特的诽谤文章“警告”；这篇文章完全是攻击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粗野的诽谤性的谰言。为了揭露福格特的诽谤，在马克思的坚决要求下，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 6月9日左右 恩格斯写完了应马克思请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筑城学”这一条目，载于同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七卷。
- 6月9日左右和16日左右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两篇评论意大利军事行动的进程的文章。文章以“军事事件”和“马振塔会战”为题，分别发表在6月11日和18日该报上。“马振塔会战”一文还以“历史的一章”为题发表在7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6月10日 马克思在和比斯康普商谈中，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恩格斯表示，愿意公开地和更积极地参加“人民报”的出版工作，并建议在最近一期“人民报”上刊登这则消息。6月11日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印数为1000册。
- “人民报”征得马克思的同意，发表了编辑部关于

- 扩大该报撰稿人范围和吸收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写作力量，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和海泽参加该报工作的声明。
- 6月12日左右—
7月2日左右 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人民报”出版工作的一些问题，并同许多熟人商定给“人民报”以物质支援。马克思还到苏格兰去拜访了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伊曼特和海泽，并就筹措出版报纸的经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
- 6月23日左右 马克思为“人民报”写“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一文，认为随着意大利战争的结束，德国将成为新的革命事件的中心；文章发表在6月25日该报上。
- 6月23日—7月7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一文和两篇以“索尔费里诺会战”为题的文章。文章分别于6月25日、7月2日和9日发表。
- 6月24日左右和
7月6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评论意大利军事行动的进程的文章：“战争的消息”和“历史的公断”；文章作为社论分别于7月8日和21日发表。
- 7月3日左右 马克思从曼彻斯特返回伦敦后，担任了“人民报”的实际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他打算不仅利用这家报纸作为宣传革命无产阶级思想的讲坛，而且在一旦发生革命事件时就把它变成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中心。7月9日左右马克思写“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揭露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及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发动的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运动的反革命性质。文章发表在7月9日“人民报”上。
- 7月12日左右—
8月中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五篇评论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

- 拉弗兰卡条约”、“被证实了的真理”和“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说明拿破仑第三在7月间匆匆和奥地利签订和约,是因为他害怕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各国的革命震荡,同时还揭露了波拿巴集团对意大利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敌视态度。文章作为社论分别发表在7月27、28日,8月4日和29日该报上。
- 约7月中 马克思就匿名的反福格特的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厂厂主霍林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走狗。由于6月中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的印刷厂中曾发现带有布林德的手迹的传单校样,并把它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所以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
- 7月20日—8月3日左右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一组以“意大利战争。回顾”为题的文章,阐述了奥意法战争的各个主要事件。这一组文章发表在7月23、30日和8月6日该报上。
- 7月23日—8月20日 马克思在“人民报”上转载了“自由新闻”发表的外交文件“1837年内阁出版的俄国当今在位皇帝训诫录”的译文。马克思还把这个文件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经略加删节后,发表在8月3日该报上。
- 7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给敦克尔,指出有必要在报上刊登一个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已经出版的广告。
- 7月底—8月中 马克思为“人民报”写《Quid pro quo》这组文章,根据官方的外交文件,批判地分析了普鲁士统治集团在奥意法战争期间的政策。文章发表在7月30日,8月6、13和20日该报上;由于“人民报”停刊,这一组文章没有登完。

-
- 8月3—15日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评论,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卓越的科学成就和制定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事业中的重要阶段;评论发表在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上。由于“人民报”停刊,评论没有登完。
- 8月5日左右 马克思以“不列颠的贸易”为题写一篇关于英国对外贸易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8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8月13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德纳请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关于黑格尔这个条目的建议。但是,由于德纳提出一个必需的条件,要求这一条目必须写得“绝对公正”,就是说不要对黑格尔的观点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 约8月中 马克思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知道,由于奥格斯堡“总汇报”刊登了李卜克内西寄去的传单“警告”,福格特向法院对该报提出控诉,所以该报编辑部坚决要求为对福格特的指责提供证据,虽然马克思激烈反对“总汇报”的方针,但是他认为必须帮助该报揭露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活动。因此,他决定同布林德会晤,要求布林德证实对福格特的指责。但由于布林德不在伦敦,会晤未能举行。
- 8月19日左右 马克思为“人民报”写“政治评论”一文,主要是评论伦敦建筑工人的罢工;文章发表在8月20日该报上。
- 8月20日 由马克思担任编辑的“人民报”出版最后一号(第16号)。该报由于经费困难而停刊。
- 8月23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一文,根据对1844—1858年期间英国官方统计资料的分析指出,尽管工业生产有所增长,但英国无产阶

- 级贫困化的过程却加剧了。文章发表在 9 月 16 日该报上。
- 8 月底—10 月 由于“人民报”停刊,马克思要用很多时间来清理有关该报出版工作的事务。他不得不用自己的钱去偿付一部分因出版报纸而欠印刷厂厂主的债。
马克思经受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他没有钱付房租、煤气费、水费,无法缴纳子女的学费。恩格斯像往常那样,帮助了马克思。
- 9 月—10 月 10 日 左右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步兵”这一条目,刊载在 1860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九卷。
- 9 月 1 日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瑟美列拜访了马克思,把奥意法战争开始时科苏特同路易-拿破仑进行谈判的情形告知了马克思。
- 9 月 5 日 马克思写“工厂工业和贸易”一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断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发展所固有的某些规律性。文章发表在 9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马克思写“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根据从瑟美列那里得到的材料,揭露了波拿巴集团利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运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企图。文章发表在 9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并摘要刊载在伦敦“自由新闻”、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威塞尔报”上。
- 9 月 8 日和 20 日 之间 恩格斯同从德国来的双亲一起到苏格兰旅行。
- 9 月 10 日左右— 9 月底 马克思获悉布林德 9 月 8 日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布林德在信中坚决否认他曾参与对福格特提出指责一事。马克思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去见伦敦“自由新闻”报的责任编辑科勒特,科勒特证实 5 月 27 日“自由新闻”报发表的匿名文章“康斯坦丁大公——未来的匈牙利国王”的作者正是布林德,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后来印发

- 的传单“警告”基本上是相同的。
- 9月13—30日 马克思以“新的对华战争”为题写一组文章,揭露了英法殖民主义者的行为,尖锐地抨击了帕麦斯顿政府掠夺性的殖民政策。这组文章发表在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9月17日 马克思收到霍林格尔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奥·费格勒的书面声明,他证实传单“警告”的手稿从笔迹看是布林德写的,并且说霍林格尔亲自告诉他传单的作者是布林德。
- 10—11月 马克思认为在无产者中间传播自己的经济学说有很大的意义,因此,他给一批工人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
- 10月18日 马克思写“英国的贿选活动”一文,揭露资产阶级贵族当权的英国的政治制度;文章发表在1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0月19日 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奥尔格斯请马克思把证明传单“警告”的作者是布林德的文件寄去,回信时马克思随信寄去了排字工人费格勒9月17日的声明,以便在审理福格特控诉“总汇报”一案时把这些文件提交法庭。马克思的信和费格勒的声明一起发表在10月27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
- 10月20日 马克思写“对和平的激进看法”一文,批判地评价了法国、撒丁和奥地利之间的和约的条款;关于签订这一和约的谈判是1859年10—11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1月 恩格斯研究哥特语,并打算进一步精通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
- 11月7日 马克思寄给汉堡“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篇驳

- 斥汉堡“自由射手”报编辑爱德华·梅因的声明,梅因毫无根据地断言,布林德不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并指责马克思企图诽谤布林德。马克思在自己声明的结尾要求布林德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从而帮助揭露福格特同拿破仑第三的联系。马克思的声明以“关于卡尔·福格特控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案件”为题,发表在11月19日“改革报”第139号的副刊上。奥格斯堡“总汇报”没有发表马克思的这篇声明。
- 11月10日 恩格斯参加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
- 11月15日 由于布林德公开拒绝承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马克思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一篇声明,根据无法辩驳的事实,再一次证实传单是布林德写的。马克思的声明发表在11月2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25号的副刊上。
马克思写“德国的动荡局势”一文,指出奥普矛盾的尖锐化;文章发表在1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1月17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关于苏伊士问题的文章,但没有发表。
- 11月中 马克思写“对华贸易”一文,以中国为例,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各国的掠夺行为;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欧洲列强对华贸易的发展前景不佳。文章发表在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1月25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一文,评论英国社会舆论对法国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威胁的反应。文章于12月9日发表。
- 1859年12月10日左右—1860年2月初 恩格斯写三篇文章,阐述1859年11月开始的西班牙侵略摩洛哥的战争的进程;有两篇以“对摩尔人的战争

-
- 的进程”和“对摩尔人的战争”为题，作为社论分别发表在1月19日和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另一篇以“对摩尔人的战争”为题，于3月17日发表。
- 12月12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正在研究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同时指出达尔文成功地证实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给了神学以毁灭性的打击。
- 12月13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谈到俄国社会发展的速度比欧洲其他各地快，他一方面指出了农民反对贵族的运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贵族反对沙皇的立宪运动。
- 50年代末—60年代初 恩格斯研究英国经济学家达布耳德的“英国财政、货币制度和统计史”一书，并且作了详细的摘录。

人名索引

三 画

- 凡蒂, 曼弗雷多 (Fanti, Manfredo 1808—1865) —— 意大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曾参加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皮蒙特师; 1860—1861 年任意大利陆军和海军大臣。——第 414—416、458 页。
- 大莫卧儿王朝——印度的钵谿沙赫王朝 (1526—1858)。——第 331 页。

四 画

- 尤赫 (Juch) —— 德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从 1859 年 7 月起为“海尔曼”报编辑。——第 689 页。
- 尤利乌斯, 古斯塔夫 (Julius, Gustav 1810—1851) ——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158 页。
- 尤维纳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纪六十年代, 死于 127 年后) ——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 341 页。
- 巴赫, 亚历山大 (Bach, Alexander 1813—1893) —— 男爵, 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和教权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8—1849 年任司

法大臣, 1849 年 7 月至 1859 年 8 月任内务大臣, 实际上掌握了奥地利的全部政策。——第 478 页。

- 巴赞, 弗朗斯瓦·阿希尔 (Bazaine, François Achille 1811—1888) —— 法国将军, 从 1864 年起为元帅,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曾参加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曾参加 1862—1867 年法国对墨西哥的武装干涉, 普法战争期间 (1870—1871) 指挥莱茵军团, 1870 年 10 月在麦茨投降。——第 402 页。

巴尔本, 尼古拉 (Barbon, Nicholas 1640—1698)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认为物的价值是由它的有用性决定的; 他是所谓货币国定说的先驱。——第 68 页。

巴拉宾,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 (Балабин, 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 俄国外交家, 1858—1864 年驻维也纳大使。——第 338 页。

巴拉盖·狄利埃, 路易 (Baraguay d' Hilliers, Louis 1764—1812) —— 法国将军,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他是阿希尔·巴拉盖·狄利埃的父亲。——第 259 页。

巴拉盖·狄利埃, 阿希尔 (Baraguay d'

- 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54年指挥法国的波罗的海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1870年任巴黎总督。——第350、381、389、390、401、402、415、416、422、427、431、440、455、458、478页。
- 巴纳姆,芬涅阿斯·泰勒(Barnum, Phineas Taylor 1810—1891)——美国私营剧院老板,专演各种奇离古怪的戏剧。——第505页。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ede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第26页。
- 戈登(Gordo)——奥地利将军,曾多次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第649页。
- 切茨,亚诺什(Czetz, Janos 1822—1904)——匈牙利将军,在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中任七城市革命军总参谋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567页。
- 文普芬,弗兰茨(Wimpffen, Franz 1797—1870)——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第一军团的指挥官。——第382、442页。
- 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Welden, Franz Ludwig 1782—1853)——男爵,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对革命的意大利的远征;在镇压了1848年十月起义后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9年4—5月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第267页。
- 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9—79)——罗马皇帝(69—79)。——第473页。
- 丹尼洛一世·涅哥什(Daniilo I Njegoš 1826—1860)——门的内哥罗公爵(1852—1860)。——第505页。
-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198页。
- 日尔明尼,沙尔·加布里埃尔(Germigny, Charles Gabrielle 1789—1871)——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和财政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1—4月任财政部长,土地信用公司经理(1854—1856),法兰西银行经理(1856—1867)。——第197页。
- 比克西奥,雅克·亚历山大(Bixio, Jacques Alexander 1808—1865)——法国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国民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年12月20—29日任农业和贸易部长,1849年为立法会议员。——第199页。
- 卜尼格先,鲁道夫(Bennigsen, Rudolph 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1859—1867年为民族联盟党主席,从1867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3和1887—1898)。——第548页。

五 画

布阿(Bouat)——法国将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367

- 页。
- 布伦(Boulogne)——据传说是公元前390年入侵意大利并占领了罗马的高卢人的领袖。——第509页。
-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他发展了“劳动货币”论。——第76页。
-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第41—45、51、86、94、114—116、137页。
- 布莱克,威廉(Blake, William)——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经济学家,著有关于货币流通的著作。——第94、169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236—238、586、606页。
- 布坎南,大卫(Buchanan, David 1779—1848)——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信徒和诠释者。——第103页。
- 布鲁姆,亨利·彼得(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男爵,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大法官(1830—1834);从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便不起多大作用了。——第51、523、591页。
- 布奥尔·绍恩施坦,卡尔·斐迪南(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后为驻伦敦公使(1851—1852)、首相和外交大臣(1852—1859)。——第335、338—341、477页。
-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Blücher, Gebhardt Lebrech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曾多次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296、498页。
- 布朗沙尔(Blanchard)——法国将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390页。
- 布莱克利(Blakeley)——英国军官和记者,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担任“泰晤士报”在奥军中的通讯员。——第639页。
- 布尔韦尔,威廉·亨利·利顿·厄尔(Bulwer, William Henry Lytton Earle 1801—1872)——英国外交家,议会议员(1830—1837),辉格党人;1839年和1840年任英国驻巴黎代办,后任驻马德里公使(1843—1848)、驻华盛顿公使(1849—1852)和驻佛罗伦萨公使(1852—1855);1858—1865年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第573页。
- 布尔巴基,沙尔(Bourbaki, Charles 1816—1897)——法国将军,原籍希腊人,曾参加1853—1858年克里木战争,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曾参加1870—1871年普法战争。——第321、458页。
- 布尔布隆(Bourboulon)——1859年法国驻中国全权代表。——第568、569页。
- 布隆诺夫,菲力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公使(1840—1854, 1858—1860),后为大使(1860—

- 1874), 出席 1856 年巴黎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员。——第 505 页。
-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 布卢姆菲耳德, 约翰·阿瑟·道格拉斯 (Bloomfield, John Arthur Douglas 1802—1879)——英国外交家; 1851—1860 年任驻柏林公使和全权代表。——第 523 页。
- 白恩士, 詹姆斯 (Burnes, James 1801—1862)——英国医生, 亚历山大·白恩士的哥哥。——第 575 页。
- 白恩士, 亚历山大 (Burnes, Alexander 1805—1841)——英国军官, 1838—1842 年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期间任喀布尔英军参谋部政治顾问。——第 574—576 页。
- 汉利, 约瑟夫·沃纳 (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贸易大臣 (1852, 1858—1859)。——第 238 页。
- 汉普敦, 约翰 (Hampden, John 1594—1643)——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他代表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第 506 页。
- 加尔涅, 热尔门 (Garnier, Germain 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君主主义者; 重农学派的模仿者; 亚当·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第 63、64、99 页。
- 加格恩, 亨利希 (Gagern, Heinrich 1799—1880)——男爵,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自由派;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议长, 属于中间派右翼, 曾任帝国首相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3 月)。——第 463 页。
- 加布伦茨, 路德维希·卡尔·威廉 (Gablenz, Ludwig Karl Wilhelm 1814—1874)——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 曾参加 1866 年奥普战争。——第 413 页。
-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1848 年率领志愿军站在皮蒙特军队方面奋不顾身地同奥地利作战; 1849 年 4—6 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 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而斗争,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阿尔卑斯猎兵。——第 179、185、194、381、386、399、403—407、413、420、424、435、436、441、473、479、593、623、663 页。
- 加利阿尼, 斐迪南多 (Galiani, Ferdinando 1728—1787)——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学说的批评者; 他断言物的价值是由它的有用性决定的, 同时也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做了许多正确的猜测。——第 22、47、62、79、95、144 页。
- 卡斯尔里子爵, 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eagh, Robert Stuar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 (1805—1806, 1807—1809), 外交大臣 (1802—1822)。——第 71、678 页。
- 卡斯特尔博果 (Castelborgo)——意大利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415、416 页。
- 卡登, 罗伯特·瓦尔特 (Carden, Robert Walter 生于 1801 年)——英国官吏, 议会议员, 托利党人。——第 586—589

- 页。
-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 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贵族特权的维护者。——第 118 页。
- 卡穆, 雅克 (Camou, Jacques 生于 1792 年)——法国将军,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近卫师。——第 429 页。
- 卡尔利, 卓万尼·黎纳尔多 (Carli, Giovanni Rinaldo 1720—1795)——意大利学者, 著有许多有关货币和粮食贸易的著作, 他反对重商主义。——第 141 页。
- 卡富尔, 卡米洛·本佐 (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和领袖; 撒丁政府首脑 (1852—1859 和 1860—1861), 实行在萨瓦王朝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意大利的政策, 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仑第三的支持, 1861 年领导第一届意大利政府。——第 179、180、335、406、470、473 页。
- 让南 (Jannin)——法国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429 页。
- 本德尔 (Bender)——伦敦书商。——第 685 页。
- 圣芒——见芒, 亚历山大罗。
-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85、147 页。
- 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 (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陆军大臣 (1851—1854), 1854 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 198 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487、575、576、675、676、679、680 页。
- 尼耶尔, 阿道夫 (Niel, Adolphe 1802—1869)——法国将军, 后为元帅;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199、350、381、415、418、420、423、427—431、455、458 页。
- 皮特(小皮特)威廉 (Pitt William 1759—180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的首领之一; 曾任首相 (1783—1801、1804—1806)。——第 606 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皮尔派, 因他而得名)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 (1834—1835 和 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第 54、64、72、164、174、573 页。
- 皮卡尔 (Picard)——法国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429 页。
- 皮阿诺里, 卓万尼 (Pianori, Giovanni 1827—1855)——意大利革命家, 曾参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和反对法国干涉者的罗马共和国保卫战; 革命失败后流亡皮蒙特, 后又流亡法国; 1855 年 5 月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 190 页。

弗莱隆, 埃利·卡特林 (Fréon Elie Catherine 1719—1776) —— 法国批评家和政论家, 伏尔泰的论敌。—— 第 435 页。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 —— 德国诗人, 开始活动时是浪漫主义者, 后来成为革命诗人,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 第 683 页。

弗略里, 艾米尔·费里克斯 (Fleury, Emile Felix 1815—1884) —— 法国军官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第 198 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 —— 奥地利皇帝 (1848—1916)。—— 第 185、313、318、334—336、373、379、426、442、443、448—453、455—461、467、469、473、478、484—486、490—494、508、516、542、592、595、638、640 页。

弗兰契斯科二世 (1836—1894) —— 那不勒斯国王 (1859—1860)。—— 第 468、469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iedrich-Wilhelm I 1802—1875) —— 黑森-加塞尔选帝侯 (1847—1866), 1831—1847 年为摄政王。—— 第 596、598—600 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大帝)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 —— 普鲁士国王 (1740—1786)。—— 第 296、504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 —— 普鲁士国王 (1797—1840)。—— 第 504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 普鲁士国王 (1840—1861)。—— 第 371、548 页。

弗兰克·德·庞比尼昂—— 见庞比尼昂, 让·雅克·勒·弗兰克。

兰斯唐侯爵, 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 (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1806—1807 年任财政大臣, 枢密院院长 (1830—1841, 1846—1852), 不管大臣 (1852—1863)。—— 第 43 页。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 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第 311 页。

瓦扬, 让·巴蒂斯特·菲利贝尔 (Vaillant, Jean-Baptiste-Philibert 1790—1872) ——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陆军大臣 (1854—1859), 1859 年奥意法战争期间是总参谋长。—— 第 486 页。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伦纳 (Walewski, Alexander-Florian-Joseph-Colonna 1810—1868) —— 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所生之子; 曾参加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 曾任外交大臣 (1855—1860); 曾担任巴黎会议 (1856) 的主席。—— 第 542、622 页。

六 画

西迪-穆罕默德 (Sidi Mohammed 1803—1873) —— 摩洛哥皇帝 (1859—1873)。—— 第 631 页。

西尼耳, 纳骚·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 英国庸俗的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他反对缩短工作日。——第123、134页。
- 西蒙尼,艾尔纽(Simonyi, Ernő 1821—1882)——匈牙利政治活动家,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1年为匈牙利议会议员。——第567页。
-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交家,1851—1854年任驻彼得堡公使。——第675、679页。
- 西马糜各厘(Seymour, Michael 1802—1887)——英国海军上将,1854—1856年参加克里木战争,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海军指挥官(1856—1858)。——第583页。
-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 Chales 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41、51、87页。
- 米契尔(Mitchell)——英国驻广州代办。——第602—604页。
-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nié, Claude Etienne 1804—1870)——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创造了新式步枪。——第192、208、210页。
- 米尔纳·基卜生——见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
- 米塞尔登,爱德华(Misselden, Eduard 1608—1654)——英国商业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第115、119—121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真姓为阿鲁埃)(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进行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的斗争。——第311、435页。
- 达里蒙,路易·阿尔弗勒德(Darimon, Louis Alfred 1819—1902)——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他赞同并宣扬蒲鲁东的观点。——第76页。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 - 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有名的法国外交家,首任外交大臣(1797—1799, 1799—1807, 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1814—1815),以政治上毫无原则和自私自利著称。——第673页。
-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D'Apre, Constantin 1789—1850)——男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第267页。
- 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安德鲁·拉姆西(Dalhousie, James Andrew Ramsay 1812—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印度总督(1848—1856),实行殖民掠夺政策。——第331页。
- 吉南,路易·欧仁(Ginain, Louis Eugène 1818—1886)——法国战争画画家。——第519页。
- 安诺特,克劳德·弗朗斯瓦(Nonnotte, Claude François 1711—1793)——法国作家,耶稣会教徒,伏尔泰的论敌。——第435页。
- 安斯提,托马斯·契泽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 者；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曾任香港首席检查官（1854—1859）。——第571页。
- 艾曼努尔——见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 毕希，约翰·格奥尔格（Büch, Johann Georg 1728—1800）——德国经济学家，基本上持重商主义观点。——第158页。
- 毕洛夫，亨利希·迪特里希（Bülow, Heinrich Dietrich 1757—1807）——普鲁士反动的军事作家，有名的“最新军事制度的精神”一书的作者。——第269—271、365、479、482页。
-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530页。
- 多德，乔治（Dodd, George 1808—1881）——英国政论家，著有许多有关工业问题的著作。——第99页。
- 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Mohammed 1793—1863）——阿富汗国王（1826—1863）。——第574—576页。
-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174页。
- 亚历山大，黑森亲王（Alexander, Hessischer Prinz 1823—1888）——奥地利将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401、430页。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442页。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180、319、394、406页。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15、31、39、58、107、127、146页。
- 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 在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叫萨尔达尼拔）——亚述国王（公元前668—约626）。——第565页。
- 色诺芬（Xenophon 公元前约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第125、127、147页。
-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1727—1760）。——第63、65页。
-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第63页。
- 齐格勒，弗兰茨（Ziegler, Franz）——维尔腾堡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主张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曾参加创建民族联盟党。——第463页。
- 列奥波特二世（Leopold II 1797—1870）——托斯卡纳大公（1824—1859）。——第545页。
- 休谟，大卫（Hume, 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150—155、158—161、171、172、175页。
- 休谟，詹姆斯·迪肯（Hume, James Deacon 1774—184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第169页。

伊索(Aisopos公元前六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178页。

伊兰尼,丹尼尔(Iranyi, Daniel 1822—1892)——匈牙利政治家和政论家,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议会议员,后为革命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567页。

伊哈斯,丹尼尔(Ihász Daniel 1818—1882)——匈牙利军官,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后来流亡国外,科苏特的朋友。——第567页。

伊万三世(Иван III 1440—1505)——莫斯科大公(1462—1505)。——第564页。

伊丽莎白(Elizabeth 1801—1873)——普鲁士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妻子。——第371页。

伊丽莎白 I (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第134页。

考莱男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1804—1884)——英国外交家,驻巴黎大使(1852—1867)。——第356页。

七 画

邦康帕尼,卡洛(Boncompagni, Carlo 1804—1880)——意大利国家活动家,温和自由派,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意大利;1848年任撒丁教育大臣,1852年任农业、贸易、教育和司法大臣,1853—1856年为下院议长,1859年任撒丁驻佛罗伦萨全权代表。——第543页。

芒,亚历山大罗(Mon, Alejandro 1801—

1882)——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37, 1844—1846);1858—1862年为驻法国大使,政府首脑(1864)。——第542页。

亨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606页。

亨什尔曼,伊姆雷(Henszlmann, Imre 1813—1888)——匈牙利考古学家,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567页。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25、525页。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第41、50—52、87、149、158—169、172—175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11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Val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著有许多关于筑城学和围攻战的著作。——第283—285、290页。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囚于普鲁士监狱中;1846—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从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马克

-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83 页。
- 沃尔弗, 克利斯提安 (Wolff, Christian 1679—1754)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形而上学者。——第 530 页。
- 汉尔波尔, 霍雷修 (Walpole, Horatio 1717—1797) ——英国贵族, 作家和艺术理论家。——第 437 页。
- 沃尔波尔, 斯宾塞·霍雷修 (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内政大臣 (1852, 1858—1859 和 1866—1867)。——第 238 页。
- 杜兰多, 卓万尼 (Dutando, Giovanni 1804—1869) ——皮蒙特军队的将军, 1848—1849 年曾与奥军作战,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266、267、415、416、458 页。
- 杜尔菲尔德 (Dürfeld) ——奥地利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429 页。
- 杜维尔努阿, 亨利希·古斯塔夫 (Duvernoy, Heinrich Gustav 1802—1890) ——维尔腾堡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曾任自由派内阁的内政大臣 (1848—1849), 省议会议员 (1851—1868), 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463 页。
- 坎宁, 查理·约翰 (Canning, Charles John 1812—1862) ——从 1859 年起为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邮政大臣 (1853—1855), 印度总督 (1856—1862), 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组织者。——第 326—328 页。
- 努根特, 拉伐尔 (Nugent, Laval 1777—1862) ——伯爵, 奥地利元帅;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 1859 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216、266、372、638 页。
- 肖特, 济格蒙德 (Schott, Siegmund 1818—1895) ——维尔腾堡作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463、464 页。
- 贝克, 罗伯特 (Baker, Robert) ——爱尔兰的工厂视察员。——第 228、243、244 页。
- 贝利, 赛米尔 (Bailey, Samuel 1791—187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但同时他也正确地看出了李嘉图经济观点中的一些矛盾。——第 61、134 页。
- 贝雷, 若尔日 (Beuret, Georges 1803—1859) ——法国将军, 曾参加 1823 年的西班牙远征、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罗马远征,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390 页。
- 贝塔, 亨利希 (贝特齐希 (Betzied) 的笔名) (Beta, Heinrich) ——德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688 页。
- 贝克尔, 伊曼努尔 (Bekker, Immanuel 1785—1871) ——德国语文学家, 整理并出版了古代作家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阿里斯托芬等) 的许多著作。——第 15、39、58 页。
- 贝克莱, 乔治 (Berkely, George 1685—1753) ——英国的反动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主教, 在政治经济学上他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 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 他是货币名目论的代表人物。——第 24、69、108

- 页。
- 贝列拉, 伊萨克 (Péaire, 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2年同他的兄弟艾米尔·贝列拉一起创立了动产信用公司, 他著有许多关于信贷问题的著作。——第 85、86、335 页。
- 贝格尔 (Berger)——奥地利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483 页。
- 贝特伦, 格尔格利 (Bethlen, Gergely)——伯爵, 匈牙利军官, 曾参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567 页。
- 贝奈德克, 路德维希 (Benedek, Ludwig 1804—1881)——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6 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义和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1860 年任奥军参谋长, 匈牙利军政总督, 1866 年奥普战争期间任奥军总司令。——第 380、381、386、387、422、440、453—456、458、485、486 页。
- 贝尔尼埃, 弗朗斯瓦 (Bernier, François 1625—1688)——法国医生, 旅行家和作家。——第 120 页。
- 克莱, 威廉 (Clay, William 1791—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 “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 174 页。
- 克赖, 帕尔 (Kray, Pál 1735—1804)——奥地利将军, 原籍匈牙利, 曾多次积极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 270、271 页。
- 克尔纳, 格奥尔格 (Körner, Georg)——十八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家。——第 146 页。
- 克拉姆-加拉斯, 爱德华 (Clam-Gallas, Eduard 1805—1891)——奥地利将军, 原籍匈牙利, 1848—1849 年参加镇压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1866 年奥普战争的参加者。——第 427、454 页。
-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43 页。
- 克拉普卡, 迪约尔吉 (Klapka, György 1820—1892)——匈牙利将军, 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指挥匈牙利一个军团; 1849 年 7—9 月任卡罗姆要塞卫戍司令, 该要塞顽强地抗击了奥军的侵犯; 1849 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 1867 年大赦后返回匈牙利。——第 435、436、564、567 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最大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 1812—1814 年在俄国军队中服务。——第 491、503、668 页。
- 克莱斯特, 艾瓦德 (Kleist, Ewald 1715—1759)——德国诗人。——第 692 页。
- 克洛蒂尔达, 萨瓦公主 (1843—1911)——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女儿, 从 1859 年起为拿破仑亲王的妻子。——第 196—198 页。
- 里利阿 (Lillia)——奥地利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428、430—432 页。
- 里瑟姆, 威廉·亨利 (Leatham, William

- Henry 1815—1889)——英国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 586、587、590、591 页。
- 里士满公爵,查理·伦诺克斯(Richmond, Charles Lennox 1735—1806)——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 606 页。
- 里奥斯,迪埃哥·德·洛斯(Rios, Diego de Los)——西班牙将军,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619、627、630 页。
-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第 525 页。
- 劳麦,弗里德里希(Raumer, Friedrich 1781—1873)——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362 页。
-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维尔斯顿男爵(Loyd, Samuel Jones,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 174 页。
- 劳夫塔斯,奥加斯特斯·威廉·弗雷德里克·斯宾塞(Loftus Augustus William Fredrick Spencer 1817—1904)——英国外交家;驻奥地利大使(1858—1860)。——第 338、341、477 页。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 181、183、266、311、316、318、468、469、475、542、670 页。
-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约 469—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 513 页。
-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伟大的俄国统帅。——第 257 页。
- 麦克唐纳,雅克·埃蒂耶纳·约瑟夫·亚历山大(Macdonald, Jacques Etienne Joseph Alexandre 1765—1840)——法国元帅,曾多次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799 年在意大利远征和瑞士远征期间为法军总司令;拿破仑第一退位后,为波旁王朝服务,从 1816 年至 1830 年在王室朝廷中身居要职。——第 255、256、258、259、271 页。
-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1808—1893)——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64—1870);在色当会战(1870)中率 10 万法军降敌,绞杀巴黎公社的创子手之一;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第 350、381、415、416、420、424、428—431、434、440、455、458、639 页。
-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MacLeod, Henry Dunning 1821—1902)——英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第 51、133 页。
- 麦克拉伦,詹姆斯(Maclaren, James)——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流通史的研究者。——第 60、157—159 页。
- 麦克斯威尔,约翰·霍尔(Maxwell, John Hall 1812—1866)——英国农学家和统计学家,苏格兰农业协会秘书。——第 244 页。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

-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人。——第 23、42 页。
- 沙弗哥特希,约翰·弗兰茨 (Schaffgotsch, Johann Franz 1792—1866)——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454 页。
- 沙培尔、冯 (Schaper, von)——普鲁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莱茵省总督 (1842—1845)。——第 7 页。
-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1768—1848)——法国的名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 (1822—1824)。——第 678 页。
- 利希顿施坦,爱德华·弗兰茨·路德维希 (Lichtenstein, Eduard Franz Ludwig 1809—1864)——奥地利将军,曾积极参加镇压 1848 年 6 月的布拉格起义;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386、427 页。
- 伯恩施托尔夫,阿尔勃莱希特 (Bernstorff, Albrecht 1809—1873)——伯爵,普鲁士外交家,曾任驻伦敦公使 (1854—1861),外交大臣 (1861—1862),驻伦敦大使 (1862—1873)。——第 521 页。
- ## 八 画
- 金,彼得·约翰·洛克 (King, Peter John Locke 181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 235 页。
- 金凯德,约翰 (Kincaid, John 1787—1862)——五十年代苏格兰的工厂和监狱视察员。——第 226、227 页。
-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越狱逃跑,逃亡伦敦;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海耳曼”报的编辑 (1859),进行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第 684—689、694、695 页。
- 雨果,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 309 页。
- 罗,约翰 (Law, John 1671—172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财政家,曾任法国财政大臣 (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第 154、157、159 页。
- 罗登 (Roden 死于 1859 年)——奥地利将军,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440、483 页。
- 罗素,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枢密院院长 (1854—1855);1855 年英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第 237、238、521—523、541、542、571、622 页。
- 罗奈,亚诺什 (Rónay, János 1814—1889)——匈牙利学者和作家,曾参加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6 年返回匈牙利,匈牙利议会议员。——第 567 页。
- 罗巴克,约翰·阿瑟 (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

- 会议员。——第 238 页。
- 罗斯·德·奥兰诺, 安东尼奥 (Ros de Olano, Antony 1808—1886) ——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温和派,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617 页。
- 罗伦纳, 斐迪南多 (Lorena, Ferdinando 1835—1907) —— 托斯卡纳大公列奥波特二世的儿子, 1859 年 7 月父亲退位后接受了斐迪南多四世大公的封号。——第 545 页。
- 罗伊谢尔, 奥古斯特·路德维希 (Reyscher, August Ludwig 1802—1880) —— 维尔腾堡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463、464 页。
- 罗伯斯比尔, 奥古斯丹 (Robespierre, Augustin 1763—1794) ——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人;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弟弟。——第 665 页。
- 杰 尔贝·德·桑纳兹, 毛利齐奥 (Gerbaix de Sonnaz, Maurizio 1816—1892) —— 皮蒙特军队的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401 页。
- 杰 科布, 威廉 (Jacob, William 1762 左右—1851) —— 英国商业家, 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第 99、125、126 页。
- 弥勒, 亚当·亨利希 (Müller, Adam Heinrich 1779—1829) —— 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德国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 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第 62、63 页。
- 奈, 米歇尔 (Ney, Michel 1769—1815) —— 法国元帅,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第 259 页。
- 奈斯勒 (Nessler) —— 法国军官, 新式枪弹的发明者 (1857)。——第 192 页。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 —— 英国国家活动家, 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的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政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307、309、474、477、505—507、513、523、541、543、547、561、569—576、580—584、607 页。
- 帕尔马女公爵——见波旁的路易莎, 玛丽亚-泰莉莎。
- 昂塞尔姆, 雅克·贝尔纳·莫迭斯特 (Anselm, Jacques 1740—1812) —— 法国将军, 1792 年在革命的法国同奥地利作战期间, 指挥一个军。——第 664 页。
- 昂吉埃腊, 殉道者彼得 (Anghiera, Pietro Martire 1457—1526) —— 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 生于意大利, 长期在西班牙宫廷服务。——第 144 页。
- 味吉尔 (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 ——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510 页。
- 武科维奇, 舍表 (Vukovics, Sebő 1811—1872) ——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曾任革命政府司法部长 (1849), 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曾同科苏特保持联系。

- 第 567 页。
- 林德赫斯特男爵, 约翰·辛格顿·柯普利 (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1772—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托利党人; 曾任大法官 (1827—1830, 1834—1835, 1841—1846), 议会议员。——第 497 页。
- 叔尔茨, 卡尔 (Schurz, Karl 1829—1906)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曾流亡瑞士; 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 684 页。
- 图恩, 列奥 (Thun, Leo 1811—1888)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反动分子; 按民族是捷克人; 弗兰茨·约瑟夫最亲近的顾问之一, 曾任宗教和教育大臣。——第 478 页。
- 图克, 托马斯 (Tooke, Thomas 1774—1858)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接近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他批评了李嘉图的货币论。——第 88、168、169、175、176 页。
- 图斯涅尔达——凯拉赛族领袖阿尔米纽斯的妻子。——第 684、685 页。
- 舍勒尔, 巴特米·路易·约瑟夫 (Schérer, Barthémy-Louis-Joseph 1747—1804) ——法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1795—1796 年和 1799 年参加法国在意大利的战争, 曾任陆军大臣 (1797—1799)。——第 665 页。
- 舍伐利埃, 米歇尔 (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 ——法国工程师,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第 107 页。
- 征服者威廉一世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1027—1087) ——英国国王 (1066—1087)。——第 64 页。
- 法里尼, 鲁伊治·卡洛 (Farini, Luigi Carlo 1812—1866)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意大利, 曾任教育大臣 (1851—1852); 1859 年为撒丁驻摩地那的全权代表, 内政大臣 (1860), 政府首脑 (1862—1863)。——第 544 页。
- 法利埃罗, 马林诺 (Faliero, Marino 1274—1355) ——威尼斯总督 (1354—1355) 因参与推翻贵族统治的阴谋被处死刑。——第 316 页。
- 居莱, 费伦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 ——伯爵, 奥地利将军, 原籍匈牙利,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 曾任陆军大臣 (1849—1850),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在马振塔会战失败以前, 统率奥军 (1859 年 4—6 月)。——第 185、345、366—369、372、373、379、389、419—425、428—430、432、433、442、444、478—482、490、638、639 页。
- 门德尔森, 莫泽斯 (Mendelssohn, Moses 1729—1786) ——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 自然神论者。——第 157 页。
- 彼得一世 (Пётр I 1672—1725) ——从 1682 年起为俄国沙皇, 从 1721 年起为全俄皇帝。——第 106、674、678、680 页。
- 佩利茨, 卡尔·亨利希·路德维希 (Pöhlitz, Karl Heinrich Ludwig 1772—1838) ——德国历史学家。——第 689 页。
- 佩尔采尔, 摩里茨 (Perzel, Moriz 1811—1899) ——匈牙利将军,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1851 年流亡英国。——第 567

- 页。
- 佩利西埃, 让·雅克 (Pelissier, Jean Jacques 1794—1864)——法国元帅, 三十至五十年代初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以极端残酷著称;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 (1855年5月—1856年7月); 驻英国大使 (1858—1859), 1859年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第361、494、506页。
- 拉·格萨尼埃尔, 路易·埃蒂耶纳·阿图尔·杜布罗伊-埃尔昂 (La Guéronnière, Louis Etienne Arthur Dubreuil-Hédon 1816—1875)——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五十年代为波拿巴主义者。——第297页。
- 拉德勒·德·拉·沙尔耶尔, 茹尔·玛丽 (Ladreitt de la Charrière, Jules, Marie 1806—1870)——法国将军, 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 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431页。
- 拉德米罗, 路易·勒奈·保尔 (Ladmirault, Louis René Paul 1808—1898)——法国将军,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绞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第431页。
- 拉博麦尔, 罗朗·安格里维埃尔·德 (La Beaumelle 1726—1773)——法国作家, 伏尔泰的论敌。——第435页。
- 拉德茨基, 约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 奥地利元帅, 从1831年起指挥北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 1848—1849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1850—1856年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总督。——第185、209、216、217、265—268、322、373、415、433、479、639页。
- 拉多维茨, 约瑟夫 (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翼领袖之一。——第250、274—276、278、281、288、314、464页。
- 拉莫特卢日, 约瑟夫·爱德华·德 (La Motterouge, Joseph Edouard de 1804—1883)——法国将军,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429页。
- 孟德维尔, 约翰 (Mandeville, John 约1300—1372)——据说是关于周游世界各国的许多通俗故事的编写人。——第108页。
- 孟德斯鸠, 沙尔 (Montesquieu, Chales 1689—1755)——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150、155页。
- 孟德斯鸠-费森萨克, 安·比埃尔 (Montesquieu-Fezensac, Anne-Pierre 1739—1798)——法国将军, 政治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 1792年曾参加征服萨瓦。——第649页。
- 阿梯拉 (死于453年)——匈奴领袖 (433—453)。——第507页。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0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从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1841—1846)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第573、675页。
- 阿特伍德, 托马斯 (Attwood, Thomas

- 1783—1856)——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72页。
- 阿塞利奥,马西莫·德·(Azeglio, Massimo d' 1798—1866)——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温和自由派,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意大利,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曾任皮蒙特内阁首相和外交大臣(1849—1852),1859年为撒丁驻罗马尼亚全权代表。——第543页。
- 阿勒曼迪,米凯莱·拿破仑涅(Alemandi, Michele Napoleone 1807—1858)——意大利将军,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参加者,曾领导伦巴第、瑞士和热那亚的志愿军。——第404页。
- 阿伯思诺特,乔治(Arbuthnot, George 1802—1865)——英国财政部官员;著有一系列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174页。
- 阿雷蒂诺,彼得罗(Aretino, Pietro 1492—1556)——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讽刺作家,著有许多尖锐地揭露教皇宫廷和欧洲各国君主的抨击性小册子。——第158页。
- 阿泰纳奥斯(Athenaeus 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古希腊演说术教师和语法学家。——第63页。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 Lu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最大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569页。
- 阿尔米纽斯(Arminius, 公元前17—公元21)——日耳曼部族凯拉赛人的领袖,曾领导日耳曼部族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并于公元9年在条多堡森林中击败了罗马人。——第685页。
- 阿姆斯特朗,威廉·乔治(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国发明家,以发明特别的线膛炮而著名。——第256页。
- 阿尔勃莱希特(Albrecht 1817—1895)——奥地利大公,将军,1848—1849年参加镇压意大利革命,1851—1860年为匈牙利军政总督,1859年曾负外使命赴柏林。——第508、517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1813),从1850年起为元帅。——第642页。
- 波拿巴,约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仑第一之长兄,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第434页。
-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Joseph Charles Paul, Prinz Napoleon 1822—1891)——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其长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以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而著名。——第196—199、300、382、399、444、453、457、459、460、489、564—565、642页。
- 波拿巴王朝(Bonaparte)——法国帝国王朝(1804—1814, 1815, 1852—1870)。——第183、198、205、280、304、472、474、476、501、564、566页。

- 波旁王朝 (Bourbonen) —— 法国的王朝 (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542 页。
- 波旁的路易莎, 玛丽亚-泰莉莎 (Louise Marie Th ese de Bourbon 1819—1864) —— 帕尔马女公爵, 帕尔马公国摄政女王 (1854—1859)。——第 542 页。
- 波林尼雅克, 奥古斯特·茹尔·阿尔芒·玛丽 (Polignac, Auguste Jules Armand Marie 1780—1847) —— 公爵, 复辟时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曾任外交大臣和内阁首脑 (1829—1830)。——第 673、678 页。
- 波埃利奥, 卡洛 (Poerio, Carlo 1803—1867) ——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1848 年任那不勒斯的警务长官和教育大臣, 1849—1859 年在意大利被监禁, 1861—1867 年为意大利王国议会副议长。——第 185 页。
- 庞比尼昂侯爵, 让·雅克·勒·弗兰克 (Pompignan, Jean Jacques Le Franque 1709—1784) —— 法国诗人, 伏尔泰的论敌。——第 435 页。
- ## 九 画
- 约翰 (Johann 1782—1859) —— 奥地利大公,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12 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 314 页。
- 洛克·金——贝金, 彼得·约翰·洛克。
- 洛克·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 ——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二元论者, 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动摇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 66—68、110、137、150、154、159 页。
- 咸丰 (1831—1861) —— 中国皇帝 (1850—1861)。——第 572 页。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活动家,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第 157 页。
- 查耳迪尼, 恩利科 (Cialdini, Enrico 1811—1892) —— 意大利将军, 曾参加 1848—1849 年民族解放战争和克里木战争,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413—416 页。
-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742 左右—814) —— 法兰克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317 页。
-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 英国国王 (1660—1685)。——第 43 页。
- 查理-阿尔伯特 (Charles Albert 1798—1849) —— 撒丁国王 (1831—1849)。——第 182、474 页。
- 若米尼, 昂利 (Jomini, Henri 1770—1869) —— 将军, 初在法军中供职, 后在俄军中供职, 原籍瑞士,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 著有許多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第 263 页。
- 契安多斯——见格伦维耳, 理查, 白金汉和契安多斯公爵。
- 济格尔, 弗兰茨·路德维希 (Siegel, Franz Ludwig 1812—1877) —— 德国记者和律师, “萨克森立宪报”编辑, 主张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548 页。
- 威尔逊, 詹姆斯 (Wilson, James 1805—1860)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 1853—1858 年为财政部秘书长; 1859—1860 年为印度财

- 务大臣；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 168、176、331、578 页。
-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 (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 ——英国将军，1855 年克里木战争期间曾指挥卡尔斯保卫战，议会议员 (1856—1859)。——第 505 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 ——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在 1808—1814 年和 1815 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统率军队；曾任军械总长 (1818—1827)，总司令 (1842—1852)，首相 (1828—1830) 和外交大臣 (1834—1835)。——第 291 页。
- 威尔特尔，卡尔 (Werther, Karl 1809—1894) ——普鲁士外交家，驻奥地利大使 (1859—1866 和 1866—1869)。——第 437、512、513、515—517 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普鲁士亲王，摄政王 (1858—1861)，普鲁士国王 (1861—1888)，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334、336、436、451、462、463、508、510、513、517—519 页。
-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777—1847) ——黑森—加塞尔的选帝侯 (1821—1847)。——第 596、598 页。
- 伯尔 (Boë 1808—1859) ——奥地利将军，匈牙利人，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440、483 页。
- 柏里——见塞西耳，威廉，柏里勋爵。柏拉图 (Plato 公元前约 427—约 347)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第 107、196 页。
- 柯顿，威廉 (Cotton, William 1786—1866) ——英国商业家，英格兰银行经理；称黄金的自动天平的发明者。——第 101 页。
- 柯波克，詹姆斯 (Coppock, James 1798—1857) ——英国法学家，议会选举事务代理人。——第 586、588 页。
- 柯贝特，托马斯 (Corbet, Thomas)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83 页。
- 哈通，恩斯特 (Hartung, Ernst 1808—1879) ——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1866 年参加奥普战争。——第 429 页。
- 哈治·阿布德·萨勒姆——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间在泰图安辖下任摩洛哥军队的指挥官。——第 613 页。
- 哈德菲尔德，乔治 (Hatfield, George 1787—1879) ——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 575 页。
- 哈森普鲁克，汉斯·丹尼尔 (Hassenpflug Hans Daniel 1794—1862) ——德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1832—1837 年任黑森—加塞尔的司法大臣和内政大臣，1850—1855 年为内阁首脑，专制主义的拥护者。——第 599 页。
-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er) ——1273—1806 年 (中有间断)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朝，奥地利王朝 (从 1804 年起) 和奥匈帝国王朝 (1867—1918)。——第 179、395、437、438、448、474、476、493、521、689 页。
-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 (Haxthausen,

- August 1792—1866)——普鲁士官吏和作家,写过一本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公社制度残余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农奴主反动分子。——第 678 页。
- 洪堡,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伟大的德国学者、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361、686、688 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审判案(1852)的组织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见证人。——第 520 页。
- 施利克,弗兰茨·亨利希(Schlick, Franz Heinrich 1789—1862)——伯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1854—1859 年指挥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的奥军;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任第二军团指挥官。——第 442、444 页。
- 施泰因,罗仑兹(Stein Lorenz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第 16、23、525 页。
- 施特劳斯,约翰(Strau, Johann 1825—1899)——杰出的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挥家。——第 373 页。
- 施塔迪昂,菲力浦(Stadion, Philipp 1799—1868)——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383、386、389、399、401、454 页。
-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卡尔洛维奇(亨利希)(Шторх, Андрей Карлович (Генерал) 1766—1835)——俄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模仿者。——第 106、123 页。
-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48 年 6 月, 1849—1850, 1858—1861)。——第 361、463、508—523 页。
- 施瓦尔岑堡,艾德蒙(Schwarzenberg, Edmund 1803—1873)——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386、454 页。
- 施瓦尔岑堡,费力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公爵,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在镇压了 1848 年 10 月维也纳起义以后任首相和外交大臣。——第 462、599 页。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第 87 页。
- 科斯塔,德·波勒加尔(Costa de Beauregard)——侯爵,意大利贵族,代表萨瓦出席撒丁议会的议员。——第 646 页。
-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Kolb, GeorgFriedrich 1808—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9—1866 年为“新法兰克福报”编辑。——第 295 页。
- 科勒尔,奥古斯特(Koller, August 生于 1805 年)——奥地利外交家,驻柏林大

- 使(1857—1860)。——第516页。
- 科尔登, 弗兰茨 (Cordon, Franz 1796—1869)——奥地利将军,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427、428、430、432页。
- 科苏特, 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在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435、436、446、470、560—567、685页。
- 科洛勒多-梅尔茨和瓦尔泽, 温采尔·约瑟夫 (Collaredo-Melz und Wallsee, Wenzel Joseph 1738—1822)——奥地利将军, 从1808年起为元帅, 曾多次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665页。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50页。
- 欧仁亲王——见博阿尔奎, 欧仁。
- 欧仁妮——见蒙蒂霍, 欧仁妮。
-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公元前约480—约40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著有许多古典悲剧。——第127、509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1871年受封)(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十九世纪后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 1858—1859和1866—1868), 首相(1868和1874—1880)。——第235—238、582页。

十 画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636、686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传记材料)。——第9、10、636、683页。
- 纽马奇, 威廉 (Newmarch, William 1820—188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176、235页。
- 特罗胥, 路易·茹尔 (Trochu, Louis 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1870—1871年为巴黎军事总督和国防政府主席。——第413、416、429、431、455页。
- 特罗洛普 (Trollope)——英国企业家, 建筑公司经理。——第546页。
- 摩伯, 托马斯 (Cooper, Thomas 1759—1840)——美国科学和政治活动家,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 自由贸易思想的宣传者。——第24页。
- 摩札, 亚历山大鲁 (Cuza, Alexandro 1820—1873)——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 1859—1866年为多瑙河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1862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君主(统治者), 号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 由于反动派的阴谋, 他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第505页。
- 库恩, 弗兰茨, 库南菲尔德男爵 (Kuhn, Franz, Fleihner von Kuhnfeld 1817—1896)——奥地利军官, 从1866年起为

- 将军, 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任总参谋长, 后来指挥一个旅, 1868—1874 年任陆军大臣。——第 372 页。
- 库斯托第, 彼得罗 (Custodi Pietro 1771—1842) ——意大利经济学家, 由于出版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作而著名。——第 22、28、47、62、100、114、141 页。
- 库克基亚里, 多美尼科 (Cucchiari, Domenico) ——意大利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皮蒙特师。——第 415、416 页。
- 班迪亚, 亚诺什 (Bangya, Janos 1817—1868) ——匈牙利记者和军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 同时也是秘密警探; 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对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奸细在高加索进行活动 (1855—1858)。——第 560 页。
- 茹贝尔, 巴特米·卡特林 (Joubert, Barthémy Catherine 1769—1799) ——法国将军, 曾参加 1196—1799 年波拿巴对意大利的远征, 1798—1799 年任意大利法军总司令。——第 259 页。
- 配第, 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1687) ——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第 24、41—44、54、114、119 页。
- 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 (Colombo, Christopher 1451—1506) ——发现美洲的杰出的航海家, 原籍热那亚。——第 148 页。
- 哥特谢德, 约翰·克利斯托夫 (Gottsched, 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 ——德国作家和批评家, 十八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第 158 页。
-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1854—1856), 外交大臣 (1856—1882)。——第 513、521、635、671、676—679 页。
- 埃梅特, 安东尼 (Emmett, Anthony 1790—1872) ——英国军事工程师, 从 1855 年起为将军, 曾任圣海伦岛工程长官 (1815—1821)。——第 269 页。
- 埃查古埃·拉斐 (Echagüe, Raphaël 1815—1887) ——西班牙将军, 曾参加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 属温和派;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609、610、617、618 页。
- 埃伦伯勒伯爵, 爱德华·罗 (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印度总督 (1842—1844), 1846 年为海军首席大臣,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8)。——第 237、333、584 页。
- 埃斯潘纳斯, 沙尔·玛丽·埃斯普亚 (Espinasse, Charles Marie Esprit 1815—1859) ——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429 页。
- 桑纳兹——见杰尔贝·德·桑纳兹, 毛利

- 齐奥。
- 乌尔班, 卡尔 (Urban, Karl 1802—1877) —— 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 第 403、404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 (Urquhart, David 1805—1877) —— 英国外交家, 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1847—1852 年为议会议员。—— 第 65、561 页。
- 乌斯塔里斯, 海罗尼莫 (Ustáris, Jerónimo) —— 十八世纪前半叶的西班牙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者。—— 第 44 页。
- 乌泽多姆, 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格维多 (Usedom, Karl Georg Ludwig Guido 1805—1884) —— 普鲁士外交家, 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全权代表 (1848) 和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全权代表 (1858—1859)。—— 第 395 页。
- 泰列基, 拉斯洛 (Teleki, László 1811—1861) —— 伯爵,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为匈牙利共和国驻法国代表, 革命失败后仍留在法国, 匈牙利议会议员。—— 第 567 页。
- 泰列基, 山道尔 (亚历山大) (Teleki, Sándor (Alexander) 生于 1818 年) —— 伯爵, 匈牙利军官,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第 564、567 页。
- 爱德华三世 (Edward III 1312—1377) —— 英国国王 (1327—1377)。—— 第 65 页。
- 朗兹, 威廉 (Lowndes William 1652—1742) —— 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财政部秘书长。—— 第 67、68、72、110 页。
- 朗敏, 威廉 (Ramming, Wilhelm 1815—1876) —— 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 1866 年曾参加奥普战争。—— 第 429 页。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传记材料)。—— 第 7—11、532—534、560、568、601、683 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 意大利革命家, 严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 1849 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 年为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在五十年代曾反对波拿巴法国对意大利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干涉。—— 第 406、407、476、561—563、567、594 页。
- 马森纳, 安得列 (Masséna, André 1756—1817) —— 法国将军, 从 1804 年起为元帅, 拿破仑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之一, 1814 年倒向波旁王朝方面。—— 第 271、665 页。
- 马丹普雷, 昂日·奥古斯特 (Martimprey Ange Auguste de 1809—1875) —— 法国将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 曾参加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 第 431 页。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 英国牧师,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 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的鼓吹者。—— 第 26、87、556 页。

-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 1874—1876)。——第335、336、340、341、477、582—584页。
-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475页。
-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1811—1864)——巴伐利亚国王(1848—1864)。——第336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182、192、213、218、230、234、255—259、262、264、267、269—272、276、277、280、286、288、295、296、304、306—308、312、313、317—319、365、378、382、397、398、419、432、434、439、441、442、482—484、487—490、492、503—507、566、652、653、663—665、671—674、678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179—201、206—208、212、214、249、288、296、297、300—303、305—309、311—314、316—320、322、323、335、339—342、344—346、350、354—358、361、362、365、371、379、382、392、394、398、399、404—407、409、410、413—418、421、423—428、433—441、444、446、448、450、452、458、460、462、466、467、469—479、481—484、486—494、497—507、511、519、522、523、541—545、548、560、562—566、572、592—596、607、608、625、635—637、640—643、646、657、662、669—673、675—677、679、685、693页。
-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 格雷,查理(Grey, Charles 1764—1845)——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30—1834)。——第606页。
- 格雷,约翰(Gray, 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创始人之一。——第73—76页。
- 格林,雅科布(Grimm, Jakob 1785—1863)——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德国民间创作的收集者,柏林大学教授。——第145页。
- 格律奈,卡尔·路德维希(Grüne, Karl Ludwig 1808—1884)——伯爵,奥地利将军,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将军衔侍卫长(1850—1859)。——第450、453、478页。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后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第54、571页。
- 格兰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

- 1880)——法国记者,毫无原则的政治家,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代表(1852—1870),持极右立场;“立宪主义者报”的撰稿人。——第544页。
- 格伦维耳,理查,白金汉和契安多斯公爵(Grenville Richard Duke of Buckingham and Chandos 1797—1861)——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18—1839)。——第235、238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249、251、464页。
- 海斯,亨利希(He, Heinrich 1788—1870)——男爵,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年任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奥军总司令,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在马振塔会战(1859年6—7月)失败后统率奥军。——第216、369、372、379、425、442、450、460、461、478、480、481、484、485、488、491—493、639页。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死于1860年)——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1849年革命,后来流亡英国。——第683页。
- 海瑙,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kob 1786—1853)——奥地利将军,曾残酷镇压1848—1849年的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运动,由于残酷他得到了一个绰号“疯狂的鬣狗”。——第185页。
- 海尔曼——见阿尔米纽斯。
- 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eliogabalus或Elagabalus 204—222)——罗马皇帝(218—222),这个名字成了挥霍、独裁和淫乱的象征。——第564页。
- 海尔布隆纳尔,卡尔(Hailbronner, Karl 1789—1864)——巴伐利亚军事作家和旅行家,奥地利统治集团的侵略意图的表达者之一。——第250、278、280、288页。
- 俾斯麦公爵,奥托,冯·申豪森(Bismarck, Otto, von Schönhause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1851—1859年是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1),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他用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他是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曾制定镇压社会主义者的特别法。——第313、521页。

十一画

- 荷马(Homerus)——半传说中的古希腊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158页。
-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后来是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第309、325、328、343、355、477、513、543、566、572、573、575、584页。
- 梯图斯(Titus)——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律师,主张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一德国,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548页。
- 梯尔泰(Tyrtaios 公元前7—6世纪)——古希腊诗人,曾歌颂斯巴达人的军事功

- 绩。——第 692 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内政大臣(1832—1834),总理(1836—1840),共和国总统(1871—1873),绞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197 页。
- 莫拉尔(Mollard)——皮蒙特将军,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458 页。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les Auguste 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立法团主席(1854—1856, 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第 189、198 页。
- 莫罗,让·维克多(Moreau, Jean Victor 1763—1813)——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第 271 页。
- 盖亚尔德,弗雷德里克(Gaillardet, Frederick 1808—1862)——法国记者和剧作家,1839—1848 年在美国发行“美国信使报”;1848 年回到法国,仍为该报的经常通讯员。——第 200 页。
- 培尔西尼,让·日尔贝尔·维克多(Perigny, Jean-Gilbert Victor 1808—1872)——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政大臣(1852—1854, 1860—1863),驻英国大使(1855—1858, 1859—1860)。——第 198 页。
- 许布纳尔,亚历山大(Hübner, Alexander 1811—1892)——奥地利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1849—1859 年任驻巴黎大使。——第 179、186、300、318 页。
- 基什,米克洛什(Kiss, Miklos 生于 1820 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者,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 564、567 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掌握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了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8、237 页。
-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的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之一,后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9—1865 和 1865—1866)。——第 571、572、580 页。
- 措贝尔,托马斯·弗里德里希(Zobel, Thomas Friedrich 1799—1869)——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 386、427、454、479 页。
- 雷诺,比埃尔·伊波利特(Renault, Pierre Hippolyte 1807—1870)——法国将军,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321、429、431、455 页。
- 勒库尔布,克劳德·雅克(Lecourbe, Claude Jacques 1759—1815)——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

- 征。——第 257、654 页。
-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686 页。
- 梅拉斯, 米哈埃尔·弗里德里希·贝奈狄克特 (Melas, Michael-Friedrich-Benedikt 1729—1806) ——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七年战争 (1756—1763), 1799—1800 年任意大利奥军总司令。——第 220 页。
- 梅德尼扬斯基, 山道尔 (Mednyánszky, Sándor 生于 1816 年) ——匈牙利军官, 曾参加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567 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131、303、508、515、522、584 页。
-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人物; 曾任内政大臣 (1848—1850), 首相和外交大臣 (1850—1858)。——第 313、599 页。
- 雪恩海斯, 卡尔 (Schönhals, Karl 1788—1857) ——奥地利将军和军事作家;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第 216 页。
- 雪恩奈希, 克利斯托夫·奥托 (Schönaich, Christoph Otto 1725—1807) ——德国诗人, 叙事诗“海尔曼”的作者。——第 158 页。
-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 ——杰出的德国哲学家,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第 530 页。
- 康罗贝尔, 弗朗斯瓦·塞尔坦 (Carrobert, François Certain 1809—1895)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任法军总司令 (1854 年 9 月—1855 年 5 月);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 350、381、413、415、416、420、424、427—431、434、455、458、459 页。
- 康斯坦丁, 尼古拉也维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 ——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之次子, 海军元帅, 领导海军系统 (1853—1881) 和舰队 (1855—1881), 1858—1861 年作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员参加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准备和实行; 波兰王国总督 (1862—1863)。——第 672 页。
- 康斯坦西奥,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 (Constandio, Francisco Solano 1772—1846) ——葡萄牙医生, 外交家和作家; 曾把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文。——第 51 页。

十二画

- 莱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 ——伟大的德国作家, 批评家和哲学家, 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157 页。
- 莱泽, 古斯塔夫·阿尔芒·昂利 (Reiset, Gustav Armand Henri 1821—1905) ——法国外交家; 1859 年任驻达姆斯塔特大使时曾负特殊使命去见维克多·艾

- 曼努尔二世, 以便签订苏黎世和约。——第 544 页。
- 莱沙赫, 济格蒙德 (Reischach, Sigmund 1809—1878) ——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427—430 页。
- 莱希堡, 约翰·伯恩哈特 (Rechberg, Johann Bernhard 1806—1899) ——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保守主义者, 曾任首相 (1859—1860), 外交大臣 (1859—1864)。——第 361、513—518 页。
- 凯, 约翰·威廉 (Kaye, John William 1814—1876) ——英国军事史学家和殖民官吏, 曾任印度事务部政务机密司秘书 (1858—1874), “阿富汗战争史”一书的作者。——第 575 页。
- 凯撒 (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约 100—44) ——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188 页。
- 凯勒曼, 弗朗斯瓦·克利斯托夫 (Kellerman, François Christophe 1735—1820) ——法国将军, 从 1804 年起为元帅,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后为正统主义者。——第 650 页。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25、42、44、47—50、59、63、103、116、136、157—159、534 页。
- 斯宾斯, 威廉 (Spence, William 1783—1860) ——英国昆虫学家, 同时也研究经济问题。——第 87 页。
- 史密斯, 托马斯 (Smith, Thomas 1513—1577) ——英国国家活动家, 民法教授。——第 134 页。
- 斯坦利, 爱德华·亨利, 得比伯爵 (1869 年受封) (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六十至七十年代为保守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殖民大臣 (1858、1882—1885) 和印度事务大臣 (1858—1859), 外交大臣 (1866—1868、1874—1878), 爱德华·得比的儿子。——第 325、326 页。
- 斯图亚特, 詹姆斯 (Steuart, James 1712—178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 47、48、68—71、152、155—158、175 页。
- 斯图亚特, 达德利·库茨勋爵 (Stuart, Dudley Courts 1803—1854) ——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与波兰保守派君主主义流亡集团有过联系。——第 561 页。
- 斯巴克斯, 杰雷德 (Sparks, Jared 1789—1866) ——美国历史学家, 在哈佛大学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历史教研室。——第 45、46 页。
- 斯宾诺莎, 巴鲁赫 (别涅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第 157 页。
- 斯特拉本 (Strabon 公元前约 63—公元约 20) ——古希腊最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146 页。
- 汤普逊, 威廉 (Thompson, William 约 1785—1833) ——爱尔兰经济学家, 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 欧文的信徒。——第 76 页。

- 菲力浦二世 (Felipe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 (1558—1598)。——第 119 页。
- 菲兰杰里, 卡洛, 萨特里安诺公爵 (Filangieri, Carlo, Fürst von Satriano 1784—1867)——那不勒斯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曾多次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 1848—1849 年残酷镇压西西里岛的起义, 并担任该地总督直至 1855 年, 曾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1859—1860)。——第 336 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主张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 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进步党的首领之一, 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 548 页。
- 贺布, 詹姆斯 (Hope, James 1808—1882)——英国海军上将, 1859—1860 年曾率领远征舰队侵略中国。——第 568、569、577 页。
- 贺雷西 (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Horatius, Quintus Flaccus 公元前 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123 页。
- 费舍 (Vischer)——德国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创建民族联盟党。——第 463 页。
-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cob 1805—1871)——德国激进政论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在 1848—1849 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 462、463、505 页。
- 费里埃, 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Férier, François Louis Auguste 1777—1861)——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 家, 国家官吏, 重商主义的模仿者。——第 525 页。
- 费特尔·冯·多根菲尔德, 安东 (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on 1803—1882)——匈牙利将军, 1848—1849 年是科苏特的战友,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567 页。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529、530 页。
- 费希泰提奇 (Festetics)——奥地利将军, 原籍匈牙利,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386 页。
- 普基, 米克洛什 (Puky, Miklós 1806—1887)——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在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时期为匈牙利议会议员和革命政府委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1867 的大赦后返回匈牙利。——第 567 页。
-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 (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伟大的俄国诗人。——第 167 页。
- 普鲁斯, 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 (Bruce, Frederick William Adolf 1814—1867)——英国殖民官和外交家, 驻中国公使 (1858—1865)。——第 568—570、573、581、583 页。
- 普林尼 (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Pliny (Caius Pliny Secundus) 公元 23—79)——罗马博物学家, “博物志” (共 37 卷) 的作者。——第 122 页。
- 普里姆-伊-普腊斯, 璜 (Prim y Prats, Juan

- 1814—1870)——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党的领袖之一,曾参加1834—1843年和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个师,后来指挥一个军。——第610、617、618、621页。
- 普尔斯基,弗兰齐舍克(Pulszy 1814—1897)——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原籍波兰,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大赦后返回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第567页。
- 普罗佩尔提乌斯,塞克斯都(Propertius, Sextus 公元前约49—约15)——罗马抒情诗人。——第16页。
- 博宁,爱德华(Bonin, Eduard 1793—1865)——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陆军大臣(1852—1854、1858—1859)。——第508页。
- 博麦尔——见拉博麦尔,朗朗·安格里维埃尔·德。
- 博阿尔奈,欧仁(Beauharnais, Eugène 1781—1824)——亲王,法国将军,拿破仑第一的继子,曾多次参加拿破仑远征(包括1812年对俄国的远征在内);1805—1814年为意大利总督。——第256页。
- 博阿尔奈,奥当斯(Beauharnais, Hortence 1783—1837)——拿破仑第三的母亲,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妻子。——第504页。
- 博赞克特,詹姆斯(Bosanquet, James 1804—1877)——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还发表过一系列有关圣经年表著作。——第88页。
- 博赞克特,查理(Bosanquet, Charles 1769—1850)——英国企业主和经济学家,在货币流通问题上曾同李嘉图进行论战。——第160、164页。
-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 John 1780—184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过一些有关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176页。
-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北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科学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第45、46、108、154页。
- 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Ferdinand Maximilian 1832—1867)——奥地利大公,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总督(1857—1859),墨西哥皇帝,号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864—1867)。——第179、185页。
-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由于1848年炮轰墨西拿获得了炮弹国王的绰号。——第183、185、336页。
- 斐迪南四世——见罗伦纳,斐迪南多。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制定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第8、525、529—532页。
- 黑森亲王——见亚历山大,黑森亲王。

十三画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 Ale

- xander)——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第 240—242 页。
- 瑟美列, 贝尔塔兰 (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曾任内务部长 (1848) 和革命政府首脑 (1849);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567 页。
- 杨格, 阿瑟 (Young, Arthur 1741—1820)——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 157 页。
- 路德, 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卓越的宗教改革活动家, 德国新教 (路德教) 的创始人, 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 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 120、131、136 页。
- 路易·菲利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204、309、503、504、506 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斯, 乔治·康瓦尔 (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财政部秘书长 (1850—1852), 从 1852 年到 1855 年为“爱丁堡评论”杂志的出版者和编辑, 曾任财政大臣 (1855—1858), 内政大臣 (1859—1861) 和陆军大臣 (1861—1863)。——第 333 页。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44 页。
-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 (1715—1774)。——第 192 页。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瓦松, 路易·昂利 (Laison, Louis Henri 1771—1816)——法国将军, 曾多次参
- 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第 257 页。
- 路德维希, 亚诺什 (Ludvigh, Janos 1812—1870)——匈牙利记者和政治活动家, 曾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567 页。
- 路德维希一世 (Ludwig I 1786—1868)——巴伐利亚国王 (1825—1848)。——第 438 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 (Rothschild)——金融世家, 在欧洲各国拥有许多银行。——第 318、335、377 页。
- 塞西耳, 威廉, 柏里勋爵 (Cecil, William, Lord Bugnley 1520—1598)——英国国家活动家, 首席大臣 (1558—1598)。——第 134 页。
- 塞律里埃, 让·马蒂约·菲利贝尔 (Séurier, Jean-Mathieu-Philibert 1742—1819)——法国将军, 从 1804 年起为元帅,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第 665 页。
- 詹诺韦西, 安东尼奥 (Genovesi, Antonio 1712—1769)——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者。——第 37、114 页。
- 奥当斯——见博阿尔奈, 奥当斯。
- 奥热罗, 比埃尔·弗朗斯瓦·沙尔 (Auge-reau, Pierre François Charles 1757—1816)——法国将军, 从 1804 年起为元帅,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第 665 页。
- 奥朗则布 (1618—1707)——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 谡沙赫 (1658—1707)。——第 120 页。

- 奥普戴克, 乔治 (Opdyke, George 1805—1880) —— 美国企业主,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88 页。
- 奥尔格斯, 海尔曼 (Orges, Hermann 1821—1874) —— 德国记者, 从 1854 年到 1864 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之一。——第 635、640 页。
- 奥尔西尼, 费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 ——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 190、195、307、310、435、436、506 页。
- 奥当奈尔, 列奥波多, 吕森纳伯爵 (O'Donnell, Leopoldo, 1809—1867) —— 西班牙将军和反动政治活动家, 温和派的领袖之一; 1854 年利用了国内革命危机来建立军事专政; 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领导了对资产阶级革命 (1854—1856) 的镇压; 反动政府首脑 (1856—1857、1858—1863、1865—1866),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间任西班牙远征军总司令。——第 609、610、613—618、620、627—632 页。
- 奥尔洛夫,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 —— 公爵, 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外交家; 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 (1856)。——第 505 页。
- 奥维尔斯顿——见劳埃德, 赛米尔·琼斯, 奥维尔斯顿男爵。
- 奥克兰伯爵, 乔治·伊登 (Auckland, George Eden 1784—1849)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历任大臣职务, 印度总督 (1836—1842)。——第 575 页。
- 奥尔良王朝 (Orléans) —— 法国王朝 (1830—1848)。——第 608 页。
- 奥尔斯瓦特, 鲁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 ——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贵族的代表, 曾任首相和外交大臣 (1848 年 6—9 月), 不管大臣 (1858—1862)。——第 508 页。
- 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 尼德兰总督 (1674—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67、72 页。
- 福雷, 埃利·弗雷德里克 (Forey, Elie Frédéric 1804—1872) —— 法国将军, 后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1854—1855 年统率在克里木的法军;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第 383、387、389、390、399—402 页。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属左派,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本小册子 (1860) 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走狗。——第 362、435、436、439、530、657、686 页。
- 福尔邦奈, 弗朗斯瓦·维隆·杜韦尔·德 (Forbonnais, François-Véron Duvergier de 1722—1800) ——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财政家,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 154 页。
- 蒙塔朗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天主教党的首领, 在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期

- 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就转为反对派。——第506页。
- 蒙蒂霍,欧仁妮(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195、506页。
- 蒙塔纳里,杰明扬诺(Montanari Gemignano 约1633—1687)——意大利科学家,数学和天文学教授;著有许多关于货币的著作。——第28、143页。
- #### 十四画
- 歌德,约翰·沃尔夫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463、510页。
- 赫德,弗兰西斯(Head, Francis 1793—1875)——从男爵,英国殖民官,旅行家和作家。——第302—304页。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始祖之一。——第10、45、52、74、76、506页。
-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国自由派政论家,柏林“国民报”编辑(1848—1875),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508、548页。
- 豪格维茨,克里斯提安·奥古斯特·亨利希·库尔特(Haugwitz, Christian Heinrich Kurt 1752—1832)——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外交大臣(1792—1804、1805—1806)。——第313页。
- 维利(Very)——侯爵,撒丁外交家。——第437页。
- 维里,彼得罗(Verri, Pietro 1728—1797)——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派学说的最早批评者之一。——第141页。
- 维利森,威廉(Wilisen, Wilhelm 1790—187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1850年指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对丹麦作战;著有许多军事史著作。——第250、274、278、288、371页。
- 维利森,弗里德里希·阿道夫(Wilisen, Friedrich Adolf 1798—1864)——普鲁士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62—1864年任普鲁士驻意大利大使。——第371、512—514、516、517、520页。
- 维努亚,约瑟夫(Vinoy, Joseph 1800—1880)——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绞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第390、399、402、429—431页。
- 维勒什,山道尔(Veress, Sándor 1828—1884)——匈牙利历史学家和记者,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567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179、182、183、185、187、193、196—199、298、300、382、402、404、413—415、467、469、473、474、476、508、542—545、594、622、642、667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240、317、319、547页。
- 维茨拉尔,古斯塔夫(Wetzlar, Gustav 1813—1881)——奥地利将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旅。——第

429 页。

维特凯维奇, 伊万·维克多罗维奇 (Виткевич, Иван Викторович 死于 1839 年) —— 俄国军官, 驻阿富汗外交代表 (1837—1838)。—— 第 575 页。

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Wittelsbächer) —— 巴伐利亚公爵 (1180—1806), 后为国王 (1806—1918) 的王朝。—— 第 395 页。

十五画

黎尔, 威廉·亨利希 (Riehl, Wilhelm Heinrich 1823—1897) —— 德国反动文学史家和政论家。—— 第 525 页。

黎塞留公爵, 阿尔芒·让·杜·普勒西 (Richelieu, Armand Jean du Plessis 1585—1642) —— 法国专制主义时期最大的国家活动家, 红衣主教。—— 第 592 页。

蔡斯 (Zais) ——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医生, 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 曾参加创建民族联盟党。—— 第 462—464 页。

德尔, 欧仁 (Daire, Eugène 1798—1847) —— 法国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 第 44、86 页。

德索尔, 让·约瑟夫·保尔·奥古斯丹 (Dessolle, Jean Joseph Paul Augustin 1767—1828) —— 法国将军, 曾多次参加拿破仑战争, 后为正统主义者。—— 第 257 页。

赖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 “改革报”编辑;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 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

党;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 流亡英国。—— 第 561 页。

摩莱肖特, 雅科布 (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 —— 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生于荷兰; 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 第 530 页。

十六画

穆莱·阿巴斯 (Muley-Abbas 死于 1885 年) —— 摩洛哥亲王,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摩洛哥军队总司令。—— 第 613 页。

穆勒, 詹姆斯 (Mill, James 1773—1836)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 第 87、170—172 页。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模仿者。—— 第 87 页。

诺曼, 乔治·华德 (Norman, George Warde 1793—1882)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著有关于货币流通和赋税的著作, “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 英格兰银行经理。—— 第 174 页。

泽巴赫, 阿尔宾·列奥 (Seebach 1811—1884) —— 男爵, 萨克森外交家, 五十年代为驻巴黎公使。—— 第 180、505 页。

霍纳, 莱昂纳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 —— 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工厂视察员 (1833—1856), 他保护了工人的利益。—— 第 222—225 页。

霍尔·麦克斯威尔 —— 见麦克斯威尔, 约翰·霍尔。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

- 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明显的反民主的倾向。——第43页。
-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捍卫无阶级的利益;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第40页。
- 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1415—1701)、普鲁士国王(1701—1918)和德国皇帝(1871—1918)的王朝。——第313、361、395、438、476页。
- 霍亨施陶芬王朝(Hohenstaufen)——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朝(1138—1254)。——第261页。
- 霍韦利亚诺斯-伊-腊米雷斯,加斯帕尔(Jovellanos y Ramirez, Gaspar 1744—1811)——西班牙国家活动家,作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信徒,持重商主义观点。——第44页。
- ## 十七画
- 缪拉特,拿破仑·律西安·沙尔(Murat, Napoléon Lucien Charles 1803—1878)——亲王,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政治活动家;拿破仑第三的堂兄弟。——第181页。
- ## 十八画
-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金喀尔田伯爵(Elgin, James Bruce, Earl of Kincardine, Earl of 1811—1863)——英国外交家,在1857—1858年和1860—1861年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印度总督(1862—1863)。——第570、571、581—584、601、602、604页。
-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的“服务”论。——第26、51、87、107、158页。
- 萨博,伊姆雷(埃梅里克)(Szabó, Imre (Emerich) 1820—1865)——匈牙利军官,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曾任陆军部长(1848),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曾参加1859年奥意法战争。——第567页。
- 萨博,伊什特万(埃蒂耶纳)(Szabó, István (Etienne) 1825—1862)——匈牙利军官,曾参加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567页。
- 萨瓦王朝——意大利王朝之一,1720年至1861年统治撒丁王国,1861年至1946年统治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第474、543页。
- 萨巴拉-伊-德·拉·普恩特,璜(Zabalay de la Puente, Juan 1804—1879)——西班牙将军,属温和派,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在1859—1860年的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指挥一个军。——第610、617页。
- 萨尔达尼拔——见亚述巴尼拔。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 画

巴力——圣经中的天神、太阳神和丰产之神；公元前两千至一千年间在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普遍祭祀巴力；巴力的崇拜者被基督教传统斥责为追逐暴利和沾染恶习的人。——第 186 页。

五 画

史纳格——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细木工。——第 522 页。

史赖，克里斯多弗——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记”中的人物，补锅匠。——第 515 页。

圣彼得——使徒。——第 509 页。

加西莫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名字已成了丑陋的化身。——第 309、441、448、506、563 页。

六 画

亚伦——根据圣经传说，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古犹太人的最高司祭；亚伦在西奈山建立了供奉的金犊。——第 317 页。

米特勒——歌德的长篇小说“亲和力”中的人物；米特勒（意译为调停人）作为一个僧侣，经常调解在他的教区中发生的纠纷。——第 510 页。

伊菲姬尼亚——古希腊神话中国王亚加米农的女儿，特洛伊之战前被亚加米农当作了祭品。——第 635 页。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西修斯（公元前四世纪）的宠信。“达摩克利斯剑”一词是经常的、迫近的和可怕的危险的同义语；根据传说，达摩克利斯应迪奥尼西修斯之约赴宴，席间迪奥尼西修斯想使羡慕他的达摩克利斯相信人的安乐是不长久的，就把达摩克利斯安置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把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第 190 页。

西得·康佩亚多尔——中世纪的“我的西得之歌”（用西班牙语写成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约 1140 年）“西得轶事”和许多抒情诗歌中的主人公；西班牙民间传说中这位受人爱戴的英雄成了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西得”的题材。——第 610 页。

七 画

麦克佩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人物，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虚荣目的，不惜犯血腥罪行。——第 319 页。

八 画

奈斯托尔——根据希腊神话，奈斯托尔是参加特洛伊之战的希腊英雄中最老最贤明的英雄；在文学传统中，他经常被当作饱经世故的聪明的长者的典型。——第 43 页。

彼得·施莱米尔——德国浪漫派诗人夏米索的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第 105 页。

九 画

耶和华——古犹太教的主神。——第 509 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代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303、325、326、333、338、506 页。

威廉·退尔——关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中描写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席勒在他的同名剧作中采用了威廉·退尔的形象。——第 506 页。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第 569 页。

十 画

息息法斯——希腊神话中科林斯之王，由于欺骗诸神，被罚永远向山上推石头，石头推上山后又立即滚下来。由此就产生了“息息法斯式的劳动”一词，指沉重而又无成果的劳动。——第 305 页。

十一 画

教堂司事——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第 584 页。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的创始人。——第 316、509 页。

十二 画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第 584、586 页。

提修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第 522 页。

莱散特——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第 522 页。

十三 画

奥菲士——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奥菲士的歌唱能驯服野兽，甚至使石头着迷。——第 373 页。

雅努斯——古罗马的神，有前后两副面孔；雅努斯的转义就是口是心非的人。——第 577 页。

十四 画

玛门——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在基督教经文中，玛门是恶魔，是好利贪财的化身。——第 222 页。

玛尔斯——古代罗马人的战神。——第 198 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第四”）中的人物，一个爱吹牛的胆小鬼、打诨者和酒鬼。——第 428、508 页。

十五 画

摩西——根据圣经传说，摩西是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见“出埃及记”）。——第 25 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 44 页。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人民报”(《Das Volk》)——伦敦出版。
——第 400、421、434、438、443、451、
457、461、465、490、499、523、526、535、
548、683、695 页。

四 画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鲁塞尔出版。——第
189、198、494 页。

五 画

-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
——巴黎出版。——第 197、200—205、
323、353 页。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
——维也纳出版。——第 636 页。

六 画

-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伦敦
出版。——第 561 页。

七 画

-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伦敦
出版。——第 569、581 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
出版。——第 417 页。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

——巴黎出版。——第 460 页。

八 画

- “京报”(《Peking Gazette》)——第 569 页。
“画报”(《L'Illustration》)——巴黎出版。
——第 486、487 页。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
出版。——第 437 页。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
——第 437 页。
“法国中部报”(《France Centrale》)——第
195 页。

九 画

- “美国信使报”(《Courier des Etats-
Unis》)——纽约出版。——第 200 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
格斯堡出版。——第 8、250、280、314、
384、388、635、636、640 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巴黎出版。——第 186、300、309、
312、339、343、344、353、361、492、498、
500、572、580 页。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
tung》)——达姆斯塔德出版。——第
639 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362 页。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

伦敦出版。——第 407、563、567 页。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
——第 342、498 页。

十 画

“海耳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
——伦敦出版。——第 684—689、692
页。

“旁观者”(《The Spectator》)——伦敦出
版。——第 42、150 页。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
第 239 页。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
don News》)——第 487 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10、184、188、194、
199、206、212、220、228、234、239、245、
301、304、306、310、315、319、324、333、
337、342、346、351、355、358、363、370、
377、382、388、391、396、405、412、417、
426、434、444、447、456、468、471、476、
495、502、540、545、554、557、559、560、
563、567、585、591、595、600、605、608、
615、621、626、632 页。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
——第 189、239、301—304、353、384、
388、406、452、498、539、569、572、573、
577、578、584、631、638、639、657 页。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
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莱比
锡。柏林出版。——第 688、694 页。

十一 画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伦敦
出版。——第 571 页。

十二 画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
ischer Staats Anzeiger》)——柏林出
版。——第 513 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
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
werbe》)——科伦出版。——第 7、8 页。

十三 画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版。
——第 198 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 ische Zeitung》)
——柏林出版。——第 313 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
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科伦出版。——第 10 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
出版。——第 96、578—580 页。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
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
——第 376、541 页。

十四 画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十五 画

“论坛报”——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
bücher》)——巴黎出版。——第 8、9 页。

十八 画

“萨克森立宪报”(《Sächsische Konstitu-
tionelle Zeitung》)——德勒斯顿出版。
——第 548 页。

地名索引*

三 画

士伦——第 193、231、232、334、664 页。

士尔比哥——第 418、427、428、433、639 页。

大沽——第 569、573 页。

大西洋——第 195、389、413 页。

大圣伯纳德山口——第 210、256、258、260、625、649、650—653 页。

小圣伯纳德山口——第 256、260、648、650—654、658、663、667 页。

上海——第 569、580、585 页。

广州——第 569、570、578、584、585、602 页。

士瓦本——第 261、262 页。

凡尔登——第 283 页。

四 画

切瓦——第 663 页。

切尔沃河——第 660 页。

切列扎拉——第 442、445 页。

切韦达列山口——第 257 页。

巴门——第 243 页。

巴登——第 211、446、598 页。

巴黎——第 8、71、125、143、179、180、185
——187、190、200、206、282、283、286、

287、289、291、292、306、309、316、323、349、350、354、361、380、434、447、470、477、482、505、506、519、542、544、545、547、548、564、567、593、643、644、648、654、668、676、693 页。

巴塞尔——第 212、282、286、287、313、446、625、637、647、648、655、657、659 页。

巴萨诺——第 219、254、268 页。

巴伐利亚——第 210、211、255、256、261、262、269、270、272、274—277、289、345、395、404、510 页。

巴尔德堡垒——第 258 页。

巴尔塞洛内特——第 648 页。

文洛——第 285、287、289 页。

文森——第 185 页。

文察利奥——第 402、413、479 页。

丹第——第 227 页。

丹吉尔——第 618、614、621、632 页。

日内瓦——第 231、254、623、625、645、655—658 页。

日内瓦湖——第 656、658、659 页。

比尔湖——第 656 页。

比利时——第 283—285、289、290、292 页。

比耶拉——第 231、479 页。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比凯堡——第 523 页。
 比尔格伦——第 656 页。
 比纳斯科——第 428、439、440、481、482 页。
 比利牛斯山脉——第 293、662 页。
 厄比纳尔——第 287 页。
 厄特鲁里亚——第 642 页。
 什普留根山口——第 255、257—260、404 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 293、312、371、548、599、673、678 页。
 牛津——第 134 页。
 天津——第 568、570、573 页。
 云纳河——第 286 页。
 戈伊托——第 266、442、445、454、455、460 页。
 太晤士河——第 547、570 页。
 牙买加岛——第 148 页。
 韦尔切利——第 230、231、366—369、379、384—387、402、413、415—417、419、420、422、423、433、479、639 页。
 尤列尔山口——第 257、258 页。

五 画

瓦卡里察——第 389、399、405 页。
 瓦拉几亚——第 300、309、314、336、505 页。
 瓦格拉姆——第 212 页。
 瓦朗西恩——第 294 页。
 瓦哈德-埃耳-杰鲁河——非洲的一条河流。——第 627、629 页。
 瓦尔河——第 220、254、660、664 页。
 瓦兰察——第 366、367、379、381、382、385、398、415、416、419、420、422—424 页。
 瓦列卓——第 454、458、459 页。
 瓦瑟河——第 283、286、287、292 页。

瓦尔山口——第 232 页。
 瓦尔德锡——第 662 页。
 瓦尔特林纳——第 254、257、258、403 页。
 瓦得(窝州)——瑞士的一个州。——第 625、656—659 页。
 瓦里斯(瓦勒)——瑞士的一个州。——第 280、625、654、656—659 页。
 瓦伦西亚——第 662 页。
 北区——第 222 页。
 北京——第 568、570、571、573、574、584 页。
 北海——第 285、507、599 页。
 北布拉班特——第 289 页。
 汉堡——第 88、312、328、377 页。
 汉鲍洛——第 386 页。
 汉诺威——第 336、345、395、438、548 页。
 兰涅克——第 655 页。
 兰格尔高原——第 668 页。
 兰列布尔——第 651—653 页。
 兰德列西——第 284 页。
 卢比康河——第 196、198、253 页。
 卢瓦尔河——第 282、292 页。
 卢艾亚河——第 661 页。
 卢齐延什泰格——第 259 页。
 卢克曼尼尔山口——第 257 页。
 田达——见田达山口。
 田达山口——第 231、232、277、350、624、648、661—666 页。
 布伦——第 196、198、286、418 页。
 布隆(布尔诺)——第 377 页。
 布利达——第 632 页。
 布拉格——第 377 页。
 布鲁治——第 286 页。
 布柯维纳——第 293 页。
 布隆采耳——第 280、299、312、464、507、596 页。
 布里昂察——第 479 页。

- 布里昂松——法国的城市和要塞。——第 231、232、647、651 页。
- 布里西亚——第 185、404、460 页。
- 布劳利奥——第 258 页。
- 布兰塔河——第 213、219、254、261、263、267、272 页。
- 布鲁塞尔——第 8、10、506 页。
- 布鲁阿河——第 656 页。
- 布鲁内克(布鲁尼科)——第 254 页。
-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377、394 页。
- 布莱得弗德——第 591 页。
- 布伦尼奥谷地——第 257 页。
- 布尔克-圣莫里斯——第 653 页。
- 卡尔斯——第 505 页。
- 卡萨勒——第 185、230、231、264、348、349、366、368、369、379、381、382、385、398、415、479、489、638、652、667 页。
- 卡利希——第 438 页。
- 卡多烈——第 254 页。
- 卡利阿诺——第 268 页。
- 卡马斯科——第 479 页。
- 卡斯泰卓——第 390、399—402 页。
- 卡斯特尔——第 288 页。
- 卡斯特尔-霍夫勒多——第 441、442、445、449、453、454 页。
- 卡萨林诺——第 402 页。
- 卡塔卢尼亚——第 662 页。
- 卡斯特列托——第 428、481 页。
- 卡斯提奥涅——第 213、268、441、442、444、445、448、453—455、482—484、488、489、640 页。
- 卡斯特努沃——第 387 页。
- 卡尔卡勒——第 663 页。
- 卡莫尼卡谷地——第 259 页。
- 卡维尔诺谷地——第 660 页。
- 卡斯特内多洛——第 441 页。
- 卡博-涅格罗角——第 619 页。
- 卡夫里阿诺——第 441、442、444、445、454—456、485、638 页。
- 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城附近(古罗马)。——第 278 页。
- 卡尔弗利特山口(科巴里特,卡波列托)——第 254 页。
- 加来——第 287 页。
- 加维阿——第 257 页。
- 加塞尔——第 377、393 页。
- 加尔各答——第 326、327、574 页。
- 加尔达湖——第 214、215、265、273、404、441、444、453、459、483、484 页。
- 加列西奥——第 663 页。
- 加里西亚——第 288、293、314、374 页。
- 加拉希耳兹——第 227 页。
- 加拉斯科——第 383、387、417、419、422、480 页。
- 加斯梯里亚——第 616 页。
- 皮蒙特——第 178—184、188、193、194、209、213、229—234、255、260、264—266、273、274、279、280、313、344、345—350、365—368、373、378、384—388、398、455—458、474—480、486、489、492、543、545、566、594、623—625、641—648、661—667、670、672 页。
- 皮佐克——第 257 页。
- 皮腊诺——第 372 页。
- 皮阿琴察——要塞——第 260、274、335、349、366、379、386、389、390、399、419、420、422、425、440、542、544、638 页。
- 皮亚德纳——第 441、482 页。
- 皮亚韦河——第 254、263 页。
- 圣昆廷——第 287 页。
- 圣马丁——非洲的堡垒。——第 630、632 页。
- 圣马力诺——第 360、404 页。

- 圣马尔蒂诺——第 427、428、453、456 页。
 圣迪济埃——第 287 页。
 圣海伦岛——第 269、304、437、499 页。
 圣让哥尔弗——第 657、658 页。
 圣漂尔顿——第 372 页。
 圣让德莫里延——第 654 页。
 圣哥达山口——第 258、260、655 页。
 圣巴特耳米——第 653 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107、180、
 187、305、338、345、373、521、575、676
 页。
 圣卡西阿诺——第 441、444、454、455、485
 页。
 圣伯纳迪诺——见伯纳丁。
 圣巴尔科拉——第 372 页。
 东区——第 240 页。
 东印度——第 538、604 页。
 弗略留斯——第 285 页。
 弗列茹斯——港口。——第 647 页。
 弗里布尔——瑞士的一个州。——第 625、
 656、657 页。
 弗拉西涅托——第 379 页。
 弗利得利赫什达特——第 293 页。
 宁波——第 569 页。
 白河——第 568—570、573、582—584 页。
 尼斯——第 231、350、622—626、633、642、
 643、645、648、661—672、677 页。
 旧金山——第 636 页。
 边屯区——第 207、209、212、485、638 页。
 左洛图恩——第 657 页。
 匹威格顿——第 274 页。
 印度——第 65、124、130、298、325—328、
 330—333、352、538—540、571、575、
 580、585、602、613、629 页。
 567、672—674、676—678 页。
 亚琛——第 339 页。
 亚尔萨斯——第 251、295 页。
 亚平宁山脉——第 229、233、254、389、663
 页。
 亚平宁牛岛——第 253 页。
 亚得利亚海——第 185、214、254、256、
 263、372、541、641 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 230—233、264、273、
 274、348、349、366—369、380—382、
 387、398、415、489、625、638、652、663、
 664、666、667 页。
 多伊茨——第 288 页。
 多瑙河——第 251、262、269、317、323、
 673—675、678、679 页。
 多瑙河各公国——见瓦拉几亚和莫尔达
 维亚。
 多腊-巴尔特亚河——第 368、369、379—
 381、415、479、644 页。
 多腊-里帕里亚河——第 644 页。
 西区——第 222、238 页。
 西西里岛——第 337、360 页。
 西里西亚——第 376、394 页。
 西布罗姆威奇——第 238 页。
 西克斯-马敦山口——第 258 页。
 安讷河——第 283、286、292 页。
 安讷西——第 658 页。
 安特卫普——第 285—287、295 页。
 安察斯卡谷地——第 660 页。
 伊斯河——第 657 页。
 伊万城——第 678 页。
 伊符雷——第 256、368、652、653 页。
 伊韦尔登——第 656 页。
 伊扎尔河——德国的一条河流。——第
 274 页。
 伊泽奥湖——第 259 页。
 伊泽尔河——第 649—651、653、658 页。
 匈牙利——第 251、314、336、376、470、561—

六 画

伊宗察河——第 254、262、266—268、274、276、289 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 298 页。
 达尔萨谷地——第 267 页。
 达尔马威亚——第 314、372 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 505 页。
 达姆斯塔德——第 463 页。
 达尔仁特腊山口——第 648、664 页。
 托农——第 658 页。
 托斯卡纳——第 181、266、313、318、339、355、359、361、399、444、469、473、475、542、545、594、641 页。
 托尔托纳——第 233、366、379、387、415 页。
 托纳列山口——第 234、254—257、259 页。
 托勃拉赫山口——第 269 页。
 列维勒——第 265 页。
 列尼亚哥——第 214—216、218、233、265、267、442、492、494 页。
 列姆堡(里沃夫)——第 377 页。
 吉兹——第 284 页。
 吉涅斯特列洛——第 390、401 页。
 艾契河——见阿迪杰河。
 艾塞克斯——第 240 页。
 朱迪卡里耶——第 234、254、261 页。
 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第 489 页。
 华沙——第 280、299、312、507、672、673、678 页。
 华里斯——第 403、404 页。
 休达——第 609、610、613—621、627—630 页。
 色当——第 285 页。
 米兰——第 179、183、185、216、220、234、255、262、265、276、318、365、373、388、399、416、419—427、433、439、480、482、561、640、666 页。

地中海——第 180、183、214、350、617、619 页。
 圭迪佐洛——第 442、445、449、453—455、459 页。
 汝拉山脉——第 286、647、656 页。
 伏尔姆斯山口——见博尔米奥。

七 画

廷恩谷地——第 653 页。
 杜埃——第 287、289、294 页。
 杜塞尔多夫——第 487 页。
 利尼——比利时的一个要塞。——第 285 页。
 利尔——第 287、294 页。
 利伏诺——第 399 页。
 利物浦——第 383、572 页。
 利斯河——第 284 页。
 利斯谷地——第 660 页。
 沃尔塔——第 267、441、442、445、449、453、459 页。
 沃格拉——第 379、383、387、390、399、405、415、419、422、424 页。
 伯尔尼——第 371、656、658 页。
 伯桑松——第 652 页。
 伯尔尼汝拉山脉——第 625、656、657 页。
 伯纳丁(圣伯纳迪诺)——第 257、260 页。
 苏扎——第 367、651 页。
 苏格兰——第 42、48、64、104、221、226、244、562、563 页。
 苏黎世——第 541—543、545、592—594、658 页。
 苏瓦松——第 283、286、289 页。
 苏甘纳谷地——第 254、261、273 页。
 苏伊士运河——第 506 页。
 贝恩利——第 238 页。
 贝拉诺——第 257 页。
 贝卢诺——第 254 页。

- 贝尔加莫——第 185、404 页。
 贝尔贝莱——第 71 页。
 贝尔博河——第 230、264、666 页。
 贝斯塔齐亚——第 429 页。
 贝萨拉比亚——第 673 页。
 贝雷古阿尔多——第 386、419、421、422、425、428、480、481 页。
 贝耳焦伊奥索——第 387、439、441 页。
 贝尔加莫阿尔卑斯山脉——第 257 页。
 里昂——第 193、206、231、232、282、286、287、349、350、645、649、652、668 页。
 里姆——第 287 页。
 里沃利——第 213、267、268、273、488、489 页。
 里米尼——第 254、645 页。
 里沃利高原——第 267、273 页。
 佛利——第 641 页。
 佛西尼——第 622、646、657 页。
 佛罗伦萨——第 543 页。
 克尔——第 288 页。
 克伦地亚——第 254、261、275 页。
 克伦河——第 258 页。
 克里木——第 183、365、501 页。
 克拉科夫——第 335 页。
 克雷莫纳——第 185、260、273—274、440 页。
 克劳伊登——第 238 页。
 克里特岛——第 675 页。
 克拉根富特——第 262、269、273 页。
 克列申丁诺——第 231 页。
 克里木的赫尔松涅斯——第 502 页。
 麦茨——第 193、287、446 页。
 麦士河——第 283—285、287、289、294、668 页。
 那慕尔——第 285—287 页。
 那不勒斯——第 178、253、266、313、339、360、475、641、670 页。
 吕特岑——第 419、423 页。
 吕内维尔——第 307 页。
 沙布累——第 622、646、657 页。
 肖蒙——第 283、287 页。
 坎比奥——第 366、379、380 页。
 芒勃朗省——第 646 页。
 别洛斯托克——第 677 页。
 辛普朗山口——第 255、256、260、263、280、657、660 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 213、268、277、394、397 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560、673—675 页。
 来巴赫(柳布梁纳)——第 345、678 页。
- ## 八 画
- 阿契——匈牙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373 页。
 阿温——第 283 页。
 阿姆——法国的一个要塞。——第 488、497、504 页。
 阿腊贡——第 662 页。
 阿尔萨——第 287 页。
 阿尔堡——第 656 页。
 阿萨纳——第 366、386、638 页。
 阿拉斯——第 294 页。
 阿库伊——第 230 页。
 阿左拉——第 453、457 页。
 阿勒河——第 656、658 页。
 阿达河——第 234、254、256、258、259、263、272、274、403、421、489 页。
 阿斯蒂——第 398 页。
 阿尔夫河——第 647、658 页。
 阿本斯堡——第 234、482 页。
 阿普罗思——第 227 页。
 阿奥斯塔——第 260、652、660、662 页。
 阿普思卡——第 257、258 页。

- 阿穆尔河(黑龙江)——第 574 页。
阿尔登高原——第 285 页。
阿尔克河——第 649—651、653 页。
阿尔科列——第 213、268、488 页。
阿尔多夫——第 258 页。
阿尔班加——第 663、666 页。
阿尔尼亚托——第 381 页。
阿尔贝维耳——第 624、652、658 页。
阿尔及利亚——第 179、197、201、203、205、218、321、334、610、629、630、640 页。
阿尔巴尼亚——第 336 页。
阿克维利亚——第 254 页。
阿姆斯特丹——第 71 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 219、229、231、233、254—260、263、275、347、351、368、433、467、480、489、541、624、626、643—645、647—655、658、660、666—668、670、671 页。
阿哥尼亚河——第 385、386、417、418、420、424 页。
阿迪杰河(艾契河)——第 183、193、206、215—220、229、231、234、250、252—259、261—268、272—274、277、285、288、289、299、314、315、317、421、425、445、523、593、660 页。
阿耳黑西腊斯——第 609 页。
阿耳布拉山口——第 257 页。
阿尔汉格尔斯克——第 636 页。
阿比亚帖格腊索——第 385、427、428、439、440、480—482 页。
罗马——第 179、181、182、193、194、311、339、360、403、470、475、489、541、594 页。
罗察特——第 480、639 页。
罗贝科——第 429、430、481 页。
罗尼河——第 232、282、321、657、658 页。
罗斯巴赫——第 296 页。
罗曼尼亚——第 473、475、543、594、641、670 页。
罗克鲁阿——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84 页。
波河——第 213—215、220、229—232、247、249、250、252—255、263—265、269、273、274、277、282、290、293、294、299、314、317、349、366—369、379—387、389、390、393、398、399、416、419、421、422、429、440、441、467、478—480、482、489、625、635、636、661、667、670 页。
波拉(普拉)——在南斯拉夫。——第 372 页。
波尔多——第 197 页。
波罗的海——第 277、293 页。
波希米亚——见捷克。
波斯尼亚——第 336 页。
波佐伦哥——第 449、453、459 页。
波思基亚伏——第 655 页。
波南特海岸——第 665 页。
佩斯——匈牙利首都,现在布达佩斯的左岸部分。——第 372、565 页。
佩特耳施坦山口——第 254、261 页。
拉巴特——第 614 页。
拉芒什海峡——第 340、644 页。
拉姆布罗河——第 440、483 页。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第 312、335、644 页。
拉腊什(埃尔-阿拉伊什)——第 614、621、632 页。
法国——第 282—298 页。
法兰克尼亚——第 463 页。
帕尔马——第 181、183、185、266、274、312、318、339、360、387、459、469、473、475、545、594、641 页。

帕多瓦——第 267 页。
 帕维亚——第 179、185、213、253、276、
 379、380、385、386、389、399、419—425、
 429、440、479—481 页。
 帕勒斯特罗——第 402、413—417、479、
 639 页。
 庞尼克斯山口——第 258 页。
 庞塔菲尔山口——第 254、259、261 页。
 庞-迭-博富阿森(勒-庞-迭-博雷阿森)
 ——第 256 页。
 非斯——第 614 页。
 孟买——印度的城市和管区。——第 327、
 330 页。
 明乔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第
 193、206、213—220、229、230、232、234、
 252、258、262—269、272—275、277、
 282、288—290、293、294、296、299、314、
 315、317、365、433、435、438、439、441—
 445、448—450、452、454—457、460、
 470、474、478、483、484、488、492、523、
 593、635、636、640、670、672、686 页。
 玫瑰峰——第 660 页。
 依朗兹——第 258 页。
 易北河——第 317、419、423 页。
 松布尔河——第 284、285、289 页。
 些耳德河——第 284、285、294 页。
 舍亨塔尔——第 258 页。
 居塔希亚——第 561 页。
 的里雅斯特——第 180、219、220、250、
 372、377、382、460 页。
 金齐库尔姆——第 258 页。
 阜姆(里耶卡)——第 564 页。
 门的内哥罗——第 309 页。
 芬斯特闵茨山口——第 256、259、261、273
 页。
 彼得林根(佩埃恩)——第 657 页。
 直布罗陀海峡——第 615 页。

九 画

柏林——第 291、311、371、392—394、438、
 508、509、511、512、516—520、523、548、
 637 页。
 柏肯海德——第 238 页。
 洛林——第 251、295 页。
 洛桑——第 256、652 页。
 洛迪——第 185、488、489 页。
 洛纳托——第 441、442、444、453、454、
 489、640 页。
 洛阿诺——第 665 页。
 洛美洛——第 366、369、379 页。
 洛美利纳——第 379、380、382、383、385
 —388、399、419、425、638、639、645
 页。
 洛特布尔——第 282、647 页。
 美多列——第 268、454 页。
 美因河——第 276 页。
 美因兹——第 287 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313、314、346、
 361、371、377、393、395、463、548、598、
 599 页。
 迪尔河——第 285 页。
 迪韦德罗谷地——第 660 页。
 威尔士——第 549—551 页。
 威塞尔——第 288、289 页。
 威尼斯——第 143、178、180、183、262、
 372、474、641、643、645、670、672 页。
 威尼斯省——第 183、216—220、233、234、
 250、252、264、267、272、289、468 页。
 威克菲尔德——第 586、590 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 10、642 页。
 南锡——第 287、361 页。
 南布拉班特——第 285 页。
 哈里季——第 227、523 页。
 哈里法克斯——第 402 页。

哈特耳普耳——第 238 页。
 勃朗峰——第 624、647、658 页。
 勃兰登堡——第 512 页。
 勃伦纳——奥地利和意大利国境上的一个山口。——第 254、256、261、275、276 页。
 音河——第 256、259、261 页。
 音斯布鲁克——第 262、269、273 页。
 施蒂尔夫——见斯特尔维奥。
 施特廷(兹杰辛)——第 277、394 页。
 科佐——第 366 页。
 科摩——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403 页。
 科伦——第 285、287、289、311 页。
 科摩湖——第 255—257、260、273、403、404 页。
 科西嘉岛——第 297、341、349 页。
 科尔纳列——第 387 页。
 科尔别塔——第 427、428、430、481 页。
 科尔尼切——道路。——第 663 页。
 科马基奥——第 335 页。
 科布伦茨——第 446 页。
 科涅利安诺——第 219 页。
 科莫恩(科马罗姆)——第 373、397 页。
 科特阿尔卑斯山脉——第 660、662 页。
 科丁纳·达姆佩佐(科丁纳)——第 254 页。
 香港——第 571 页。
 恒河——第 523 页。
 耶拿——第 212、277、284 页。
 幽里希——第 289 页。
 恰克图——第 140 页。
 郎卡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22、238、240 页。
 约克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22、238、240 页。
 保加利亚——第 336 页。

柳提赫(列日)——第 285、287 页。
 英果尔施塔特——第 276 页。
 契维达列-德尔-弗里乌利——第 254 页。

十 画

埃及——第 25、503、675 页。
 埃德尔河——第 293 页。
 埃克斯堡垒——第 647、658 页。
 埃克缪尔——第 234 页。
 埃佩尔讷——第 283 页。
 埃克斯敏斯特——第 567 页。
 埃伦布莱施坦——第 288 页。
 乌利——瑞士的一个州。——第 655 页。
 乌尔姆——第 270、271、276、637 页。
 乌迪讷——第 256、660 页。
 乌凯马尔克——第 512 页。
 爱尔兰——第 42、43、221、243、244、549、552、553 页。
 爱森纳赫——第 548 页。
 爱北斐特——第 243 页。
 爱尔福特——第 280、419、423、599、691 页。
 索恩河——第 267 页。
 索恩河岸夏龙——第 506 页。
 索尔费里诺——第 449—452、454—457、460、470、484、485、487、490、493、522、638—640、692 页。
 索尔福特——第 523 页。
 索马康帕尼亚——第 234、267、450 页。
 热马普——第 285 页。
 热那亚——城市和港口。——第 231—233、260、277、334、341、349、350、365、367—369、379—382、387、388、477、624、645、660、663、665 页。
 热那亚海岸——第 665、666 页。
 热涅维(热涅瓦)——第 646、657 页。
 热安峰(吉甘特峰)——第 648 页。

- 泰图安——非洲的一个居民点。——第 610、613、614、619—621、627、628、630—632 页。
- 泰图安——非洲的一条河流。——第 614、616、619、629 页。
- 库内奥(科尼)——第 663 页。
- 库尔塔唐——第 266 页。
- 库斯托查——第 213、234、267、372、450 页。
- 特雷维佐——第 262、269、273 页。
- 特劳波(奥帕瓦)——第 678 页。
- 特尔米尼昂——第 653 页。
- 特尔多皮奥河——第 385、386 页。
- 特兰西瓦尼亚——第 336 页。
- 特隆皮亚谷地——第 259 页。
- 桑提亚——第 231 页。
- 桑德里奥——第 645 页。
- 桑塔路其亚——第 216、266、268 页。
- 纽约——第 338 页。
- 纽芬兰——第 444 页。
- 纽沙特尔——瑞士的一个州。——第 625、657 页。
- 纽沙特尔湖——第 656 页。
- 格米山口——第 659 页。
- 格罗斯特——第 586—590 页。
- 格拉斯哥——第 226、562 页。
- 格拉鲁斯——第 655 页。
- 格里斯山——第 660 页。
- 格劳宾登——第 261、655、660 页。
- 格腊波洛——第 383、386 页。
- 格勒诺布尔——第 282、651 页。
- 格腊迪斯卡——第 220 页。
- 格累夫森德——第 238 页。
- 格腊韦洛纳——第 386 页。
- 格留恩斯(格洛林察)——第 273 页。
- 纳瓦山口——第 663、664、666、667 页。
- 纳维利奥河——第 428 页。
- 纳维利奥大运河——第 427 页。
- 伦敦——第 10、88、168、186、239、240、291、325、326、328、330、332、334、345、380、407、498、521、523、539、547、561、563、564、567、570、573、575、587、678、686、688 页。
- 伦巴第——第 178、181—183、188、192—194、198、213、214、232、234、250、252、255、259、260、262—264、270、272、273、275—281、297、334、335、348、388、397、399、403、404、425、467、473、474、480、481、492、502、520、593、594、623、641、643、655、661、665、666、672 页。
- 马赛——第 197、334、365、383 页。
- 马尔瓦——第 330 页。
- 马振塔——第 418、420—422、425—432、439—442、449、452、480—482、486、487、490、513、639、640 页。
- 马连峨——第 213、220、231、234、255、269、380、488、652 页。
- 马拉加——第 619 页。
- 马德里——第 573 页。
- 马里兰——北美的一个州。——第 64 页。
- 马里昂堡——第 284 页。
- 马格德堡——第 377、393、394、523 页。
- 马乔列湖——第 366、379、386、403、479 页。
- 马尔纳河——第 283、286、287、292 页。
- 马尔纳河岸夏龙——第 287 页。
- 马达加斯加——第 199 页。
- 马丁斯布鲁克——第 257 页。
- 马斯特里赫特——第 287、289 页。
- 马尔鲍尔格(马尔鲍尔格托)——第 259 页。
- 马利尼亚诺(梅累尼亚诺)——第 213、422、440、441、483、639 页。
- 根特——第 286 页。

鬼桥——第 258 页。
 柴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22、240 页。
 拿骚——第 463、464 页。
 班堡——第 548 页。
 贡比臬——第 283、286、289、307、497 页。
 旁遮普——第 551 页。
 涅费尔斯——第 258 页。
 恩菲耳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08、210 页。
 海利布里奇——第 238 页。
 夏特耳-圣德尼——第 657 页。
 哥达——第 636、637 页。
 哥达——见圣哥达。

十一画

莫市——第 283 页。
 莫贝日——第 284 页。
 莫德林——第 678 页。
 莫拉维亚——第 314 页。
 莫里延高原——第 622、646 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 300、309、314、505、673 页。
 曼丘河——第 656 页。
 曼都亚——第 213—219、233、252、262、265—268、272—274、288、293、318、442、445、453、457、459、460、488、489、492、494、592、641 页。
 曼海姆——第 287 页。
 曼彻斯特——第 540、563、603 页。
 基瓦索——第 368 页。
 基泽河——第 234、254、261、263、441、449、453、454、456、457、460、483、513、640 页。
 康芬察——第 413—415 页。
 康德萨(卡斯提耳埃霍斯)——第 618—620 页。

康士坦丁——第 621 页。
 康斯坦茨——第 655 页。
 康波福米奥——第 593 页。
 梅代阿——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堡垒。——第 632 页。
 梅克内斯——第 614 页。
 梅济埃尔——第 284 页。
 梅累尼亚诺——见马利尼亚诺。
 密雷栖霞——第 213、234、482、488、665 页。
 密多塞克斯——英国的一个郡。——第 238、240 页。
 累翁——在西班牙。——第 616 页。
 累根斯堡——第 482 页。
 琉森——第 658 页。
 第戎——第 287 页。
 都灵——第 180、185、199、213、230、231、344、349、350、366—368、379、380、401、478、480、544、624、625、645、648、653、663、665、667、670 页。
 捷克——第 376、404 页。
 得比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22、240 页。
 崩维耳——第 658 页。
 教皇国——第 178、253、318、341、467、468、541—543、641、670 页。
 黄金海岸——第 438 页。
 雪恩布龙——第 493 页。
 绍林吉亚——第 463 页。
 莎姆伯里——第 622、624、646、649、651、663 页。
 培斯克拉——第 214—219、233、252、265、266、272、273、288、442、453、454、458、460、492 页。
 梯叶里堡——第 283、292 页。
 措尔恩多夫——第 296 页。
 盖尔曼尔斯海姆——第 288 页。

十二画

- 博岑(博耳察诺)——第 269、273 页。
 博登湖——第 256、261 页。
 博法洛拉——第 385、386、418、419、421、422、425—429、639 页。
 博伊泰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第 261 页。
 博尔戈福特——第 214、267 页。
 博尔米达河——第 229—231、260、264、366、665、666 页。
 博洛尼亚——第 641 页。
 博尔米奥(伏尔姆斯山口)——第 220、255、257、258 页。
 费拉拉——第 265、335、641 页。
 费拉河——第 261 页。
 费涅斯特雷利——第 651 页。
 斯图加特——第 676 页。
 斯图腊河——第 648、661、665、666 页。
 斯普累河——第 435 页。
 斯佩威亚——第 260 页。
 斯特拉斯堡——第 196、282、287 页。
 斯特拉杰拉——第 379、383、387、389、399、405、419、422 页。
 斯科里维亚河——第 379、387 页。
 斯特尔维奥(施蒂尔夫)山口——第 231、234、254—256、260、261、273、404 页。
 莱科——第 255、404 页。
 莱比锡——第 393、419、423 页。
 莱茵省——第 7 页。
 莱茵河——第 191、212、215、220、247、249、250、257、258、261、274、276、282、283、285—290、292—294、308、314、315、317、346、392、438、446、451、488、501、508、608、626、633、635—637、641、647、658、668、669、671—676、678、679 页。
 莱斯河——第 257、258 页。
 莱斯角——第 383 页。
 菲森——第 255、273 页。
 菲利普维耳——第 284 页。
 普罗凡斯——第 231、232、350 页。
 普法尔茨——第 446 页。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第 272 页。
 普罗洛尼恩——第 654 页。
 普拉格尔山口——第 258 页。
 提罗耳——山区。——第 215、216、218、219、220、234、255、259、261、266、267、269—272、274—277、404、460、594、660 页。
 提翁维耳——第 287 页。
 提契诺河——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第 179、217、255、260、263、265、268、274、345、366、367—369、383、385、387、393、403、417、418、420、421、424—429、432、433、460、479、635、639 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 672、674、677 页。
 提罗耳阿尔卑斯山脉——第 215、219 页。
 腊布(迪厄尔)——第 373 页。
 腊万纳——第 641 页。
 黑森—加塞尔——第 596—600 页。
 黑森—达姆斯塔德——第 211、446 页。
 斐维——第 656、657 页。
 琳道——第 262 页。
 凯恩——第 312、335、358、644 页。
 森泽河——第 656 页。
 喀布尔——第 574、575 页。
 扬子江——第 604 页。
 策勒河——第 656、657 页。
 闵斯德——第 257、593、655 页。
 敦克尔克——第 282、647 页。
 温斯柏利——第 238 页。
 富尔卡山口——第 659 页。

十三画

奥布河——第 286、287 页。
 奥得河——第 293、438 页。
 奥尔良——第 282 页。
 奥尔巴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第 230、264 页。
 奥尔勃河——瑞士的一条河流。——第 656、657 页。
 奥格斯堡——第 393 页。
 奥登纳德——第 285 页。
 奥涅利亚——第 624、660、663 页。
 奥利奥河——第 234、254、259、263、482 页。
 奥里欧罗——第 390 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 599、600 页。
 奥斯坦德——第 287 页。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 185、212、313、442、445、506、637 页。
 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第 251 页。
 塞塞耳——第 658 页。
 塞纳河——第 282、283、286、287 页。
 塞齐亚河——第 229、230、260、264、274、349、366、369、379、380、385—387、398、400、402、403、413、416、478、479 页。
 塞拉利奥——第 609 页。
 塞尔维亚——第 309、323 页。
 塞耳克尔克——第 227 页。
 塞齐亚谷地——第 660 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 291、300、397 页。
 塞斯托·卡兰德——第 231、256、403 页。
 塞美林——东阿尔卑斯山的山口。——第 489 页。
 塔兰特兹——第 622、646 页。
 塔纳罗河——第 230、264、398、663—666 页。

塔腊门托河——第 254、263 页。
 瑟堡——第 181 页。
 滑铁卢——第 180、285 页。
 葡萄牙——第 293 页。
 意大利——第 213、214 页。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一个邦。——第 558 页。
 雷申-舍迪克山口——第 257、259 页。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第 213、260、489、660、662、665、666 页。

十四画

蒙斯——第 282 页。
 蒙多维——第 213、234 页。
 蒙美利安——第 649 页。
 蒙费拉托——第 645 页。
 蒙特诺特——第 213、234、482、488、665 页。
 蒙特贝洛——第 383、387、389—391、398—402、416、430、449、478、488、493、638 页。
 蒙特维多——第 179 页。
 蒙特克亚里——第 442、445 页。
 蒙特科尔诺——第 257 页。
 蒙特涅格罗——第 618、619、630、631 页。
 蒙沙弗卡列——第 653 页。
 蒙塞尼山口——第 231—233、334、350、367、624、648、650—653、660、663 页。
 蒙塔博尔山(塔博尔)——第 648、652 页。
 蒙特伊泽兰山口——第 624、653 页。
 蒙热涅夫尔山口——第 231、232、350、648、651、653 页。
 维也纳——第 209、219、251、255、256、262、267、269、273、276、289、291、294、295、306、318、334、338、340、341、356、362、369、371、373—377、450、451、473、493、503、512—514、517、518、595、625

页。
 维罗那——第 214—219、282、265—268、273、442、445、460、488、492、494、516、639、678 页。
 维琴察——第 217、218、262、267、268 页。
 维阿马拉——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山口。——第 257 页。
 维吉瓦诺——第 366、379、383、385、420、424、480、481 页。
 维多利亚——澳大利亚的一个邦。——第 558 页。
 维尔腾堡——第 211、395、446、463 页。
 维耳讷夫——第 656、657 页。
 维列佐托——第 479 页。
 维斯拉河——第 293、392、438、674、675、679 页。
 维拉弗兰卡——第 472—475、500、507、541—543、547、592—594、641、642、677、691 页。
 维苏威火山——第 178 页。
 魁北克——第 444 页。
 福尔马察谷地——第 660 页。

十五画

德里——第 120 页。
 德果——第 213、234、488、665 页。
 德蒙特——第 661 页。
 德勒斯顿——第 505 页。
 德散扎诺——第 454 页。
 德尔维奥——第 257 页。
 德森(提契诺)——瑞士的一个州。——第 645、655、666 页。
 摩洛哥——第 199、609、614、616、627、630—632 页。
 摩地那——第 181、183、185、266、313、318、339、360、469、473、475、542、543、594、641 页。

摩加多尔——第 614、632 页。
 摩尔塔拉——第 380、387、419、420、423、424、480 页。
 摩塞尔河——第 283、284、287、292 页。
 撒丁——见皮蒙特。
 撒丁岛——第 641 页。
 鲁科斯——见鲁科斯河。
 鲁科斯河——第 614 页。
 剑桥——第 134 页。
 慕尼黑——第 269、273、276、277、377、393 页。
 赖兴堡——第 377 页。

十六画

诺罗——第 259 页。
 诺维——第 213、230、380、381、387、398、415 页。
 诺伊斯——第 287 页。
 诺瓦拉——第 183、213、231、234、366、379、380、386、414—422、424、428、479、480、639 页。
 诺瓦列捷——第 386 页。
 穆蒂埃——第 624、654 页。
 穆塔塔尔——第 258 页。
 霍根林登(霍恩林登)——第 269 页。
 霍恩弗里德贝尔格——第 296 页。
 锡耶纳——第 645 页。

十八画

萨瓦——第 231、260、477、544、545、622—626、633、642—651、653—659、663、664、666、672、677 页。
 萨累——第 379、632 页。
 萨雷——第 240 页。
 萨涅河(萨宁)——第 656、657 页。
 萨尔河——第 287 页。
 萨沃纳——第 663—667 页。

萨克森——第 394、395、404 页。

萨兰什——第 658 页。

萨托里——凡尔赛附近的高地。——第

196、307、308、427、434、503 页。

萨沃尔日——第 664 页。

萨尔茨堡——第 261、269 页。

萨特里日河——第 523 页。

萨辛纳谷地——第 257 页。

萨比亚谷地——第 259 页。

镇海——第 569 页。

货币、重量、容量名称表

货 币

1 镑(英国金币)= 20 先令	马克(德国铸币)
1 先令(英国银币)= 12 辨士	多布萨(西班牙金币)
1 辨士(英国铜币)= 4 法寻	马拉维第(西班牙铸币)
半辨士(英国铜币)= 2 法寻	瑞斯(葡萄牙铸币)
法寻(英国铜币)	1 伊彼利阿耳(俄国金币)= 15 卢布
1 基尼(英国金币)= 21 先令	1 卢布(俄国银币)= 100 戈比
1 索维林(英国金币)= 1 镑	戈比(俄国铜币)
1 法郎(法国铸币)= 100 生丁	1 鹰币(美国金币)= 10 美元
1 利弗尔(法国银币)= 1 法郎	杜卡特(欧洲金币,起源于意大利)
1 拿破仑币(法国金币)= 20 法郎	1 克朗(丹麦、挪威和瑞典的铸币)= 100 欧耳
埃巨(法国铸币)	
阿西涅(法国纸币)	

重 量

(英国的重量单位)

常 衡		金 衡	
1 夸特	12 700 公斤	1 磅= 12 盎司	372 242 克
1 磅	453 592 克	1 盎司= 20 本尼威特	31 103 克
1 克拉(也是衡量合金中金的含量的尺度)	0 200 克	1 本尼威特= 24 克冷	1 555 克
		1 克冷	0 065 克

容 量

(英国的容量单位)

1 夸特= 8 蒲式耳	290 790 升	1 加仑= 8 品脱	4 544 升
1 蒲式耳= 8 加仑	36 349 升	1 舍费耳(普鲁士的容量单位)	54 960 升

译 后 记

本卷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是在徐坚的译文的基础上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1961 年所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十三卷校订的；这一著作的序言在校订时还参考了俄、英、日等文译本。此外，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这一著作，在附录中加了一个“货币、重量、容量名称表”。

“新的对华战争”和“对华贸易”两篇文章是在人民出版社 1961 年所出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译文基础上校订的。

参加本卷翻译工作的有刘晔星、李俊聪、丁世俊、王锦文；负责校订的是张文焕、张奇方；部分地参加译校工作的有宋书声、张慕良、杜章智、吴达琼、冯如馥；参加资料工作的有孔令钊、陈瑞麟。“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是集体校订的，参加的有周亮勋、樊以楠、屈洪、陈国雄、荣敬本、杨启漪、张钟朴、王锡君、麦明尧、王燕华、沈渊、薛中平、孙开焕、于华、鲍世明、王全民、冯文光、孔熙忠、余大章、刘炎等；校订稿全部经原译者徐坚审阅过。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